

毛泽东书信赏析

王树山 王建夫 编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王树山



毛澤東書信賞析

王樹山 王建夫 編著

山東人民出版社

中石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泽东书信赏析/王树山,王建夫编者. —2版.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1
ISBN 7-209-02128-0

I. 毛... II. ①王... ②王... III. 毛泽东著作—书信集—鉴赏 IV. A84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084 号

毛泽东书信赏析

王树山 王建夫 编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政编码:2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泰安市长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8 印张 2 插页 800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6001—9000 定价:50.00 元

顾问：臧克家

赵树丛

封面题字：欧阳中石

编 著：王树山

王建夫



王树山（左），王建夫（右）与欧阳中石先生（中）在一起（2008年8月）



毛泽东在工作



毛泽东书写的部分信件

再版说明

200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那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和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对中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毛泽东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毛泽东逝世后的27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敬爱的领袖,而是深刻铭记他的丰功伟绩,他的教诲和他开创的壮丽事业。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的深切缅怀和崇敬之情,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伟大人物最好的怀念,就是接过他们开创的事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更大的业绩,而不是仅仅沉湎于对过去业绩的追忆。毛泽东领导开创的事业是伟大的,但我们今天和明天的事业更伟大,更辉煌。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但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我们必须一以贯之。研究和探讨毛泽东思想,对于全面理解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毛泽东书信赏析》一书进行补充、修订,再次出版,使内容更加丰富,资料更加翔实,形式更加精美,展现毛泽东生平事迹、思想理论、大成智慧,文韬武略和情感历程更加生动,这不仅是向毛泽东诞辰110周年的献礼,而且对于进一步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具有积极意义。

王树山 王建夫

2004年1月于泉城济南

第一版序言

世纪伟人毛泽东以其超卓的天才智慧,为世人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字著述。这些著述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作用于特定的历史时代,并能超越该时代,赋予新时代以新的精神动力。研究这些著述,对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书信作为毛泽东著作整体中一个不可或缺又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脍炙人口之篇不胜枚举。轻展领袖封封书信,就如同观赏一部活生生的中国革命史,举凡发生在毛泽东一生中的一切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能在信中找到如影相随的斑斓痕迹。把毛泽东书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独立的研究、探讨、赏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次勇敢者的探索。王树山、王建夫同志,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典籍,进行了艰苦的专题采访,不断考证、注释、赏析、编排,晨抄晚写,终于形成了一部专著,名为《毛泽东书信赏析》。我为他们这种勤于学习、精于思考的精神所感动,也是想鼓励他们在这方面作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研究,故欣然同意在该书即将出版的时候写几句话。

该书基本上是以历史为线索,以重大事件为重点,共搜集毛泽东近 60 年间有代表性的书信精华之作 180 余封,基本能代表毛泽东书信的全貌:分为求学立志篇、探索真理篇、星火燎原篇、同舟共济篇、海人施政篇、肝胆相照篇、治国兴邦篇等七篇。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每封书信写作时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认真的考证和比较全面的介绍,详细分析了每封信的具体内容和突出特点,最后写出了个人的研读体会。同时,对信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典故术语等还作了补充注释。

该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发展、情感历程和革命生涯,是从一个新的角度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的有益尝试。全书观点明确,史料翔实,见解精辟,情感真挚,态度严肃,赏析清晰明了,繁简适中,既有一定的可读性,又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一部以书信为突破口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研究的好书,可以让读者在毛泽东广博无垠的思想海洋中寻得一方脚踏实地的绿岛。因此,本书将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是无疑的!

希望编著者今后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

徐树绩

1997 年 8 月于山东师范大学

第一版前言

历史已经定论：东方巨人毛泽东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几个历史人物之一。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代表者，其政治生涯波澜壮阔、辉煌灿烂，其思想体系浑然天成、博大精深，其理论著述鸿篇巨制、雄冠古今，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最为丰富的智慧宝库。毛泽东书信就是这智慧宝库里闪闪发光的璀璨明珠。

无论是青少年时期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战争时期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是建设时期的施政治国、泽润东方，毛泽东都以革命家的气度、政治家的胸襟、战略家的睿智、理论家的深邃、艺术家的激情，为世人留下了一幅幅经天纬地、气吞寰宇、情洒人间的亲笔书信。这些书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党外人士、亲朋故旧、师友学兄间的情感、交往历程，在亿万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人民领袖雄伟壮阔的精神丰碑，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姿、光彩照人的历史画卷。

由于毛泽东独具的历史地位、特有的领袖气质、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超卓的语言驾驭能力，他的书信或慷慨激昂、雄浑豪放，或庄严凝重、深沉悲壮，或情理兼具、诲人不倦，或幽默含蓄、质朴无华，或温婉有节、热情坦率，或崇论宏议、涉深识远……大凡读过他书信的人，无不为其信中折射出的光辉思想、非凡才智、高尚人格和博大胸襟所折服。他那支如椽大笔，匠心独运，挥洒自如；笔力所及，可包举宇内，并吞八荒，读后使人心潮澎湃，感奋不已。

毛泽东书信所以能让人掩卷起敬、过目难忘，还因为他融于信中博大而真挚的思想情感。毛泽东是极重感情之人：戎马倥偬之中，他爱兵如子，体恤民情，坦荡无私，心忧天下；身居高位之后，仍无君临天下之傲岸，惟有人民至上之襟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信贵情，情贵真。在毛泽东风格各异、情韵万种的书信里，有革命豪情，有儿女柔情，有战友深情，有故园乡情，有盟军挚情，有师友亲情，凡此种种，皆发于衷，寓于理，入于深，出于浅。再加上他世情洞达、议论风生的书信语言，读之使人心暖肠热，深受启迪。

领袖千古，整廿一载。导师著作，辉竟日月；素日酷读，爱不释卷；读之愈深，仰望愈诚。值此毛泽东逝世 21 周年之际，谨以拙作敬表无限崇仰、缅怀之深情。

王树山 王建夫

1997 年 8 月于泉城济南

凡 例

一、本书乃毛泽东书信精品之荟萃，收录自1915年2月至1974年11月近60年间有代表性的书信190封，其中再版时补加9封，并附图片、手迹若干。书信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并根据不同时期的主题略分为七篇。

二、所选书信注重广泛性、思想性、欣赏性，能反映时代大背景，文献史料价值高，文学艺术特点突出，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所选书信皆刊印自己正式出版的公开出版物，注明出处，不出校记。

四、每封书信选择了一句有代表性的原话作为该信的主标题。

五、对于信中涉及到的重要人物、事件和重点、难点、疑点问题作了注释，对收信人力求更加详细，以便加深对书信的理解。重复释目用参见条加以注明。

六、每封书信附一篇赏析文章。

七、本书截稿于2003年8月，此后发生的变动，只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酌情修改，一般不予补正。

八、书末附有信中重要注释词目的笔画索引，以供检索。

总 目

再版说明	(1)
第一版序言	(1)
第一版前言	(1)
凡 例	(1)
篇 目	(1—11)
正 文	(1—568)
求学立志篇	(1—34)
探索真理篇	(35—94)
星火燎原篇	(95—154)
同舟共济篇	(155—206)
诲人施政篇	(207—356)
肝胆相照篇	(357—384)
治国兴邦篇	(385—568)
附 录	(569—580)
再版后记	(581—582)

篇 目

求学立志篇

- “《盛世危言》失布匣”
——致文运昌(1915年2月24日) (2)
-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致湘生(1915年6月25日) (6)
- “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
——致萧子升(1915年9月6日) (9)
- “就良图,立远志”
——致黎锦熙(1915年11月9日) (13)
- “情景宛在,感念奚如”
——致萧子升(1916年6月26日) (16)
- “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致萧子升(1916年7月18日) (18)
- “望时惠箴规,借益愚陋”
——致萧子升(1916年7月25日) (22)
- “德智所寄,不外于身”
——致黎锦熙(1916年12月9日) (28)
- “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致白浪滔天(1917年春) (32)

探索真理篇

-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 (36)
- “《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
——致黎锦熙(1919年9月5日) (43)
- “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致陶毅(1920年2月) (45)
- “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
——致黎锦熙(1920年3月12日) (49)
- “办一个自修大学”
——致周世钊(1920年3月14日) (51)
- “寻佚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致黎锦熙(1920年6月7日) (54)

“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	
——致曾毅(1920年6月23日)	(57)
“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	
——致向警予(1920年11月25日)	(61)
“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	
——致欧阳泽(1920年11月25日)	(64)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致罗章龙(1920年11月25日)	(66)
“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	
——致张国基(1920年11月25日)	(69)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	
——致罗学瓒(1920年11月26日)	(71)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致蔡和森(1920年12月1日)	(74)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致蔡和森(1921年1月21日)	(81)
“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	
——致彭璜(1921年1月28日)	(84)
“遵第一号通告”	
——致施复亮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1922年6月20日)	(87)
“托带片言,借当问候”	
——致文玉钦、文赵氏(1922年11月11日)	(90)
“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	
——致林伯渠、彭素民(1923年9月28日)	(92)

星火燎原篇

“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	
——致中共中央(1929年3月20日)	(96)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	
——致中共中央(1929年4月5日)	(101)
“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致林彪(1929年6月14日)	(109)
“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	
——致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8日)	(118)
“共产主义的敬礼”	
——致李立三(1929年11月28日)	(12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致林彪(1930年1月5日)	(124)
“严厉督促,不稍疏忽”	
——致江西省行委(1930年11月20日)	(132)
“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	
——致周以栗、谭震林等(1931年6月28日)	(136)
“诱敌深入”	
——致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1932年9月中旬)	(140)
“占领川陕甘三省”	
——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935年6月16日)	(143)
“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1935年9月8日)	(146)
“优待俘虏”	
——致林彪、聂荣臻、朱瑞等(1935年3月2日)	(152)

同舟共济篇

“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	
——致高桂滋(1936年)	(156)
“甚望加速推动之力”	
——致杜斌丞(1936年8月13日)	(159)
“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	
——致杨虎城(1936年8月13日)	(161)
“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	
——致宋哲元(1936年8月14日)	(164)
“严密警戒,十分团结”	
——致王以哲(1936年)	(166)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致邵力子(1936年9月8日)	(169)
“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致王均(1936年9月8日)	(171)
“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	
——致朱绍良(1936年9月8日)	(173)
“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	
——致宋庆龄(1936年9月18日)	(175)
“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 (1936年9月18日)	(179)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致蔡元培(1936年9月22日)	(183)

“停止内战一致对日”

——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1936年9月22日)..... (186)

“愿先生速起图之”

——致张学良(1936年10月5日)..... (190)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致许德珩等(1936年11月2日)..... (192)

“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致蒋介石(1936年12月1日)..... (196)

“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致冯玉祥(1936年12月5日)..... (200)

“共维大局”

——致阎锡山(1936年12月22日)..... (203)

诲人施政篇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

——致徐特立(1937年1月30日)..... (208)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

——致埃德加·斯诺(1937年3月10日)..... (215)

“惟有斗争方能胜利”

——致何香凝(1937年6月25日)..... (217)

“不可自夸红军长处”

——致彭雪峰(1937年8月10日)..... (223)

“何时走,我来看你”

——致周素园(1937年10月6日)..... (226)

“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

——致雷经天(1937年10月10日)..... (228)

“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1937年10月25日)..... (230)

“何时有空,我来看你”

——致艾思奇(1937年)..... (233)

“惟有合群奋斗”

——致文运昌(1937年11月27日)..... (236)

“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

——致范长江(1938年2月15日)..... (243)

“废止称残废院”

——致何长工(1938年2月25日)..... (246)

“高明如兄,谅有同情”

——致邓宝珊(1938年12月5日)..... (250)

“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致何干之(1939年1月17日)	(252)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	
——致萧三(1939年6月17日)	(255)
“发展,向上,愉快”	
——致毛岸英、毛岸青(1939年8月26日)	(257)
“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	
——致范文澜(1940年9月5日)	(259)
“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致毛岸英、毛岸青(1941年1月31日)	(264)
“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	
——致萧军(1941年8月2日)	(270)
“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	
——致谢觉哉(1941年8月6日)	(272)
“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致谢觉哉(1941年8月22日)	(275)
“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	
——致中共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 (1941年9月29日)	(277)
“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	
——致陈毅(1942年8月4日)	(279)
“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	
——致何凯丰(1942年9月15日)	(282)
“让自由主义暴露”	
——致何凯丰(1943年4月22日)	(28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致杨绍萱、齐燕铭(1944年1月9日)	(287)
“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	
——致彭德怀(1944年1月10日)	(291)
“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致周扬(1944年4月2日)	(293)
“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致李鼎铭(1944年4月29日)	(295)
“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致丁玲、欧阳山(1944年7月1日)	(299)
“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	
——致秦邦宪(1944年8月31日)	(302)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致郭沫若(1944年11月21日)	(305)
“很想和你见面”	
——致沈雁冰(1944年11月21日)	(310)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	
——致陈毅(1944年12月1日)	(313)
“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	
——致邓宝珊(1944年12月22日)	(316)
“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	
——致萧三(1945年2月22日)	(320)
“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致柳亚子(1945年10月4日)	(323)
“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结果”	
——致洪禹(1946年3月12日)	(330)
“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1946年8月22日)	(332)
“照所定方针去做”	
——致习仲勋(1946年9月2日)	(335)
“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致陆定一(1946年9月27日)	(337)
“海喻勤勤,感且不尽”	
——致符定一(1946年9月30日)	(339)
“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致朱德、刘少奇(1947年6月14日)	(342)
“你要看历史小说”	
——致毛岸英(1947年9月12日)	(346)
“只要有热情,有恒心”	
——致毛岸英(1947年10月8日)	(348)
“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	
——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1948年3月2日)	(350)
“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	
——致刘少奇(1948年3月6日)	(353)

肝胆相照篇

“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致李济深、沈钧儒(1948年5月1日)	(358)
“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致吴玉章(1948年8月15日)	(360)
“有益于国计民生”	

——致刘少奇(1948年10月26日)	(362)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致吴晗(1948年11月24日)	(364)
“谨请命驾北来”	
——致陈嘉庚(1949年1月20日)	(368)
“同德同心,再接再厉”	
——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 (1949年2月2日)	(370)
“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致李宗仁(1949年4月8日)	(372)
“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致张澜(1949年6月1日)	(374)
“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致宋庆龄(1949年6月19日)	(376)
“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	
——致程潜(1949年7月4日)	(380)
“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	
——致黄炎培(1949年8月26日)	(382)

治国兴邦篇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致杨开智(1949年10月9日)	(386)
“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	
——致周世钊(1949年10月15日)	(387)
“剿办须有策略步骤”	
——致刘鄯一(1950年3月14日)	(389)
“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致杨开智、李崇德(1950年4月13日)	(394)
“不宜由弟推荐”	
——致毛森品(1950年4月18日)	(397)
“不必远道来京”	
——致李祖一(1950年4月18日)	(401)
“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	
——致文洞泉(1950年5月7日)	(403)
“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	
——致叶健农(1950年5月12日)	(407)
“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	
——致周文楠(1950年5月12日)	(408)

“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致刘亚南(1950年5月27日)	(410)
“说富农的部分长了,反而不清楚”	
——致刘少奇(1950年6月4日)	(411)
“未知有此决心否”	
——致谭世瑛(1950年8月31日)	(414)
“一概不要修建”	
——致黄克诚、王首道(1950年9月20日)	(416)
“请予酌办见复”	
——致王首道(1950年10月11日)	(418)
“这是不可避免的”	
——致陈叔通(1950年12月18日)	(420)
“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	
——致周世钊(1950年12月29日)	(422)
“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致饶漱石、陈丕显(1951年1月10日)	(427)
“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	
——致张澜(1951年1月22日)	(429)
“计划轮番作战兵力”	
——致周恩来(1951年2月7日)	(431)
“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	
——致黄炎培(1951年2月17日)	(435)
“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	
——致李达(1951年3月27日)	(437)
“似以不印为宜”	
——致毛宇居(1951年4月5日)	(439)
“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	
——致张元济(1951年7月30日)	(441)
“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	
——致陈叔通(1951年10月14日)	(443)
“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	
——致毛泽连、毛运梯(1951年12月11日)	(444)
“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	
——致张有威(1952年7月7日)	(446)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	
——致黄炎培(1952年9月5日)	(448)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	
——致齐白石(1952年10月5日)	(451)

“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	
——致彭德怀(1953年6月21日)	(453)
“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	
——致毛月秋(1953年10月4日)	(455)
“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	
——致李漱清(1953年10月16日)	(457)
“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致廖静文(1953年12月13日)	(458)
“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	
——致彭石麟(1954年3月31日)	(460)
“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致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1954年4月)	(466)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	
——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1954年4月29日)	(468)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	
——致卫立煌(1955年3月17日)	(470)
“辩论总是会有益的”	
——致蒋竹如(1955年5月1日)	(472)
“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致中共湘乡县委(1955年5月17日)	(474)
“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	
——致田家英(1955年9月27日)	(476)
“奉和一律,尚祈指政”	
——致周世钊(1955年10月4日)	(478)
“亲爱的太姐”	
——致宋庆龄(1956年1月26日)	(480)
“我可作证”	
——致曹云芳(1956年8月11日)	(481)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	
——致黄炎培(1956年12月4日)	(483)
“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	
——致周世钊(1956年12月5日)	(485)
“应以新诗为主体”	
——致臧克家(1957年1月12日)	(487)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致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	
(1957年3月17日)	(489)
“我失骄杨君失柳”	

——致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492)
“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象征”	
——致《真理报》编辑部(1957年11月20日)	(494)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	
——致刘建勋、韦国清(1958年1月12日)	(496)
“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	
——致刘少奇(1958年2月10日)	(499)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致田家英(1958年4月27日)	(501)
“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	
——致张治中(1958年5月22日)	(503)
“问题还在争论中”	
——致周谷城(1958年7月28日)	(505)
“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	
——致周世钊(1958年10月25日)	(509)
“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	
——致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 (1958年10月25日)	(511)
“这篇文章可以转载”	
——致吴冷西(1958年10月)	(513)
“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	
——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 (1958年11月9日)	(515)
“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	
——致刘思齐(1959年1月15日)	(517)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致胡乔木、吴冷西、彭真(1959年4月25日)	(519)
“要如实公开报道”	
——致胡乔木、吴冷西(1959年6月20日)	(521)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致田家英(1961年1月20日)	(523)
“就照这样付印”	
——致何其芳(1961年1月24日)	(525)
“向群众寻求真理”	
——致邓小平(1961年4月25日)	(527)
“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	
——致李井泉并陈正人(1961年5月6日)	(530)
“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	

——致张平化(1961年5月14日)	(532)
“照此报告,坚决执行”	
——致邓小平(1961年6月22日)	(534)
“不计时日,以愈为度”	
——致胡乔木(1961年8月25日)	(536)
“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致周世钊(1961年12月26日)	(542)
“我们两家同是一家”	
——致杨开智(1962年11月15日)	(544)
“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	
——致张千(1963年5月26日)	(546)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	
——致章士钊(1965年7月18日)	(551)
“诗要用形象思维”	
——致陈毅(1965年7月21日)	(553)
“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	
——致李先念(1965年8月15日)	(556)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致江青(1966年7月8日)	(558)
“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	
——致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1967年12月17日)	(562)
“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	
——致李庆霖(1973年4月25日)	(564)
“不要说没有工作”	
——致江青(1974年11月20日)	(566)



(1913 年的毛泽东)

求学立志篇

“《盛世危言》失布匣”

——致文运昌^[1](1915年2月24日)

咏昌先生：

书十一本，内《盛世危言》^[2]失布匣，《新民丛报》^[3]损去首叶，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4]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书二本，信一封。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注释】

[1]文运昌(1884—1961)，字咏昌，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坵(当时属湘乡)人，毛泽东的表兄。早年毕业于湘乡县立师范，在乡任小学教师。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农民运动，任湘乡县凤音乡农民协会秘书等。建国后，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是据收信人的回忆等判定的。

[2]《盛世危言》，清末郑观应著。该书批评清廷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主张变革以御外侮，倡议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

[3]《新民丛报》，半月刊，梁启超主编。1902年在日本横滨创刊，1907年停刊，共出96期。初期曾载梁启超的《新民说》等，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与政治思想，宣传维新，抨击清廷顽固派，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1903年后反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受到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批判。

[4]泽东，即毛泽东(1893—1976)。湖南湘潭人。字润芝。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加过湖南新军。1913年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1914年随校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8年4月与蔡和森等组织新民学会。同年8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1919年回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同年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1920年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1923年6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1924年参加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活动，

曾在国民党一大和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1925年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同年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作了较深刻的论述。1926年11月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1927年3月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同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八七会议，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会师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同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此前后，相继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提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开创了武装夺取政权的新的革命道路。1930年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同年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与朱德等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1931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年1月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和红军中的统治。遵义会议后，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战胜国民党政府军的围追堵截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同年12月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路线和政策。1936年12月任中央军委主席，并担任这一职务直至逝世。1937年先后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抗日战争爆发后，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努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938年先后写了《论持久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军队制定了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纲领。1942年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后在他逝世前的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会上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政治局主席。1945年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抗日战争胜利后，与周恩来等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1946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后，指挥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政府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1948年9月后，亲自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1949年3月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必须由农村转向城市。后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明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任务和方针。同年9月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全国政协主席。建国后，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任务，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并主持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1954年在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56年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年夏发动反右派斗争。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错误地发动对彭德怀的批判,并进而在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1963年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发动了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运动。1974年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他的某些错误也导致了一些重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在晚年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就其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建立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主要著作编为《毛泽东选集》等。

【赏析】

19世纪末的中国正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风云变幻、动荡不安的时代,正是一个需要巨人且产生巨人的时代。1893年底,在湖南湘潭县一个不起眼的山村,毛泽东诞生了。毛泽东生在农家茅舍,祖辈世代务农。父亲毛顺生精于经营,克勤克俭。母亲温和善良,勤劳俭朴,善于持家,乐于助人。这使毛泽东从小同情农民,养成了热爱劳动的好习惯。从六岁起,毛泽东就下地劳动,与劳苦大众有着深切、朴素的感情。农民的悲惨生活深深地触动着他幼小的心灵,贫苦农民的勤劳、勇敢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使他从小就正直善良,嫉恶如仇。在与农民的接触中,他得出如下结论:要改变农民的悲惨命运,就必须识字,只有拥有知识,才能改变现状。为此,毛泽东发奋读书。1902年,他入家乡私塾攻读诗书,先后就学于韶山美公桥、桥头湾、钟家港、井湾里、乌龟井、东茅塘等地。断断续续的读书生活,使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因贴近下层民众的生活,确立了兼济天下、解民倒悬的远大志向。1910年,毛泽东因不满于私塾的封建礼教,辍学在家务农,父亲让他去米店当学徒,毛泽东极不情愿。为了说服父亲,这位聪明倔强、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韶山骄子,设筵劝父,得到父亲同意,离开韶山,来到外婆家——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东山小学堂,对毛泽东帮助最大的是表兄文运昌。文运昌向他介绍了这个学堂的情况及学校“新法教育”改革,并经常提供图书给他阅读。毛泽东除了读中国古代的历史以外,还喜欢读外国的历史、地理及其他各种书籍。当时新书报流传很少,文运昌就多方寻找,向毛泽东推荐。在文运昌推荐的进步书籍中,最令毛泽东爱不释手的,是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这两个刊物倡导民主、改良、变革维新,反对封建礼教,使毛泽东眼界大开。同时,梁启超那笔端带情的文章,也使毛泽东很受鼓舞,爱不释手。1915年寒假,已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来到外婆家向八舅拜年,顺便向文运昌还了先前借过的部分书籍,同时夹上了这封短信。

此信虽短,却体现了少年毛泽东酷爱读书、精于读书的精神。信中提到的《盛世危言》一书,作者是郑观应。郑观应17岁赴上海学习商务,是商界著名人物,面对外国侵略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他不满于现状,期望革新,振兴中华。在《盛世危言》一书中,他强烈地

批评了当时中国顽固派的泥古不化,甘心愚陋、受制于人,指责洋务派学习西方技术,而不从事本国的政治改革,是“遗其体而求其用”,“遗其精义而袭其皮毛”。他认为:“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由此他主张变革,要求设立议院,广办学校,发展工商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实行“商战”,以抵制侵略,挽回权利。对于《盛世危言》一书,毛泽东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曾明确地说:“我当时非常喜欢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书中变革图新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毛泽东,使他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四书五经”的新世界。他从反叛意识出发,逐渐了解到一些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大势,开始从政治上思考救国救民的问题,从而激发了他深沉而又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期望历史大变革的改良主义精神。

信中提到的另一种刊物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该报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封建顽固派,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很大。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都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思想家,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都主张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讲求新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们逃亡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积极介绍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康有为认为:“穷则变,变则通。天道,后起者胜于先起也;人道,后人远于前人也。”这是对几千年来“天不变,道也不变”的形而上学观念的大胆否定。梁启超力主创新,反对做古人之奴隶,改良人心道德,培养“新民”。这些思想对于青年毛泽东有着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康梁的文风多为平易畅达,反对桐城派古文风,以求经世致用,可执晚清文坛之牛耳。特别是梁启超的“野狐”笔法,“其文条理清晰,笔锋常带感情”。毛泽东对此极为崇拜,并积极效仿,他的文章恣意纵横,笔力千钧,深得康梁笔意,备受师友赞赏,可见康梁对其影响之深。

政治上的敏感性,以及救国救民思想的初步形成,使毛泽东对进步刊物读而又读,翻了又翻。由于太喜欢读这些书,致使有些书已残缺不全,所以,信中说:“《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掘去首叶。”这体现出毛泽东对接触新思想的浓厚兴趣和迫切愿望。

此信渗透着毛泽东对文运昌表兄的一片尊敬、真挚的感情。毛泽东比文运昌小九岁,他们自幼交往亲密,情同管鲍。文运昌劝说毛泽东来到东山高等小学堂,替他办了入校注册手续,并做了他的入学担保人,还向毛泽东介绍进步书刊,这使毛泽东非常感激。虽然在辈份上属平辈,但信中却称其为“咏昌先生”,可谓意仰情长。落款“泽东敬白”,更是敬有三分。只是书被读“破”,很是抱歉,“尚希原谅”,足见毛泽东温厚、真挚、诚恳的态度。

全信虽只40余字,但言辞简约,凝炼集中,情生万端,意厚笃诚,读后叫人感慨不已。

“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

——致湘生^①(1915年6月25日)

湘生足下:

初一日接君书,今二十五日矣,未作复者,吾暑假住处未定也。前友人招往浏阳,继吾不欲往,寓省城又无钱,故止有回家一法。学校试验今日完,吾于课程荒甚。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序,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②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③。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阅足下所定课程及为学之功,使愧悔无地。不知足下之意,学校与自修果已定否?看君欲学英文、数学,又似预备进学校。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④。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⑤。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原,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同学陈子^⑥,有志之士,余不多见。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盍留意焉!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以为然乎?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⑦君病死,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踟躅南城隈。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瀣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飏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⑧。荡涤淮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⑨。郑某处书三本,信一函,今寄来。油纸三十张,钱三百,款小路远,不必汇寄。训学生词一纸,保命丸一纸,可阅也。足下读书有得,望函以见告。余容后呈,敬请课安!

又《明耻篇》一本,本校辑发,于中日交涉,颇得其概,阅之终篇,亦可得新知于万一也。

泽东顿首

六月廿五日

复启者,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吴校长,即作训学生辞者,教习闻皆一时名宿。阅其招学通告,固自与他校不同,吾意与足下宗旨相合,可来考乎?寄上通告一纸,

伏乞详察》。

泽东又及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影印

【注释】

〔1〕湘生，情况不详。

〔2〕曾文正，即曾国藩（1811—1872），字泽生，湖南湘乡人。清末湘军首领。道光进士。1853年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以吏部侍郎身份在湖南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等军事工业。有《曾文正公全集》，文中提到的“曾文正家书”，俱收录其中。

〔3〕语见曾国藩咸丰七年（1857年）十二月十四日《致沅弟》信。原文为：“沅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

〔4〕康有为（1858—1927），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广东南海人，故人称康南海。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后，他联合1300多名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派相对立。他的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5〕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沧江，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后逃亡日本，曾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鼓吹立宪保皇，与资产阶级革命派相对立，但他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对当时知识界有较大影响。五四运动后批判封建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为文流利畅达，为学界推重。他的著作内容宏富，涉及极广，后人编为《饮冰室合集》。

〔6〕陈子，指陈昌（1894—1930），字章甫，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中共党员。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与毛泽东同学。1915年毕业后，任长沙县五美小学教师。1917年在一师附小任教。后从事工人运动。1926年任水口山铅锌矿工工会主席。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继续坚持斗争。1929年去上海，被派往湘西贺龙部工作，途经澧县时被捕，1930年在长沙就义。

〔7〕易昌陶，湖南衡山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于1915年3月在家中病逝。

〔8〕岛夷，原指我国古代东南沿海一带居民，此处借指日本。北山，古指今甘肃西南部边境，或指吉林一带，此处泛指东北一带。当时日本和沙俄互相勾结，侵略满蒙，袁世凯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

〔9〕1916年《易君咏畦追悼录》中收入的这首诗，与这封信中的诗有四字不同，一是“方期沅洛游”的“沅”字为“沅”字，二是“予期竟早亡”的“期”字为“渊”字，三是“后来有千日”的“日”字为“里”字，四是“飞鸢拂灵帐”的“灵”字为“云”字。

【赏析】

此信共有两层意思。

首先,此信向同学湘生介绍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经验。毛泽东在学习方法上不断总结经验,在湖南第一师范,他奋发读书,在思想上深受杨昌济老师的熏陶。杨昌济一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曾东渡日本,后又去英国深造,不仅对中国文化有着很深的造诣,对西方启蒙学说也颇有修养,可谓学贯中西。在读书方法上他也有一套正确的主张。他认为,对于学问,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要有所取舍,采取分析的态度,做到贯通今古,融合中西,既要输入西学,也要输出中学。他指出,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就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他国。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然后可以适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杨昌济这种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精神,以及他的博学多识和高尚人格,对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人生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由于继承了杨昌济的这一思想,毛泽东在处理古今中外的知识学习问题时,就有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在这封信中,他分析了学堂科学的繁琐和学校分教奖励之虚荣的现状,决定把“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作为自己的为学之道,并和湘生交换看法。他还向湘生举出康有为和梁启超的例子,并以此说明先中后西、先博后约的道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所说的读书学习并不是死读书,而是考虑到“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这种科学的治学方法,当作培养奇杰、救国救民的重要手段来看待的。

其次,信中还表达了“亲师而外,取友为急”的思想。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不仅注重获取知识,而且乐于广交朋友。他认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对于同学间的友谊,毛泽东十分珍重。1915年3月,同学易昌陶病逝家中。毛泽东闻讯后,深表悼念。时值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企图霸占中国的“二十一条”,内忧外患加剧,好友英年早逝,使毛泽东百感交集。他写道:“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潮,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役,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既表达了对亡友的痛悼,又抒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写了首五言诗给湘生,希望他予以斧正。五言诗进一步表达了“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悲染芳年友,悲叹有余哀”的悲痛之情,以及“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的忧国之志。

全信采用文言的形式写成,显得概括凝练,典雅质朴,感情浓烈。特别是信中的五言长诗,风格几近《诗经》之韵,又有乐府民歌之音,读来叫人回肠荡气,感慨万端。

“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

——致萧子升^[1](1915年9月6日)

子升学长足下:

仆读《中庸》^[2],曰博学之。朱子补《大学》^[3],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闻黎君邵西^[4]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足下好学深思,闻其说未备,輒转说述,但不能尽惟即耳。苟有一知,敢不效于左右,以答盛意,致其恳恳邪!仆问邵西,学乌乎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其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邵西不谓然,此先后倒置也。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尤贵肆应曲当。俾士马克^[5],通识最富者也。即令袁氏^[6],亦富于通识者也。错此则必败,其例若王安石^[7],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8],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于是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此其具体耳,其抽象则如何?下手之方则如何?于是邵西曰,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一也。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籍,各审其美而靡所阙,二也。今之教者学者皆不然。长,今之所谓通也。异,今之所谓奥也。其实,所谓长者,堆积冗复而已,堆积冗复,不得谓之通;所谓异者,佶聱闷涩而已,佶聱闷涩,不得谓之奥。至于为求学之阶梯,将以观古今之群籍,亦无知与无能焉者矣。历史者,观往迹制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纲而挈其目,莫妙觅其巨夫伟人。巨夫伟人为一朝代之代表,将其前后当身之迹,一一求之至彻,于是而观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属品矣。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后观亚洲史乃有根;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地理者,空间之问题也,历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图为要;地图之用,手填最切。地理,采通识之最多者也,报章杂志皆归之。报章杂志言教育,而地理有教育之篇;报章杂志言风俗,而地理有风俗之章。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理范围之内。今之学者多不解此,泛泛然阅报章杂志,而不知其所归,此所谓无系统者也。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的也,君子假之,而得为学、养生之道焉。为学奚假乎是?是须有条理有秩序,紊之则无以为条理秩序,以钝吾心而缮吾性,为学之道孰大焉。养生奚假乎是?古之人有行之者,陶侃、克林威尔、华盛顿是也。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猎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9]。盖人之神也有止,所以瘁其神也无止,以有止御无止则殆。圣人知之,假是以复其神,使不瘁也。犹不止此,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

梁启超氏民国元年教育方针^[10]，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邵西所言各科下手方法及其用如此。于是又介仆读《群学肄言·缮性篇》^[11]，仆因取其书遍观之竟，乃抚卷叹曰，为学之道在是矣！盖是书名《群学肄言》，其实不限于群学，作百科之肄言观可也。其旨以谓为学之难三：其一在物，其一在心，其一心物相对。在物者曰物蔽，在心者曰情督智絃，心物相对者曰学波、国拘、流枯、政惑、教辟。是三难者，将欲祛之，则必缮性。缮性在学，学有三科，曰玄间著。玄科者，名、数二学属之；间科者，物理学、化学属之；著科者，博物学属之。三科习，而后三难祛。心习缜，性灵缮，于是乃可言学，络之以心理生理，关于群学者大也。吾谓此岂惟学也，德即寓乎其中矣。于此有人焉，不蔽于物，督于情，絃于智，而又无学波、国拘、流枯、政惑、教辟诸弊，其人之为君子，尚待言哉！近每与人言及为学，即介以此书。以其所言者切也。足下有暇，可览观焉。（原用此书）以上所陈，凡分三者：初论专通之先后，次言诸科之研法，次述“群肄”一书之可珍。然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足下所深注意，仆所以言之在后者，夫亦郑重之意云尔。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之篇^[12]，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不向若而叹也！有为人之学，有为人国之学，有为世界人之学。为人之学者，父子夫妇昆弟之道，布帛菽粟之宜也。为人国之学者，明其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之学也。为世界人之学者，世界观，国际学也。顾为人国人之学易，为吾国人之学难。历史半万载，地方七千里，政教若是其繁遽，人情风俗若是其广复，将恶乎求之？吾而为日本，土疆三岛耳，吾而为德伊^[13]，历史才半纪，土地敌吾二广省耳，如之何不易！然则何苦而为中华民？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今欲通国学，亦早通其常识耳。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千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如是之书，曾氏“杂钞”^[14]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为之之法，如《吕刑》^[15]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16]一篇出于《史记》^[17]，吾读此篇而及于《史记》，加详究焉出于《史记》者若干篇，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18]，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与黎氏所云略合。惟黎则一干，此则四宗。黎以一书为主，此所主者，不止一书也。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19]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吾闻之甚有警焉！试一观当世诸老先生，若举人、翰林、秀才之属，于其专门之业，不可谓不精，若夫所谓常识，求公例公理，绳束古今为一贯，则能者不甚寡哉！斯宾塞尔^[20]云，专攻之之〈学〉，每多暗于通宗，岂不然哉！所陈词冗意单，掇粗漏精，既承盛指，不敢不告，赐之是正，不胜待幸。

泽东顿首

九月六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萧子升(1894—1976),又名旭东,湖南湘乡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三班学生。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1915年一师毕业后,先后在长沙修业,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等职,后长期旅居国外。1976年在巴拉圭去世。

[2]《中庸》,相传为战国时子思所作。原为《礼记》中的一篇。宋程颐、朱熹将此篇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编,统称为“四书”。

[3]朱子,即朱熹(1130—1200),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著名理学家。补《大学》,指朱熹所补“释格物致知之义”一段。作者信中所引之句,原文为:“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4]黎邵西,即黎锦熙,当时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参见本书第13页注[1]。

[5]俾士马克,今译俾斯麦(1815—1898),普鲁士王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

[6]袁氏,指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北洋军阀首领。1911年任内阁总理大臣,1912年3月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权。1915年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宣布次年改元“洪宪”,元旦即皇帝位。由于遭到全国反对,1916年3月被迫撤消帝制。

[7]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宋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上书,主张变法。为宣传改革,著《三经新义》(其中有《周官新义》)、《字说》(今不存)等书,所作散文,雄健峭拔,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8]《周礼》原名《周官》,或称《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

[9]陶侃(259—334),东晋庐江浔阳(今江西九江)人。曾为荊州刺史、广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克林威尔,今译克伦威尔(1599—1658),英格兰军人和政治家。1653年起任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护国公。华盛顿(1732—1799),美国将军、政治家、首任总统。下面所说“陶侃运甓习劳,克将军驱惜山林,华盛顿后园斫木”,都是说他们不论地位高低,总不忘习劳励志。

[10]蔡氏,指蔡元培。参见本书第184页注[1]。“民国元年教育方针”,指1912年蔡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所发表的《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11]《群学肄言》系严复将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斯宾塞所著《社会学原理》摘译成中文出版时所取之名。绪性篇是其中的一篇。

[12]四部之篇,三国魏荀勖分书籍为甲部(六艺、小学)、乙部(诸子兵书、术学)、丙部(史记及其他记载)、丁部(诗赋图籍)四部,至晋书充重分四部,定为经、史、子、集。隋唐以后经籍艺文分类,多用四部为序。也作群书的通称。

[13]德伊,今译德意志。

[14]曾氏“丛钞”,指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

[15]《吕刑》,《尚书》中的一篇。周穆王时有关刑罪的文告,因吕侯的请命而颁,故名。

[16]《伯夷列传》,《史记》中的一篇。记述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之事。

[17]《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共130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

[18]《论语》，孔子言行的记录，为儒家经典之一。《近思录》为南宋朱熹、吕祖谦合撰，共14卷。辑录北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和张载的言论，计622条。

[19]姚氏“类纂”，指清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

[20]斯宾塞尔，今译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早期的进化论者。强调用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现象。著《综合哲学》十卷，对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发展影响甚大。

【赏析】

为了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化，1915年夏天，毛泽东准备从一师退学，报考长沙高等师范，因为这个学校设文史两种，重自习，不重上讲堂，对研究古籍很有好处。后在黎锦熙的劝告下，他放弃了这一想法，决心博览广学。他的这一学习方法，也充分体现在这封给萧子升的信中。

首先，毛泽东在信中讲了“通与专”的先后关系问题。在一师求学期间，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老师除了杨昌济、徐特立之外，就数黎锦熙了。黎锦熙是一师的历史教员，富有爱国和民主精神，常与进步同学讨论学术，谈论时事政治，对毛泽东影响很大。当毛泽东认为“学校蚀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之时，黎锦熙劝告他这是先后倒置。对于专和通、新和旧的关系，应是：“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为了证明这个道理，他以傅士马克、袁世凯为例，论证了“政家”、“事功家”之学大都富于博学通识；他还以王安石为例，说明王安石虽为专门之学者，但恰因不能周知社会，而实行了不适当的措施，其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没有通识博学。毛泽东被黎锦熙劝服，“翻然塞其妄想，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也”。其次，毛泽东在信中讲述了各学校的研讨方法。对于历史，他指出，要研讨中国史，同时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应当注意中西之比较；研究地理，必须借用地图，因为政治、军事、产业、交通、宗教等等无一不在地图范围之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历史、地理学习的独到见解。正是这种认识，才为他后来的军事生涯中运筹帷幄创造了条件。另外，毛泽东还在信中谈到了体操、图画、音乐、手工等学科，认为必须有条理有秩序，不仅把它们视为养生之道，还要把它们当作美感教育来对待，体现了毛泽东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思想。再次，他介绍了《群学肄言·绪论篇》这本书的内容，还重点讲了国学的意义。从1913年到1916年，毛泽东把读书的重点放在中国历史典籍上面，除了课堂上国文、修身、历史、地理接触到的以外，他的业余时间几乎全用来阅读古书。从先秦诸子到明清时代王船山、谭嗣同的著作，他广泛涉猎。对于国学的学习方法，他主张，欲通国学，应早通其常识，方法是由此及彼，“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其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思想已经鲜明地暴露出来。

全信洋洋洒洒，舒展流畅，言辞简约，概括凝炼，句式多变，长短相间。信中多处采用例证法，达到了以理服人的效果。特别是无溢信中那富有辩证、推理的逻辑力量，使整篇书信活而不乱，大而不空，长而不散，收到了很好的说理效果。

“就良图，立远志”

——致黎锦熙^[1]（1915年11月9日）

邵西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2]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3]，服善也；扬刘臣莽^[4]，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招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太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5]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6]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暑假后，乃作一启事^[7]，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弟毛泽东顿首

十一月九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黎锦熙（1890—1978），又名黎邵西，也作黎劭西。湖南湘潭人。语言学家。1914年至1915年上半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杨昌济、徐特立创办宏文图书社编译所，教学之余从事著述。1915年9月赴北京，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

[2]熊君，指熊光楚（1886—？），湖南湘乡人。1913年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该校图书管理员。1917年夏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后参加新民学会和赴法勤工俭学。

[3]元凯臣舜，见《史记·五帝本纪》：“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谓之‘八元’。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至于尧，尧未能

举。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

[4]莽，指王莽（前45—23），汉成帝时封新都侯，初始元年（公元8年），废汉称帝，改国号为新。

扬，指扬雄（前53—18），蜀郡成都人，西汉文学家。成帝时为给事黄门郎。王莽执政后，扬雄校书天禄阁，官拜大夫。以文章名世，曾作《剧秦美新》以讽莽。

刘，指刘歆（？—23），西汉末年古文经学派的开创者。刘向之子。王莽执政时，任国师、嘉新公，为四辅之一，并以女配莽子。后歆与王涉谋杀莽，事泄自杀。

[5]朱子，即朱熹。参见本书第11页注[3]。语见《朱子语类》卷八。原文为：“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者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功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功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也。”

[6]语意见《诗·小雅·伐木》。原文为：“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7]指1915年暑假后，毛泽东发“征友启事”一事。

【赏析】

毛泽东告别自学生活，以优异成绩考入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四师合并于一师。辛亥革命后，一师实行民本主义教育方针，先后聘请了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行端正的杨昌济、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人任教。毛泽东刚进一师便惊异地发现，这所学校不仅有着鲜明的时代气息，更有一批博学多才的老师。在这学风醇厚、思想新颖、人才济济的知识殿堂里，他很快得到老师们的赏识。毛泽东对博学多识的老师也十分敬重。假如说，毛泽东对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的情感颇多表现为对长辈的敬仰的话，那么，毛泽东和黎锦熙的交往则近乎于对朋友的坦率和笃诚。读书所思，有感而发，毛泽东总要向黎锦熙请教，以期望有所指正。1915年9月，黎锦熙调北京教育部任职，这使毛泽东更加思念自己的老师。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由于误传黎锦熙被袁世凯所罗致，1915年11月9日，黎锦熙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写了这封信，袒露了自己的心迹。

此信首先恳切地劝诫黎锦熙“不可急图进取”。毛泽东在信中分析了形势。当时，为了实现皇帝梦，袁世凯收揽名士，企图借此装潢门面，聘用梁启超等清末君主立宪派分子为参政院参政员。到1915年8月，袁世凯及其亲信们已经公开喧嚷复辟帝制，加之黎锦熙有被袁世凯罗致的误传，使毛泽东“不敢不言”。他在信中痛斥袁世凯招揽名士，“以术愚人”的倒行逆施，指出“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的现实。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劝黎锦熙不要急图进取，并进一步提醒黎先生：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不可久居，急归无恋。对于毛泽东来说，黎先生是他崇敬的老师，然而在有关国家大事面前，他却不能不坦诚直言，表现了他对社会问题的高度责任感和敏锐的观察力。直到后来当知道黎先生并未被袁世凯笼络时，毛泽东才如释重负。由此可见，年仅22岁还在读书的青年毛泽东，对许多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是何等的严肃认真！毛泽东在信中还讲述了他在学校里的表现。此时的毛泽东虽然在黎先生的劝告下，放弃专攻古籍的想法，确定先通后专的意愿，认真在学校读书，但学校的陈规陋习，已使性情不羁的毛泽东深恶痛绝。他痛斥

学校并非读书之地,在这个“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的地方,只能使宝贵时光逐渐消失。所以,毛泽东认定:“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表达了走出校门、改造社会的决心和志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顾炎武的名言。毛泽东常以此为信条,以天下为己任。要达到匡世救国的目的,他以为应有一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志士,结成一股力量,这种思想也体现在这封信中。他在信中深切地写道:“渴望兄归,一商筹之”,并表达了“甚愿日日趋前请教”的愿望。在信的最后,毛泽东叙述了自己“求友之心甚炽”的心绪。1915年秋,毛泽东向长沙各校发出一则征友启事,“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然而当时长沙风气闭塞,此举不易为人理解,应者寥寥无几。毛泽东非常郁闷,但不灰心,正如他在信中所言:“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全信自始至终充满了对黎锦熙先生的敬仰和尊重之情,从一个侧面展现出毛泽东心忧天下、报国图强的强烈愿望和远大志向。

“情景宛在，感念奚如”

——致萧子升^{〔1〕}（1916年6月26日）

升兄赐鉴：

今朝九钟抵岸，行七十里，宿银田市^{〔2〕}。主人与予有故，颇安适焉。四肢之怨虽深，而灵台之乐殊甚。洗尘振衣，捉管为书，回想昨霄今早，情景宛在，感念奚如！中途寡所见闻，然略可得而述。近城之处，驻有桂军^{〔3〕}，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征以校内所见，信乎两粤睹《赌》风之重也。七里铺、姜车^{〔4〕}一带，有所谓护国军^{〔5〕}二股：一苏鸣鹤所部，约千二百人；一赵某所部，数略同。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迹，有如画图。今夕书此，明日发邮，在途两日，二十九前后当达左右，欲以取一笑为快，少慰关垂也。

泽 白

二十六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萧子升，参见本书第10页注〔1〕。

〔2〕银田市，应为银田寺，镇名，离韶山冲约30里，原属湘潭县，现属湘潭市韶山区。

〔3〕桂军，泛指广西军阀部队，这里指陆荣廷于1916年宣布反袁独立后所组成的军队。

〔4〕姜车，应为姜畲，镇名，原属湘潭县，现属湘潭市湘江区。

〔5〕护国军，原为蔡锷1915年12月在云南策动讨伐袁世凯时组织的军队的称谓。后各省讨袁军队，也多用此名称。1915年12月，蔡锷由北京潜返昆明，策动讨伐袁世凯，在护国寺召开动员大会，原定组织“共和军”讨袁，为避免与“共和党”之名雷同，即就护国寺取名“护国”。护国军组织三个军。次年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出兵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进军两广；第三军总司令由云南都督唐继尧兼任，坐镇云南。讨袁战争实际由第一军担任，在四川与袁军激战。6月，袁在众叛亲离下惊忧病死，护国军之名因而撤销。但陕、川等地仍有以护国军旗号组军割据的。

【赏析】

1916年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全国人民同声庆祝，毛泽东也

深为之欢欣。然而北洋军阀在失去袁世凯这个恶头目之后,各成派系,分别投靠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中国的统治权,中国并没有摆脱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除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外,还有张作霖的奉系、唐继尧的滇系、陆荣廷的桂系。湖南处在南北军阀对峙的军事要冲,北来南去,南来北去,使湖南人民深受战乱之苦。1916年暑假,毛泽东决定回乡看望因病卧床的母亲,6月25日离开长沙,6月26日到达湘潭,接着步行70里,夜宿离韶山约30里的银田寺。沿途的一片战乱景象,使毛泽东感到不安和愤懑。当晚,他“捉管为书”,给萧子升写了这封信。

全信以叙述暑假返乡省亲途中见闻为主要内容,深刻揭示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不幸。信中简言叙述了从早到晚步行70里到达银田寺住宿的过程。接着笔锋一转,回想途中见闻,“略可得而述”。首先,毛泽东叙述了近城之处的桂系军阀招摇过市、横行霸道的情景。“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等句,表达了对军阀、旧军人的鄙视。其次,毛泽东还在信中刻画了底层士兵的窘迫状况。“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毛泽东从中推测这些军官可能是一些“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的人。“细询其人,殊觉可怜”一句,表达了毛泽东对底层士兵的同情。再次,信中还用近乎于抒情的笔触,描写了一路景色,读来如同写景散文,把大自然的池水、田苗、日隐、岚采、云霞融合在信中,给友人萧子升描绘了一幅军阀混战下的田间风景画,抒发了毛泽东对农田风光及农家生活的复杂感情。

此信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写成,多处使用白描手法,对人和物进行了精雕细刻的描绘,字里行间渗透了毛泽东对旧制度的憎恶以及对新社会、新生活的向往。

“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

——致萧子升(1916年7月18日)

升兄足下：

十二日在湘潭发一函^[1]，不知到否？兹又七日矣，心有所触，敬为吾兄述之，亦前约也。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2]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三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3]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4]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南北军兴^[5]，湘为斗场，省城波浪迭兴，当春夏之交，危险万状，而能镇定不挠。矿警一役^[6]之后，学生多逃，下谕不可辍课，请款即发，此岂巽懦蹙跽者所克办哉！筹画独立，尤具苦心，先授意望云亭^[7]，使之独立，然后计退北军，调归所部，联络黔桂，一旦响应。袁氏不幸早死矣，使战事延长，则四川与湘省独立之功，不在云贵首义之下，岂特地有所必取，城有所必攻，南北成败之枢纽在是焉耳。党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汤曷尝媚袁哉？汤之见猜于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扩兵，继派曹锟^[8]以监之，继又派沈金鉴^[9]以掣其权。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彼江宁冯氏^[10]之杀人，比此谁多少？其击吴江，荡江阴，如刈草芥耳。谓其制造民意，逢迎袁恶，污浼善类似矣。然云、贵、广西诸省，曷尝无此等事哉！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以此为罪，非知大计者也（杀人、污善二事，在严格的伦理学则当别论）。此次出逃，前书论其愚，正唯其愚，故不得谓之诈。其汉口通电^[11]，多系实事，有兵万余而不战，惧糜烂也；有财而不取，惧遗患也（湘人宣布罪状^[12]，谓其卷款数百万，恐未必然）。要之，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何以云现象益紊也？汤之招致桂军，好意也，而桂军叛之，此非必陆荣廷^[13]之意，追汤至于湘阴，劫其饷械，连同省中所掠，捆载而归，报纸所称“文明军队，班师凯旋”者也。即如弟校，寸草皆为拾去，小学有湘军残械，以八人守之，彼乃尽取去，又缚八人者而欲杀之。故去桂军，人人以为如去虎也。程潜^[14]醉心权利，统兵来省，声势赫然，既与曾继梧^[15]为仇，又与陶忠恂^[16]作敌。唐蟒、龙璋^[17]之徒，乘之以兴，咸欲睚眦都督一眚以为快，各自招兵以张其势力。程、陶纵其部下，在距城某地大战两昼夜之久，设无刘公^[18]出而维持，早已焦烂不可收拾矣。民政府、民政厅同时并立，各自发号，各自施令，怪不可闻。七月初七，乱徒捣巡警署，警卒逃散，枪械劫去。十余年惨淡经营之成绩，一旦荡然无存。筹备十余日矣，尚复不能站岗。赌徒猖起，淫风火炽，商埠警权，几为外人所得，秩序之坏极矣！汤既去，暴徒弹冠相庆，憾前之被压也，四捕调查，捕则杀之。十七日追悼杨德邻^[19]，缚六人欲杀之以为祭，有阻得

免。呜乎,此法兰西恐怖时代之现象也。士生其间,慎哉立身。弟在湘潭,逡巡不敢来省,得友报始至,诚畏之也。各属劫长官拒知事之声,纷然起矣。宁乡知事丁象益,鄂人而汤委者也。有易孔昭盗首谢文彬所委,谢死易遂下狱。兹易得龙璋委任,乃煽其余党公电逐丁而代之。都督今数易矣,又有易人之说。当独立时,认汤为督,旋逐去之,欢迎陆荣廷。陆未至,而曾代。及程潜至,又不得不下台,遂公举浏阳军官,参议员、省议员、公民团及各绅商,通电列名者数十百人也,旋忽相惊以伯有^[30]。陈宦^[31]来,北军数万至岳州,又开会,又迎陆荣廷,久之无事,则又公举黄克强^[32]。怪哉湘事,真莫名其妙矣!由此观之,湘省之祸,此之辛亥为烈也。兄乡居,谅欲闻其详。是非自有公论,弟于他事多恕,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恐招过。不可令他人见,阅后摧烧之,幸甚。余容后续,鹄企箴规。即颂暑安。不宣。

弟 泽东敬白

七月十八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湘潭发一函,指1916年7月12日毛泽东由家返校途经湘潭县城时向萧子升所寄之信。萧子升,参见本书第10页注[1]。

[2]汤芑,指汤芑铭(1886—1975),字铸新,湖北蕲水(今浠水县)人。汤化龙之弟。时任湖南都督,积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5月29日,被迫宣布湖南独立。7月4日晚,从长沙仓皇逃走。

[3]袁氏,指袁世凯,参见本书第11页注[6]。

[4]张树勋,字竹桥,湖南宁乡人。1914年10月至1916年7月任湖南省警察厅厅长,后任河南省警备处长。

[5]辛亥以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湖南当军事之冲。北洋军阀为制服两广,企图壅据湖南;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阵地。北来南去,南来北去,各系北洋军以及黔军、桂军、湘军等都出入湖南,战祸兵灾,接踵而至,湖南人民深受其害。

[6]矿警一役,指1916年5月14日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率矿警二营进驻长沙各处街巷,意欲推翻汤芑铭,自任都督之事。

[7]望云亭,湖北宜昌人。1915年8月任湖南零陵镇守使,屡次电劝袁世凯称帝。及至1916年5月17日,宣布郴州、永州独立,自称护国军湖南总司令,又通电宜章、桂阳、资兴、汝城各县,脱离北京政府。

[8]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今天津市)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天津武备学堂毕业。清末为袁世凯所辖京畿陆军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驻岳阳。护国战争爆发后,该师进入戒备状态,以图镇慑南方。

[9]沈金鉴,字叔瞻,浙江吴兴人。1915年9月至1916年6月,任湖南巡按使。

[10]江宁,即今南京。

冯氏,指冯国璋(1857—1919),字华甫,直隶河间人。1913年“二次革命”时,率军攻

占南京,被袁世凯任命为江苏都督。后为北洋军阀直系首脑。

[11]汉口通电,指1916年7月7日汤芑铭在汉口发出的通电。电中说明“离湘宗旨”,“意在退兵弭变”,并自称“有兵不战”,“有财不取”,以掩人称“汤屠户”诸端劣迹。

[12]罪状,指《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芑铭罪状》。其中罗列“汤芑铭在湘十大罪恶”:一、吞没巨款,紊乱财政;二、残杀无辜,力长元恶;三、蓄植游探,流毒社会;四、纵恃北军,蹂躏人民;五、摧残教育,毒戮士林;六、酷用毒刑,绝灭人道;七、滥用私人,秽乱吏治;八、盗卖矿产,次第卷逃;九、出入警蹊,阻绝交通;十、援结败类,败坏风俗。

[13]陆荣廷(1859—1928),字干卿,广西武鸣人。清末曾任广西提督等职。辛亥广西独立,被推为副都督,旋任都督。护国战争期间,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任都督兼广西护国军总司令,曾派军进入湖南。1916年7月6日,北京政府曾一度任命陈宦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未到任前,由陆暂兼任,均未到任。

[14]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参见本书第380页注[1]。此时率部进驻长沙。

[15]曾继梧(1873—1943),字凤冈,湖南新化人。同盟会会员。1912年任湖南新军第三师师长。1916年6月任湖南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汤芑铭逃走后,率军进入长沙,同年7月暂代都督。

[16]陶忠恂,原系北洋军将领,汤芑铭离湘后,陶尚有部分队伍留在长沙城外,时曾继梧编制湘军,陶部拟扩充为第三师,任师长,并以朱泽黄、周则范分任旅长。程潜到达省城后,部队也驻城外,1916年7月14日与陶部发生冲突,互战两日。信中所指程、陶大战两昼夜,即指此事。

[17]唐蟒(1887—1954),字圭良,湖南浏阳人。唐才常之子。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岳州镇守使、湖南都督府参谋长、湘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参谋长等职。

龙璋(1854—1918),字研仙,湖南攸县人。清末举人。曾与胡元倭等在长沙创办明德学堂,资助华兴会、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西路巡按使、都督府民政司长。1916年7月上旬被湖南军政各界联合会议推为湖南民政长,未到职。

[18]刘公,指刘人熙(1844—1919),字良生,自署荃庐,湖南浏阳人。曾任广西道台。后设立湖南中路师范学堂,又任法政学堂总办。辛亥革命后,任湖南民政司长。曾电促王芝祥策动陆荣廷宣告广西独立。1915年投入反袁(世凯)驱汤(芑铭)运动。次年7月6日,被湖南各界联合会议推举为临时都督,19日北京政府任命暂代湖南督军,25日又任命兼代湖南省长。

[19]杨德邻(1870—1913),字性恂,也作杏生,湖南长沙县人。曾任国民党湖南支部政务研究会会长,谭延闿都督府财政司司长。因坚决主张反袁,1913年10月13日被湖南查办使汤芑铭杀害。

[20]相惊以伯有,出自《左传·昭公七年》:“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谓郑人畏伯有鬼魂作祟。后以“相惊伯有”形容无故自相惊扰。

[21]陈宦(1876—1939),字二庵,也作二安,湖北安陆人。1912年任北京政府参谋部次长,为袁世凯所宠信。1915年2月,督理四川军务,率北洋军三旅入川。次年5月22

日,因西南各省先后讨袁,被迫宣布独立。旋为川军驱逐出境。此时被大总统黎元洪任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遭湘人抵制,未果。

[22]黄克强(1879—1916),原名轸,字廛午,也作庆午,后改名兴,号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1903年在长沙发起组织华兴会,被举为会长。1905年任中国同盟会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旋被各省代表公举为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任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南北和议后,任南京留守。“二次革命”时,就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败后再次亡命日本,坚持反袁。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1916年7月下旬,被湖南军政各界通电公推为湖南督军,黄无意于此,乃荐谭延闿以自代。同年10月31日病故。

【赏析】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虽然没念过书,但性情温和,仁慈善良,博爱纯朴,与人为善。母子之间有深厚的感情。当听说母亲病重时,毛泽东顿时感慨道:“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1916年暑假,毛泽东回乡探望了母亲,心灵得到极大的宽慰。然而,毛泽东更加系念着救国救民的大计,关心着湖南乃至中国的战局。在家没多久,毛泽东便从家乡返回学校,7月18日,他给萧子升写了这封信。

全信紧紧围绕湖南局势,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南北对峙,北洋军阀为制服两广,企图盘踞湖南。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阵地,各系北洋军以及黔、桂、湘三军等均出入湖南,战事频仍,接连不断。面对这种频繁更替的军阀统治,毛泽东不无迷惘。1916年7月4日,时任湖南都督的汤芑铭在一片湖南独立的声浪中从长沙仓皇逃走,毛泽东深表痛惜。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开门见山,指出:“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毛泽东为什么会对军阀汤芑铭寄予幻想呢?信中列举了汤芑铭在湖南三年内实行法制,使湖南一洗从前,秩序整肃的事实。在整治军队方面,他冲破袁世凯的扼制,暗中扩张军队,“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社会治安良好,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全省,虽南北军兴,而能镇定不挠。至于他杀人太多,毛泽东认为是不得已而为之。并说:“图远者必有所待,成大者必有所忍,护国之目的,不如此不足以达之”。因此,毛泽东认为,汤无罪于天下,无罪于湘人。而汤芑铭进出长沙以后,程潜醉心权力,统兵来省,与曾继梧、陶忠诤为敌;唐蟒、龙璋乘机招兵,扩张势力,各派各系同时并立,各自发号施令,使整个湖南赌徒稍起,淫风火炽,秩序坏到极点。再加上湖南这种走马灯式的军阀,都督更迭,使毛泽东发出了“于他事多恕,独于湘局实愤愤不能平于心”的愤懑之情。

全信紧紧围绕汤芑铭被逐一事,慷慨发表自己的意见,可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同学意气,挥斥方遒”,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湖南形势及出路的深切思考。虽然他这时还没有接受马列真理,没有找到根本解决湖南问题的办法,但他在学习期间关心时事,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是难能可贵的。

“望时惠箴规，借益愚陋”

——致萧子升^[1]（1916年7月25日）

升兄足下：

十二日由湘潭发一函，十八日由校发一函，皆详述时事，不知有遗落否？盼复不至，曷胜延企。国局自上月三十日约法、国会、内阁三大问题^[2]解决后，南方相继取消独立，撤除军务院，渐趋统一。此由于南部诸英之深明^[3]义，^[4]段氏^[5]之中枢斡运，黎公^[6]之至诚感人，其力尤多。各省虽尚有不服命令者，如山西之拒沈铭昌^[7]，福建之拒胡瑞霖^[8]，广东之攻龙济光^[9]，四川陈周之争^[10]，湖南之逐汤芑铭^[11]。除湖南之动出无理外，其余或缘帝制关系，或因势不得已，有可原焉。中央举措，究可佩服，任任可澄^[12]为滇省长，戴勘^[13]为黔省长，罗佩金^[14]为桂省长，蔡谔^[15]（锷）^[16]督蜀，陆荣廷^[17]督粤。调去陈宦、周骏、李烈钧^[18]，李加以中将勋二位^[19]，可谓善于调处者矣。前书言湘人取们罗主义^[20]，举刘^[21]以便其私，不幸言中矣。蔡谔^[22]（锷）亦已赴任，惟粤之龙、李皆去，此与川局相同，为愚虑所不及。

湖南问题始终不赞成，既略详前书，兹又有可述者焉。一般暴徒无故将汤逐去，都督已经两易，刘已真除代理，应如何服从中央，静候简人。乃又公举黄克强^[23]，欲独出风头，行分治制。故举龙璋^[24]为民政长，终以舆论攻击，悬之空中，令人笑其滑稽。近乃迫唆议会重举之，以请于中央。然黄请之既久，请龙亦已数日矣，并不见中央命令，吾意必难应允。此种自推长官风气，极不可开。本省人作本省官，其害甚大。在湖南尤有特别情形，前车不远，即在辛亥。今兹目前之祸，又显而易见，倾侧、构陷、钻营之风大竞。民政厅日出知事一批或数批，本不应更而更之。湘潭知事张其钜，到任未逾月，称贤能，今易人矣。樵运局已易三人，初一人以运动人，旋他人又运动得委而代之，兹中央又委一人至。造币厂则更四人，尚未定，皆数日间事。弟校校长委彭政枢，学生大愤，欲拒之而未能。刘、吴长者，而所为如此，皆暴徒之过。刘与谭组安^[25]书云“度日如年”，盖实语也。此略举一二，余可概见，几何不如俗人所云“打开脑壳”乎！前书言暴徒乘机报复，有所谓“国事同难会”者最横行，捕杀人不辨黑白。军人政客，气焰万丈，稍有帝制嫌疑者，即斥去之。施文尧竟枪毙矣。弟昔曾与瞿兄书，言杀机一起，报复未已，法兰西之祸，最为可惧，不谓此次竟演此恶剧。又湘之独立，至昨日始取消，盖事事称怪焉。

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穷悉，虽然，其诸罪魁祸首，为塞后患、励廉耻起见，又何可不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故拿办八人令^[26]下，人心奇快。阅报至此，为之惊骇。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夫历史，无用之物也。居数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败盛衰之迹岂少，应如何善释，自立自处？王莽、曹操、司马懿、拿破仑、梅特涅^[27]之徒，奈何皆不足为前车之鉴？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28]等，皆

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

近日朝野有动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协约”^[26]。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日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见也。驻日公使有急报归国，《大公报》登之，足下可观焉。大隈阁^[27]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骏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醉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其勉之，谓可乎？

西方似无大烈之战，据经济学家从经济上观察，战事不能再延一年。现在德、奥始终未败，鞑旦海峡始终未破，塞、比、门三国^[28]已亡，自去冬罗马尼亚加入后，同盟国声威更振，协约方面则屡思耸动葡萄牙、希腊，然至今未动云。

墨乱^[29]未已，美以兵力干涉，喧传已久，然未见实行，反有墨乱徒侵入美南部，恣杀民人之事。威尔逊^[30]任期已满，正在选举中。候补者威尔逊、许士、罗士福^[31]。有举威者，芝加高则举许。许，大理院长，主和平与威同。美人忌罗氏雄杰，罗亦自知不胜，乃宣告让许。吾意美人既不愿加入欧战，又扩张兵备之事，舆论尚未成熟，故此次非威即许，政策既不变，则威不妨联任。至罗当民国元年与塔虎脱^[32]竞争，由共和党^[33]裂为进步党^[34]，以此使民主党^[35]之威尔逊坐收渔人之利。犹忆其往某处演说，怨家刺之，血流肠溃，犹从容演说毕乃就医，未尝不叹其勇且壮！闻其春秋盛，雄奇迈往之气未衰。愚意此刻非彼用武之时，欧洲非彼用武之地。彼之时，乃十年以后；其他，则太平洋耳。日美战争之说，传之已久。十年之后，中国兴会稽之师^[36]，彼则仗同袍之义，吾攻其陆，彼攻其海。既服三岛，东西两共和国亲和接近，欢然为经济食货之献酬，斯亦千载之大业已。今之退让，殆亦有见于此乎！

湘城报纸近无虑七八家，《大公报》^[37]殊有精神，以仄于篇幅，不能多载新闻。《湖南公报》^[38]纯系抄录，然新闻为多。近日海上诸名流演说，如孙中山^[39]之地方自治等，长哉万言，殊可益智，《湖南公报》载之，而《大公报》不见。又如《时报》^[40]著名访员之通函，该报亦向不录，为可惜也。此数日载有天坛宪法草案^[41]原稿，此可摘下，而议会之议事录，亦可注意焉。

书此既竟，接足下及瞻兄^[42]大示，始知前两书均未达览，承寄银市信^[43]，亦未奉到。盖初九日在家动身，正兄言旋不久，尚在途中耳。在校颇有奋发踔厉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人数稀少，天气亦佳，惟甚畏开学上课。瞻兄在原地教学甚善。望时惠箴规，借益愚陋。现在兵已退去，前所以能住，升兄知之也。余意不尽，敬颂日绥。

弟 泽东白

七月二十五日灯下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萧子升,参见本书第10页注[1]。

[2]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宣布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重行召集国会,裁参议院,改政事堂为国务院,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南方的军务院于7月15日宣布撤销。

[3]此处和下处空缺字,疑为“大”字和“及”字。

[4]段氏,指段祺瑞(1865—1936),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1912至1916年历任北京政府陆军总长、参谋总长、国务总理。袁世凯死后,以国务总理地位统治北京政府。

[5]黎公,指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篡改约法,设参政院时,黎被任为院(议)长。袁死后,由副总统接任大总统。

[6]沈铭昌,字冕士,浙江绍兴人。历官河南豫东观察使、山西省长、内务次长、财政次长、山东省长。

[7]胡瑞霖,字子笏,湖北江陵人。当时被任命为福建省长。

[8]龙济光(1868—1925),字子诚,云南蒙自人。彝族土司。清末历任广西提督、广东陆军第二十五镇统制。1913年奉袁世凯命攻占广州,任广东都督。先是反对护国战争,率部攻桂,滇,后又被迫宣布广东独立。袁世凯死后,被任为广东都督兼巡按使,遭到滇、桂护国军的反对。后率部占据海南岛。

[9]指陈宦,周骏在四川的权力之争。1916年5月22日,陈宦被迫宣布四川独立,改任都督。两日后,袁世凯任命重庆镇守使,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骏为崇武将军,署理四川军务,讨伐陈宦,攻占成都,旋因护国军西上而退走。袁世凯死后,6月25日陈宦离川赴京,周骏率部进驻成都,自任都督。

[10]汤芑铭,参见本书第19页注[2]。

[11]任可澄(1878—1945),字志清,贵州安顺人。曾创办贵州优级师范学堂、法政学堂。护国战争期间,任云南都督府右参赞。此时被北京政府任为云南省长。

[12]戴勘,应为戴戡(1880—1917),字循若,贵州贵定人。唐继尧督黔时,任都督府参赞、贵州巡按使。1915年任参政院参政。同年冬赴昆明,任护国军第一军右翼总司令,率部入川。袁世凯死后,任四川军务会办,四川省长。1916年7月6日由黎元洪任命为贵州省长。

[13]罗佩金(1878—1922),字镕轩,云南澄江人。同盟会员。1909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先在南宁龙济光部任随营学堂总办,后赴昆明,历任新军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及七十四标标统等职。武昌起义后,与蔡锷等光复昆明,旋任南征总统官、军政部长、南防军总司令。1915年底参加护国运动,任第一军总参谋长。旋任广西省长。1920年出任滇南巡阅使。后被唐继尧杀害。

[14]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早年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政变后赴日本留学,后在江西、湖南军事学堂任教职,又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总教练官、陆军小学堂总办等职。1911年与革命党人在昆明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任云南军都督。1915年12月25日与李烈钧、唐继尧等发动护国战争,任护国

军第一军总司令，举兵入川。袁世凯死后，被任为四川都督兼民政长。不久去世。

〔15〕陆荣廷，参见本书第20页注〔13〕。

〔16〕周骏，字吉珊，四川金堂县人。曾任四川重庆镇守使，代理四川将军。

李烈鈞(1882—1946)，字协和，江西武宁人。同盟会员。历任江西新军第五十四标一营管带，云南讲武堂教官和陆军小学堂总办。武昌起义后任九江军政分府参谋长。旋被推为安徽都督。次年改任江西都督。1913年“二次革命”时在湖口宣布独立，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1915年冬任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率部由滇经桂入粤。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总参谋长。

〔17〕据当时北京政府授勋条例，有大勋位，勋一位，勋二位等勋位等级。

〔18〕门罗主义，今译门罗主义，指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提出的对外政策，宣称“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任何欧洲列强不得干涉西半球的事务。

〔19〕刘，指刘人熙。参见本书第20页注〔18〕。

〔20〕黄克强，即黄兴，1916年7月底，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时，湖南军政各界通电公举黄兴为湖南督军。参见本书第21页注〔22〕。

〔21〕龙璋，参见本书第20页注〔17〕。

〔22〕谭组安，即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号畏三，湖南茶陵人。1909年任湖南咨议局议长，为湖南立宪派首领人物。1911年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任主席，并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10月22日长沙起义后任军政府参议院院长，民政部长；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任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1916年8月北京政府委为湖南省长兼督军。1918年7月被护法军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驻郴州，与长沙的张敬尧对峙；1920年6月，张敬尧被逐后，谭任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11月被赵恒惕逼迫去职。

〔23〕1916年7月14日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愿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铃、周自齐、薛大可等八人。但以后均无结果。

〔24〕王莽，字巨君，西汉城人。平帝时为太司马。屡次捐地献钱，收揽民心，树立党羽，笼络儒生。平帝死，立孺子婴为帝，自称摄皇帝，三年即真，改国号曰新。纷事改革，法令苛细，连年征战，劳役频繁，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地皇四年(公元23年)九月，绿林军攻陷长安，王莽被杀。参见本书第14页注〔4〕。

曹操(155—220)，字孟德。汉沛国谯郡(今安徽亳县)人。灵帝中平元年，以骑都尉参加镇压黄巾起义，迁济南相。后起兵讨董卓，建安元年迎献帝至许都，先后击灭袁术、袁绍、刘表等，统一黄河流域。位至丞相、大将军，封魏王。子丕代汉称帝，追尊操为太祖武帝。

司马懿(178—251)，字仲达。三国谯县(今河南谯县西)人。为曹操父子重用。曹丕时，任大将军。曹芳即位，以太傅与丞相曹爽共同辅政。嘉平元年，杀曹爽，自为丞相，独揽国政。至其孙司马炎，代魏称帝，建立晋朝，追谥懿为宣帝。

拿破仑，指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帝国外交大臣和首相。1848年维也纳三月革命时被驱

逐，亡命英国。

[25]段芝贵(1868—1925)，字香岩，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被袁世凯委为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旋护理湖广总督，次年被任为驻京总司令官，继任拱卫军总司令、察哈尔都统。1913年任陆军第一军军长。1914年改任湖北都督，又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1915年9月，拥袁称帝。后任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1920年直皖战争中任皖系前敌总司令，失败后逃匿天津。

倪嗣冲(1868—1924)，字丹忱，安徽阜阳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之一。辛亥革命时，任河南布政使帮办军务。1913年任安徽都督，后改安徽巡按使。支持袁世凯称帝。后拥护段祺瑞。1917年为“督军团”倡乱的祸首，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全国，派兵入湖南。1920年皖系战败后被解职。

吴炳湘，字镜潭，安徽合肥人。曾任京师警察厅总监，积极鼓吹袁世凯复辟帝制。

[26]日俄协约，指1916年7月日俄再订关于分掠满蒙权益的协约。

[27]大隈阁，指日本大隈重信于1914年再任首相时第二次组织的内阁。该内阁曾胁迫中国北京政府接受旨在并吞中国的“二十一条”。

[28]塞比门三国，指塞尔维亚、比利时、门的内哥罗(即黑山)三国。

[29]1913年墨西哥韦尔塔发动政变，推翻马特洛政府，捕杀马特洛，自任总统。美国以韦尔塔亲英，拒予承认。1914年，以卡兰沙为领袖的自由党推翻韦尔塔政府，由卡兰沙继任总统。1916年3月，由波兴将军统率之美国干涉军入侵墨西哥，但因墨西哥人民坚决抵抗，干涉军于1917年2月撤退。

[30]威尔逊(1856—1924)，美国民主党人，1913至1921年任美国总统。

[31]许士，即查尔斯·伊万斯·休斯，曾任纽约州州长，当时任最高法院陪审法官。

罗斯福，即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美国共和党人。1899至1900年任纽约州州长，1901年当选副总统，同年麦金莱总统被刺身亡后，继任总统。

[32]塔虎脱，今译塔夫脱(1857—1930)，美国共和党人。1901至1904年任菲律宾总督，1904至1908年任美国陆军部长，1909至1913年任总统。

[33]共和党，美国两大政党之一，1854年由联邦党演化的辉格党(自由党)等政治势力组成，长期同民主党轮流执政。

[34]进步党，指西奥多·罗斯福于1912年因参加竞选所组建的民族进步党。

[35]民主党，原为民主共和党，1828年成立，为美国两大政党之一，长期与共和党轮流执政。

[36]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为吴王夫差所败，勾践卧薪尝胆，刻苦图强，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于前473年兴师攻灭吴国。会稽为越国建都之地，“兴会稽之师”，即指吴越交战的这段历史，后常以此喻兴兵报仇雪耻。

[37]《大公报》，指湖南《大公报》，由刘人熙、贝允昕主办，李抱一、龙兼公、张平子等曾先后担任主编。该报于1915年9月1日创刊，1927年3月2日被查封，1929年5月21日复刊；日本占领长沙时，于1944年6月16日停刊；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5年10月1日复刊，最后于1947年12月31日停办。

[38]《湖南公报》，日报，1912年4月创刊于长沙。最初由共和党贝允昕任主编，李抱

一、黎锦熙、张平子等任编辑。1913年转为进步党机关报。刘腴源、黎锦熙曾任总经理和总编辑。袁世凯窃国后,该报拥护袁世凯、颂罗铭。1916年袁死后停刊。

[39]孙中山,参见本书第38页注[4]。

[40]《时报》,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狄葆贤(楚霄)创办。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支持和资助。1904年6月13日发刊于上海。1921年由黄伯惠接办,1939年9月1日停刊。

[41]天坛宪法草案,原名《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在北京天坛祈年殿起草而得名。1913年“草案”制成,主要规定政府组织采用内阁制,以限制总统权力。当时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攫取大权,阴谋称帝,以武力解散国会,“草案”即被废弃。

[42]晦兄,指萧子晦。参见本书第255页注[1]。

[43]银币信,指投寄湘潭县银田寺传毛泽东的信。

【赏析】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正是辛亥革命失败,国内政局剧烈动荡的时期。军阀连年混战,帝国主义重新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毛泽东天天阅读报纸,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思考着社会变革的问题,并把自己独到的思考写出来,寄给好友萧子升。从1915年7月到1916年7月短短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就给萧子升写了11封事关时局的信。这封信就是其中的一封。

全信共分三层意思:

首先,信中分析了湖南的形势。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接任大总统职务,宣布恢复民国元年临时约法,重新召集国会,裁参议院,改政事堂为国务院,国局“渐趋统一”。对此,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中央举措,究可佩服”,并且主张对附和帝制的罪魁祸首,严加惩治,“庶几震慑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靡腥秽之气”。对于新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等八人,他认为这是“人心奇快”,并指出:“最恶者袁世凯,而八人者则其次也。”同时,他又对新总统的所谓惩办表示不满:“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八人者,闻亦多逃矣。”

其次,毛泽东还在信中分析了中日关系并发表了自己的预见。1916年7月,日俄再订关于瓜分满蒙权益的日俄协约。毛泽东通过《大公报》知道这个消息后,认识到:“日人诚我国劲敌”,并指出:“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愿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并建议萧子升“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

再次,信中还分析了美国的局势以及美国的总统竞选情况,并就联合美国战败日本一事作了大胆的设想。

信的最后一部分,叙述了自己在学校的情况。“在校颇有奋发踔厉之概,从早至晚,读书不休”。毛泽东炽热而顽强的好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

“德智所寄，不外于身”

——致黎锦熙(1916年12月9日)

邵西^[1]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2]，均堕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之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3]，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辱教：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又囑以常常通信，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质诸左右，增笔墨裁（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4]，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见，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5]。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亦其身体之弱然尔。颜子^[6]则早夭矣；贾生^[7]，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8]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矣。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拨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9]。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10]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11]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教安！

小弟 泽东谨上

十二月九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 邵西，即黎锦熙，参见本书第13页注[1]。

[2] 袁氏，指袁世凯，参见本书第11页注[6]。王、梁、章、樊，据黎锦熙回忆及有关史实，系指王闿运、梁启超、章炳麟、樊增祥。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湖南湘潭人。近代学者,杨度之师。曾受袁世凯招揽,任清史馆馆长。

梁启超,参见本书第7页注〔5〕。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枢密顾问。拥护袁世凯,1912年冬被任命为东北筹边使。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被囚,袁死后获释。

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云门,湖北恩施人。清末曾任江宁市政使、护理两江总督,袁世凯设立参议院时任参政。

〔3〕1915年9月,黎锦熙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纂处主持人。

〔4〕1916年秋,黎锦熙等人发动“国语运动”,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并发表《论教育之根本问题》。“以国语易国文”一文即指这篇文章。

〔5〕三达德,见《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6〕颜子,即颜渊(前521—前490),名回,字子渊,春秋末鲁国人。孔子学生。好学有德,但身体很弱,29岁白头,31岁即去世。

〔7〕贾生,指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洛阳人,政论家、文学家。文帝时召为博士,颇受赏识,升为太中大夫。敢于提出改革建议,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所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转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死,深感未尽太傅之责,忧惧哭泣,岁余而死,年三十二。

〔8〕王勃(648—675),字子安,唐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文学家。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称“初唐四杰”。曾任沛王府修撰、虢州参军。所写《滕王阁序》,脍炙人口。后往交趾探亲,因渡海溺水,受惊而死,时方28岁。

卢照邻(约635—约689),即卢升之,号幽忧子。唐幽州范阳(今河北涿县)人。文学家。曾任新都尉。后为风痹症所苦,投颍水而死。后人辑有《幽忧子集》。

〔9〕见《论语·乡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10〕见《孟子·尽心》,原文为:“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11〕罗斯福,指西奥多·罗斯福,曾任美国总统。其人好胜,体格强健,喜爱运动。卸总统任后,曾到非洲东部探险。

孙裳,据日本《体育大辞典》载:Sando是德国铁路哑铃操的普及者,常作巡回表演。

嘉纳(1960—1938),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讲道馆馆长。曾将日本“柔术”改良为“柔道”,后曾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

【赏析】

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书籍,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常常和黎锦熙谈古论今。他们虽曰师生,却情同手足。在湖南一师,黎锦熙组织了“宏文图书编译社”,毛泽东常携

友来此活动,并自发组织了哲学小组,每逢星期日和假日,毛泽东还经常到黎锦熙居住的芋园科学求教,两人过从甚密,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亲密无间。他曾说:“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又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1915年9月,黎锦熙应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在北京担任了教科书的特约编纂员。此时的毛泽东仍在一师求学,两人千里相隔,却音信不断。在频繁的书信来往中,毛泽东所言之事极广,从报国救民及世界观、人生观的探讨,到哲学辩论,每谈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全是毛泽东奋发求学的结果。在毛泽东长达五年的一师求学生涯中,他对知识的学习达到了如饥似渴的程度,他的远大志向就是要通过学习,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乃至世界、宇宙之大本源问题。他曾言道:“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真理“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为此,他先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伦理学,希望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由于毛泽东读书目的明确,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愿望迫切,他的学习踔厉风发,“从早至晚、读书不休”。他还与朋友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毛泽东还十分注重学习方法。他认为,学问学问,既要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进行讨论交流。正是毛泽东的勤奋好学,使他学识渊博,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太问题上独具慧眼,别有高论。

这封书信,集中谈了对体育锻炼的看法,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很注重锻炼身体,经常自觉地进行雨浴、风浴、冷水浴、游泳、野游、露宿,以此达到《书经》所描绘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的境界,从而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

毛泽东深深知道身体对于艰苦的革命斗争的重要性,信奉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一至理名言。在他看来,体育锻炼对于强身健体,加强国人的体质,改变中国庸辱的“东亚病夫”面貌,激发民族豪气,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他认为体育锻炼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平均发展,不仅能强身健骨,还能培养意志,不仅为养生所必需,还在于卫国之至要。他常告诫朋友,一个人身体不好,就无从谈到学问、道德,不把身体锻炼好,就不能谈救国救民。在一师的五年中,他坚持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游泳是毛泽东最擅长的,他曾携百侣去橘子洲头,到中流击水。他曾自豪地抒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他还自编一套运动体操,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击和跳跃等动作,共六段二十七节,自称“六段操”,天天练习,终年不断。不仅如此,他还倡导别人锻炼。在担任第一师范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时,他就积极发动和组织学生投身于体育活动。他在其《体育之研究》一文中,针对国力衰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提出自己的见解,主张必须从体育锻炼着手,来改变国民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他认为,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为此,“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主张“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力图发起一场艰苦卓绝的民族复兴运动。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首先对“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一事致歉。当时,袁世凯已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步伐,“筹安会”六君子又以湖南人杨度为首,这使毛泽东十分担心。他惟恐黎锦熙也被袁世凯笼络,误入歧途,于是及时写信给黎锦熙,申明大义,他写道:“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并劝黎离京归湘。不久,他收到黎锦熙的书信,得知其在京所为只不过是“书生事业”,既非“事务

官”，更非所谓名士，未被袁世凯笼络时才释然于心，对于去冬那封信，毛泽东请先生叔作“妄言”，多多谅解。这就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毛泽东的虚心。接着，从分析黎锦熙的现状入手，转入正题。黎锦熙时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员及文科主任，故毛泽东在信中说：“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针对“以国语易国史”一文，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毛泽东反对片面追求智育第一，认为这只能培养偻身俯首、纤纤素手，“见兵而畏”的文弱书生，不能培养建国栋梁之材。由此入手，毛泽东论述了“德、智、仁与勇并举”的辩证思想。“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没有了身体这个承载，知识和道德都将无所依附。为说明这个道理，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锻炼身体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他以颜子、贾生、王勃、卢照邻等“不永寿者”的“早夭”或“坐废”为反例，说明“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的道理。一方面，他以罗斯福、孙策、嘉纳等人为正例，论证了“至弱之身”通过体育锻炼可以达到“至强之效”的道理，使此信达到了以理服人的效果。

“德智所寄，不外于身”，强调的是“身”。信中，毛泽东还劝黎锦熙：“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注重身体锻炼这一观点一经确立，便从此根深蒂固，并使毛泽东终生受益匪浅。他不但是一个理论上的创造者、倡导者，更是一个实践上的推进者。据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载，毛泽东回忆起当年他对体育锻炼独特而又丰富的体验时，曾不无自豪地断言：“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可见体育锻炼对他的影响之深。

此信内涵丰富，结构严谨，语气富有节奏，语调铿锵有力，感情酣畅淋漓。而且，援古论今，旁征博引，正反奇证，用例恰当，汪洋恣肆，不乏天马之魂，亦有振聋发聩之音，在当时国力孱弱、武风不振的历史背景下，此信无疑具有较强的震撼力、说服力和感召力，足以唤起读者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情和理性是毛泽东伟大性格的两个侧面。此信字字带情，显得气势澎湃，句句寓理，叫人心服口服，不愧为一篇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佳作，是政论文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望见丰采，聆取宏教”

——致白浪滔天^{〔1〕}（1917年春）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靛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2〕}毛泽东上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这封信是毛泽东与萧植蕃（即萧三）在白浪滔天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期间写的。

白浪滔天（1871—1922），即宫崎寅藏，也作白浪庵滔天，日本熊本县人。早年受日本自由民权思潮熏陶，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参加兴中会，与黄兴等交往甚密。在穷困潦倒之际，拒绝东京赤坂警察署长的贿赂，保护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1916年10月，黄兴在上海病逝后，灵柩归葬湖南。次年2月，白浪滔天由日本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4月离开长沙回国。

〔2〕萧植蕃，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教员。参见本书第255页注〔1〕。

【赏析】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五年多的时间，正是青年毛泽东风华正茂的时期，也是他在政治上、思想上跃上新境界的重要时期。在一师，毛泽东的文化科学知识不断丰富，政治思想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探索和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取得很大进展。他爱惜光阴，刻苦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深入社会，磨砺意志，以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异成绩和出众才华，赢得了师生的尊重，同时，结交了许多良师益友，在教师中有杨昌济、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等；在同学中有罗学瓚、周世钊、蔡和森、陈章甫、张昆弟、萧植蕃、萧子升等。毛泽东关注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变化，天天阅读省内外报刊，分析时局精辟入理，成为同学中的“时事通”。他还主张青年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目标，博览广学。除此以外，毛泽东还特别注意主动地结交有志之士。他交朋友的原则是“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人

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在给萧子升的信中，他又说：“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嚶鸣而求友声。”正是这种急切的求友心情，使毛泽东不仅把目光投向一师的老师、同学，还积极向社会寻找知己、朋友，联系一些有名望、有学识的智者。只要是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是外地来的有名望的学者，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向其求学问道。1917年春，曾经参加兴中会、支持辛亥革命、保护过孙中山和黄兴的日本著名人士白浪滔天从日本来到长沙，参加黄兴改葬的葬礼。毛泽东得知，非常兴奋，立即和同学萧植蕃联名给这位日本知名人士写了这封求见、请教的信。

首先，此信表达了对白浪滔天先生的敬仰，高度赞扬了白浪滔天对中国人民的友谊。信的称呼是“白浪滔天先生阁下”，起笔之处，顿添敬仰之情。接着，信中用了四个短句，气势连贯，情韵激扬，显得短促而迫切。“久钦高谊，觐面无缘”，表达了一种敬仰之情。然后，“远道闻风，令人兴起”一句，表达出一种向往之情、喜悦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心情呢？作者没有直说，而是紧扣白浪滔天先生的“高谊”铺陈开来。对于黄兴，白浪滔天“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这本已仁至义尽了，然而，在黄兴改葬之时，白浪滔天又万里漂洋，临穴送棺，这是何等真挚而感人的友谊啊！或许正是白浪滔天的爱友、助友、吊友、悼友的情谊，深深地打动了“嚶其鸣声，求其友声”的毛泽东，对友谊的珍视和追求，使他与白浪滔天产生了共鸣。所以，在信中，毛泽东挥笔写道：“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这种高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对黄兴一人，而应视为白浪滔天先生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

其次，此信还表现出了毛泽东、萧植蕃虚心求教的治学态度以及对圣贤志士的崇拜心理。毛泽东之所以对社会圣贤、仁人志士如此看重，除了他注重友谊之外，还与他早期“圣贤创世”的历史观分不开的。他在读《世界英雄豪杰传》时，对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物圈圈点点，并希望中国也能有这样的英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在对《伦理学》批注时，他写道，豪杰之士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此种动力，乃至坚至真之实体，为成全其人格之源。毛泽东热切地期盼着英雄降临，圣贤出世，来救中国，这显然是一种唯心史观。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毛泽东进而得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观。早年的毛泽东高举思想解放、个性解放的旗帜，紧跟中国进步潮流，探寻着中国的未来道路，并在不断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同时，不断地改造着自己，完善着自己。后来，他从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著名论断，实现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

此信结构严谨，条理清楚，内涵丰富，语言典雅，笔调流畅，给人一种简洁明快、朝气蓬勃的情感激荡。



(1919 年的毛泽东)

探索真理篇

“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致黎锦熙(1917年8月23日)

邵西^①先生阁下：

省城一面^②，几回欲通音问，懒惰未果。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涂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③，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樗枘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④而三。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千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⑤，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则纷纷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无内省之明；一则不知天下应以何道而后能动，乃无外观之识也。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霖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翳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自昔无知识，近顷略阅书报，将中外事态略为比较，觉吾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

德太坏。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怀仲⁽¹⁾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今人劝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其始所谓立志，只可谓之有求善之倾向，或求真求美之倾向，不过一种之冲动耳，非真正之志也。虽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此又学之所以贵乎幼也。今人学为文，即好议论，能推断是非，下笔千言，世即誉之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议论，皆其心中之臆见，未尝有当于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²⁾，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顾既腾之以为口说，世方以为贤者之言，奉而行矣，今乃知其为妄，宁不误尽天下！弟亦颇有蹈此弊倾向，今后宜戒，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探讨既得，自然足以解释一切，而枝叶扶疏，不宜妄论短长，占去日力。阁下以为何如？

圣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³⁾，如孔子之“百世可知”⁽⁴⁾，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⁵⁾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惟宗教家见众人以为神奇，则自神奇之，如耶苏、摩哈默德、释迦牟尼⁽⁶⁾。）

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学不可。吾见今之人，为强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学见解，自然人己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

某君语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哉？老朽者聪明已蔽，语之以真理而不能听，促之而不能动，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顾道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学讲堂，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问题都不求解释，只顾目前稀米尘埃之争，则甚矣人之不智！弟谓此种人，大都可怜。彼其不顾道理者，千百年恶社会所陶铸而然，非彼所能自主也，且亦大可怜矣。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义利一也，毁誉又一也。愚者当前，则只曰于彼乎，于此乎？歧路徘徊，而无一确实之标准，以为判断之主。此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一种笼统之社会制裁，则对于善者鼓吹之，对于恶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驱于此制裁之下，则相率为善不为恶，如今之守节、育婴、修桥、补路，乃至教、友、睦、雍、任、恤种种之德，无非盲目的动作。此种事实固佳，而要其制裁与被制裁两面之心理，则固尽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欲使此愚人而归于智，非普及哲学不可。

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终日经营忙碌,非为君子设也,为小人设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则政治、法律、礼仪制度,及多余之农、工、商业,皆可废而不用。无如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12]。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义,故立太平世为鹄,而不废据乱、升平二世^[13]。大同者,吾人之鹄也。立德、立功、立言以尽力于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

弟对于学校甚多不满之处,他日当为书与阁下详论之。现届毕业不远,毕业之后,自思读书为上,教书、办事为下。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乎未定,如何教书、办事?强而为之,定惟徒费日力,抑且太觉糊涂。以糊涂为因,必得糊涂之果,为此而惧。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三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三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三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14]与范公之画粥^[15],冀可勉强支持也。阁下于此,不知赞否若何?又阁下于自己进修之筹画,愿示规模,作我楷模。思深言长,聊欲尽意,不觉其琐。

乡弟 泽东谨上

八月二十三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 邨西,即黎锦熙,参见本书第13页注[1]。

[2] 黎锦熙于1917年4月16日自北京回到长沙,4月23日其《日记》中载:“上午到社晤毛润之,谈学。”5月15日黎离长赴京。

[3] 191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同萧子升用“游学”形式进行社会考察,从长沙动身,到了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了解群众生活状况和社会风俗人情。到沅江后遇洞庭湖涨水,道路被淹,便乘船返回长沙。历时月余,行程近千里。

[4] 袁世凯,参见本书第11页注[6]。

孙文,即孙中山(1866—1925),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六岁参加农业劳动,十岁入塾读书。1878年随母到檀香山,就读于英、美教会所办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1884年入香港拔萃书室,后转域多利书院。1886年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学校学医,第二年转学香港西医书院。1892年毕业后,先后在澳门和广州开设西医房,日益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1894年经上海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

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遭拒绝。遂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主张。次年至香港,合并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起义,事泄而败,逃亡国外。1896年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执,得英人康德黎等帮助脱险。后留居伦敦,悉心钻研西方各国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寻求救国真理,其间曾访问第二国际。1900年组织惠州(今惠阳)三洲田起义,失败后仍奔走国外,同保皇派作斗争,并在欧洲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同盟的组织活动。1905年由欧洲再到日本,以兴中会和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其他革命分子,组成中国同盟会,被举为总理;确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同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论战,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才有前途;主张用“平均地权”和“土地国有”政策防止贫富悬殊。同时积极在国内外发展同盟会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在两广、云南等地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宣统三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12月25日由欧洲回到上海,29日经在南京举行的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到南京宣誓就职,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成临时参议院,公布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于立宪派及其他旧势力对袁世凯的支持及革命党人的妥协态度,被迫于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临时大总统职,荐袁世凯以自代。8月,同盟会吸收其他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被推为理事长。9月,接受袁世凯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1913年2月去日本考察铁路状况,积极进行借款活动。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后,愤而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因国民党涣散无力,旋即失败。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被举为总理,并于次年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坚持反对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被推举为海陆军大元帅,誓师北伐。次年因受桂系军阀排挤,向非常国会提出辞职,赴上海继续撰述《建国方略》。1919年书成,并创办《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发表《实业计划》。同年,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命陈炯明部驱逐在粤的桂系军阀势力,重回广州。1921年国会召开非常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他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揭护法旗帜,组织大本营,准备北伐。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他退居上海,陷于极大苦闷。但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给了他以新的希望。此后,他接受中国共产党、苏俄共产党和列宁的帮助,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中国国民党改组为民主革命的阶级联盟,邀请共产党人参加,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1923年,在驱逐陈炯明后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回访苏联,邀请苏联政治与军事顾问到广州,帮助中国革命。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党章,发表宣言,把旧三民主义根据三大政策重新加以解释,成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同时创办黄埔军官学校,聘请苏联顾问,仿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军事制度,训练革命武装干部。同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后,应北京政府之邀,于11月13日带病北上,提出对内召开国民会议,结束军阀统治,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同帝国主义和段祺瑞、张作霖等北洋军阀作斗争,坚信中国人民有能力来解决全国一切大事。积劳病剧,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其遗嘱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

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著作有《中山全书》或《总理全集》多种。1956年为纪念他诞生90周年，出版了《孙中山选集》。

康有为，参见本书第7页注〔4〕。

〔5〕曾文正，即曾国藩，参见本书第7页注〔2〕。洪，指太平天国创建者、领袖洪秀全（1814—1864），广东花县人；杨，指杨秀清（约1820—1856），广西桂平人，太平天国创建者之一。收拾洪杨一役，系指曾国藩从1852年开始，在湖南帮办团练，编组湘军，于1864年率领湘军攻陷天京，使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一事。

〔6〕怀中，即杨昌济（1871—1920），字华生，又名怀中，湖南长沙人。戊戌变法时，参加湖南维新活动。1903年留学日本，研习教育学。1909年考入英国厄北浞大学，主攻哲学和伦理学；1912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在德国短期考察后，1913年春返国。1913年至1918年，曾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四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校任教。毛泽东曾受学于其门下。1918年夏，应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直至病逝。

〔7〕某公，指梁启超，参见本书第7页注〔5〕。1903年10月，梁在《新民丛报》第38～39号所载之《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文中说：“若夫理论，则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且不得不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者也。”以后，梁又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过“今我与昨我挑战”的话。

〔8〕佛教称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三界。下为欲界，中为色界，上为无色界。这是由佛教善恶报应和禅定修行理论概括而来的。

〔9〕见《论语·为政》。原文为：“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0〕“圣人复起，不易吾言”，见《孟子·公孙丑》。原文为：“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11〕耶稣，即耶稣，基督教所信奉的救世主，称为基督。传教于犹太各地。后因改革犹太教，被钉死于十字架。

摩哈默德，今译穆罕默德（约570—632），生于麦加，伊斯兰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教创始人。

〔12〕巢，指巢父；许，指许由，又作许繇。均为古代隐士。相传巢父因巢居树上而得名。帝尧要让位给他，不受。尧又要让位给许由，巢父又劝许由隐居。许遂逃至箕山下，农耕而食。尧改请他做九州长官，他却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

〔13〕从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这是儒家公羊学派的历史进化观。近代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与《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结合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这种乌托邦的历史进化观。

〔14〕颜子，参见本书第29页注〔6〕。颜子之簞瓢，语出《论语·雍也》，原文为“子曰：‘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15〕范公，指范仲淹（983—1052），字希文。北宋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据宋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载，范仲淹少时家贫，在僧寺里读书，经常煮粥一小锅，待凝结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外加一点咸菜，即为一天饮食。《宋史·范仲淹传》也记述：“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

【赏析】

在湖南一师上学期间,毛泽东不仅从杨昌济先生那里学到了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而且确立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杨昌济先生认为,青年人要有奋斗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独立创造精神,他反对做官混世,而经常教育学生要立志成才,服务于社会,不要沉溺于一己之悲欢,而要树立远大志向。他自编的修身讲义《论语类钞》,开篇就倡言立志。他在解释《论语》句式时,曾发过感慨:“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古来殉道者,可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能前赴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他强调人应该为社会谋利益,宁可牺牲一己之利,而不可牺牲己之主义。杨昌济的这些言论,不仅目光远大,而且颇具浩然正气,这对于正在确立人生观的青年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指导作用。毛泽东不仅继承杨先生的立志思想,还进一步抒发自己对“立志”的看法。在追求真理,求学问道的探索中找到了自己应确立的真正的远大志向和抱负。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信,详细谈了自己对“立志”的认识。

全信包括三层意思:

首先,毛泽东抒发了自己对黎锦熙先生的思慕和怀想之情。每当毛泽东学习或实践中遇到什么问题,产生什么思考,他总忘不了请教在北京的黎锦熙先生。自从黎锦熙到北京就职,毛泽东虽能以信相通,但无法时时谋面,常感到“四无亲人,莫可与语”的孤寂。越是如此,越发怀想黎先生。“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一句,虽为比喻,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和黎锦熙先生的深情厚意,这是从正面写黎先生对自己成长的重要。毛泽东如此思念师长,是因为周围的人昏庸碌碌,不能商量学问,不能谈天下大事。每当彷徨苦闷之时,这种心灵的孤独之苦更是不可胜言。寥寥数语,把黎先生在自己心目中的重要位置阐述得淋漓尽致。

其次,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求得大本大源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的想法。毛泽东之所以产生这种想法,从主观上讲,是他努力探索的结果,从客观上讲,则有深刻的社会背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思想界掀起了新的狂澜。陈独秀首先揭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他创办《新青年》,开敬告青年,希望青年迅速觉醒,“奋起智能,力排除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他号召青年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树立新的思想:自主的而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使新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指封建思想和封建专制。杨昌济热烈拥护新思想,他把自己订的《新青年》送给毛泽东等青年看,使毛泽东对封建专制和封建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毛泽东认为,中国积弊甚深,国民思想太落后,道德太陈旧,要改变国家的面貌,必须用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重塑国民的思想和灵魂。而袁世凯及其封建军阀,却以木愚人,称帝道孤,在思想界泛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毛泽东在这封信中痛斥道:“以拥护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就是康有为等人,虽略为有本源,也“徒为华言炫听”。接着,毛泽东论述了自己的“本源”观。他的本源观,以倡学为基础,以启民智为己任,以追求真理为目标。因此,他提出要研究哲学、伦理学,要探讨世界的根本大源。因为在他看来,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愚昧落后的国民智米污塞,开通为难,要开启民智,仅凭枝节入手不行,必须有本源。毛泽东抽象而又明确地指

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这就把“大本大源”看成了人类的真理。他大声疾呼：“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这说明毛泽东已在思想上、实践上，从一介书生跨入了力倡哲学救国的重要阶段。

第三，全信还集中展示了毛泽东对“立志”的看法。毛泽东针对当时盲目模仿、追求名利的立志观，提出了求真理、立真志的“立志观”。他指出，要立真志，必须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尽力为之，“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只有这样，才能叫真立志。对于立真志的方法，毛泽东毫不掩饰地写道：“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很显然，毛泽东把追求真理作为立志的内容之一，表达了他决意要在黑暗的中国探索一条救国救民道路的宏大抱负。然而，在救国救民依靠什么力量的问题上，此时的毛泽东是模糊的。他认为并不是人人都能探得“大本大源”，在信中，毛泽东按照人们对宇宙真理掌握的程度不同，分为“圣人”、“贤人”和“愚人”。他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贤人“略得大本”，愚人“不得大本”。由此可见，毛泽东把圣贤和豪士的伟力视为天生就有的，这就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的色彩。他指出，社会上愚者多，智者少，愚者“只顾目前稻米尘埃之争”，而对于生死、义利、毁誉等重大问题，只是“歧路徘徊”，要援救他们，必须普及哲学。毛泽东在当时的这种圣贤观是一种唯心史观，其落脚点是依靠圣人，改造愚人，达到天下皆为圣贤，“共跻于圣域”。

最后，毛泽东还在信中袒露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早就对学校教育有诸多不满之处，他为此设想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略通“国学大要”之后，就出国留学以求得“西学大要”，以此达到探求真理的目的；并表示为达到目的，须克服人、地、财的困难，学习古人颜回和范仲淹的吃苦精神，克服困难，奋发图强。

此信言长意深，体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热血青年的思想境界。虽然当时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还不健全，还明显地带有“唯心主义”和“心物二元论”的色彩，但这种闪烁着哲人思想的光芒，足以能启发当时的人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桎梏，冲决历史的网罗，破坏陈腐学说的囹圄，以求得思想的彻底解放。

“《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

——致黎锦熙(1919年9月5日)

邵西^[1]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2],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3],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4]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九·九·五从修业学校^[5]寄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邵西,即黎锦熙,参见本书第13页注[1]。

[2]《新湖南》是五四运动时期由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自治会创办的周刊,龙毓莹(字伯坚)任主编,编委有李振翩、张维等人。《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新湖南》第7号即由毛泽东接手主编,直至第11号被张敬尧查封为止。

[3]《民铎》,于1916年在日本东京创刊,由留日中国学生所组织的“学术研究会”编辑发行,从第五号起迁至上海出版。1931年停刊。《国语学之研究》,为黎锦熙于1918年10月和1919年1月分别在武昌、太原国语讲习班所编撰的讲稿,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平民》,据黎锦熙1950年写的《毛主席六礼记事并注释》中说:“《平民》刊物待考。查我1919年日记:‘七月廿一日,看茎弟(黎锦晖)所撰高等法文专修馆平民周刊发刊词。’或即此,也与留法团体有关。”

[5]修业学校,指长沙修业学校。始建于1903年,当时只设中学部。1904年接收敬业小学堂,增办小学部,1906年又开办速成师范科。1906年至1918年,徐特立在该校任校董兼教员,1919年4月至12月,毛泽东在该校小学部任历史课教员。

【赏析】

1919年4月,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毛泽东从北京回到上海,又从上海回到长沙。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人们曾热烈地欢呼“公理战胜”。然而,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和会上竟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地位,拒绝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而且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全国各地的进步学生和爱国群众纷纷提出一定要“誓死力争,义无反顾”。毛泽东看到北京、上海的学生运动开展起来,发起并领导了湖南五四运动。为了很好地推动湖南爱国斗争,宣传新思潮,也为了有一块发表自己政见的阵地,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亲自主编了《湘江评论》一刊。他在创刊宣言中,热烈地为新思潮欢呼,号召人们打倒强权,并对俄国十月革命及各国人民反抗强权的斗争给予热烈的支持,鲜明地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毛泽东作为一个在革命浪潮中执著追求真理的无畏战士,以丰富深邃的思想,豪迈奔放的气概,震动了社会。这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期刚刚印出,就被张敬尧派军队查封。然而,毛泽东并未因此而停止战斗。9月初,他应邀担任《新湖南》主编,这期间,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这封信。

信中首先回顾了《湘江评论》被查封和《新湖南》编辑等情况。毛泽东对报纸早就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北京期间,毛泽东积极参加北京新闻研究会的活动,从理论上到实践上武装和锻炼了自己。正当五四运动后各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时,毛泽东经过十几天的筹备,使风貌崭新的《湘江评论》一经面世,便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毛泽东那波辣而酣畅的文笔,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使广大读者感到痛快淋漓。创刊号印了两千份,当天被抢购一空,加印两千份后,仍不能满足要求。《湘江评论》被人们誉为“湖南的怒吼”、“湖南人民的心声”。《湘江评论》寄到北京后,李大钊、陈独秀给予很高的评价。黎锦熙收到以后,也大加褒奖,并写信表示夸奖。对此毛泽东谦虚地写道:“来示敬悉,承奖甚愧。”

其次,信中还提出了研究国学的想法。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因为他想在出国前的两三年内,用他已经得到的国文知识,阅读新出版的报纸、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作为出国研究的基础。由此可见,在当时湖南兴起出国热时,毛泽东考虑更多的是不懈地探索和追求中国和世界学术思想的大纲。

此外,在信的末尾还提出了湖南学生留法一事。在湖南一师即将毕业或已经毕业的学生,面临着一个选择职业的问题。他们不满足湖南这个闭塞的地方,他们认为湖南交通不方便,政治文化又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所以,不愿意“堆积”在湖南一地,并打算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去考察,去开辟一个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毛泽东对此十分赞成。在信中,他认为这“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四处奔走,并为有志青年奔忙,多方联络,作出了极大的努力,但他决定留在国内,清醒而坚定地走自己的求索之路。

“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 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

——致陶毅(1920年2月)

斯咏^[1]先生：

(上略)^[2]

我觉得我们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我们同志，在准备时代，都要存一个“向外发展”的志。我于这问题，颇有好些感想。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在一个人，或者还有团体的，共同的，那就少了。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的。错误之故，因为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这样的冥想，一个人虽觉得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这是一个弊病。还有第二个弊病。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进行的限于一个人。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要治这种弊，有一个法子，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讨论有二点：一，讨论共同的目的，二，讨论共同的方法。目的同方法讨论好了，再讨论方法怎样实践。要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具体(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上述之问题，是一个大问题。于今尚有一个问题，也很重大，就是“留学或做事的分配”。我们想要达到一种目的(改造)，非讲究适当的方法不可，这方法中间，有一种是人怎样分配。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

我们几十个人，结识得很晚，结识以来，为期又浅(新民学会^[3]是七年四月才发生的)，未能将这些问题澈底研究(或并未曾研究)。即我，历来很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狠有研究的价值。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狠是可叹！你是狠明达狠有远志的人，不知对于我所陈述的这一层话，有甚么感想？我料得或者比我先见到了好久了。

以上的话还空，我们可再实际一些讲。

新民学会会友，或旭旦学会^[4]会友，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

目的之方法。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份责任,为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在目的地方面,宜有一种预计,怎样在彼地别开新局面?怎样可以引来或取得新同志?怎样可以创造自己的新生命?你是如此,魏周劳^[5]诸君也是如此,其他在长沙的同志及已(己)出外的同志也应该如此,我自己将来,也很想照办。

以上所写是一些大意,以下再胡乱写些琐碎:

会友张国基^[6]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暉^[7]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8]君等数十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9]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10]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11]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12]君等商量。听说上海复旦教授汤寿潜^[13]君(即前商专校长)也有意去。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诉你!好像你曾说过杨润馀^[14]君入了我们的学会,近日翻阅旧的《大公报》^[15],看见他的著作,真好!不知杨君近日作何生活?有暇可以告诉我吗?今日到女子工读团^[16],稻田^[17]新来了四人,该团连前共八人,湖南占六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己)经失败了)。北京女高师,学生方面很有自动的活泼的精神,教职方面不免黑暗。接李一纯^[18]君函,说将在周南^[19]教课,不知已(己)来了否?再谈。

毛泽东

九年二月在北京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注释】

[1]斯咏,即陶毅(1896—1931),女,湖南湘潭人。长沙周南女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周南女校任事。

[2]原件如此。

[3]新民学会,由毛泽东、蔡和森和萧子升等发起,于1918年4月在湖南长沙成立。学会最初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后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1920年有一部分会员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加在湖南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4]旭旦学会,1920年1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进步女学生团体。成员多为长沙周南女校和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

[5]魏,指魏璧(1897—1969),又名幅庵,女;周,指周敦祥(1898—1980),号肫如,女;劳,指劳君展(1900—1976),又名启荣,冀儒,女。三人均为湖南长沙人,周南女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以后都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劳君展并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6]张国基,参见本书第69页注[1]。

[7]萧子障,当时在上海筹备赴法勤工俭学,发起成立赴法学生联合会,1920年5月离开上海去法国。参见本书第255页注[1]。

[8]1920年初,彭璜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以实行半工半读互助协助为宗旨”。彭璜任该团临时会计。参见本书第85页注[1]。

[9]何叔衡(1870—1935),又名瞻岳,老武,湖南宁乡人,新民学会会员。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委员、湘江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检查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红军长征后留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牺牲。

[10]湘事,指当时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11]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学会,是由向警予、蔡畅等发起,于1919年12月在湖南长沙成立的进步团体。学会“以赴法勤工俭学将来回国振兴实业教育”为目的。奉“劳工神圣”、“工读神圣”、“实行妇女解放”为信条。规定成员必须戒除“懒惰之习惯,奢侈之装饰,邪僻之行为”。该会负责筹备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事务,筹集出发川资及互助基金,推动了当时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2]李大钊(1885—1927),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1918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负责北方区党的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被选为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积极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24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4月6日被军阀张作霖逮捕,28日在北京英勇就义。

[13]汤寿潜,即汤松(1887—?),湖南长沙人,先留学日本东京商业学校,后留学美国,1915年归国,曾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长沙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当时是湖南华法教育分会在沪干事。

[14]杨润霞(1899—?),女,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12月曾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现在——解放过渡期中——的女子应读怎样?》、《原来你们城里人时新这样》等文章。

[15]《大公报》,指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26页注[37]。

[16]女子工读团,指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成立于1920年初,其宗旨为“实行女子工学互助”,成员多为北京各女子学校的学生。

[17]稻田,指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因校址设在长沙古稻田,故又名稻田女子师范学校。

[18]李一纯(1890—1984),女,湖南长沙人。长沙周南女校毕业,1923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均从事理论教育工作。

[19]周南,指长沙周南女校。

【赏析】

191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组织开展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斗争,第二次来到北

京,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创办的“少年中国学会”。在北京停留期间,毛泽东尽力搜集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籍,用心地阅读,思想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时的毛泽东已逐步把驱张运动放到了他改造社会的方案中去思考。湖南应当怎样改造?社会究竟如何改造?新民学会应该向何处去?是赴法好还是赴俄好?一系列的问题促使他进一步探索。1920年2月,毛泽东把自己的思考以书信的形式,告诉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

此信洋洋洒洒,主要有三层意思:

首先,毛泽东提出了加强“共同讨论”,来组织“联军”的问题。他认为,对于社会改造的目的和方法问题,同志中认真研究的很少,多数有两个弊病:一是许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其错误往往是因为个人冥思苦想的结果。二是所想的办法尽管好,但限于一个人,是“人自为战”,是“浪战”,这样,“用力多而成功少”。根据以上两个弊端,毛泽东提出了“要结合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同志团体”的主张。他相信,有了这样一个团体,就能够克服“目标空泛”或“人自为战”,就便于“共同的讨论”。对于讨论的内容,毛泽东指出一是讨论共同的目的,二是讨论共同的方法。他认为,有了这样的共同讨论,将来才会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只有这样才有具体的效果可睹。“浪战”是会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在改造社会中“同志的分配”问题。他针对许多人“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的做法,指出:“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多扯同志去,不免错了一些。”毛泽东委婉地批评了当时某些盲目地、赶时髦式的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因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就要“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去打先锋的人”,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大留学”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对会友张国基赴南洋一事很表赞成,对在上海的萧子暉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一事,也极为称赞,对何叔衡留法的选择,毛泽东劝他留俄。至于女子留俄事宜,毛泽东也及时和李大钊商量,使同志们去世界各地考察,达到天涯海角都要去人的目的。

第三,此信还报告了工读互助团的消息。1920年初,赴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和陈独秀等人与北京的王光祈相呼应,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彭璜任该团临时会计。毛泽东在信中表示:“彭璜君等数十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工读互助团运动,毛泽东却不仅无欣喜,而且感到茫然。

通篇书信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结构严谨,论述精当,举例论证,以理服人,语言运用通俗易懂,明白如话,字里行间流露出毛泽东对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深刻的思考和艰辛的探索。

“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

——致黎锦熙(1920年3月12日)

邵西^[1]先生：

奉上“湖南建设问题条件”二份，有好些处所尚应大加斟酌。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的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支支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首“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先生是很明白湖南事情的人，敬请将各条斟酌，或要增减修正，见示，以便持赴沪上，从事进行，不胜感谢！

乡弟 毛泽东

一九二〇，三，一二。

附 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2]

(一)军政

(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

(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

省城治安，以隶属省长之警察维持之，绝对不驻兵。

各县治安，以隶属县知事之警察维持之，废除警备队及镇守使名目。

(3)军费支出总额，至多不得超过省收入总额十二分之一。

(二)财政

(1)银行民办。银行发行纸币基金，由省议会监督存储。基金额与纸币发行额之比例，由省议会议定。

(2)举办遗产税、所得税及营业税。减轻盐税。废除两年来新加各苛税。

(3)民办“湖南第一纺纱厂”。

(三)教育经费

(1)恢复民国二年教育经费原额，以后应时增加。

(2)确定来源。

(3)保管权属之由省立各学校组织而成之“教育经费保管处”。

(四)自治

(1)恢复并建设县、镇、乡自治机关。

(2)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3)成立并公认县、镇、乡工会。

(五)完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

(六)在最快期内,促进修竣粤汉铁路之湖南线。

提出者 湖南改造促成会。

通信处 上海法租界八仙桥永乐里

全国各界联合会 彭璜。^[3]

~~~~~怀疑的地方,或者明后天的晚上来尊处领教。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邵西,即黎锦熙。参见本书第24页注[1]。

[2]所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起草情况不详。

“~~~~~怀疑的地方,或者明后天的晚上来尊处领教”,系毛泽东手迹,文中小黑点和曲线亦为毛泽东所加。《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于1920年6月14日在上海《申报》发表。

[3]彭璜,参见本书第85页注[1]。

## 【赏析】

五四运动以后,正当毛泽东热心于他的“新村实验”时,张敬尧率兵入湘,在湖南这块兵家必争之地,无恶不作。“张毒不除,湖南无望”,这是湖南人民的呼声。《湘江评论》被查封以后,毛泽东决意领导湖南人民进行驱张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和组织下,湖南学联焚烧日货,进行罢课和请愿活动。毛泽东还亲率赴京代表团到国务院请愿,竭尽全力,然而呼吁无效。为了更好地争取舆论支持进行驱张宣传,毛泽东在北京组织了“平民通信社”,他白天四处奔波,晚上赶写文章,推动驱张运动的进行。此时毛泽东所考虑的问题是深刻的。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开始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产生浓厚兴趣,认识到像驱张运动这种“支支节节地向老虎口里讨碎肉”的做法是令人失望的。湖南究竟怎样改造?带着这个问题,3月12日,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并附上了“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两份。

全信自始至终体现了毛泽东对湖南改造问题的艰辛探索和思考。首先,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改造湖南的诸多疑问。他分析了湖南的现状,进而论及全国的局面,逐步认识到社会问题要“根本解决”才有希望。一方面认识到通过请愿达到目的的不可能性,另一方面又找不到“根本解决”的办法,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对驱张运动已多少有些进退两难的意思。正如他在信中所言:“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然而他并没有因此而泄气,相反,他觉得这一次“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如果连这也不做,那更是没有希望的。其次,毛泽东请求黎锦熙对“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各条斟酌,或增或减,提出修正意见。这个文件虽然体现了湖南人民对改造社会的意志和利益,但究其实质完全是一个改良的方案,都是与“根本解决”无关的,相反却打上了新村主义改良的痕迹。

新村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界的一股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毛泽东受其影响,也在积极进行着“新村实验”。他认为,要使社会进步,“改良其旧”是不能奏效的。旧生活只适应旧时代。旧时代已变更,必有适应新时代的新生活,因此,必须以“创造其新”作为新社会的基础。

“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这一问题,像一条主线贯穿全文,使此信言短而意赅,生动体现了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 “办一个自修大学”

——致周世钊<sup>[1]</sup>（1920年3月14日）

惇元吾兄：

接张君文亮<sup>[2]</sup>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sup>[3]</sup>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个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干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他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来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sup>[4]</sup>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的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 看译本校原本快且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一求到较多的知识。

2.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所以我对于上列三条的第一条，认为更属紧要。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

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上述二层(个人的方面和团体的方面),应以第一为主,第二为辅。第一应占时间的大部分,第二占一小部分。总时间定三年(至多),地点长沙。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约可定为下列几种:

(1)教课。(每人每周六小时乃至十小时)

(2)投稿。(论文稿或新闻稿)

(3)编书。(编一种或数种可以卖稿的书)

(4)劳力的工作。(此项以不消费为主,如自炊自濯等。)

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sup>[1]</sup>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以上是说暂不出洋在国内研究的活(话)。但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

我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我想两三年后,我们要组织一个游俄队。这是后话,暂时尚可不提及他。

出杂志一项,我觉很不容易。如果自修大学成了,自修有了成绩,可以看情形出一本杂志。(此间的人,多以恢复《湘江评论》<sup>[2]</sup>为言。)其余会务进行,留待面谈,暂不多说,有暇请简复一信。

弟 泽东

一九二〇,三,一四。

北京北长街九十九号。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周世钊,当时任长沙修业学校主任教员。参见本书第387页注[1]。

[2]张文亮,号闻谿。湖南湘潭人。当时在长沙修业学校读书。

[3]语出《诗·小雅·蓼莪》。

[4]胡适之,即胡适。参见本书第259页注[3]。

黎邵西,即黎锦熙。参见本书第13页注[1]。

[5]何叔衡,参见本书第47页注[9]。

邹泮清,即邹蕴真,(1894—1985),又名半耕,泮芹,湖南汉寿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学生,新民学会会员。曾任修业学校等处教员,湖南通俗教育馆编辑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当时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

[6]《湘江评论》,著名的革命报刊。周报。1919年7月14日,在长沙创刊。毛泽东

主编。每期四开一张,约12000字。分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栏。曾发表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第五期出版后,被军阀政府查封。第二期附有《临时增刊》,第五期未发行。该报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在当时颇有影响。

## 【赏析】

这封书信,反映了毛泽东为改造中国所做的大胆的尝试。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新思潮的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成了进步思想界的主流。但是,此时的社会主义,却包含着各种流派。如马克思主义、新村主义、工读互助主义、无政府主义,当时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此时的毛泽东虽已接受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仍有很大的求知欲。在《民众的大联合》中,就联合的方法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马克思的方法,另一方面也肯定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创始人克鲁泡特金的方法。在思想纷杂、急剧动荡的潮流面前,毛泽东面临的仍然是一种艰苦的比较和选择。当时,新村主义的宣传,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像李大钊这样已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人,也对新村主义表示了很大的兴趣,在新村主义的影响下,工读互助主义也在悄然兴起。毛泽东正是在这股思潮激荡下,开始了他的新村生活试验。从1919年冬毛泽东撰写的《学生之作》一文来看,他当时设想的新村,是以新学校、新教育为中心,以新家庭、新学校及其他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的理想社会蓝图。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信周世钊,其中也谈了这方面的思想和改造社会的计划。

此信共分三层意思。第一,毛泽东与周世钊商讨了国内研究与出国研究的先后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是“从个人”方面考虑的。就个人来说,他打算留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对于留在国内的原因,毛泽东考虑到了语言的障碍,东西方文明的地位及立足于“中国”这个地盘三个方面。第二,毛泽东与周世钊讨论了团体事业的准备工夫。这个问题是从“团体”这方面考虑的。毛泽东提出:“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曾主张学生在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工读结合。毛泽东曾说,旧日读书人不屑做农圃事,今一边读书,一边工作,以神圣视工作焉,则为新生活焉。号称士大夫有知识一流,多营逐于市场与官场,而农村新鲜之空气之不吸,优美之景色之不赏,吾人改而欣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焉。毛泽东还设计到:新学校中的学生,为创造新家庭之成员。“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举其著者,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场所、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等。在此信中,毛泽东对他描画的“自修大学”设计为:“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对于生活费用取得的方法,均可定为教课、投稿、编书、劳力的工作。“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另外,毛泽东还提出了“太留学”、“游侠”、“出杂志”等问题。

此信层次分明,情理兼容。信的开头,先言“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此时的毛泽东刚丧母数月,对周世钊“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表示深深的理解。他在信中写道:“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接着,毛泽东将种种感想与周世钊展开了讨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和周世钊之间亲密无间的情谊。通篇书信语言通俗流畅,浅显朴实,读来如同聊家常一样,具有独特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 “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

——致黎锦熙(1920年6月7日)

邵西<sup>[1]</sup>先生：

京别以来，在天津、济南、泰山、曲阜、南京等处游览一晌，二十五天才到上海，寓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sup>[2]</sup>，同住连我四人。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想找一俄人，学习俄语，此时尚未找到。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他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办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语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斯宾塞尔最恨国拘<sup>[3]</sup>，我觉学拘也是大弊。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呵！文学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一难得书，二不得空时，懈怠因循，只好说“今日不学又有明日”罢了。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我近来功课，英文，哲学，报，只这三科。哲学从“现代三大哲学家”<sup>[4]</sup>起，渐次进于各家；英文最浅近读本每天念一短课；报则逐日细看，剪下好的材料。我外国文还在孩子时代，不能直接看书。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近来国内到处发了丛书热，不管他动机和内容怎样，总于我这种“知识荒”的人多少有些益处。旅京学会<sup>[5]</sup>出报的事可实现否？只是这种混合的团体，很不容易共事，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我觉得具体、鲜明、热烈，在人类社会无论是一种运动，或是一宗学说，都要有这三个条件，无之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我想做一篇“具体、鲜明、热烈，与新运动”的文章，无闲暇构思的机会，恐怕不能做了出来。先生能指挥日常生活，将“上衙门”“下私宅”“作事”“读书”支配得那样圆满得当，真不容易。我因易被感情驱使，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望着先生，真是天上。北京此时想是很热，上海也热起来了。余话后谈。敬问

近安。

毛泽东

六，七。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 【注释】

[1]邵西，即黎锦熙。参见本书第13页注[1]。

[2]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今为上海市安义路63号。毛泽东在这里，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名义，同支持驱张（敬尧）的各界人士进行联络，并协助《天问》的编辑工作。同住者有李凤池、李思安、陈书农等。

[3]斯宾塞尔，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所著《社会学研究》，由严复摘译出版，名为《群学肄言》。《国枓》为其中的第九篇。此词系严复据原书意译，意即为一国狭隘范围所限。参见本书第12页注[20]。

[4]指柏格森、罗素、杜威。

柏格森（1859—1941），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曾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教授。创立直觉主义哲学。192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罗素（1872—1970），英国逻辑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1920年曾来中国讲学。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杜威（1859—1952），美国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1919年至1920年曾在中国讲学。

[5]旅京学会，指旅京湖南学会，成立于1920年春。会长范源廉。毛泽东为该会编纂干事之一，主要会务是利用星期日请名人讲演或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拟出月刊，未成。1920年秋后该会停止活动。

## 【赏析】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请愿团30余人，第二次来到北京。他一方面领导请愿团向北京政府的总统府、国务院请愿，一方面尽力搜集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藉。1920年5月初，毛泽东离开北京，5月5日到达上海，住在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6月7日，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简言回顾了自己的近况。离开北京到上海期间，毛泽东到泰山、曲阜游览，参观了孔子墓和孔子弟子濯凡的小溪和孟子的出生地，登上了泰山。25天后毛泽东到达上海，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过着一种共产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自己煮饭，轮流值班，实践着半工半读的共产生活。当时，彭璜和陈独秀等人，与在北京试办工读互助团的王光祈相互应，在上海发起组织了工读互助团。毛泽东曾经为之欣喜，同时又很茫然，他感慨道：“将来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写道：“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同时，提出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的主张。

其次，此信还体现了毛泽东“有意往俄”的思想。在第二次进北京期间，十月革命的影响正在中国迅速扩大。1920年2月，苏俄政府又发表了同中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的通告，引起极大的震动。研究俄国革命，成为一切爱国的先进分子的共同课题。毛泽东通过和李大钊接触，聆听到李大钊就具体问题发表的意见，而且读到一些共产主义和十月革命

的中文书籍。是留俄好,还是留法好?这个问题,毛泽东经过思索,倾向于留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

再次,此信还体现了“自由研究”的思想。他在信中痛切地感慨道:“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毛泽东早就有过自由研究学习的实践,他曾于1912年7月,离开高等中学,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长达半年时间的自学生活,他还利用暑假多方求学问道,读无字大书。他曾感慨地说:“于书本得者少,于质疑问题得者多。”毛泽东自由研究的范围是很广的,他特别对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最感兴趣,也最想研究。他认为,用已经学到的国文作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是“出国研究的基本”。为此,他希望黎锦熙将关于言语文字学和佛学的书名开示给他,以便于收聚研究。最后,此信还对旅京学会表示异议,认为“不如另找具体的鲜明的热烈的东西,易于见效,兴味较大。”他把“具体”、“鲜明”、“热烈”当作人类社会运动、学说必备的三个条件。不具备三个条件,便是附庸,不是大国;便是因袭,不是创造;便是改良派,不是革命派。他在信中,已经明显地划清“大国”与“附庸”、“因袭”与“创造”、“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实质性区别,体现了毛泽东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巨大进步。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此时仍处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冲撞中,但他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却已迅速增长。在北京期间,通过李大钊的文章和李大钊的直接帮助,毛泽东逐渐找到了社会主义这个明确的目标,找到了阶级斗争这条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正确道路。

全信言辞恳切,意挚情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黎锦熙的敬重以及对真理的执著追求。

## “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

——致曾毅<sup>[1]</sup> (1920年6月23日)

曾毅先生阁下：

惠书诵悉。名言谠论，钦感莫名。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sup>[2]</sup>，乃得乘隙陵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归己（己）囊。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非欲自处于小部落也，吾人舍此无致力之所。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已倒矣。吾侪缩小范围，讲湖南自决自治。吾侪大胆昌言，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陆荣廷<sup>[3]</sup>也罢，唐继尧<sup>[4]</sup>也罢，段祺瑞<sup>[5]</sup>也罢，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无正当职业之人，不得与闻湖南事。要说天经地义，这才是天经地义也。湖南大国也，南阻五岭，北接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羨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须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曰夸言乎？得吾三千万人之一齐努力，固不难致之也。舍基础而筑层楼，四千年中国人之过也。舍己之田而耘人之田，近年来湖南人之过也。吾人主张“湘人自决主义”，其意义并非部落主义，又非割据主义，乃以在湖南一块地域之文明，湖南人应自负其创造之责任，不敢辞亦不能辞。与湖南文明之创造为对敌者，军阀也，湘粤桂巡阅使<sup>[6]</sup>也，湘鄂巡阅使<sup>[7]</sup>也，护国军，靖国军，征南军<sup>[8]</sup>也。是等之敌对者，一律退出湖南境地以外，永无再入湖南境内与湖南人对敌。湖南人得从容发展其本性，创造其文明，此吾人所谓湘人自决主义也。

来书大意，“湘人自治，废督废兵，超出南北党争，建湖南为缓冲地带”。名言至论，大赞成而特赞成。至谓“不设一兵”，陈义甚高，无可反对之余地。惟敝会主张废除一切守备队、镇守使，暂保存正式有纪律之陆军一师。尊意乃欲不设陆军，而以警备队维持地方秩序，名实未亏而作用大异。警备队者，土匪之友。土匪无警备队不得枪，警备队无土匪不得开差机会，不得多量之开差费与乡村附带掠夺。正式编制之陆军，纪律较严，土匪有些畏惧，一也。陆军至多设一师，遍湖南地面设警备队，则至少七八个司令，三四个镇守使，兵额大增，二也。虽然，犹有进者，湘人自决主义，固不是无抵抗主义，强暴复来，可以任其宰割。强暴复来乎，正式之抵抗，仍不可少也。湘人自决主义者，们罗主义也。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湖南人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仍抵抗

之。正式陆军一师之设,顾到民力,顾到土匪,复顾到至不得已时抵抗强暴,此则第三之理由也。呜乎湖南!鬻熊开国<sup>[1]</sup>,稍启其封。曾、左<sup>[2]</sup>吾之先民,黄、蔡<sup>[3]</sup>邦之模范。一蹶不振,至于桂、粤窥其南,滇、黔窥其西,北洋派窥其北,岳阳沦为北派驻防者六年,长沙则屡践汤、傅、张<sup>[4]</sup>之马蹄。谁实为之,可不哀乎!然湖南人虽死,而未尽死。至于压之既甚之时,起为一瞬不视之举。驱汤芑铭,驱傅良佐,驱张敬尧,消极的破坏冲决之力,仍存在于其本性之中。此后应注意者,则积极的建设之进行,世界大势之观察,民治之敷施,文化之宣传,教育之改造,刻不容缓也。三千万人,则等于明治改革<sup>[5]</sup>时日本之人口也。地理则较之瑞士而强也。多而无当,太而无当,无日本人瑞士人之知识能力与训练,空鼓其勇气,消极的少意识的破坏则能之,瑞士光华之国,日本充实之邦,终未能见于大江流域之湖南也。阁下湖南人,来书所云,对于湘事,同此感怀。同人皆平民,湘事改造,具见所刊宣言及改造条件之中。第一义则自决主义,第二义则民治主义,谭组闾,赵炎午<sup>[6]</sup>诸驱张将士,劳苦功高,乡邦英俊。此后希望其注意者,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之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三千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最重要者,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三千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此同人最大之希望也。来函已付沪报发表。大乱初勘(戡),三千万人,人人要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先生更有赐教,无任欢迎之至。

湖南改造促成会<sup>[7]</sup>

六月二十三日

上海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号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曾毅(1879—1953),原名曾纬,字松乔,别号松父、松翘,湖南汉寿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06年经宋教仁介绍加入同盟会。1913年在汉口主办《民国日报》,不久,该报被查封,曾等被捕入狱。被保释出狱后,1914年再次留学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主办《中华新报》。1919年底,到南京河海工程学院任国文教授,第二年又经广州到了长沙。

[2]南北武人,指北洋军阀和西南各省地方军阀。

[3]陆荣廷,参见本书第20页注[13]。

[4]唐继尧(1883—1927),字贻麋,云南会泽人,曾任贵州、云南都督,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和广州护法军政府元帅(未就)。1920年6月1日通电废督,解除云南督军一职,而以川、滇、黔三省联军总司令名义扩大统治地盘。

[5]段祺瑞,参见本书第24页注[4]。

[6]1917年11月,湘粤桂巡阅使为陆荣廷,以陆为首的桂系军阀当时占有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地盘。

[7]北京政府曾授予湖北督军王占元湘鄂巡阅使职,以图控制湖北、湖南两省。

[8]护国军,指袁世凯筹备复辟帝制时,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于1915年12月25日

在云南所组织的讨袁军队。参见本书第16页注〔5〕。

靖国军,指1917年滇、陕等省组织的军队。是年9月,孙中山等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云南督军唐继尧曾通电赞成护法,但又独树一帜。以维护《临时约法》、“奠国家之基础”为名,将部队编为靖国军,自称滇川黔靖国军总司令。后陕西等省亦相继成立靖国军。1921年唐取消靖国军名义。陕西等省靖国军也先后解散。

征南军,指北京政府冯国璋、段祺瑞于1918年征战南方各省,以实现“武力统一”中国时,所组织的北洋军队。

〔9〕鬻熊开国,湖南省在春秋、战国时为楚国地域,鬻熊为楚之先祖。

〔10〕曾、左,指曾国藩、左宗棠。

曾国藩,参见本书第7页注〔2〕。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清末湘军军阀、洋务派代表人物。1875年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统大军入疆,收得失地,阻遏英、俄侵略有功。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力主出兵抗法。

〔11〕黄、蔡,指黄兴、蔡锷。分别参见本书第21页注〔22〕和第24页注〔14〕。

〔12〕汤、傅、张,指汤芑铭、傅良佐、张敬尧。

汤芑铭,参见本书第19页注〔2〕。

傅良佐(1873—1924),字清节,湖南乾州厅(今吉首)人。曾任直隶蔚榆镇守使、北京政府陆军次长。1917年8月6日被任命为湖南督军,9月9日到任,11月14日夜,在南北军阀混战中逃出长沙。

张敬尧(1881—1933),字勋臣,安徽霍丘人。历任北洋军第七师师长、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等职。1918年4月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20年6月在人民斗争和湘军逼迫下退出湖南。后在吴佩孚、张宗昌、张作霖部下担任司令、军长等职。

〔13〕明治改革,即明治维新,日本近代史上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时值明治天皇在位,故名。

〔14〕谭组阁,即谭延闿,参见本书第25页注〔22〕。

赵炎午,即赵恒惕(1880—1971),字彝五,也作炎午,湖南衡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历任广西常备军协统、广西督练公所会办。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遭袁世凯逮捕,经谭延闿调解获释,返湘后任师长。当时任湘军总司令。

〔15〕本文是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名义写给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瞿毅的一封信。湖南改造促成会是湖南人民驱逐张敬尧、推动湖南制宪和自治的群众组织。1919年末,毛泽东、彭璜等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等地进行活动。1920年初,彭璜等在上海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名义,宣传驱张和湖南自治等问题。不久,毛泽东到上海,与彭璜等人均以该会名义推动湖南自治。1920年7月,谭延闿宣布湖南自治,促成会遂成为推动湖南自治的一个实力团体,直到1923年湖南省制宪自治运动失败。

## 【赏析】

1920年6月,谭延闿率军进驻湖南,张敬尧在内外交困中逃出长沙,并很快全部撤出湖南。毛泽东由此亲身体会到子弹的呼啸声胜过请愿的呼声。湖南问题怎么办?在这个

问题上,毛泽东早已认识到必须根本地解决,然而湖南问题毕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根本解决力量在哪里呢?毛泽东考虑的首先是湘人自觉努力为湖南自治进行不懈的斗争。他在上海接连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等文章,阐明他的主张。毛泽东著文指出,张敬尧走了,但是新的张敬尧还会回来,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出来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使人民处于半死半生的状态。他主张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和八九年来经历的痛苦,废去督军,建设民治。“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毅写信,陈述“湘人自治,废督废兵”等主张。毛泽东阅后,写了这封信。

全信共分两层意思:

首先,从分析湖南的时局出发,论述了“湘人自治”的问题。他认为湘事之所以如此“糟透”,都是因为多数湖南人民不能“自决”,有话不说,有意不伸,才使南北武人乘隙凌侮。由此,毛泽东主张:“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对于民治的内涵,毛泽东指出,要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修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扬湖南人的精神,在湖南领域之内创造一种湖南文明,人人负起创造的责任,使南北武人一律退出湖南境地。这才是湘人的自决主义。

其次,毛泽东论述了自己对“废督废兵”的看法:主张废除一切守备队,镇守使,保存正式有纪律之陆军一师,而不同意曾毅所谓“以警备队维持地方秩序”的意见,并陈述了理由,说服曾毅;同时指出,今后要注意观察世界大势,敷施民治,宣传文化,改造教育,实行“民治主义”。他还希望谭延闿、赵恒惕:第一,遵守自决主义,不引狼入室;第二,遵守民治主义,自以为平民之一。其愿望虽好,但显然是徒劳的。

全信生动体现了毛泽东湖南自治的思想,虽然仍带有改良主义色彩,但反映了人民的利益立场。湖南自治的主张,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政治出路的一种高度自觉的设计,其实质是通过各省自治最终达到全国统一,这在当时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关注。

## “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

——致向警予<sup>[1]</sup>（1920年11月25日）

警予姊：

来信久到，未能即复，幸谅！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弟和荫柏等主张湖南自立为国<sup>[2]</sup>，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者绝少。自治问题发生，空气至为黯淡。自“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说出，声势稍振。而多数人莫名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教育系我职业，顿湘两年，业已（已）决计。惟办事则不能求学，于自身牺牲太大耳。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此颂进步！健豪<sup>[3]</sup>、伯母及咸熙<sup>[4]</sup>姊同此问好。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 向警予（1895—1928），湖南溆浦人。原名俊贤，笔名振宇。土家族。女。早年入周南女校学习，1915年毕业。后任溆浦县立女校校长。1919年参加新民学会。同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在法国同蔡和森结婚。1921年底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长，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并主编《妇女周报》。1924年领导上海丝厂女工和南洋烟厂工人罢工。1925年入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初回国，在武汉总工会宣传部和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工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武汉负责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的工作，并主编《长江》刊物。在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3月28日因叛徒出卖在武汉法租界被捕后，被“引渡”给武汉国民党当局。同年5月1日在汉口余记里空坪刑场被杀害。

[2] 荫柏，即彭璜。当时他与毛泽东等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并组织俄罗斯研究会。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写有《湖南共和国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非中国式非美国式的共和国》，《怎么要立湖南“国”》，《对于湖南建“国”的解评》等文。参见本书第85页注[1]。



〔3〕健康，即葛健康（1865—1943），女，原名兰英，湖南湘乡荷叶（今属双峰县）人。是蔡和森和蔡畅的母亲。49岁时就读于湖南女子教员养成所。后在家乡创办湘乡县立第一女子简易职业学校。1919年随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同赴法国勤工俭学。1924年回国后在长沙湖南平民女子职业学校任校长。

〔4〕戚熙，即蔡畅（1900—1990），女，湖南湘乡永丰镇（今属双峰县）人，蔡和森的妹妹。新民学会会员。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转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中共两广区委妇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事兼妇女运动讲习所教务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湖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7年任中央妇委委员。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部长、妇女部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西省委统战部部长、组织部部长。1941年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45年任中国解放区妇联筹委会主任。1948年被选为国际民主妇联副主席。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建国后，任全国妇联第一、第二、第三届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1975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8年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90年9月11日在北京逝世。

## 【赏析】

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在北京和上海时，即与彭璜等人研究过将来驱逐张敬尧以后，如何促进湖南局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的问題。他与彭璜草拟了一个题为“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的材料，明确提出要废督裁兵，银行民办，增加教育经费、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等意向。张敬尧被赶出长沙后，湘军头目谭延闿、赵恒惕打着“湖南自治”和“湘人自治”的招牌进入长沙。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从9月5日到10月11日一个多月之内，个人或联名连续在长沙、上海等地的报纸上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等十余篇文章，提出了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毛泽东认为，“湖南共和国”的实质，是鼓励湖南人民起来当家作主，不再听任军阀、官僚的摆布。他说：“湖南自治决不是有了少数当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必要办自治，自治便可以实现的”，“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有‘民’来发起的。”这个“民”是指种田的农人，做工的工人，转运贸易的商人，殷勤求学的学生。毛泽东主张湖南自治，正是让湘人当家作主、参政议政、制定法律、执掌政权，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和组织下，以新民学会会员、湖南省学联干部和各界进步人士为核心，以广大学生为基础，联络各界人士，于10月10日组织了湖南自治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毛泽东为湖南自治多方筹划，到处奔走，并向谭延闿递交《请愿书》。事后，谭延闿拒绝《请愿书》，并诬告毛泽东挟持省议会旗子，捣毁省议会。最后，湖南自治运动毫无结果。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痛苦地进行了反省。11月25日，他给向警予写了这封信，总结了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

该信首先为“来信久到，未能即复”而抱歉。1920年9月6日向警予到达法国后，曾给彭璜、毛泽东来过一封信，信中说：“知在国内积极活动，湘事大有可望，行见东方瑞士，

不一二年即将脍炙于吾人之耳鼓。愈之欢跃！”但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的苦闷之中，心情难免沉重。“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训是沉重的，但原因何在呢？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道：“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这里说的是国民的愚弱或麻木不仁，指出了教育特别是思想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进一步分析道：“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至此，毛泽东已深深地体会到：在反动阶级统治之下，企图用和平请愿，议会改良的办法，来达到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手中拥有武装的反动阶级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正如信中所说：“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最后，毛泽东针对“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现状，对向警予提出了“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教一人”的愿望和主张。

此信写得昂扬激奋，入情入理。从信的称呼“警予姊”，最后落款“弟泽东”，及“健豪伯母及威熙姊同此问好”等话，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向警予的真正友谊。信中多用短句，显得激昂慷慨。语言运用典雅端正，凝练概括，语气凝重、郁愤，同时充满了“心忧天下”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建立“湖南共和国”的主张，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中国政治出路的思索，其实质就是最终实现各省人民当家作主和自治，实现全国统一。毛泽东在自治运动结束后，能够及时地省察自己，并总结了运动失败的教训，这对于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

——致欧阳泽<sup>[1]</sup> (1920年11月25日)

玉生兄：

共同的精神四项<sup>[2]</sup>，弟样样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也是极端赞成的。岂但省界，国界也不要限。弟在京所以有那么一说<sup>[3]</sup>，是因为新民学会<sup>[4]</sup>现在尚没有深固的基础，在这个时候，宜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弟意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弟见好些团体，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半淞园会议<sup>[5]</sup>，都主张本会进行应取“潜在的态度”，弟是十二分赞成，兄也是赞成的一个，长沙同人，亦同此意。弟以为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你的信<sup>[6]</sup>我在上海接到，彭，周，劳，魏<sup>[7]</sup>，都转给他们看了。我七月回湘，一向多忙，未能作答，幸谅！你现状谅好，我忘记你在芬丹白露<sup>[8]</sup>，抑在蒙达尔尼<sup>[9]</sup>？来信幸告。近因积倦，游览到萍，旅中作书，言不尽意。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萍乡旅中。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 欧阳泽(1897—1924)，号玉生，湖南益阳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2] 共同的精神四项，指1920年5月22日欧阳泽致毛泽东、彭璜等人信中所说的新民学会会员应注意的四个问题。

[3] 毛泽东于1920年初在北京时曾说新民学会暂不必吸收外省人为会员。

[4] 新民学会，参见本书第46页注[3]。

[5] 1920年5月8日，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

[6] 指1920年5月22日欧阳泽致毛泽东、彭璜等人信。该信提出关于新民学会的共同精神和新会员入会问题。

[7] 彭、周、劳、魏，指彭璜、周敦祥、劳君展、魏璧，他们均为新民学会会员。

[8]芬丹白露,今译枫丹白露,法国北部塞纳——马恩省城镇,在巴黎东南65公里,位于塞纳河左岸约3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中。

[9]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在法国,离巴黎约100公里。

## 【赏析】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在上海半淞园为赴法会员召开送别会。毛泽东主持了这个会议,会议讨论了很长时间。心亲天下的新民学会同仁,已把欢送会开成了讨论会。会议就学会的任务、活动的方法、会员条件和入会手续等都作了详尽的讨论。鉴于当时国内有些进步团体作风飘浮、组织涣散、成员思想不一致及缺乏共同奋斗目标等现状,会议特决定学会的态度应当是“潜在切实,不务虚名,不出风头”,“遇见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关于入会的条件和手续,也作了正式规定,会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①纯洁;②诚恳;③奋斗;④服从真理。会员入会须有五人介绍,评议部通过。这次会议,对新民学会发展成为一个思想一致、组织严密的战斗团体具有重要意义。6月22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欧阳泽,致信毛泽东、彭璜等人,提出了关于新民学会的共同精神和新会员入会问题。当时,由于毛泽东领导驱张运动,未能及时作复。11月25日,毛泽东给欧阳泽回了这封信。

全信紧紧围绕欧阳泽的来信,一一作答,并重点强调了新民学会应采取潜在的态度。欧阳泽在来信中提出了新民学会会员应注意的四个问题:“一、对于本会要尽心尽力栽培他,灌溉他,爱惜他,务使他无量的发展。却不要一心一意的专事服从他,倚靠他,更不要扶甚么野心来利用他,把他当个偶像和傀儡玩。二、本会对于个人,和个人对于本会,须都要负完全的责任。本会的失败,即是个人的失败;个人的失败,也就是本会的失败。三、会员对于本会,在学术上有互助的责任,在行为上有互相劝勉的责任。四、会员对于会员,须要有理性的爱,感性的爱是靠不住的。感性的爱是暂时的,部分的。理性的爱,方是普遍的,永久的,方能维持一个团体,不至于忽而涣散。”这四条都是利于新民学会健康发展的合理化建议,毛泽东“样样赞成”,并赞成“会员加入不限省界”的观点。由于1920年初,毛泽东曾说过会员暂不必吸收外省人的话,所以,在此信中,毛泽东耐心地解释道,这是因为新民学会现在还没有深固的基础。通过驱张运动,毛泽东很好地总结了失败的教训,更加感到信守共同主义的必要性。在信中,他指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想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放全人类各种问题,就必须“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他还把不注重基础的团体比作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毛泽东把这种不顾基础的做法视为虚骄浮躁的做法。为此,他重提上海半淞园会议的精神,重提学会应采取“潜在的态度”,并把这种态度视为新民学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

五四时期一些追逐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一些新名词,生存活别,虚妄骄浮。毛泽东的这封信虽然只是从正面讲了学会应采取的正确态度,但也在无形中抵制了虚妄骄浮风气的侵蚀,对于新民学会的不断发展壮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主义譬如一面旗子”

——致罗章龙<sup>[1]</sup> (1920年11月25日)

章龙兄：

昨信谅到。重翻你七月二十五日的信<sup>[2]</sup>，我昨信竟没有一句复答你信内的话，真对不住。今再奉复大意如下。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有两个意思：一是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sup>[3]</sup>（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织（组）织上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一是湖南的地理民性，均极有为，杂在全国的总组织中，既消磨特长，复阻碍进步。独立自主，可以定出一种较进步的办法（湖南宪法），内之自庄严璀璨其河山，外之与世界有觉悟的民族直接携手，共为世界的大改造。全国各省也可因此而激厉进化。所以弟直主张湖南应自立为国，湖南完全自治，丝毫不受外力干涉，不要（要）再为不中用的“中国”所累。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此意前函<sup>[4]</sup>未尽，今再补陈于此。

兄所谓善良的有势力的土气，确是要紧。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置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兄以为何如？

“会务报告”<sup>[5]</sup>专纪会务，不载论述文字，尚未着手编辑，大略每季一册尽够了。此外会友通信，发刊通信专集<sup>[6]</sup>，为会友相互辩论商讨的场所，兄处有与会友间往还信稿，不论新旧，请检出寄弟。

“湘江”<sup>[7]</sup>尚未出版，固因事忙，亦怕出而不好，到底出否，尚待斟酌。

弟本期在城南附小<sup>[8]</sup>办一点事，杂以他务，自修时间狠少，读“岁月易逝无法挽回”，“思想学术节节僵化”<sup>[9]</sup>诸语，使我不寒而栗。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求学程序预计，略有一点，迟后当可奉告。

讲到湖南教育，真是欲哭无泪。我于湖南教育只有两个希望：一个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一个是希望学生自决，我唯一的希望在此。怪不得人家说“湖南学生的思想幼稚”（沈仲九<sup>[10]</sup>的话），从来没有人供给过他们以思想，也没有自决的想将自己的思想开发过，思想怎么会不幼稚呢？望时赐信为感！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罗章龙,1896年生,湖南浏阳人。新民学会会员。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1931年因另立中央,被开除出党。历任河南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湖南大学等校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等。

[2]1920年7月25日罗章龙致毛泽东信提出关于“湖南建国”及对新民学会的意见。

[3]康梁维新,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1898年变法维新运动。孙黄革命,指孙中山、黄兴领导的1911年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

[4]前函,指1920年6月30日毛泽东致罗章龙的信。

[5]会务报告,指《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由毛泽东编辑。

[6]通信专集,指《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

[7]“湘江”,指当时计划复刊的《湘江评论》。参见本书第32页注[6]。

[8]城南附小,指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当时毛泽东在该校任主事,并兼任师范部国文教员,同时在附小举办平民夜校。

[9]1920年7月25日罗章龙致毛泽东的信中有“樗栎急节,岁月易逝,无法可以挽回。况思想学术,节节僵化,更不可不注意”句。

[10]沈仲九,当时是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

## 【赏析】

1920年,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中国迅速扩大,毛泽东受到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冲撞的同时,也在实际斗争中寻求着湖南的出路,组织发动了湖南自治运动,但终因反动阶级的阴谋与拥兵霸道而失败。毛泽东从中深切地感到:政治改良,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从而更加感到“主义”的必要,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解,决心另辟道路,另造环境。而要开辟这种新路,毛泽东认为,首要的是同志中要有一种“主义”的结合。他在给欧阳泽的信中,提出必须“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1920年11月25日,通过对实践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毛泽东实现了思想上的新的飞跃,他把心中的想法写在信中,寄给了罗章龙。

全信共分三层意思:

第一,分析了湖南自治的问题。这时的毛泽东“不反对零碎解决”问题,也“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而是主张从各省小组织入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首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由此可见,毛泽东所主张的湖南自治,实则是着眼于全国的主张,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决不是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

第二,“主义的结合”问题。要改造中国,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这里的“主义”指的是信仰、理想,“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所以,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他还生动地举例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第三,学生的自决问题。这是对湖南教育的反思和批判。对于湖南教育,毛泽东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是希望至今还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亡,这个希望是做不到的。第二个希望就是希望学生自决。这是使学生思想脱去幼稚的根本出路。

全篇书信,渗透着毛泽东对真理的执著追求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面对五四以后汹涌澎湃的社会思潮,他终于在残酷的斗争风雨中接过了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炬。此信语言运用浅显生动,举例恰如其分,用喻形象主动,读来通俗易懂,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感召力。



## “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

——致张国基<sup>[1]</sup>（1920年11月25日）

颐生兄：

两信<sup>[2]</sup>先后奉悉，久未作复，甚歉！所言会务六项<sup>[3]</sup>，弟大体均赞成。第一项发行会报，现已（已）决发刊会员通信集和会务报告两种。第二项会友加入宜郑重。第三项会友加入不要有男女老幼等区别。弟忆夏间在上海与姚甫、赞周、子降、荫柏、望成、韞庵、敦祥、冀儒、玉生等在半淞园会商<sup>[4]</sup>，及回长沙再和长沙会友商酌，多主会友加入，要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向上，并须有五人介绍，经评议部通过，然后再郑重通告全体会员，正与你的主张相合。（南洋方面同志，当然应该连络）。第四项，会所的确定，也是要事，不久总要在长沙觅到一个相当的会所。书报的设置与会友研究有关，长沙巴黎南洋应“分别”设备，其经费可由各地会员“分”任。第五项，经费的筹措，我意只要会员常年费交齐，普通用费已（已）够。此外只有印通信集和会务报告须款，但也不多，可由会员临时分任。会友录即印在会务报告之内，本年总可以印出一本。南洋通信社组织极要。惟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学李石曾<sup>[5]</sup>先生等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苟是世界主义，无地不可自容，李石曾等便是一个例。苟是殖民政策，则无地可以自容，日本人便是一个例。南洋文化闭塞，湘人往南洋者，宜以发达文化为己任。兄等苟能在南洋为新文化运动，使国内发生的新文化，汇往南洋，南洋人（不必单言华侨）将受赐不浅。又南洋建国运动，亟须发起，苟有志士从事于此种运动，拯数千万无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为大业，何以加兹。弟意我们会员宜有多人往南〔洋〕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俟有成效，即进而联络华侨士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世界大同，必以各地民族自决为基，南洋民族而能自决，即是促进大同的一个条件。有暇望时通信。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 张国基，1893年生，又名颐生，湖南益阳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1927年南昌起义时任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尔后长期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华侨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侨联常委、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全国侨联主席等职务。

[2]指张国基1920年5月23日关于新民学会会务及9月19日关于南洋通信社组织给毛泽东的两封信。

[3]指1920年5月23日张国基给毛泽东的信中所说的对新民学会的六点意见。

(4)焜甫,即熊光楚,参见本书第13页注[2]。子暉,即萧三,参见本书第255页注[1]。荫柏,即彭璜,参见本书第151页注[1]。

望成,即刘明伊(1899—1977),又名若云,湖南安化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的同学。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曾任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

毓庵,即魏璧,参见本书第46页注[5]。敦祥,即周敦祥,参见本书第46页注[5]。冀儒,即劳君展,参见本书第46页注[5]。玉生,即欧阳泽,参见本书第64页注[1]。

[5]李石曾,即李煜瀛,河北高阳人。清末留学法国,在巴黎加入同盟会。后与蔡元培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联络部分法国人士成立华法教育会,任书记,倡导留法勤工俭学。北伐战争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后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1956年定居台北,后病死。

## 【赏析】

为了使新民学会的会员积极向外发展,毛泽东把长沙当作学会的重要阵地,主张采取大规模自由研究的方法,有计划地派人去世界各地尽快吸取新的思想学说。由于毛泽东的积极倡导和组织,先后有会员到上海、南京、汉口就读,有的会员到了日本留学。张国基等七八个会员到了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教书。1920年5月23日,张国基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自己对新民学会的六条意见:一是学会内发行一种书报,以交流学术研究成果;二是吸收新会友,须有四个以上会友介绍,并经委员长和评议部同意;三是学会要真正解放,打破界限,新会友不分年龄、性别、籍贯、学历,但他的思想必须与学会宗旨相合;四是学会应有会所,并多买书报杂志供会友阅览;五是通过常年捐与特别捐的形式,多方为学会筹措经费;六是编印会友录,以便常通声气。9月19日,张国基就组织南洋通讯社问题再次致信毛泽东。11月25日,毛泽东一并回复,写了这封信。

信中首先为自己收信后久未作复致歉。然后,对来信中所说的意见表示赞成,就发行会报、会友加入、确定会所、筹措经费、会友通信等问题一一作了答复,交换了看法。可以说,张国基的意见与新民学会半淞园会议的决议大体上是吻合的。最后,毛泽东建议张国基学习李石曾先生介绍学生往法国的用意,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用通俗的话叙述道:“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而殖民政策,则是损人利己的政策。对于如何采取世界主义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去南洋的湘人,应该“以发达文化为己任”,把国内新文化运动中发生的新文化传至南洋,多做教育运动和文化运动,联络华侨土著各地各界,鼓吹建国,拯救千万南洋人民出水火,实现南洋民族的彻底自决。

这封书信反映了毛泽东和他的会友们在五四运动后,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毅然决定在夜色如磐,魔怪蹁跹的旧世界中开辟一条光明大道的大无畏气概和坚定执著的信念。正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民学会会员的影响下,会员们虽天各一方,但仍能交流经验,增进了解,互通信息,寻求着如何才能彻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信中所述的“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的主张,标志着毛泽东正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 “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

——致罗学瓚<sup>[1]</sup> (1920年11月26日)

荣熙兄：

兄七月十四日的信，所论各节，透澈之至。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你谓中国读书人，以身殉学，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这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诚哉不错。尚有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如读书成了习惯，便一直读下去不知休息。照卫生的法则，用脑一点钟，应休息十五分钟，弟则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我看中国下力人身体并不弱，身体弱就只有读书人。要矫正这弊病，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至少也要养成读书和游戏并行的习惯。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之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势（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现在我决定在城市住两个月，必要到乡村住一个星期，这次便是因休息到萍乡，以后拟每两个月要出游一次。

四种迷<sup>[2]</sup>，说得最透澈，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人每人给一张就好。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sup>[3]</sup>，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我于后三者，于说话高兴时或激烈时也常时错误，不过自己却知道是错误，所谓明知故犯罢了（作文时也有）。

“工学励志会”，听说改成了“工学世界社”<sup>[4]</sup>，详情我不知，请你将组织，进行，事务等，告我一信，通信尚未到。交换报一节弟可办到。请陆续将稿寄来（寄长沙文化书社<sup>[5]</sup>交弟）。

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我想现在反对婚姻制度已（已）经有好多人说了，就只没有人实行。所以不实行，就只是“怕”。我听得“向蔡”<sup>[6]</sup>同盟的事，为之一喜，向蔡已（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我想我们正好奉向蔡做首领，组成一个“拒婚同盟”。已（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我反对人道主义）。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

同盟组成了，同盟的各员立刻组成同盟军。开初只取消极的态度，对外“防御”反对我们的敌人，对内好生整理内部的秩序，务使同盟内的各员，都践实“废婚姻”这条盟约。稍

后,就可取积极的态度,开始向世界“宣传”,开始“攻击”反对我们的敌人,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都纳入同盟做同盟的一员。我这些话好像是笑话,实则兄所痛憾的那些“家庭之苦”,非用这种好笑的办法,无可避免。假如没有人赞成我的办法,我“一个人的同盟”是已经结起了的。我觉得凡在婚姻制度底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我是早已〈已〉宣言不愿加入这个强奸团的。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请你将反对的意见写出。此祝进步。

弟 泽东。

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刊印

## 【注释】

[1]罗学瓚(1893—1930),号荣熙。湖南湘潭人。1912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7年10月,参加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2月,参加组织400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向中国驻法公使进行请愿示威斗争,被法国政府驱逐回国。11月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秋,回到长沙,从事工人运动,组成人力车工会。1923年4月,组织人力车工人大规模的请愿示威游行。后任中共湖南区委宣传部长,举办农民干部训练班。秋收起义前,被调到长沙,以湖南省委委员兼湘潭工作委员会书记的身份建立工农武装,进行武装斗争。1928年5月,任浙江省委书记。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1930年夏,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2]怀中,即杨昌济。参见本书第40页注[6]。

[3]四种迷,指罗学瓚1920年7月14日致毛泽东信中所说的四种错误:第一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这叫做“感情迷”;第二是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这叫做“部分迷”;第三是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结局,这叫做“一时迷”;第四是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这叫做“主观迷”,也可说是“信仰迷”。

[4]罗学瓚在1920年7月14日的信中说:“我近与各处友人交接,常觉得中国人求学的头脑,太不明了。第一宗错误,是感情用事。无论处事接物,都拿感情的好恶,来断定事物之是非。譬如有人崇拜日本德国军国主义的,就说法国人爱和平不振作为不正当。又如见中国的小事小物或有一点比外国略好,就说中国人胜于外国。又譬如勤工俭学同志,自己想做的工不能找得,遂说勤工俭学不行。”

[5]工学世界社,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体。1920年2月,李富春、李维汉等在法国巴黎发起组织勤工俭学励进会,其成员大部分为湖南旅法的新民学会会员。8月,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停止活动。

[6]文化书社,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易礼容等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而发起组织的一个书报杂志的发售机关。1920年8月2日,发起人假楚怡学校开成立大会,推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为筹备员,易礼容为经理。文化书社成立后,先后在平江、浏阳、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等地建立分社,经营销售《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青年》等重要书刊百余

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文化书社也是共产党的秘密联络机关。1927年5月21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封闭文化书社。

[7]向慕,向指向警予,蔡指蔡和森。分别参见本书第61页注[1]和第77页注[1]。

## 【赏析】

由于受新文化运动和杨昌济先生的影响,毛泽东在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学会的革命性和先进性。在毛泽东等勤奋努力和认真组织下,新民学会从一个追求进步的团体发展为革命团体。1920年5月,新民学会在上海半淞园召开会议,强调学会要有“潜在切实,不务虚名,不出风头”的态度。会员之间的态度应该是: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等。新民学会从此更加健康地发展。会友之间互通信息,交流心得,展开议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十分活跃。

1920年7月14日,罗学瓚给毛泽东写信,就“身体问题”、“四种谜”、“工学励进会与通信社”、“婚姻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收到信后,写了这封信。

此信针对罗学瓚信中提出的问题的,首先指出:“身体诚哉是一个大问题。”为了论述这个问题。毛泽东分别从客观上、主观上分析了原因:在客观上,主要是由于家庭、社会和学校的环境太坏造成的;在主观上,就是心理上的惰性。在分析主客观原因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矫正这种弊病的办法:一是在社会方面,须设法造成好的环境;二是在个人方面,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其次,毛泽东针对罗信中的“感情谜”、“部分谜”、“一时谜”和“主观谜”指出,“四种谜,说得最透澈”,并主张“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不能“以部分概全体”,不能“以一时概永久”。第三,就罗信中提出的“婚姻问题”,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婚姻制度的实质,“在理论上,是以法律保获(护)最不合理的强奸,而禁止最合理的自由恋爱”;在事实上,“天下无数男女的怨声,乃均发现于这种婚姻制度的下面。”毛泽东早在1919年11月就赵五贞因不满于封建礼教和婚姻而自杀一事,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向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展开猛烈的批判。提倡妇女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之一。毛泽东把婚姻制度变革和整个社会制度变革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从根本上使社会制度得到根本改变,才能使婚姻得到彻底改变。在这封复信中,毛泽东对“向蔡同盟”的事极其赞赏。他称赞向警予与蔡和森已经打破了“怕”,实行不要婚姻,并主张已有婚约的,解除婚约,没有婚约的,实行不要婚约,组成“拒婚同盟”,务使全人类对于婚姻制度都得解放。

毛泽东是提倡婚姻自由的。早在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中,关于“女子问题”就列了17项,其中除了女子参政、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女子交际等问题外,还有恋爱自由及恋爱神圣问题、废娼问题、堕妻问题及放足问题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毛泽东对恋爱自由、婚姻平等、妇女解放的深刻思考。

此篇书信集深刻的理论与深远的历史因果于平实无华的叙述之中。结构严整,轻重缓急相应相问,举例论证,说服力强,把读者最关心的问题放到时代大背景下去论述,顺理成章,入情入理,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

——致蔡和森<sup>[1]</sup> (1920年12月1日)

和森兄子昇<sup>[2]</sup>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接到二兄各函，欣慰无量！学会<sup>[3]</sup>有具体的计划，算从蒙达尔尼会议<sup>[4]</sup>及二兄这几封信始。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今得二兄各信，我的计划书可以不作了。我只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会友，对于二兄信上的计划，人人下一个详密的考虑，随而下一个深切的批评，以决定或赞成，或反对，或于二兄信上所有计划和意见之外，再有别的计划和意见。我常觉得我们个人的发展或学会的发展，总要有一条明确的路数。没有一条明确的路数，各个人只是盲进，学会也只是盲进，结果糟踏了各人自己之外，又糟踏了这个有希望的学会，岂不可惜？原来我们在没有这个学会之先，也就有一些计划，这个学会之所以成立，就是两年前一些人互相讨论研究的结果。学会建立以后，顿成功了一种共同的意识，于个人思想的改造，生活的向上，很有影响。同时于共同生活，共同进取，也颇有研究。但因为没提出具体方案，又没有出版物可作公共讨论的机关，并且两年来会友分赴各方，在长沙的会员又因为政治上的障碍不能聚会讨论，所以虽然有些计划和意见，依然只藏之于各人的心里，或几人相会出之于各人的口里，或彼此通函见之于各人的信里，总之只存于一部分的会友间而已。现在诸君既有蒙达尔尼的大集会，商决了一个共同的主张，二兄又本乎自己的理想和观察，发表了个人的意见，我们不在法国的会员，对于诸君所提出当然要有一种研究、批评和决定。除开在长沙方面会员即将开会为共同的研究、批评和决定外，先述我个人对于二兄来信的意见如左<sup>[5]</sup>。

现在分条说来。

(一)学会方针问题。我们学会到底拿一种什么方针做我们共同的目标呢？子昇信里述蒙达尔尼会议对于学会进行之方针，说：“大家决定会务进行之方针在改造中国与世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以我的接洽和观察，我们多数的会友，都倾向于世界主义。试看多数人鄙弃爱国，多数人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而忘却人类全体的幸福的事；多数人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更繁复地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就可以知道了。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都是不应该带有爱国的色彩的。和森在八月十三日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家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除无产阶级专政一点置于下条讨论外，国际色彩一点，现在



确有将它郑重标揭出来的必要。虽然我们生在中国地方的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这是一层。做事又并不限定在中国,我以为固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如帮助俄国完成它的社会革命;帮助朝鲜独立;帮助南洋独立;帮助蒙古、新疆、西藏、青海自治自决,都是很要紧的。以下说方法问题。

(二)方法问题。目的——改造中国与世界——定好了,接着发生的是方法问题,我们到底用什么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呢?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阶级专政”。和森又曰:“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sup>[5]</sup>,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为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蒲鲁东<sup>[7]</sup>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sup>[8]</sup>兄来信,主张与子昇相同,李说:“社会改造,我不赞成独统的改造,用分工协助的方法,从社会内面改造出来,我觉得很好。一个社会的病,自有它的特别的背景,一剂单方可医天下人的病,我很怀疑。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我对子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罗素<sup>[9]</sup>在长沙演说,意与子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但我于罗素讲演后,曾和荫柏、礼容<sup>[10]</sup>等有极详之辩论,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以资本主义教儿童,这些儿童大了又转而用资本主义教第二代的儿童。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地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地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安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以上是第一层理由。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为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



要物不倾向上,依力学原理,要有与它相等的一力去抵抗它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它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它,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虽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sup>[11]</sup>,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哪有回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有拿破仑第一<sup>[12]</sup>称帝失败了,又有拿破仑第三<sup>[13]</sup>称帝。有袁世凯<sup>[14]</sup>失败了,偏又有段祺瑞<sup>[15]</sup>。章太炎<sup>[16]</sup>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等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要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止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因此我觉得俄国的革命,和各国急进派共产党人数日见其多,组织日见其密,只是自然的结果。以上是第三层理由。再有一层,是我对于无政府主义的怀疑。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其局。因为这种社会状态是定要造成人类死亡率减少而生率加多的,其结局必至于人满为患。如果不能做到(一)不吃饭,(二)不穿衣,(三)不住屋,(四)地球上各处气候寒暖和土地肥育均一,或是(五)更发明无量可以住人的新地,是终于免不掉人满为患一个难关的。因上各层理由,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漠克拉西<sup>[17]</sup>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三)态度问题。分学会的态度与会友的态度两种。学会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潜在”,这在上海半淞园曾经讨论过<sup>[18]</sup>,今又为在法会友所赞成,总要算可以确定了。第二是“不倚赖旧势力”,我们这学会是新的,是创造的,决不宜许旧势力混入,这一点要请大家注意。至于会友相互及会友个人的态度,我以为第一是“互助互勉”(互助如急难上的互助,学问上的互助,事业上的互助。互勉如积极的勉为善,消极的勉去恶),第二是诚恳(不滑),第三是光明(人格的光明),第四是向上(能变化气质,有向上心)。第一是“相互间”应该具有的。第二第三第四是“个人”应该具有的。以上学会的态度二项,会友的态度四项,是会及会友精神所寄,非常重要。

(四)求学问题。极端赞成诸君共同研究及分门研究之两法。诸君感于散处不便,谋

合居一处,一面作工,一面有集会机缘,时常可以开共同的研究会,极善。长沙方面会友本在一处,诸君办法此间必要仿行。至分门研究之法,以主义为纲,以书报为目,分别阅读,互相交换,办法最好没有。我意凡有会员两人之处,即应照此组织。子昇举力学之必要,谓我们常识尚不充足,我们同志中尚无专门研究学术者,中国现在尚无可数的学者,诚哉不错!思想进步是生活及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唯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弟为荒学,甚为不安,以后必要照诸君的办法,发奋求学。

(五)会务进行问题。此节子昇及和森意见最多。子昇之“学会我见”十八项,弟皆赞成。其中“根本计划”之“确定会务进行方针”,“准备人才”,“准备经济”三条尤有卓见。以在民国二十五年前为纯粹预备时期,我以为尚要延长五年,以至民国三十年为纯粹预备时期。子昇所列长沙方面诸条,以“综掣会务大纲,稳立基础”,“筹办小学”,“物色基本会员”三项为最要紧,此外尚应加入“创立有价值之新事业数种”一项。子昇所列之海外部,以法国、俄国、南洋三方面为最要。弟意学会的运动,暂时可统括为四:1.湖南运动,2.南洋运动,3.留法运动,4.留俄运动。暂时不必务广,以发展此四种而使之确见成效为鹄,较为明切有着,诸君以何如?至和森要我进行之“小学教育”、“劳动教育”、“合作运动”、“小册子”、“亲属聚居”、“帮助各团体”诸端,我都愿意进行。惟“贴邮花”一项,我不懂意,请再指示。现在文化书社<sup>[1]</sup>成立,基础可望稳固,营业亦可望发展。现有每县设一分社的计划,拟两年内办成,果办成,效自不小。

(六)同志联络问题。这项极为紧要,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此节和森信中详言,子昇亦有提及,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我的意见大略说完了。闻子昇已回国到北京,不久可以面谈。请在法诸友再将我的意见加以批评,以期求得一个共同的决定,个人幸甚,学会幸甚。

弟 泽东

九年十二月一日,文化书社,夜十二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蔡和森(1895—1931),湖南湘乡永丰(今属双峰)人。原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唐,学名彬。早年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and 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同毛泽东等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曾与毛泽东、陈独秀通信,商讨组织中国共产党等问题。1921年冬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同年底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主编。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10月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7年3月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8年6月去苏联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0年回国参加中共中央领导工作。1931年任中共中央代表,主持广东省委工作。同年6月10日因叛徒出卖,被港英当局逮捕,引渡到广州,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

[2]子昇,即萧子升,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参见本书第10页注[1]。

[3]学会,指新民学会。参见本书第46页注[3]。

[4]蒙达尔尼会议,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1920年7月在法国蒙达尔尼(今译蒙塔尔纪)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

[5]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左”即“如下”。

[6]迪克推多,是英文“dictatorship”一词的音译。意为专政、独裁。

[7]蒲鲁东(1809—1865),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

[8]李和笙,即李维汉(1896—1984),湖南长沙人,又名罗迈。1918年参加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和湖南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主持八七会议,并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兼上海市委组织部、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赴苏联学习。1933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陕北公学校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1946年参加中共驻重庆、南京代表团,协助周恩来工作。后任中共中央城工部副部长和部长、中央统战部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政务院秘书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务院第八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常委、副主任,1984年8月11日在北京病逝。本信中提到的李和笙关于“俄国式的革命,我根本上有未敢赞同之处”的意见,是他留法期间在探索革命道路过程中一度所持的看法,不久就改变了。

[9]罗素,参见本书第55页注[4]。

[10]荫柏,即彭璜,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湖南俄罗斯研究会会计干事。参见本书第85页注[1]。

礼容,即易礼容,新民学会会员。当时是长沙文化书社经理。参见本书第85页注[2]。

[11]参见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第十八。原文为:“与学者语,正如扶醉人,东边扶起却倒向西边,西边扶起却倒向东边,终不能得佗卓立中途。”后被朱熹收入《近思录·为学》,作“与贤说话,却似扶醉汉,救得一边,倒了一边,只怕人执著一边”。

[12]拿破仑第一,即拿破仑·波拿巴(1769—1821),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百日王朝皇帝。

[13]拿破仑第三,即路易·波拿巴(1808—1873),拿破仑一世之侄,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

[14]袁世凯,参见本书第11页注[6]。

[15]段祺瑞,参见本书第24页注[4]。

[16]章太炎,即章炳麟,参见本书第29页注[2]。

[17]德谟克拉西,是英文“democracy”一词的音译。意为民主,民主主义。

[18]1920年5月,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会议,送别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友。会议提出新民学会应取“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的态度。

[19]文化书社,参见本书第72页注[6]。

## 【赏析】

1920年7月,新民学会留法的13位会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在法国的蒙达尔尼举行了为期五天的会议,鲜明地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但是对于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较大。蔡和森等人主张强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以萧子升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则主张温和的革命,既无政府主义的蒲鲁东的方法,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8月间,蔡、萧二人分别致函毛泽东,一方面告知在法会员的决定,另一方面陈述自己的观点,请毛泽东发表意见。毛泽东认为学会不能只是人的聚集,感情的聚集,而应是主义的结合,必须用以马克思主义为共同信条的指导思想来统一会员的思想和行动。对于大浪淘沙中出现的思想分化,毛泽东总是及时正确地阐明自己的主张。读罢来信,毛泽东感到“欣慰无量”,同时,为解除在法会员内部的意见分歧,12月1日,毛泽东在文化书社给蔡和森、萧子升及留法全体会员写了这封信,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全信从六个方面详细探讨了学会的宗旨及具体计划。一是学会的方针问题,经过了“五四”运动和驱张运动的毛泽东,深深地体会到:中国黑幕层张,贪官麇集,政治腐败,政权操纵在少数人之手,对于旧社会,只能“根本解决”。没有政权,便不能发动革命,保护革命,完成革命。所以,他同意留法会友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学会方针。他在信中写道:“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他在信中表明:他深切赞同走俄国人的道路,组织共产党。1921年1月,在长沙召开的新民学会年会上,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改良是补缀的办法,应主张大规模地改造。”对于改造中国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做事便利起见,又因为中国比较世界各地为更幼稚更腐败应先从此着手改造起见,当然应在中国这一块地方做事,但是感情总要是普遍的,不要只爱这一块地方而不爱别的地方,因为“凡是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所以,应该有人在中国做事,更应该有人在世界做事。后来,他解释说:“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这蕴含着毛泽东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萌芽。二是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信中着重论述了“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且篇幅近一半,可见毛泽东对此问题理解之深刻,观点之明确,态度之坚定。信中首先用劝解的口吻剖析了萧子升等人的“温和革命”、“平和手段”和“用教育的方法”等观点,并认为这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的,因为“用教育的方法”

是有现实条件的——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而这一切均被资本家把持。况且，教育之力难以改变资本主义者的心理天性，无法动摇其阶级本质，用教育去达到无产阶级的共产要求，遥远无期。所以，“教育”是行不通的，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必须建立共产党。正如他在信中所说：“我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此后不久，毛泽东在与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讨论时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从“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新民学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毛泽东同志从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彻底转变。三是态度问题。此信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立大志兼济天下，学以致用，不务虚荣，不出“风头”和蔑视权贵、最信主义的革命精神，以及提倡会员间互助互勉，诚恳不滑，光明磊落的态度。四是求学问题。毛泽东提出思想进步是生活事业进步之基，使思想进步的惟一方法，是研究学术，发奋求学，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正确的理想是事业发展的动力，而正确理想的确立则来源于正确的、发展的理论指导，并要求以后发奋求学。最后，他还谈到了会务问题和同志联络问题，并认为同志联络问题极为紧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很注意结交志同道合之友。他认识到，要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有一大批志同道合、坚定不移的人，组织联军共同与敌人作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士、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助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因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

此信在艺术上有其独到之处。一是主题鲜明，凝炼集中。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信念坚定，胸怀远大，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矢志不移。此信正集中反映了他的理想与追求。对于子昇、和笙观点的反对，正是源于对蔡和森主张的赞同。二是语言通俗，蕴含丰富。毛泽东把对同志的爱护和对真理的忠贞，行云流水般地展现在字里行间，使得条理明晰，层次分明，说理透彻，措词中蕴含着深邃的思想。三是感情真挚，以理服人。信中告诫性的语言不多，更多的是商量式的口吻，而且多次使用问句，不断地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从而把读者引入深邃的思想境界之中，宛如促膝交谈，使人感觉非常亲切。四是层次分明，不枝不蔓，既有综论，又有分论，层层辨析，引人入胜。

##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

——致蔡和森<sup>[1]</sup> (1921年1月21日)

和森兄：

来信<sup>[2]</sup>于年底始由于升<sup>[3]</sup>转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sup>[4]</sup>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sup>[5]</sup>，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为）。详情后报。

弟 泽东

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城南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蔡和森，参见本书第77页注[1]。

[2] 指蔡和森托萧子升从法国带回的1920年9月15日给毛泽东的信，信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组织共产党等问题的意见。

[3] 子升，即萧子升，参见本书第10页注[1]。

[4] 陈仲甫，即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今安庆）人。原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早年曾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1901年后两次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03年回国。1904年创办《安徽俗话报》，并组织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6年又赴日本留学。1907年回国后，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教。辛亥革命后，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后长期主编《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达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参加领导五四运动。1920年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和筹备成立中国共产党，并指导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又当选为中共第二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和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后期,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右倾、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大革命遭到失败。1927年在中共八七会议后,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后因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多次拒绝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分配的工作,隐居上海,从事文字学研究。1929年因反对共产国际,主张取消主义和组织小集团,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同年与彭述之等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后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1942年5月27日因心脏病在四川江津逝世。主要著作编为《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5]《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920年11月创办的刊物。

## 【赏析】

自1920年起,为了向外发展,更加直接地了解研究俄国十月革命及世界革命运动,学习先进思想,毛泽东和他的朋友蔡和森等人,利用新民学会,大力倡导“勤以做工,俭以求学”的主张,发动了勤工俭学运动。为使更多的湖南青年寻找到救国救民的真理,学到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毛泽东于1918年8月来到了全国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杨昌济先生的帮助下,毛泽东得以到北大图书馆工作,这一工作不仅使他开阔了视野,遍访了知名人士,增多了知识,增长了才干,而且结识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李大钊和陈独秀。在李大钊和陈独秀进步思想影响下,他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之旗,投身于政治运动的大涛大浪中,逐步抛弃了旧的孔孟学说和个人英雄主义。1920年5月,毛泽东来到上海,在陈独秀的帮助下,进一步理解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观点,确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伟大目标。此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依旧与毛泽东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主张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作为新民学会的宗旨,毛泽东以此表示“深切的赞同”,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对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此信于同年底由萧子升转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阅后,写了这封复信。

蔡和森在来信中称: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特别强调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认为“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就不可能得到经济的解决”。针对这些,毛泽东回复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象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动摇”。这就把“唯物观”与“唯理观”严格区分开来。接着,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工团主义的不可靠性,而极赞成蔡和森“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的主张。“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不能不使毛泽东等救国救民的有志之士欢欣鼓舞,恰此时蔡和森的信从欧洲漂洋过海而来,其真知灼见深深地触动着毛泽东,真是英雄所见,志同道合。所以,在信中,毛泽东称赞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这些在建党问题上逐步一致的意见,是毛泽东与蔡和森多次讨论交换意见的结果。毛泽东同意蔡和森关于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的观点,进一步指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战斗组织。对于党组织的建设,毛泽东同意蔡和森关于党的纪律为铁的纪律的观点,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更多的有觉悟有组织的先进分子,以适应改



造中国与世界的使命,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

蔡和森在来信中再次向毛泽东提出组建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指出在民众运动落后的中国,非组织与俄(国)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正是在蔡和森写信的前一个月,陈独秀在上海积极进行建党活动,发起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所以,毛泽东回复道:“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就在毛泽东得信的前两个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李达任主编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秘密出版发行。陈独秀为创刊号写了《短言》,指出“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我们不可听议会派的欺骗,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中抢夺来政权,并且用劳动政权底制度,拥护劳动派政权,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乃至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对《共产党》创刊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理论上为建党积极做准备工作。而且亲自深入工人阶级中去,为工人办夜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争取工人中的骨干分子,领导和组织工人罢工,培养干部。为建党做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干部准备工作。几个月以后,各地共产党组织的代表在上海举行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全信主题鲜明,立场坚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态度以及对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

## “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

——致彭璜<sup>[1]</sup>（1921年1月28日）

荫柏兄：

示奉悉，出入证收到，感甚！日前论及待人态度，意犹未尽。弟为不愿与恶人共事之人，谅兄所深知，但疾恶如仇，弟亦不为。恶人自己不认为恶，一也；吾人恶之，未必无蔽，二也；恶在究竟，仍不为恶，三也；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四也。第三第四两点，兄亦时作此言。第一点属客观，第二点属主观，为观人所不可忽。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今欲悔而返乎两年半以前，有此志，病未能也。于吾兄久欲陈其拙愚，而未得机会，今愿一言，倘获垂听，有荣幸焉。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有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弟弟常觉得一个人总有缺点，君子只是能改过，断无生而无过。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的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第一概都有。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工具未善，工作何？弟有一最大缺点而不好意思向人公开者，即意弱是也。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之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我平日态度不对，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兄或谓为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悚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兄于礼容<sup>[2]</sup>，我觉未免过当，立意不十分诚，泄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兄说待我要反抗，兄看我为何如人？如以同某人款待我，则尽可“不答应”，何“反抗”是云。至说对某某及礼容要“征服”，则过矣过矣！人哪能有可以征服者，征服必用“力”，力只可用于法，用于法则有效；力不可用于私人之交谊，用于私人之交谊则绝对无效。岂惟无效，反动随之矣。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其原多出于“占据的冲动”与“意力之受拂”。兄与礼容之争，吾谓乃属于后者。（此情形弟亦常经过，并常以此施诸他人。）意力受拂，最不好过，修养未纯如吾人，一遇此情形，鲜有不勃然奋起者，此则惟有所谓“眼界宽”与“肚量大”者能受之，兄以为何如？今晚从城里归，已十二点钟，又与孩子们谈坐一小时，再写此信，有想就写，文句不贯，意思不贯，原有是幸！此颂

大安。

弟 泽东

一月二十八日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彭璜(1896—?),字殷柏(又作荫柏)。湖南湘潭人。五四运动中,被选为湖南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会长,加入新民学会,在驱逐军阀张敬尧运动中,组织湖南旅沪各界联合会,主编出版《天河》周刊。1920年秋,同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发动湖南各界开展反军阀谭延闿、赵恒惕斗争。他极力赞助毛泽东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和发起成立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后发起留俄勤工俭学运动,认定中国应走十月革命的道路。1921年,他在长沙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湖南最早的几个党员之一。后因精神失常失踪,下落不明。

〔2〕礼容,即易礼容,乳名国三,有时写成韵珊,1898年生,湖南湘潭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曾与毛泽东等一起创办长沙文化书社,并任经理。1936年曾在上海国民党控制的工会中工作。

## 【赏析】

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想事情,看问题总是高屋建瓴,深谋远虑。他善于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善于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的力量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他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谁联合得基础牢固,团结得有力量,胜利就属于谁。对于如何进行民众的大联合,毛泽东指出,先从小联合入手,由许多小联合进而发展为大联合。而此时毛泽东的交友之道,无不受到向团结求联合的思想影响,无不体现他的群众观。毛泽东交友是为了求友互助,结友成长,勉友进步,因而身边聚集了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互相勉励,不追逐名利,升官发财,而是集合起来“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从毛泽东早年的交友来看,毛泽东交友注重交结品质高尚,吃苦耐劳,有志于国的朋友,交友的目的是为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为成就一番大事业打好基础。毛泽东不仅善于团结志同道合的人,而且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正是毛泽东这种宽宏大量的宝贵品质,才使他勇于摒弃前嫌,自觉维护组织的团结和壮大;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改正缺点,毫不相互隐瞒自己的观点或以文过饰非的方法待人,达到共同进步,相互团结的目的。给彭璜这一封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交友方面的正确主张。

彭璜和毛泽东是同乡,与毛泽东等人一起创办文化书社,筹办俄罗斯研究会。彭璜在传播新思想,宣传新文化,团结社会各界,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革命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1920年下半年,由于性格等原因,彭璜与当时任文化书社经理的易礼容发生了矛盾,并将此写信告知毛泽东。毛泽东从团结出发,给彭璜写下这封情真意切的复

信。

此信,首先谈到了彭瓚的优点,指出他“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是朋辈中所少有的,然后,用概括的语言列举了他的十点缺点,接着坦率地指出了彭瓚对易礼容“未免过当”,“立意不十分诚,泄忿之意多,而与人为善之意少”。毛泽东坚持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思改,方为正道。革命者担负着救国救民之大任,要注意加强个人修养,时刻反省自己的缺点和过错,闻劝则喜,从善如流。革命同志间的批评,必须从善意出发,从“主义”的要求出发,不合“主义”要求者,必须批评,与主义无关者,大可以不必太介意,同志之间不存在谁“征服”谁的问题,即信中所谓“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

全信反映了毛泽东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的科学态度。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把组织共产党的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建党成了他的迫切要求和强烈愿望。他和何叔衡一起,在长沙发起创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组织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力图培养一批有作为的革命青年,以作为革命运动的骨干。毛泽东十分注重组织的团结和壮大。因此,对于“主义”之争,他主张以争对争,针锋相对;对于同志之争,他则主张寓让于争,顾全大局。同时,此信体现了他对同志热情帮助,待之以诚,晓之以理,助之以法以及大局至上,团结至上,胸怀坦荡,反躬自省的道德情操。对彭瓚的评价一分为二,优点、缺点一目了然,毫不含糊。在批评同志的同时,毛泽东勇于亮短,不怕丢丑,批评别人以前,首先对自己作了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评。从私人之争到主义之争,不仅意义得到升华,而且更能从革命的高度,把人们团结在主义的旗帜下面,为救国救民而共同奋斗。此信说理透彻,层次分明,语言生动,善用对句,热情中寓含睿智的哲思,谦逊中显露出刚正的性格。特别是信中几处巧用问句,加强语气,促人深思,即便今天读来,亦使人恍若晤谈,身临其境。

## “遵第一号通告”

——致施复亮<sup>[1]</sup>并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1922年6月20日)

国昌兄并转中局诸兄：

(一)一、三、四、五号通告均到，即遵第一号通告于六月十七号开大会改组，表决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执行委员三人如下：

书记——毛泽东。

组织部主任——李隆郅<sup>[2]</sup>。

宣传部主任——罗君强。

(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sup>[3]</sup>二人年龄虽过二十八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

(三)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十二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十三条之规定呈请中局认可，乞示复。

(四)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六条三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十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三个月，认为过促难于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三个月为六个月，可否，乞示复。

(五)此间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建议中局一件事如下：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区执行委员会至正式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

(六)请补发第二号通告。(以后付通告或重要函件须挂号)

(七)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通信处：衡州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枏(书记)；常德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候复。

书记 毛泽东

六月二十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施复亮(1899—1970)，原名施存统。浙江金华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1919年在杭州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后去日本，

担任东京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1921年被日本当局驱逐回国,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作。在团的一大、二大当选为团中央书记、中央委员。1923年后历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大学教授、团上海市委书记等职,并在中山大学、黄埔军校任教。1927年在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在上海大陆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1929年后,从事译著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著作。“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5年12月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任常务理事。1947年以后,曾一度积极鼓吹中间路线。1948年5月参加新政协会议筹备工作。1949年4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南下。上海解放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顾问。建国后,历任政务院劳动部副部长,第一、二、三、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副主席等职。1970年12月病逝。当时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

[2]李隆郢,即李立三。当时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参见本书第121页注[1]。

[3]李六如(1887—1973),湖南平江人。名抱良。早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后赴日本留学。1918年回国。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28年到新加坡、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回到中央苏区,先后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和代理行长。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后被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后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行政学院代院长,中共中央财经部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兼人民法院院长。建国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全国政协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3年4月1日病逝。著有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等。当时在长沙教书。

## 【赏析】

在近代中国,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和新式学校的创办,涌现出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对于这个异军突起的社会群体,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评价:“在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新的青年群体大多具有强烈的民主主义思想,曾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但最终告以失败。1919年5月4日,中国青年再度崛起,成为一支引人注目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先进的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下,逐渐认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无产阶级的青年组织团结广大青年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1920年8月在上海党小组的指导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以俞秀松为首的八名青年创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之后,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团组织。这个时期的青年团是一个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青年团体,直至中共一大召开后,青年团才开始成为一个“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在这期间,毛泽东的建团思想代表了团组织建设的正确方向。第一,注重团员政治素质,“寻觅真同志”,吸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入团。第二,注重在工人中建团,成立了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地方团组织。第三,带领团员积极参加实际斗争。第四,考虑

青年特点组织“星期同乐会”活动,使团组织充满了生机活力。1922年5月5日,在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与会代表25位,代表17个地方团,500多名团员,施复亮当选为团中央书记。大会通过了《团纲》和《团章》,确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青年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初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并明确接受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大会一致同意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加入少共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长沙团支部在接到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一、三、四、五号通告后,按要求选举成立了长沙团执行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任书记,李隆邦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任宣传部主任,表决了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同时,在衡州、常德两地成立地方团。

此信是毛泽东执行团中央第一号通告后给施复亮及团中央的报告。毛泽东在信中汇报了长沙团于7月17日召开的改组大会的情况,并建议: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三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十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任期,由三个月延长为六个月;青年团中央尽快地将各省进行分区。此信汇报了衡州、常德两地成立地方团情况及要求补发团中央第二号通告的意见。

此信反映了毛泽东早年的革命活动。在创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积极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建团过程中,他积极慎重,注意主义的结合,强调扩大工农成分,建立地方执行委员会,把团组织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团的主要负责人由党员担任。同时,重视加强思想教育,团结争取受各种思潮影响的青年,并使其走上革命道路。信中,毛泽东既有自己的活动汇报,更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于章程的有关条款提出自己的主张。“促成几个地方团”,“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附通告或重要函件颁挂号”等建议,体现了毛泽东在执行上级指示过程中“不唯上,只唯实”的精神和对工作认真负责、务实求实的态度。

全信以序号为线索,将自己的工作、思想及意见串联起来,显得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浑然一体;全信语言概括,平实质朴,使人读来有简洁明快之感,特别是信中多次用括号注明注意事项,显得认真细致,严肃慎重。正是在毛泽东等积极倡导和组织下,青年团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以工农青年为主要成分的革命组织。在1922年到1923年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中,团组织异常活跃,发挥了重要的宣传动员、组织领导的作用。



## “托带片言，借当问候”

——致文玉钦、文赵氏<sup>[1]</sup>（1922年11月11日）

舅父舅母大人尊前：

久不通信，疏忽得很！二位大人谅都人好！合宅谅都安吉！甥在省身体尚好，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刘先生<sup>[2]</sup>回乡之便，托带片言，借当问候。有便望二位大人临赐教诲为禱！敬颂

德安！

甥 毛泽东上

十一月十一号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文玉钦(1859—1929)，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托(当时属湘乡)人，毛泽东的八舅父，农民。

文赵氏(1855—1937)，湖南湘乡人，文玉钦之妻，毛泽东的八舅母，农民。

[2]刘先生，不详。

### 【赏析】

毛泽东的童年时代大多是在距韶山冲约十华里的湘乡县棠佳阁外婆家度过的。那里纯朴的民风，小伙伴们的和睦相处，外婆家成员的悉心照顾，使他拥有了一个快乐的童年，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的思想和实践，使他纵使登高望远，奔走四方，犹能情系棠佳阁，思念着外婆家的亲人。

毛泽东的两个舅舅文玉瑞、文玉钦，对他的生活给予了很大照顾，不仅在他升学问题上大力支持，说服父亲毛顺生接济学杂费，而且在他参加革命斗争后，精心照料着其生病的母亲。因此，毛泽东对两个舅舅非常尊敬，一直思念着他们。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新民学会会员旅欧勤工俭学，从长沙来到北京。临行前，他写信向舅舅告别，并对自己生病的母亲久居其家，承其照料，表示了感激之情。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又致信舅舅，进一步表达了内心的感激。“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料，至深感激”。1920年9月，文玉瑞病逝时，毛泽东专程回乡送终。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于同年8月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毛泽东被任命为党的湘区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在长沙从事工人运动，领导安源煤矿、长沙泥木工厂、

水口山铅矿等处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工作十分繁忙。1922年，一位姓刘的先生回乡，勾起了毛泽东对舅舅的怀念。他提笔疾就一封书信，托付刘先生转交舅父文玉欽及舅母文赵氏。

此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为了天下人的大“家”而不惜舍小“家”的崇高风范。为了指导工人大罢工，毛泽东多次深入矿井和工棚，详细了解工人疾苦，启发工人觉悟，要求工人团结，激励工人斗争，在工人中间播下了反抗剥削和压迫的火种。1922年5月1日，安源工人俱乐部成立后，毛泽东在工人中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建立党支部，吸收优秀工人入党。安源俱乐部的会员迅速增加。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毛泽东一心扑在了领导工人运动的伟大事业上，对自己家里的事情却很少顾及。正如信中所言：“久不通信”，可见工作之忙。但毛泽东并没有归因于工作繁忙，无暇写信，而是从主观上认为是“疏忽得很”。事实上，毛泽东早在求学时期就已经确立了“以天下为己任”的宏远志向。远大的志向，使他无暇顾及家庭的琐事，纵然有炽热的赤子之心，也最终难以尽赤子之孝。第一次到北京时，母亲已“病势危重”。1921年正月初七，毛泽东回到韶山，父母已双故，他曾对弟弟毛泽民及弟媳王淑兰说：“这几年我不在家，泽覃也在长沙读书，家里只有你们两口子撑着。母亲死了，父亲死了，都是你们安葬的，我没有尽孝”。毛泽东不仅舍小家，顾大家，而且动员小“家”顾大“家”，他动员毛泽民和王淑兰：“你们不要舍不得这个家！为了建立美好的家，让千千万万的人有一个好家，我们只得离开这个家，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毛泽东毁家兴邦，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全家牺牲了六位亲人。他们以自己的牺牲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拥护。

其次，此信还体现了毛泽东对舅父母的关心和尊敬。毛泽东曾说过：“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恋我外家诸兄弟子侄，乃一切穷苦同乡……”因为在毛泽东及其家人参加革命以后，毛泽东的外亲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曾经饱含深情地感叹道：“他们（指文家外亲）过去因为我受过迫害，吃过很多苦”。的确，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文家难免磨难。在外工作的毛泽东偶尔想起外亲，总有无尽的牵挂。“二位夫人谅都人好！合家谅都安吉！”一语道出游子浓烈的思乡之情。这不仅是毛泽东对舅父母的亲切问候，更是他对外亲的美好祝愿。为了不让舅父母牵挂，信中对工作的繁忙，处境的险恶，只字不提，仅用“甥在省身体尚好”一句，安慰外亲。对自己工作方面的情况，用“惟学问无进，甚是抱愧”暗示之，而对革命的具体工作未作明确说明，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坚强的组织观念和严明的纪律观念。

## “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 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

——致林伯渠、彭素民<sup>[1]</sup>（1923年9月28日）

伯渠  
素民二位同志：

第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sup>[2]</sup>于二十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sup>[3]</sup>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惟谭<sup>[4]</sup>军现占优势，长沙以下压湘水而阵，长沙以上则掩有醴陵之半，使北军仅据岳州如前年张福来故事<sup>[5]</sup>不图进取，则谭赵必议和，而赵仍站不住。

关于本党<sup>[6]</sup>在湘发展，虽在军事时代仍应努力进行，昨与夏希<sup>[7]</sup>同志（夏希极能做事，在学生界有力量）商议分三步办法：第一步组织长沙支部；第二步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支分部；第三步再组织湖南总支部。关于长沙支部，现决定即日租定房子成立筹备机关（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然后开成立会推出候补支部长，呈请本部<sup>[8]</sup>委任。惟经费极困，机关既立，每月至少须一百元内外，现正邀集热心同志设法捐集应用。在沪时请本部委我以筹备员名义（夏希为筹备主任）以便与各方面接头，请早日寄到为荷！

素民苏中<sup>[9]</sup>二同志来信并《通信》四份业已收到，当如嘱办理，《通信》稍后或还可以增加销路。《本部公报》请按期寄二份来，以前的并请检一全份见寄。

第 泽东

九月二十八号

此信托人带汉寄上，因检查极厉害，来信请写交毛石山，莫写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林伯渠（1886—1960），湖南临澧人。名祖涵，号邃园。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后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曾任湖南省财政厅长。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国民党中央总务部副部长，积极帮助孙中山从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后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农民部部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兼财政委员会主席。1928年夏赴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7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后曾以

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参政会,从事统一战线工作。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和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62年6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著有《林伯渠日记》等。

彭素民(1885—1924),江西清江人。当时任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部长。

[2]赵,指赵恒惕,当时是北洋军阀政府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参见本书第39页注[14]。

[3]1923年夏,湘军内部谭延闿和赵恒惕为争夺对湖南的控制权爆发战争。当时支持赵恒惕的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军队被称为北军。

[4]谭,指谭延闿,当时是孙中山任命的湖南省省长,湘军总司令。参见本书第25页注[22]。

[5]1921年8月,直系军阀吴佩孚与湖南军阀赵恒惕为争夺湖北地盘进行战争。吴佩孚部前敌总指挥张福来率领军队击败湘军,攻下湖南岳州。吴赵从各自利益出发停战议和。吴在取得驻防岳州便于控制赵恒惕的有利条件后,停止了南进。

[6]指中国国民党。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毛泽东当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湖南进行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

[7]夏希,即夏曦(1901—1936),湖南益阳人,字萑伯。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湖南学联干事部主任。同年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任中共湖南区委委员。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当选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监委。1926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192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1931年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3月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1932年犯肃反扩大化错误,被撤销领导职务。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兼军分会委员和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36年2月28日在长征途中牺牲。

[8]这里的本部,是中国国民党当时的最高领导机关。

[9]苏中,即徐苏中。1923年曾任中国国民党总理办公处秘书。

## 【赏析】

1928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统一全党思想,解决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问题。毛泽东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多次发言,赞同党内合作的形式。毛泽东既不赞成陈独秀忽视中共独立性的观点,也不赞成张国焘的关门主义倾向,强调中共党员参加国民党之后,必须保持独立性,工人农民必须大量加入国民党,但共产党必须独立地领导工人农民进行阶级斗争,以改造国民党的成分,建立联合战线,共同完成民主革命。中国共产党和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首次合作,可以说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事件,毛泽东在其中起到了积极推进和坚决捍卫的作用。毛泽东正确估量了当时的阶级形势和阶级力量,认为当时的中国是反动军阀支配的天下,外力和军阀勾结为恶,共产党必须暂时放弃自己的激进主张,争取和国民党合作。非革命的民主派也会暂时放弃他们的主张,去和共产党合作,组成统一战线。他说:“革命的大业不是容易的事,惟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能成功”。由于毛泽东作风严谨,工作认真,主张正确,所以被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推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负责起草国共合作决议案的工作。中共三大通过的《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集中了大会的正确意见,也凝结着毛泽东的心血,渗透了毛泽东的基本观点。《决议案》指出:“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要“时时警惕国民党,勿为贪而狡的列强所愚”。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进入了中共核心领导层,为他推进国共合作提供了广阔的舞台。9月,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9月16日,他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离开上海到湖南长沙,贯彻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指导中共湘区委员会筹组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毛泽东到达长沙后不久,谭延闿和赵恒惕为争夺湖南统治权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发展国民党的工作因此而遇到了麻烦。为此,毛泽东给时任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的林伯渠和任部长的彭素民写了这封信。

此信如实地汇报了长沙的局势和时代背景。当时政局可谓瞬息万变,金戈铁马战犹酣。然而,毛泽东则坚持认为,越是这样的“军事时代”,越应“努力进行”国民党的发展。然后,毛泽东详细而又慎重地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计划。先组织长沙支部,再组织常德、衡州及其他可能的分支部,最后组织湖南总支部。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机构的安排和设置上是深思熟虑的。同时,毛泽东提出应立即秘密成立筹备机关,多多邀请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加入国民党。针对活动经费的困窘,他提出设法捐集及总部给予拨款等方法。

此信语言恳切而庄重,从容而稳健,既有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又有因地制宜、因情谋势的革命气概,读来让人不难看出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那思维缜密、驾驭时局的内在特质。

此信集中反映了毛泽东临危不惧、审时度势、不屈不挠的斗争风格。正是在他的指导下,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次年1月,湖南临时省总部成立,1925年7月正式成立了湖南省党部。



(1931 年的毛泽东)

## 星火燎原篇

## “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

——致中共中央<sup>[1]</sup>（1929年3月20日）

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

1. 我们（红军第四军）三月十四日攻克汀州<sup>[2]</sup>城。郭凤鸣（福建第二旅旅长）打死，陈尸汀市三日。缴获步枪约五百枝（单响，九响多，红军用不着），马枪七、八枝，迫击炮三尊，炮弹一百余发。郭旅残部向上杭溃退。

2. 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务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建立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分秘密公开两种），日内即成立临时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目下是政治部代替政权机关。

3. 时局开展（我们看到三月三日的上海报，三月十三日的……及漳潮两报），闽西及赣南望中央将一般计划指示我们。红军应该怎样行动，尤盼飞速指示！

4. 对一般的计划，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这时候无论什么派别欺骗群众，都敌不过我们共产党的事实了。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我们的意见：宜在江苏、直隶<sup>[3]</sup>，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皖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5. 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6. 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彬部）约四百枪，战斗力颇好，现在兴国、泰和、赣州之交。独立第四团（段月泉部）约三百余枪，战斗力尚弱，现在兴国、于都之交。红军彭德怀<sup>[4]</sup>部约三百枪（井冈山逃出来沿途失散后存余者），在于都、信丰之间。三月七日彭部袭击刘士毅<sup>[5]</sup>残部，缴步枪百余，水旱机关枪各一，子弹七担。红军第四军大概十天内尚在闽边工作，十天外须赴赣边瑞金、宁都一带游击。那时须看湘赣战局的形势，从有利于红军的发展及有利于工农群众发展的标准上去决定行动。或再回闽边，或在赣南作较久时间的游击，或往吉安去接近国民党的战区。惟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7. 福建省委须立即派遣一闽西特委来汀州指导汀属八邑<sup>[6]</sup>工作，汀属党部太弱，担负不起建设政权的责任。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现在枪无人抬），望省委以大力注意此间。

8. 福建全省，浙江全省，赣东赣南两边，统治阶级的军力非常薄弱（在全国来比较），未知中央曾讨论以此三地方为目标，首先创造公开割据的计划否？三地统治势力既弱，又通海口，这是值得注意的。



9. 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二十日在大余与李文彬<sup>[1]</sup>作战失利,循粤边南雄入赣南信丰、安远、寻乌,曾三次与追兵接触,均且战且退。二月一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之罗福嶂<sup>[2]</sup> 停脚一天,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五团紧蹙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到罗福嶂后为安置伤兵计,为找有党有群众的休息地计,为救援井冈山计,决定前往东固(宁都、兴国、吉安之交,地属吉安)。二月十一日到宁都之大柏地,与追兵之先头部队刘士毅第十五旅两团战,大败之。我军士气大振,缴得步枪二百余,水旱机关枪六架,俘敌甚众。敌之残部,溃退赣州。追兵后续队伍李文彬部(三团)到来,我们则已往东固。在东固休息一星期,与江西红军二、四两团会合,并与江西赣南特委接上了头(在于都),安置了伤兵。及李文彬(赣军最精锐部)追至东固,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动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sup>[3]</sup>),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二月二十五日离开东固,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复入宁都、瑞金之王田市,后卫距敌才一里,乃我们离开王田市向汀州之原因。张旅<sup>[4]</sup> 忽然折回,盖湖南战事爆发,蒋系须集中部队,固将张旅调回,因此我们得安心对付郭凤鸣旅。十三、四日两次击溃郭部二、四团,而红军亦在兴国、于都一带发展。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最大的就是干部损失多员最为可惜。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尽了我们的精力,才应付过这个难关,而得现时之胜利。内部团结坚固(最困难时兵士开小差的极少,干部袁文才<sup>[5]</sup> 等数人脱离队伍),党的指导不错,亦为战胜困难的原因。

10. 军中党的最高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敌委员会(因事实的需要,除中央任命的名单外增了几人)。第四军除留在湘赣边界的一部分外,出来的部队现编为三个纵队,共三千人,枪一千五百,子弹极少。因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战斗力不及从前。但井冈山出发以来的疲败精神,业已恢复,士气亦已振奋起来。因两次损伤的结果,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的缺乏,达于极点,亟盼中央派人来补充,至少须派军事的政治的教官各数人,来此开办训练学校。

11. 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一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一月间在井冈山接到的;一是六次大会<sup>[6]</sup> 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太会……结<sup>[7]</sup> 六件),今年一月在水新接到的。我们寄给中央的信,去年八月毛泽东之一长信,由湖南省委转;去年十一月前委之详细报告,由湖南江西两省委转,此报告历述两年来湘赣边界斗争之经过,红军之现在计划等,不知均曾收到否?

12. 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惟少组织、宣传、职工三决议案,乞即补寄!

13. 闽西特委亟速建立。赣南特委与江西省委非常隔绝,但与前委已发生密切关系。湘赣边界特委自去年五月成立以后,与湖南省委关系较密,与江西省委关系较少。赣南党部,于都及东固最好,兴国、信丰、宁都、安远、寻乌次之,瑞金、会昌、石城尚无组织。长汀在开始发展中,最好之永定,离我们三百余里。为应付江西事变,红军此刻不能去永定。阮山<sup>[8]</sup> 同志的红军有开来汀州之必要,必须如此,我们去江西后,汀州的政权才可以继续,才可以与我们取得密切的联络。郭凤鸣死,汀州再无人管,八邑中心工作应在长汀,望

省委熟计。

14. 中央在估计力量时,不可把我们估量得太大。

前委

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这是毛泽东以中共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给中共中央的信。

[2] 汀州,旧府名,即福建长汀。

[3] 直隶,旧省名,辖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 and 河南、山东两省的小部地区,1928年改为河北省。

[4] 彭德怀,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参见本书第291页注[1]。

[5] 刘士毅,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副师长兼第十五旅旅长。

[6] 汀属八邑,指旧汀州府下辖的归化、长汀、上杭、永定、宁化、清流、连城和武平八个县。

[7] 李文彬,当时任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旅长。

[8] 罗福嶂,村名,位于江西寻乌县东部。

[9] 打圈子政策,是毛泽东对井冈山初期红军游击战术的一种形象说法。

[10] 张旅,指国民党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旅长张与仁。

[11] 袁文才(1898—1930),江西南冈人,又名选山。早年参加农民武装马刀队。1926年秋率部参加起义,任宁冈行政委员会委员兼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后,即带领农军接受改编,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团团长兼一营营长。1928年4月后,历任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团长,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红四军参谋长。1929年随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南闽西途中,脱离队伍回井冈山,仍坚持革命,任中共宁冈县委常委。1930年7月在江西永新被错杀。

[12] 六次大会,指1928年6月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当时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13] 原文如此。

[14] 阮山,当时是闽西红军游击队的领导人之一。

## 【赏析】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面对革命的危局,毛泽东凭着他那坚定的革命信念、执著的探索精神及对中国社会深刻的洞察力,在风云变幻中思考着中国革命的出路。1927年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来到湖南,与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一起领导发起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27年10月,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通过艰苦的斗争,创立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冬天,湘赣两省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井冈山红军的第三次“围剿”。大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之下困难重重。红军单衣单裤,终日红米南瓜。为了克服军事上、经济上的困难,1929年1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柏露村主持召开了前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边界各县委以及红军团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毛泽东首先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精神,接着,会议就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展开了讨论。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敌人集中五倍于我的兵力进行“围剿”,形势是严峻的,但井冈山根据地决不能丢,红军不能没有后方基地,只要坚持斗争,就能粉碎敌人的进攻。会议接受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前委提出的作战方针,决定留红军一部守井冈山,红军主力则向物产丰饶,距大城市较远,群众基础较好,地域广大且多山的赣南挺进。毛泽东起草了红四军进军的宣言和布告,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任务和政策,号召工农兵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的反动统治以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而斗争。2月,红四军在瑞金太柏地歼敌两个团,3月攻占宁都、兴国、瑞金、于都、广昌等县,初步打开了赣南局面。

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行动计划问题。会议认为应抓住蒋桂战争爆发的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形势。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不再返回井冈山,而和已到赣南的原红五军及江西二、四团密切配合,在赣南、闽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实行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毛泽东特别强调,红四军应根据形势和需要,决定自己的有机区域,惟闽西、赣南这一计划是必须建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同日,毛泽东以前委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了这封信。

此信详细地报告了红四军下山以来,一路艰苦转战,挺进赣南闽西的情况,首先汇报了3月11日红四军攻克汀州之战。此役击毙敌旅长郭凤鸣,俘敌2000多人,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全军上下喜气洋洋。接着毛泽东还分析了汀州群众基础好的状况。对于红四军的一般计划,毛泽东指出,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一般工作中心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北院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在行动策略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民党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混战的形势,提出了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以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并借此使赣南闽西与湘赣割据区域连接。毛泽东在信中还简要汇报了李文彬部、彭德怀部的情况,指出了惟闽西赣南这一计划必须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毛泽东在汇报红四军行动情况时,详尽而细致,他总结道:离开井冈山起,由于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敌兵追截,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可以说,这次困难为自有红军以来最大之困难。于是放弃固定区域公开割据政策,采取变动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之跟踪穷追政策。由于红军尽了精力,加上

内部团结坚固,党的指导不错,才使红四军战胜了困难。

此信还反映了毛泽东高瞻远瞩、灵活机动的策略方针。在此信中,毛泽东分析了时局,坚持武装割据,并主张利用国民党混战之机,发展壮大自己,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同时提出了“打圈子政策”,广泛采用游击战术,这一战略战术在“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可以说是一条保存自己、拖垮敌人、击败敌人的正确路线。

此外,信中还渗透了毛泽东发动群众、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很注重发动群众工作,注意红军的政治建设,对部队要求严格,关心群众利益,强调严格遵守纪律。在此信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近城农民大大起来,连日建立农会、工会的基本组织”,“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当作非常重要的工作,主张“目前主要的工作是扩大党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建设政权机关及闽西红军”。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毛泽东通过打仗这个手段,分兵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的光辉思想。

此信内涵丰富,层次清晰,对时局分析透彻,对红四军情况汇报得详尽而细致,对今后的工作计划阐述的颇具策略,体现了毛泽东在工农武装割据时期卓越的斗争艺术。毛泽东在信中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 “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

——致中共中央<sup>①</sup>（1929年4月5日）

中央：

二月七日的信<sup>②</sup>由福建省委转来，四月三日在瑞金收到。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三次进攻井冈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我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言，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地消灭。群众是一定倾向我们的。屠杀主义又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不能再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形势之下，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六次大会<sup>③</sup>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但革命发展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精神。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精神之下才有可能。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闽西赣南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党部，战斗的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由闽西赣南的例子使我们想到别的地方或者也有这种现象，所以我们要反对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恶考倾向，但取消主义和不动主义的倾向又要极力防止。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六次大会指出了忽视农民革命的错误。中央此信有“发展农村中广大的普遍的斗争”之言，这种意见才是对的。

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大的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理想。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与地方武装的赤卫队来说完全不同。湘赣边界宁冈各县的农民只愿在本县赤卫队当兵，不愿入红军，因此红军简直寻不出几个湘赣边界的农民。红军成分是老的国民革命军、浏平湘南的农军和迭次战役的俘虏兵。（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乎浏，四军

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方能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此次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因为我们部队是集中的,领导机关(前委)和负责人(朱、毛)的态度是坚决奋斗的,所以不但敌人无奈我何,而且敌人的损失大于他们的胜利,我们的胜利则大于我们的损失。宁都和汀州二役<sup>[6]</sup>的胜利,地头蛇之郭刘二旅完全消灭了战斗力,使赣南闽西一方清汉,致有现在之群众发动成绩者非部队集中、指导机关健全决办不到。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力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来都用这种战术。在湘赣边界时,大概集中兵力一度击溃敌人之后,可以散开工作两三星期(分数大支出去,每大支又分数小支出去),及至敌人再整军来,我们又集中起来了,再击溃敌人,再分散工作。此次敌人穷追,我们用盘旋式的游击,可以走很宽的地方,发动很宽的群众。每到一处少则顿住半天,多则顿住五天,先之以广大的宣传(政治部统属的文字宣传队和口头宣传队,均以连为单位,每连二队,每队三人,路上行军及每到一处,宣传就立刻普及),继之以散发财物(大地主及反动分子的谷子、衣服、器具)然后进行组织(党的支部、秘密工会、秘密农会)。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现在的队伍,与叶贺<sup>[7]</sup>时候的队伍大不相同,叶贺的队伍是单纯打仗的,若在今日,决不能存在的。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

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sup>[8]</sup>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sup>[9]</sup>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sup>[10]</sup>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

自刘郭二旅击溃之后,闽西赣南可以说没有敌人了。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目前,国民党统治从此瓦解,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在这种时局之下来布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粤湘二省中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湘省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政策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失尽。赣浙闽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sup>[11]</sup>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然郭旅已被击破,陈国辉卢兴邦<sup>[12]</sup>二部均土匪军,战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亦未打过仗,战力谅不大,只有张贞<sup>[13]</sup>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二团好的,且五部完全是无政府,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sup>[14]</sup>二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则差得多,其中一大半和我们作战过,除李文彬<sup>[15]</sup>一旅之外其余都是被我们打败过的。第二,三省党的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明外,江西福建二省党及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



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等县党及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是很大的，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独立第二团、第四团有一天一天发展之势，赣东方志敏<sup>[10]</sup>的红军独立第三团<sup>[11]</sup>并未消灭，如此已造成了向南昌包围之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混战的长期战斗中，我们要和蒋桂二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此一年中，要在上海、无锡、宁波、杭州、福州、厦门等处建设无产阶级斗争的基础，使能领导赣浙闽三省的农民斗争。江西省委必须健全，南昌、九江、吉安及南浔路的职工基础须努力建立起来。

我们三月十四日到汀州，战败郭旅，打死郭凤鸣，始知蒋桂决裂，国民党大混战快到来。对于目前工作的布置，决定在国民党混战初期，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因此，我们不下杭、永<sup>[12]</sup>，也不去龙岩，在汀工作十七日，于四月一日开到瑞金，定四月八日进占于都，到于都当召集一扩大会，与赣南特委与中央军事部派来的罗寿男同志等讨论行动计划。闽西赣南的民众都非常之好，在长汀县城及新桥、河田等地工作时，夺取上劣谷子的群众，一聚就有几千。在汀州组织了二十个秘密农协、五个秘密工会，总工会也成立了。党的组织比前发展二倍。组织了一个赤卫队，单独站不住，现随军来到瑞金。政权机关开始是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政治部任命的，及至工会、农会各组织了几个之后，即召集代表会议选举正式革命委员会。临时与正式的革委都发布政纲。到瑞金规定四天工作计划，把部队分散到县城、壬田市、西江、九堡四地工作，每地再分小支，指挥机关在县城。瑞金民众如火如荼地起来，欢迎我们，和地主斗争非常勇敢。可惜以前全无组织，一个同志都没有，无本地领导，组织工作仓卒，难做得好，特别是县城。到于都后大约有一星期在县城及四蛟工作，以后或向宁都、广昌，或向万安、泰和，看情形决定。赣南游击一个时期，再赴闽西，那时须与郭凤鸣残部及卢兴邦、陈国都战，福建省委须努力准备。

军中状况，四军除小部分留边界外，大部分出来的计三千六百人，一千一百枪，在太余、信丰、寻乌损失约二百支枪、六百个人（多数是作战时失联络，真正被敌人拿去的不过几十枪、一百多人）。报纸所载那些骇人的消息，都是敌人欺骗的话，宁都汀州二战之后，不但恢复原状，而且增长了些。全军现编为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纵队，每纵队辖二支队（等于营），每支队辖三大队（等于连），每纵队约枪五百余支，千二百余人。分兵游击时即以纵队为单位。分开出去，然后再分小支，分开、集合都很便利。彭德怀同志之第五军到井冈山者八百人，枪五百支，此次到瑞金者六百人四百枪，现在编为四军第五纵队，彭同志以副军长名义指挥之，数日后须返湘赣边界，收集旧部恢复政权，与赣南取得联络，仍属前委指挥。政治部已设立，军设军政治部，每纵队设纵队政治部。政治部内设秘书处、宣传科、组织科（分职工、农民、特务三股）、政治保卫科。支队大队两级设党代表。纵队以上废除党代表，只有政治部主任。全军在汀做了整齐的眼装，每人发四元零用费，给养已不成问题，士气非常振发。赣东黎川方面（与广昌接近）有两个部队想来接头，一是金汉鼎<sup>[13]</sup>部下反叛出来的五百多人，三百多枪，现编为第四纵队，纵队长田桂清；一是土匪军三百多人，二百多枪，到处被打无出路，现编为独立营，胡竹笙为营长。此两部约定四月十四日后开到



宁都编就训练。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现在兴国一带,与我们联络很好。湘赣边界遭一度破败之后,现必到了恢复的机会,那边陈王佐<sup>[20]</sup>部二百支枪系属红军第四军外,宁永莲遂酃茶<sup>[21]</sup>六县赤卫队共八百枪,在军阀混战无力顾及的时候,不但可以保守,且可以向外发展,彭同志率部回去,当更有办法。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是邓乾元同志。湘南自去年三月暴动失败之后,党的基础在盲动主义之下完全毁灭,农军武装也被豪绅缴去,群众都被镇压下去了。去年八月红军攻郴,在资兴、汝城、桂东组织三个县委,三个农民武装的赤卫队,另组织一特委统辖之,杜修经为书记。近接报告,他们又在盲动主义之下牺牲了。醴陵去春暴动后,党的组织打破,武装消灭之后,夏季又向四军领去七十支枪,秋季全部覆灭于攸、醴<sup>[22]</sup>交界之皇图岭,此足见少数武装单独存在之不易。

红军党的指导机关是中央任命的前委。去年六月四日中央来信云:关于前敌指导机关,中央视为有组织委员会之必要,委员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此外还须组织一职工委员会,前委之工人同志为书记,一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军委及工委名单由前委决定。所有管辖的范围,依据环境来决定,所有管辖区域内工作,完全为前委指挥。前委在江西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受湖南省委指导。主管的省委,接到前委的报告须立即回答,并将前委的报告及省委的回答立送中央。我们对中央这种组织的指示,视为十分适当,合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地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原稿已失。一个是去年十一月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sup>[23]</sup>,历史地叙述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付上,此信原稿尚存,特重写付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一个是三月二十日前委在长汀发的信,由福建省委转来,未知能达到否?今亦重新寄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及到汀州才看到《少年先锋》第三、四期,《中国工人》第三期,北京出版的《人言》第二期,汀州留沪同志出的《前响》第二期。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健<sup>[24]</sup>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前 委

一九二九、四、五于瑞金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共中央的信。

[2]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的信。

[3]指1929年初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4]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5]浏平,指湖南浏阳和平江。

[6]指大柏地战斗和长汀战斗。1929年2月10日至11日,红军第四军在江西宁都大柏地(后改属瑞金),伏击尾追红军的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五旅刘士毅部,歼灭该旅大部,俘虏敌团长以下800多人,缴枪800余支。1929年3月18日至14日,红军第四军与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激战于福建长汀的渔溪、长岭寨一带,全歼敌军两千余人,击毙旅长郭凤鸣,并乘胜占领长汀城。

[7]叶,指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原名叶为询,字希夷。早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8年赴福建参加孙中山的援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后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1924年赴苏联,后曾在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北伐战争期间,率独立团作为北伐军先锋,先后参加攻克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等战役。1927年3月任国民革命军十一军副军长兼二十四师师长。同年8月1日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11月回国,任新四军军长,参加领导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14日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政府军扣押。1946年3月获释并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4月8日自重庆赴延安途中,在山西兴县因飞机失事遇难。

贺,指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原名文常,字云卿。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在湘西领导农民暴动。后任川军混成旅长、师长、镇守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独立第十五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与周逸群、段德昌等到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任红四军军长、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红二军团总指挥。1934年与红六军团会合后,任红二、红六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1935年率部参加长征,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领导创建了晋绥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6月9日在北京逝世。

[8]刘伯承,当时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参见本书第146页注[1]。

[9]恽代英(1895—1931),湖北武昌人。字子毅。1920年参与创办利群书社。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和1925年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和《中国青年》主编。1926年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3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

1927年3月在武汉参与主持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同年4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秘书长。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后,任中共沪中区、沪东区行委书记。1930年被捕。1931年4月,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南京监狱。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

[10]贺昌(1906—1935),山西离石柳林(今属柳林)人。原名颖,又名其颖,字伯聪。1920年考入太原省立第一中学。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任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后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和工农部部长,团湖北省委书记。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第五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9年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宣传部部长、湖南省委常委。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5日在赣南作战时牺牲。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

[11]蒋伯诚(?—1951),浙江诸暨人。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2]陈国辉(1898—1932),福建南安人。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卢兴邦(1880—1945),福建尤溪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二师师长。

[13]张贞(1884—1963),福建诏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4]朱培德(1889—1937),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地任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

熊式辉(1893—1974),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五师师长。

[15]李文彬,云南盐兴(今属禄丰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二十一旅旅长。

[16]方志敏(1900—1935),江西弋阳人。原名远镇,乳名正鹄,曾用笔名云母文、祥松等。1916年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曾组织九区青年社,以“抱不平、均贫富”为宗旨。1919年入江西省立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加入江西改造社,参与编辑《新江西》社刊。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组织江西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私立黎明中学和南昌文化书社。从事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曾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参与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的组建工作,任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农运部长,并在江西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底,领导弋横农民暴动,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十军。历任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4年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军政委员会书记。1935年1月,因叛徒告密,在江西玉山陇首村被俘。同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就义。著述编有《方志敏文集》。

[17]独立第三团,似应为独立第一团。

[18]杭、永,指福建上杭和永定。

[19]金汉鼎(1891—1967),云南黎县(今华宁)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集团军第十二师师长。

[20]王佐(1898—1930),江西遂川人。原名云辉,号南山。原为井冈山绿林武装首

赣。1927年改称农民自卫军,迎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1928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副团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独立团团长、红四军五纵队纵队长,曾坚持井冈山地区游击战争。1930年8月于永新被错杀。当时任湘赣边界红军独立第一团团长。

〔21〕宁永莲莲鄱茶,指江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酃县、茶陵。

〔22〕攸、醴,指湖南攸县和醴陵。

〔23〕即《毛泽东选集》中《井冈山的斗争》一文。

〔24〕何键(1887—1956),湖南醴陵人,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 【赏析】

1929年1月柏路会议后,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红军一路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加强“工农武装割据”和根据地建设,以农村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恢复和发展。2月红四军在瑞金取得了大柏地战斗的胜利,3月下旬先后攻占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县,并成立了闽西第一个红色政权——闽西革命委员会。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返回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的原红五军会合。红军的力量得到了壮大。然而,就在红军瑞金会合后的第三天,前委收到了由福建省委转来的中央2月7日给润芝、玉阶两同志并湘赣边特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这封信是革命形势异常严重之时写的,该信对形势作了悲观的估量,对红军的策略提出了错误的主张。来信认为,反动势力对革命仍是“一致的压迫”,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欺骗,工人斗争很难有“广大的革命发展”,农民斗争和许多农村苏维埃区域则因得不到城市领导而失败,所以目前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基于上述分析,中央指示红四军前委应有计划地将红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持久。”来信还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理由是: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中央强调:“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不应图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毛泽东、朱德看到指示信后,不同意信中对形势的悲观估计和要求红军分成小股散入乡村的策略。1929年4月5日,毛泽东以前委名义复信中央。全信围绕中共中央的错误主张,阐明了当前形势以及红军应采取的策略:

首先,此信针对来信对形势所作的悲观估计,提出了“反革命高潮逐渐低落,革命高潮逐渐生长”的观点。此信开宗明义,起笔点到了“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对此,毛泽东指出,在反革命高潮向低潮过渡时,革命高潮逐渐生长,党组织的战斗力也会恢复,党内干部分子的消极性也会迅速消失。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口号,积极精神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才能有所加强。对于中央的错误做法,毛泽东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表现在地方党支部战斗精神非常之弱,许多斗争的机会轻易放过去了。群众是广大而且革命的,党却袖手不去领导。为此,毛泽东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的光辉论断。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创造大区域产业支部,正是党

在组织建设方面的最大任务。有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再有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与扩大,就会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

其次,此信反驳了中央来信中“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的观点,提出了“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主张。毛泽东用红四军的实践活动,具体说明了分散在农村中的危害和弊病,接着总结汇报了三年来斗争情况。他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与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展是一天天扩大的。”“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已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党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为中国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三,此信还体现了毛泽东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又实事求是的思想。针对中央来信中要求朱、毛“脱离部队,速来中央”的指示,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从工作出发,指出:“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是失败。”同时表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

另外,信中还分析了闽西、赣南的局势,以及蒋桂混战的形势,汇报了红四军的军中状况等情况,预言“革命高潮很快地会到来”。

此信内容丰富深刻,层次分明,逻辑严谨,言事则简要概括,论理则入木三分。而且信中长短句式兼用,时而语句精炼,音节短促,时而语句舒缓,语势激昂,时而演绎推理,时而归纳判断,显得有松有驰,自然流畅,既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丰富思想情感,又体现了他不唯上、只唯实的勇气和胆魄。

## “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

——致林彪<sup>[1]</sup>（1929年6月14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sup>[2]</sup>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的，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sup>[3]</sup>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sup>[4]</sup>，长有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



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sup>[1]</sup>。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闻,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sup>[2]</sup>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sup>[3]</sup>,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sup>[4]</sup>,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sup>[5]</sup>与二、四团<sup>[6]</sup>。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sup>[7]</sup>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sup>[8]</sup>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sup>[9]</sup>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sup>[10]</sup>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sup>[11]</sup>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sup>[12]</sup>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



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未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二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④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迫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四个好听的名词罢了!

⑤ 流氓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氓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别,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氓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⑥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太部往湘南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⑦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么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

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決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sup>[16]</sup>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无法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說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

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 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 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sup>[19]</sup>,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不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 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sup>[20]</sup>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 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 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氓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

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sup>[1]</sup>,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陈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耗尽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毛泽东在四军期间,曾作过许多次报告,其中有一篇是讲“四军党的基础”,这篇报告就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毛泽东在四军期间,曾作过许多次报告,其中有一篇是讲“四军党的基础”,这篇报告就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

毛泽东在四军期间,曾作过许多次报告,其中有一篇是讲“四军党的基础”,这篇报告就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毛泽东在四军期间,曾作过许多次报告,其中有一篇是讲“四军党的基础”,这篇报告就是在这封信中提到的。

**【注释】**

[1] 林彪(1906—1971),湖北黄冈人,原名育蓉,又作毓蓉。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任连长。同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任红四军管带、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军长。1932年后,任红一军团军团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曾指挥平型关战斗。1938年冬去苏联治病。1942年回国后,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建国后,历任中南军区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七至第三届全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私乘飞机叛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坠身亡。1973年8月被中共

中央决定开除党籍。1981年1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判为反革命集团案主犯。

[2]指林彪1929年6月8日给毛泽东的信。

[3]白砂会议,指1929年6月8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4]原件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5]1928年7月上旬,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湘南)的思想,于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受严重损失,通称八月失败。

[6]“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7]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8]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300个字。

[9]指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军第五军,该军1928年12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军会合。

[10]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1929年2月,红军第四军与第二、第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合。

[11]柏路会议,指1929年1月4日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桂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四军、第五军军委等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了如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彭德怀率红军第五军和第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12]彭德怀,参见本书第291页注[1]。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13]原件如此,可能是指花名册说的。

[14]原件在“纵队委员会”前,有三个字不清。

[15]指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6]湖雷前委会议,指1929年5月底或6月初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

[17]原件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18]朱云卿(1903—1931),广东梅县人。当时任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19]行委,行动委员会的简称。

[20]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21]原件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22]即共产主义的敬礼。C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 【赏析】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动向赣南进军。在以毛泽东、朱德、陈毅为核心的中共前敌委



员会的坚强领导下,红四军团结一致,艰苦奋战,开辟了赣南、闽西两块革命根据地,出现了比井冈山时期更热烈、更广阔的革命新局面。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红四军自下井冈山以来,经过半年征战,伤亡较大,特别是中下级军官和各级政治工作人员“损失太多”、“十分缺乏”。如果等中央派人来,一是路途艰险,往往不能到达。二是数量有限,远不能满足部队的大量需要。所以,多是在每次战斗的俘虏中,挑选一些表现好的来充任下级军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军队的纯洁性。从党的组织状况来看,因长期在高度分散的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不仅红军中,连党内也涌进了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由于红四军党和部队组织状况的复杂化,因而也就必然带来了思想状况的复杂化,即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旧军队中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和习惯,逐渐滋长起来。比较突出的表现是: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甚至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人也产生了动摇。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日益和无产阶级思想发生矛盾,影响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贯彻执行。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怎样有效地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及时纠正我们党内和军内的新的条件和环境下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党的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但是,在红军创建初,我们党对如何把农民成分占多数的军队建设成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在理论上缺乏必要的准备,在实践上又缺乏经验。因此,在如何建党建军这一问题上,红四军领导层内存在意见分歧。毛泽东强调部队的政治建设,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党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组织纪律性,强调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1929年6月8日,毛泽东在白砂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正式成立军委等问题。由于中共代表刘安恭故意制造混乱,助长了党内思想上的分歧,造成了红军思想上的混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请求更换前委书记,让自己离开前委。他说,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他离开前委。这时,林彪给毛泽东一封信,主要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看到信后,彻夜未眠。当时的处境让他焦虑不安,夜不能寐。他感到一种苦恼。但他相信,他要求离开前委,决不是放弃斗争,而是希望找到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几天以后,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信。

首先,此信表达了毛泽东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坚定信心和勇气。他在信中开宗明义:一定同一切“谋有利于同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他认为,目前红四军出现的问题暴露出来是对的。党内的争论不是退步,而是党的进步。那些调和敷衍了事,大事化小事的才是退步。由于毛泽东辩证地分析了红四军内部的争论,才使他坚定了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的信心和勇气。他表示:一定要彻底弄清问题,一定不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使红四军的党由此得到一个极大的进步。他一方面提出离开前委的理由,同时还表示:“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的一天!”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忍辱负重,服从组织,顾全大局,坚持斗争的高尚情操。

其次,这封信还对红四军争议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他说,不明白红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目前争论问题的来源,更不会明白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因此,毛泽东归纳到

举了14种争论的问题,问题的产生,根本上是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着重首先分析了这个问题的历史原因,指出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斗争,是红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其他问题大体上都是这一总线索的分支。

流寇思想是毛泽东批评的又一种错误观点。他说,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红四军中的游民成分,由此,毛泽东指出:“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只有和红军中存在的原始的游民队伍现象作斗争,才能建设红军为真正的人民军队。对于军委问题的争论,毛泽东一针见血地分析道,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在纵委之上硬生生地要一个军委,这是少数同志历来错误路线的结果,是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为此,毛泽东对“家长制”进行了解释,他说,家长制的含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的委派,没有群众选举。而红四军党内没有这个定义,他指出,红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如果少数同志患了善忘病,可以去查会议记录。他的雄健的笔锋,辛辣的语言,使回答颇具说服力和坚强的斗争性。

最后,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论述了红四军党内错误思想的本质和危害。他指出,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证明最近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成分,考虑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毛泽东就是依靠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得出了结论: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危险的。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奋斗,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

全信在艺术构思上有其独到之处:在结构上采用“总—分—总”的框架,首先提出了论点,然后分别加以论述,最后作出结论,显得首尾一贯,整饬错落,水到渠成。在主题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这就从历史的、现实的、全局的角度深刻而全面地分析论述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并无情地进行了抨击,表现出了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的决心和勇气。在理论阐述上不拘一格,纵横驰骋,多次运用排比句式和事例论证、数字例证,集广阔的革命形势与尖锐的思想斗争于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中,显得形散而神聚,情激而理深。在语言运用上,洋洋洒洒,气势恢宏,毫无雕琢痕迹,更少字斟句酌,而是直抒胸臆,显得精辟干练,辛辣犀利,气若悬河,势如破竹,充分表达了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建设不懈探索、顽强斗争的坚定意志。



[illegible]

“惟當局理論常識太低” 66年第3次思想調查表

“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  
须赶急进行教育”

“**必须赶急进行教育**”

致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8日)

致中共中央(1929年11月28日)

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借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当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闽西已有六十万赤色群众足以掩护红军，刘（和鼎）金（汉鼎）张（贞）<sup>(2)</sup>等会剿，形势并不严重。现决整理一时期，即向刘张进击。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正在准备一个月给养。

彭德怀

十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sup>①</sup>,《红旗》<sup>②</sup>,《列宁主义概论》<sup>③</sup>,《俄国革命运动史》<sup>④</sup>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请垫付,寄付地点“上海”<sup>⑤</sup>。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余详前委报告。

毛泽东 刘少奇 邓小平

“天下第一等好事，莫如读书”匾 合 题“丙午孟秋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于河州”

《毛泽东书信选集》,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年。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注释】①指谢汉秋。1929年10月他被中共福建省委派往闽西巡视工作。②刘和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师长。③金汉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④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3]陈毅,当时任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929年8月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会后,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带回部队。陈毅,参见本书第313页注[1]。

[4]布报,即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杂志,1927年10月24日创刊。

〔5〕《红旗》，是中共中央当时的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编。初为周刊，从第24期起，改为三日刊，每逢星期三、六出版。第1期到第4期，为16开本，第5期起，为32开本。第24期起，改为8开的单张报纸。设有社论，国内外消息、问题与回答、转载、短斧头笔栏目。该报注重鼓动性，对政治事变或国家大事都发表

评论,以后又大量刊登党的文件。从第40期起,确定为党的政治机关报。1930年8月14日停刊。①《列宁主义概论》是斯大林所著《论列宁主义基础》最早汉译本的书名。②《俄国革命运动史》瞿秋白著。1927年7月由新青年社出版。③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赏析】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红四军党内和军内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红四军的主干是早期的北伐军和来自湘东、湘南的农民,后来又补充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兵,其阶级成分大多数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军事干部大多来自旧军队,加上红四军作战频繁,生活艰苦,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使红四军党内、军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不良作风逐渐泛滥起来;出现了单纯的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以及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这种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极大地妨碍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由于红军初创,对如何建立一支新型的工农红军缺乏经验,在红四军领导层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1929年春夏之际,终于发生了一场大争论,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民主集中制、官兵关系、建立根据地问题。这是一次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建军思想的交锋。毛泽东总结了红四军从井冈山到赣南、闽西的斗争实践,认为这种争论是党的进步,而不是倒退,分析了引起争论的原因,指出,这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不正确的思想,以求红军的彻底改造。在红四军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毛泽东表示所争论问题不解决绝不当前委书记。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他请求红四军前委批准,到闽西蛟洋指导地方党工作,同时休养病体。毛泽东离开部队后仍时刻关心部队的建设。他不仅与朱德、陈毅共同制定了粉碎闽、粤、赣三省敌人“会剿”闽西根据地的计划,而且对如何建设一支新型军队做了周密的探讨。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后,部队政治工作有所削弱,极端民主化倾向有所滋长,这引起了朱德对建党建军问题的认真思考。陈毅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后,带回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信中肯定了红四军的斗争经验和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正确解决了思想上的分歧,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责成前委“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维护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增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根据中央指示,带着患病之躯,从蛟洋到达汀州与红四军汇合,按中央指示担任前委书记。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按照中央九月来信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同日,毛泽东向中共中央写了这封报告信。

在信中,毛泽东首先汇报了红军进攻梅县虽遭受一定损失,但官兵士气仍然高昂的情况,建议红四军暂在福建境内开展活动,因为福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体现了毛泽东一切从实际出发,相信群众,充分依靠群众的工作态度。其次,毛泽东指出,敌人虽三路“会剿”,但形势并不严重。红军只要休整一个时期,准备够一个月的给养,打败“会剿”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展现了毛泽东虑事周密、胸有成竹的革命英雄主义、乐观主义精神。但他在

信中着重提到党员理论素质较低,急需加强教育的问题,要求中央多寄些理论刊物和著作,以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正确的革命实践要有正确的革命理论来指导的远见卓识,以及在军队建党工作中所做的艰苦努力。早在工农红军初上井冈山时,毛泽东针对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革命情绪因大革命失败严重挫伤,各级政权落到地主豪绅手里等现实问题,首先恢复和建立各级党组织。著名的三湾改编后,把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民主制度,古田会议又针对部队党建的新情况、新问题,突出了党的思想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提出了党内学习的内容,列举了党员教育的种种方法,提高了干部战士觉悟,增强了部队战斗力。

此信反映了毛泽东服从中央领导,顾全大局、认真工作的高尚情操。毛泽东病愈后从蛟洋到达长汀,马上按照中央指示开展工作,认真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并得出“打破会剿局面,才是出路”的结论,为了革命利益不受损失,勇于忍辱负重,捐弃前怨,埋头工作,可见他对革命事业极端忠诚、负责的态度。

此信还反映了毛泽东加强团结、理论联系实际的务实态度。在早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很注重团结的力量,他常常比喻“一根筷子容易折,一把筷子折不断”。面对敌人的“会剿”,毛泽东首先想到的是团结,只有团结才有力量。但由于当时红四军干部、战士的素质在短期内没有得到提高,部队中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以及极端民主化思想都普遍存在,这就对红四军党内的团结造成了不利影响。然而,即使如此,也总是有办法的,那就是必须用共同的理论武装头脑,用崇高的信仰指导行动。所以,毛泽东针对“党员理论常识太低”的现状,提出了“望得书报”的“如饥如渴”的要求,并特别提醒“勿以事小弃置”。

通观全篇,语气诚恳,充满信心,语言生动,情真意切,表达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正是在毛泽东积极探索和艰苦努力下,红四军党的建设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并在全中国得到了推广,红军在思想上、组织上不断发展,不良倾向得到克服,政治影响进一步扩大,军民关系更加密切,农村革命根据地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 “共产主义的敬礼”

——致李立三<sup>[1]</sup> (1929年11月28日)

立三兄：

多久不和你通讯了，陈毅<sup>[2]</sup>同志来才知道你的情形。我大病三个月，现虽好了，但精神未全复元。开慧和岸英<sup>[3]</sup>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不知通信处。闻说泽民<sup>[4]</sup>在上海，请兄替我通知泽民，要他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并要他写信给我。

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独秀近来行动<sup>[5]</sup>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地宣传。

共产主义的敬礼

毛泽东

邮政通信处<sup>①</sup>

附注②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原名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李明、柏山等。早年曾在湘军中服役。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中共安源煤矿支部书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同刘少奇等一起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赴苏联出席莫斯科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扩大会议和赤色职工国际会议。1926年回国。在第三、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先后任组织部长、秘书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在香港、广州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以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成员之一。1930年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失。1931年去苏联学习，曾出席共产国际七大，并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和在莫斯科外文出版局工作，任中文部主任，主持翻译了多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苏联“肃反”期间曾受到迫害。1946年春回国，先后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后改城工部)部长、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副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劳动部长、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曾当选为中共第四至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

迫害,1967年6月22日含冤去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平反昭雪。著有《中国职工运动简论》、《五卅运动史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

〔2〕陈毅,参见本书第313页注〔1〕。

〔3〕开慧,即杨开慧(1901—1930),湖南长沙人,又名霞,字云锦。毛泽东夫人。1920年入长沙福湘女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后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返回长沙从事地下革命斗争。1930年10月因叛徒出卖被捕,坚贞不屈,同年11月14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

岸英,即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参见本书第257页注〔1〕。

〔4〕泽民,即毛泽民(1896—1943),湖南湘潭人,字润莲,毛泽东之弟,1922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曾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1925年4月到广州参加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后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1931年7月赴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军区经理部部长。1932年2月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家银行行长。参加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新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代理厅长、民政厅长。1942年9月被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秘密杀害。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出版部的工作。

〔5〕指陈独秀当时在党内散布托派观点,成立小组织等反党活动。陈独秀,参见本书第81页注〔4〕。

〔6〕现在保存的此信的抄件中,引号内空缺。

【附录】

## 【赏析】

毛泽东与李立三同是工人运动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共同领导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等一系列革命活动,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1927年冬至次年春,李立三当时已成为中央的实际负责人。陈毅到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时,向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李立三、周恩来等同志汇报了红四军两年来的情况和问题,并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起草了历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陈毅回来以后,将中央指示作了传达。同时将李立三在中共中央工作的情形告诉了毛泽东。于是,共同斗争的往事牵起了毛泽东对李立三的想念。自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由于白色恐怖及当时极其困难复杂的环境,两人一直没有联系。“多久不和你通讯了”一句,既有难言的牵挂,又有无尽的思念,显得思绪饱满,情真意切。两年间,斗争的惊涛骇浪,身体状况的恶化,别妻离子的相思都深深触动着毛泽东的感情深处。开慧及爱子处境如何呢?杨开慧同毛泽东结婚后一直协助他开展革命活动,还参加过毛泽东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曾跟随毛泽东遍足湖南五县,考察农运。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杨开慧却根据党和毛泽东的指示回到长沙板仓坚持地下斗争。两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消息杳无所知,甚至连通讯地址都未曾知道。在风雨飘摇的白色恐怖里,杨开慧为了革命,处境险恶,毛泽东虽重任在肩却无时无刻不在挂念。“开慧和岸英等我时常念及他们,想和他们通讯”一句,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思恋之情。“把开慧的通信处告诉我”一句,足以看出毛泽东对

杨开慧的忠贞和思念。然而,他们都想不到,仅仅一年以后,由于叛徒出卖,杨开慧就被反动军阀何键杀害于长沙。

此信还表达了毛泽东渴求知识,为革命索读书报的迫切愿望。毛泽东酷爱读书,从小就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儿时的传奇小说到青少年时期的马列主义书籍,革命活动越深入,他读书的要求就越强烈。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像攻城略地那样地占有知识,是他丰富见识、增进才干的一条重要途径。毛泽东的斗争策略所以具有更高的哲理性和科学性,就是因为他爱读书,善读书,能从书中悟出深奥的道理,批判地继承大量的民族智慧和决策经验,找到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以增长斗争的智慧和能力。但在当时的环境和条件下,毛泽东却很难找到更多的书本。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索书要求,正是革命斗争的需要。

信末一段有力地谴责了陈独秀的反党行为。毛泽东当年曾经从陈独秀、李大钊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十分钦佩,并盛赞陈独秀大力倡导“科学”与“民主”的“至坚至高精神”,并“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但当陈独秀陷入右倾机会主义泥潭,公开进行反党活动时,毛泽东自然不能容忍,这就产生了他早年所说的“主义之争”。他深恶痛绝地驳斥道:“岂有此理”。对中央的驳议文件他表示应当普遍地宣传。“共产主义的敬礼”,反映了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无限忠诚和执著追求,以及愿同李立三等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定决心。

此信在艺术上有一鲜明的特点,那就是情与理的巧妙结合。通篇观之,思路清晰,气势贯通,先情后理,以理辅情,给书信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致林彪<sup>[1]</sup>（1930年1月5日）

在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的行动问题上，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缺少正确的认识。他们虽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来，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他们不赞成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在福建、广东、江西之间的三个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同时也没有在游击区域建立红色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此也就没有用这种红色政权的巩固和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观念。他们似乎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再来一个全国武装起义，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他们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他们的这种理论的来源，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件事认清楚。如果认清了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则一，就会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国有这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长期混战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战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何以始终不能有一个统一的政权。二，就会明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因之，也就会明白农村起义何以有现在这样的全国规模的发展。三，就会明白工农民主政权这个口号的正确。四，就会明白相应于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一件怪事而产生出来的另一件怪事，即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伴随着红军和游击队而来的，成长于四围白色政权中的小块红色区域的存在和发展（中国以外无此怪事）。五，也就会明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会明白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sup>[2]</sup>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切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sup>[3]</sup>，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这种估量，多半是从主观主义出发。其结果，无疑地是要走上盲动主义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切当的估量，又必

然要产生另一方面的坏结果。因此,在判断中国政治形势的时候,需要认识下面的这些要点:

(一)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脆弱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这样就可以解释现在西欧各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比现在中国的革命的主观力量也许要强些,但因为它们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比中国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力量更要强大许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时爆发革命。现时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因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对地弱的,所以中国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会比西欧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这在五卅运动<sup>[1]</sup>及其以后的大革命运动已经得了充分的证明。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三)对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这样,决不可只看它的现象,要去看它的实质。当湘赣边界割据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当时湖南省委的不正确的估量,把阶级敌人看得一钱不值,到现在还传为笑谈的所谓“十分动摇”、“恐慌万状”两句话,就是那时(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统治者鲁涤平<sup>[2]</sup>的形容词。在这种估量之下,就必须要有产生政治上的盲动主义。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sup>[3]</sup>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sup>[4]</sup>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其实,那时英、美、日在中国的斗争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蒋桂冯混战的形势业已形成,实质上是反革命潮流开始下落,革命潮流开始复兴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不但红军和地方党内有一种悲观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时也不免为那种表面上的情况所迷惑,而发生了悲观的论调。中央二月来信<sup>[5]</sup>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四)现时的客观情况,还是容易给只观察当前表面现象不观察实质的同志们以迷惑。特别是我们在红军中工作的人,一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追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把这种一时的特殊的小的环境,一般化扩大化起来,仿佛全国全世界的形势概属未可乐观,革命胜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这种抓住表面抛弃实质的观察,是因为他们对于一般情况的实质并没有科学地加以分析。如同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来,只有详细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种矛盾是否真正向前发展了,才能作决定。既然国际上帝国主义相互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之间、帝国主义和它们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发展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一迫切,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因此就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一天天扩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战,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发展起来。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

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因为反动政府在粮饷不足的条件之下无限制地增加军队,并因此而使战争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众经常处在困苦的环境之中。因为国家的赋税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战祸的日广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国的灾荒和匪祸,使得广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为无钱开学,许多在学学生有失学之忧;因为生产落后,许多毕业学生无就业之望。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

上面的话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给中央的信中,就已经有了。那封信上说: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七日)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国民党三次‘进剿’井冈山<sup>[10]</sup>,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为止,往后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革命潮流逐渐升涨。党的战斗力组织力虽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渐低落的形势之下,恢复一定很快,党内干分子的消极态度也会迅速消灭。群众是一定归向我们的。屠杀主义<sup>[11]</sup>固然是为渊驱鱼,改良主义也再不能号召群众了。群众对国民党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灭。在将来的形势之下,什么党派都是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的。党的六次大会<sup>[12]</sup>所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党(在大城市中)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举行暴动。但是革命的发展将是很快的,武装暴动的宣传和准备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大混乱的现局之下,只有积极的口号积极的态度才能领导群众。党的战斗力的恢复也一定要在这种积极态度之下才有可能。……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胜利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的建立,中心区域产业支部的创造,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重要任务;但是在同时,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这封信对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有如下的答复:

“中央要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

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过,而且多次实行过,但是都失败了。因为:(一)主力红军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卫队来历不同。(二)分小则领导不健全,恶劣环境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四)愈是恶劣环境,队伍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决奋斗,方能团结内部,应付敌人。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

这一段话的缺点是:所举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极的,这是很不够的。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这样才能耸动远近的视听(所谓扩大政治影响),才能于促进革命高潮发生实际的效力。例如我们前年干的湘赣边界政权,去年干的闽西政权<sup>[12]</sup>,都是这种兵力集中政策的结果。这是一般的原则。至于说到也有分兵的时候没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给中央的信上说了红军的游击战术,那里面包括了近距离的分兵:

“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sup>[13]</sup>,用波浪式的推进行策。强敌跟踪,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

这里所谓“打开”,就是指近距离的分兵。例如湘赣边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时,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在永新境内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时,二十八团往安福边境,二十九团往莲花,三十一团往吉安边境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的赣南各县的分兵,七月在闽西各县的分兵。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若不能达到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败,削弱了红军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赣边界分兵打郴州那样,则不如不分为好。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中央那时还有一个通告,谓蒋桂战争不一定会爆发。但从此以后,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体上说来就都是对的了。对于那个估量不适当的通告,中央已发了一个通告去更正。对于红军的这一封信,虽然没有更正,但是后来的指示,就没有那些悲观的论调了,对于红军行动的主张也和我们的主张一致了。但是中央那个信给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响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觉得就在现时仍有对此问题加以解释的必要。

关于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后来又在于都有一次决定。当时指出的理由,见之于给中央信上的,如下:

“蒋桂部队在九江一带彼此逼近,大战爆发即在眼前。群众斗争的恢复,加上反动统治内部矛盾的扩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来。在这种局面之下来布

置工作,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赣浙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sup>[14]</sup>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十四团,但郭<sup>[15]</sup>旅已被击破;陈卢<sup>[16]</sup>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sup>[17]</sup>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sup>[18]</sup>,熊式辉<sup>[19]</sup>两部共有十六团,比闽浙军力为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论,赣北之德安、修水、铜鼓尚有相当基础;赣西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党和赤卫队的势力是依然存在的;赣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丰、兴国等县的红军第二第四团有日益发展形势;方志敏的红军并未消灭。这样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围的形势。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

上面争取江西的话,不对的是规定一年为期。至于争取江西,除开江西的本身条件之外,还包含有全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条件。因为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便决不能得到一年争取江西的结论。那个建议的缺点就是不该规定为一年,因此,影响到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所谓“快要”,也不免带上了一些急躁性。至于江西的主观客观条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观条件如给中央信上所说外,客观条件现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点:一是江西的经济主要是封建的经济,商业资产阶级势力较小,而地主的武装在南方各省中又比哪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没有本省的军队,向来都是外省军队来此驻防。外来军队“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远非本省军队那样关系切身,往往不很热心。三是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比较远一点,不比广东接近香港,差不多什么都受英国的支配。我们懂得了这三点,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的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了。

所谓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释,这点是许多同志的共同的问題。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婴儿。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是为答复林彪散发的一封对红军前途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的信。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批评了当时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一种悲观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在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的时候,这封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指名批评林彪的地方作了删改。林彪，参见本书第114页注〔1〕。

〔2〕方志敏，参见本书第106页注〔16〕。

〔3〕这里所说的“革命的主观力量”，是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

〔4〕五卅运动，指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5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的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在5月15日枪杀了工人顾正红，并伤工人十余人。29日青岛工人被反动政府屠杀八人。5月30日，上海二千余学生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进行宣传讲演，一百余名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6月，英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继续进行屠杀。这些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的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高潮。

〔5〕鲁涤平（1887—1935），湖南宁乡人。1928年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

〔6〕指1929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战争。

〔7〕1928年7月至11月，江西、湖南两省的国民党军队两次“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后，又于同年底至1929年初调集湖南、江西两省共六个旅的兵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毛泽东等周密地研究了粉碎敌人“会剿”的计划，决定红军第四军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以红四军的一部配合红五军留守井冈山。经过内外线的艰苦转战，红军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曾经被敌人一度侵占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8〕指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给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的信。本文中引录的1929年4月5日红军第四军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该信的内容，主要是关于当时形势的估计和红军的行动策略问题。中央的这封信所提出的意见是不适当的，所以前委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9〕这里是指湖南、江西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

〔10〕指反革命势力对付人民的革命力量采用血腥屠杀的手段。

〔11〕指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举行。

〔12〕指福建西部长汀、龙岩、永定、上杭等县的工农民主政权，它是红军第四军主力1929年离开井冈山进入福建时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

〔13〕“固定区域的割据”指工农红军建立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14〕蒋伯诚，当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

〔15〕郭，指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

〔16〕陈卢，指福建的著匪陈国辉和卢兴邦，他们的部队在1926年被国民党政府收编。

〔17〕张贞，当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8〕朱培德，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

〔19〕熊式辉，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委员、第五师师长。



## 【赏析】

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投入了新的战斗之中。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此后党又领导了大小武装起义上百次,开辟了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到1930年上半年,红军已达7万人。尤其是毛泽东、朱德所建立的井冈山和湘赣根据地,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与此同时,党内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部分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产生了愤慨和报复情绪,他们一方面对白色恐怖极端仇恨,另一方面又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痛心疾首,害怕再犯类似错误,因而出现“左比右好”的错误观念,这种情绪与当时共产国际提出的“不断革命论”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另一种是“右倾悲观思想”,一部分同志继续照搬从巴黎公社到俄国十月革命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认为摧毁资产阶级反动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是在全国革命高潮到来、全国武装总起义时才能办的大事,在平时是不应当实行的。在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艰苦历程中,林彪等就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这种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还有一部分同志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看不到敌人营垒中的矛盾,特别是遇到败仗,或四面被围,或强敌跟踪时,便把一时的局部挫折或困难当成全局看待,只看到大革命失败所造成的损失和革命力量的弱小,看不到继续发展的条件,只看到中国革命力量不如西欧的工人阶级强大,而不知中国反动势力之间的矛盾比西欧更复杂、剧烈。由于对客观形势的悲观估计,所以他们对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扩大革命影响,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缺乏信心,在强敌的残酷进攻面前对红色政权的发展前途表示怀疑。有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当时在红四军工作的林彪给毛泽东的信,就代表了这种右倾悲观情绪。如果不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革命就难以继续前进。为此,毛泽东继《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之后,于1930年1月5日给林彪写了这封信。

此信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一锐利武器,科学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批判了夸大革命主观力量的盲动主义和看不到革命力量发展的悲观思想。毛泽东一方面批评了犯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指出他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反革命力量,走上盲动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小看革命的主观力量而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的悲观主义。盲动主义者寄希望于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以为是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全国的胜利已经迫近。悲观主义者对在农村搞革命根据地缺乏热情和信心,主张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都做好了,然后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来一个全国的武装起义,来一个全国范围的大革命。实际上,这仍是把革命的惟一希望寄托于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把农村革命根据地只看作是权宜之计。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红色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尖锐化的产物。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农村政权,深入土地革命,扩大人民武装的道路,才能树立革命群众的信心,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使之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从而

促进革命高潮的到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认为,革命高潮并非遥远无期,要以积极的态度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不承认革命正处于低潮这个客观事实,把低潮当作高潮,搞“左”倾盲动是错误的;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不相信革命高潮会迅速到来,怀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前途,同样也是错误的。毛泽东对如何透过现象把握实质,作了最生动的示范。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整体出发,分析当时敌我双方各个侧面的矛盾,并将这些矛盾联系在一起,这些矛盾已经引起或将会引起另一些矛盾,每一对矛盾虽有其主导方面,却又在斗争中互相转化。由此,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于当时具体情况的斗争策略,把革命群众的主观能动作用充分调动起来,去促使矛盾迅速向利于革命的方向转化,因而得出了“星星之火”,很快“可以燎原”的结论,得出革命高潮就快要到来的结论。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科学的分析,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就绝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而好像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这封信充分估计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在中国革命中的意义和作用,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光辉思想,指明了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对及时纠正党内两种错误倾向,为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江西中央红军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当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语调高昂,言辞犀利,振聋发聩,极富有思辨色彩和鼓动性,是这篇书信的突出特点。毛泽东运用客观、冷静、犀利的笔锋,剖析了盲动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的错误,指出其要害,并站在历史的大纵深的角度,俯瞰世界乃至中国的风云变幻,得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全信格调高亢,论理深刻,层层剖析,如暴风骤雨,酣畅淋漓,饱蘸革命激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量,从精神上、思想上引导人们为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奋斗。使用排比句是此信的另一特色。如:在阐述认清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这一国情的意义时,毛泽东一连用了六个“就会明白……”的句子,构成了昂扬气势,产生了无可辩驳、鼓舞人心的说理效果。再如,在列举江西的客观条件时,用了“一是……”、“二是……”、“三是……”,构成了一种气势,使事实环环相扣,强化了语气。此外,信中还大量运用了比喻句。如把盲动主义者说成是“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把革命的力量说成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把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比作“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等,使书信形象生动,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 “严厉督促,不稍疏忽”

——致江西省行委<sup>[1]</sup>(1930年11月20日)

省行委转左路行委,赣西行委,湘东特委:

(一)我到水南知道这方面对于应敌工作,已有相当的准备。各乡开了群众大会,全区开了活动分子会,坚壁清野亦有准备。特别是对白军士兵的宣传工作做得好,水南街上房内房外都写满了标语、宣言和歌谣,又组织白军士兵运动委员会。这样看来,水南的应敌工作,比儒坊区之一点没有做,吉安洋油大部未搬,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要好得多。以儒坊区及吉安的情况推之,西区儒林区、纯化区、泰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于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恐怕亦相差不远。此时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去指示时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要指出分宜县委县政府之全部覆灭,新余县委县政府曾受重大损失,峡江紧急会议被敌人冲散,吉安无盐并以洋油和万多斤盐资送敌人等等严重的教训。

(二)报载六十师三团从鄂南开动,五日完毕,六十一师继续开拔,从莲花方面进攻赣西。除永新安福两县委县苏<sup>[2]</sup>要飞速准备应敌外,湘东特委尤要飞速准备应敌。对于牵制蒋蔡两部<sup>[3]</sup>(这是敌军主力),湘东群众和独立师要担负很大的责任。一进到永新、安福、泰和、吉安等地,赣西行委就要指导各地群众,实行牵制该敌,同时已进到吉安之敌,要想尽方法去牵制他,务使蒋蔡罗李<sup>[4]</sup>四师不能渡过河东。在这个任务下,红军第三军负了很大的责任。上述许多工作,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都要指导。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截至现在,好像没有行使他的职务,既没有发一个通告给各地指示工作,又没有发一个通报到各地报告敌情,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湘东方面左委左部都要指挥,就是省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西行委对于湘东行委、赣东行委、赣南行委属境,亦不能在这紧张时候断然划分区域,不加指导,如近日开的赣西行委扩大会,赣西各县委员等联席会,雇农代表大会,均不邀莲花、萍乡、兴国、宁都、永丰的代表到会(至少应该邀他们列席旁听),真是非常之不应该。

(三)水南区还不知道只发柴、菜钱,不发油、盐、米钱的事,别处还是相同,对于供给红军油、盐、米一事,当没有接得通告。我要财政部派两人,一往永丰、宁都,一人往纯化、水南、陂头、白沙、东固办理红军给养问题,财政部负责人员多答应了,实际并没有做,等两天红军到了这些地方,油、盐、米问题全仍然不能解决。特别是盐,须预从省政府的盐中挑一部到这些地方,方能供给红军,不用钱买。筹款一事,一百二十万元还只有二十三万元到手(此二十三万元无论何人非得总前委命令,不能支用分文,务望注意),非努力进行筹款不可。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是为重要。省委应该每天开一次会,召

集省苏<sup>[1]</sup>负责人参加,集中指导一切。

(四)我们今日可到白沙,明日可到藤田,望省委、左委、赣东行委、赣西行委、二十二军军委,每天各有一信送总前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湘东行委最近报告(内述独立师缴枪五百余等事的)在安<sup>[4]</sup>收到。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水南写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信。

[2]县苏,县苏维埃的简称。

[3]蒋蔡两部,指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第六十师和第六十一师,师长分别为蔡廷锴和蒋光鼐。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北伐、东征和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后任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时,率部进行抵抗。后来奉调福建执行“剿共”任务。1933年,同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期间曾一度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抗战胜利后,积极投身民主革命运动。1946年3月,与李济深、李章达等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反对内战,主张民主,要求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1948年1月,在香港参加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冬,赴北京。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国解放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在北京病逝。

蒋光鼐(1887—1967),抗日将领。字憬然。广东东莞人。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3年后,历任粤军营长、团长、副师长、副军长、军长。1929年,粤军改编,任六十一师师长。1930年,六十一师与蔡廷锴的六十师合编为第十九路军,任总指挥。1931年,在江西围剿工农红军。同年,所部调往上海,任淞沪警备司令。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上海,率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进行抵抗。1932年7月,十九路军转驻福建,任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1933年11月,与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发动反蒋的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财政部长。失败后,去香港。1935年,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反蒋,主张联共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参加抗战,未能取得实权。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1946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1967年6月,在北京病逝。

[4]蒋蔡,指蒋光鼐、蔡廷锴。罗李,指罗霖、李觉,当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九路军第三纵队第七十七师师长和第十九师师长。

〔5〕省苏，省苏维埃的简称。

〔6〕安，指江西吉安。

## 【赏析】

在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思想的指引下，1930年下半年，工农武装割据已呈星火燎原之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尤其是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更使蒋介石寝食难安，视为心腹之患。1930年10月，蒋、冯、阎中原大战刚刚结束，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以10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声称三至六个月内肃清红军。蒋介石亲自发布命令，为这次“围剿”制定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的作战方针，布置三路大军，由北向南，从吉安、建宁一线，企图将红军主力压至清江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地区，聚而歼之。

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在罗坊主持召开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合会议，研究如何抵制立三路线，粉碎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针对蒋介石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毛泽东提出了撤开两手、诱敌深入、歼敌于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东渡赣江，退到根据地内部作战，利用根据地的优越条件，充分依靠民众实行人民战争，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打破敌人的进攻，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11月1日，毛泽东、朱德在罗坊园前村发布命令：“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使其疲惫而歼之。决心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干、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红军按照毛泽东、朱德的指示，相继从袁水两岸地区转移，东渡赣江，首先到达樟树、抚州、永丰地区，迅速展开群众工作，打土豪筹款，做好了反“围剿”的准备。11月20日，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这封信。

全信共分三层意思。

首先，通报了水南应敌工作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对水南的准备工作无论是在发动群众，还是在对白军士兵宣传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批评了儒坊区的应敌工作不力。“吉安洋油大部未搬，盐没有搬完，宣传工作不力”，依此类推，“西区儒林区、纯化区、泰和、永新、莲花、安福、永丰、兴国，尤其是东路的于都各地的应敌工作，准备工作”，也不会太好。信中指出，大致当前，备战不力，是相当危险的。当时，红军仅4万人，且装备落后，面对生死考验，不积极备战等于坐以待毙。所以，毛泽东严正建议：“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为了消除大家的松懈和麻痹情绪，集中精力认真备战，毛泽东对于省行委如何指示作了具体建议：要指出吉安打下后大家以为天下太平了的错误观念，同时要求吸取分宜县委、政府全部覆灭，新余县县政府的重大损失及峡江紧急会议被敌冲散等的严重教训，作为前车之鉴，以引起大家的警觉。

其次，分析了敌情，对省行委、左路行委、湘东特委工作中的一连串失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从报上得到消息，国民党第六十师已从鄂南开动，六十一师继续开拔，攻入赣西。大敌当前，毛泽东指示永新、安福两县苏维埃要飞速准备迎敌，湘东特委尤要飞速准备迎敌。为牵制敌人，使蒋光鼐、蔡廷锴、罗霖、李觉四师不能渡过河东。毛泽东要求独立师、红军第三军各负其责，但当时的情况都令毛泽东大为不满：左路行委和左路指挥部，



既不通告工作,也不报告敌情;省行委对湘东行委,赣西行委对湘东行委,赣东行委,赣南行委属境划分区域,不加指导。对此,毛泽东严厉批评道:“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真是非常之不应该。”

第三,此信表达了毛泽东对红军给养问题的指示和关心。由于省行委,赣西行委不加指导,水南区消息封闭,“对于供给红军油、盐、米一事,当没有接到通告”,毛泽东曾要财政部派一人往永丰、宁都,一往纯化、水南、陂头、白沙、东固,办理红军给养问题,但财政部负责人说得多,实际并没有做。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他严肃地指出,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他要求省委重新计划,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每天开一次会,集中指导一切。最后,毛泽东要求省委、左委、赣东行委、赣西行委,“务使消息灵通为要”。

全信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主题鲜明,凝炼集中。作为新型人民军队的领袖,毛泽东信念坚定,策略得当,战略科学,对于打败敌人“围剿”,已经成竹在胸,但他也同样关注战术上的准备工作。这封书信紧紧围绕备战,从物质上、思想上予以了高度重视。在物质上,他强调的是红军的给养和财政问题,他深深地知道,财政和给养对于反“围剿”的重大作用,要顾及到“围剿”时间之长,给养准备之足,否则,就陷入被动。在精神上,他强调对敌情要进行调查分析和研究。他在后来总结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毛泽东讲的是战前的思想准备和调查分析。在此信中,毛泽东特别强调要互报敌情,使消息灵通,做到知彼知己,百战百胜。

二、语言简练,准确有力,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号召力。如“值得省委推动赣西赣东两行委及湘东特委重新严格的指示一次”、“要飞速准备应敌”、“实在是非常之大的缺点,以后非改变不可”、“真是非常之不应该”、“务望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是为重要”等等句式,显得简练明快,节奏鲜明,果断干脆,与战事紧急气氛相吻合,显示出强烈的鼓动性,使人读后不容懈怠,精神振作,奋然而起。

通篇书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战略确定以后,非常重视战术问题。由于毛泽东、朱德的正确领导,全体红军的奋勇作战,短短五天,红军连战连捷,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毛泽东为此挥笔写道:“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万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 “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

——致周以栗、谭震林<sup>[1]</sup>等(1931年6月28日)

以栗同志转边界工作委员会

震林同志转十二军军委：

此次十二军工作区域分得不妥当，清流、连城应让第十二军作第二步工作区。十二军中心任务应不是筹款，而是建立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的工作。十二军担任这三县，三十五军担任瑞金一县，三军担任于都会昌二县，均以两个月（七八两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四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十二军两个月要做三县工作不是容易的。一次战争<sup>[2]</sup>后，四个月中十二军做了石城一县宁南<sup>[3]</sup>半县工作，现在宁南是半色区域，石城是全区。过去成绩如此，现要两个月做三县工作是必然难做好的，必定要增加工作时期才行。若推广到清连二县，并且把十二军主力三十四师摆到二县去，那末十二军工作将又是毫无效果。因此须变更康都决议<sup>[4]</sup>，把三十四师迅速调返来，使他担任宁化全县，三十五师担任石城全县，三十六师担任长汀全县，军直属队在三县之间。望坚决照此布置。

依大局看来，过去所拟三军团去二崇<sup>[5]</sup>、四军去宁安<sup>[6]</sup>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sup>[7]</sup>，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乃由我们一身遮断两广反蒋视线，使之集注于我们自己，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我们不应如此蠢。去南丰以北，目前事实上既不许，整个策略上亦不宜。因一则无巩固政权可能，二则威胁长江太甚。西南北三面都不可，便只有东方是好区域。第一、蒋系地盘，无直接威胁两广之弊。第二、地势偏僻，即不受威胁，若较之我们出南丰，宜黄者为小。第三、有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第四、有款可筹，军以内不愁给养。第五、群众很多，可以出兵扩大红军。因有这些条件，我们应该在这区域作长期工作计划。三军团应以建宁、泰宁、将乐为工作区域，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域。四军应以归化<sup>[8]</sup>、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尤溪为筹款区域，即在三县筹款自给。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筹款自给。赣东独立师的中心工作区是广昌，使之联系建宁与石城。所谓工作区都是要分配土地、建立政权的。筹款区只打土豪，做宣传，而不分田地，不建立政权。工作时期暂定两个月，延长下去可到六个月。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十二军在宁化、长汀、石城工作，要力戒二期在石城，最近在建宁工作之失败（石城游击队尽是流氓，富农，通通反了水），要来一个彻底的转变，坚决反对群众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如若三县工作再如过去建宁、石城一样，那末军委和三个师委须负严重的责任。

总前委 毛泽东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十时于建宁

石城信所说三个月工作时间须缩短一个月,因敌进攻紧迫。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周以栗(1897—1934),湖南长沙人,字子慎。早年在长沙周南女校执教。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中共党团书记。1927年1月与毛泽东一起创办武昌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务主任。同年12月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兼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红军总前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瑞金红军中央军政学校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内务人民委员。1934年11月赴上海治病途中,在江西于都与国民党政府军队作战中牺牲。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委员。

谭震林(1902—1983),湖南攸县人。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和中共茶陵县委书记。参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后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第二纵队政委和第四纵队政委,红一军团第十二军政委、福建军区司令员。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闽西,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三支队政委,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苏浙军区政委,新四军第二师政委兼中共淮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华中野战军政委、华东野战军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1949年5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红军第十二军政治委员。

[2]一次战争,指红军第一方面军进行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3]宁南,指江西南都县南部。

[4]1931年6月21日至22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丰县康都圩召开第九次会议,讨论时局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行动方针以及战场布置等问题。会议决定第三军团向将乐逼近,占领将乐、顺昌两县,筹款60万;第十二军分兵在宁化、清流、汀州工作,筹款15万;第四军(缺一个师)迫进沙县、归化、永安,筹款40万;第三军两个师进占南丰,限前进到里塔圩,如敌不退,只留一师在兴国、于都边。

[5]二崇,原件如此,疑为江西上犹、崇义。

[6]宁安,原件如此,疑为江西定南、安远。

[7]1931年5月,广西的李宗仁,广东的陈济棠联络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对峙。

[8]归化,旧县名,即今福建明溪县。

## 【赏析】

第一次反“围剿”中,毛泽东等神机妙算,运筹帷幄,红军五天两捷,以弱胜强,歼敌过万,大显神威。蒋介石不甘失败,调兵遣将部署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蒋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坐镇南昌,厚集兵力20万,严密封锁,逐渐紧缩包围圈,欲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蒋介石吸取战前教训,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进犯苏区腹地。毛泽东、朱德指挥3万红军,充分准备,严阵以待。3月20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就第二次反“围剿”的政治准备工作发布通令,分析了目前敌我形势和我军胜利条件,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规定红军及地方游击队高呼革命口号:1.勇敢冲锋!2.拼命杀敌!3.拥护共产党!4.拥护苏维埃!5.活捉何应钦!6.打倒蒋介石!7.二次战争胜利万岁!8.工农解放万岁!他要求地方武装运用扰、堵、截、疲、诱、捉、盲、饿、侦、袭“十字诀”战术和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方法,争取群众,瓦解敌军,配合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高瞻远瞩,力排众议,耐心诱导,使大家接受“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和“就地打仗,诱敌深入”的方针。从5月16日开始,红军势如破竹,首战告捷,一鼓作气,15天行程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缴枪2万余,痛快淋漓地粉碎了敌第二次“围剿”。蒋介石气急败坏,痛哭失声。毛泽东则豪情万丈,赋词一首: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里如卷席。有人泣,步步为营嗟何及!

第二次“围剿”再告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信誓旦旦“不灭共匪,即舍命疆场。”毛泽东料想蒋介石不会善罢甘休,审时度势,统筹兼顾,不懈地谋划着新的部署。当时国民党内部分又发生新的争斗。5月底,两广军阀在广州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旨在同南京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则伺机南进,要和蒋介石再争高低。毛泽东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暂时的守势,立即令红军准备转入攻势作战。1931年6月21日至22日,红军第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在江西南丰县康都圩召开第九次会议,讨论了时局和第三次反“围剿”的行动方针以及战场布置等问题。为了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针对第九次会议的布置,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就红军分散工作区域问题给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西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栗和红军第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写了这封信。

全信立足形势发展的大背景,客观、全面地分析了时局。对红军工作区域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敌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指出:“十二军工作区域分得不妥当”,毛泽东既不赞成第十二军分兵清流、连城,也不主张把筹款当作中心任务,而是主张深入宁化、石城、长汀三县,三军不应进占南丰,而应去于都、会昌两县;三十五军负责瑞金一县的工作;利用七八月份,真正解决分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四个问题,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这才是红军的中心任务。毛泽东还从大局出发,指出过去所拟三军团去二崇、四军去宁安的计划,不但客观上帮助蒋介石打击两广,为蒋介石所大愿,并且要很快引起两广的对共行动,必然要促进蒋粤妥协对共的过程,对革命不利。毛泽东以充足的理由提出了向东发展的主张。最后,毛泽东指示,三军团应以建宁、泰宁、将乐为工作区域,分田地、建政权,以顺昌、邵武、光泽为筹款区,打土豪,做宣传。四军应以归化、清流、连城为工作区域,以沙县、永安、尤溪为筹款区

域,三十五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三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赣东独立师以广昌为工作区域,联系建宁与石城,这样就会真正做到使于、瑞、石、宁、会、汀六县连成一片,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

此信从提出问题,分析原因,指出方向到制定办法,层层展开论述,显得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推理自然,层层深入,水到渠成。此信语言质朴,言辞诚恳,既有对形势的客观分析,又有对工作区域的科学安排,如同摆棋布子,布局谋势,高屋建瓴,疏密得当,加之书信说理精辟,论证严谨,读后使人很受启发,恍然顿悟,信心大增。

## “诱敌深入”

——致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1932年9月中旬)

中央局急转鄂豫皖分局：

寒电悉。

(一)此次敌集结兵力分进合击我鄂豫皖苏区，整个形势已不同于去年，但其战略战术颇似去年三次“围剿”对付中央区之并进长追，并益以坚守据点稳打稳扎。

(二)因此我们建议，红四方面军目前应采取相当的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于我们的地方，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这样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

(三)这三次战斗中的战略与战术的经验，你们可以根据目前形势与四方面军的优点灵活运用。

(四)红十六军在通山、咸宁的两次胜利，这次一方面军向北发展的胜利的开始，均是对鄂豫皖的配合策应行动。湘鄂西应在打击敌人一方的便利条件下，以一部分兵力向京汉路西行动。

中央局在前方的 周毛朱王<sup>[1]</sup>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周、毛、朱、王，是指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和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 【赏析】

1932年6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纠集十万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他制定“三步走”计划：第一步是对鄂豫皖红军根据地造成“圆锥式”包围；第二步是突入鄂豫皖红军根据地，占领集镇，控制要道，寻红军主力作战；第三步是对鄂豫皖红军根据地实行分区“清剿”。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临时中央要求鄂豫皖红四方面军除以二十五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等主力，

以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和武胜关之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威吓武汉,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张国焘推行比王明还要冒险的进攻战略,命令红军迎击、决战,以坚决的不停顿的进攻,夺取武汉等中心城市,并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以完成一省与数省的胜利。8月上旬,鄂豫皖根据地大敌压境。敌人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遇红军主力则据地固守,待援合围击破红军主力后,则并进长追,四面围截。红四方面军面对严重局势,仍然贯彻“不停的进攻”方针,在战略或战役上被动应付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奋战月余,终因寡不敌众,撤离豫东南。9月中旬,红四军向皖西根据地转移。在转移途中,张国焘等红四军领导人致电中央,报告了鄂豫皖红军的转战情况。电报指出:敌分路合进,每路均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正移师皖西……我军最大的困难即补充人员不易,医院中现有近万名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缺医生缺药……请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9月13日,苏区中央局向在中央根据地前方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转发了这份电报。接电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并要求急转鄂豫皖根据地。

这份电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思想。诱敌深入,是毛泽东战略战术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指出: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时,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他说,战略退却,“江西叫做‘诱敌深入’,四川叫做‘收紧阵地’。从前的军事理论家和实际家也无不承认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时在战争开始阶段必须采取的方针。外国的军事家就曾这样说:‘战略守势的作战,大都先避不利的决战,使至有利的情况始求决战。’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这里,毛泽东把诱敌深入叫做战略退却。在他看来,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的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战略步骤。无数事实说明,当敌人举行大规模“围剿”时,红军一般的作战原则是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作战,因为这是使红军最有把握地打破敌人进攻的办法。

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就曾提出“诱敌深入”战略战术,指挥红军在强敌进攻面前,先行战略退却、战术舍弃,即在重要地区寸土不让,在非重要地区敢于舍弃,直至诱敌深入到预定地点。毛泽东强调指出,在红军力量很弱小,根据地尚不巩固,敌强我弱的基本条件远未改变的情况下,对于敌人的大规模“围剿”,红军首要问题是如何保存军力。因此,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把敌人放进来打。当敌人向我进攻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部退却,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和有利的地形条件,发现敌人的弱点,创造战机,采取多种积极手段,使敌我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变化;然后集中兵力,实施反攻,各个歼灭敌人于运动中,从而粉碎敌人的“围剿”。实施诱敌深入的谋略,关键在于以利动敌。那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人们,反对战略退却,反对诱敌深入,理由是退却会丧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谓“打烂坛坛罐罐”),对外也会产生不良影响。毛泽东则认为,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生意。如果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适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的政治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作代价。



在这份电文中,毛泽东针对国民党军队并进长追、坚守据点、稳扎稳打的“围剿”特点,建议红四方面军一要“诱敌深入到有群众工作基础的”、“地形便利于我们的地方”,力争取得拥护红军的群众和有利的阵地。二要“掩蔽我主力目标,严格地执行群众的坚壁清野”,制造假相,迷惑敌人,促使敌人发生过失。三要“运用广大的游击队,实行四面八方之扰敌、截敌、袭敌与断绝交通等等动作,以疲劳与分散敌人力量,而不宜死守某一点,以便利敌之分进合击。”四要“在运动中选择敌人薄弱部分,猛烈打击与消灭敌人一点后,迅速转至另一方,以迅速、果敢、秘密和机动,求得各个击破敌人,以完全粉碎四次‘围剿’。”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诱敌深入的军事韬略。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意思是说,面对强手,不要死打硬拼,而要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红军所以能够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原因关键就在于此。

## “占领川陕甘三省”

——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1935年6月16日)

张徐陈各同志<sup>[1]</sup>：

迭电悉。

甲、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

乙、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sup>[2]</sup>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sup>[3]</sup>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sup>[4]</sup>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丙、以懋功<sup>[5]</sup>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sup>[6]</sup>，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丁、我野战军于十二号已全部通过天全、芦山之线，十八号主力及中央机关可集中懋功、两河口<sup>[7]</sup>之线，因粮食极少不能休息，约月底全军可集中理番<sup>[8]</sup>地区，并准备渡岷江。

戊、弟等意见如此，兄意如何乞复为盼。

朱 德 毛泽东

周恩来 张闻天

十六日二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张，指张国焘，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徐，指徐向前，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陈，指陈昌浩，当时任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2] 指中央红军。

[3] 威州，镇名，即今四川汶川县县治。

[4] 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指挥官兼第一师师长。

[5] 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小金县。

〔6〕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7〕两河口，村名，位于今四川小金县北部。

〔8〕理番，旧县名，即今四川理县。

## 【赏析】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指导下，纠集百万军队，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此时掌握中央军委领导权的，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大敌当前，他不顾红军的实际情况，错误地提出“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方针，决心“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继续采取冒险主义进攻路线。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以北路军三个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发起进攻，28日，进占黎川。李德、博古对黎川的丧失非常震惊，制定了保住黎川“国门”，然后于“国门”外打击敌人的方针。10月9日，红军连攻硝石未克。10月20日，攻打敌人重兵堡垒阵地资溪桥犹未克。11月11日，进攻敌人战略要地南城以北之浒湾仍未克。红军连战连败，处于被动失利的境地。11月20日，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慌忙从北路军中抽调九个师，从沪杭地区抽调两个师，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第十九路军，这使红军的正面军事压力大为减轻。毛泽东抓住良机，积极建议临时中央：一是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二是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堡垒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并指出：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赣南闽西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然而，李德、博古等人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斥之为“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仍然命令红军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这样，不但没有把十九路军拉到自己周围，而且在军事上使红军坐失良机。蒋介石镇压十九路军以后，回过头来更加疯狂地进攻中央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实际，组织广昌大会战，同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消耗战，使红军损失惨重。1934年4月，敌人攻破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10月，开始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左”倾机会主义者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完全陷入被动地位。这时，毛泽东提出，红军主力应立即向湖南中部挺进，调动敌人于湖南歼灭之。但“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敢向敌人后方进攻。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八万余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出发，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1935年1月6日，红军突破乌江，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日，中央机关领导人在遵义城召开会议，纠正了当时“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把毛泽东重新推向党和红军的领导岗位。“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四个月连续行军，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继续北上，准备在川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蒋介石不断向红四方面军东部和北部增兵，但是原位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害怕国民党军队对川陕根据地的“围剿”，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向川西根据地转移。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到达茂县、岷州、理番及松番以南地区。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致电中共中央，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1935年6月1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达懋功。6月16日，毛泽东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了这份电文。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注重审时度势,而且表现出非同寻常的预见性和判断力。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对战争中时与势的科学分析上面,把握趋势,预见未来,统揽全局,为战争决策提供了科学准确的依据。特别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和重大关头,他总是超前预测,庙算为先,始终指引中国革命朝着胜利方向前进。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中的时、势有着极其广泛的丰富的内涵。在毛泽东的军事视野里,时、势的内涵和外延是极其宽泛的。他认为,在战略上审时度势,就要从战略上研究时代、国情、时局、格局、时机,甚至国际间的关系。在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针对有人提出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深入研究中国国情基础,分析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论断。在举世瞩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敌人尾追堵截,欲置红军于死地。毛泽东根据敌势、地势、经济基础、群众基础以及临近苏联的格局,反复权衡利弊,提出了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主张。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红军到哪个地区落脚,必须充分考虑这个地区的地域条件如何,经济条件如何,群众基础如何,民族风俗、周边环境乃至国际环境如何等一系列重要因素。而红四方面军所在的以懋功为中心的川西北广大地区,纵横千余里都是深山穷沟,山大地广,人稀粮少,给养困难,不适合大部队久驻。这一地区,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不易在短时间内消除。至于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大致相同。至于西康,情形就更差了。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主力出此并不是长久之策。相反,川陕甘地区位于汉水流域,地域广阔,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机动作战。群众基础又好,人口又多,经济条件也好,便于红军兵员和给养及时补充。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虽是蒋介石的嫡系,战斗力较强,但与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闻听红军如惊弓之鸟,国民党西路军对红军敬而远之,红军若集中兵力打胡宗南,他们有按兵不动的可能。这就能够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对敌人实施攻击,从而在川陕甘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

所以,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提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这些战略决策,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审时度势、先知谋势的韬略。

## “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

——致朱德、张国焘、刘伯承<sup>[1]</sup>

(1935年9月8日)

朱张刘三同志: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

一、左路军<sup>[2]</sup>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sup>[3]</sup>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泸、天、芦、雅、名、邛、大<sup>[4]</sup>直至懋抚<sup>[5]</sup>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如毛儿盖<sup>[6]</sup>者,仅一磨西面<sup>[7]</sup>而已。绥崇<sup>[8]</sup>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处此有绝食之虞。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此事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sup>[9]</sup>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亦远胜西康<sup>[10]</sup>地区。

三、目前胡<sup>[11]</sup>敌不敢动,周王<sup>[12]</sup>两部到达需时,北面敌仍空虚。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等当机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 洛甫 博古 向前

昌浩 泽东 稼轩<sup>[13]</sup>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原名代珍,字玉阶。早年曾任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体育教员。1909年考入云南讲武堂。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参加云南起义。后任滇军

团长、少将旅长，曾参加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1922年为追求救国真理，弃官离职，赴德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秘密军事训练班学习。1926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任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委员。1927年1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后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同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1月率起义军余部举行湘南暴动，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同年4月率部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后任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1934年参加领导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批判“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兼任红军左路军总指挥，同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和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八路军在敌后开展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参加领导全国的抗日斗争。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组织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巨大胜利。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年10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和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后，连任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编为《朱德选集》等。

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又名特立、凯音。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1920年10月，参加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局成员。会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1922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同年底去苏联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团长。1924年1月，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5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农部主任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西、湖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27年7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作为中央代表赴南昌，试图阻挠八一起义。1922年至1928年间，曾当选为中共二届中央委员、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1935年3月，率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



根据地,进行长征。6月,在四川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合后,任红军总政委兼中央军委副主席。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抗日方针,擅自带领左路军南下川康边界,自立“中央”,分裂红军。1936年7月,被迫取消伪中央,任中共西北局书记。10月率部到达陕北。1937年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1938年4月,逃往武汉,叛变革命,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以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离居香港。后移居加拿大。1979年11月在多伦多病死。著有《我的回忆》。

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1912年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学习。1913年参加四川讨袁军。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任川军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与杨闇公、朱德等人一起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策应北伐战争,并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军总指挥。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暂编十五军军长。同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赴苏联学习军事。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曾参加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后因反对王明“左”倾错误被撤职。1934年参加长征,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参加创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6月与邓小平等率部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开始解放军的战略进攻。1948年11月参加指挥淮海战役。1949年4月参加指挥渡江战役。同年底参加指挥西南战役。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第二届至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当选为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因年迈和健康原因辞去中央、国家和军队的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2]左路军,下辖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第九军,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军。

[3]懋功,旧县名,即今四川小金县。

[4]康、泸、天、芦、雅、名、邛、大,指四川康定、泸定、天全、芦山、雅安、名山、邛崃、大邑。

[5]懋,指懋功。抚,指抚边,村名,位于今四川小金县北部。

[6]毛儿盖,村名,位于四川松潘县西部。

[7]磨西面,村名,位于四川泸定县南部。

[8]绥,指绥靖,旧县名,即今四川金川县。崇,指崇化,村名,位于四川金川县南部。

[9]卓克基,位于今四川马尔康县南部。

[10]西康,旧省名,辖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1955年撤销。

[11]胡,指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剿匪”第三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兼第一师师长。参见本书第173页注[3]。

〔12〕周，指周浑元，当时任国民党军“剿匪”第二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官。王，指王均，当时任国民党军“剿匪”第三路军第三纵队第三军军长。参见本书第171页注〔1〕。

〔13〕洛甫，即张闻天（1900—1976），江苏南汇（今属上海市）人。幼名应皋，化名洛甫、洛夫，笔名刘云、平江等。1916年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加入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赴日本，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21年回国。1922年去美国，任中文《大同日报》编辑。1924年回国后，任中华书局编辑，并加入文学研究会、创造社。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和工作，曾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1930年底回国。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3年1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仍兼宣传部部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摒弃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在党中央负总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长征途中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1938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马列学院院长，负责理论宣传和干部教育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等。建国后，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6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以后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从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研究。曾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届常务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76年7月1日在无锡病逝。1979年8月中共中央予以平反。主要著述编入《张闻天选集》。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负总责。

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见本书第303页注〔1〕。

向前，即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原名象谦，字子敬。1922年山西省立太原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五台山小学任教。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政治教官、参谋、团副。1927年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广州起义，任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联队长。广州起义失败后，随起义军退到海陆丰地区，相继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师长。1929年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同年被派到鄂豫皖地区，先后任红十一军军长兼三十一师师长、红一军副军长兼一师师长、红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红四军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1932年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到川北，参加领导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兼西北军区司令员。1935年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同年与中央红军会师后，任红军右路军总指挥。1936年任红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红四方面军兼西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参加领导红军渡河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代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一兵团司令员和政委，中央军委直属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曾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聘为黄埔同学会名誉会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十一届一中全会、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90年9月26日在北京逝世。

昌浩,即陈昌浩(1906—1967),湖北汉阳人。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4月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兼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红四军政委、红四方面军政委。1933年1月到达川北地区后,兼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西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4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5年参加领导红四方面军长征。1936年10月参与率领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西路军政委。同年12月任军委委员。1937年3月返回延安。1939年8月去苏联。1952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1967年7月30日在北京逝世。

稼蔷,即王稼祥(1906—1974),安徽泾县人。原名嘉祥,又名稼蔷。1924年考入上海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苏区中央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瑞金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部长。1934年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批判“左”倾军事错误领导。会后任中共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成员、中央政治局常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部长。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政协常委。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第八、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 【赏析】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接连失利,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历史上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7日,红军强渡乌江攻占遵义后,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把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毛泽东推到了全党的领导岗位上,中国革命的历史,在历经磨难之后,终于掀开了新的篇章。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指引下,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顺利通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

月中旬到达四川懋功,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会师。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9月张国焘率领左路军抵达阿坝地区,拒绝执行中央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他的种种阴谋表现,已使毛泽东意识到“北进”与“南下”之争,是中央与张国焘分歧的焦点。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影响全局,影响党和红军的命运。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张国焘,力主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共同北上。1935年9月8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等七人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北上”、“南下”问题,并共同署名给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写了这封电报。

此电从团结出发,着眼大局,分别晓以左路军“北进”、“南下”之利害,从地形、经济条件,少数民族区域、西北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等四个方面因素入手分析南下的危险,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又从北进有望补充减员,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等各方面分析北进的正确性,指出北进才是惟一正确的道路。电文还分析了时局,通报了右路军的行动计划,目的是让左路军进入甘肃,开辟新局面。

全文反映了毛泽东等人在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北上、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为争取张国焘、谋求团结、保存红四方面军力量共同对敌的强烈愿望;反映了毛泽东既讲原则性,又讲灵活性的斗争艺术。此信用事实说话,力劝张国焘率军北上。但张国焘一意孤行,最终走上了叛变革命的道路。

全信在结构上采用了标准的电文形式,提纲挈领,简明扼要,条理清晰,言简意赅;语言上多用短句,与整个事态发展相吻合,显得情急意切,特别是“弟等仔细考虑结果认为”、“务望兄等熟思审虑,立下决心”、“弟等并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万望兄等当机立断”等语句,亲切无限,极尽革命情意,于最严重关头,仍能做到既以理服人,又以情动人,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人团结至上、顾全大局的战略眼光和善于斗争的伟人气魄。

## “优待俘虏”

——致林彪、聂荣臻、朱瑞<sup>[1]</sup>等(1936年3月2日)

林聂朱,徐程郭并致张云逸,刘志丹宋任穷,阎红彦蔡树藩,萧劲光转告各地方武装首长<sup>[2]</sup>;

关于改变待遇俘虏军官的政策,此次战斗中一团仍未能全部执行(四〇五团王营长大衣帽子被剥)。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

彭毛杨<sup>[3]</sup>

三月二日二十一时半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林彪、聂荣臻、朱瑞,当时分别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

[2] 徐程郭,分别是指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政治部主任郭述申。张云逸,当时任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军委后方办事处参谋长。刘志丹、宋任穷,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和政治委员。阎红彦、蔡树藩,当时分别任红军第三十军军长和政治委员。萧劲光,当时任红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3] 彭、毛、杨,毛指毛泽东,彭、杨分别指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部主任杨尚昆。

### 【赏析】

东征红军势如破竹,战果辉煌。毛泽东和彭德怀会合以后,于1936年2月24日下达了方面军训令。训令指出:我方面军已胜利渡过黄河,完成了东征战略的第一步任务。为了坚决粉碎敌人援兵,建立作战根据地,毛泽东和彭德怀决定:除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石楼以外,主力迅速进占柳林、离石、中阳、孝义、永和一线以内的有利阵地,大力开展群众工作,争取群众的支持。然后,集中兵力消灭敌军一路至二路,取得在山西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作为红军东征的第二步任务。2月24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急电周恩来:“请到前线催促红二十八军主力东调,如能及早赶到,定能夺取被晋绥军占领的吴堡、佳县、神府许多地方,而且直接援助了主力。”刘志丹、宋任穷奉命率领红二十八军向东进发,趁晋绥军四个步兵旅回援山西之

机,恢复了一度被他们占领的大片区域,巩固了陕北根据地东部地区。阎锡山对红军神速突破黄河天险十分惊慌,立即调集十四个旅的兵力编成四个纵队,准备从北东南三面,向红一方面军发起反击。

为了实现东征第二步战略目标,红军按照这一战略部署,英勇善战,不断巩固并扩大战果。红十五军团数日内连续在渡口、义牒镇、石楼以南等地歼灭敌人三个营,前锋直指同蒲路。2月25日,红一军团在吴村上村消灭阎锡山的精锐部队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部,一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连。但一军团在3月初的一次战斗结束后,发生了对敌四〇五团王营长实行割衣、剥帽等违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错误,致使改变待遇俘虏军官的政策在此次战斗中未能全部执行。大敌当前,只有切实注意实行优待俘虏政策,才能在一定条件下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一军团的错误如不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东征的胜利。1936年3月2日,毛泽东与彭德怀、杨尚昆联名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朱瑞等发了这份电文。

在中国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非常注重“心战”谋略。他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把“瓦解敌军,优待俘虏”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和纪律,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实现革命战争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他认为,红军俘虏的白军士兵大多是工农子弟,他们越是不了解我们,越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要是放回一个能争取十个,这账不是很好算?在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毛泽东针对押运俘虏返回茅坪途中发生的打骂俘虏现象,在茅坪召开有俘虏参加的军民大会,宣布了优待俘虏的政策:一是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二是不搜俘虏腰包;三是伤病者给治疗;四是释放俘虏,愿留者欢迎参加工农革命军,愿走者一律发给路费,欢送回家。随后,他又提出: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病一样,对待敌方受伤官兵同样如此。毛泽东深刻地指出:向苏区进攻的白军士兵,一面被强迫进攻我们,一面却受我们的革命教育,每个苏区可以说都是白军士兵学习革命的大学校。因此,替蒋介石挖坟墓的不只是红军,而且是他自己的士兵。后来,毛泽东又把优待俘虏这一政策,写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中。陈毅在给中央写的《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现状的报告》中指出:俘虏兵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士兵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们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要再当兵,不要再打工农红军。敌人的伤病员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回去,只有气得没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煽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种释放、优待敌军俘虏官兵的政策,使得投诚者日益增多,敌军军心动摇。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概括了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其中之一就是瓦解敌军和优待俘虏的原则。他指出:“战胜敌人不仅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要依靠敌军的瓦解。”他在《论新阶段》、《论持久战》和《论政策》等文章中,都对政治工作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到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在瓦解敌军方面,通过开展“高树勋运动”,并在俘虏当中开展诉苦教育,使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参加到人民军队的行列。在解放战争期间被歼灭的八



百余万国民党军队中,起义、投诚者一百七十余万人,被俘虏者四百五十余万人,两项共计六百三十余万人,占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瓦解敌军既是一种“攻心”手段,又是一种政治目的。实施攻心夺气的谋略,必须根据战局发展,因情制宜,因人施法,先知敌心,把握时机,力争通过政治攻势和心理攻势,着力创造诱导敌人瓦解的条件。特别是要把“心战”的目标对准敌人的各级指挥官,深入了解敌指挥官的军事思维、观点和人格,充分利用其心理弱点,采取攻心策略,使之固有的精神和理念瓦解。红军作战的根本目的是迫使敌人放弃抵抗,服从红军意志,而不唯完全消灭其肉体,只有对敌人实施政治宣传或物质优待,进行恰当的心理攻势,才能最终改变敌人原有的理念、立场,并使其倒戈归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在红军东征过程中,毛泽东经过认真分析,认为当时的敌人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是与蒋介石有矛盾的地方实力派,他们也有反蒋的要求,甚至有抗日的愿望。这样,对国民党军队实行俘虏政策,不仅有利于瓦解敌军,而且有利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提出:“必须向全体红色战士指战员说明优待俘虏特别优待官长的用意何在,以及对于清查敌军大小军官,一经解除武装,一律不得剥衣,不得搜身,不得打骂,不得捆绑,不得讥笑,而以热烈欢迎诚恳招待的态度向着他们,用此策略以瓦解白军。”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攻心夺气、瓦解敌军的军事谋略。



(1936 年的毛泽东)

## 同舟共济篇

## “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

——致高桂滋<sup>[1]</sup>（1936年）

培五师长阁下：

马志明同志回，述阁下赞同敝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之提议，甚感甚感。时至今日，全国即将陷于沦亡惨境，凡属食毛践土之伦，实舍救国无急务，舍抗日无工作。敝军间关南北，克抵三秦，所务者救中国，所求者抗日本。任何个人、团体、党派、军队，凡与此旨合者则联合之，凡与此旨背者则攻击之。其联之者，为民族革命增义旗也。其攻之者，谓其是真正之汉奸卖国贼，为四万万同胞诛妖孽也。阁下率领之数千健儿，与于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役，复与于四年前抗日之役，光荣历史，国人同佩。与红军为敌，谅出于卖国贼首蒋介石之驱迫，转旆击贼，则前事消忘。从此抗日讨卖国贼之革命联合战线上，有广大民众，有红军，复有阁下之义师，无疑将更有无数之义师陆续涌出于炎黄华夏之域，出中国于危亡，实为此之是赖。为使猜疑去之务尽，诚信孚于金石，就阁下对马同志所示及敝方所见，列为数条，借求明察：

（一）两军各守原防，互不相犯。

（二）抗日讨卖国贼大计，从长计议，务出尽善，并使贵军处于安全地位，有任何卖国贼加贵军以危害者，敝方愿以实力共击之。

（三）在贵军尚未至能取公开行动之时机，敝方愿将双方关系及一切信使往还保守绝对秘密。

（四）贵军未至公开行动之时机，当敝方攻击卖国贼军队（如井岳秀<sup>[2]</sup>）时，务望采取消极态度，即对敝方之敌不作任何援助举动。

（五）清涧贵部粮秣柴火，既属友军，自当尽力接济。但请阁下对敝方所需之物（如西药、布匹等）亦量为接济。

（六）互派代表在共同基础上订立初步的抗日讨卖国贼协定。

（七）互相建立最机密之通讯联络（交换密码）。

（八）保证双方代表及来往人员之安全。

以上各项，不论阁下所能同意者为全部或一部，敝方均愿与阁下开始实际之谈判。当此国亡无日关头，鄙人等决不因小节而忘大难。区区救国之诚，谅蒙贤者深察。抑更有进者，居今日而言，抗日讨卖国贼，非有广大之联合战线不为功，此不但在国内者为然，即在国际者亦然。环西北数省而军者非尽汉奸卖国贼，其中尽多爱国有志之人，告之以亡国灭

种之祸，陈之以联合救国之谋，动之以汉奸卖国贼之蠢与危，必有能感发兴起者，阁下曷尽力图之乎？其在国际则联合一切与日本为敌之国家与民族，实为抗日讨卖国贼重要纲领之一，远者姑勿具论，近在西北，则有伟大强立之苏维埃联邦。是国也，有与我共同反侵略目标，有援助中国反帝运动之深长历史，引以为友，实无损而有益，鄙人等当尽力以图之。附上敝党中央之政治决议及文告多种，借供参考。嚶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谁谓秦无人而曰甘受亡国奴之辱乎？寇深情急，竭意进言，惟阁下熟思而审图之。

专此。

顺颂

勋祺

中国抗日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 席 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彭德怀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高桂滋(1891—1959)，字培五，陕西定边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1949年拒绝去台湾。建国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

[2]井岳秀，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师长。

## 【赏析】

华北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企图占领全中国的野心已暴露无遗，中华民族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最危急关头。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极大地鼓舞了全体爱国同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迅速发展。为切实有效地领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毛泽东指出，在新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有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甚至是地方实力阶级营垒内也有可能分化。为了加强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统战对象调查了解以后，展开心理攻势，利用宣传品、喊话等形式耐心解释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政策，激发爱国同胞的抗日热情。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爱国热情和抗战胆识，使国民党上层将领产生了分化，也得到了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赞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高桂滋的抗日思想，与周恩来、彭德怀联名写了这封信。

信中首先对高桂滋同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一事表示感谢。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只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才是惟一出路。为唤

起高桂滋的民族自尊和民族大义，信中对高桂滋的部队在北伐及抗战中的光荣历史给予了很高评价，以鼓舞高桂滋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士气。至于与红军为敌，毛泽东归咎于蒋介石的压力和驱使，给高桂滋卸下了思想包袱。为了抗日，共产党是可以捐弃前嫌的，只要能调转枪口，两军便可化敌为友，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高桂滋的各种顾虑。关于两军结盟问题，毛泽东则提出了八项具体的意见和办法，让高桂滋了解我党详细政策，并随信附上党中央的决议和多种文告，促其早下决心，一致抗日。

此信在结构上采取“总一分一总”的形式，先总体介绍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再分别从八个方面作了具体论述，为实现这八项主张，又进一步总论了广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通篇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浑然天成；语句或长或短，气势恢宏，特别是对偶句和排比句的恰当使用，使得语势抑扬顿挫，句式活泼多姿，再加上“婴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等语句的引用，使语言生动形象，具有无比强烈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 “甚望加速推动之力”

——致杜斌丞<sup>[1]</sup> (1936年8月13日)

斌丞先生左右：

仲节君回，盛称德意，并聆抗日救国宏论，无任钦迟。值此国难日亟，国贼猖狂，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伪蒙军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sup>[2]</sup>质量之改组，凡此种种，愈见日寇之变本加厉。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虎臣<sup>[3]</sup>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愿与先生勉之。特派张同志<sup>[4]</sup>专谒崇阶，敬祈指示一切。云山在望，延企为劳，诸惟心照，不尽。即颂

日绥

毛泽东 手启

八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杜斌丞(1888—1947)，爱国民主人士。陕西米脂人。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早年任陕西榆林中学校长多年，延聘进步教师，传播进步思想。西安事变前后，曾任国民党军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及甘肃、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等职。1933年，促成十七路军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代表杨虎城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对西安事变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抗日战争期间，与林伯渠、董必武保持联系，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1年，负责筹组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部。抗战胜利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参与创办《秦风日报》，并促成其与《工商日报》出联合版，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1947年10月7日，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延安为之开了追悼会，毛泽东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2] 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适应日本帝国主义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而设立的政权机构。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通过在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绥远)建立脱离国民党政府的特殊区域来达到并吞华北的目的。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威胁，在相继签订丧失河北、察哈尔两省主权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之后，又于同年12月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3] 虎臣，即杨虎城。参见本书第161页注[1]。



〔4〕指张文彬(1910—1944),湖南平江人。原名纯清。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到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后,任红五军第四纵队政委、红五军政委、中国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红七军政委、红三军团保卫局长。1934年参加中央红军长征,西安事变后参加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后任红军驻兰州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南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粤北省委书记。1942年6月在高陂被国民党当局逮捕。1944年8月在狱中牺牲。当时是红军派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

## 【赏析】

1936年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国共两党关系及统一战线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会议确定,放弃抗日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继续国共对话,同时对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于8月13日在给杨虎城写信的同时给他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写了此信。

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争取西北军等地方势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抗战时期的重要策略之一。他曾经指出,对军阀,我们要向前看,不要往后看,对过去他们干的反人民的坏事,不要耿耿于怀,更不要看他们怎样腐化,只要现在有一点民族气节就好,就要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他们。他认为西北军不是蒋的嫡系部队,而是受蒋介石排斥和打击的地方势力,蒋介石让其打击红军,意在达到削弱这些杂牌军的目的。毛泽东看到敌人内部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毅然捐弃前嫌,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他不但亲自多次写信给张、杨二将军,还考虑到他们周围的人的统战作用。杜斌丞作为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参议,对促成杨虎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有着特殊的作用。争取杜斌丞对争取杨虎城极为有利。为此,毛泽东在信的开头首先对杜斌丞的救国思想予以肯定。“无任钦迟”四字,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激动心情和对杜斌丞的无比信任。“大好河山,危险万状”,“伪蒙向绥远进攻,冀察政委会质量之改组”等等,寥寥数语,道出了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危急形势。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呼吁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杨虎城将军也同意成立联合阵线,但这只是一个开端,况且杨虎城时有迟疑态度,必须由“同意”到“切实负责”,共同促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真正建立,这就需要杜斌丞先生“加速推动之力”,并希望对西北各部大力斡旋,担负起救西北、救华北、救中国之伟大事业。

此信层层深入,环环相扣:先赞扬杜的抗日宏论,以唤起他的民族自尊和抗日自觉;接着分析外侮入侵、国土沦陷的时局,以激发他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然后,进一步提出了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对杜的深切期望,表达了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日的诚意和决心。

## “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

——致杨虎城<sup>[1]</sup> (1936年8月13日)

虎臣先生勋鉴：

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然为友为敌，在先生不可无明确之表示。虚与委蛇的办法，当非先生之本意。目前日本进攻绥远<sup>[2]</sup>，陕甘受其威胁。覆巢之下，将无完卵。蒋氏向西南求出路，欲保其半壁山河，倚靠英国，西北已非其注意之重心。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sup>[3]</sup>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比闻贵部将移防肤洛<sup>[4]</sup>，双方更必靠近，敝方庆得善邻，同时切望贵部维持对民众之纪律，并确保经济通商。双方关系更臻融洽，非特两军之幸，抑亦救国阵线之福。具体办法及迅速建立通信联络等事，均嘱张同志趋前商订。专此奉达，不尽欲言。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八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杨虎城(1893—1949)，国民党爱国将领。号虎城。陕西蒲城人。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1913年退伍还乡，领导贫苦农民打击恶霸、官府，拉起武装抗暴队伍。1915年参加反袁护国战争。1916年任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营长。1917年参加陕西靖国军，先后任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第三路司令。1924年派代表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冯玉祥北京政变后，任陕西国民军前敌总指挥，后部队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任师长。7月在耀县设立“三民军官学校”，以共产党人魏野畴为政治部主任。1926年4月率部进驻西安，部队改为陕军，任陕军副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坚守西安八个月，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西安解围后，于12月离开西安，避居三原。1927年2月任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总司令。后所部改为第十军，任军长。5月出潼关

与北伐军会师,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冬转至安徽太和县休整,与中共皖北特委合作。大革命失败后,不再与冯合作,1928年夏化名呼尘,去日本东京疗养。8月回国。在山东临沂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暂编第二十一师师长。1929年蒋、冯决裂,离冯附蒋,部队改编为第四师,任师长,移驻河南南阳,兼南阳守备司令。1930年所部先后改编为陆军第十七师、第七军、第十七路军,任军长及总指挥。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10月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1月进驻西安。1931年任潼关行营主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1933年援助察绥抗日同盟军。11月派代表前往福建参加福建人民政府活动。与红四方面军订立互不侵犯协定。被国民政府撤免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1935年5月东北军移驻西北,双方取得联系。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初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同年,设立王曲(西安南郊)训练团,任副团长。12月12日和东北军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撤销“西北剿总”,改组陕西省政府,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1937年1月5日被南京政府撤职留用。3月去浙江会见蒋介石,请求抗战。4月被迫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十七路军总指挥职务。6月被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派为欧美考查军事专员,出国考察。在国外曾三次电请回国参加抗战。10月29日乘船回国。11月26日抵香港即受特务监视。30日到南昌,被囚禁,历时12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晚,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戴公祠”。次子、幼女、秘书夫妇和小孩、副官、警卫员同时遇难。

[2] 绥远,参见本书第198页注[4]。

[3] 张文彬,参见本书第159页注[4]。

[4] 肤,指肤施,即今延安。洛,指洛川。

## 【赏析】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其独占中国的进程,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成为国内主要矛盾。团结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共同抗日,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由于日寇的入侵,中国面临存亡的紧要关头,各阶级的相互关系也随之改变。他着重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认为在新形势下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肯定了过去参加过反共而后又从国民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政治势力,包括某些带枪的地方派,某些国民党在野人物以及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绅士,在新形势下有加以联合的必要和可能。在争取东北军的同时,毛泽东对争取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工作给予极大关注。杨虎城当时是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是一个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将领,并且他与共产党人早有交往。大革命失败后,他保护过共产党人,与蒋介石有很大的矛盾,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排除异己行为早已心怀不满,更不赞成“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杨虎城的情况,决定利用蒋、杨矛盾,争取杨虎城联共抗日。1935年12月5日,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写信,促使杨虎城与中共确定了联合抗日的原则。12月下旬,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到达西安,与杨虎城继续商谈,达成了抗日友好、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双方进行抗日教育、抗日准备等协议,使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信心更加坚定。

1936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犯中国已是箭在弦上,杨虎城的思想却突然有所动摇。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促使杨虎城坚持初志,共同抗日,8月13日,毛泽东又给杨虎城写了这封信。

该信首先对杨虎城同意联共抗日给予肯定,赞扬他“同意联合阵线,盛情可感”。杨虎城有抗日要求,也有一定进步思想和抗日诚意,同一些共产党人有过友好的关系,中共中央同他合作的初步协议已经达成。虽然蒋介石一再督促西北军进剿红军,但他持消极态度,在此情况下共产党对杨虎城保持的诚意不变,即信中所言“九个月来,敝方未曾视先生为敌人”,同时也批评了他“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这种态度对共同抗日无益。毛泽东从“在理在势在历史”三个方面,分析说明西北军与红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理”即指当时国家存亡关头,国共两党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国内之争为次;“在势”,指在日本进犯绥远,陕甘受威胁之时,蒋介石欲借日本帝国主义之刀剪除异己,已经开始放弃西北,向西南求出路,依靠英国,欲得半壁江山,“覆巢之下,将无完卵”,惟有合力抗日,才有生路;“在历史”即指一旦建立统一战线,完成抗日胜利之大业,将为历史之功臣,留辉青史。

在这国破家亡,全国人民要求联合抗日呼声日渐高涨之时,杨虎城将军应及早表明态度,并有所作为,态度果决,立场坚定,不应该冷静观望。“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一句,表达了毛泽东的殷切期望之情。为帮助杨虎城早下决心,信中还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参加联合战线作了周密打算,保证“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同时,希望西北军官兵能严明纪律,不侵扰百姓,确保经济和通商自由,以利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由此可见,毛泽东的统战工作是建立在经济互利的原则基础上的。为了争取地方势力派,毛泽东曾指示叶剑英实行“红白通商”,经济互利,开放市场,发展贸易,利用集贸市场中中共工作人员与国民党官兵的接触,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从精神上、物质上促使抗日统一战线更加巩固。

此信说理透彻,情理交融,从信中让人感受到了共产党人的挚诚和一切从民族大义出发的胸襟,这对于杨虎城决心与红军建立统一战线以及后来发动“西安事变”,不能不说是一个有力的促进。

## “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

——致宋哲元<sup>[1]</sup>（1936年8月14日）

明轩主席先生勋鉴：

刘子青<sup>[2]</sup>先生来，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力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联合华北人民群众作实力之准备，一面恢复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将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sup>[3]</sup>甚急，德王<sup>[4]</sup>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的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sup>[5]</sup>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尽全力以为后援。近者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惟具体实施步骤，必须规划周详，方免贻误。兹遣张金吾<sup>[6]</sup>同志前来就教，请予接谈。如荷同意，即以张同志为敝方长驻尊处之联络代表，一切通信联络均以秘密出之。鲁韩绥傅晋阎三处，弟等甚愿与之发生关系，共组北方联合战线。先生必有同心，尚祈设法介绍。临书不胜屏营翘企之至。

专此。即请勋祺

弟 毛泽东拜启

八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宋哲元（1885—1940），抗日将领。字明轩。山东乐陵人。1912年入陆建章左路备补军随营学校，毕业后，任哨长。后任冯玉祥部十六混成旅营长、第十一师团长、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1924年10月任国民一军第一师师长。1925年任热河都统。1926年9月随冯玉祥加入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1927年6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改任暂编第九师师长，又改编为陆军第二十八师，任师长。1929年冯玉祥在山西被阎锡山软禁，他代理国民军总司令。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任第二方面军第四路军总指挥，战事失败，国民军残部退入山西，改编为二十九军，任军长。1932年9月任察哈尔省主席。1933年3月率部参加长城抗战，任华北军

三军团总指挥。1935年8月任平津卫戍司令。11月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何梅协定》签订后,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任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七七事变中,所部曾奋起抗战,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任总司令。1938年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后第一集团军撤销,被夺去军权。1940年4月在四川绵阳病逝。当时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2]刘子青,当时是宋哲元派来与中国共产党联络的代表。

[3]绥,指绥远省。参见本书第198页注[4]。

[4]德王,即德穆楚克栋鲁普(1902—1966),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人,蒙古王公。1936年5月在侵华日军的策划下,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德王任总裁,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5]冀察政委会,即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见本书第159页注[2]。

[6]张金吾,即张经武(1906—1971),湖南酃县人。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华北地区做统一战线工作的代表。

## 【赏析】

瓦窑堡会议以后,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面形成,毛泽东提起他那支如椽大笔,分别给倾向抗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及地方势力派写信。其中包括给宋哲元将军的这一封。

1933年,国民党为保平津之屏障的北平和东北,在长城各重要关口,调兵力守。宋哲元负责防御长城喜峰口。3月中下旬,日军数次向喜峰口等关隘发起猛烈攻击,宋哲元指挥守军以近战肉搏誓保阵地,日军屡攻不破,二十九军大刀队名扬天下,正如信中所言“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当时天津《益州报》载文称,法国人民忘不了凡尔登英雄,中国人民亦不能忘记喜峰口英雄。喜峰口几仗,使中国人民又抬起头来。此即毛泽东信中所言“曩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对于宋哲元部的英雄壮举,毛泽东深表钦佩,但他更希望宋哲元在日寇得寸进尺,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同时进攻之时,更加坚定抗日决心,联合华北广大人民群众,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等待时机成熟发动大规模的抗敌之战。信中还揭露了日寇妄图吞并绥远进而吞并整个华北的野心,希望宋哲元不要丧失气节,为抗日救国继续做出贡献。为增强宋哲元将军的信心,毛泽东认真分析了抗日力量不断壮大的形势,指出,国内统一战线大有进步,红军主力渐次集中,国际联系已有把握,“凡此均非徒托空言,而有实际力量,足以资为抗日之用者也”,他建议宋哲元联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共同组成北方联合阵线,抗击日寇,并表示共产党人将“竭尽全力以为后援”,红军将成为抗日的坚强后盾,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宋将军的信任和支持,以及联合抗日、奋起御侮的一贯立场和决心。

此信论理深入浅出,在抗日的旗帜下只求团结对敌,丝毫不提以往不愉快之事,肯定宋哲元从日寇入关时的“奋力边陲”到日寇得寸进尺时的“独立支撑”等闪光的一面,也表达了中共及全国民众愿以全力相助的诚心。最后,希望“先生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至此,信的全部意义,倾叙殆尽,显得气势贯通,顺理成章。信中用词妥帖恰当,抒情言志,严谨而又激扬,起到了良好的说理功效。



## “严密警戒，十分团结”

——致王以哲<sup>[1]</sup>（1936年）

鼎方军长勋鉴：

日寇侵略益厉，兄我双方救亡之准备大宜加紧，庶于救亡阵线有最大之裨益。我兄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目前国际与中国形势日益紧张，一方面侵略主义者动员其侵略阵线，一方面反侵略主义者大规模动员广大民众，组成和平与救国的阵线。中国之汉奸势力虽日益嚣张（如所谓以日制蒋，以政制党，以团制军之一派），然反日反汉奸势力亦大见增进。蒋氏政策之开始若干的转变，南京国民党左派之开始形成，实为近可喜之现象。蒋氏及国民党果能毅然抛弃过去之政策，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停止进攻红军，开放各派党禁，弟等极愿与之联合一致，共同担负抗日救亡之事业。双方谈判现将进至比较具体的阶段，虽何时成就尚不可知，然希望实已存在。倘能达到成功之域，对贵我双方之合作事业自有极大之便利也。

近日外间谣传蒋氏将于西南问题<sup>[2]</sup>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谓将用分化政策不利于张副司令<sup>[3]</sup>。此讯如确，是蒋氏尚未放弃其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险狠毒的政策。其政策果欲见之实行，弟等可断言蒋氏必归于最后的失败，因为张副司令及我兄联俄联共抗日救亡之主张，并非少数人的主张，实全国爱国同胞的主张；非陈济棠<sup>[4]</sup>等之不真实不纯洁的主张，乃真心实意为国家为民族的主张。谁要反对张副司令及我兄，不但弟等所率领的红军必以全力出而声讨蒋氏及东北军中叛逆分子之罪恶行为，即全国爱国人民及国际革命势力亦决不容蒋氏等胡干。至于东北军最大多数官兵抗日复土之决心及其坚固的团体，亦必不容东北军中极少数无志节之分子逞其私欲而任其作叛国叛乡叛团体之万恶的勾当。目前蒋氏及其一派亦正在开始进行联俄联共政策，我兄与张副司令实此政策之首先提倡与首先实行者，安得以为有罪而排斥之？由此以观，弟则深望此说之止于谣言，或为蒋氏左右一部分汉奸分子谋划，而非现正开始若干转变之蒋氏及国民党多数有良心分子的意见。但兄等仍宜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则以全国与西北的有利形势，以东北军与红军的联合力量，决不怕外间若何之风波也。秋风多厉，为国珍摄。勿此布臆。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王以哲(1895—1936),东北军将领。原名王海山,号鼎芳。黑龙江省宾县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从1922年起,任东北军教导队排长、连长、营长,东北军团长、师长及中将旅长。1928年底,张学良成立东北学生队,任教育长。“九·一八”事变前夕,获悉日军将发起军事挑衅,亲赴北京,请张学良回师备战。“九·一八”事变后,率部退入关内,驻守北平。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同宋哲元等将领一起,进行了持续两个月的长城抗战。张学良被迫下野出洋后,被蒋介石召见,许以河南省主席要职,并赠送50000元。他拒绝拉拢,同东北军将领团结一致,不离阵地。1934年张学良归国,任鄂豫皖剿总副司令,王所部六十七军被调大别山参加剿共。1935年进驻陕北。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抛弃了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立下了不朽的功绩。1936年2月又根据张学良的指示,就红军与六十七军实行局部合作达成协议。1936年陪同张学良飞赴延安,同中共代表周恩来会晤,后参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张学良、杨虎城领衔的八项政治主张通电上签名。以后又力主按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通过和平谈判营救张学良。1937年2月2日以身殉职。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军长。

[2]指两广事变。1936年6月,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出通电,组织西南联军,并出兵企图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7月陈济棠因部下为蒋介石收买而被迫下台,九月李宗仁、白崇禧与蒋妥协。参见本书第188页注[3]。

[3]张学良。当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副司令。参见本书第190页注[1]。

[4]陈济棠(1890—1954),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粤军首领。字伯南,广东防城人。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陆军速成学校。1908年加入同盟会。在粤军曾任连、营、团、旅长。参加了讨袁战争,在孙中山讨伐陈炯明时,与邓演达、张发奎奋起兵变,击败陈炯明叛军。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率部参加第二次东征和南征战役。曾在潮汕阻击南昌起义进入广东的叶挺、贺龙部起义军。1928年任粤军第四军军长。蒋桂战争中,采取侧翼迂回战术,重创张桂联军。中原大战中,挥军入湘,连续挫败张桂联军。1931年与桂系联合通电反蒋,另立国民党政府,任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一集团军司令等职,积极整军经武,扩充学校,并亲自抓全民军训,成为实际上拥有军政大权的“南天王”。宁粤合流后,任“围剿”红军中央苏区的副司令、南路军总司令。1936年6月,联络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为名,发动了反蒋的“两广事变”,任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总司令。失败后下野,结束了对广东的割据局面。1937年后任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4年病死于台北。

## 【赏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三省,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东北军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十分强烈。毛泽东利用蒋介石与东北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积极开展争取东北军的工作,促使他们转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上来。193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把争取东北军抗日确定为我党的一项基本方针,

在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中坚持“上层的与下层的同时并进”的原则，努力使东北军成为抗日军。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给时在东北军主持军中大计的王以哲写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出，目前国际与国内形势日益紧张，形成了侵略与反侵略两大阵线。在国内，汉奸势力日益嚣张，反动势力也大见增进；蒋介石政策开始转变，国民党左派开始形成，革命形势是可喜的。接着，毛泽东以洞察秋毫的敏锐眼光，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蒋介石挑拨离间、排除异己之阴险狠毒政策，因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看来，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关键，在于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所以，毛泽东抓住蒋介石在西南问题解决之后进攻东北军的传言，提醒王以哲严密警戒，十分团结自己的团体，预先防止东北团体中某些居心不正分子的乘机捣乱，这一方面显示了共产党对王以哲部的关心，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瓦解敌军、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此信处处渗透着中共对东北军的关心支持和团结之情，中共中央对东北军的态度，不是瓦解、分裂，更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给予共同的纲领，并使之团结在纲领的周围，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成为共产党的友军。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既有对形势的透彻分析，又有对友军的友好劝告，既有自己一贯的主张，又有对东北军的紧密联合，这就大大激发了东北军将士的抗日热情。

毛泽东曾主张，在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上，主要的是依靠耐心说服与解释，从政治上争取他们到抗日阵线上来。因此，此信在语言的运用上不厌其详，不拒其细，在心理上展开交流，将利弊得失剖析得条理分明，可谓句句在理，字字千钧。

##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致邵力子<sup>〔1〕</sup>（1936年9月8日）

力子先生：

阅报知尚斤斤于“剿匪”，无一言及于御寇，何贤者所见不广也！窃谓《觉悟》<sup>〔2〕</sup>时代之力子先生，一行作吏，而面目全变。今则时局越作越坏，不只一路哭，而是一国一民族哭矣！安得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为此一国一民族添欢喜乎？共产党致国民党书<sup>〔3〕</sup>，至祈省览。语云：越人弯弓而射之，则己弯弓而射之，其兄弯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sup>〔4〕</sup>此垂涕而道之言也，先生其不以为河汉乎？“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办法则不可。日本帝国主义正亦有此大志，正用飞机大炮呼声动地而来，先生欲与之争“开发”，争“建设”，舍用同样之飞机大炮呼声动地以去，取消它那一边，则先生之“开发”建设“必不成功，此办法问题也。谈到这个办法问题，询谋僉同，国人皆曰可行，不信先生独为不可行，是则国共两党实无不能合作之理。《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与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机会，先生其有意乎？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

九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邵力子（1882—1967），原名闻泰，字仲辉，又名凤寿。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1908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与柳亚子等发起组织南社。1916年1月与叶楚伦创办《民国日报》，任经理兼编辑。1919年6月主编副刊《觉悟》，提倡新文化。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任上海大学副校长，后代校长。1925年6月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后任政治部主任。北伐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退出中国共产党。1928年蒋介石复职后，再任总司令部秘书长。1931年辞职，去上海，任中国公学、复旦实验中学校长。1932年4月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后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事变后，被免职。1937年2月改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主张抗日。1940年5月至1942年11月，出任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努力改进中苏关系，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支援。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重庆谈判期间，任国民党的谈判代表。曾出席旧政协会议。1949年作为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和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两次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商谈，谋求国内和平。国民政府拒绝和平协议后，脱离国民党。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等职。1967年12月在北京病逝。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

[2]《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1919年创刊,由邵力子主编。从1920年起,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影响下,逐渐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园地。1925年五卅运动后,邵力子去广州,国民党右派分子逐步控制了《民国日报》,《觉悟》的面貌随之右转。

[3]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信中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参见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一卷)。

[4]参见《孟子·告子章句下》。

## 【赏析】

1936年8月,中共中央致信国民党,要求组织两党共同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中共中央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明确指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由此确定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为了尽快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9月8日,毛泽东亲自给与共产党军队毗邻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了这封信。

信的开头,毛泽东委婉地告诫邵力子先生“所见不广”、“面目全变”。言辞诚挚,恳切,不遮掩,像与朋友恳谈。《觉悟》时代的邵力子可谓朝气蓬勃,为国家大事着想,大力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马克思主义,但在“时局越作越坏”、“一国一民族哭”的时候,却“无一言及于御寇”,这是为什么呢?信中没有正面回答,也没有加以指责批评,而是诚恳地劝导其负起“去旧更新,重整《觉悟》旗帜”的责任,继续保持意气风发的立场风范,坚决“御寇”。只有如此,才能为“一国一民族添欢喜”。

接着,毛泽东借用《孟子》中的一段话形象地说明国共两党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道理。两党之间、两军之间决不能“弯弓而射”,只有团结,才能御敌于国门之外。

针对邵力子先生“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宏伟志愿,毛泽东极力赞扬邵力子先生的志向之大,但也指出仅有“大志”,办法不行也是枉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炮已撞开华北大门之危机关头,避开抗战之当务之急,奢谈如何“开发西北”、“建设西北”,岂不是愚蠢至极!因此,“开发”、“建设”之前提必须先确保“西北”是中国自己的,有主权才能开发。而要争取独立自主,唯一的办法是首先向日本侵略军开炮,夺回失地。

毛泽东最后指出“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乃“天下大势”,说明国共合作,是民心所向,不可逆转。国共两党只有真诚合作,携手共进,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才能使中国人民摆脱亡国奴的命运,才能使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志向得以真正实现。

后来,邵力子先生读罢此信,感慨万千,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别在思想深处认识到了国共合作对整个抗日救国运动的极端重要性,也为共产党一心救国的诚意所感染,1949年国共和谈破裂,他竟留北平未返,最终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彻底决裂。

## “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致王均<sup>[1]</sup>(1936年9月8日)

治平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sup>[2]</sup>,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sup>[3]</sup>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顺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王均(1891—1936),字治平,云南省呈贡县人。云南讲武堂毕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

[2]见本书第170页注[3]。

[3]朱玉阶,即朱德。他和王均曾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学。参见本书第146页注[1]。

### 【赏析】

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声中,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时局,明确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为了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还亲自向国民党将领致信。这是当时给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的一封信。

王均跟随蒋介石从2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剿匪”、“剿共”。所以信之开头,毛泽东就直言点明,这十年的内战,“也可以休息了”。此句之用,略有几分诙谐,又不无讽刺意味,让人浮想联翩。十年内战,起于国民党对民族联合阵线的破坏,源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和专制。虽然国共两党过去十年有着不少的恩恩怨怨,但在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停止对抗,一致对外。凡是具有一点民族精神的爱国健儿,都应效命疆场,奋力杀敌,军中要人,更应幡然悔悟,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积极抗战。但信中没有直言,而用先生“谅有同感”一句,这样便大大缩短了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起到了更为显著





## “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

——致朱绍良<sup>[1]</sup>(1936年9月8日)

绍良先生:

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可谓大有缘矣!然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为鹬蚌者不亦危乎?付上共产党致国民党书<sup>[2]</sup>,为国家民族谋,亦为先生谋也。两党两军之间,无胶固不解之冤,有同舟共济之责。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天下后世颂先生为民族英雄,岂不愈于胡宗南<sup>[3]</sup>君所谓“无期徒刑”乎?夫“剿匪”非特无期徒刑也。且是一种死刑。非曰红军宣告先生们之死刑也,日本帝国主义实宣告之,非特宣告国人某一部分于死刑,实欲举全民族而宣告之,呜呼危矣!先生而同意统一战线,则鄙人竭诚以迎。惟事宜急办,迁延则利在长驱而入之寇。尚祈致意蒋先生<sup>[4]</sup>,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书不尽意。顺颂勋祺!

毛泽东 启

九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朱绍良(1890—1963),字一民。江苏武进人,生于福州市。1910年赴日本留学,加入同盟会。1916年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北伐战争初期,任李济第四军第十师参谋长,曾拟定汀泗桥作战计划。1927年任武昌行营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后投靠蒋介石,成为嫡系,先后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军政厅长、师长,参加蒋桂、蒋冯战争,后升第二军军长。1930年任“剿匪”第六路总指挥,进攻中央苏区。翌年,调任江西绥靖主任。1932年改任豫鄂皖边区“剿匪”总指挥,围攻红军。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参加上海抗战。1937年底,调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司令长官兼甘肃省主席。1944年代理新疆省主席,确立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1946年春,任国民党政府副参谋总长。1947年后,任蒋介石重庆行营主任,福建绥靖主任兼福建省政府主席。国民党败溃台湾后,他任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63年12月病逝于台湾。当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甘绥靖公署主任。

[2]见本书第170页注[3]。

[3]胡宗南(1899—1962),国民党陆军上将。字寿山,浙江孝丰(今安吉)人。1924年

入黄埔军校,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和国民革命第一军任排、连、营长。曾参加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的战斗。北伐战争时任团、师长。1929年后参加了蒋介石对桂、冯、唐的战争和中原大战。1932年入鄂豫皖“围剿”工农红军。1935年入川“剿共”。次年任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7军团军团长,曾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移驻关中,率部参加武汉会战,在信阳一线对日作战。失败后驻防西安。1940年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入晋对日作战。1942年后历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担任黄河河防、拒阻河东、山西日寇以及封锁中共陕甘宁边区等任务。湘桂战役中,协助汤恩伯将日军逐出黔境。1947年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率部进犯延安,遭到沉重打击。1948年任川陕甘边区绥靖主任,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后率部退往四川,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在解放军发动的西南战役中,其70万军队被歼。1950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前一天,只身飞往台湾,任国民党战略顾问等职。1962年病逝。著有《宗南文存》。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在陕北进攻红军。

[4]指蒋介石。参见本书第197页注[1]。

## 【赏析】

朱绍良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爱将,跟随蒋介石多年,唯命是从,潜心“剿共”,与红军有着不共戴天之仇。但在日寇入侵、国土沦丧之时,毛泽东毅然捐弃前嫌,为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统战的目标指向了与共产党交战十年,怨积颇深的朱绍良。毛泽东在信的开头幽默而略带惋惜地写道:“十年酣战,随处与先生相遇”,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同样是炎黄子孙,同饮黄河母亲的乳汁,可现实却是同室操戈,如此“酣战”,得利者却是日本帝国主义。外敌入侵,兄弟应操戈对外,所以毛泽东郑重指出,两党“无胶固不解之怨,有同舟共济之责”,应“抛嫌释怨”,“以对付共同之敌”,唯其如此,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倾巢之下,完卵难保。如果仍然一意孤行,下场自然可悲,这可悲的下场,就是国民党的“无期徒刑”,这告诉了朱绍良先生当前局势的严重性。毛泽东希望国民党悬崖勒马,若一如既往,不仅国民党死无葬身之地,就连整个中华民族都会亡国灭种。“呜乎危矣”的感叹,表现了毛泽东对整个中华民族面临的境遇的忧患之深。他谦恭地劝诫朱绍良先生如若“同意统一战线”,那么“鄙人竭诚以迎”,但仅仅“同意”还不行,如若拖延时日,后果仍非常严重,那将“利在长驱而入之寇”。统一战线的建立刻不容缓,迁延一分,不知又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不知又有多少中华沃土被日寇肆意蹂躏、践踏。中华民族的好儿男,应不再犹豫踌躇,应昂起头颅,血战到底,血洒疆场。这正是对朱绍良先生的殷切希望。

最后,毛泽东希望朱绍良先生以私人身份致意蒋介石,以民族利益为重,立即决策。“国事犹可为也”一句。既表达了毛泽东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情,又表达了毛泽东对抗战前途的坚定信心。在致信朱绍良的同时,毛泽东连续写了好几封信,与国民党的爱国志士互通信息,以期达到迅速建立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目的。

此信语言精炼,说理透彻。特别是“鹬蚌相持”典故的运用,可谓恰如其分,形象生动,大大增强了书信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 “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

——致宋庆龄<sup>[1]</sup> (1936年9月18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sup>[2]</sup>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sup>[3]</sup>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sup>[4]</sup>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人，生于上海。孙中山夫人。早年在上海读书。1908年到美国佐治亚洲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学习。1913年毕业后任孙中山秘书。1915年10月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结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坚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向国内外介绍孙中山的遗嘱，谴责国民党右派，并参加北伐战争的准备工作。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期间，坚持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中共紧密合作，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同年8月访问苏联和欧洲。曾两次被选为世界反帝国主义同盟大会名誉主席，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29年回国参加孙中山奉安典礼。不久再度赴欧洲。1931年回国后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1932年12月在上海与鲁迅、蔡元培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亲任主席，保护和营救了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民士。1933年9月主持远东反战大会，并任

远东反帝反战同盟中国分会主席。1935年率先响应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积极开展抗日活动。1938年6月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创建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慈善救济事业，并给予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物质援助。1948年1月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同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建国后，曾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福利协会会长等职务，长期主持中国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会的工作。还当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一、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在五届人大常委第十二次会议上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1981年5月15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接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5月28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宋庆龄遗集》。

[22] 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参见本书第181页注[4]。

[3] 指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参见本书第170页注[3]。

[4] 吴稚晖(1865—1953)，江苏武进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

孔祥熙(1880—1967)，四大家族成员之一。字庸之，山西太谷人。早年经营钱庄。1901年，去美国留学，曾就读于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回国后，任山西太谷美国创办的铭贤学校校长，同时经营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阎锡山政府参议。1921年后，任鲁案善后公署实业处长，中俄交涉公署驻沈阳代表。1924年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历任工商部长、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任内期间，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掌握行政、财政、金融大权，滥发纸币，垄断金银兑售，举借内外债，套取外汇，聚敛了大量财富。同时经营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陆运输公司等，利用国家资本壮大自己企业和从事投机，独占商业贸易。1947年赴美。1962年到台湾，曾任台湾中华书局董事长。1966年再去美国。1967年病死于纽约。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

宋子文(1894—1971)，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成员之一。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17年回国，任汉冶萍煤铁公司秘书。1923年被孙中山委任为两广盐务稽核所长。1924年广东政府中央银行成立，为主要经营人。1925年任广东国民革命政府财政厅长、财政部长。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委。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财政部长。1932年任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院长。1935年因同蒋介石矛盾，辞去所兼各职。1934年创立中国财经开发公司，以此为基础，相继创办了中国棉业公司、华南大米出口公司、广州银行、扬子江电力公司等。1935年任中国银行董事长。西安事变时，参加了同张学良、杨虎城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谈判。此后，为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以驻美特使的身份，曾于1941年2月和9月、1942年6月，多次向美借



款。1942年秋,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1945年率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被选为四名主席之一。同年6月任行政院长。抗战胜利后,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接收大量敌伪财产,创办了中国纺织公司、中国蚕丝公司等垄断企业。为支撑迅速崩溃的国统区经济,大量抛售黄金,引起黄金风潮,纸币贬值,造成恶性通货膨胀。1947年任广东省主席兼绥靖主任。1949年去法国,后定居美国。1971年病死于纽约。当过任国民党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中国银行董事长。

李石曾,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北平研究院院长。参见本书第70页注⑤。

蔡元培,当时任南京中央研究院院长。参见本书第184页注①。

孙科(1891—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之子。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曾任广州非常国会及外交部部长。1919年任广州英文《广州时报》副主编。先后任广州市政厅长、广东省建设厅长兼治河督办等职。1921年起,三任广州市市长。1923年10月被孙中山指定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与筹改组国民党。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广州特别市党部。曾作为孙中山代表赴东北联络奉系军阀,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他反对联俄、联共政策,曾筹款资助西会议派。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任政府委员、建设部长、代尹兼省长等职。1926年1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当选为中常委兼青年部长。武汉时期,任国民政府委员兼交通部长,参与汪精卫的分共、清共活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先后任财政部长、铁道部长、考试院长等职。1931年5月南下广州,任粤方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反对蒋介石专权。宁粤合流后,一度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张抗日,与中国共产党和解,不久被蒋介石、汪精卫排斥下台。1932年2月,改任立法院院长,主张实行宪政,任宪法草案委员会主任,主持制定五五宪草。并发起成立“中苏文化协会”,出版一批进步刊物。抗日战争时期,先后提出“抗日救国纲领草案”、“长期抗日方针案”、“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等。曾以中国政府代表和蒋介石特使身份去苏联谈判,先后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中苏商务条约》。抗日战争胜利后,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行宪”时,曾参加副总统竞选,后继续在立法院院长。全国解放前夕,去美国寓居。1964年到台湾。次年任蒋介石总统府资政,后改任考试院院长。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

## 【赏析】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野心支配下,1931年9月18日,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政府对此不作抵抗,命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如遇日军寻衅,务必慎重避免冲突”,致使日军侵华行为肆无忌惮,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积极号召抗日,对此,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奋起响应。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得到了宋庆龄的赞同,并经她等1700多人联合签名后予以公布,引起了强烈反响。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日益猖狂,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议“立即停止你们与我们之间相互残杀的内战及一切仇杀的行为,并立即联合起来,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进行



神圣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驱逐华北，内蒙的日兵并收复失地”，并郑重宣布：“只要你们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立即动员全国对日抗战，并实现民主自由与制裁汉奸，我们和红军不独不妨害抗日，而且用一切力量援助你们，并愿和你们密切合作”。1936年8月10日，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研究两党关系及统一战线的问题，放弃了抗日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并决定起草致国民党的信及关于对蒋政策的党内指示。而蒋介石政府仍无彻底抗日之决心。为了唤醒国民党中枢负责人员觉悟，毛泽东想起了共产党人的忠实友人宋庆龄，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那天，毛泽东给她写了这封言辞恳切的信。

此信称“庆龄先生左右”，表达了毛泽东的谦逊和对宋庆龄的尊重，称呼一出，极容易让人回想起当年。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毛泽东与宋庆龄在武汉分别。十年间，宋庆龄克服重重压力，坚持孙中山革命救国的三民主义，这在毛泽东看来是难能可贵的。所以，信中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对信仰的坚定，容易加深革命的信任，对历史的回顾是为了表达共同的抗日责任。在国难日深、抗日呼声日高的形势下，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仍无彻底悔过之心，毛泽东写这封信，正是要求宋庆龄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希望宋庆龄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同时，附上致国民党中央的信，宣传共产党一贯的抗日主张。

此信语言朴实，明白如话，字里行间流露出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尊敬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期落款处，毛泽东写的是“‘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而不是“1936年9月18日”，其用意分明是在提醒日本入侵中国已有五年了，而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仍无抗日之思想，这就更能唤起宋庆龄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宋庆龄见信后，不负毛泽东的期望和嘱托，多次与中共代表潘汉年、彭雪峰等商讨统一战线之事，并把他们引见给宋子文、宋美龄等人，宋庆龄还多次会见吴稚晖、孔祥熙、孙科等人，宣传联共抗日主张，在国民党中央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力量。为促使国民党“剿共”政策的转变，她又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出席会议，并作了具体实际的活动，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做了《实现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批判了“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言论。在她的带动下，国民党基本接受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由此可见，毛泽东此信，在当时促成联蒋抗日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

## “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sup>〔1〕</sup>

(1936年9月18日)

乃器行知钧儒韬奋先生：

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sup>〔2〕</sup>，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

我相信我们最近提出的民主共和国口号，必为诸位先生所赞同，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民主分子实行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方策。

付上我们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sup>〔3〕</sup>，请求诸位先生予以审察，并以高见惠示我们。

国民党军队继续对于红军的进攻与一切野蛮法令的尚未撤废，到今天仍然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这也就不得不使诸位先生对于我们今天所执行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与实际行动，尚有若干的隔阂与误会。因此，我委托潘汉年<sup>〔4〕</sup>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和转达我们对诸位先生的热烈希望。此致

抗日救国的敬礼！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章乃器(1897—1977)，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生建国会领导人。浙江青田人。1917年浙江甲种商业学校毕业，从事银行工作，升至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积极支持北伐。1927年11月独自创办《新评论》半月刊，评论时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联合上海银行界创办中国征信所，并任董事长。1935年同沈钧儒等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次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他被推为领导人之一，负责宣传工作。同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赞同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此后，发表了大量文章，抨击蒋介石政府“先安内后攘外”政策。1936年11月23日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被国民党拘捕，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发表题为《少号召，多建议》的文章。对国民党存有很大幻想。曾任安徽省财政厅长，对安徽的财政进行了一定的改革。抗战胜利后，他参

加发起并建立了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1948年赴解放区参加筹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1949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财经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粮食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1977年病逝。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

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濬,改名知行,后改行知。安徽歙县人。1914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旋赴美留学。先后在伊利诺斯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和教育。1916年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教务长、系主任。后参加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从事平民教育和教育改良运动。1927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1930年晓庄师范被国民政府封闭后,逃亡日本。次年春回国任《申报》总经理处顾问。1932年在上海郊区办山海工学团,实行小先生制,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1936年夏出国参加世界新教育等会议,会后赴欧美等地向华侨宣传抗日救国。1938年回国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在重庆为战时难童创办育才学校。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救国同盟,次年被增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并与李公朴等创办社会大学。抗战胜利后,积极参加反内战活动,并主办《民主》周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1946年7月25日因劳累过度患脑溢血在上海逝世。著有《中国教育改造》、《斋夫甘言》、《中国大众教育问题》、《行知诗文集》等。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

沈钧儒(1875—1963),爱国民主人士,中国人民救国会领袖,中国民主同盟的重要领导人。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生于苏州。1905年入东京政法大学速成科。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次年5月加入同盟会。曾任浙江教育司长、第一届参议员。北伐军攻克浙江,成立国共合作的浙江省临时政府,任省政务委员兼秘书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拘禁。获释后任上海法政学校(后改为上海法学院)教务长,同时执行律师职务。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1935年12月在共产党《八一宣言》影响下,与马相伯、邹韬奋、陶行知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为发起人之一,被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1936年11月22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他和另外六位救国会领导人,制造七君子之狱。出狱后,立即投入抗日斗争。1938年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行民主、保障民权,积极投身民生宪政运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他原为创议人、发起人之一,因部分发起人反对,直到1942年才得以入盟,救国会同时为盟内政团之一。1944年9月被选为民盟中央常委。1945年冬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任主席。1946年1月作为民盟的代表之一,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后在上海做律师并参加民盟总部领导工作。1947年他反对国民党压迫民盟解散组织,秘密离沪赴香港。1948年1月5日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届三中全会。声明拒绝接受解散民盟总部和停止盟员活动的错误决定,提出民盟联共、反蒋、反美、反封建的政治主张,放弃第三条道路,恢复民盟总部,主席一职暂由他与章伯钧等中央常委轮流代理。同年,响应中共中央号召,领导民盟开展新政协运动。9月前往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12月20日被选为民盟中央副主席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1956年2月任民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63年6月病逝于北京。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sup>[1]</sup> 沈钧儒(1895—1944),原籍江西乐平,生于福建永安。原名德润。早年入圣约翰大学学习。1921年毕业。1922年入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工作。1926年接编《生活》周刊。“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宣传抗日救亡,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1932年与胡愈之等创办生活书店。1933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7月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回国后,参加上海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工作。1936年11月因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后在上海、武汉、重庆相继创办并主编《大众生活》、《生活日报》、《抗战》、《全民抗战》。1941年皖南事变后,再度出走香港。1942年底到苏北解放区。1944年7月24日病逝。后中共中央接受他遗书中的申请,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主要著作编为《韬奋文集》。当时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sup>[2]</sup>

[3] 见本书第170页注[3]。

[4] 潘汉年(1906—1977),江苏宜兴人。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1924年加入郭沫若等领导的创造社。主编进步刊物《洪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坚持革命文化运动。1929年、1930年前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左翼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1931年后是中央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之一。1933年夏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央赣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兼地方工作部部长。遵义会议后被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任中国共产党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代表。1937年9月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后在上海、香港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战工作。1948年夏到1955年春,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和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副市长等职。1955年,被关押审查。1963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1982年平反昭雪。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同南京国民党当局谈判的代表。

## 【赏析】

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在1936年8月至9月份,不仅向国民党政界、军界等高层人士写信,阐明我党主张,而且也给党外人士写信,以求其声援支持。

此信,首先对章乃器等四人的爱国革命精神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章乃器等四人曾于1936年7月15日联合署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

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这恰恰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愿望,也与共产党一贯主张的团结抗日主张一致。但抗日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巩固,抗日战争尚未取得最后胜利,所以,毛泽东希望他们在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方面继续努力,做更多的有益的工作。就在毛泽东写这封信的前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决议》,认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已经进入新阶段的形势下,大有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团结一切民主爱国人士,实现真正抗日救国的最好办法,这就为民主爱国人士指明了方向,必然会得到人民的欢迎,也必然会得到“诸位先生所赞同”。但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放弃对红军的“围剿”,把“我们与先生们远远地隔离着,彼此不能经常共同讨论与交换抗日救国的具体意见”。只好派潘汉年同志前往交换具体意见,其中暗含之意是非常丰富的。

此信层次清晰,脉络分明。第一段,对先生们的抗日言行深表敬意,同时提出了更高要求;第二段,向先生们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方案;第三段,请先生们对《致国民党书》予以审查指导;第四段,表达了与先生远隔不能共商抗日救国具体意见的惋惜之情。四段连贯,转接缜密,既可以看出作者叙述上的技巧,又让读者体味到了作者情与理的激荡。其情其理,感人心魄。

在语言运用上,以朴实见长,毫无造作之意。敬意和希望、信任和理解,无不发自心底,一气贯穿。特别是信尾称“抗日救国的敬礼”,再次表达了毛泽东的坚定立场以及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伟大气魄。毛泽东的这封信,对于当时国统区各界知名人士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致蔡元培<sup>[1]</sup> (1936年9月22日)

子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sup>[2]</sup>，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子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这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宋庆龄先生，何香凝先生，李石曾先生，吴稚晖先生，张溥泉先生，于右任先生，孙哲生先生，居觉生先生，覃理鸣先生，柳亚子先生，叶楚傖先生，邵力子先生，汪精卫先生，陈璧君先生，经亨颐先生，陈公博先生，顾孟余先生，曾仲鸣先生，甘乃光先生，张静江先生，戴季陶先生，陈果夫先生，丁惟汾先生，宋子文先生，陈树人先生，褚民谊先生，彭泽民先生，李任潮先生，李德邻先生，陈友仁先生，邹海滨先生，徐季龙先生，朱雯青先生，白云梯先生，恩克巴图先生，李福林先生，陈护方先生，程颂云先生，唐孟潇先生，朱益之先生，李协



和先生,柏烈武先生,刘震寰先生,谭逸儒先生,张知本先生,冯自由先生,谢慧生先生,茅祖权先生,蒋雨岩先生,孔庚先生,郭沫若先生,沈雁冰先生,陈望道先生,李鹤鸣先生,胡适之先生,章行严先生,周作人先生,钱介磐先生,傅斯年先生,罗家伦先生,段锡朋先生,陈宝镗先生,张东荪先生,彭一湖先生,彭泉舫先生,杨端六先生,胡子靖先生,陈凤荒先生,周谷城先生,舒新城先生,以及一切之党国政人,学术师友,社会朋旧,统此致讯。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蔡元培(1868—1940),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898年9月辞官回绍兴,提倡新学,曾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辛丑条约》签订后,愤清廷腐败,抵沪,任南洋公学教员,爱国女校校长,中国教育会会长,并创办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次年冬,创刊《俄事警闻》(后改名《警钟》日报),揭露沙俄侵略我国东北,影响极大。1904年与陶成章等组织光复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指定为上海分会会长。1907年留学德国,在莱比锡大学研究哲学、文学、美学与心理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文明史,深受尼采唯心主义哲学影响。1911年武昌起义后,归国。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2月被任为专使,赴北京迎袁世凯到南京就总统职。任教育总长期间,积极改革封建教育,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因不满袁世凯专权,与同盟会阁员集体辞职。旋再赴德国留学,从事研究工作。1913年夏,因宋教仁被刺回国,参加反袁。不久又去法国,研究哲学和从事著译工作,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提倡科学民主,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五四运动中,反对政府镇压学生,多方营救被捕者,但不主张罢课。1923年辞北大校长职,赴欧洲从事学术研究。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参与“清党”,一度附和蒋介石,参加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监察院院长兼代司法部部长等职。1928年8月坚辞其他各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至终,为中国新科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1932年12月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副主席,营救政治犯。1937年上海沦陷,移居香港,赞成国共合作。1939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1940年3月在香港病逝。著有《蔡元培选集》。

[2] 见本书第170页注[3]。

## 【赏析】

蔡元培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毛泽东与他的

交往,最先是与蔡元培的《伦理学原理》结缘的。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就批注过蔡元培先生译的《伦理学原理》。他极爱此书,批注甚细,达12000余字。后来为组织新民学会成员留法勤工俭学,毛泽东来到北平,经常向当时兼任“华法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请教留法事宜,于是,毛泽东与蔡元培的交往渐渐增多。毛泽东参加革命后,蔡元培虽与他无法谋面,但仍尽力地帮助他。杨开慧被捕期间,蔡元培曾联合几位社会名士,致电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要求保释杨开慧,虽然未能如愿,但也尽了绵薄之力。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外妥协,对内实行法西斯统治,蔡元培极力反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主张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成为共产党的同盟者,受到了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欢迎和赞许。为了团结爱国志士,早日促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给蔡元培写了此信。

此信简言回顾早年交往,然后,笔锋一转,“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指明了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华民族面临着国破家亡之危。共产党要求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但国民党政府“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入于靡木不仁室息待死之绝境”,国家危亡,民族存续之危,并未引起国民党警醒,他们反而进行所谓“反共”、“剿匪”,使日寇渔利。信中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希望蔡元培予以充分理解和支持。信中对蔡元培的爱国言论予以肯定,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蒋政府立即“停止内战”,“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真正恢复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希望蔡元培在有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的召开之日,在建立统一对外国防政府,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等方面做更多更有意义的工作。通篇书信纵横捭阖,力拔千钧,雄浑飘逸,挥洒流畅,字里行间洋溢着伟人毛泽东那炽热而浓烈的爱国之情。信的主体部分,透彻而又明晰地展现出了国共两党对于抗日救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有力地谴责了国民党的罪恶行径,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始终一贯的抗日主张。在共产党要求抗日而国民党消极观望面前,“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一句,犹如一条主线,贯穿全篇,形成了段落层次递进,有张有弛,环环相扣的气势,极大地唤起了蔡元培先生的爱国热情。书信从头到尾,思路清晰,有理有据,气势贯通,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在国破家亡面前所独有的超人睿智和博大情怀。

感情浓烈,率真,鼓舞人心,是本篇的特色之一。从客观上讲,毛泽东的此信,如果能唤起蔡元培的爱国情怀和民族忧患意识,这并不是全依赖毛泽东的权威,而是凭着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感人的人格力量。

在表达手段上,全信大量使用排比、对比句式,而且长、短句兼用,使得全篇气势恢宏,热情充溢。“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一句,反复运用,催人思索,具有较强的说理效果,令人掩卷难忘,决然奋起。

## “停止内战一致对日”

——致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sup>[1]</sup>

(1936年9月22日)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

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sup>[2]</sup>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sup>[3]</sup>，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务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李济深(1886—1959)，中国国民党爱国民主派人士。民革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字任潮，广西苍梧人。1914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参加护法战争，任粤军一师参谋长，师长。1925年8月国民政府将其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军长。在1926年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战争中，留守广州大本营，任北伐军总参谋长兼后方留守司令，在后方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兼广东省主席。1927年追随蒋介石，在广州举行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参谋

总长,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广东省省长。1929年春,赴南京调停蒋桂矛盾,被蒋介石扣押于汤山。“九·一八”事变后获释,任训练总监、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厅主任。1933年11月22日联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联共、抗日、反蒋,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通电脱离国民党,另组建生产人民党,事败赴香港。1935年七八月间与陈铭枢、蔡廷锴等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张组成“联合战线”抗日、反蒋。全国抗战开始后,恢复国民党党籍,任党政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开始,任桂林办公厅(前身为行营)主任。此间,因参加民主运动,掩护进步人士,桂林办公厅被蒋介石取消。抗战胜利后,到南京,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委员,但与共产党合作,对国民党军队做策反工作。1946年春,在广州与何香凝、蔡廷锴等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被推举为主席。1948年5月5日代表民革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协号召。随后到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工作。1949年9月代表民革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在北京病逝。

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县人,广西陆军学堂毕业。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6年后在滇军、粤桂军任职,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统领、路军司令等职。1923年同孙中山领导的广东大元帅府建立联系,加入国民党。后与同学黄绍竑合作,讨伐旧桂系陆荣廷、沈鸿英。至1925年7月,统一广西,成为新桂系的领袖,建立了在广西的统治。1926年3月广西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任军长。7月率军参加北伐,先入湖南,后援江西。1927年3月当选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4月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其第七军成为南京政府的支柱之一,不久,同蒋介石的矛盾明朗化。8月蒋介石下野。9月国民党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实权把持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10月滇成(宗仁)唐(生智)战争,唐生智战败,桂系势力扩展到两湖。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蒋桂表面合作,他任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桂军)总司令。对奉“北伐”胜利后,兵力发展到20万人。1929年桂系在两次蒋桂战争中失败。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任反蒋派的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及扩大会议成立的国民政府委员。1931年5月参加国民党反蒋各派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非常会议。“九·一八”事变后,宁粤妥协,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西南政委会常务委员、西南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鼓吹反共、反日,首倡“焦土抗战”。1936年发动六一两广事变,主张抗日反蒋。抗日战争初期,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线防御战。1938年1月兼任安徽省主席,3月指挥台儿庄一战,取得重大胜利,名扬全国。1943年9月升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区中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一、五、十战区。抗战胜利后,支持反革命内战,任北平行营主任。1948年4月得到美国支持,当选南京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代行总统职权。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推翻后,赴美就医,长居纽约。1965年7月20日冲破重重险阻,回到祖国,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热烈欢迎。1969年1月病逝于北京。

白崇禧(1893—1966),桂系军阀,国民党政府军事将领。字健生。广西临桂人。1900

年入广西初级陆军学校,辛亥革命后转入武昌第二陆军预备学校,1915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任桂军中下级军官。1923年任广西讨逆军参谋长。次年,与李宗仁的“定桂军”合并,组成广西“定桂讨贼军”,任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与李宗仁、黄绍竑共同消除广西境内其他势力,控制广西。1926年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占杭州、上海等地。1927年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8年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十三军军长,率军去西北。1929年因蒋桂矛盾,被解除兵权。1931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2年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与李宗仁以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统治广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对日战略作战计划。1938年任桂林行营主任,统一指挥长江以南三个战区。后任军训部长、军事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华中军政长官。1948年末,迭次致电蒋介石,要求与共产党“恢复和平谈判”,逼蒋下野,让桂系掌权。后又妄图在南方几省固守。1950年所部被人民解放军打败,去台湾,任蒋介石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崩死于台北。

1936年两广事变时,李济深曾赴广西支持李宗仁,白崇禧反对蒋介石。

[2]见本书第170页注[3]。

[3]指1936年两广事变中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议和避免战争一事。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逐步趋于高潮。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公开发表通电,揭起反蒋的旗帜。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及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名义,饰令所部改称“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该军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任副总司令,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7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两广采取分化手段,任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免去陈济棠所兼各职,任陈济棠部军长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撤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以及一、四集团军名义。余汉谋等通电拥蒋,陈济棠被迫下台,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妥协。

## 【赏析】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中共中央表示,欢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于抗日的进步思想,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态度,并明确提出共产党的一贯原则立场,即在抗日的大目标下,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惟一正确的道路”。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全国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的国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信发出

以后,毛泽东还给国民党要人单独写信,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望或地位积极响应,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个人都亲自发动或支持过“两广事变”,反对过蒋介石,有过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义举。毛泽东抓住了这个背景和三个人的共同点,于9月22日写了这封信。

在信中,毛泽东直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的救国大计方案必须进入具体实施之阶段。“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以及“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所致。这不仅指出了国民党面临的任务,而且也道出了消极抗日的危害。国民党政府能自觉省悟,固然很好,若不自觉,就应“督促批判,责其更新”,这是全国人民和各实力派共同的责任。最后,毛泽东指出,有必要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不亡的开端。

战场上的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提挈千军,席卷天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品格,在此信中亦有所体现。毛泽东认为,致中国国民党书既然已经提出抗日救国大计,就必须立即付诸实施,订立协定,并将此视为抗日救国的开端。言而不行,不若不言;行而不果,不若不行。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使他对看准了的事情,一旦决心要干,就要彻头彻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责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此句充盈阳刚之气,如霆如电,风驰电掣,又如决口大川,浩浩荡荡,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义无反顾、雷霆万钧的人格力量。



## “愿先生速起图之”

——致张学良<sup>[1]</sup> (1936年10月5日)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sup>[2]</sup>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內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內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与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张学良(1901~2001)，著名爱国将领，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奉天陆军讲武学堂毕业后，在其父张作霖奉军中服役，历任团、旅、师、军长。1928年任正太、京汉方面奉军总指挥，抵抗北伐军，被击败退回东北。张作霖死后，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不久，毅然易帜，任国民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通电拥蒋，率部入关，击败晋军，占领天津、北平，助蒋取得胜利。1930年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不战而退，使日军唾手而得东三省。1932年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1934年任鄂豫皖“剿共”副司令。1935年任西北“剿共”副司令。面对既不能抗日复土，“剿共”又屡遭失败的现实，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1936年与杨虎城一起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迫使蒋介石结束内战，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后被长期幽禁。2001年10月14日生夏威夷逝世。

[2] 胡宗南，参见本书第173页注[3]。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一军军长。

## 【赏析】

20世纪30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而且在实践中大胆实行,首先把统战目标对准了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东北军原是以老牌军阀张作霖为首的封建割据色彩极其浓厚的地方武装集团。少帅张学良迫于形势无奈易帜归蒋,但他一方面与日本帝国主义不共戴天,另一方面又与蒋介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弃守东北入关。蒋介石让他反共,阴谋在内战中消灭这支军队。东北军伤亡巨大,蒋介石不但不给补充,还取消了几个师的番号。东北军背井离乡,怀念故土,厌恶内战,不愿当亡国奴,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张学良一方面受东北军爱国抗日情绪的影响,同时也集家仇国恨于一身,对日寇有着宿仇旧怨,加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的影响,必然会产生强烈的共鸣。党中央、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这一情况,决定把争取张学良的工作,当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步骤和关键性步骤,并向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救国主张,展开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统战工作。1936年毛泽东又指示围困甘泉的红军,主动停止攻击,让开大路,使东北军在兵困马乏之时深受感动。1936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中共中央还派周恩来、李克农与张学良进行会谈。1936年10月5日,毛泽东又给张学良写了这封信。

此信称呼“汉卿先生阁下”,表达了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尊重和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接着,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35年8月1日发表《八一宣言》以来,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抗日形势,以及国民党置日寇加紧扩大侵华的事实于不顾,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现实。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对内则扩大内战,大肆镇压各地的爱国进步力量,以致举国上下人心激愤,民怨沸腾。特别是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张学良部“剿共”,这些与中共的主张是不相容的。在信中,毛泽东重申:“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呼吁是为了唤起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必要的自卫方式上的还击;同样是为了唤起国民党当局的觉悟。这就充分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全国共同抗日局面的诚意。

为促进张学良早下决心,把思想、行动统一到抗日救国上来,毛泽东对张学良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希当机立断,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互派代表谈判停战的具体条件,并对张学良提出了“愿先生速起图之”的迫切要求。

通篇书信慷慨激昂,富于极强的感召力。全篇紧紧围绕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主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游移不决的态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贯主张,号召人们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停止对抗,抛却前怨,共赴国难,从而唤起读者的抗日热情。整篇书信思路清晰,有理有据,气势贯通,字里行间浸透着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特有的远见卓识和作为革命家博大恢宏的浩然气势。

##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致许德珩<sup>[1]</sup>等(1936年11月2日)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sup>[2]</sup>，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字楚生。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并任《全国学联月刊》总编辑，是《五四宣言》主要起草人。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回国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和秘书长。1927年后，任暨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并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5年参加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参加发起组织民主评学座谈会，并当选为理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代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二至第七届中央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被聘为黄埔同学会顾问。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在北京逝世。译有马克思《哲学之贫困》、拉法格《家族进化论》、布哈林《唯物史观社会学》等。

[2]1935年底，许德珩和夫人劳君展得悉毛泽东已到达陕北，买了30多双布鞋、12块怀表和十几只火腿，委托中共地下党的徐冰、张晓梅设法转送到陕北。

### 【赏析】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辛万苦长征到达陕北，实现了北上

抗日的愿望。但蒋介石继续其“剿乱方针”，置日寇入侵、国势垂危于不顾，千方百计进攻红军。红军因此面临蒋军“围剿”，给养困难的严峻形势。1936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来到许德珩家，闲谈中，把红军因反动派封锁和“围剿”造成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缺乏等情况告诉了许德珩夫妇。此时的许德珩已任北大教授，与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当他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使用自己的钱到东安市场买了13块火腿，12只怀表和30多双布鞋，委托地下党送到陕北。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毛泽东深为感动。他虽然不知是北大哪位教授所送，但他执意要写一封感谢信。于是展纸提笔，写了这封信。

因为不知哪位教授送的礼物，所以，此信的称呼是“各位教授先生们”。此信首先对“惠赐各物”的各位教授先生们表示“衷心感谢”。抗日的主张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尊重，也在全国人民之中达成了共识。这礼物虽少，但情志沟通，思想一致，这是最可值得珍惜的。所以，毛泽东指出，你们只所以千里迢迢，托送东西，是因为“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从“精神”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深入指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然后，阐明了共产党“团结全国出兵抗日”的主张，并倡言：“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几年以后，在毛泽东赴渝谈判期间，毛泽东才得知火腿、怀表、布鞋均系许德珩夫妇所送。

这封书信有其独特之处：篇幅短小，言简意丰。全篇书信不足130字，却表达了丰富的内涵，既有对各位教授先生们的衷心感谢，又有对各位教授先生们的敬爱之情。是他们，在红军危难之际，伸出温暖的双手，馈赠火腿、怀表、布鞋等物，虽然身在国统区，却崇尚光明与进步，甘愿为革命担风险，做贡献。虽然远隔千里，但心灵和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信尾，毛泽东号召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携手并肩，笑迎未来，共同担负起驱逐日寇、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历史重任。特别是此信用“民族革命的敬礼”一句作结，使作者的感情得以升华，从而表达出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抗日心声。

各位教授先生們：

收到惠贈各物（大鵬、時表等），衷心感  
謝，不勝榮幸！我們與你們之間精神  
上完全是一致的。我們的敵人只有日本，  
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我們正準備  
一切迅速進到團結全國出兵抗

我們與你們見面之期已不遠了。  
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而奮鬥！為  
中華民主共和國而奮鬥！這是全國  
人民的旗幟！也就是我們與你們共同的  
旗幟！謹致  
民族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月二十



## “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致蒋介石<sup>[1]</sup>（1936年12月1日）

介石先生台鉴：

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sup>[2]</sup>。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sup>[3]</sup>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数月来绥<sup>[4]</sup>东情势益危，吾人方谓先生将翻然变计，派遣大军实行抗战。孰意先生仅派出汤恩伯之八个团向绥赴援，聊资点缀，而集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董英斌、孙震、万耀煌、杨虎臣、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高桂滋、高双成、李仙洲等二百六十个团，其势汹汹，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sup>[5]</sup>。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今者绥远形势日趋恶化，前线之守土军队为数甚微，长城抗战<sup>[6]</sup>与上海一二八之役<sup>[7]</sup>前车可鉴。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忽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张国焘 周恩来  
王稼蔷<sup>[8]</sup> 彭德怀 贺 龙  
任弼时 林 彪 刘伯承 叶剑英  
张云逸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董振堂 罗炳辉 邵式平 郭洪涛

率中国人民红军 同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原名瑞元,学名志清。浙江奉化人。早年在保定军官学校和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08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手下任团长,参加中华革命党,从事反袁活动。1922年6月孙中山在广州蒙难,他由上海到广州,登上永丰舰护卫孙中山,获得孙中山信任。1923年8月孙中山派代表团赴莫斯科考察军事及取得武器援助,任他为团长。1924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广州卫戍司令。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展反西山会议派的斗争,他表现积极,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开始进入国民党中央机关。1926年3月20日用阴谋手段制造中山舰事件,迫使共产党员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排挤汪精卫出国。同年5月15日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迫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他本人担任了组织部长(陈果夫代理)、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代理)等要职。6月5日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把革命抛于血泊之中。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1927年“宁汉合流”过程中,国民党内派系纷争,他于8月13日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赴日本,以退为进。1928年1月复任总司令职。2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主席。3月任政治会议主席。对奉系“北伐”胜利后,1928年10月10日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1930年兼行政院长。在此期间,他在新军阀混战中打败所有对手,实现“统一”。1930年冬起,连续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五次大规模“围剿”。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他操纵国民政府,采取对日不抵抗政策,引起国内各界的强烈不满。1931年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和行政院长,回浙江老家,遥控南京政府。1932年1月21日与汪精卫联袂入京,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兼任行政院长,共同掌握南京政府大权。1935年12月汪遇刺之后,继任行政院长。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主张,停止“剿共”军事活动。七七事变后,对外抗日,对内联合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威信空前提高。1938年3月任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统一领导党政军。1943年8月1日林森逝世,继任国民政府主席。1938年10月以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人民不满。抗战胜利后,他一方面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事,同意和平建国方针,签订了两党会谈纪要,一方面调军队向解放区进攻。1946年6月发动全面内战,大失人心。战争初期,一时得势,匆忙召开制宪国大,后召开行宪国大。1948年4月当上中华民国总统。但因无法挽回战争败局,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代理总统,但仍操纵实权。1949年12月10日飞台湾。1950年3月1日复任总统,此后一直连任总统和国民党总裁。1975年4月5日在台北病逝。

〔2〕直罗镇之役,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围剿”的一次重要战役。

1935年7月,国民党军队开始第三次“围剿”陕甘根据地。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处于危险之中。这时,国民党东北军第五十七军的四个师和第六十七军的一个师,分别由甘肃庆阳、合水和陕西郿县(今富县)东西对进,企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加以围歼。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下,红十五军团于11月20日用一个连的兵力将敌人的先头部队第一〇九师诱至直罗镇。将其包围。21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到下午,将敌一〇九师的大部歼灭。红军主力乘胜西进,围歼敌之援军。23日,在张家湾地区歼灭敌一〇六师一个团。24日,全歼由直罗镇突围的残敌。此战共俘敌军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了敌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3〕察,指察哈尔省,当时的辖区是今河北省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

〔4〕绥,指绥远省,1954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5〕山城堡之役,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部队开到甘肃海原(今属宁夏)以西地区休整。国民党调集五个军260多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红军展开攻势,并令马鸿逵、马步青率部在兰州到宁夏(今银川)黄河沿岸布防,堵截红军,企图将红军消灭在陇东地区。红军争取东北军,重点打击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第一军。11月17日,在荫城以西将胡部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击溃。19日,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环县以北的山城堡南北地区,将其右路第七十八师诱入山城堡地区。21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的配合下,对进占山城堡的敌七十八师发起猛攻,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人一个旅又两个团。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击溃了对盐池、定边进犯的敌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粉碎了胡宗南的三路夹击。

〔6〕长城抗战,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的重要战役。1933年1月,日军在西蒙义一指挥下,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3月4日占承德后,向长城各关口进攻。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指挥下,夜袭喜峰口日军,近敌作战,发挥大刀片威力,歼敌五六千人,滞敌阵前。古北口驻军第十七军徐廷瑶部关麟征、黄杰、刘戡师轮番固守,予敌重大杀伤。傅作义统率的第五十九军坚守独石口,自怀柔县出击,夜战、近战、白刃战,迭获胜利。冷口先由东北军缪澂流防守,后第三十二军商震率部支援,多次激战,节节防守。长城抗战获全国人民有力支援,后在南京国民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政策指导下,与日本妥协,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守军退出长城沿线。

〔7〕一二八之役,又称淞沪抗战,指1932年1月28日起,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部等奋起抵抗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

〔8〕王稼蔷,即王稼祥。参见本书第148页注〔13〕。

## 【赏析】

1936年春,红军为抗日救亡,东渡黄河,征讨山西军阀,意在实现直接对日作战。而蒋介石先后调集十个师的兵力,以陈诚为总司令,协同阎锡山截击红军,同时,又命令东北军和西北军进攻陕甘宁根据地。为了保存抗日力量,避免不利作战和国共冲突,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共决定将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并督促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等联名给蒋介石写了这封信。

此信称“介石先生台鉴”，是对蒋介石的尊称，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去年8月以来”，是指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以来，“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正是《八一宣言》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一贯立场。这种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却接二连三地发动直罗镇战役，山城堡战役，置日寇入侵于不顾，全力“剿共”，其结果只能是日本侵略者从中渔利。所以，信中希望蒋介石停止向苏区大举进攻，而把军事力量投入到抗日大局中。为了抗日，避免同室相煎，红军一再退让，不愿与国民党进攻部队正面冲突，以免自相残杀。然而，蒋介石不但不悔悟，反而步步进逼，“大有非消灭抗日红军荡平抗日苏区不可之势”。为了保存抗日红军与抗日根据地，红军不得已进行有节制的反击，这种结果也是由蒋介石专心“剿共”造成的。信中希望蒋介石认清形势，以国家民族为重，一言而决。毛泽东表示，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前线，绥远之国防力量，将骤增数十倍，那么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也得为抗日之英雄。最后，毛泽东再次请求蒋介石当机立断，“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做抗日英雄，馨香万世，还是失国人之心，遭千秋辱骂，是摆在蒋介石面前的两条路。何去何从，只有让蒋介石自己选择了。“反共”是蒋介石的本性，从“中山舰事件”到“整理党务案”，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围追堵截“剿共”，“反共”，都一览无余地暴露出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即使在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五大上的蒋氏讲话也是别有用心，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其实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改编，特别是必须解除武装，才能“以政治方法来解决”。但无论蒋介石的选择如何，历史将以不可逆转之势向着实行团结抗日的阶段过渡了。

此信层次递进，思维严密，情理交融。摆事实，讲道理，是毛泽东的一大特点，也是他思想政治工作最有力的法宝。此信，先从摆事实入手，做到了以事服人。为说明蒋介石孤行己意，对红军围追堵截这个问题，毛泽东列举了直罗镇战役、山城堡战役、向绥远援等事实，使蒋介石在铁的事实面前，无言以对。其次，此信又从讲道理入手，做到了以理服人。红军步步退让，竟不能使蒋介石回心转意，红军为自卫，组织山城堡战役并取得胜利。为了增强说理效果，毛泽东采用正反对比的方法。“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反之，“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心，遭千秋之辱骂”。两种结果，两种前途，两条道路，截然不同。强烈的反差对比，产生了强烈的说理效果。此信还做到了以言感人。“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一段，可谓语重心长，至诚至恳，其中的“敢”、“请求”、“允许”之用，显得委婉含蓄、谦虚谨慎。但信中对蒋介石没有半点强制和丝毫的迁就。相反地，信中晓明大义，指明方向，供其抉择。信中还用典故辅助说理，特别是信中引用“过则忽悔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等警句，起到了警人以醒，昭人以戒的效果。

以事服人，以理服人，以言感人，以典警人，构成了此信的最大特色，并因此使语势跌宕起伏，论述精当，内蕴丰厚，说服力强。此外，信中大量运用正反对比修辞方法，把中共的顾全大局、团结对敌与蒋的一心“剿共”，自相残杀作对比，把停战前与停战后的效果进行对比，把抗日、降日的结局作对比等等，大大增强了说理效果。

## “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致冯玉祥<sup>[1]</sup> (1936年12月5日)

焕章先生：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

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

然而蒋介石先生至今犹孤行己意，对日无抗战决心，对内则动员三百个团大举“剿共”。最近敝军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sup>[2]</sup>其军心动摇已极，然夫己氏<sup>[3]</sup>犹不悟也。

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诚得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sup>[4]</sup>战场。否则，长城淞沪诸役<sup>[5]</sup>前车可鉴，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不及矣！泽东与先生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悔，锡以圭针，敢不拜赐！敝方抗日救国纲领，具见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sup>[6]</sup>，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何评判，愿接高明。

先生老部下董振堂<sup>[7]</sup>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书不尽意。

肃颂

勋祺！

毛泽东 手启

十二月五号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冯玉祥(1882—1948)，国民党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生于河北省青县。1896年入伍。历任北洋陆军旅长、陕西督军。属直系军阀。1922年5月9日任河南督军，不久去豫督职。10月31日任陆军检阅使。曹锟贿选大总统后，他秘密倒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任第三军总司令，进军热河。10月23日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24日与孙岳、胡景翼部组成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1月5日逐溥仪出宫。北京政变后，多次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11月10日与段祺瑞、张作霖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组成临时执政府，段任临时执政。1925年1月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军一军各部统辖于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改称暂编西北陆军，驻察、绥、甘和京兆地区，所部被称为西北军。北京政变后，直系吴佩孚联奉反冯。1926年1月1日通电下野，4月加入国

民党,5月9日抵莫斯科。国民军战败退入绥远一带。8月17日离苏返回,23日被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国民党代表、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9月15日抵绥远五原(今内蒙巴彦淖尔盟),被国民军将领公推为国民联军总司令。17日在五原誓师就职,宣布全军参加国民革命。与北伐军遥相呼应,出师甘陕。1927年4月6日武汉政府决定国民联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任总司令。策应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挥师东进,进攻张作霖部。6月1日攻占郑州,开封等地,与武汉北伐军会师。之后,参与郑州会议、徐州会议,策划反共、宁汉合作活动。1928年4月与蒋阎桂联合对奉张“北伐”,攻占天津。10月南京政府改组,任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但与蒋矛盾日益尖锐。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任反蒋派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失败后,于10月23日宣告下野。余部被国民政府改编为二十九军,宋哲元为军长。“九·一八”事变后,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3年5月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推动下,在张家口同原国民军将领吉鸿昌(共产党员)、方振武等发起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同盟军把日伪军全部驱逐出察哈尔境,部队发展到10余万人。但受到南京政府压力,于8月14日离张家口去泰山。1936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2月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1937年8月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不久,改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对日作战。但所辖国民党军队不听指挥,同年冬,战败被撤去军队指挥职务,先后在武汉、重庆闲住。1946年9月任国民政府考察水利专使,赴美考察水利。强烈抨击国民党独裁、内战方针,主张和平、民主建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7年12月20日南京政府撤其考察水利专使职,令立即回国,遭拒绝。1948年初,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该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7月偕夫人李德全离美返国,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1日所乘苏联“胜利号”船在黑海海面起火,受伤身亡。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2]参见本书第198页注[5]。

[3]夫已氏,词意为那个人。

[4]绥远,参见本书第198页注[4]。

[5]长城抗战,参见本书第198页注[6]。

淞沪抗战,参见本书第198页注[6]。

[6]参见本书第170页注[3]。

[7]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西北军任师长,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1930年任国民党政府第二十六路军旅长。1931年被调到江西“剿共”前线。同年12月14日与季振国、赵博生、黄中岳率部在宁都起义,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十三军军长。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红五军团总指挥、军团长。曾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率部担任后卫。1935年7月任红五军军长。1937年1月20日在甘肃高台西路军西征中战斗牺牲。

## 【赏析】

冯玉祥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拥护者,被毛泽东称为



“置身民主，功在国家”的民族英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法西斯独裁统治。1933年，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取得重大胜利。其后，日蒋勾结对其造成了内外夹击之势，致抗日同盟军遭受失败，冯玉祥被迫再上泰山，读书修身，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1933年11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与国民党内李济深等部分反蒋势力，合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及时派出代表参加，予以声援和支持。冯玉祥的一系列壮举及鲜明的抗日态度，使毛泽东极为钦佩，并把冯玉祥作为团结争取的对象。1936年12月5日，毛泽东给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写下了这封情深意切的亲笔信。

“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一句中三个“从”字的运用，恰如其分地刻画了冯玉祥抗日壮举在全国的影响。正是因为同是主张抗日者，所以，“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信中陈述了值此国家危难关头，人民以及不同党派的最重要任务，是把民族斗争置于诸争之首。虽蒋氏动员300个团大举“剿共”，共产党人“略施还击，胡宗南军一旅溃败，一旅覆灭，其军心动摇已极”，但蒋仍未反悟。信的第四自然段用较大的篇幅说明在蒋氏仍无醒悟之时，冯玉祥“登高一呼，众山齐应”，说明冯玉祥并不是孤军奋战，共产党和广大人民是其坚强的后盾。最后的“先生老部下董振堂诸君，大有进步，堪以告慰”一句，看似闲笔，却暗含毛泽东丰富的统战思想。

全信短短数百字，却用六个“先生”称谓，表明毛泽东为人的谦逊和对冯玉祥的敬重。此信使冯玉祥感到欣慰和振奋，也使冯玉祥更加了解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对坚定其抗日救亡的决心无疑是一大激励和推进。

此信简洁有力，整饬条理，包容量大。第二自然段只用一句话，就把当前的形势和出路分析得极为透彻，表现了毛泽东对时局和前途深刻明晰的认识。第三自然段揭示出蒋介石政策的反动和军心的动摇。“略施还击”一句，表现出毛泽东对重庆“围剿”的轻蔑。第四自然段为中心所在，毛泽东指出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和决心。因为写信的对象是熟通文言的冯玉祥，所以，毛泽东在信中也多用凝炼，整饬的文言。例如：“日蹙国百里，虽噬脐而无及矣！”（每天缩小国土上百里，即使后悔也没有用了！）“处虽异地，心实无间，倘得不吝教诲，锡以圭针，敢不拜赐！”（虽然不在一个地方，但心相通，倘若得到你的指教，给我指导，怎么敢不接受呢？）“前曾遣人付上，谅承鉴察，有所评判，愿接高明。”（在此以前曾派人送上，希望得到你的评察，有什么评论，我们愿接受您高明的意见。）所有这些文言词句的巧用，给此信增添了独特魅力。

## “共维大局”

——致阎锡山<sup>[1]</sup> (1936年12月22日)

百川副委员长勋鉴：

陕变<sup>[2]</sup>突起，事出非常。从电讯中知我公反对内战，有“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敝方主张详删皓两电<sup>[3]</sup>，“抄陈台鉴。敝方为大局计，不主决裂，亦丝毫不求报复南京，愿与我公及全国各方调停于宁陕之间，诚以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目前宁军<sup>[4]</sup>攻陕甚急，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至于红军，只要南京停止“剿共”政策，赞同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并划定适宜之防地，决不向南京管辖境内进攻。对我公领导之晋绥<sup>[5]</sup>方面，前遣彭雨峰<sup>[6]</sup>晋谒，已将鄙意奉陈。数月来我公及傅将军在绥东英勇抗敌<sup>[7]</sup>，与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取消防共会，尤为敬佩之至。惟现宁陕相持甚急，如宁方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战争范围扩大，所需于我公协助之处甚多。如何使晋绥陕甘四省亲密团结，联成一气，俾对国事发言更为有力之处，敬祈锡示南针。尊处与敝处电台联络亟宜从速建立，再从吉县，延长建立徒步通信站。如荷同意，电台即从一月十五号起开始发报。徒步通信站在吉县者尊处任之，在延长者敝处任之，在平渡关两岸各备渡船一只，约定专任通信，双方武装互不过河。晋陕经济通商亦愿早日实行，恢复寻常关系。吉县县长璩象咸先生今春随军来陕，屈在敝处教育部工作者数月。璩先生诚笃君子，对敝方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知之颇悉，倘得随时往来，甚为欢迎。彭雨峰在尊处多承优遇，感荷实深，尚祈随时予以指导，使之有所遵循。一切统祈详示。

敬颂

公祺！

毛泽东 敬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五台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辛亥革命后历任山西都督、省长，长期盘踞山西。在直、皖、奉三系之间投机自保。1927年投入国民党集团，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1930年与冯玉祥等出兵反对蒋介石，失败后，逃往大连。1931年又被蒋介石委任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九·一八”事变后，支持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阻挠中国工农红军开赴抗日前线。1937年起，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和

推动下,曾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建立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进行抗日。1939年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屠杀共产党员和牺盟会进步分子,摧残山西的抗日民主政权。此后,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并暗中与日本侵略者勾结。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1949年3月太原解放前夕,潜逃广州,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后去台湾,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长、总统府资政。1960年死于台北。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2] 陕变,指西安事变。又叫双十二事变。“九·一八”事变和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不抵抗,继续进行反共内战。被调到陕甘一带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十七路军)广大官兵要求抗日,反对内战。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认识到“剿共”没有前途,秘密与红军订立了合作抗日协定,一再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仅拒绝张、杨的要求,而且调嫡系部队进驻陕甘,监视张、杨的行动,强迫他们继续进攻红军。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并屠杀当地抗日青年。张学良、杨虎城再三痛述联共抗日主张,概遭蒋介石拒绝。张、杨不得已发动“兵谏”,于12月12日在临潼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逼蒋抗日。同时,逮捕其军政要员陈诚等十余人;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主任委员;通电全国,提出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事变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企图借机扩大事态,以“讨伐”张、杨为名,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以建立亲日政权。中共中央正确分析了形势,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6日,周恩来等应张、杨之邀到西安,团结张、杨,共同努力,使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战议和、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等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全国性抗战局面形成。

[3] 删电,指1936年12月15日毛泽东等红军将领就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电报。皓电,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936年12月19日提议召集和平会议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4] 指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党政府中亲日派何应钦指挥的向陕西进逼的军队。

[5] 绥,指绥远省。参见本书第198页注[4]。

[6] 彭雨峰,即彭雪峰(1907—1944),河南镇平人,原名修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考入北平民国大学。1930年后,任红八军大队政委和第六师政委,红三军团二师政委、江西军区政委、红军大学政委。1934年10月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后任中央军委第一局局长、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红一军团四师政委。1937年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处长。1938年后,任新四军驻河南确山竹沟留守处主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新四军六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四师师长兼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9月11月在河南夏邑八里庄指挥作战时牺牲。

[7] 1936年8月和11月,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两次进攻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东北地区。绥远驻军傅作义等部奋勇抗击,并于11月收复百灵庙等地。

傅作义(1895—1974),著名爱国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字宜生,山西荣河(今临猗)人。1910年入太原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在太原参加反清起义,任学生军排长。

1915年入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在阎锡山部任营、团长。1926年直奉“讨赤”之役中，率部守天镇，冯军强攻三月而不下，因功升旅长、师长。随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率部与奉军作战，袭占涿县后，被张学良重兵包围，固守三月而不破，以勇闻名于世。1928年任第三集团军第五军团总指挥兼天津警备司令。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任晋军第四路军指挥官，失败后移防绥远。1931年后任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华北军第七军团总指挥，率部参加长城抗战。1936年发动绥远抗战，取得百灵庙大捷，收复绥远失地。抗日战争时期历任第七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等职，先后率部参加忻口会战、包头战役、绥西战役、五原战役，善用奇袭，多有斩获。解放战争时期，任华北“剿总”总司令。1949年天津解放后，接受中共和平解放北平条件，率部起义，对北平、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建国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4年病逝。当时任绥远省主席，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军军长。

## 【赏析】

阎锡山长期割据山西，以尖钻刁滑而臭名昭著。不论是与蒋介石，还是与共产党交往，他总是以保护自身利益为前提，故又有“铁算盘”之称。“九·一八”事变后，他曾想游刃于国民党、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坐收渔翁之利。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乃至亚洲的野心绝非阎锡山所能想象。当他意识到惟有抗日，才能达到保全自己的目的时，便与西北的红军建立了联系。1936年10月，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薄一波等五人以个人身份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太原协助阎锡山从事抗战准备，从而使山西等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对待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权势力中出现了以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讨伐张、杨和以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亲美派同张、杨进行谈判以营救蒋介石的两种主张。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于同年12月17日派周恩来飞抵延安，着力协调，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了条件。阎锡山对此也发表了看法，即“共维大局”。红军东征的胜利，曾使阎锡山尝到了厉害，红军回师后，毛泽东又于1936年5月25日致函阎锡山，揭露蒋介石强制、监视晋军反共的险恶用心，表示红军愿与晋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阎锡山因恐遭蒋介石排挤、控制，又看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人民中的影响日益扩大，被迫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中共派代表赴山西谈判。

12月22日，毛泽东给阎锡山写了这封信。毛泽东对阎锡山反对内战、同意抗日、共维大局之主张，表示钦佩，接着向阎锡山阐明了共产党红军的立场，即在“陕变”问题上顾全大局，不主决裂，不求报复南京。同时明确指出：“非如此则损失尽属国家，而所得则尽在日本”。同时表明，只要南京当局停止“剿共”政策，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划定各自适宜的阵地，则红军绝不向南京管辖的地区进攻。毛泽东对西安事变可能出现的非和平结果作了回答：“如宁方（亲日派何应钦部）坚持进攻而无丝毫转圜之余地，则红军势难坐视”，绝不陷朋友于危险境地。最后，毛泽东还对阎、共双方建立通讯联络提出了建议。

全篇书信，语气肯定庄重，语言运用慎重、丰富，深入人心。“蜀胜钦佩”、“尤为敬佩之至”、“一切统祈详示”、“敬祈锡示南针”等语句的反复运用，显得沉着稳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统战艺术。





(1937 年的毛泽东)

## 海人施政篇



##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

——致徐特立<sup>[1]</sup> (1937年1月30日)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sup>[2]</sup>，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什么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 徐特立(1877—1968)，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原名懋恂，又名立华，字师陶。早年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辛亥革命后，被推选为湖南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曾赴日本考察教育。1913年后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五四运动期间，提倡并亲自参加留法勤工俭学。1924年夏回国，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后创办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8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

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后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自然科学学院院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员。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8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编为《徐特立文集》、《徐特立教育文集》等。当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

[2]1913年至1919年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期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求学。

## 【赏析】

徐特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发现了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把他视为得意门生。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他们一起战斗,一起工作。徐老的崇高风范和伟大人格使毛泽东非常敬佩。毛泽东心忧天下、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也使徐特立对他十分挚爱。1937年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六十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之情,给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部部长的徐特立先生写了这封信。

此信以赞扬和敬重的语气起笔:“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这既是对徐特立20多年革命生涯的崇高评价,又是对他伟大人格的无比信任和赞赏。接着,毛泽东运用对比方法,以“有些人”的不良表现,从七个方面来反衬徐特立的高风亮节和崇高风范:一是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在大革命失败后,许多意志不坚定的党员脱党甚至投敌,徐特立却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共产党。二是虚心好学的自觉性。徐特立虽然懂得很多,但时刻认为不足,与有些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满得很”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三是襟怀坦白的品质。徐特立光明磊落,言行一致,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手里做的,而“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未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四是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作风。徐特立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不搞特殊,没有架子,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而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五是有很强的服从党纪军纪的纪律观念。徐特立是处处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约束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六是“三个第一”的革命情操。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自己第一。七是拣重担子挑的革命精神。徐特立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从这七个方面,毛泽东对徐老进行了高度赞扬,对与徐老风范差之千里的“有些人”的表现进行了批评,并衷心地表示:“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这也表达了毛泽东高尚的革命情操。在信末,毛泽东敬祝先生健康长寿,并祝愿他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毛泽东尊敬徐特立,并不仅仅是尊敬“二十年前的先生”,而是更尊重他的一贯积极、坚决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先生的高风亮节永远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所以,毛泽东谦逊地说:“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模范人物的事迹是值得肯定的。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十分重视对模范人物的表扬,这并不仅仅是为了鼓励这些党的先进分子继续奋斗,而是为了给人们树立学习的榜样。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赞扬张思德、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赞扬刘胡兰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避开了空洞的说教,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个真实可见的人物,使人们可感、可知、可信、可学,从而使众多模范人物所表现出的高尚品质和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发扬光大。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号召全党全体人民向徐特立学习,也正是为了这一点。

善于运用排比和对比是此信的一大特色。几项对比,娓娓道来,生动地刻画出徐特立先生无私无畏、老当益壮的革命精神,鲜明地批判了落后者贪生怕苦、自私自傲的错误和观点。七处排比,扬善弃恶,充分表现出涌动在伟人胸中的爱师之意、尊师之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信开头称“徐老”,并称“同志”,最后,致老师的敬礼又是“革命的敬礼”,从这寻常字眼中,却不难看出毛泽东不仅把徐老当作自己的老师,更是把他当作革命征途上一位十分难得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友来看待的。

此信语言朴实无华,情感自然流露,不仅正确地评价了徐特立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也为全党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徐光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現在  
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將來必定還是  
我的先生。當新中國的時候，許多生  
產黨員離開了共產黨，有些甚至跑  
到敵人那邊去了，<sup>你</sup>卻在一九二七年秋天  
加入共產黨，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  
積極的。從那時至今長期的艱苦  
斗争中，你比許多青年壯年黨員還要積  
極，還要不怕困難，還要虛心學習  
新的東西。什麼苦？什麼身體精神不  
行？什麼困難障礙不？在你面前

却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  
却做了畏葸不前的藉口。你是懂得  
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  
那里只有丰桶水，却偏要一滴一滴。  
你是心宽恕的，就是口宽恕的与心宽  
裕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  
角落，却未免藏着一些耿耿于怀  
耿耿于怀的东西。你是在任何时候都是  
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  
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事。你是善于表现  
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新的纪律的模  
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就程度不足

東溥人家的，自己並不吃虧在內。你  
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長青  
人卻是出風頭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  
第一。你總是揀這事做，凡事也去躲  
避責任，而在有些人則只願意揀輕  
鬆事做，遇到把重責他們的問題就  
躲避了。所有這些方面我都是  
佩服你們，願意繼續地學習  
你們，也願意在老毛同志幫助  
你。當你六十歲生日的時候



寫這封信祝福你，願你健康，  
願你長壽，願你成爲一名革命先人  
與重慶人民相擁抱。此致  
革命的敬礼！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  
於延安。

##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

——致埃德加·斯诺<sup>[1]</sup>(1937年3月10日)

斯诺先生:

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在还好?

我同史沫得列<sup>[2]</sup>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

此问

健康!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作家。1928年秋,来到中国,先后担任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助理主编,以及《芝加哥论坛报》、《纽约太阳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记者。他报道了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他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时,报道并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夏,他冲破重重障碍,访问陕北革命根据地,写下了闻名中外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50年代,他在美国受到麦卡锡分子的迫害。1959年,被迫迁居瑞士。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华,著有《大河彼岸》、《漫长的革命》等书,从各个侧面反映新中国的情况。1972年2月,在瑞士逝世。

[2]史沫得列,即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4—1950),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中国。1937年初访问延安。著有《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等书。

### 【赏析】

1936年6月,经宋庆龄介绍,斯诺冲破国民党重重封锁,进入“红色世界”,在延安的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这次奇特的“西行”使斯诺惊异地发现:在贫瘠的中国西北部,竟聚集了中华民族的精华。在谈话中,毛泽东对抗战形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与国际事务、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自己的革命经历及红军长征等等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深信的中国人民必胜、日本帝国主义必败的观点,使斯诺觉得很是新

鲜,对共产党、毛泽东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曾称毛泽东是“窑洞里的预言家”,并把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视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次采访中,毛泽东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四个月之后,斯诺写出了轰动全球的《西行漫记》一书,成为第一个让世界了解毛泽东的外国人。

毛泽东非常赞赏斯诺,这并不仅仅因为他与斯诺个人之间的深厚友谊,更重要的是斯诺是第一个客观地报道“红色世界”,为统一战线而做出贡献的外国人。毛泽东曾这样说过:“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同情被压迫民族解放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通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与斯诺友好交往的思想根源。斯诺离开延安不久,美国进步作家、新闻记者史沫得列于1937年初来到了中国,毛泽东在见到史沫得列后,自然会想起斯诺,于是写了这封信。

在信中,毛泽东不无深情地写道:“自你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斯诺的正义感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时时”之用,说明了想念之深。时光如箭,一晃一年的时光过去了,但友情与日俱积,“你现在谅好?”一句,既有对旧日朋友的缕缕牵挂,又有对远方朋友的深深祝福。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变本加厉,中华大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要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共已出台了很多政策,而国民党政府顽固不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战胜日本侵略者,就必须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在国内国际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广泛宣传和舆论的支持。所以,信中说:“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收阅,并为宣传。”表达了毛泽东对斯诺的无比信任和非同寻常的崇高友谊,这种友谊不仅永远渗透入两人的生命历程中,而且永远鼓舞着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1939年斯诺再访陕北,写就介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为亚洲而战》一书。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分别于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三次访问中国,都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斯诺后来发表了许多介绍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文章,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贡献。1972年2月,斯诺病逝,部分骨灰运往北京,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这一切,不正是毛泽东与斯诺、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吗?

## “惟有斗争乃能胜利”

——致何香凝<sup>[1]</sup> (1937年6月25日)

香凝先生：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sup>[2]</sup>，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sup>[3]</sup>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忽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看了柳亚子<sup>[4]</sup>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六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刊印

### 【注释】

[1]何香凝(1879—1972)，国民党左派，著名女革命家和政治活动家。原名谦，又名瑞谦。广东南海人。廖仲恺夫人。1903年初，入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后转入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05年参加同盟会，成为最早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得到孙中山以及留日革命学生的敬重和信赖。1908年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1910年秋毕业。辛亥革命后，同廖仲恺回到广州。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14年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和护法运动。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她坚决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忠实执行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孙中山逝世和廖仲恺遇难后，更加坚定地为实现孙中山的遗志而勤奋工作。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继任妇女部部长。在北伐战争中，积极组织慰劳队和救护队，随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辞去国民党政府一切职务，回广州创办仲恺农工学校。“九·一八”事变后，从国外回到上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同宋庆龄、冯玉祥等联名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主张联共抗日。随后同宋庆龄等发起“救国入狱运

动”，抗议蒋介石非法逮捕全国救国联合会领袖“七君子”。1938年汪精卫投敌叛国，她奋笔疾书，怒斥卖国贼的罪恶活动。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立即同宋庆龄联名通电，严厉斥责蒋介石的反共阴谋。解放战争时期，积极组织国民党内的民主力量从事反蒋活动。1946年秋，同李济深等在广州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同李济深等联合反蒋的国民党组织及党员在香港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选为主要领导人。同年5月，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民主人士一起发表声明，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4月由香港到达北平，6月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主席等职。1972年9月1日在北京逝世。

〔2〕《双清词草》是廖仲恺的诗词集，192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影印出版。

〔3〕承志，即廖承志（1908—1983），广东惠阳人，廖仲恺、何香凝之子。1925年加入中国国民党。“四·一二”政变后赴日本。1928年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国际海员工会工作。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全国海员工会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在随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曾被张国焘拘捕。抗日战争爆发后，相继在上海、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1942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出狱后，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新华社社长。建国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青年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外交部党组第二书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华侨大学校长。曾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中日友好协会会长。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第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6月10日在北京病逝。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4〕柳亚子，“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题字，共同表达胸中的愤慨。参见本书第323页注〔1〕。

### 【赏析】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定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深得社会各界的拥护。抗日民主人士何香凝不仅自己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赞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而且还把儿子廖承志送到延安参加革命。她还专门托人为毛泽东送去毛笔、自己的画集和廖仲恺的诗词集《双清词草》，以表达她对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抗日主张的赞同。毛泽东为此写了这封信，作为答谢。

早在20年代，毛泽东就与何香凝有过交往。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后曾任宣传部代理部长。对于何香凝，他十分尊崇，敬为先生。在此信中，他称赞何香凝继承孙中山遗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

的不懈斗争,称赞她是中华民族的模范,并表达了自己对何香凝革命精神的敬仰之情。

毛泽东极善于团结党外先进的民主人士,一起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不仅对于何香凝这样的左派政治活动家,对于像柳亚子那样的有先进民主思想的旧文人,也是努力团结他们一同前进的。柳亚子是著名的民主人士、诗人,当时他经常为何香凝组织的“寒之友社”成员的画题诗、题字,表达对时事的愤慨。毛泽东看重他们的为民主奋斗的可贵的一面,同时又以深刻的洞察力,指出了斗争的长期性,“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方能达到”一句,既是对何香凝的鼓励和引导,又表达了毛泽东对斗争前途坚定不移的信念。

此信首先对何香凝先生赠送礼物以鼓舞斗争之意,表示深深的谢意,并表示惟有多做点工作,才能答谢其厚意。毛泽东赞扬了何香凝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模范。对于何香凝的革命行为,不仅共产党人敬仰,而且还有全国民众。信中告诉何香凝,廖承志在延安很好,希望她不要挂念。毛泽东在信中还表达了对柳亚子先生的想念之情,赞扬他是一位有骨气的文人。

全篇围绕着一个鲜明的主题来阐述,即:为胜利而斗争!“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努力”等句子的运用,使斗争的主题贯穿全信,始终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由“逼蒋抗日”逐渐地发展为“联蒋抗日”,为扩大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多次进行谈判。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华民族的危机加深,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捐弃前嫌,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积极的让步,迫使国民党在五届三中全会上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但是,这种“接受”毕竟是逼迫的结果。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高潮,尽量动员全国人民一致抗战以争取胜利,毛泽东强调指出:民族统一战线既联合、又斗争。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尽量支持国民党内外力量,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要针锋相对,不能无原则地让步。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逆流之时,共产党必须坚决团结各民主党派、各方面爱国进步人士和各阶层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须服从于民族斗争,推动民族斗争。这种阶级斗争,目的并不是推翻国民党的政权,而是为了使它投降不了,反共不成,继续成为抗日战线内不可分割的力量。在斗争中,毛泽东运用灵活多样的方法,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斗争中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对于国内各阶级相互关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和策略。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这种斗争的灵活性,来源于他深邃的辩证思维能力和严谨的实事求是态度。正是由于真正掌握了辩证思维的方法,他才能够着眼事物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革命斗争的方针、政策;才能够全面分析事物向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才能从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中,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最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这种政策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清醒地、全面地驾驭着整个抗战局势的发展,并在整个抗战大局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由此观之,信中所谓“惟有斗争乃能胜利”的话语,是何等意味深长啊!



第 號

承蒙先生：

承蒙先生承蒙先生及雙清

詞筆，即收到了！太感謝。沒有

什麼奉送。先生，惟有多做點

工作，作為謝厚意之物。先生

以盡光滿斗中之意。我雖不知在

世竟乃好。今日之事，惟求斗中

乃能勝利。先生一家人繼承好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先生傳統，苦斗不屈，為中華民族  
樹立模範。果仰瞻此有全國  
民衆之擁護，東華少數人而已。  
而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覺得他好。  
此勿中意。十年不見，先生知  
此較老了些。然心則更年。青！這  
士不寬以所。有了柳葉下生。  
先生，為兄上人，信時乞為致意。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第 號

像這樣有骨氣的正當文人，可惜太  
少，得二三十年前電話說叫做人中  
麟鳳，<sup>他</sup>知道他現時的這片意見  
為何？<sup>他</sup>對事所有轉機，想  
先生必力之壓，<sup>他</sup>竟成之域，方須作也  
大努力方能達到。敬祝  
健康！  
白 氏 東上

二月廿三日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 “不可自夸红军长处”

——致彭雪峰(1937年8月10日)

雪枫同志<sup>〔1〕</sup>：

各电均悉，甚慰。

甲、同各方接洽，在积极推动抗战的总方针下，要有谦逊的态度，不可自夸红军长处，不可说红军抗日一定打胜仗，相反要请教他们各种情况，如日军战斗力、山地战、平原战等等红军素所不习的情形，以便红军有所根据，逐渐克服困难。不可隐瞒红军若干不应该隐瞒的缺点，例如只会打游击战，不会打阵地战，只会打山地战，不会打平原战，只宜于在总的战略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指挥，不宜于以战役战术上的集中指挥去束缚，以致失去其长处。这些都应着重说明。根据山地战与游击战的理由，红军要求位于冀察<sup>〔2〕</sup>晋绥<sup>〔3〕</sup>四省交界之四角地区，向着沿平绥路<sup>〔4〕</sup>西进及沿平汉路<sup>〔5〕</sup>南进之敌作侧面的袭击战，配合正面友军战略上的行动。红军技术与装备十分贫弱，也要使他们知道，并照昨电所开五类十九种物品要求补充，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

乙、因时局紧急，红军不待改编即拟出动，到大同后再行改编。朱周<sup>〔6〕</sup>已于九日飞京，俟接其回电立即出动。如他们问及如何还未改编，则答以因为南京的拖延（不发表宣言，不决定政治纲领，不发表指挥部，也不颁布番号，最近几天内才把番号颁下，但指挥部还未委任）。

丙、出动路线，因洛川至府谷千余里无粮，延安南北八百余里颗粒无买（机关粮食从晋西与西安买来），因此决不能走陕北，只能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此点与阎<sup>〔7〕</sup>交涉一定要办到。

丁、太原公开办事处立即开设，你为主任。

毛泽东

八月十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雪枫，即彭雪峰，当时被中共中央派往山西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1937年8月后，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参见本书第204页注〔6〕。

〔2〕察，指察哈尔，旧省名，原辖今河北省西北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1949年改辖今河北省西北部及山西省北部地区，1952年撤销。

〔3〕绥，指绥远，旧省名，辖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1954年撤销。

〔4〕平绥路,即北平(今北京)至绥远包头铁路,今京包路。

〔5〕平汉路,指北平(今北京)至汉口的铁路,今京广一段。

〔6〕朱周,指朱德、周恩来,当时他们应蒋介石邀请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7〕阎,指阎锡山,当时任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 【赏析】

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后,日军打开了侵占华北的门户,随后,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疯狂向纵深推进。山西危在旦夕,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坐卧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把加紧联合阎锡山抗日的任务摆上重要议事日程。毛泽东全盘分析山西的地形和敌情特点后认为:一、山西是红军通向华北抗日的门户,是红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俯瞰河北平原的有利之地。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开展游击战争,不仅有利于钳制华北日军的纵深侵入,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红军发挥山地游击战的优势,消灭敌人。二、在山西存在着与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因为,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军占领平津后,阎锡山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乘机进军山西,阎锡山深感地盘难保。为此,阎锡山表现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共产党和红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三、搞好同阎锡山的统战关系,对于粉碎蒋介石阴谋很有帮助。当时,蒋介石企图对红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两个师开往蔚县一带集中,一个师开往冀东一带。毛泽东认为,蒋介石这样做,包含着极大的阴谋,为红军安全计,为隐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心走韩城渡河,经蒲县、孝义、汾阳到大同集中,决不走平汉路,把红军都放在山西,相互策应,避免遭遇不测。在分析山西局势基础上,毛泽东加紧了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早在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在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同时,委派代表争取阎锡山抗日。1936年10月,薄一波等五人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以个人身份接受山西地方实力派邀请,到太原协助阎锡山从事抗战准备工作。北方局在山西成立了由薄一波任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从事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负责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与阎锡山建立了特殊的统战关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阎锡山采取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态度,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太原建立了和延安直接联系的电台。“七七事变”以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抗日前线,中共在山西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1937年7月20日,毛泽东为力保平津、张家口致电阎锡山,赞颂阎锡山“老成谋国”,表示“至为钦佩”,并指出:“非抗战无以图存。”

红军如果向山西挺进,无论是行进路线、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还是后勤保障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同阎锡山具体谈判,以便协商解决。为了巩固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指导山西的统战工作,毛泽东于1937年8月10日给当时在山西等地做统战工作的彭雪峰颁发了此电。

这份电文一方面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谦虚胸怀,另一方面又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卑而骄敌的军事韬略。卑而骄敌谋略,是指设法使敌人骄傲放纵,造成敌人心理麻痹骄狂,然后乘此一举击败敌人的谋略。

卑而骄敌的谋略,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示敌以卑辞,以骄其心;二是示敌以弱势,以



纵其志。二者之目的都在于造成敌方心意骄傲。傲则轻敌，轻敌则必败。我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大凡骄将，多因兵力强盛而轻敌，骄心必生；或因屡战屡胜而懈怠，骄情必长。卑而骄敌谋略的运用，可以使敌人过高地估计自己，或过低地估计敌人，在作战指导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也可以使敌人松懈，放弃警惕，在精神上解除武装；还可以使敌人防备不周，造成许多可击之隙。从这个意义上讲，卑而骄敌，意在夺其心、乱其谋、丧其志。骄敌的方法很多，比如示敌以弱，示敌无备，示敌美词等等，都可以起到麻痹对手、骄其心、丧其志、乱其谋的作用。明·周承邦《兵家要领》：“骄则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忧其寇，不惜其下，患言逆耳，良士疏斥；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敌窥其意，故率欺辞而降其礼，佯为败而示其怯，……使我骄卒惰，方始乘之。”骄兵必败，诚为千古之训。所以，有为之将，不怕被敌人看不起，反而故意让敌人轻视自己。

毛泽东借鉴骄兵必败的历史教训，要求官兵一定要养成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他说，“共产党员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应该言必信，行必果，不傲慢，诚心诚意地和友党友军商量问题，协同工作，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共产党员“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从谋略学的角度来讲，毛泽东汲取“卑而骄之”的谋略精华，以谦逊的手段，掩盖高明的意图。他把卑而骄敌的谋略，运用到同友党友军的接触之中。事实上，在中国革命长期的斗争中，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不断总结革命实践的经验，逐步总结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军事思想，在战斗和战役上也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打法。红军不断壮大，已不再面临生存问题，而是面临迎接机遇、乘隙发展、壮大自己的问题。但是，新的形势使毛泽东意识到：打败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需要谦逊；巩固统一战线，避免国共之间的磨擦、冲突，需要谦逊；建设一支富有智慧的统战干部队伍，同样需要谦逊。谦逊，不仅是人民军队建设的需要，也是实现革命战争任务的需要。在此电中，毛泽东一再要求彭雪峰同各方接洽要有谦逊的态度，敢于示弱，善于示弱，而不是张扬、标榜红军的优点。从整篇电报来看，毛泽东始终没有强调自己的优势，而是有意识地摆出了自己的弱势，用己之“弱”点，掩盖自己的“强”点，这正是毛泽东卑而骄敌谋略在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正是在毛泽东这一谋略指导下，中共代表与同盟者友好合作，在抗战初期打消了敌对情绪，为八路军担负“配合国军”、“侧面作战”、“到四角地区”等任务，为争取抗日所需给养装备等，找到了合理的现实依据。



## “何时走，我来看你”

——致周素园<sup>〔1〕</sup>（1937年10月6日）

素园老先生：

示敬悉。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告我。将来我们经费较充裕的时候，可以每月帮助先生一点生活费，大体上等于在延安生活一样。这完全因为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丝毫也不是为了别的。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并告我。何时走，我来看你。

敬礼！

毛泽东

十月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素园（1879—1958），贵州毕节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1925年退出军政界。1936年随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返回原籍。建国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贵州省副省长等。

### 【赏析】

周素园是爱国民主人士，是辛亥革命时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在西南的军政界有相当的威望。1936年2月，任弼时、贺龙率红二方面军逼进贵州的毕节，国民党毕节专员劝周素园一道逃走，周不肯。毕节解放后，王震专程拜访他，贺龙也以主席的名义请周素园担任了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深为共产党的诚心诚意所感动，提出随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曾多次与周素园畅谈，称他是十分亲切可敬的朋友和革命同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高级参议，但他觉得做参议像是坐享优待，要求做一些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健康状况，没有答应这一要求。于是，周素园便向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返回原籍，毛泽东收到信后，写了这封信作答。

通篇书信围绕着周素园的来信层层展开。信的第一段,对周素园的工作安排作了耐心细致的解释:不让周素园从事实际工作,并不是党对他有成见,而是一直把他看成了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的同志。对于周的工作安排,完全是照顾到周的年龄、健康和兴趣,而不是其他原因。信的第二段,表达了毛泽东对周素园无微不至的关怀之情。对于周素园的回黔工作计划,毛泽东首先是“全部同意”,其次“路费拟赠300元,不知够不够”,请报告。再次是等经费充裕后,发给生活补助,最后,临走时请留下通讯处。信尾称:“何时走,我来看你”。由此可知,工作安排的缘由无可厚非,关怀之情令人动容。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周素园的尊重和关心。尊重别人,关心别人是毛泽东处事之道的一个原则,他认为尊重别人是一个原则问题,只有尊重他人才能团结他人,壮大自己。正是毛泽东这种平易近人、尊重别人、团结大多数人的宝贵品质,才使毛泽东能够与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心贴心,从而赢得了人民的真心拥护和爱戴。

周素园接到毛泽东的回信,非常感动。正是在毛泽东伟大人格的鼓舞下,周素园回到贵州后,仍然努力为革命事业奋斗。建国后,他还担任了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 “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

——致雷经天<sup>[1]</sup> (1937年10月10日)

雷经天同志：

你的及黄克功<sup>[2]</sup>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雷经天(1904—1959)，广西南宁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是审判黄克功案件的审判长。

[2]黄克功，少年时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1937年10月，对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把刘茜打死。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

## 【赏析】

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件令人瞩目的情杀案：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红军干部黄克功，逼婚未遂，开枪打死了陕北公学的女学生刘茜。一些反动报纸一哄而起，大肆渲染这起所谓的“桃色新闻”，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借此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恶毒的污蔑和攻击。

对黄克功如何处置，意见是不一致的。有人主张杀人者应该偿命；有人认为黄克功是

重要干部，革命有功，抗战需要，不可杀。黄克功也在狱中给毛泽东写信，列举其对革命的功绩，请求宽恕，并表示如果死的话宁愿死在抗日前线。当时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此案的审判长雷经天举棋不定，专为此事致信毛泽东，请求指示。

革命队伍竟出现如此丧失人性的败类，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和愤慨。作为党和红军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一贯强调，作为人民的军队，应该有以往一切旧军队所没有的革命觉悟和严明的纪律。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为红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把严明的纪律作为人民军队战胜敌人的根本保证。他指出：作为红军战士，作为革命者，作为共产党员，应该有比一般群众更高的觉悟和更高的革命道德。党和军队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利益的，而黄克功的行为，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党性，丧失了革命军人的革命性，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为了维护党与红军的纪律和尊严，维护人民的利益，不杀黄克功无法平民愤，统全军。为此，毛泽东写了这封信，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此信以黄克功为典型，教育全党全军，要严肃法纪，严于律己，并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此为前车之鉴，吸取教训。信中肯定了黄克功过去光荣的斗争史，但也指出了他犯下的不容赦免的大罪。黄克功为了个人私利，将爱国女青年枪杀，手段残忍，完全把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人民的立场抛于脑后，这是与党和红军的宗旨不相容的。他虽然有功，但其过更大。所以，信中说：“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针对有些人提出的黄克功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应该赦免的观点，毛泽东断然写道：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不这样办”。针对有些人提出的大敌当前，不宜斩将的观点，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在信中，毛泽东要求雷经天要把这封信在公市会上当众宣读，并对刘茜同志的家属给予安慰和抚恤。

此信入情入理，功过严明，充满了正义的力量，给全党全军上了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执法如山、处事果断、从严治军、从严治党的伟大品格和政治胆魄。

治罪不可手软，治乱不可犹豫，执法不可敷衍。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军队和革命胜利的果实来之不易，必须很好地捍卫和珍惜，必须与一切有损于革命和军队立场的人作不妥协的斗争。联想到建国后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理，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这一革命家的品格是一贯的、坚决的。

此信语言冷静而强硬，准确而有力，严谨而庄重。信中四处运用排比句，显得理直情激，掷地有声，充分表现出了正义必将压倒邪恶的勇气和力量。另外，像“不得不”、“不能不”等三处运用了双重否定句式，加重了语气，具有不容置疑、无可辩驳的震撼力和说服力。

当雷经天当众宣读此信后，参加审判大会的群众信服，罪犯黄克功信服。极力渲染“桃色新闻”的反动报纸顿时哑口无言。对黄克功的正确处理，不仅教育了全党、全军，也是对国民党反动宣传言论的致命痛击。这一事件的妥善处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声望，保证了革命的本色和初衷。

## “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

——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1937年10月25日)

朱彭任,林聂罗,贺关萧,刘徐张各同志并转各级负责同志<sup>[1]</sup>:

小<sup>[2]</sup>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sup>[3]</sup>,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你们宜发通令于全军,一直传达到连队战士,说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一个艰苦奋战的长过程。凡那种自称天下第一、骄气洋溢、目无余子的干部,须以深切的话告诉他们,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毛泽东

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朱彭任,分别指朱德、彭德怀和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林聂罗,分别指林彪、聂荣臻、罗荣恒,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长、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贺关萧,分别指贺龙、关向应、萧克,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政治委员和副师长。刘徐张,分别指刘伯承、徐向前、张浩(林育英),当时分别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副师长和政治委员。

[2]有一份抄件在“小”字上面改为“晨”字,另两份抄件为“小”字。

[3]1937年10月23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在山西平定县七亘村地区遭日军一个联队和二百余骑兵的袭击,伤亡三十余人。

### 【赏析】

1937年10月,毛泽东指示八路军向北突进,直捣敌空虚后方,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先后进行忻口会战,娘子关战役。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破袭同蒲路,第一一五师向繁峙至平型关全线攻击,夜袭阳明堡,突袭日本总兵站原平镇,于雁门关设伏,围困代县,毙日军两千三百余人,焚毁飞机二十五架,汽车一百二十辆,断绝交通,使前线日军军需匮乏,各种兵器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有力支援了忻口会战。

10月中旬,沿平汉路进攻的日军已经占领了石家庄、邯郸等地,控制了河北大部分地区。而进攻山西企图右翼迂回的日军第五师团与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主力,由于遭到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有力阻击,被迫滞留在忻口一线。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至内寿一

决定转移兵力,夺取山西。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二九师,向进攻娘子关之敌侧后挺进,寻机歼敌,阻止日军西进。10月22日,第一二九师开始在娘子关以东之长生口、东石门、马山村等处,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手段,打击进犯的日军。为阻击和钳制由井陘沿正太路南侧西进的日军第二十师团左翼纵队,第一二九师主力迅速进至侧鱼镇以西的七亘村。

七亘村,位于娘子关东南由侧鱼镇通向平定城的公路上。10月23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奉命赶到七亘村附近的营庄布置阵地。正当他们赶修隐蔽工事的时候,被敌机发现,敌人当夜来袭。七七一团警戒不严,敌人开火以后,才仓促应战。包围过来的敌人一个联队(相当于中国军队的一个团)和骑兵二百多人,与我军七七一团发生激战。战士们作战很顽强,有一名通讯员冒着炮火三次冲进团部,把重要文件抢了出来。三连五班八名战士伤亡七人,始终没有退下阵地。据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回忆:安顿好第七七一团之后,刘伯承说“部队遭到袭击,这是个教训,责任应该由我承担。你再把情况核实一下,我要向周副主席写检讨。”周恩来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那时正在太原,代表中共中央同阎锡山交涉,并直接负责处理八路军的一切事宜,刘伯承很快写了检讨报告。毛泽东获悉此事后,于10月25日发了这份电报。

这份电报充分显示了毛泽东戒骄戒躁的军事韬略。胜和败作为军事斗争中的一对矛盾,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他们相对立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并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所以,古语有“胜败乃兵家常势”之说。《资治通鉴·唐纪》:“胜负兵家常势。”《旧唐书裴度传》:“一胜一败,兵家常势。”这里指出的是,胜利和失败都是战争中经常遇到的情况,要正确对待,不要为一时的胜利而骄傲自满,也不要因一时的失败而灰心丧气。《尉缭子·战权第十二》:“凡我往则彼来,彼来则我往,相为胜败,此战之理然也。”这句格言说明:军事对垒双方往往不是我方战胜敌方,就是敌方战胜我方,这是战争的客观规律。而军事指导者的责任就是要一方面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力求把胜利引向我方,把失败引向敌方;一方面在失败后,要善于挽回败局,捕捉战机,东山再起,而不畏怯气馁。同样,在胜利后,要善于控制胜局,不可骄傲,松懈,盲目乐观,而应居安思危,加强防备,巩固胜利成果。

毛泽东历来重视戒骄戒躁的谋略运用,提倡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夺取胜利与戒骄戒躁、把谨慎精神和勇敢精神密切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强调戒骄戒躁的作风,就是要使战争指导者的判断和分析更加符合客观实际。1944年,他在延安整风时,针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由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列为整党的文件。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时北伐军到了武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忘记了国民党将要袭击我们。结果犯了陈独秀路线的错误,使这次革命归于失败。第二次是在一九三〇年。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的条件,打了一些胜仗,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损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红军打破了第三次“围剿”,接着全国人民在日本进攻面前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更严重的路线错误,使辛苦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战起来了,统一战线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骄傲起来,



自以为了不得，结果犯了和陈独秀路线有某些相似的错误。这一次，又使得受这些同志的错误思想影响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的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全国胜利前夕，他又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戒骄戒躁，是因为在中外历史上，有不少军队在打了胜仗之后，沉醉于歌舞升平，文恬武嬉之中，骄奢淫逸，耽于安乐，丧失了战斗力。结果军队被和平打败，自己被自己打败。历史的覆辙，永远是后者之殷鉴。毛泽东意识到，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几乎都惊人相似地存在着胜利后即骄傲的思想倾向，而这些倾向恰恰是他们失败、灭亡的根源。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指出：“小胜之后，必生骄气，轻视敌人，以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团七亘村受袭击，是这种胜利冲昏头脑的结果。”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战的过程，这个过程决定了抗日军队，特别是抗日军队的干部，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必须把勇敢精神和谨慎精神结合起来，反对军队中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对于指导今后的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 “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致艾思奇<sup>[1]</sup> (1937年)

思奇同志：

你的《哲学与生活》<sup>[2]</sup>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sup>[3]</sup>（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艾思奇(1910—1966)，云南腾冲人。原名李生萱，又名李崇基。早年赴日本留学。“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1933年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1934年发表《大众哲学》，对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起过启蒙作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赴延安。后任抗大主任教员，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委秘书长，《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教育工作，历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学会副会长。1966年3月22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编为《艾思奇文集》，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

[2]《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继《大众哲学》之后，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写的一本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1937年4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1937年9月毛泽东作了《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

[3]指毛泽东在他所作的摘录中对艾思奇《哲学与生活》一书中一个论点的质疑。

### 【赏析】

没有伟大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实践。作为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非常注意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并用于指导革命。从1920年第一次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起，毛泽东就把研读马列著作当作武装头脑的头等大事看待，从此和革命导师的著作结下了不解之缘。1932年他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列宁著的《“左派”幼稚病》，读罢爱不释手。就是在长征路上，毛泽东因患病躺在担架上，仍然在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革命的需要，使他视书如命，废寝忘食。到延安以后，他基本上搜集到了当时国内版的所有马列著作，并且留下了大量的批语。除此以外，毛泽东还十分注意阅读国内的哲学著作，并和几位哲学界的朋友建立了友谊。1937年4月，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艾思奇著的《哲学与

生活》一书。该书以答读者问的形式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了当时人们所关注的世界观问题、辩证法问题、真理问题及认识上的其它问题。9月,毛泽东全文阅读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真地作了摘录。此后不久,为了和艾思奇讨论一些哲学上的问题,毛泽东写了这封信。

艾思奇是抗日军政大学的主任教员,是1937年10月到达延安的。此信称“思奇同志”,使人感到亲切和友好。“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这句话是对艾思奇著作的高度评价。一个“更”字,是针对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无论在思想上、形式上都有很大进步而言的。该书形式活泼,逻辑严密,内容丰富,又能反映时代,这是令毛泽东欣喜之处。如此深刻的书籍,毛泽东当然是爱不释手的。他读了以后,写了长达19页的摘录,并着重摘录了辩证法方面的内容,内容涉及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特殊与一般,差别与矛盾,外因与内因,本质与现象,运动与静止,辩证唯物论与机械唯物论等重要哲学问题,批判了相对主义、绝对主义、怀疑主义、折衷主义、公式主义、机械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错误观点。在信中,毛泽东坦率地说:“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毛泽东对于自己的抄录是十分认真的,态度更是严肃的,“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一句,足以见得他的谦逊和认真。毛泽东对《哲学与生活》的摘录,并不是不假思索地抄录,而是通过抄录,发现疑点,共同探讨,以求认识统一。艾思奇有一个论点是:“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但是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某两件差别东西同时地在一起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时,就成为矛盾了。例如店员与作家本无矛盾的,如果某店员有了写作兴趣而想成为作家时,二者就在统一体里互相排斥,也就成为矛盾了”。毛泽东在摘录这一观点时,写道:“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该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应抛却毛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为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的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大司父煮饭,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一定条件下统一起来,店员与作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统一起来。半工半读,可以把工读统一起来。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所以在信中,毛泽东说:“请你再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但并不是要艾思奇来,而是毛泽东去看艾思奇,前提是艾思奇“今日何时有暇”。由此可见,毛泽东对艾思奇是何等的尊重。

从此信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学习的态度和方法。早年的毛泽东养成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良好习惯。对于有益的东西,他总要加以批注和摘录。但对于有些片面的甚至错误的观点,他却不愿苟同,而能及时进行争论或当面交换意见。

这篇书信篇幅短小,语言凝练,朴实流畅,多用口语化的短句,简洁明了,亲切感人。“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一句,体现了毛泽东对学习、对同志认真、谦逊的态度和作风。这在今天看来,也是值得人们好好学习的。

思古如流水

你以接近中，這是在你交際中

刻的事，你讀了，這是很多了，抄

錄了一些，這是一篇日記，也有抄錄

的。其中有不關緊要者，請也一見

是古的不同，請你再看看，這是不

是古的不同

你。

一九五五年

## “惟有合群奋斗”

——致文运昌<sup>[1]</sup> (1937年11月27日)

运昌吾兄：

莫立本<sup>[2]</sup>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译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有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sup>[3]</sup>，因她系泽覃<sup>[4]</sup>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sup>[5]</sup>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托诸位兄嫂侄子儿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 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参见本书第2页注[1]。

[2] 莫立本，即方克，1918年生，湖南桃江人。当时是从湖南长沙去延安的一位青年。

[3] 周润芳，参见本书第408页注[1]。

[4] 泽覃，即毛泽覃（1905—1935），湖南湘潭人。字润菊。毛泽东之弟。1918年赴长沙读书。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入湖南自修大学学习。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曾任青年团长沙地委书记处书记,在水口山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到广州工作。1927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后被朱德派往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1928年4月接应朱德、陈毅部从井冈山。后任红四军三十一团管党代表,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永吉泰特委书记兼红军独立五师政委。1932年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曾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迫害。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1935年4月25日在江西瑞金红林战斗中牺牲。

〔5〕刘霖生(1865—1949),名新澍,字浚源。湖南韶山市大坪乡竹麓村人,毛泽东的堂姨表兄。任过湘乡县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湘乡县临时参议会会议长等职。

## 【赏析】

文运昌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任过小学教师和中学庶务。毛泽东在他的帮助下,在学堂上学,进步很快。1927年元月,毛泽东到韶山考察农民运动,曾来到棠佳阁外婆家歇宿,此后,再也未返棠佳阁。但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依然眷恋着少年时的乐园,眷恋着那里的山山水水,更惦念着外婆家的亲人。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共二次合作,文运昌曾向毛泽东写信介绍长沙莫立本等进步青年去延安学习,投身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并由莫立本带去一信,不久又写了一封,向毛泽东问候。毛泽东睹物思人,于11月27日,写了这封信。

无情未必真豪杰,亲情难忘是故乡。正是通过文运昌的信,毛泽东才获悉老辈人的去世,同辈人生活的悲欢离合。为了革命,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妹妹……都牺牲了,但健在的亲戚生活也很艰难。看到一家的遭遇,毛泽东想到了天下所有劳苦大众的命运。他以一个革命家的胸怀,自觉将自家的命运与全中国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了为天下人谋幸福,他不仅不为自己、家族、亲戚考虑太多,而且坚决制止任何亲人借他的地位谋取私利。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委婉地用表兄能够理解的语言讲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宗旨,劝他和亲友不要投奔他谋事和找工作,对于表兄开办军校的计划,也明确表示不能资助,并解释了寄给周润芳的20元旅费是公家给予死难烈士家属的资助,而不是个人的资助。对公私分明,不谋私利的大义,毛泽东讲得严肃而委婉,令人动容。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何为生路呢?投亲靠友是不长久的,也没有什么安逸可图,惟一的办法就是团结对敌、“合群奋斗”。为此,毛泽东鼓励亲友要与人民一起奋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生路。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革命家、政治家的本色。

信写得平实质朴,但充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使命感和浓烈的亲情。“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一句,表达了毛泽东对故乡的热切的惦念。多次要求回信的话语,更进一步表达了毛泽东对亲人及乡人的挂念,显示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亲情浓烈的一面,使人看到了一个大义凛然而又不失亲情的伟人形象。信的最后,毛泽东充满激情和信心地写道:我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这无疑会给亲人和乡人以莫大的鼓舞。

此信既有对家乡人民的无限眷恋和热爱,也有舍小家为大家的博大胸怀;既有回肠荡气的感情奔流,又有为拯救天下劳苦大众奋斗不息的精神体现;既有对暂时困难的正视,又有对未来胜利的预见。同年12月,毛泽东的亲人接到了此信,欣喜不已,深受鼓舞。



達兄先生：

黃三本到，接飛毛書，相又接  
十月十六日函，快慰莫名。八舅父  
母仙逝，至為痛惜。謝表兄嫂輩  
都健在，又見快事。家境艱難，  
此外一家一人情況，全國大多數人  
皆然，惟有金庫舊例，驅除日本  
帝國主義，稍有出路。吾兄想來  
工作甚好，惟我們這裏僅有夜  
餐<sup>飯</sup>而已，上面惡習氣下至火夫，待遇

相同，因為我們的事業為國家民族  
苦若民衆做事，犧牲個人私利，故  
人人平等，毫無歧視。如兄家  
累甚重，定在外巨借一大小是事作  
有接濟，故不克來此。道路甚遠，  
我亦不勝旅費。在湘閩兩軍控，  
計劃甚善，亦暫延期實行，私心雖  
想助兄，事實難於做到。前由  
公家撥下二十元旅費給兄周芳，因  
他係潭平死難烈士（潭平前年被

3  
授长江西)之喜,故公家出此,并  
非我私人的事故,敢新语之。  
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  
敬爱外家及我家统一切亲苦人  
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恋外  
家祖先下位,及一切亲苦同乡,  
但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帮助你们,  
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即使如此,但我想起先及  
祖表兄弟下位们常通书信,我

得你們信條數字都是歡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  
請通知我鄉下親友，如他們願意  
和我通信，就是很歡喜的。他請  
轉知他們不要來此謀事，因為此  
處毫無薪水。

劉霖生先生近健在嗎？請  
君代為問他老父。

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大舉進攻，  
我們的工作是很繁重的，但我

們都很快樂健康，我的身體比  
前兩年要好些，請告慰康家  
其他各位姨姪侄兒女們。並  
告他們，八路軍的勝利就是他們  
大家的勝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  
苦與艱辛。謹祝  
康家及表嫂的健康！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 “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

——致范长江<sup>[1]</sup> (1938年2月15日)

长江先生：

马先生来，获读手书，张同志回延，又接一月三日大示，久稽回答，幸原谅之。

先生提出的问题都是国家重大问题，要说个明白，非一封短信可了。但解决先生问题的主要一点，我认为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现在共同说并共同做的东西已有了许多，从实行抗战到若干民主自由都是，但还没有全部东西，还没有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东西，并使这个东西为国共两党及全国各界所真心承认并真心求其实现。如果有了这个东西，而且真心承认了它又真心求其实现，那先生所提问题的全部便都获得解决了，关于用实际行动帮助国民党健全，我们已在开始作，并望新闻界及全国各界大家都作。诚如先生所感，这是重要问题，但一面也需要国民党同志们欢迎这种帮助，至少不拒绝。我们已提出互相帮助的口号，如果有了一个共同纲领，事情就好办了。军队问题，先生所虑为两党互信障碍者，实由于没有一个包括从抗战到建国的纲领之故。有了的话，这种顾虑，在任何一党方面就都不会有了，因为在过去十年的教训之下，任何一党要背叛纲领而重起内战，必为全国人民所反对，要打也打不起来。否则不但两党之间可为互信障碍，一党内部，何莫不然，过去十年国民党同一主义同一政党内部的无数战争，不是明显的证据吗？我们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我在去年五月延安会议所作报告的结论<sup>[2]</sup>中（此文先生谅已看过），对于遥远的中国前途——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转变，都曾指出共产党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何况只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的阶段之内？故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以历史论，十年前的分裂，主动者属谁，被动者属谁，以及因何而破裂，已是人人皆知历史铁铸之事实。彼时谁撕毁那个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因而掀起内战，先生当能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十年前并没有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以此推知即使今天把八路军解散，甚至把共产党解散，谁能担保中国境内不再出一个八路军，不再造一个共产党？要知这些东西不是凭空发生的，并非真如某些人们的见解是若干共产党领导分子从心所欲造出来的，或真是所谓“不合国情”的，而实实在在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至于先生的第二个问题——一方面当局感觉不安，一方面人民要求改革，我以为也即是上面同一性质的问题，症结同在国民党承认并实行一个共同纲领。

要达此目的，无疑需要各方面努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应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斗。两党的事不是两党私事，而是国民公事，先



生于此关心至切，钦佩无已。远承下问，略述鄙见，尚希进而教之。手此奉复。

敬致

民族解放之礼！

毛泽东

二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范长江（1909—1970），新闻记者。名希夫。四川内江人。曾参加过南昌起义。193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同时为《大公报》、《晨报》、《世界日报》撰稿。1935年7月，以《大公报》记者身份，自四川出发考察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线，写了大量实地通讯，轰动全国，后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西安事变后，首先进入西安，后转赴陕北，向全国报道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实况。抗日战争初期，经常亲临前线采访，写了许多通讯，成为当时著名的战地记者。后任《大公报》汉口版采访主任。1938年，发起组织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团结了大批进步青年。同时创办了国际新闻社，向国内外报道抗日战争的实况。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与创办香港《华商报》。次年，转入苏北解放区，先后任华中新华社和《新华日报》社社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南京代表团发言人、新华通讯社总编辑。全国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社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职。1970年，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

〔2〕指毛泽东1937年5月7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结论，题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

## 【赏析】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都应当以民族利益为重，使自身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实行全民族团结抗战，这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惟一出路。也只有这样，各个阶级和政治派别才有自己的前途。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共识。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这时不得不改弦更张，同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但当时在国内，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力量和态度。人民大众坚决主张抗战，誓死保卫祖国。不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特别是那些开明绅士，也站在抗日方面，不愿做亡国奴。但很多人对如何开展抗日战争还不清楚，对共产党一时也不够了解。由于国民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国际上承认的合法政府，又有200万军队，它的“正统”地位是多数中间力量所承认的，所以许多人把抗日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但对它的腐败和专制又不满。在国民党内，也是既有赞成抗日的民主分子，也有暗藏的汉奸，使得国共两党合作抗战的局面很难巩固和顺利发展。1937年和1938年初，范长江两次致信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诸如抗

行一个共同纲领,用实际行动实现抗战乃至建国以及帮助国民党健全及解决军队问题等事关国家全局的重大问题。毛泽东针对这些问题,于1938年2月15日写了这封复信。

此信认为,只有国共两党实行共同纲领,才可避免内战,才可共同抗击日寇,共同纲领是实现民主革命的保障,解决问题的主要一点,即是“真实地承认并执行一个共同纲领”,如能有了从共同抗战到共同建国的全部纲领,并使其为国共两党和全国各界所实心承认并实心求其实现,则国家的大政问题就解决了。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诚恳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内战,在战胜外敌与建立民主国家的阶段内,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应该争取和平转变,而避免流血。毛泽东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的真实政治态度,即从抗战到建国的全部纲领之态度。十多年前的分裂,掀起了一场内战,这已是人人皆知的历史,铁铸之事实,但原因就在于国民党撕毁了当时的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总结历史教训,毛泽东指出,今后症结之中心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信的最后指出,要达到此目的,无疑需要各方面的努力,两党党员及领袖以至全国各界一切关心民族前途的人,都应为共同促进并实行这个纲领而奋斗。

此信作为给范长江的复信,既具有革命家对时局深刻的分析,又具有尖锐、犀利、雄辩的谈锋。信一开始,就肯定范长江提出的问题是国家的重大问题。为了阐明共产党的主张,回答范长江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从历史的大纵深和现实的小视角谈起,通过国共两党对共同纲领态度的分析,指出问题实质不在共产党,而在国民党是否特有真实的政治态度。

恰当地运用对比的修辞方法是本篇的突出特点。毛泽东采用了纵比和横比的方式,论及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毛泽东多用纵比,从“过去十年”、“以历史论”、“十年前”和“今天”等时间概念上,使人们校正了视听,澄清了认识,做到以史为镜,以事为凭,增强了论证的力度;论及国共两党的分歧,则多用横比,把共产党的承认并执行共同纲领与国民党的只承认不执行甚至背叛,把共产党不要内战和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等一一进行对比,产生了不辩自明的效果。另外,信中两次运用反问,把问题留给读者,以此引起读者的注意和思考,又加重了语势,这对于揭露问题的内在联系与本质,极为有力。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伟大统帅,毛泽东高屋建瓴,俯瞰全局,思虑极为深广。此信既立足于现实,又着眼于未来,既有思想的深邃,又有题旨的阔大,读后令人按卷惊叹。

## “废止称残废院”

——致何长工<sup>〔1〕</sup>（1938年2月25日）

长工同志：

你提的办法，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请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你为院长兼政治科长，王群为政委兼供给科长，另找一专门的卫生科长，就是你们三个人负总院责任，靠近军委留守处找一二间房子办起事来。不日起始的教导院工作会议好好地开一开，由你主持，王群辅之，我可以来讲一次话。先找富春，滕，肖，谭，莫<sup>〔2〕</sup>一商开会要点，即将你拟的东西先行讨论一番。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五日

乘此次开会，彻底地把各院全部情形调查清楚。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何长工（1900—1987），湖南华容人。原名坤。早年入省立长沙甲种工业学校学习。1919年在北京参加五四运动。同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曾任中共华容区党委书记兼军事部长。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红四军二十八团党代表，红五军第五纵队党代表，红八军军长，红十三军政委，红军大学校长兼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九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河防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和副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军政大学代校长、通化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军工部长兼军械部长。建国初期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和代部长。后长期任地质部副部长和党组书记。1975年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顾委常委。1987年12月29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八路军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员。

〔2〕富春，即李富春（1900—1975），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部领导人之一。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1927年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和代理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和代理书记。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参加长征，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

军团政委、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到陕北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建国后，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七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1月9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滕，指滕代远(1904—1974)，湖南麻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郊区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醴陵县委书记、湘东特委书记、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1928年参加领导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党代表、红四军副党代表、红三军团政委、红一方面军副政委、中央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曾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中共中央北方局常委、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委员、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央军委铁道部部长。建国后，任铁道部部长、解放军铁道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中央委员。1974年12月1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

萧，指萧劲光(1903—1989)，湖南长沙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军事学校学习。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在广东从事革命工作。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1927年赴苏联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红五军团政委、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二十一军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委。建国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79年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和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1989年3月29日在北京逝世。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

谭，指谭政(1906—1988)，湖南湘乡人。原名世铭。1927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并随军参加秋收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任中共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红四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主任和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一师政治部主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

央东北局委员、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1954年调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56年后，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中央军委常委。1960年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到错误批判后，受到撤职、降职等处分。1975年出任中央军委顾问。1980年被中共中央正式平反。是第一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和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8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

莫，指莫文骅。当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政治部主任。

## 【赏析】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犯，在太原失陷前后，山西战局吃紧，同时毗邻的陕甘宁边区的河防也逐渐紧张起来。为加强河防，毛泽东决定从临镇河以北到清涧至河口设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任命何长工为司令员。1938年农历正月，有人向何长工报告：延长、延川、宜川等县残废医院有二百多名经历过长征的伤员，在延长集合，要去延安“请愿”。原因是，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卫生部成立了几个医院，收容伤病员，由于医院设备差，药物缺乏，医护人员对伤病员关心照顾不够，伤员意见很大；加之有些伤员病愈后，体质过差，有的成了残废，不能重返战斗部队，受到部分人的歧视，在当地安家落户又不习惯，家属问题也无法解决，大家纷纷要求回南方老家去，并要去延安“请愿”。于是，何长工打电话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这些同志大部分是从长征过来的，流过血，对革命有贡献，现在残废了，没向党伸手要什么，就是要求我们改进工作，要求回老家也是合情合理的”。毛泽东还自我批评道：“我们确有官僚主义，要发动伤病员给我们提意见”。他要何长工“转告伤员，就说毛泽东和中央领导的窑洞已经腾出来了，欢迎他们到延安来住，整整我们的官僚主义”，同时从主观找原因，设法改进工作。他指示，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要改为荣誉军人教导院，由何长工担任总院院长，并负责办理。何长工制定了筹建荣军教导院的方案，呈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写了这封复信。

此信开宗明义，对何长工的方案表示“完全同意”。为尽快付诸行动，及早解决伤病员的后顾之忧，他指出“会同王群同志切实办一办，一定要力改过去错误方针，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从这个指示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伤病同志的深厚感情和照顾好伤病号的强烈愿望。“切实”、“一定”、“力改”、“积极地当作训练干部去办好”等词句及着重号的运用，表明了毛泽东对过去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深恶痛绝，体现了毛泽东从谏如流、闻过则改的博大情怀以及知错务纠、纠错务尽的工作作风。为了尊重伤病员的人格，唤起他们的自尊心和荣誉感，毛泽东提议将名称改为荣誉军人教导院，对教导院的人员编制、办公地点、组织机构、召开工作会议等具体工作一一作了部署。这就把组织、人员、地点和工作制度等事项落到了实处。信外又加上一句“乘此次开会，彻底地把各院全部情形调查清楚”，再次表达了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以及对荣誉军人体贴入微和高度负责的态度。

后来,他又指示召开了伤员代表与卫生部门人员参加的代表会议,专门研究解决伤病员提出的问题。在会上,毛泽东说,客观上说,边区条件确实很苦,伤员病员都来延安也不大可能。从主观上说,我们工作中有官僚主义,没有抓紧解决大家的困难;要求来延安提意见也是对的,以后有意见还可以到延安来提;工作没有搞好,责任在我们上面没有组织好。

毛泽东写此信之时,正值全民族抗战的高潮,他认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党的整个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干部,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而解决好伤病员的问题,能够激励千百万战士更好地驰骋疆场,勇敢战斗,视死如归。军事家的毛泽东不仅爱兵如子,更能励兵奋进,他知道,信心和士气是一种无形的强大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的迸发是有一定条件的,要通过心理激励的方法加以鼓舞,要通过情感的交流加以理解,更要通过稳妥的工作加以保障。毛泽东之所以将残废医院改名为荣誉军人教导院,其重大意义在于:

一是强调教育。毛泽东主张“教诫为先”,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和为人民服务及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使每一个伤兵都懂得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

二是强调同心,即同心同德。毛泽东曾指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支军队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上下齐心,才能战无不胜;伤病员要和全体人民一样拥护抗日大局。

三是强调爱抚,即用关心爱护的情感去唤起部属的积极性。将帅爱护士兵,士兵作战必然视死如归。爱兵者,兵恒爱之;敬兵者,兵恒敬之。这是带兵的真谛。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军队的将帅,做到了关心、体贴、爱护属下,照顾他们的愿望,满足他们的需要,有力地增强了人民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 “高明如兄，谅有同情”

——致邓宝珊<sup>〔1〕</sup>（1938年12月5日）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凉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sup>〔2〕</sup>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专此。敬颂

戎绥

弟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邓宝珊（1894—1968），名瑜。甘肃天水人。1909年入营当兵，次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参加伊犁革命党起义，被军阀杨增新通缉。1918年协助张义安发动三原起义，参加陕西靖国军。后在胡景翼的陕西陆军第一师任团长，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任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曾两次领衔通电全国，欢迎孙中山北上召开国民会议。次年，指挥击溃刘镇华的“镇嵩军”，将奉系李景林部逐出天津地区。1926年冯玉祥五原誓师后，他任国民联军援陕军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起用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主张开明政治。大革命失败后，寓居上海，曾掩护、接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30年中原大战时，任冯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1933年代理甘肃省主席，旋改任国民党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防榆林，坚持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持沉默态度。1949年1月赴北平敦促傅作义起义，并全权代表傅作义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嗣后促成绥远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曾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68年11月，病逝于北京。

〔2〕陈奇涵（1897—1981），江西兴国人。1919年入韶关滇军讲武堂分校学习。曾任滇军代营长。1925年入黄埔军校，任政治大队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南昌军官教育团参谋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教导团团长、红三军参谋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江西军区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教导师参谋长、中央军委随营学校校长。

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教育局局长、绥德警备区司令员、关中警备区司令员、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司令、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和总校教育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东满军区副司令员、辽宁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任江西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参谋长。建国后,任江西军区司令员、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和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81年9月在北京病逝。当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

## 【赏析】

邓宝珊是一位很有民族正义感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邓宝珊对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十分拥护,并为之奔走。抗日战争爆发后,邓与共产党团结抗日,维护了延安北面的安定。1938年5月,邓宝珊及随行人员首次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毛泽东亲切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参观。邓为此深受感动,欣然允诺,在延安整整住了一周,密切了与共产党的关系。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召开,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批判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倾向,确立了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并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方针。为了使邓宝珊加深对共产党的了解,毛泽东尽量将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重大决策,通过各种途径告诉邓宝珊,以便加强了解,促进交流,巩固统一战线。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对国民党的正面进攻停止,变军事进攻为政治诱降,在敌占区扶植汉奸组织,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猖獗。国民党政党的重点也逐渐从对外转向对内,执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面对这种历史的逆流,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地提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帮助党外人士清醒地认识国内政治局势中出现的严重危机,分清是非;同时广泛接触国民党的民主派、地方势力派,共商国事,继续征得他们的信任,巩固并扩大民族统一战线。1938年12月,毛泽东派八路军驻绥德警备司令陈奇涵与邓宝珊面商防务,并写了这封信,同时转达六中全会的文件资料供他参阅。

毛泽东在信中,表达了真诚合作的愿望。当时,蒋介石顽固派极力地破坏国共合作,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力量,针对这些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英明策略。所谓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势力派。毛泽东给邓宝珊写信,目的就在于此。邓宝珊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深为感动,在抗战时期始终与陕甘宁边区保持着睦邻友好的关系。

此信多用短句,语气诚恳,谦逊,真挚,语言凝炼,内涵丰富,准确流畅,简洁干脆,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联合抗日的坚强决心和为抗日救国义无反顾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 “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

——致何干之<sup>[1]</sup>（1939年1月17日）

干之同志：

看了你的信，很高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sup>[2]</sup>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列宁主义，而以哲学为主，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盼你多多指教。

你的研究民族史的三个态度，我以为是正确的，尤其第二个态度。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sup>[3]</sup>的事业等。

你的两本新书如出版时，盼各付我一本。

敬祝努力！

毛泽东

一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何干之（1906—1969），历史学家，原名谭毓均，1936年改名何干之。广东台山县人。1926年秋，考入广州中山大学。1929年赴日，入明治大学和早稻田大学经济科。“九·一八”事变后回国。1932年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和广州国民大学任教，并担任国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次年春，参加发起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东分部，被推选为书记。后到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编辑部工作。不久又东渡日本，担任东京“文总”宣传部长。1936年在上海著作人协会（即社联改组后之名称）总团工作，开始研究史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延安陕北公学任教。1939年担任华北联合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1943年当选为晋察冀边区参议员。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华北大学二部主任。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先后担任研究部副主任和历史系主任，致力于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为我国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著有：《中国经济读本》，《列强支配中国的经济网》（与李凡

夫合著),《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中国现代革命史》。当时是陕北公学的教授和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

[2]陈伯达(1904—1990),福建惠安人。1924年入上海劳动大学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任中国大学教授,并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宣传工作。1937年赴延安,任毛泽东政治秘书。1942年后,任《学习》编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建国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农工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1966年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成为实际负责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当选为全国社科联副主席。是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70年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一中全会上被以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的名义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宣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0年9月20日在北京逝世。著有《真理的追求》、《在文化阵线上》、《论毛泽东思想》等。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3]班超,东汉名将。曾在西域征战31年,迫使匈奴西迁,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

## 【赏析】

毛泽东非常注重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因而最爱读中国史书,4000万字的《二十四史》,他不仅通读下来,而且有些部分反复读过好几遍。《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以及各朝代事本末等,他也通读了,深厚的古史功底和对中国历史的科学的、唯物的、辩证的理解,使他对中国古代史书的研究和理解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是一些历史学家也难以企及的。

毛泽东不仅自己爱读中国史书,而且极力倡导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风报告中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因此,他提出要聚集人才,有组织地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这一观点,在此信中已经表示出来了,即信中所说的“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也正因为如此,他对于何干之研究中国民族史的想法表示赞成和支持。而毛泽东自己也有志于研究中国历史,如中国战争史,但紧张繁忙的工作和哲学研究,使他没有充足的时间能进行民族史方面的研究。所以说“有志未逮”,即虽有这个志向,但没有实现。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毛泽东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研究上面。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中国革命继续前进,集中精力,发奋攻读马列的书,包括马、恩、列、斯的原著和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的著作。这些学习与研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对于“研究近代史”一事,可以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几句话来解释:“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

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如何研究呢？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别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这是毛泽东对全党提出的任务，也正是他自己努力想做的事情。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对何干之从事历史研究，特别是对民族史的研究表示十分赞赏，并希望他切实去做，这在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尤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国民党妥协、分裂、倒退和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激烈斗争之际，通过研究民族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孰是孰非，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等民族投降主义者大加鞭挞和痛斥，对教育党内外人士，反对卖国，坚持抗战的大政方针大有益处。坚持“古为今用”是毛泽东一贯的观点，他反对为研究而研究，反对厚古薄今，主张把着眼点放在解决现实斗争和指导革命的问题上。因此，毛泽东充分肯定何干之的这一态度，对于当时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同志指出了民族侵略主义的错误，如“兼弱攻昧”（吞并弱小的，攻击落后的），“好大喜功”等，以其辩证的思维，指出了问题的另一面。毛泽东把积极抵抗与侵略区别开来，并举出了汉代班超征战西域，解除匈奴威胁的例子，表现了毛泽东辩证思维的严密性和深刻性。

此信层次分明，说理透彻，语言准确凝炼，用例恰如其分，论证简洁明快，夹叙夹议，读后让读者深受启发和教益。

## “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

——致萧三<sup>[1]</sup> (1939年6月17日)

子暉同志：

(一)大作<sup>[2]</sup>看了，感觉在战斗，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盼望你更多作些。

(二)高尔基晚会如无故障当来参加，惟这几天较忙一些。

(三)马，待查问一下看，这事倒不很容易。如你在边区范围内行动，那我可以拿我的马给你用一下；如往外边，就得另想法了。

敬复。

毛泽东

六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萧三(1896—1983)，又名萧子暉、萧植蕃。萧子升之弟。无产阶级革命家，优秀的文化战士，国际活动家，诗人。湖南省湘乡县人。早年和毛泽东、蔡和森一起创建新民学会，并为毛泽东举办的《湘江评论》撰稿。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经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1928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任教。同年从事文学活动。1930年作为中国作家常驻代表，出席在苏联举行的革命作家会议，并主编该会刊物《世界革命文学》中文版。1934年出席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他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职务。1939年在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编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文协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委员。1946年任华北文协主任。建国后，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顾问，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副会长，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1983年2月逝世。编著有《革命烈士诗抄》、《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萧三诗选》等。当时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编译部主任。

[2]指萧三写的一本诗稿。

### 【赏析】

萧三是湖南人，毛泽东的同乡好友。自上小学时两人就是同学，后又一起上师范学



校,一起参加新民学会,投身新文化运动。两人从相识到相知,常在一起散步,游玩,交流学习体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诚挚相待,情同手足。共同的救国救民理想,使他们都参加了五四运动。1939年初,当毛泽东在延安领导抗日救国运动的时候,萧三在任弼时的帮助支持下,从国外回到延安,来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战友毛泽东身边。一向喜欢作诗著文的萧三到延安后,深为延安特有的生活气息和战斗生活所激荡,从而焕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他写的文章多反映时代生活,愿意交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也非常爱看萧三的文章,而且每次都认真阅读,评价甚高,有时还提出修改意见。为了互通信息鼓励和支持萧三不断地提高和创新,毛泽东除了亲自专程拜访,还经常写信与萧三进行交流。早期的亲密交往和延安志同道合的革命感受,使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由于萧三极熟悉毛泽东的生平实践和革命活动,他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为了写好各个解放区的缘起、略史,他曾同毛泽东多次交换意见,并提出要一匹马出去采访的要求。1939年6月的一天,萧三又将诗稿《和平之路》和《萧三诗选》送给毛泽东,请他指正。6月17日,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了这封信。

复信首先谈了对诗稿的看法,肯定了诗稿的鲜明特征——战斗性。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军事进攻,代之以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对付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把扫荡的重点放在了华北。1939年春,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治安肃正计划”,实行军事、经济、文化、特务一体的“总力战”。面对敌人的强大攻势,八路军和新四军根据中央指示,依靠广大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通过在广大地区内无数小的战斗打击日军,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战斗的生活需要战斗的文艺。因此,毛泽东盼望萧三多作些诗。然后,毛泽东又就参加高尔基晚会的事略作解释。最后,答复了萧三借马采访的要求。后来萧三果真借了毛泽东的那匹马。

此信简明扼要,条理清晰,采用条文式的结构,而且每段前面都加了序号,显得井井有条。

此信在语言运用上显得随意自然,明白如话,字里行间渗透出伟人毛泽东对老朋友那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和无微不至的关切之情。

## “发展,向上,愉快”

——致毛岸英、毛岸青<sup>〔1〕</sup> (1939年8月26日)

岸英  
岸青二儿:

你们上次信收到了,十分欢喜!

你们近来好否?有进步否?

我还好,也看了一点书,但不多,心里觉得很不能满足,不如你们是专门学习的时候。

为你们及所有小同志,托林伯渠<sup>〔2〕</sup>老同志买了一批书,寄给你们,不知收到否?来信告我。下次再写。

祝你们发展,向上,愉快!

毛泽东

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毛岸英(1922—1950),又名毛远仁。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与杨开慧之子。1922年10月22日生于长沙。1930年至1936年在上海生活。1936年6月离沪到法国巴黎,并于1937年初赴苏联学习。1939年加入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1942年后,先后在苏雅士官学校、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莫斯科东方语言学院学习。1943年1月加入苏联共产党(1946年回国后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曾任苏军坦克连党代表,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1946年秘密回到延安。回国后,在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10月15日与刘思齐结婚。1950年10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志愿军总部秘书。同年11月25日,在朝鲜平安北道遭美机轰炸,不幸牺牲,年仅28岁。

毛岸青,1923年生,曾用名杨永寿。湖南湘潭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次子。1923年11月13日出生于板仓杨宅。1930年杨开慧遇害后,与毛岸英、毛岸龙一同到上海,过了几年流浪生活。1936年6月离开上海到法国巴黎。1937年赴苏联学习。1947年10月回国,入哈尔滨中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共中央宣传部马列主义著作编译所从事翻译工作。参加翻译了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五六本书。1951年因儿时大脑受伤和岸英牺牲的刺激,患重病。1960年与邵华结婚。1970年生一子,取名新宇。

〔2〕林伯渠,当时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参见本书第92页注〔1〕。

## 【赏析】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毛泽东超越“亡国论”和“速胜论”的误区，向全国抗日战场发出了“持久战”的光辉论断，充分表现出毛泽东作为伟大战略家的英明，然而，面对儿子岸英、岸青的来信，毛泽东又显得亲情难抑，展现出作为父亲别具情怀的一面。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将夫人杨开慧及三个儿子送到岳父杨昌济先生的老家——湖南板仓。为了中国革命，到杨家后的第二天清晨，毛泽东就别妻离子，去发动和领导秋收起义。那时，长子岸英才五岁，次子岸青三岁，三子岸龙刚刚临世。1930年，杨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岸龙下落不明，岸英、岸青流落民间。后来，党的地下工作者找到了岸英、岸青，并转道送往苏联学习。岸英、岸青经常给父亲写信，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每次见信，毛泽东即使工作再忙，也总是得闲回复，关心孩子的成长。这封信，就是1939年8月26日毛泽东给两个儿子的一封信。

毛泽东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与寻常人一样，对亲人有着挚热的爱。但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把这种爱与中国的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儿子，他惦念其生活，更关心其学习和进步，对孩子的成长寄予很高的期望。儿子的每一点进步，都使他十分喜欢。毛泽东深知学习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他常以亲身的感受，告诉儿子应抓紧这种“专门学习的时候”，认真读书，学习、发展、向上。毛泽东自幼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博览群书，而且持之以恒。在这封信里，他尽管自称看了不多的一点书，但实际上，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阅读研究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其他社会哲学、政治书籍。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满足，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他有一句名言：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要学习一点东西，必须从不自满开始。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并以此来教育和要求自己的孩子，希望他们能成长为优秀的栋梁材。

毛泽东不仅爱护自己的孩子，而且也关心在莫斯科的所有中国的少年儿童。在这封信中的“你们”除了指岸英、岸青外，还包括“所有的小同志”。为了所有的小同志的发展、向上、愉快，毛泽东特意托人寄书，这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关心革命下一代的博大情怀。

此信简洁明快，言简意赅，既有为岸英、岸青他们的进步而欢喜之情，又有对他们近来情况的牵挂之情；既有对他们学习的鼓励之情，又有对他们发展、向上、愉快的期望之情，读来让人倍受鼓舞。

## “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

——致范文澜<sup>[1]</sup>（1940年9月5日）

文澜同志：

提纲<sup>[2]</sup>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sup>[3]</sup>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sup>[4]</sup>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

九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字仲云。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1914年入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1917年毕业后，曾在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任教。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失去中共组织关系。1927年起，相继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任教。1939年9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到延安，任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1945年冬任北方大学校长。1947年7月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建国后，任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曾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是第一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病逝。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历史简明教程》（上册）、《中国近代史》（上册）、《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等。

[2] 指范文澜1940年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提纲。这个提纲后经整理于同年连续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第三期上，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3] 康，指康有为。参见本书第7页注[4]。

梁，指梁启超。参见本书第7页注[5]。

章,指章炳麟。参见本书第29页注[2]。

胡,指胡适(1891—1962),学者。原名洪骝,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910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过农学、哲学、文学,受教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初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年7月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讲演实验主义,介绍杜威哲学。1918年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为新文化运动著名人物。五四运动中对学生的运动表示同情。1919年7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改良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随后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22年创办《努力周报》,后又出版《国学季刊》和《现代评论》。同年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主张组织“好人政府”。1925年参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926年去英国参加中英庚款会议,后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1928年创办《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形成新月派。次年5月发表《人权与约法》等文章,发起人权运动,主张专家政治。同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创办《独立评论》,支持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发表全盘西化的言论。1932年参加宋庆龄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因违犯纪律被开除。1938年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代表蒋介石签订了《中美互助条约》。1942年辞大使职,任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留居美国,研究学术。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任伪国大主席,领衔提出“戡乱条例”。南京解放前夕,去美国。1958年赴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白话文学史》(上卷)等。

康、梁、张、胡都是在近代中国经学史和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学者。

[4]廖平(1852—1932),四川井研人,中国近代经学家。

吴虞(1871—1949),四川新繁人。五四运动前后曾写文章批判旧礼教,后来很少发表新见。

叶德辉(1864—1927),湖南湘潭人,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古文学者。

## 【赏析】

1940年,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了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读罢讲演提纲,写了这封信。

毛泽东提笔之处,喜悦之情跃然纸上。“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对“提纲”的赞赏,缘于现实的需要。1939年11月,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12月,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在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国民党也开动宣传机器,大肆贩卖反共理论,发起反共攻势,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宜再存在”,中国要实行“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反动文人叶青胡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他们极力宣扬所谓“基马尔主义”,“一次革命论”,鼓吹“三民主义”足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面对这种与抗战、进步、团结背道而驰的错误言论,毛泽东指出:“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

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了闷葫芦里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对国民党的独裁和抗战不力表示不满，但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抱有疑虑，有些人还企图在国共两党的政治主张之外走另一条道路。这无疑是思想上的大倒退、大反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毛泽东鼓励说，如果这种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如果能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错误进行批判，则能在学术界发生大的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一句，反映了毛泽东的谦虚，也表达了毛泽东对范文澜的鼓励和期望之情。其实，毛泽东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集中全党智慧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系统而又完整地提出了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第一次全面、深刻、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20年的历史经验，论述了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趋于成熟。毛泽东的这一科学的理论，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武装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增强了人民的胜利信心。

毛泽东非常注重科学理论的重大作用，在延安新哲学学会召开的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上，毛泽东到会，并讲话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陷。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过去我们注意得不太够，今后应加紧理论研究”。给范文澜的这封信，正是毛泽东重视理论的充分体现。

毛泽东强调理论研究，但从不主张为研究理论而研究理论，而是要求紧密结合变化着的斗争形势，用研究来的理论指导现实斗争，以粉碎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导伟大的抗日战争。

此信自始至终充满了毛泽东对范文澜的赞扬、激励之情。对于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济学的意义以及如何清算等问题，毛泽东分析得极为透彻。全信语言的运用，朴实而蕴含激情，简短而富有生气，读来催人奋发，鼓舞人心。



文澤同志：

這周讀了，你主編，法，所寫出，中  
有大意，因為用馬克思主義來分析這首歌  
一，因為目前地主大衆人階級成爲主  
在部十分複雜，同利與主幹的系  
統分析就是反對這種分析。你應  
早可以作爲參考，對正一半中有大的  
影響。 其次請注意用病以有破  
則，不知對李果章胡也錯誤一否有

所批判否？不知席及廖平天虞崇德等  
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明所批判，  
越朋友可张告为批判否。

我对历史空气研究，估研及  
估明研究等为一处，原为等。政川  
敬说！

叶东

九月二日

## “只有科学是真学问”

——致毛岸英、毛岸青<sup>[1]</sup>（1941年1月31日）

岸英  
岸青 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青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sup>[2]</sup>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参见本书第257页注[1]。

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参见本书第257页注[1]。

[2]林伯渠，1939年是中国共产党驻西安的代表。参见本书第92页注[1]。

### 【赏析】

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又把反共武装进攻的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于1941年初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背信弃义，布置陷阱，诬陷新四军为“叛军”，发

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毛泽东分析形势，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斗争形势之严峻，任务之艰巨，使毛泽东日理万机，工作异常繁忙。1941年1月31日，毛泽东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给毛岸英、毛岸青写了这封信。

此信落笔之处，亲情顿生。“岸英、岸青二儿”，此呼一出，已经饱含了作为父亲的满腔爱恋和牵挂之情。因为写信以前，毛泽东多次收到岸英、岸青的信和照片，都因为忙而未复。所以，在这次复信中，毛泽东写道：“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令父亲欣喜的并不只是儿子写来书信，而是从寄来的书信中，毛泽东发现了他们的进步。“很欢喜的”一句，声情并茂，溢于言表。然后，毛泽东特别夸奖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这是令父亲高兴的一面。但父亲又担心儿子的进步会因此而骄傲起来，助长自满情绪。毛泽东劝告他们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然后他又说，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以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由此可见，毛泽东并不是教儿子不问政治，而是指出了儿子当前主要任务就是专心致志地读书，以科学武装头脑，为将来从事社会实践提供有利条件。毛泽东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态度是重视的，而且对于如何重视，重视的时间先后，有自己辩证的观点。将来，毛岸英这一代，必定会成为新中国的建设者，没有自然科学知识是不行的。所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接着，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别人对岸英、岸青的鼓励和赞赏，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提醒儿子辩证地对待别人的表扬。毛泽东一向对于女要求严格，历来反对躺在老子的功劳簿上不思进取，而要胸怀远大，奋发进取。所以，他在信中说：“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作为伟人和父亲的毛泽东教子有方，当严则严，当宽则宽，严则不容分辩，宽则平等待人。信中“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一句，不仅体现出慈祥、宽厚的情怀，又有利于儿子的独立思考。

此信内涵丰富，语气恳切，平易而不失庄重，威严而不显强硬。他不许子女有任何特殊行为，也从 not 把自己的意志凌驾于子女的意愿之上，而是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循循善诱，促人自醒，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善教的一面。此信两次用“建议”一词，显得气氛融洽，字里行间既有不尽的喜爱之情，又有严格要求的态度；既有进步的褒奖，又有对问题的辩证分析，充分体现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对革命后代的殷切期望和谆谆教导之情。

岸英二兄：  
岸清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  
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  
岸清的照片，并且是第一次的信与照片，  
我都未读，很对你们不起，知  
你们见谅。

你们先进了，很欢喜的。岸英  
文疏，通顺，字也写得不错，有通顺的  
声气，是很好的。快有一年

作建議，題為「紀周禮」，多向自  
此科學界，少談些政治。  
治是要新，但周禮以「禮」為  
自然科學為宜，社會科學輔之。  
將來例置過來，以社會科學  
為主，自然科學為輔。○  
經濟學，只有科學是真學問，  
別都用玄氣。○人家說  
你抬舉你，這有一樣好，就是



鼓勵你上進；但有一樣壞處，就是  
容易受自滿之氣，得意忘形，不  
知腳踏實地，實事求是。你們  
有你們的行程，或好或壞，決定  
於你們自己及你們的直接環境。  
我不起來干涉你們，我的意見只  
當作建議。由你們自己負責  
決定。總之我歡喜你們，望你  
們更好。

岸英安然寫詩，我立詩

興也沒有，因此寫不出。讀  
 笑書。前年我在西安林伯渠宅同  
 志家，一大塊給你們少年不  
 圖，臉紅耳赤，真是了不得。  
 現再酌檢一書上，大批的讀後  
 代也讀也今年為此，自三不  
 六月已；讀書少，因為太忙。  
 你們讀到為何？想以為个  
 己。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

## “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

——致萧军<sup>[1]</sup>(1941年8月2日)

萧军同志：

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敬问近好！

毛泽东

八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萧军(1907—1988)，原名刘鸿霖，曾用笔名三郎、田军。辽宁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吉林舒兰县筹谋组织抗日义勇军，事败后潜入哈尔滨，开始文学创作生涯。1933年，完成其代表作《八月的乡村》。随后，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左翼文学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1946年，曾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置。1951年初，创作长篇小说《五月的矿山》、《第三代》。“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79年11月，重返文坛。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鲁迅研究会理事等。1988年6月22日病逝。当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

### 【赏析】

在与毛泽东交往的文人中，萧军当是一位有个性的作家。1938年初，萧军应李公朴先生之邀，到达山西临汾，任民族革命大学文艺指导，因不满于校长阎锡山的反共言论，愤然辞别，参加了游击队。后因日军威胁临汾，辗转来到延安。毛泽东从丁玲那里得知此事，专程前去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看望，并与之共进午餐。毛泽东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毫无首长架子，使年轻气傲的萧军深受感动。1940年6月，他携夫人、女儿第二次来到延安。1941年，他先后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理事、主席。起初，大家相处友好，萧军本人心情舒畅，工作很有成绩。后来，萧军因对同志之间的矛盾和革命文艺

队伍里的宗派主义作风不满，决定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同年7月，萧军当面与毛泽东辞别。毛泽东寻问原因，萧军直言不讳地向毛泽东反映了延安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特别是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并建议毛泽东应当有一个文艺政策，便于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只有这样，才能加强团结，有利于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一向从谏如流的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并极力挽留他，让他收集一下文艺界的情况。

盛情之下，焉能再辞？萧军回心转意，把专心收集到的材料寄给毛泽东，并再次写信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萧军是一位敢于斗争、勇于批评的文人。他在与民族的阶级的敌人作斗争的同时，也大胆抨击革命阵营内部的种种不良现象。虽然萧军有自己的缺点，但在交往中，毛泽东也了解到萧军直言率真的性格。毛泽东从团结、友爱、帮助的愿望出发，提笔写了这封信。

在信中，毛泽东写得诚恳坦率，严肃认真：“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这一段娓娓道来，如同促膝交谈。接着，毛泽东首先作自我批评：“延安有无数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然后善意地批评萧军“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可以说这既击中萧军的要害，但又不是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毛泽东在批评萧军之后，又表扬萧军“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并再次邀请萧军“再谈一回”，让人感到一种耐心周到的爱护之情。

毛泽东写信的时候，恰逢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毛泽东亲自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指对同志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也就是在团结的前提下，通过善意的批评达到最后的团结。萧军才华横溢，性格鲜明，是当时颇有争议的人物。毛泽东喜欢他的耿直秉性，对他十分尊重、谅解和爱护，但对他当时的弱点也逐步得以了解。为了帮助同志进步，毛泽东才写了这封信帮助他克服缺点。此信从团结的大局出发，以同志式的推心置腹的语言展开叙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心平气和。“三要”、“一不要”，细剖症结，指点迷津，有劝导之情，无教训之意，完全是出自帮助朋友完善自我的良好愿望。

胸阔如海，心细如丝。毛泽东这封信既诚恳虚心地接受了萧军的意见，也严肃认真地指出了他的缺点，既有善意的规劝，又有积极的引导；既有友好的理解，又有深刻的道理，可谓推心置腹，至情至理。一位领袖对待一位青年作家竟然如此平易诚挚！其光辉的人格，宽广的胸怀，真诚的友情，深深打动了萧军。此后，萧军安心革命工作，为革命事业辛勤工作了几十个春秋。

## “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

——致谢觉哉<sup>[1]</sup>（1941年8月6日）

觉哉同志：

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

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工作，则：（一）今年的八百万投资仅顾及公营事业，全没有顾及私人农业贷款与合作社贷款，仅是不得已的过渡时期的办法，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如能投三四百万元于农业，加以政府的春耕秋收运动之动员，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食，则收二十万担粮税数千万斤草税而民不伤，或尚可向绥、榆<sup>[2]</sup>输出数万担。如能使畜产繁殖及商业有相当繁荣，则年收二三百万元羊税与七八百万元商税而民不怨，财政的基本问题即解决了。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但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惟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因据银行告我，边区棉、布等入口年仅三千万元之数。如能输出四十万驮，除换取三千万元棉、布之外，尚有一千万元现币进口，则情况更好了。至收六百万至八百万盐税以补一部分财政之不足，尚是第二个好处，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虽然是否能销出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尚不可必，然舍此并无解决出入口问题之其他办法，因而舍此便无法解决物价、币价两大问题，故此政策的根本方针是完全正当的。因为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在盐的问题上，今年是不能行的，原因是粮贵、草贵与国民党限制，今年与去年不相同，舍官督民运（半强制主义），便不能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出境。

我前信未蒙林老<sup>[3]</sup>复示，似以所提各点为不切肯要。然区区之意，在使此问题得到合理解决，以达意志统一与行动统一之目的，过去数月的不统一，实在是非常之不利的。然统一首在对财经建设基本方针有一致意见，故就感想所及，提出如上论点，就正于你及林

老。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未知你意如何?

敬候日安!

毛泽东

八月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谢觉哉(1884—1971),湖南宁乡人。又名焕南。1921年参加新民学会。曾主编《通俗日报》和《湖南民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到上海,负责编辑《红旗报》和《上海报》。1931年秋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湘鄂省委政治秘书长、《工农日报》主编、省委党校教务长。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毛泽东秘书、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七七事变后,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代表。1939年后,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西北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法律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部长。建国后,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1月27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

[2]绥德,指陕西省绥德县、榆林县。

[3]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参见本书第92页注[1]。

## 【赏析】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初,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的对华作战计划确定:竭尽一切手段,发挥综合作战能力,以维持占领区的“治安”。日寇企图把中国变成它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以扫荡为主,又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使抗日根据地遇到了空前的困难。不仅军事、政治、文化方面的斗争加剧,经济斗争也尤为突出地摆在了中共领导人面前。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减轻人民负担,中共在政治上实行精兵简政和减租减息政策,在经济上发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中央、毛主席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制定一系列具体方针,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军民兼顾”的方针;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在组织经济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的方针。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健康发展,成就尤为显著。毛泽东不仅身体力行参加生产劳动,而且对边区经济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1941年8月6日,毛泽东给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写了这封信。

陕甘宁边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起一些经济建设经验。为了探讨、研究起见,毛泽东在信中主要同谢觉哉谈了边区的财政问题。毛泽东在信中指出,边区财经问题的规律性和决定点在于两点:①发展经济;②平衡出入口。对于发展经济,他主张“公私兼顾”,即首先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向境外输出一定量的物产,交换一定量的必需品入境,以使出入口平衡。“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按照这两点来检查工作,则应注意: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到增加粮、畜产量。盐是惟一能够达到出入口平衡的主要商品,它能解决好出入口平衡的问题,从而解决好物价币价两大问题。

此信主题鲜明,层次清楚,在结构上采用“总—分—总”的形式,使全篇紧紧围绕财经问题分别依次展开叙述,显得有条不紊,疏密紧凑;在语言运用上,带有鲜明的推理论证色彩,显得客观实在,毫无华丽词藻;在叙述方式上,由此及彼,水到渠成,显得思维缜密,逻辑严谨。

此外,像“虽仍不深刻,却……”、“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未知你意如何”等词句的运用,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谢老的尊敬和谦恭之情。

## “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致谢觉哉<sup>[1]</sup>(1941年8月22日)

谢老:

二十一日示悉。我要的,就是林老<sup>[2]</sup>令财,建两厅起草的,不是另要别的计划。你说有了今年经验,计划会要实际些,是对的。今年有很丰富的经验,为前此所未有。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八万人与一百四十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至于执行政策中的错误缺点(边币中,盐的产运销中,粮食中,税收中,公营工商业中),都由于缺少经验之故,今后应该着大力于纠正。今年的所以采取这些政策,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今年经验教育了八万人,也教育了一百四十万人(富县报告可证),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领导者。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边区有政治、军事、经济、财政、锄奸、文化各项重大工作,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而不要提民主或其他什么为中心工作。这些意见,未加深究,提出作为你的参考。高岗<sup>[3]</sup>同志送来一个材料,值得注意,阅后请退还高同志。徐老<sup>[4]</sup>生活的叙述看过,已交组织部,中央准备一般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但徐老一人。此问

日安!

毛泽东

八月二十二日

周文<sup>[5]</sup>可入党团<sup>[6]</sup>,共六人,请提出中央局。政府党团向中央局负责,是执行中央局决定的,其任务是掌握政策,总结经验,大事须经中央局批准。

我说盐的官督民运含有部分的强制劳动,不说半强制劳动,就是你说的公私交利之意。但必须承认这部分强制的必要性,第一,衣暇必须去,非去不行;第二,公盐六万驮,不但今年,明年还是必须的,应列入明年预算中。春耕秋收动员,也带部分强制性,但运盐的强制性,较之春耕秋收要多一些,与完全无偿的军事动员如运粮,经济动员如筑路则大有区别。但运粮筑路也是必须的,也得承认之。只反对劳民伤财有损无益的动员。又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 谢觉哉,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书记、陕甘宁边

区政府秘书长。参见本书第273页注〔1〕。

〔2〕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参见本书第92页注〔1〕。

〔3〕高岗(1905—1954),陕西横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做兵运工作。1933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参与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议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代理政委。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兼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委主任。1953年与饶漱石进行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54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和批判后,于8月在北京自杀。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开除党籍。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4〕徐老,指徐特立,当时任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参见本书第208页注〔1〕。

〔5〕周文(1907—1952),四川荣经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

〔6〕指陕甘宁边区政府党团。党团,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

## 【赏析】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封锁,加之连年的自然灾害,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出现了极大困难。为了战胜经济困难,党中央决定动员敌后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于1941年8月22日,给谢觉哉写了这封信。

此信谈的中心问题是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很注意总结经验,他指出1941年边区经济建设“最大的一条经验,就是在公私合作中(8万人与140万人合作)解决了问题,证明政策是对的,办法是有的”,那就是同时发展公营经济和私营经济,才能保障财政供给。不允许私营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抗战的需要也得不到补充。不发展公营经济也不行,只有发展了公营经济,才能减轻人民负担,休养民力,才能基本解决或部分解决军队、机关和学校的供给。他认为在执行政策中错误缺点的产生,也是因为缺乏经验。此信还指出,凡人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主意、订计划的出发点和方法论,所以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毛泽东还指出:“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通过总结经验,可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抓住问题的实质,找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毛泽东的宏图大略总是先入一着,高人一筹,奥妙就在于他善于总结经验。正是由于善于很好地总结经验,才使他在摸透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清醒地认识和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

此信紧扣主题,联系实际,反复论证,有理有据。文中八处提到“经验”二字,这像是在告诫人们,注意吸收新经验,善于总结老经验,这是边区领导的一项重要任务。

通观全篇,语言朴实无华,自然流畅,通俗易懂。“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会作”、“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等句子,语言虽然朴实,却蕴含着深奥道理。

## “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

——致中共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sup>[1]</sup>

(1941年9月29日)

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各同志：

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关于实际方面的材料，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要目见另单）。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请各同志首先看下列材料：

- （一）《左派幼稚病》<sup>[2]</sup>（用1939年解放社版）；
- （二）艾译《新哲学大纲》<sup>[3]</sup>第八章“认识的过程”（即《哲学选辑》第四章）；
- （三）李译《辩证唯物论教程》<sup>[4]</sup>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式论理学”；
- （四）河上肇<sup>[5]</sup>《经济学大纲》的“序说”（已油印发出）。

中央研究组

组 长 毛泽东

副组长 王稼蔷<sup>[6]</sup>

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中央研究组、高级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高级学习组，是中共中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于1941年8月和9月决定成立的。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高级学习组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党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指导。

[2] 《左派幼稚病》，即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4月至5月）。

[3] 指艾思奇和郑易里翻译的苏联米定、拉里察维基等所著《新哲学大纲》。

[4] 指李达和雷仲坚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5] 河上肇（1879—1964），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6] 王稼蔷，即王稼祥。参见本书第148页注[18]。

### 【赏析】

抗日战争以来，由于战斗频繁，斗争任务紧张，党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抓得不

够,党内存在着一些诸如学风、党风、文风不正的问题。毛泽东正确分析了问题的原因,指出,这些党内的问题和思想矛盾,是社会上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要解决好这些矛盾,一不能光靠处分和采取压服的方法,而必须使党员和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别是非,观察问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很有必要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生动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于是延安整风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41年4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的决定》,其内容是:(一)为了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班。其组成成分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党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级机关某些干部,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二)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第一期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的20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克服错误思想,发展革命理论为目的。(三)延安以外各地各重要地点,均建立各级学习组,军队至师、军区、或纵队为止,地方至区党委或省党委为止。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错误。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为了加强对整风运动的思想领导,9月26日成立了由毛泽东任组长的中央学习研究组。中共中央相继作出了《关于高级干部学习的决定》,全国各地都成立了高级学习组,研究马列主义、党史及中国革命问题。为了指导好延安中央研究组及高级学习组同志们的政治理论学习,9月29日,毛泽东写了这封信。

此信开宗明义,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中国共产党从一诞生就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并产生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紧密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中发展起来的,是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提高起来的。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始终。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有关整风的报告中,一再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共产党、边区乃至个人的历史进行认真总结,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边区工作、干部思想作风实际结合起来,通过“结合”,加深对整风文件的理解,转变思想作风,推动边区乃至全党的各项工作。所以,这次理论学习,仍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对于实际方面的材料,他“请各同志看六大以来的文件”,关于理论方面,建议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备用材料在信中列举了四篇。

此信层次分明,言简意赅,让人读后一目了然:先介绍“研究”的方针是什么,再说实际方面的材料有哪些,理论方面的材料有哪些,对于介绍的材料还特别注明了有关解释。可以看出,作为中央研究组组长的毛泽东对理论研究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工作认真负责的态度和满腔的革命热忱。

## “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

——致陈毅(1942年8月4日)

陈毅同志<sup>〔1〕</sup>：

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面情况，这是很好的。你们又刚在四月底开过扩大会还不很久，也不必急于更改。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以华中论，你们决定现有八万主力军四万地方军扩大至十万主力军十万地方军，共计二十万，党政还不在内，江南、皖东、淮北、鄂中均已缩小，这个总数是太大了。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像，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现在华北、山东须下绝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到了明年必不能维持。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

毛泽东

八月四日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陈毅，当时任新四军代军长。参见本书第313页注〔1〕。

### 【赏析】

从1941年开始，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扫荡”和“蚕食”，并将数以百万计的壮丁抓往东北和日本国内。国民党政府在皖南事变前，断绝了对八路军粮饷和其他物质供应，并继续以几十万军队对根据地实行包围和封锁，加上各地不断发生自然灾害，导致抗日根据地面积缩小，根据地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抗战以来，随着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壮大和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部队机关出现了臃肿、庞大、行动不便以及指挥不灵等现象。这样，便产生了两个亟待解决的矛盾：一是根据地物质条件恶劣、生产力下降与军队供应之间产生了水小鱼大、兵多难养的矛盾；二是庞大的军事机构行动困难、指挥不便，为战争环境所不容。此种矛盾不解决，便有作毙危险。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敌后抗战困难的严重性、长期性，以及我军出现的新情况、新矛盾，并开始寻



求解决困难的办法。1940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节省人力物力,坚持长期抗战的指示,明确要求全区域党政军民学脱离生产者之人数与全人口之比例不能超过百分之三。1941年11月7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指出:主力军应采取适当的精兵主义,其工作重心是提高其政治军事技术的质量,缩编与充实编制。中央军委还认为,无论将来有无大的变动,在山地根据地内主力军在数量上的比较,一般应以二与一之比为原则,在平原根据地内则以一与一之比为原则;在某些最困难的区域,应当打消主力军与地方军的区别,全部武装地方化。1941年11月6日,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指出:“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理由是: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主义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惟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量入而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办法是:一、政府应根据客观物质条件及主观经济需要而提出计划经济,以求全面提高生产力,改善经济条件,加强经济基础;二、在现在经济基础上,政府应有量入而出的统一经济计划;三、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在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病残滥竽充数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物力等现象;四、规定供给条例,避免不必要的供给与消耗;五、提倡节约廉洁作风,避免不应有的浪费现象。李鼎铭先生的提案,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的议员不理解,认为正值抗战紧急关头,日寇不断向我进攻,顽固派也封锁我们,不断制造磨擦,在此情况下实行精兵简政,岂不是束手就擒?甚至有人怀疑提案的人动机不良。但多数议员认为,这一提案是有远见的。在毛泽东支持下,这一提案最终被通过。

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这个提案十分重视,他将提案的内容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并高度评价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1941年12月初,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指示:“为了长期斗争,准备胜利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把精兵简政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的中心工作。社论指出,在敌我斗争已进入新的阶段的情况下,我们的兵,不能不精,我们的政,不能不简。12月13日,中共中央向各抗日根据地发出了“精兵简政,发展经济”的指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纷纷实行这一政策。毛泽东指出,这一次精兵政策,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1942年上半年,全军进行了第一次精兵,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有较大差距。1942年8月3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彻底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的社论。社论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应用一切力量来彻底实行精兵政策。1942年8月4日,毛泽东针对新四军部分同志认为华中不能精兵简政的片面观点,起草了这份给陈毅的电报。

《孙子兵法·行军篇》:“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擒于人。”“兵非益多”谋略,是孙子在《行军篇》中提出的质量建军的思想。“武进”,意为恃勇冒进;“并力”,意为聚合力量,指的是集中兵力;“料敌”,意为判明敌情;“取人”,意为选择精兵强将;无虑而易敌,意为无远虑又轻敌。孙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作

战并不是兵力越多越好,只要不轻敌冒进,并能集中使用兵力,准确判明敌情,善于用人取得部下信任和支持,也就足够了。只有那种无深谋远虑又轻敌妄动的人,必定会成为敌人的俘虏。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能以一当十,以十当百。乌合之众,人数虽多,又有何益。所以,孙子在评论当时军队时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毛泽东在这份电报中倡导的精兵简政的策略,正是在总结抗日战争经验基础上对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被毛泽东称为“黎明前的黑暗”阶段,八路军和抗日革命根据地面临着军事、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以“扫荡”为主要形式,实行“清乡”、“蚕食”、“治安强化运动”等多种形式的进攻,使根据地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国民党顽固派又在陕甘宁边区驻兵几十万,建筑碉堡数以万计,断绝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粮饷供应,再加上连年自然灾害,解放区的生产和军民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减少,原有机构和人员相对庞大,收支矛盾尖锐,物质困难重重。毛泽东认为,这个困难,今后必然愈来愈厉害。目前还有若干同志处之泰然,不大觉得,我们就有唤起这些同志提起注意之必要。各抗日根据地的全体同志必须认识,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在毛泽东看来,精兵简政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说:“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因此,毛泽东积极采取李鼎铭先生的提案,而且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大刀阔斧地推行,确实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各部队先后多次缩编机关,整编部队,减少指挥层次,充实和加强战斗部队;如晋西北军区精兵前,机关与部队人数的比例,师旅级为一比一点七,团级为一比十点八。据晋察冀边区1942年8月统计,战斗部队员额已占边区部队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五。

清·魏源《圣武记·武事余记》:“兵愈多者力愈弱,饷愈多者国愈贫。”意思是说,军队数量越多,国家的力量越弱;军饷发得越多,国家财政就越贫困。这条格言告诫人们,军队的规模与数量,必须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军队过于庞大,就会影响经济建设,削弱整体实力。由此可见,走精兵之路是军队建设的根本。毛泽东倡导的精兵简政政策,有利于八路军精简机关,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将大部分主力旅与军分区合并,以加强地方军,使主力军、地方军的比例趋于合理,从而达到军队和地方党政机关的人数不超过根据地人口的百分之三的目标,达到精简、效能、统一、节约以及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这一策略,虽然使部队数量有所减少,但战斗力有所提高,并使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得到加强,从而更加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形势。同时,也减轻了人民负担,对克服困难,坚持长期的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 “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

——致何凯丰<sup>[1]</sup>(1942年9月15日)

凯丰同志：

今日与博古<sup>[2]</sup>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他向二百余人作了报告，影响很好（据舒群<sup>[3]</sup>说），报馆人员在讨论改进中。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事，我想还要讨论一次，以促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各根据地当局也还未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武器，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整风完后，中央须设一个大的编译部，把军委编译局并入，有二三十人工作，大批翻译马、恩、列、斯及苏联书籍，如再有力，则翻译英、法、德古典书籍。我想亮平<sup>[4]</sup>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最好还是他主持编译部，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sup>[5]</sup>及鲁迅<sup>[6]</sup>，实是功德无量的。

罗迈<sup>[7]</sup>走后，中研院由你直接指导。

解放<sup>[8]</sup>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我已替舒群约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艾、范、孙雪苇<sup>[9]</sup>及工、妇、青三委都在内。青委约的冯文彬<sup>[10]</sup>，拟每月征6,000—10,000字的青运稿件，不知能办到否？

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敬礼！

毛泽东

九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刊印

### 【注释】

[1]何凯丰(1906—1955)，江西萍乡人。又名何克全。1924年参加革命。后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3年任少共中央局书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1月出席遵义会议。同年到达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粮食部部长。193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3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1941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中共沈阳市委书记等。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主义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共

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

[2]博古,即秦邦宪,当时任解放日报社社长。参见本书第303页注[1]。

[3]舒群(1913—1989),黑龙江哈尔滨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

[4]亮平,即吴亮平(1908—1986),浙江奉化人。翻译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书,曾在延安编辑《解放》周刊。

[5]唐三藏,即玄奘(约600—664),洛州偃师(今河南偃师)人。唐代高僧,佛经翻译家。曾主持翻译经、论70余部,共1300多卷。

[6]鲁迅,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曾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著作多种,编为《鲁迅译文集》,共十卷。

[7]罗迈,即李维汉,1940年10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41年7月兼任中央研究院新闻研究室和教育研究室主任,1942年9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参见本书第78页注[6]。

[8]指《解放日报》。

[9]艾,指艾思奇,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参见本书第233页注[1]。

范,指范文澜,当时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参见本书第259页注[1]。

孙雪苇,又名刘雪苇,1912年生,贵州郎岱(今属六盘水市)人,当时是延安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

[10]冯文彬,当时任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 【赏析】

全党范围内的整风运动掀起以后,由于抗日根据地人口稀少,地域辽阔,开展整风工作困难重重。有些地区党的路线贯彻不下去,存在着依靠少数人冷冷清清做工作的问题,没有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多次指出,要解决发动群众的问题,根本的办法是从思想上进行教育;具体的办法之一是办好报纸,宣传好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依靠报纸能够把大家组织起来,把边区整个的政治、文化生活组织起来。因此,应该不拘形式,因地制宜,多办各级各类报纸,促进边区的政治、生产、文化等各方面工作的开展。但在当时,各地宣传部门对当地的通讯社工作及报纸工作注意不够,对宣传人员及宣传工作缺乏指导,不懂得通过报纸去做工作。为了改正过去不注意讨论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的习惯,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使报纸的宣传更加符合党的政策和方针,更好地发挥通讯社及报纸作为革命政策和革命工作的组织者、宣传者的作用,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给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何凯丰写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信中说,应善于利用报纸、新闻作为极重要的武器进行革命工作。毛泽东肯定了报馆的工作有进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为完全的党报。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早在同年3月毛泽东就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向前来参加会议的延安各部门负责同志和作家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要利用报纸整顿“三风”,通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

出去,以此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解放日报》的工作进步很快,影响很好,成为全党整风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宣传者。在谈到各部门利用报纸做工作的问题时,毛泽东主张还要再加讨论,以引起中央各部门同志的注意。只有把报纸当作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的武器,才能有效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政治、经济工作搞上去。所以,在此信中,毛泽东写道:“我想要写一电报(或须用书记处名义),提出此种任务。”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提出了克服宣传人员闹独立性倾向的意见。

信的后半部分,提出了建设一个大的编译部的建议,同时对其人员、职责等一一作了指示,并鼓励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信尾,毛泽东针对《解放日报》第四版存在的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的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办法。五天以后,毛泽东专门为此拟定了组稿办法,规定了负责征稿的人选,他们的分工,以及征稿、用稿和稿件的字数,并要求征稿者对稿件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无毛病,文字通顺,力求通俗化;规定每篇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如有不适合用的稿件,由编辑部负责退稿。若由编辑部作重要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这就很好地解决了稿量不足的问题。

此信结构严谨,段落分明,紧扣话题,有的放矢,让人们体会到了报纸对于做好革命工作的重要性,领悟到了深刻的革命道理。在语言运用上,多处用到“我想……”、“不知你意如何”、“不知他自己愿干否”及“不知能办到否”等句式,营造了一种宽松和谐的同志式的语言气氛,促进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心灵的默契,增长了彼此的尊重和信赖。

## “让自由主义暴露”

——致何凯丰<sup>[1]</sup>（1943年4月22日）

凯丰同志：

从前你有几封信我还未回复，兹复于下：（一）小资产自由主义问题，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惟今年五五，中宣部或可发表一个一般整风学习的总结性的东西，以推动全党的整风，请加考虑。（二）生日决定不做。做生日的太多了，会生出不良影响。目前是内外困难的时候，时机也不好。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还是学习时候，不是鼓吹时候；要鼓吹只宜以某些片断去鼓吹（例如整风文件中的几件），不宜当作体系去鼓吹，因我的体系还没有成熟。（三）高、中两级干部教育计划，依你昨日主张暂停为好，先做肃奸教育，配合此次肃奸工作，昨信已复。（四）中宣部今年业务集中于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三项，同意此种意见。惟译、著方面（译是马列，著是历史），须集几个人来干，期于有些成绩。以上请考虑。明日拟开一次宣委会议。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何凯丰，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参见本书第282页注[1]。

### 【赏析】

1943年4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指出：“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的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其数量至足惊人”，规定：“整风的主要斗争目标，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与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为了更好地推动整风运动深入开展，针对何凯丰同志几次来信提到的问题，毛泽东写了这封信，一一作了回答。

首先，针对何凯丰提出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作总论的想法，指出：“今年五五来说，还不相宜，就全党来说，目前还是让自由主义暴露的时候，还不宜于就作总论。”这就反映了毛泽东谋略决策的一个侧面。毛泽东在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运筹帷幄，高瞻远瞩，



以深邃的洞察力和精确的分析判断能力,深谋远虑,驾驭全局,因势利导,因情措法。要反对自由主义,就要找到自由主义的根源;要找到自由主义的根源,只有让自由主义充分暴露,操之过急,则往往适得其反。

其次,回答了何凯丰提出的“过生日”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对于过生日,毛泽东从不主张,这种简朴的崇高风范密切了革命领袖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此信中,毛泽东托辞“内外困难”、“时机也不好”婉言拒绝,表现了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的高尚情操。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张不宜当作体系去宣传,只宜以某些片断去宣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的谦虚和谨慎。

最后,又对有关教育问题发表了意见,赞成何凯丰先做肃奸教育的主张以及开展干部教育、国民教育、文艺运动的意见,体现了毛泽东集思广益、择善定谋的博大胸襟。毛泽东的这种虚怀若谷的高贵品质,既调动了下级的积极性,又切实保证了决策的准确性、可靠性。

##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

——致杨绍萱、齐燕铭<sup>[1]</sup>（1944年1月9日）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sup>[2]</sup>。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九日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杨绍萱（1893—1971），河北滦县人。当时是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

齐燕铭（1907—1978），北京市人。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教务处文教科任科长。

〔2〕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郭沫若，参见本书第305页注〔1〕。

### 【赏析】

延安文艺的健康发展，无不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1944年1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导，在中共中央俱乐部演出的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写了这封信，请中央党校副校长转交给了编导者。

信一开头便充分肯定了杨绍萱、齐燕铭的工作，向他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毛泽东在信中阐明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毛泽东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已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人民大众服务及如何为人民大众服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因而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应当是人民大众，文艺作品应当塑造人民大众的新形象，表现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为工农兵服务。然而“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而杨、齐的编导，恰恰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赶下台，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所以，毛

泽东对杨、齐的戏剧改革是非常满意的。《逼上梁山》的重新编导上演,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孕育出来的延安文艺奇葩。早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指出,在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人民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要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1942年,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又强调指出:“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予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因此,毛泽东把杨、齐的工作,视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并希望“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文艺工作者满怀革命激情,从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来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给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注入了活力,增强了力量。在抗战初期,他们创作出一些密切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对于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世界观还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到了根据地后仍以旧的世界观和旧的思想感情对待工农兵群众,对待党的文艺事业。这种理论脱离实际,艺术脱离政治的倾向,必然同根据地新的环境、新的服务对象和斗争要求不相适应。有些人主张艺术第一,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反动利主义”等错误倾向。因此,解决“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就成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一个原则的问题。为此,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深刻而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艺必须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

平剧《逼上梁山》是根据施耐庵的《水浒传》片断改编的。此剧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结合现实斗争,采用借古喻今的方法,生动刻画了一个不畏强暴,在遭到恶势力迫害之后,挟长风,冒风雪,投奔梁山参加斗争的林冲形象,极大地鼓舞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的抗日斗志,受到了工农兵的热烈欢迎,起到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肯定了杨、齐的编导工作。一切文化或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这种文艺的阶级倾向性,取决于作者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最根本的是世界观。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就能坚持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观点,坚定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相反,确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就只能为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服务,背离人民意愿。剥削阶级的文艺是“历史的颠倒”,而杨、齐的贡献就在于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揭露了反动阶级的腐朽,歌颂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而把人民大众推向了戏剧舞台的主角位置,塑造出了生动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新形象。所以,毛泽东在信中高度评价道:“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

此信主题鲜明,立场坚定,篇幅虽短,却言简意丰。毛泽东紧紧围绕杨、齐对旧剧的成功改编,从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全局出发,对杨、齐的无产阶级文艺实践在全国抗战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深情的赞颂,并提出殷切的希望。这对无产阶级革命作家队伍的成长及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繁荣无疑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语言运用上,此信概括集中,逻辑缜密,简洁明快,让人读后,不仅被其深刻的思想所折服,更会为其独特的思维语言而称绝。

紀念英雄烈士：

有了你們的犧牲，我們做了現在的工作，  
我向你們致敬，並請代向廣  
大同胞致敬！歷史是人民創造  
的，但在舊社會裏（在一切帝國  
主義的專制舊社會裏）它卻成了  
汪洋，由革命者、英雄、先烈們統治  
着社會，這樣歷史的顛倒，現在  
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

歷史的巨月，這些書到開門齊生面，  
所以值得慶賀。郭沫若君在歷史學  
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你們則在商  
業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你們這  
兩端都是舊到新，新的東西，你們  
端，我想到止一主就十分高興。希  
望你們多編多寫，蔚成風氣，  
推向全國去！

敬禮！

郭沫若

## “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

——致彭德怀<sup>〔1〕</sup>（1944年1月10日）

德怀同志：

看了十二条的分析<sup>〔2〕</sup>，你是用了心的，这种研究态度是很好的。内容也是一般地正确的，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sup>〔3〕</sup>。

毛泽东

一月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原名得华，号石穿。1916年入湘军。1922年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后在湘军中任营长。1926年所在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后，任独立五师一团团长。同年参加了北伐战争。192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领导发动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军长，后率部上井冈山。1930年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第一方面军副司令员、红三军团总指挥兼前委书记，参与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曾参加指挥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参加遵义会议。后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红军东征和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前方军分会副主任，参加创建华北抗日根据地。曾指挥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六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又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上书毛泽东，陈述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和教训，结果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受到批判，并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防部部长职务。1962年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并被诬陷为“里通外国分子”。1965年11月赴西南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的红卫兵非法绑架到北京，后受残酷迫害，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12月被中共中央恢复名誉并得到彻底平反。当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2〕指彭德怀1943年6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整风学习会上的发言，题为《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

〔3〕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发言记录稿中的一些提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 【赏析】

1943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在中央北方局党校地委干部整风学习会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十二条》的发言。毛泽东在看了这个发言后不久，给彭德怀写了这封信。

信中，毛泽东首先对彭德怀认真研究问题，提出自己见解的方式和态度给予了肯定。同时，对发言中一些失之偏颇的观点也提出了批评意见。在彭德怀发言记录稿的“必须使得党不把自己看成为国会选举机构的附属物……而应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联合之最高形式”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党是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工会、合作社、军队、政府（与其它阶级联合的），国会党团等阶级联合的一切形式，均须受党的领导。中国党是照这一条建立的，但在党员中认识不很深刻。”在记录稿的“1915年出版的《新青年》在后一时期实际起了中国共产党党报的作用，成为青年运动的指导刊物”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新青年》传播了共产主义思想，但还不是党报”。在记录稿的“大革命的后一时期，陈独秀犯机会主义，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于是大革命也就失败了”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加上客观原因”。在记录稿的“二七年，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暴动创造了红军的基础”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广州暴动创造了红军。”在记录稿的“必须认真进行整风工作”这句话旁边，毛泽东写了“地方要去掉官僚主义作风，军队要去掉军阀主义作风，全党要去掉教条主义作风”。这就使彭德怀的观点更加完善。

此信50字左右，可谓字字金玉，言简意赅。言彭德怀的长处用了大部分篇幅，对彭的缺点，却只用了“只是在个别地方有些缺点”一句，点到为止，显得极为含蓄，意味深长，从一个侧面表达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原则，以及对同志认真负责的态度。

## “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

——致周扬<sup>[1]</sup>（1944年4月2日）

周扬同志：

此篇<sup>[2]</sup>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sup>[3]</sup>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sup>[4]</sup>，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主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者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周扬（1908—1989），湖南益阳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曾留学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革命文学活动，曾任中共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6年后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全国文联副主席。建国后，历任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曾任一、二、三、四、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主席。党的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大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当时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2]指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后来发表于1944年4月8日

延安《解放日报》。《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编辑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

[3]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

[4]这是周扬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写的编者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的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 【赏析】

为了澄清延安部分文艺工作者的错误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毛泽东结合文艺运动的实际情况，于1942年5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此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要求延安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在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鼓舞下，《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编辑而成。此书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周扬为它作了序文。毛泽东看罢序文，写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对序文表示称赞。“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几句，表明了毛泽东的赞同和谦虚。但毛泽东同时指出，把自己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不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恩、列、斯并列，是毛泽东一贯的态度，就是文章，他也不主张与之同配。毛泽东一直把自己视为马、恩、列、斯的学生，一直把马、恩、列、斯视为中国共产党人、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不与马、恩、列、斯并列是毛泽东谦逊品格的充分体现。另外，毛泽东就周扬用列宁对蔡特金的话“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这句话“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主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虽然提出了序文的不足，但并不强制其修改，而是用民主、平和的语气进行学术商讨，建议周扬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

此信观点明确，层次分明。第一层意思，主要是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扬序文的高度评价，更体现了他的谦逊和认真；第二层意思则表达了毛泽东关于“普及”和“提高”的辩证思想观点。毛泽东早就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在此信中，他又一次作了解释。

通篇在语言运用上，显得朴实谦逊，内蕴丰富，读来觉得亲切感人。

## “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

——致李鼎铭<sup>[1]</sup>(1944年4月29日)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sup>[2]</sup>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禱！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李鼎铭(1881—1947)，原名丰功。陕西米脂县桃镇人。廪生出身。早年以教书为业。辛亥革命后，积极拥护孙中山的政治主张。1913年，任米脂县米东区区长，并创办该县第一所国民小学，任校长。1916年，受聘于榆林中学。1918年，返乡行医，并创办桃镇国民高等小学，任校长。自1923年起，历任榆林道尹公署顾问、科长等职。1926年后，一直在米脂县行医。七七事变后，拥护团结抗日的政治主张。1941年后，先后当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曾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对抗日根据地战胜困难起了积极作用。1942年12月，在边区二届二次参议会上，又作《文教工作方向》专题发言，对边区消灭文盲、培养知识分子、普及卫生习惯等方面提出许多有益的意见。抗日战争胜利后，他站在中共一边，坚决反对蒋介石反革命内战政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和平民主而斗争。1947年12月病逝。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

[2]李健侯，陕西米脂人。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 【赏析】

李鼎铭是陕西米脂一位开明的绅士。辛亥革命后在家乡提倡放足、剪发、禁赌、破除迷信和兴办学校，长期从事教育活动，晚年接受革命思想。李鼎铭先生由于竭诚爱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因此深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尊重，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隆重开幕，毛泽东在会上诚恳地说：“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就是要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和全国一切抗日的党派、阶级、民族合作，只要不是汉奸，都要联合一致，共同奋斗。”他还说，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毛泽东感人肺腑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李鼎铭先生的心，使他深受鼓舞，无比感动，十分佩服。这次会议选举李鼎铭先生为边区政府副主席。选举结束后，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演说，既讲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过程，又表达了他竭诚爱国、民主参政的热忱。其时，李鼎铭已61岁了，但壮心不已，对民主参政、建设边区尤具远见卓识。他以主人翁责任感，立足现实，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提案十分重视，高度评价说：“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李健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著有《永昌演义》一书，内容反映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读了此书，给李鼎铭先生写了这封信。

此信称“鼎铭老先生左右”，表现了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敬重。接着，毛泽东对《永昌演义》作了充分肯定和赞赏。然后，委婉地指出了此书存在的缺点。信中说：“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他不主张只赞美李自成而忽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力。对农民起义问题，毛泽东在信中作了独到的科学论述，提出了农民战争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这一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正是《永昌演义》缺乏的新历史观点。但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对此书作简单的否定，而是从正面论述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就委婉地批评了书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希望作者能以新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书加以改造，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毛泽东虽提出希望，但不强加于人，而是希望通过李鼎铭征求李健侯的意见，并代问李健侯健康状况，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作者的尊重和关心。

此信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对《永昌演义》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从而给人们以巨大的思想教育和启示，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和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高超艺术。

鼎銘老先生左右：

福漢義前數年為多人所信託；  
近因部人閱讀過，獲益良多。  
並已抄存一部，以應將來之用。  
你以李使侯先生經營此書，費了  
大力，請先生代我向作者致謝，  
之意。此書實為李自成個人品德  
但與師其想進動。實則吾國自  
秦以來二千餘年排動和庸向前  
進步省主要的是農民戰爭，  
大順帝李自成將所領氣的



偉大的農民戰爭，就是二千年  
來或快這類戰爭中的極著  
名的一次。這運動起自陝北，  
實為陝人的光榮，尤為先生及  
作者健侯先生們的光榮。此  
書現在如按述新歷史觀而  
加以改造，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  
未知能獲作此同意否？又健侯別  
近來健康如何，能來延安游  
否？統統轉致健侯先生為禱！

敬頌  
大安！

王河東  
四月十九日

## “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

——致丁玲、欧阳山<sup>[1]</sup> (1944年7月1日)

丁玲  
欧阳山二同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sup>[2]</sup>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sup>[3]</sup>，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

敬礼！

毛泽东

七月一日早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 丁玲(1904—1986)，女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蒋冰之。湖南临澧人。1921年到上海，进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1922年入上海大学中文系，一年后到北京。1927年开始发表小说，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在当时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1928年与沈从文、胡也频组织“红黑社”，出版《红黑》半月刊。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初，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下半年，担任“左联”党团书记。1933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1936年逃离南京到陕北，任苏区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抗战时期，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1946年到达晋察冀边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1948年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获得斯大林文艺奖金二等奖。全国解放后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并曾被选为世界民主妇联执行委员。1958年下放北大荒，“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1979年平反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兼文化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等职，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1986年3月在北京逝世。

欧阳山，1908年生，湖北江陵人，作家。1941年9月起任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1942年2月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2]指丁玲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于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

[3]1944年7月3日,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招待出席陕甘宁边区合作社会议的全体代表,毛泽东到会并讲话,阐述了合作社的方针和任务。

## 【赏析】

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中,出现了实行生产劳动初步合作化的组织,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为了用文学的形式鼓舞解放区军民的生产斗志,1944年6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丁玲的《田保霖》和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文章塑造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这是他们参加陕甘宁边区合作会议期间创作的新作。文章发表的当晚,毛泽东连夜读完,立即提笔给二人写了这封表扬信。

据丁玲在《〈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中说:“《田保霖》……这篇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好,一点也不满意”。不难看出,丁玲大约是着重从艺术角度评价自己的作品的,但毛泽东看重的是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家的创作道路的转变。毛泽东历来主张文艺创作要搞“工农大众文艺”,坚持在文艺创作方面要以工农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出反映工农大众现实斗争生活的时代作品。

丁玲在30年代就已蜚声文坛,但她1936年赴陕北以前的创作,刻画最成功的人物多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少数作品虽也反映了工人农民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他们革命意志的初步觉醒,但对他们的表现和刻画毕竟还是黑暗社会的受苦受难者,充其量也只是有些抗争精神而已。而《田保霖》描写的人物则是边区合作社生产中的模范,他本是受过教会宣传的买卖人,在党的教育下才热衷于“公益事业”转变成为合作社的带头人。他代表了解放区建设者的新农民形象,而他的合作社的兴旺又反映了边区人民的新生活。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发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要求写工农兵并不止于题材上写其遭际,更主要的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体现党的正确领导。《田保霖》和《活在新社会里》这类作品无疑是对这一伟大号召的最为切实有力的响应。毛泽东夸他们的文章写得好,正是充分肯定了文艺工作者队伍中出现的这种崭新的文艺方向和创作风格。

该信写得热情洋溢。“一口气读完”和两个“庆祝”既是对作品的充分的肯定和褒奖,又表现出浓烈的喜悦之情。此信一出,丁玲、欧阳山及解放区所有的文艺工作者无不深受感染和鼓舞,革命文艺迅速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气象。

丁玲  
政協山二月志：

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  
在洗澡后睡觉前一气读完，我替中国  
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所写作：庆祝  
！会作社会派要我讲一大话，毫无材  
料，不知从何讲起，陈丁谢：你们的文章  
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明晚的话，今  
天下午或傍晚提请你们来校要教，不  
知是否可以？

敬祝！

王泽东  
初一日

## “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

——致秦邦宪<sup>[1]</sup> (1944年8月31日)

博古同志：

此文<sup>[2]</sup>改了一些，原拟发表，后觉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故决定不发表，而请报馆<sup>[3]</sup>另写一篇不涉及许多根本问题的文章发表了。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sup>[4]</sup>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这种群众运动，有当地的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变工队<sup>[5]</sup>及合作社，自卫军及民兵，乡议会，小学，识字组及秧歌队，以及各种群众的临时集会；有脱离家庭、远离农村的群众运动——进军队（才有革命军），进工厂（才有劳动力市场），进学校（才有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出外做事等。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使侵略者、地主、买办手下解放农民，建立近代工业社会。“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上述种种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扩军、归队、招工人、招学生（这后二项将来必多），移民、出外做革命工作、找其他职业等等，都是提倡走出家庭，这个数目，在现在敌后战场是很大的，在战后也将是很大的。剩下的男女老幼，才是提倡巩固其家庭。在内战时的兴国县，有些家庭，剩下来待我们巩固的，竟至占人口的少数。只要有一个大的时局变动，例如打下北平之类，我们居住的这个现在很少变动的边区农村家庭人口，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

没有社会活动（战争、工厂、减租、变工队等），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裹挟李来成家的改造，正是在社会群众运动的大浪潮中才获得。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

此外，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內），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內）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以上，请给艾、陆、余<sup>[6]</sup>三同志一阅。如有意见，请告知。

敬礼！

毛泽东

八月三十一日

又,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秦邦宪(1907—1946),江苏无锡人,又名博古。1925年入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任全国总工会宣传干事,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1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临时中央局成员、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积极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3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又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中共最高领导职务。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野战部队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中央代表,协助周恩来参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93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部长,南方局组织部部长。1941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46年2月以中共代表身份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和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会议。同年4月8日由重庆返延安汇报请示工作途中,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遇难。译有《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卡尔·马克思》等。当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

[2]指原题为《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的《解放日报》社论草稿。

[3]指解放日报社。

[4]指1944年8月25日《解放日报》就山西襄垣李来成建立新式家庭一事发表的社论,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

[5]变工队,是陕甘宁边区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农业劳动互助组织。“变工”即换工,是农民相互间调剂劳动力的方法,有人工换人工、畜工换畜工、人工换畜工等等。参加变工队的农民,各以自己的劳动力或畜力,轮流地给本队各家耕种,结算时,多出了人工或畜工的由少出的补给工钱。

[6]艾,指艾思奇,当时任解放日报社副刊部部长。参见本书第233页注[1]。

陆,指陆定一,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参见本书第337页注[1]。

余,指余光生(1906—1978),浙江镇海人,当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

## 【赏析】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根据地的经济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支持战争,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基本方针,号召根据地的人民积极组织起



来,开展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活动,一面打击敌人,一面实行生产。根据地人民的热情高涨,纷纷组成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或互助组、变工队,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自救活动。这样,必然对中国古老的以自给自足的个体经济为特征的生产组织及社会组织——家庭带来新的冲击。为了引导人民群众正确处理各种群众运动与家庭的关系问题,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就家庭改造问题给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秦邦宪写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一文提出了修改意见,着重谈了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社会活动的关系问题。信中说,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得很少,而问题的重点,恰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毛泽东指出,“巩固家庭”的口号只有和革命运动联系起来,才是革命的口号,我们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革命的需要。在谈到家庭与社会活动的关系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没有社会活动,家庭是不可能改造的。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的改造,只能经过群众运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毛泽东最后指出,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

家庭问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科学问题。毛泽东将“家庭的改造”与群众的社会革命运动联系在一起,是对“个性解放与社会解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他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提出一条家庭改造之路,正确回答了边区革命和建设进程中的家庭改造与革命运动的关系问题,预见了中国将来的家庭发展方向,这在当时不仅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此信结构严谨,层次分明,论据充分,说理透彻,结论的产生水到渠成。在语言运用上,此信单、复句交叉运用,关联词语使用恰到好处,显得思路清晰而又严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娴熟的语言技巧。

## “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

——致郭沫若<sup>[1]</sup>(1944年11月21日)

沫若兄:

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sup>[2]</sup>,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sup>[3]</sup>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sup>[4]</sup>,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吧,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谨祝

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号尚武。1914年赴日本留学,后入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18年开始新诗创作。五四时期,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1921年出版诗集《女神》,并与郁达夫、成仿吾等组织创造社。1923年回国到上海,创办《创造》季刊。1924年后,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倡导革命文学,1926年应聘任广东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前夕,写出《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同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划时期著作,并著有《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等。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抗战爆发回国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战工作,先后任《救亡日报》社社长、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其间创作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解放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抗战胜利后，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从事民主活动。1949年8月当选为全国文联主席。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曾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是第一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九、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病逝。另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奴隶制时代》等，并有《沫若文集》、《郭沫若全集》行世。

〔2〕《甲申三百年祭》，是郭沫若1944年3月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著名史论著作。文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入失败的过程。

〔3〕太平军，是洪秀全等建立的农民革命武装，1851年1月在广西金田村举行起义，先后转战桂、湘、鄂、赣、皖、苏、浙等十余省，有力地打击了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但是，太平军在占领的地方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领导集团又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犯了许多错误。因此，它不能抵抗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的联合进攻，于1864年遭到失败。此后它的余部又继续奋战了两年多。

〔4〕《反正前后》，是郭沫若1929年写的反映自己1910年至1911年生活经历的作品，1929年8月由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反正”，指辛亥革命。

## 【赏析】

在已经看到抗日战争胜利曙光的形势下，毛泽东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和8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作了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他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这里所说的郭沫若的文章就是指《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在此文中论证了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他的一些首领因为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使这次起义在1645年最终失败的历史事实，并根据确凿史实，分析了明朝灭亡的社会原因，把明思宗的统治与当时农民起义的主将李自成的兴衰作了对照叙述和客观评价。这篇文章先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后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不久，《解放日报》又发表了苏联科尔内楚克的剧本《前线》。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总政治部发出联合通知，指出，这两篇文章都是反对骄傲的，这两篇作品，对我们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与学习的态度，万万不可被胜利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和戈尔洛夫的覆辙。中央要求各地将两书翻印，在干部中散发，展开讨论。8月下旬，周恩来托人给郭沫若捎去延安出版的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和史剧《屈原》的单行本。郭沫若收到著本以后，非常激动，当即致函毛泽东、周恩来，感谢他们的鼓励和鞭策。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给郭沫若写了这封信。

此信直呼“沫若兄”，读来亲切，平易近人。对于郭沫若来信中的褒奖之词，毛泽东没有接受。“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一句，表达了毛泽东的谦虚态度。接着告诉郭沫若，中国共产党已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整风文件。从这当中不难看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的注意和鉴戒。对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不唯有李自成起义，更有太平天国起义，他们都是在胜利时忘乎所以，腐化堕落，因此沦为失败。李自成起义与太平军起义，其失败如出一辙，如再写出太平军经验教训一书，当然意义更大，因此，毛泽东委婉含蓄地作了一个非“正式提议”。“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一句，进一步表达了毛泽东光明磊落，乐于自我批评、乐于接受别人监督的优秀品质。最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他的史剧和史论，并希望多多创作，继续努力。

此信语言质朴、流畅，生动感人，议理深刻。“成天在工作堆里”、“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几乎一模一样”、“生怕出岔子”、“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等语言，读来明白如话而又生动形象，思虑至深，启人至远，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勤政为民、严以律己的优良作风。

沫若兄：

大示讀出。獎第過分，於不適當，但當  
努力學習，以副故人期望。武考以後，我  
在環球裏，漸得事蹟而機會，故對於滿  
成就，覺得羨慕。我的中學同學，我們也常作  
盤風，對於你。卜膳平厲，大膳之居傲，  
一次又一次的虧，以及此種毛病，實在注  
得注意。你雖然過大半篇，太平平臨  
會是很有益的，但不就正式病流，過於太  
累你。最近看了反亞細亞，和我那時在倫敦  
所歷的，幾乎模一樣。不成功的變態，命  
命。那樣的結局是不可以迴避的。此等病  
應該是成型的罪，國際條件是很好的，所以

靠我們努力。我們希望蒙先生指出分子，但  
說不出分子是什麼地方，能舉例，請到了什麼時候  
缺乏，希望隨時示知。你的出版史對廣大  
中國人民，知識分子，不嫌太多，精神太  
白費的，希望繼續努力。恩惠則後，  
此間近時常已獲悉，茲不一一。所  
大家都和作見面，不知有此機會否？  
謹祝 健康愉快與精神煥發！

王澤東上

一九四九年十月  
廿一日 於長安。



## “很想和你见面”

——致沈雁冰<sup>[1]</sup> (1944年11月21日)

雁冰兄：

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回想在延时，畅谈时间不多，未能多获教益，时以为憾。很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

敬祝

健康！

毛泽东 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刊印

### 【注释】

[1] 沈雁冰(1896—1981)，浙江桐乡人，原名德鸿，字雁冰。1916年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1920年任《小说月报》主编，并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提倡写实主义文学。同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员。1923年兼任上海大学教授。后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长。1925年应毛泽东之邀，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政治周报》副总编辑。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回上海任国民党特别市部主任委员。同年10月到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民国日报》主编。大革命失败后从事文学创作，成为职业作家。1928年赴日本后，脱离中国共产党。1930年回国。参加左联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疆学院文学院院长、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政治部文工会常委，并曾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1948年到东北解放区。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建国后，任文化部部长，第三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并长期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1981年病危之际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其党籍。同年3月27日在北京病逝。著有《蚀》、《虹》、《子夜》等大量文学作品及论著，并有《茅盾文集》、《茅盾全集》行世。

### 【赏析】

1940年，沈雁冰在党组织帮助下，从新疆千里跋涉到达延安，在鲁迅文艺学院从事讲学工作，其间他积极参加群众文艺活动，并与毛泽东多次晤谈。同年11月在党的安排下，他离延安赴重庆，到郭沫若领导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以后，由于工作需要和形势所

迫，辗转香港、桂林等地，于1942年底重返重庆。在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沈雁冰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个性，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影响下，确立了“深入社会，面向民众”的创作原则，他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积极反映时代斗争，作品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较大提高。长期的奔波和过度的劳累也使得他瘦弱多病，身体欠佳。旧友生病，使毛泽东十分挂念，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写信给他，表示问候。

信首称“雁冰兄”，落款称“毛泽东上”，亲切之中饱含敬重。“别去忽又好几年了”，可惜相见有限，可惜相别太久，数字不多，皆是思情。“听说近来多病，不知好一些否？”人在千里之外，一寒一病俱上心头，足见牵挂之切，读来让人心暖肠热。下文抚今追昔，渴望重晤之情溢于言表。“未能多获教益”，则于敬重之情中表现出自己的谦逊。通观全信，语言质朴简约而意深情浓。

古人云：“人之相交，贵在交心。”毛泽东对朋友、战友就是这样敞开心扉，肝胆相照。毛泽东与沈雁冰的这种真诚友谊，不仅表达了一种朋友之情，更是我党和革命知识分子之间亲密团结的写照，是党领导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文化战线上团结斗争的缩影。

朋友：

别去思又对我年了，想说近多病，  
不知好一些否？回也，在延医，杨送  
间不多，未能多叙，教益，时以为憾。  
很在和你见面，不知有能会否？  
敬祝 健康！

王泽东 上 一九四〇年  
十月十一日

##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

——致陈毅<sup>[1]</sup> (1944年12月1日)

陈毅同志：

来示<sup>[2]</sup>读悉，启示极多，十分感谢！

今日已电渝不交复案<sup>[3]</sup>，周、董<sup>[4]</sup>均回，拖一时期，再议下着。至于基本方针，如你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

白区劳绩必须承认，你说得非常之对。还有“南北”问题，南方党问题，久想讲，那天临时忘了，恐怕还有别的<sup>[5]</sup>。七大讲一次，似有必要。一切不公平之事，必须使之归于公平，以利团结对敌。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

自从你及聂<sup>[6]</sup>公开后，伯承<sup>[7]</sup>即无秘密之必要。昨日党校的会，请他未到，是未正式告他可以公开之故。请你先告他，我亦当告他。

下游干部配备请和彭真<sup>[8]</sup>一商。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

你的思想一通百通，无挂无碍，从此到处是坦途了。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每一个根据地及他处只要有几十个领导骨干打通了这个关节，一切问题就可迎刃而解。整个党在政治上现在是日见成熟了，看各地电报就可以明了。

敬礼！

毛泽东

十二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 陈毅(1901—1972)，四川乐至人。字仲弘。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因参加中国留法学生爱国运动，被强迫遣送回国。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任北京学生总会党团书记、中国国民党市党部中共代表。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参加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后与朱德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十二师师长、军委书记，前委书记，红六军、红三军政委，红二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赣西特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苏区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领导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新

四军军长,山东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参与组织和指挥淮海战役。建国后,任华东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和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1月在北京逝世。遗作编为《陈毅诗词选集》、《陈毅诗稿》。当时任新四军代理军长,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2]1944年11月21日,蒋介石在拒绝赫尔利同毛泽东11月10日在延安签署的《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后,提出另一协定草案,主要内容是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允许中共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去做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草拟了一个复案,毛泽东将此复案批送中央负责人和陈毅等阅看,征求意见。陈毅在看了复案和研究了有关材料后,于12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信中分析了国共谈判的两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认为蒋介石不会走真正同共产党合作这条路,而是要照他提出的协定办,因此建议中央暂不交复案,拖一段时间,等待蒋介石集团力量的削弱,同时在此期间发展自己的力量,从而“取得全局的中心地位”。

[3]复案,指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蒋介石1944年11月21日提出的国共之间的协定草案的答复。

[4]周,指周恩来。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周恩来、董必武在收到毛泽东1944年12月1日关于暂不交复案,“请周、董同时回延”的电报后,于12月7日回到延安。

[5]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中,特意补充讲了南方、北方问题,大后方党的问题和白区工作问题。

[6]聂,指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湖北省委军委书记。曾参加北伐。1927年在南昌起义期间,任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起义军第十一军党代表。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32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并兼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1935年作为红军主要领导人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师长和政委、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领导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华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1949年北平(今北京)解放后,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建国后,任北京市市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代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9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并先后兼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家科委主任、国防科委主任。1975年后,连续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受聘为中国老龄问题全国委员会名誉主任、中国发明协会名誉会长

等。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一中全会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著有《聂荣臻回忆录》等。1992年5月14日逝世。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7]伯承，即刘伯承，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这时在延安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参见本书第146页注[1]。

[8]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参见本书第489页注[1]。

## 【赏析】

1944年10月中旬，新四军政委饶漱石利用整风之机施展阴谋诡计，策动了对陈毅的政治攻击。他污蔑陈毅“一贯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对政治委员制度”，借以独揽新四军大权。对这种栽赃陷害，陈毅义愤填膺。此事惊动了中共中央。11月上旬，毛泽东电示陈毅望其速赴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陈毅见电忧喜参半。能够参加七大，诚属可喜，但在突遭袭击之时匆匆离去，颇感苍凉。临行赋诗一首曰：“明朝策骏马，萧瑟唯此心。”可见其心情之复杂。陈毅抵延安后，毛泽东多次与之约谈、通函，明确肯定陈毅是执行中央路线的，希望他凡事忍耐，顾全大局，同时指出了陈毅的某些毛病，期盼他遇事多观已过。经过毛泽东的耐心开导，陈毅心头云雾散尽，填词赋怀，“自我琢磨几多愁，恰似佛家捧偈正当头。”大有茅塞顿开、如释重负之感。12月1日，陈毅致函毛泽东，畅谈心得体会，检讨自己“处理许多问题，疏虞之处甚多”，谅解别人的批评“事出有因”。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即于当日复函劝勉陈毅。

“白区劳绩”一段表现出毛泽东实事求是、处事力求公平的态度，展现了他光明磊落的坦荡襟怀。“你的思想一通百通”一段，洋溢喜悦之情，流露出他对同志进步的欢欣鼓舞之情。

此信自始至终流露出毛泽东对陈毅同志的无比信任。“如你所说那样，除此再无二道”、“你说得非常之对”、“有所见时，请随时告我”、“你的意见我以为是好的”、“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等语言贯穿全篇，无一句不感人，无一处不服人。特别是对于蒙受不白之冤的陈毅同志来说，这些肺腑之言，起到了缓和气氛，化解疑问，鼓足干劲，稳定局势的绝好效果。信尾，“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没有什么行不通的”之劝异，寓批评于安慰之中，足以促使陈毅幡然醒悟，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弱点。通篇多用短句，循循善诱，显得真挚、亲切、语重心长。



## “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

——致邓宝珊<sup>[1]</sup>（1944年12月22日）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太，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sup>[2]</sup>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健康！

毛泽东 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 邓宝珊，参见本书第250页注[1]。

[2] 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 【赏析】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基本上采取避战、观战态度。他们一方面希望依靠英、美、苏的力量取得抗战胜利，一方面仍在企图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1943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借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反共气焰相当嚣张。1943年秋天，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邓宝珊应邀参加会议。由于受共产党的影响，邓宝珊会前与毛泽东会面，彻夜长谈。毛泽东对时局高瞻远瞩的分析，更加坚定了邓宝珊团结抗日的信念。但在重庆开会期间，邓宝珊受到蒋介石的蛊惑、利诱，思想感情以及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会后，邓宝珊途经延安，毛泽东特别指示，对邓宝珊继续采取大力争取的方针，并亲自接见了邓宝珊。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宝珊尽力抗战，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立下了功勋。一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日趋灭亡，抗战胜利的曙光指日可见。为了帮助邓宝珊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2日给邓宝珊写

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热情歌颂了邓宝珊在抗战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和英勇壮举,对他以实际行动联共抗日的言行表示肯定。然后,指出了这次写信的缘起:“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1944年苏联红军攻占柏林。美英两国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在亚洲,日军为支援其在南洋的孤军,急需打通到越南的陆路交通线,为此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百万大军连连溃败,而共产党利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不断壮大和逐渐走向胜利的大好形势,指挥军队英勇作战,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明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信中,毛泽东由衷地写道:“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并鼓励邓宝珊继续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影响下,邓宝珊不断抵制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后来他不负众望,积极协助傅作义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功举行了绥远起义,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賓冊先生空見左右： 壬午年  
局轉換先生空見左右： 壬午年  
記。六十年抗戰先生空見左右： 壬午年  
墨痕不盡，為德之大，至不敢忘。壬午  
勝叙，壬午年，抗戰局立得很快，整個  
國際國內形勢都以變了。許多  
要說的話，均已說盡，無事誠面告。從  
今有人民的希望，繼續能戰勝外寇，復興  
中國，在此一舉無他路。大果要對八年

祝我作二周軍總結之幾句話，  
 靜立心為似較通商，未知  
 先生為然否？何時獲有暇和  
 機會，不勝企望之至。  
 敬祝健康！  
 二月二十一日  
 毛岸東上

## “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

——致萧三<sup>[1]</sup> (1945年2月22日)

萧三同志：

你的《第一步》<sup>[2]</sup>，写得很好。你的态度，大不同于初到延安那几年了，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当然，从前你的文章也是好的，但是现在更好了，我读这些文章，很得益处。

为着使延安文艺工作同志们多参加群众性的集会，须关照高岗、贾拓夫、谭政、罗迈、李富春、彭真<sup>[3]</sup>几位同志，遇有这类会议不要忘记组织文艺同志们去参加。此事请你访他们去谈谈，我有机会也将告诉他们。今年全边区性的大会少开，但地方性的，延市、延安县和延属分区的，必有许多，同县、市、分区的负责同志及宣传部讲通此事，也很必要，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 萧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参见本书第255页注[1]。

[2] 指萧三在1945年2月20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文章《第一步——从参加边区参议会及劳模大会归来》。

[3] 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参见本书第276页注[3]。

贾拓夫（1912—1967），陕西神木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书长。

谭政，当时任八路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见本书第246页注[2]。

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参见本书第78页注[8]。

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见本书第78页注[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参见本书第489页注[1]。

### 【赏析】

萧三到延安后，担任鲁迅艺术学院翻译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常委等职，从事新诗创作和翻译工作。1945年2月，毛泽东看了萧三采写的自传文章《第一步》后，深感满意，并给他写了这封信。

此信开门见山,首先肯定了萧三的文章《第一步》“写得很好”,而且与初到延安时已大相径庭,赞扬萧三的创作态度已有了很大改变。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好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萧三的《第一步》正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导下写成的,所以,毛泽东称赞“文章诚实,恳切,生动有力”。

信的下半部分,毛泽东建议,组织延安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参加群众性集会。由于真理的召唤,许多知识分子抛弃优厚的生活条件,毅然冲破重重封锁,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毛泽东是极其重视的。他认为,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如果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则一事无成。既然文艺工作者服务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所以就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转变自己的立场,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艺。为此,毛泽东大声疾呼,知识分子一定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相结合。毛泽东重言教,更重身教。他虽然工作繁忙,但仍然不忘让党员干部带头参加群众活动,并多多组织文艺同志去参加,因为革命需要知识分子。

从信中,足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以及对党员干部发挥表率作用的要求。信的末尾,毛泽东用“可否也请你去谈一下”短短一句,以商量口气,读来亲切、感人。





## “深望先生引为同调”

——致柳亚子<sup>[1]</sup> (1945年10月4日)

亚子先生吾兄道席：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柳夫人<sup>[2]</sup>清恙有起色否？处此严重情况，只有亲属能理解其痛苦，因而引起自己的痛苦，自非“气短”之说所可解释。时局方面，承询各项，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报上云云，大都不足置信。前曾奉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吾辈多从曲折（即困难）二字着想，庶几反映了现实，免至失望时发生许多苦恼。而困难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此点深望先生引为同调。有些可谈的，容后面告，此处不复一一。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sup>[3]</sup>，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

兴居安吉！

毛泽东

十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 【注释】

[1] 柳亚子(1887—1958)，江苏吴江人。原名慰高，又名人权、弃疾，字安如，一字亚庐。1903年入上海爱国学社读书，结识章炳麟、邹容等。爱国学社解散后转入自治学社。1906年改入上海理化速成科学堂，学习化学，毕业前即任教于健行公学，加入同盟会，并负责主编《复报》第一至第十一期。1909年冬与陈去病、高天梅创办南社，被举为主任，主张以文学鼓吹民族革命。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总统府秘书。旋托病至上海，任《天铎报》、《民声报》、《太平洋报》主笔，曾著文反对南北议和。自1913年起致力于新剧运动，出版《春航集》和《子美集》。1923年与邵力子、陈望道等发起新南社，自任社长，提倡新文学和社会革命。次年国民党改组，他以同盟会会员资格加入。1925年任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次年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因遭孙传芳通缉，改名“唐隐芝”，匿居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通缉，逃亡日本。1928年返国，进行反蒋活动。抗日战争期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从事抗日民主活动，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抗战结束，在香港继续进行民主革命活动。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席，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常务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所作诗词,反对旧统治,歌颂新社会,具有民主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著作有《磨剑室诗集·词集·文集》,有《柳亚子诗词选》行世,并辑有《苏曼殊全集》、《孙竹丹烈士遗集》等。

〔2〕柳夫人,即郑佩宜(1888—1962),江苏吴江人。当时正患盲肠炎,在重庆市立医院作手术治疗。

〔3〕陆游(1125—1210),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陈亮(1143—1194),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思想家、文学家。

## 【赏析】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毛泽东飞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雾都山城如睹朗日,群情激昂。柳亚子闻听更是感奋异常。8月30日,毛泽东会见了柳亚子。柳亚子被毛泽东的大智大勇深深折服了。晤后,他即兴作诗一首,称毛泽东以“弥天大勇”,亲临虎穴龙潭,尽为“霖雨苍生”。此后,二人兴晤频有,书信时往。10月2日,毛泽东在八路军办事处又约柳亚子晤谈,对时局、对谈判、对中国的未来,作了高瞻远瞩的分析。毛泽东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深深打动了柳亚子先生,使柳亚子如沐春风,喜不自胜。归后赋诗二首转递毛泽东。信中写道:“心上温馨生感激,归来絮语告山妻”,“得坐风发霁月中,铃铎躁释百忧空”,“与君一席肺腑语,胜我十年萤雪功”。10月4日,毛泽东写了这封信。

复信首先提及柳亚子的诗和信,并对柳亚子在信中和诗中所表现出来的殷切之意表示感激。对于柳亚子信中询问的关于时局的问题,毛泽东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先从询问家事入手,笔锋婉转自然,亲切感人。通过对家庭的关切,架起了彼此理解、沟通的桥梁。接着,毛泽东针对柳亚子提到的多项问题作了解答。自从9月27日恢复谈判以来,国共两党就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及召开政治会议的具体问题进行商谈。由于中共处于主动、有理、有利的地位,使得未作认真准备的国民党处于政治上的被动地位,所以,谈判进展缓慢。如信中所言:“目前均未至具体解决时期”。毛泽东还劝告柳亚子不要听信国民党的报章宣传,要认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

对国民党反动派“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毛泽东早有预料。中共坚定地相信: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只有依靠自己手里的力量,行动指导上的正确,党内兄弟一样的团结和对人民有良好的关系,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抗战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解放区空前壮大。军队由开始时的4万多人发展到100多万人,民兵发展到220多万人,解放区人口扩大到一亿多。中共七大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中共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日益提高。由于抗战的胜利,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也空前提,全国性的民主运动更进一步蓬勃发展。这说明,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已略具备,诚如毛泽东在信中所言:“前途是光明的”。但是,另一方面,取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美帝国主义,一心想把中国变为它独霸的殖民地,千方百计扶植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支持他们疯狂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在中国重建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毛泽东对此深有警觉,他深刻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提醒人们提高警惕,保持清醒头脑,不要对敌抱有任何幻想,要“针锋相对,

寸土必争”。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道路是曲折的。”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柳亚子的诗，“慨当以慷”，敢比陆游、陈亮，让读者“感发兴起”。

此信内涵丰富，逻辑缜密，极富有诗情和哲理。它从询问家事入手，进而言国是，起笔亲切自然，由此及彼，由小到大。“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一语，睿智启人，既从战略上傲视敌人，对前途抱定自信，又在战术上充分估量前进路途上的艰难险阻，乐观而不自盲从，忧患而不消沉，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光辉，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力挽乾坤的卓识远见。

通篇在结构上显得浑然一体，信前以评诗起兴，信尾以论诗作结，使此信前后一致，首尾一贯，开阖自如。

處事辦慶重軍團集八十第

王先見道序  
 清反大示涌上，深感動之。其  
 海人倦之意。柳夫人清主  
 有起色。其子要出處重情。況祇有  
 親屬能理解。其痛苦。因而起  
 自己之痛苦。自水氣經之。說所  
 不解。其方面，承詢。

處事辦慶重軍團集八十第

目前，为要其能解决问题。前  
 言云，大都不要直信。前言云  
 告二语：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  
 曲折的。事业多是曲折的。周  
 恩二言着相，虑虑反映了现实。  
 气至其理，脂若水许多苦惱。周  
 国雄之克服，决不是那么容易的。



處事辦慶重軍團集八十第

事情。此正深望先生引為調。  
有夢溪的。客後面告此。象不  
復一。先生詩。慨當以  
燥。年。初。陸。游。詩。亮。  
之。使人。威。強。興。起。可。惜。  
枯。淡。不。能。做。但是。萬。千。

處事辦慶重軍團集八十第

清兵中多矣。我  
 兵身沒先生。我  
 家丁。敬頌  
 興居安吉！  
 王月系  
 月  
 月

九二九六號掛單 五四〇六號 號三十號者和雅長

## “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結果”

——致洪禹<sup>〔1〕</sup>（1946年3月12日）

洪禹同志：

一月二十五日给我的信，很久就收到，很对你不起，到今天才复你，这是由于我几个月来都在病中的原故，请你原谅。在详细看了你的信以后，我感觉应当同意你的意见<sup>〔2〕</sup>。在关于你本人的具体问题上，当然这是你一方面的声音，而别方面的我还未听到；但是我觉得你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确是我们的党组织值得注意与必须注意的。因为今天离你发信的日子已有一个半月，在这期间内不知道你的问题已获解决否？如果尚未，请你去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当面商量解决，我已把你给我的信付给安子文同志看去了。在你的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请你告知我是如何解决的，我愿意知道这事的結果。总之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致以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三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 【注释】

〔1〕洪禹，1918年生，福建南安人，当时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在延安审干期间，曾受到错误的审查，为此向毛泽东写了申诉信，在毛泽东过问后问题得到了解决。

〔2〕洪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在抢救运动中，被毫无根据地怀疑为国民党特务，抢救运动后，又长期不作结论，不予甄别平反。他说，这种作法无论对党对个人都是极为不利的，这只能伤害无辜，制造混乱，绝不可能帮助党组织弄清问题。希望党中央关照各级党组织密切注意，千万不要因为革命节节走向胜利，就以为多一个人少一个人算不了什么，因而可以对受审查的人任意处置，或者置之不理。党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十分细密的关于人心的组织工作，任意对待受审查的人，后果不仅仅是一两个受到粗暴对待的人的问题，它是关系到人心向背，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赏析】

从1943年4月3日起，中共中央在整顿党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了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但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7月15日，当时的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

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掀起了“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洪禹就是受到错误审查者之一。数年过去了，而冤假错案迟迟未纠正，为此，他向毛泽东写了一封申诉信。毛泽东收到信后，于1943年3月12日写了这封回信。

此信称“洪禹同志”，这就表明了毛泽东对洪禹的信任。由于毛泽东连续几个月生病，所以迟复，对此，毛泽东请洪禹原谅。然后，毛泽东谈了自己的观点，“在详细看了你的信以后，我感觉应当同意你的意见”。“详细”一词，说明毛泽东对信的重视，洪禹所提意见，的确是党组织值得注意与必须注意的。这就虚心接受了洪禹的意见，并主动作了自我批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特别关心问题解决的结果。“如果尚未，请你去找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同志当面商量解决”，并要求在问题得到解决时，告他是如何解决的。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冤假错案的重视以及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

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所以在开展“审干”工作中，没有正确估价敌情，出现了“抢救运动”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没有强调客观原因，而是从主观上找原因，“我感觉对你及许多同志很负疚，因为我们工作中做得不好的事实在太多了”。这就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善于自我批评、知错必纠的思想作风以及襟怀坦荡、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

## “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

——致刘伯承、邓小平等(1946年8月22日)

刘邓<sup>[1]</sup>，并告各首长：

(一)刘邓马成电悉。庆祝你们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sup>[2]</sup>。(二)望集中主力至少十八个团于路北休整，补充新兵，以利再战。(三)大战方开始，你们必须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一切补充休整应以此为目标。(四)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望以此教育干部，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此观念在许多干部中是存在的)。

军委

未养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刊印

### 【注释】

[1]刘，邓是指刘伯承和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指晋冀鲁豫野战军1946年8月10日至22日进行的陇海路战役。此役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五师一个半旅和第六十八师一部。

### 【赏析】

在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面前，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怎样才能在战争中打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集团？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必须回答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毛泽东坚定地指出：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即在前头；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在战争面前，如果软弱和退让，不敢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中国就将变成黑暗世界，中华民族的前途就会被断送。为了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与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针对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对解放区发动的猖狂进攻，雄辩地提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增强了解放区军民打败国民党军的信心和决心，从战略高度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猖狂进攻表示出极度的蔑视。

毛泽东尽管在战略上蔑视敌人,但在具体的战斗或战役中却表现得极为慎重。1946年8月9日,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占领陇海路徐(州)、汴(开封)段和路南十余县,配合苏皖我军作战,吸引围追中原我军之敌增援陇海路。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第六、第七纵队,乘敌之虚,于8月10日夜通过敌防御间隙,突然向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沿线之敌发起攻击,逼近开封。蒋介石急忙从围追中原的国民党军队中抽调三个整编师回援。晋冀鲁豫野战军于8月13日越过陇海路南下,先后攻克杞县、通许、虞城等地。8月22日,一举歼灭蒋军整编五十师的一八一旅、二十九旅的一个团和部分保安团队共计一万六千人,控制铁路三百八十里,打乱了国民党的南线进攻计划,取得了陇海战役的巨大胜利。

陇海战役刚刚胜利,蒋介石迅速抽调兵力,集中十四个整编师三十二个旅共计三十万人,企图在我军陇海战役后尚未得到休整、部队处于疲惫状态之际,向我军展开钳形攻势,以优势兵力,分东西两路,从徐州、郑州牵制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于陇海路以北的定陶、曹县,逼我军主力与其决战,企图将我军一举消耗歼灭。蒋介石还炸开黄河花园口,企图水淹、分割解放区,控制鲁西南。然后,以主力进出彰河,占领邯郸,打通平汉路安阳至石家庄段,以实现其占领邯郸的冀冀美梦。1946年8月22日,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这份电报。

古往今来,无数军事家在指挥作战之前,总是把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和周密、科学的作战计划放在战略或战役部署第一位。在两军交锋之前,充分做好战争的各种准备工作,这正是夺取战争胜利的关键性因素。《左传·隐公五年》:“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意思是说,不做好充分准备,就不能出师。临阵磨枪,有光不利。这条古训告诫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两军交战,不能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而应该遵循先胜后战,打则必胜的原则。孙子特别重视和强调战前的准备,他把战前的思想动员、心理准备,人力物力筹备和作战方案的谋划,看成是获得战争胜利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孙子兵法·形篇》:“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这里提到的“先胜”,是军事谋略的一般原则,意思是说,要首先创造取胜的各种条件。《虎铃经》:“先定必胜之术而后举。”战争实践证明,“先胜后战”谋略的关键,就在于通过充分发挥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能动性,首先造成不被敌人战胜的各种条件,在作战准备上“先胜于敌”,以确保在有利条件下取胜。这一谋略思想对于指导战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不仅注重吸取古代兵家“先胜后战”的备战思想;而且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审时战争,部署战争。他把“先胜”的内涵,扩大为政治、军事、外交、自然等诸多因素,强调战前全面做好准备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先胜”就是“优势”,也就是“把握”,没有“先胜”的思想,就会丧失“优势”和“把握”。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是在敌强我弱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个客观存在的现实,迫使战争指导者必须十分慎重,不可轻战,不可浪战,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毛泽东继承发展中国古代关于“谋定后动”、“慎以行师”、“有备无患”、“先胜后战”的思想精华,并及时地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在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他强调,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与准备阶段中各项任务完成的程度是密切联系的。他在批评红军不重视作战准备的观点时说: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于被动地位。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把这种思想明确地概括为



“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的军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第一，作战行动事先必须有严密的计划，也就是一切军事行动要有尽可能充分的预先准备工作。诸如情况的了解，任务的确定，兵力的部署，军政教育的实施，给养的筹措，装备的补充，以及民众条件的配合等。第二，必须预计到最困难最复杂的种种情况，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解放战争之初，解放军已经拥有数量较多、战斗力较强的正规兵团，而且有了巩固而广阔的解放区战场。所以，毛泽东突出了以大兵团在更大区域内的大踏步进退的作战方式，以及实行较大范围的迂回包围、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的战法。这时，运动战和诱敌深入的内容再也不是“敌进我退”的简单较量，而是确立了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作战目标，哪里有敌人就到哪里去，哪里能够歼灭敌人就到哪里去。因此，在指导思想上，毛泽东指出：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不论什么地方，只要能大量歼敌，不必考虑距离之远近。在作战准备上，要力求打有准备、有把握之仗。在作战保障上，要善于休整部队，以战养战。在用兵部署上，要以数倍于敌军的兵力，确保在战斗战役上的绝对优势兵力。在兵力运用和作战效果上，要注意集中兵力，胜于易胜，不可平均用力，普遍求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做好战争取胜的各种准备。从解放战争的实践可以看出，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常以劣势之军战胜优势之敌，并逐步积小胜为大胜，化劣势为优势，直至夺取全国最后胜利，都是与我军高度重视战前准备有直接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军之一切胜利，都得益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有准备”和“有把握”的谋略策划。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大战方开始，你们必须准备在三四个月内打七八个大仗，一切补充休整应以此为目标”，“凡无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则必胜；凡与顽正规军作战，每战必须以优势兵力加于敌人，其比例最好是四比一（四千人打一千人，四万人打一万人），至少是三比一，歼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三部，各个击破之”。“克服战役上及战斗上平均用力、普遍求胜之轻敌观念”。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先胜后战，战则必胜的军事谋略思想。正是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诱敌整编第三师于定陶以西韩集地区，尔后视情再歼整编四十七师一部或大部，最后以一部兵力牵制徐州方向之敌，集中四个纵队的主力，对由郑州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三师实行攻击，在局部造成了四倍于敌的绝对优势。按照这样的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于9月3日午夜发起攻击，激战至9月6日下午，全歼整编第三师。随后，又迅速转移兵力，歼灭整编四十七师两个旅，共计歼灭蒋军一万七千人，取得了定陶战役的胜利。

## “照所定方针去做”

——致习仲勋<sup>[1]</sup>（1946年9月2日）

仲勋同志：

来信收到。即照所定方针去做。作战时，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如来信所说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得手后看形势，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再歼敌一个团；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此外，须准备三千人左右补充作战部队的消耗，请早为准备。最好先期交付各旅训练，临时可迅速补充。

毛泽东

九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习仲勋（1913—2002），陕西富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参加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关中军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建国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78年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联防军司令部政治委员。

### 【赏析】

1946年，国内的政治局势正处于密云不雨的状态之中，虽然一月间签订的停战协定仍在继续执行，但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依仗军事上的优势，悍然于6月发动全面内战。

面对这严峻的形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保持清醒的头脑，采取坚定的立场，抱定必胜的信心。同年八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

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明确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面对强敌,在战略上是藐视的,但在战术上却是十分重视的。他和党中央经过全面分析研究,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他指出,为着粉碎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这是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在军事上,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毛泽东认为,一切马克思主义者要想领导被压迫人民推翻反动统治,就必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善于斗争,善于取胜。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提出破强敌而取胜的法则,那就是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这一克敌制胜的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他指出:“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如果我们在全体上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因而不敢推翻他们,不敢胜利,我们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不采取谨慎态度,不讲究斗争艺术,不集中全力作战,不注意争取一切应当争取的同盟者……我们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因此,毛泽东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务求全歼敌人。毛泽东的这一军事思想,也具体地体现在这封信中。

此信首先指示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联防司令部政委习仲勋同志,“照所定方针去做”,同意习仲勋在信中所说的“集中六至七个团歼敌一个团”的做法。在战术上要求习仲勋,作战时必须注意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歼敌一部。敌人来势凶猛,力求速胜,我军则应避敌主力,击其弱小之敌。斗争的方法和组织形式必须充分考虑以我军实际情况为依据,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如我损伤不大,又有好打之敌时,可接着打第二仗”,“如不好打,则撤回休整,待机再打”。由此可见,打与不打,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必须做到“不打无把握之仗”。

此信虽短,却字字句句折射出毛泽东作为伟大军事家、战略家的智慧和风采。在此后不久的《三个月总结》中,毛泽东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过去三个月歼敌25个旅时所采用的惟一正确的作战方法,“不论在战役上、战术上,都必须如此。不论是高级指挥员,或中下级干部,都须学会此种作战方法”。毛泽东的这一光辉论断,正是指引人民军队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 “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

——致陆定一<sup>〔1〕</sup>（1946年9月27日）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sup>〔2〕</sup>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撰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方不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 【注释】

〔1〕陆定一 1906—1996，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共青团区委书记、团中央委员、团中央宣传部长、少共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少共国际代表。后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解放日报》总编辑。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教委员会副主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9年被中共中央正式平反。后当选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

书记,第十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1996年5月9日在北京逝世。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2]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见本书第536页注[1]。

光生,即余光生。当时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参见本书第303页注[6]。

## 【赏析】

1946年上半年,在美国的支持下,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调兵遣将,加紧对全面内战的部署。他把精锐部队迅速抢运到华北、东北,控制了全国最富饶的沪、宁、平、津等各大城市。对此,中共中央宣传部结合实际,着力揭露美蒋的阴谋和凶恶,旨在让人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1946年7月至10月间,国民党的军队大举进攻华东、晋冀鲁豫、晋绥、东北以及海南岛等解放区,占领了解放区的153座城市,全面内战爆发了。为了指导中共中央宣传机关的宣传活动,鼓舞士气,毛泽东于9月27日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写了这封信。

内战既已全面爆发,宣传工作就要紧紧围绕战胜敌人这一中心任务,鼓舞军队士气,灭敌之威风。而此时的宣传部门仍然在宣传敌军如何凶狂,这显然是落后于形势发展的。所以,此信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指出:“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时,再宣传美蒋的“凶”,就会使人害怕,灭我威风,泄我士气。所以信中说:“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毛泽东正确分析了时局,指出:“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在这种形势下,宣传要服从于战争全局,服务于战争全局,指出敌人是纸老虎,树立军民必胜的信心。所以在信中毛泽东要求,文章与新闻言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200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能使我军必胜,蒋军必败。这里所说的“种种条件”就是指:党中央、毛泽东为战胜强敌,在政治上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中间派,孤立反动派;在军事上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为了说明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毛泽东指示:“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以鼓舞士气,“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以说明问题,理顺情绪,以利再战,收复失地。

此信观点鲜明,立场坚定,充分说明了“士气可鼓而不可泄”的军事道理。

## “海谕勤勤，感且不尽”

——致符定一<sup>〔1〕</sup>（1946年9月30日）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仪，又获手示，海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sup>〔2〕</sup>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 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符定一（1877—1958），字宇澄，湖南衡山人，文字学家。辛亥革命后，他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任校长时，毛泽东在那里读过书。1946年夏他应毛泽东的邀请到过延安。建国后，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2〕德芳，符定一之女。

### 【赏析】

毛泽东给符定一的这封短信，缘于一段难忘之情。1912年符定一在湖南长沙省立第一中学任教，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从此，两人相识，后来成为忘年交。1918年符定一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定居于北京。同年，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曾受到过符定一的热情资助。1925年，符定一从北京回湘，在亲戚李某家里，看到一份赵恒惕欲逮捕毛泽东的密电，符定一全力说服警方，打通关节，竭力保毛泽东脱险。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乡办教育。几十年的曲折经历，使他产生了紧随共产党参加革命的想法。1946年6月，符定一重上北平，会见了中共代表叶剑英，从此，他自觉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反蒋地下斗争。1946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定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欣然携女前往，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9月，符定一告别延安返回北平。其女符德芳留在延安作短暂停留后，也由延安返回北平。符德芳女士临行前，毛泽东托她给符定一捎了些礼物并附上了这封信。



全信仅 60 余字,但字字珠玉。此信称:“字澄先生夫子道席”,落款为“受业毛泽东”,表达了毛泽东的敬重之情。正文分三层意思:一、“诲谕勤勤,感且不尽”;二、“托致微物,尚祈哂纳”;三、“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三层意思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符先生的尊敬和关怀。

此信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精雕细刻。毛泽东素来注重语言的运用,根据人的不同身份和不同文化层次,选用不同的语言,面对农民大众,他主张要认真学习运用群众语言,尽量使语言生动、朴实、通俗易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而对于象符定一这样的文字学家,他则很注重文字的提炼。此信采用四字文言短句,读来脍炙人口,既庄重严谨,又简洁明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深厚的文字功底。符定一读后,深受感动,从延安回到北平后,思想上更进一步,立场更加坚定,他经常向教育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为党工作更加积极主动。

守滋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儀又蒙平示誨諭  
 勤之感自不盡述  
 毛致洵物而社西內世局  
 多故主希老國自珍  
 南此致頌  
 敬安不具  
 業天序  
 九月十日

## “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致朱德、刘少奇<sup>〔1〕</sup>（1947年6月14日）

朱刘：

各电均收，处置很对。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我们身体均好，我比在延安时好得多了。我们自四月中旬移至大理河上游，安静地过了差不多两个月。本月九日至十一日，刘戡<sup>〔2〕</sup>四个旅到我们驻地及附近王家湾卧牛城青阳岔等处游行一次，除民众略受损失外，无损失。现刘军已向延安保安之间回窜，其目的全在骚扰。总结边区三个月战争，第一个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起即已步入正轨，党政军民坚定地向敌人作斗争。敌人内部互相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见下降，对前途悲观。我们则信心甚高，士气甚壮。彭习<sup>〔3〕</sup>率野战军上月底到陇东，因青马<sup>〔4〕</sup>八二师颇顽强，打合水未得手，但歼灭骑二旅一个团及宁马<sup>〔5〕</sup>八一师一个团于曲子附近。目前正攻环县八一师主力，拟先打开西面包围线，然后向关中进击。陈谢纵队<sup>〔6〕</sup>本月休整，决于七月一日西调，协同边区兵团<sup>〔7〕</sup>开辟西北局面。东北方面进展极快，不到一个月歼敌六个师（旅）以上，收复三十余城，增加五百万人口，目前正攻四平。山东自歼七四师后局面已稳定，现正计划新的攻势作战。刘邓<sup>〔8〕</sup>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并新组四个纵队，今后该区将有八个纵队作战。就全局看，本月当为全面反攻开始月份。你们在今后六个月内如能（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做好这三件事，就是很大成绩。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刘少奇（1898—1969），湖南宁乡人。原名刘渭璜，曾用名胡服、赵之启、陶尚行等。1920年在长沙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入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回国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不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委员、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在河北、上海、东北等地从事秘密工作，曾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等职。1930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执行局委员，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1931年秋回国，任中共中央职工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冬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

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历任红军第八军团、第五军团中央代表和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春,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正确执行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日战争初期,领导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38年底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开创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兼华中军分会书记。1939年和1941年先后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论党内斗争》的演讲,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1943年回到延安,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同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曾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47年春,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转移到华北,和朱德一起负责中共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7月,在河北平山县主持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进一步推动了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在1959年和1965年的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曾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六届四中全会和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开封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

〔2〕刘戡,当时任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

〔3〕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见本书第291页注〔1〕。

习,指习仲勋。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参见本书第335页注〔1〕。

〔4〕指青海军阀马步芳部。

〔5〕指宁夏军阀马鸿逵部。

〔6〕陈赓纵队,指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

陈赓(1903—1961),湖南湘乡人。原名庶康。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区队长。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参加南昌起义,任营长。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1930年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曾任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步兵学校校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任军委干部团团长。后任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大岳军区司令员、太岳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二野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建国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61年3月16日在上海病逝。

谢富治(1909—197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二团政委、三八五旅政委、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和代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委、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7月与陈赓率领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九纵和三十八军组成的陈谢兵团挺进豫陕鄂,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后任第二野战军三兵团政委。建国后,任川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公安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2年3月在北京逝世。1980年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并撤销悼词。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确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

〔7〕指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之一。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陕甘宁和晋绥两解放区的八路军。1947年3月组成。由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领导,约2万余人。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和陕北进行重点进攻,企图驱逐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出西北。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西北野战军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由彭德怀等指挥进行运动战。经过半年时间,连续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沙家店等战役的胜利,扭转了战局,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9月、10月间,胜利地进行了黄龙战役和延清战役,并取得第二次围攻榆林的胜利。1948年2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取得宜川、陕中等战役的胜利。4月22日,收复延安。11月,西北野战军成为人民解放军五支大的野战部队之一,有五个纵队7万人。1949年2月,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第一兵团、第二兵团。4月,由华北野战军转隶来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7月至12月,进行扶郿、兰州、宁夏等战役,并进军新疆,解放了西北全境。同时以一部分兵力配合第二野战军进行了大西南战役。1950年,向西藏进军,和平解放西藏。

〔8〕指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之一。原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八路军。1945年冬,整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立即向解放区发动武装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5年9月至11月,先后取得平绥路、上党、邯郸三个战役的胜利,促进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签订。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取得定陶、鄄城、晋南、豫北等战役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1947年6月30日起,刘邓大军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7月,取得鲁西南战役的胜利。同时,与陈赓、谢富治太岳兵团及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歼灭和吸引了大量敌人,恢复和扩大了中原解放区。1948年5月,建立中原军区,刘伯承为军区司令员,陈毅、李先念为副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邓子恢为副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改名为中原野战军。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同华东野战军一起取得了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1949年2月,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和一个特种兵纵队。1949年4月,同第三野战军协同发起渡江战役,突破国民党千里长江防线,解放了皖、赣、浙、闽

广大地区。1949年11月至1950年4月,在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的协同下,进行大西南战役,消灭国民党军70余万人,解放了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诸省。随后,一部分向西藏进军,促使西藏和平解放。

## 【赏析】

国民党军队全面进攻受挫后,被迫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在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取守势,对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进行了重点进攻。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1947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到达清涧县枣林沟后举行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进入晋察冀解放区负责党中央委托的工作。陕北人民军队只有敌军的十分之一,处于劣势。国民党重点进攻陕北,党中央处在危险处境中,这使朱德、刘少奇非常牵挂,为此,朱德、刘少奇经常用文电询问总部情况。此信是毛泽东的回复。

此信首先对朱、刘的工作表示满意,并对刘少奇身体状况表示关心。然后,毛泽东通报了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的情况,又用概括性的语言,对边区三个月来的战争作了总结:“第一个月地方工作有些混乱。第二个月起即已步入正轨”。在分析敌我力量、士气等形势的基础上,毛泽东当机立断,作出了“大举进攻,经略中原”的伟大战略,不等完全粉碎敌人的战略进攻,不等解放军在数量上占优势,就立即转入全国性反攻,把战争引向国统区。在中央部署下,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即以刘邓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为东路,挺进苏鲁皖地区,形成三军配合“品”字形犄角之势。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为实现这一伟大战略,党中央要求陈谢纵队本月休整,于7月1日西调,协同边区兵团开辟西北局面,刘邓大军本月休整,准备月底出击。为适应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新形势,解放区必须更加普遍地深入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使正在胜利发展的解放战争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支持。所以,毛泽东希望朱、刘“在今后六个月内”做好三件事:“(一)将晋冀察军事问题解决好;(二)将土地会议开好;(三)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此信从对朱、刘工作的肯定入手,以对朱、刘工作的指示作结,充分显示了毛泽东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审时度势、英明果断的军事谋略和驾驭全局的统御艺术。

战争需要人民的支持。要把群众真正动员起来,就必须关心群众所需。所以,在信中,他特别指示要将土地会议开好。正是我党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才使亿万农民得到翻身解放,才真正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

通篇在语言运用上,虽平铺直叙,但不乏感情色彩。毛泽东把刘邓四个旅的骚扰和军事进攻,说成是“游行”、“回窜”,表达了对敌人的蔑视;描写敌人内部的纷争用“埋怨日见增多”、“士气日见下降”等话,写革命队伍则用“信心甚高,士气甚壮”等话。信中多处运用对比描写,让读者很容易看出事物在时间、空间上的变化,读后一目了然。



## “你要看历史小说”

——致毛岸英<sup>[1]</sup> (1947年9月12日)

岸英儿：

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sup>[2]</sup>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sup>[3]</sup>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

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参见本书第257页注[1]。

[2]永寿，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参见本书第257页注[1]。

[3]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参见本书第293页注[1]。

### 【赏析】

1946年1月，毛岸英从苏联学习回国，组织上安排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作为党的领袖，作为父亲，毛泽东考虑的是让儿子进一步得到锻炼。他曾对岸英说，你在苏联大学毕业了，但还应当上“中国”这个大学，到农村去拜农民为师。他还派毛岸英到延安的模范村吴家枣园去学习劳动，与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从事农业生产。

1946年下半年，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毛泽东留在陕北，毛岸英随中央工作委员会东渡黄河，去山西兴城（晋西北）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后又到临县、山东阳信县等地参加土改工作。其间，毛岸英经常写信给父亲汇报自己的工作情况。而毛泽东正集中精力指挥大军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他针对蒋介石部重兵于西、东两翼，中间战线守备空虚的战略弱点，采取“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策略，实现中间突破，展开中原逐鹿。同时，指挥西北野战军，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桥、沙家店等大捷，粉碎了敌人对陕甘宁地区的重点进攻。这时，毛泽东从捷报频传的战事中沉静下来，他想起了岸英从晋西北、平山寄来的信件以及岸青从国外来的信，于是数信并复，写了这封信。

此信篇幅不长，内涵丰富。想起儿子的进步，再加上战略反攻已经开始，革命胜利在望，怎能不让毛泽东欣慰呢！“甚为喜慰”一句，极能表达这种心情。同时，毛泽东也想到了远在海外的岸英。毛泽东特别叮嘱毛岸英“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毛泽东一生酷爱文学，尤其喜爱钻研中国古典小说，他对明清小说《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尤其爱读，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悟出新的道理，指导革命斗争，解决现实问题。正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理清古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毛泽东于戎马倥偬中仍能想起教子读史，原因大概如此吧！信的最后，毛泽东用“我们这里打了胜仗”作结，乍看似乎是无关紧要之笔，但细读之，却耐人寻味。儿子的进步，使他“喜慰”，但对于战役的一连串胜利，他却未露一个“喜”字，只是说“打得敌人很怕我们”。这一方面是告诉岸英，人民正在走向胜利；另一方面又暗示着虽然前途光明，但道路是曲折的。

通篇在语言运用上，可谓声情并茂。岸英的进步让他啧啧称赞。

## “只要有热情,有恒心”

——致毛岸英<sup>[1]</sup>(1947年10月8日)

岸英:

告诉你,永寿<sup>[2]</sup>回来了,到了哈尔滨。要进中学学中文,我已同意。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你现在怎么样?工作,还是学习?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你给李讷<sup>[3]</sup>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身体好。我和江青都好。我比上次写信时更好些。这里气候已颇凉,要穿棉衣了。再谈。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十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刊印

### 【注释】

[1]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参见本书第257页注(1)。

[2]永寿,即毛岸青,毛泽东的次子。参见本书第257页注(1)。

[3]李讷,1940年生,毛泽东之女,江青所生。曾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

### 【赏析】

毛泽东对长子毛岸英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教子做事,先教做人。为此,他要求儿子脚踏实地、吃苦耐劳,把远大的理想与最基本的工作联系起来,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这封信里,他语重心长地对岸英说:“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作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这句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崇高品德和革命情操,这对于毛岸英来说,无疑是一种激励,一种告诫。无怪乎毛岸英把它作为座右铭,抄录在日记本和此后的好几本笔记本的扉页上,时时激励自己,以不辜负父亲对自己的期望。

此信篇幅较短,但内涵丰富。信的第一层意思,表达了对永寿(毛岸青)归来的喜悦。“这个孩子很久不见,很想看见他”,道出了岁月的沧桑巨变以及对毛岸青的无比挂念之情。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毛泽东就与不满四岁的毛岸青分手了。1930年杨开慧牺牲后,毛岸青流浪辗转各地。1930年冬,毛岸青连同毛岸英、毛岸龙由外祖母向振熙、舅妈李崇德照料着奔赴上海。不久,由于地下党组织受到破坏,兄弟三人无依无靠,过了一段

流浪生活，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1936年经法国赴苏联学习，后考入东方大学。1927年父子分手，到1947年，岁月已整整过去20个年头，此时的毛岸青已长大成人，而毛泽东投身革命事业，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就连见一面的愿望都未再实现。想到这些，毛泽东的感情是复杂的。此时，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想尽快看见岸青，也许只有如此，才能了却父亲心头的思念，抚平岸青心灵的孤寂。信的第二层意思，主要是对毛岸英的关心。青年往往热情有余，而恒心不足，爱慕虚荣，不切合实际。毛泽东针对青年容易犯的毛病，指出，有热情，有恒心，还要有务实的精神，这是进步的重要因素。信的第三层意思写了家事。江青与毛泽东1939年结婚，1940年生了李讷。对于这个小女儿的降生，毛泽东是十分欢喜的。写此信时，李讷七岁，已经会写信、画画了。为使全家团结和睦，他要求岸英给李讷写信，以此尽当哥哥的义务。信的最后一层意思写得委婉含蓄。塞北十月，秋去冬来，寒暑易节，该是穿棉衣的时候了。岸英那里如何呢？毛泽东没有直言。“要穿棉衣了”一句，既是对节令的估计，同时也是对毛岸英的提醒，平淡中表现了一种深沉博大的父爱！

此信语言颇似口语，显得朴素真切，自然流畅，读来生动感人。

## “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

——致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等(1948年3月2日)

彭张赵,并告贺习,向前,陈唐,陈谢,刘邓,中工委<sup>〔1〕</sup>:

东戌冬卯两电悉。(一)庆祝你们歼灭九十师、二十七师之巨大胜利。(二)同意以一四两纵取中部<sup>〔2〕</sup>、宜君,相机取同官<sup>〔3〕</sup>,以三六两纵在攻克宜君后取洛川、富县、甘泉,控制甘泉至同官公路机动地带,二纵取澄城、白水,并准备协同一、四纵作战。各部在上述任务完成后,休整半月至一个月,消化俘虏,发动群众。此次休整两个半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sup>〔4〕</sup>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sup>〔5〕</sup>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目前数日整顿队势,如粮食有办法,以寅齐前后出动为宜;如粮食困难,则提早出动。(三)大胜之后干部极易发生骄傲,望谆谆告诫,以利逐步扩大胜利。(四)建议俘虏随军尾进就粮,俘官将校后送,尉级就地向西南两线各城释放,扩大敌军失败情绪。

军委

寅冬

根据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刊印

### 【注释】

〔1〕彭张赵,是指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和赵寿山。贺习,指贺龙、习仲勋,当时分别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向前,即陈向前,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陈唐,指陈士榘、唐亮,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陈谢,指陈赓、谢富治,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前委书记和副书记。刘邓,指刘伯承、邓小平,当时分别任晋冀鲁豫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2〕中部,旧县名,即今陕西黄陵。

〔3〕同官,旧县名,即今陕西铜川。

〔4〕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参见本书第173页注〔3〕。

〔5〕诉苦,指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诉苦和三查是1947年11月到1948年夏人民解放军进行新式整军运动所用的主要方法。

### 【赏析】

毛泽东在指挥三路大军外线出击、挺进中原的同时,又命令彭德怀率领西北野战军发动了内线进攻。西北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经过艰苦奋战,已经由

原来的六个旅二万五千人,增加到五个纵队十六个旅七万五千人,敌大我小的比例由原来的十比一变为五比一。而且收复了大部失地,并与晋西南解放区连成一片,牢牢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

西北敌军虽然还有三十九个旅二十三万多人,但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且先后调出三个整编师救援豫西。整个陕北敌军被迫采取守势,主力部署于延安以南,洛川、黄陵、宜君、宜川地区,企图确保延安,阻止我军前进,实行“机动防御”。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以主力向延安和宜川线出击,建立渭北根据地的指示,制定了南下作战计划,并决定以“围城打援”的战术,发起宜川战役。彭德怀亲自到宜川一带察看地形,他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以宜川为突破口,调动敌人,创造战机。1948年2月24日,西北野战军第二、六纵队包围宜川,以主力隐蔽在宜川通向洛川的公路两侧瓦子街周围地区。2月26日,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率四个旅,由洛川等地出发,沿着洛(川)宜(川)公路驰援。2月27日,进至瓦子街以南高地,被我设伏的九个旅团团围住。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顶风冒雨,不畏疲劳,冲锋陷阵。经过两个昼夜的激战,于3月1日全歼敌人。生俘敌人一万八千人,毙伤敌人五千人;敌整编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刘勘和整编第九十师中将师长严明柏被击毙,粉碎了胡宗南阻止我军南下的企图。3月3日,又攻克宜川,全歼守敌二十四旅五千人。这样,宜川战役四天共歼敌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约三万人,在西北战场上取得空前胜利。特别是胡宗南主力刘勘部队的全军覆没,使西北和中原战场的敌军官兵胆战心惊。毛泽东得知这一喜讯,于3月2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这份给彭德怀、张宗逊和赵寿山的电报。

这份电报体现了毛泽东杀敌以怒,以士励士的谋略。战争中的人,是构成战斗力因素中最活跃、最根本、最能动的因素,也是具有感情和重大可塑性的因素。人的士气、力量、感情、心理,往往影响着战斗力的强弱。所以,古今中外的军事家无不把战争中人的教育和塑造,作为提高战斗力的重要手段。俗话说,火由心中起,勇从怒边生。战争中,合理地运用士卒的感情,激发士卒的怒气,增强杀敌的勇气,往往能够凝聚人心,激励斗志,对战争胜利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战争实践证明,军队之所以英勇作战,靠的是高昂的士气。因为部队的士气,是军队的生命和灵魂,没有了士气,部队也就形同僵尸,名存实亡。杀敌以怒谋略,就是指运用和调动士卒心理的激将励卒谋略。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非常注重激发将士的士气。他针对部队不断扩大,兵员不断补充,人员思想复杂等种种影响部队战斗力的问题,从严治军,赏罚分明,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部队将士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始终保持了高昂的革命斗志和勇敢的战斗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毛泽东都以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宣传发动和文艺演出等形式,教育官兵,激励斗志,使官兵牢记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意识到,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客观形势,要求人民解放军必须提高军事艺术,在必胜的战争中勇猛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敌人。但在革命的队伍里,还存在着若干与革命形势发展不相适应的不良倾向。因为战争在发展,部队在扩大,长期经受战争锻炼的指战员,随着战争的深入消耗很多,大批新人涌入部队,部队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组织上的不纯。加上连续作战,使一些战士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认识不足,厌倦了艰苦的战争生活,不愿意到前线作战,尤其惧怕到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有



的战士对土地改革认识不足,漠不关心。因为胜利,有的官兵滋长了官僚主义、军阀主义,不尊重地方政府,不关心士兵生活,导致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不融洽。这些问题,是革命胜利的大敌。毛泽东在继承和发展古代兵家杀敌以怒、忿而后战谋略的基础上,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将士进行“诉苦”和“三查”教育。他于1947年9月28日亲自修改并批转了辽东第三纵队诉苦教育的经验报告,号召各战略区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先后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目的在于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正确认识并积极支持土地改革,增强内外团结,提高人民军队的战斗力,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色,使每个将士懂得为谁打仗、为谁当兵的道理,从根本上提高阶级觉悟,坚定阶级立场,培育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惜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其中,诉苦教育是人民解放军多年来政治思想教育的一种有效形式。许多军队结合土改,开展诉苦教育,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提高了革命的自觉性。“三查”教育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其中,查斗志的目的,就是为了克服惧怕敌人,惧怕困难的悲观情绪,培养勇敢作战,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战斗精神。用诉苦和“三查”方法整训部队,成效显著,人民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说: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困难,群威群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指出:“此次休整两个半月,部队战斗力如此提高,以致一举歼灭胡宗南两个主力师(四个旅),证明用诉苦及‘三查’方法整训部队,发扬政治、经济、军事各项民主,收效极为宏大,故宜注意两个战役之间的必要整训。”《太白阴经二·励士篇》中指出:“激人之心,励人之气,发号施令,使人乐闻,兴师动众,使人乐战,交兵接刃,使人乐死,其在以战励战,以士励士。”宜川大捷的事实说明:正是由于经过新式整军运动,西北野战军全体指战员,才顶风冒雨,冲锋陷阵,粉碎了胡宗南阻止我军南下的企图,使胡宗南的机动兵力大部被歼,从而瓦解了国民党军在西北的防御体系。

## “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

——致刘少奇<sup>[1]</sup>（1948年3月6日）

少奇同志：

（一）丑巧电<sup>[2]</sup>早悉。所提各点甚好，已收纳于中央关于老区半老区工作指示中。惟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一点，似应了解为凡政策之正确与否及正确之程度，均待经验去考证；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作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其所以未能明确分清界限，是由于领导者自己对于所要做的事缺乏充分经验（自己没有执行过某种政策的充分经验），或者对于他人的经验不重视，或者由于不应有的疏忽以致未能分清政策的界限。其次，是由于领导者虽然知道划分政策的界限，但只作了简单的说明，没有作系统的说明。根据经验，任何政策，如果只作简单的说明，而不作系统的说明，即不能动员党与群众，从事正确的实践。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们过去有许多工作，既未能公开地（此点很重要，即是在报纸上发表，使广大人们知道）明确地分清界限，又未能作系统的说明，不能专责备各中央局，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最近三个多月，我们即就各项政策，努力研究，展开说明，以补此项缺失。但各中央局在这方面自然有他们自己的责任。又其次，是政策本身就错了。此点许多下级党部擅自决定其自以为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政策，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例如很多地方的乱打乱杀，就是如此。但是各中央局，自己在某些政策上犯了错误的也不少。例如晋绥分局，对于在订成分上侵犯中农，对于征收毁灭性的工商业税，对于抛弃开明绅士，都是自己犯了错误的。但是这类“左”倾错误犯得比较严重的似乎还不是晋绥而是华北华东华中各区（从日本投降后开始，投降前也有），晋绥的严重程度似乎还在第二位。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又其次，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即是上下联系不够，未能迅速了解运动的情况，迅速纠正下面的错误。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同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一次。（二）划分阶级草案<sup>[3]</sup>写出后，感觉一月决定草案<sup>[4]</sup>上所写的东西不够了，现正以一月草案中间一大段为基础重写一个决定，准备尽速公开发表。一月草案的首尾两段则写社论发表。因为中央发了新区土改要点，我给粟裕的那个电报<sup>[5]</sup>没有发出的必要了，因此决定不发而将其中某些部分写入社论中公开发表为有利。（三）粟裕部队要三月十五日以前才能在阳谷全部集中完毕，你们及饶陈康邓<sup>[6]</sup>似可在三月二十日左右去阳谷，你们可有充分时间讨论全部政策问题（以划阶级一书为中心），华北局组织问题及其他问题。

毛泽东

三月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刘少奇,参见本书第342页注[1]。

[2]指刘少奇1948年2月18日致毛泽东的电报。他在电报中表示,希望能迅速得到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文件,并说:“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地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之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在电报中,他还对老区土地改革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

[3]指《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的草案。这个草案曾于1948年2月16日发给党的高级领导机关进行讨论,规定不下达。

[4]指中共中央1948年1月18日原则通过的《中央一月决定》草案。这个草案的主要内容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

[5]指毛泽东1948年1月就新区土改问题准备发给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电报。

粟裕(1907—1984),湖南会同人,字裕人。1924年考入湖南男子第二师范。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任红十二军支队长、红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红一军团教导师政委、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1934年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1935年2月任红军挺进师师长,率部挺进浙江。后任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组织部部长,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副指挥、苏北指挥部副指挥、第一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和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建国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和第一政委。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和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八至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1984年2月5日在北京病逝。

[6]饶,指饶漱石。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治委员。参见本书第427页注[1]。

陈,指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参见本书第313页注[1]。

康,指康生(1898—1975),山东胶县(今胶南)人。原名张宗可,字少卿,曾用名赵容等。早年在上海大学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江苏省委

组织部部长和秘书长。1930年任中共中央审查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7月赴苏联,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之一。曾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1937年冬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延安整风运动期间,任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以“抢救失足者”为名,制造了许多冤案。抗战胜利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山东军区政委、山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三和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十届中央副主席。曾与江青等勾结在一起,陷害了大批各级领导干部。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980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其党籍,销其悼词。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副书记。

邓,指邓子恢。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参见本书第416页注〔2〕。

## 【赏析】

为了制定具体行动纲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1948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经验,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同时提出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以蒋、宋、孔、陈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新的基本经济政策。会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解决新形势下党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这个规定在总体上满足了广大农民首先是贫雇农的土地要求。但在执行《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各地发生了一些“左”的偏向,侵犯了一部分中农利益,如把他们的成分错定为富农或地方办事不要中农参加,摊派给中农的公粮负担过重;也侵犯了一部分民族工商业者的利益,如没收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对工商业征税过高;另外,对地主和贫农、地主中的大中小和恶霸不加区别,用同样方式进行斗争,或者将地主“扫地出门”,不给生活出路,有些地方甚至发生对地主乱打乱杀等现象。如果不及时纠正这些“左”的偏向,于革命极为不利。对此,毛泽东严肃地告诫全党: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他强调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为了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倾偏向,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必须避免对中农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地主富农的工商业,一般应当保护,对地主富农应当有区别,在平分土地的原则下对待大中小地主中的

恶霸,非恶霸也应有所区别;必须严禁发生乱打乱杀现象。中共中央还重新发布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两个文件,即《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1948年2月18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希望得到中央有关土地问题的文件,并说:“缺少这些文件,就不能在一般情况下避免错误及走弯路。虽然有了这些文件,也还是要犯些错误的,在我们党内主要的也还是靠党员干部的亲身体验,才能把路完全走正,但有了正确的文件后,就能避免走许多弯路”。来电还对老区的土地改革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毛泽东复电后,于3月6日作了批复。

信中说明了政策与经验的关系。“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这体现了毛泽东一贯的哲学思想,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因为党只有制定了正确的政策,才能使群众行有方向,干有目标。这又进一步说明了政策的正确与否,对于实践成败的重要性。接着信中又认真分析了土改中出现错误的原因:一是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二是领导者虽然划分政策界限,但只作了简单说明,没有作系统说明;三是政策本身就错了;四是领导方法上有错误。为纠正错误,毛泽东请刘少奇向参加中央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同年的3月7日,即毛泽东复刘少奇电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给晋绥分局发出《关于党的政策必须适时地向群众公开》的指示,指出:“任何政策的决定或改变,任何政策中正确部分或错误部分必须适时地不但向干部而且向群众公开指出,这样方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拥护而成为力量”。这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群众,坚持真理,不怕犯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宽阔胸怀。

纵观全篇,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

第一,结构严谨,说理透彻,观点鲜明,论据充分。全信围绕“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这个观点,重点分析了未能明确政策的原因。其间,像“主要的”、“其次”、“又其次”等过渡词的运用,承上启下,层层推进,显示了极强的逻辑力量。信中多次举例论证,使得说理透彻,说服力强。

第二,叙论结合,情理结合。此信说理部分多用议论式的方式展开,而举例论证时,往往用叙述的口吻进行。此外,此信在议论之中,多夹杂一些自省的词句,如“以上两种情况,各中央局与中央均应分担责任”、“我自己即深感这种责任”、“是否如此,请你们加以检讨”、“上述各点,请你向参加中工委会议的各同志正式提出,并展开讨论”等句,或自责,或期望,或指示,或建议,权责明确,且颇具感情色彩,使理因情而深化,情因理而升华。

第三,此信在语言运用上,显得严谨庄重,沉着雄健,语气恳切严肃,但又毫无责怪之意。



(1949 年的毛泽东)

## 肝胆相照篇



## “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

——致李济深、沈钧儒<sup>[1]</sup> (1948年5月1日)

任潮、衡山两先生：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向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sup>[2]</sup>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释】

[1] 李济深，当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参见本书第186页注[1]。

沈钧儒，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参见本书第179页注[1]。

[2] 潘汉年，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在香港领导对敌隐蔽斗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负责人。参见本书第181页注[4]。

### 【赏析】

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

加强了对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国统区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党的地下组织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保持着密切关系,团结了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民主党派,明确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1948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号召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事宜。5月1日,毛泽东给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沈钧儒写了这封辞谨义深的信。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同黄炎培谈论过“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当时,毛泽东面对黄炎培的耿耿诤言,自信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为了实现民主治国的理想,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前夕,就酝酿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实行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新生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在信中,毛泽东写到,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民主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为了充分征求他们的意见,毛泽东还将三党联合声明的草案附上,请求指教,广泛听取他们的意见。

语调高昂,感情充沛,言词谦逊,亲切感人,是此信的突出特点。信的称谓直呼“任溯,衡山西先生”,显得亲切、敬重。接着,直截了当地叙写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背景、名称、任务、参加人员、时间、地点及有关提议,显得周到细致、简洁明快。信尾,毛泽东接连使用“予以指教”、“统祈赐示”等语,言词谦逊,充分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广纳仁人志士,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合作协商的真挚诚意。

## “不能说毛泽东主义”

——致吴玉章<sup>[1]</sup> (1948年8月15日)

吴玉章同志：

未元电<sup>[2]</sup>悉。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

未删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释】

[1] 吴玉章（1878—1966），四川荣县人。原名永珊，号树人。1903年到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选为评议部评议员，曾负责主持《四川》杂志。1911年回国。武昌起义前夕，领导荣县起义，并建立荣县革命政权。1912年应孙中山之邀，到南京临时政府秘书处工作。1915年与蔡元培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22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3年曾与杨闇公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同年10月赴莫斯科学习。后任东方大学中国部主任。1938年回国后，任陕甘宁边区宪政促进会会长、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1945年12月随周恩来到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华北大学校长。建国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并兼任中国教育工会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66年12月12日在北京病逝。著有《辛亥革命》等。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2] 指1948年8月13日吴玉章给周恩来的电报。在电报中，吴玉章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说：“这样说是否妥当，请同主席和少奇同志商量后，赐以指示”。

## 【赏析】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45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上通过的党章正式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而毛泽东是这一思想最杰出的代表。从很大程度上讲,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正是出于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敬仰,从40年代初,党内不少人士就提出将毛泽东思想改为毛泽东主义,将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称。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表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典礼上提出“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并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给吴玉章写了这封信。

此信开宗明义,指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毛泽东并不反对别人学习他的著作,他只是把自己的著作始终看作中国革命经验的范畴,是中国革命宝贵经验的一部分。在信中,他说:“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毛泽东严肃地指出:“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

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他却常常谦虚地说:“我那几本小书有那么大的威力吗?”他一再教导大家,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他还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长期的革命斗争,造就了伟大的党和伟大的军队,也造就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心系群众,钻研马列,身先士卒,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吸取群众智慧,使我们党不断走向成熟。毛泽东思想正是革命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全党、全军、尤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主义仅两字之差,但毛泽东的伟大谦虚已卓然可见。

此信在语言运用上,显得冷静、谦逊、概括、凝练。语气硬朗、果断干脆,毫无辩驳的余地,充分表明了毛泽东那种谦虚谨慎、唯实求实的高尚情操。

## “有益于国计民生”

——致刘少奇<sup>〔1〕</sup>（1948年10月26日）

少奇同志：

此件<sup>〔2〕</sup>修改得很好。在第29页上，“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要达到这一点，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而这些私人资本虽然已经纳入这条轨道，他们总是想脱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毛泽东

十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释】

〔1〕刘少奇，参见本书第342页注〔1〕。

〔2〕指经中共中央修改过的张闻天1948年9月15日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一文。

### 【赏析】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在对解放较早的东北地区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了那里的经济成分，并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高度重视。9月间，毛泽东对这个提纲进行了五个方面的修改：①国营经济首先要适应这种组织性和计划性；②除开国家总的计划，必须特别重视地方性的国民经济计划；③使合作社成为普遍的社会制度；④在批判小资产阶级路线时，必须严格防止任何急性的“左”倾冒险主义；⑤必须有无产阶级明确而周密的经济政策，经济计划去组织指导经济建设。随后，刘少奇又对提纲作了精心修改。10月26日，毛泽东看完刘少奇的修改稿后，写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对刘少奇修改的稿子表示赞同，接着笔锋一转，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

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早在1948年9月份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在我们的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和城市私人经济在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的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正是因为“量”上的对比,中央提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这无疑是对的。但毛泽东不仅考虑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加以限制的“量”的因素,而且重视限制过程中的“质”的因素。正如他在信中所说:“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的限制”。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了该限制什么、不该限制什么、以及如何限制的问题:“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生’的轨道之上……必须经常和企图脱出这条轨道的私人资本作斗争”。正因为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私人资本总是想脱出这条轨道,走到“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反面,所以预言“限制的斗争将是经常不断的”。

此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在处理复杂经济问题上的科学、慎重的态度,以及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迫切愿望。

纵观全篇,语言平实严谨,语气沉稳,说理透彻,因果相依,推理自然。



##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

——致吴晗<sup>[1]</sup>(1948年11月24日)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sup>[2]</sup>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介绍乔木同志来见，乞加指教。他是我这里的秘书，兼管新华社工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吴晗(1909—1969)，历史学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浙江义乌人。曾在杭州之江大学预科、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学习。1930年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编成《胡应麟年谱》，为其第一部有关明史的著作。1931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立志研究明史。1934年毕业，先后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教授。1943年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满，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弊政的历史杂文。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在昆明与李公朴、闻一多等积极从事和领导民主运动。回到北平清华大学后，继续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民主运动。1948年奔赴解放区。建国后，历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第二、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全国青联秘书长、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后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在十年浩劫中，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10月在北京逝世。主要遗著有：《朱元璋传》、《海瑞骂皇帝》、《论海瑞》、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及与邓拓、廖沫沙一起撰写的《三家村札记》等。

[2]指吴晗所著《朱元璋传》一书。1948年11月吴晗到达河北平山，将此书的修改稿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后提出了一些意见。后来，吴晗在1965年版《朱元璋传》的自序中说，这些意见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启发”。

## 【赏析】

吴晗是一位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尤对明史的研究造诣颇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撰写的《朱元璋传》在史学界影响很大。1948年11月，作为民主同盟北平市临时委员会主任的吴晗，同其他许多民主党派领导人一样，奔赴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此时正值淮海、天津战役决战正酣之际，毛泽东于百忙之中接见了刚到西柏坡的吴晗等人。毛泽东问寒问暖，关心备至，并同他们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家前途。吴晗深受感动和鼓舞，当即表示了在中共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的愿望。临别前，吴晗郑重地将自己著的《朱元璋传》的修改稿送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反复阅读后，发现吴晗不仅在资料掌握上有些问题，而且在方法论上还没有完全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他抱着对作者负责的态度，11月24日写了这封信。

信中，毛泽东一分为二地对《朱元璋传》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因为此书稿是吴晗的修改稿，是用四年时间进行补充和修改过的，正如信中所说：“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这是好的方面，但有不足之处，毛泽东为此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并着重在观察历史的方法论问题上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观察历史的科学的方法论，而吴晗还没有很好地运用在书中，使得此书在观察历史的立场、观点、方法上，存在着很大局限，影响了此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此信情理交融，委婉而真挚。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待同志的尊重、热情和真诚的态度。

吴晗收到毛泽东的信后，反复阅读多遍，认为毛泽东的意见很重要，并诚恳地接受了意见。正是毛泽东的此信，使他后来认识到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就不可能推动历史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作出正确评价。因此，吴晗一边学习马列主义，一边修改《朱元璋传》，前后历经20年，反复作过三次修改。20年的历程，既是作者辛勤创作的过程，也是他在毛泽东的指导、帮助下世界观逐步改造、完善的过程。毛泽东此信，可谓影响了吴晗的后半生。

石伯先生：

每次接谈，甚快。大著刻畢，寄  
还。此书用力甚勤，据实甚广，给我  
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  
意见，可供参考，兼以留告。此外尚有一  
点，即在方法论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  
接受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历史  
的方法论。尚希先生在这方面  
加力用一番功夫，以求成就

不可限量。请致  
革命的精神！

王润东

介绍给本队来，四月廿四日  
向他指教。他是我这  
的秘书，兼管新报社工作。

## “谨请命驾北来”

——致陈嘉庚<sup>〔1〕</sup>（1949年1月20日）

嘉庚先生：

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需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及各界领袖共同商讨。先生南侨硕望，人望所归，谨请命驾北来，参加会议。肃电欢迎，并祈赐复。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陈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人。1890年秋随父去新加坡经商。此后长期侨居新加坡，经营橡胶种植等业，成为南洋著名的华侨资本家。1910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曾募捐资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时被闽侨推举为福建保安会会长。1913年开始，在集美、厦门等地，先后创办了集美中学，师范学校和航海、水产、商业学校等中等学校，并创办国学专门学校和水产商船专科学校、厦门大学等高等学校。1937年8月，任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南洋各地华侨爱国团体联合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被推选为主席。1940年3月，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劳抗战军民。5月去延安视察，返回重庆后，发表《西北之观感》，对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热情赞扬。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反共内战独裁政策，并创办《南侨日报》。1949年，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1961年8月12日病逝于北京。

### 【赏析】

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17岁远离故土福建，去新加坡谋生，30年后，成为南洋著名的工商企业家，但他依然牵挂着祖国的命运。七七事变后，国难当头，他领导南洋千万余华侨，慷慨解囊，支援祖国抗战。1940年，他率“南洋华侨回家慰问考察团”来到重庆。当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统治集团消极抗日、贪污腐化的

种种丑行之后,大失所望。经中共驻渝办事处介绍和毛泽东的邀请,陈嘉庚来到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接见了。延安简朴的陈设,不事铺张的晚餐,同志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让陈嘉庚感到意外地惊喜。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陈嘉庚还参观了陕北抗日根据地的机关、工厂、学校。在抗日根据地的所见所闻,使他感觉到了民族的希望。他欣慰地断言: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回到重庆,他感慨不已,认为中国的救星现在延安,他就是毛泽东。回到南洋后,他召开第二届南侨大会,宣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表达了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的信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4日,远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代表南洋华侨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共号召,否认蒋介石政权,并提出早日召开新政协会议,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为邀请陈嘉庚参加即将在北平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1月20日,毛泽东发出了这封函电。

函电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力量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的思想,也表达了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和各界领袖特别是对陈嘉庚的信任和欢迎之情。此信称“嘉庚先生”,以示对陈嘉庚的尊重和友好。信的正文简言介绍了国内政治、斗争形势。在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形势下,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完成中国人民独立解放事业的历史使命,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及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爱国人士肩上。陈嘉庚一向有政治远见和爱国义举,是南侨的优秀代表,为此,毛泽东“肃电欢迎”,邀请他“命驾北来”。

此信文字气势澎湃,热情洋溢,使人很受鼓舞。

陈嘉庚接信后,被毛泽东的信任和关心深深感动了,1949年6月,他飞抵北平,在以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慷慨发言。拥护民主联合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海外华侨的共同心声。



## “同德同心，再接再厉”

——致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sup>〔1〕</sup>

(1949年2月2日)

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彭泽民、章伯钧、李锡九、蔡廷锴、周建人、符定一、章乃器、李德全、胡愈之、沙千里、茅盾、朱学范、陈其尤、黄振声、朱蕴山、邓初民、翦伯赞、王绍鏊、吴晗、许广平、楚图南、丘哲、韩兆鹗、许宝驹、田汉、洪深、侯外庐、沈兹九、宦乡、杨刚、曹孟君、李文宜、罗叔章、刘清扬、张曼筠、施复亮、孙起孟、严信民、李民欣、梅龚彬、沈志远、周颖、安娥、吴茂荪、何惧、林一元、赖亚力、孔德沚、袁震、沈强、王蕴如诸先生共鉴：

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百余年来，前仆后继。无数先烈的鲜血，洒遍了锦绣山河；亿兆后起的人民，表现了英雄气概。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现在残敌尚存，诡谋时作。求喘息谓为求和平，待外援名曰待谈判。口诵八条<sup>〔2〕</sup>，手底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特电布复，敬表欢迎。

毛泽东

朱 德

二月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释】

〔1〕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是当时已到达解放区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艺术界、新闻界、社会科学界以及其他方面的有影响的爱国人士。他们在1949年2月1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等，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2〕指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

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当时南京当局口头上表示接受这八条作为谈判的基础。

## 【赏析】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结束三大战役,准备向长江以南进军,解放全中国。蒋介石迫于内部和外部压力,采取以退为进的阴谋手段,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声明,以求喘息之机,妄图凭借长江天堑作最后的挣扎,实现所谓“隔江而治”的美梦。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对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长的时间内,全面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同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毛泽东的这一声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到达解放区的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等人于1月22日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支持毛泽东的声明,纷纷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为推进革命,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并于2月1日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收到电文后,第二天就与朱德联名向他们复了这封信。

此信前后照应,首尾一贯。称谓将56位先生一一列出,仿佛牢不可破的民主统一战线钢铁长城,显示了共产党的伟大号召力。以“二月一日来电读悉,极感盛意”起笔,又以“特电布复,敬表欢迎”收笔,显得结构严谨,热情洋溢。

此信层次分明,内涵丰富。正文的第一层意思,抚今追昔,将人民解放战争视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百年解放斗争的延续和高潮。第二层意思,阐述了此次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原因。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在战争中,解放军广大指战员英勇地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各解放区人民也以无比巨大的热情,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给予前线以空前规模的支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革命群众也为战争胜利做出了贡献,从而使人民解放军得到八方支援,使敌人陷入孤立。第三层意思,讲明时局,“胜负之数,固以判明”,显示了人民必胜、反动派必亡的坚定信念。然而反动派不会自动灭亡,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随时与敌人作斗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大好形势下,依然保持清醒的头脑,及时戳穿美蒋反动派的和谈骗局,号召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心同德,再接再厉,将革命进行到底。第四层意思,高度评价了诸先生为民主事业的努力奋斗精神,以及为建设新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

此信句式多变,长短相兼,偶用排比,对偶,气势浩荡,铿锵有力。语言亦庄亦谐,生动形象,如描写国民党反动派的心态和神态,用“口诵八条,手庇战犯,眼望美国,脚向广州”四组短句,生动地刻画出国民党反动派的虚伪、阴险、摇尾乞怜的丑恶嘴脸,真是笔锋犀利,入木三分。

## “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致李宗仁<sup>〔1〕</sup>（1949年4月8日）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sup>〔2〕</sup>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sup>〔3〕</sup>。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sup>〔4〕</sup>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释】

〔1〕李宗仁，字德邻。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辞去国民党政府总统职务后任代总统。参见本书第186页注〔1〕。

〔2〕指李宗仁1949年4月7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李宗仁在电报中称：“自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心谋和”，“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在日益诡谲的世界风云下，“国共合作，尤为迫切”，“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

〔3〕指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1949年1月14日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

〔4〕张文白，即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参见本书第503页注〔1〕。

### 【赏析】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为形势所迫宣布下野，李宗仁副总统出任代总统。李宗仁迫于民意，于1949年1月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同意以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此后他两次派代表赴北平面见中共代表，希望签署和平协定，避免内战扩大。毛泽东对李宗仁的主张表示欢迎，并多次捎信希望他能北上签字。4月4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分析了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

面前的两条路：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必将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在这两条路面前，李宗仁是犹豫的。毛泽东多次捎信给李宗仁，保证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仍然任代总统，桂系部队也暂时不动，国共双方领导到北平商谈国家统一问题，只要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亲自出席。李宗仁终于被中共诚意所感动，同年4月7日，他致电毛泽东，表达“排除万难，决定谋和”的愿望。毛泽东复电后，于次日下午复了这份回电。

此电文强调以八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既然对方同意，就要依此付诸具体实现。对于战犯问题，毛泽东作了让步，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为标准，采取宽大政策，并表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了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裕康乐境地，国共双方应该早日达成和平协定。复电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非常愿意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达到上述目标而奋斗。

此信层次清晰，说理透彻，义正辞严，情理兼具。

毛泽东曾经主张，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依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发展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既不放弃革命的终极目标，也不拘泥于具体的枝节问题；既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又要灵活地变换自己的策略手段。对于战犯问题，既采取惩办政策，又准备采取宽大政策。这充分表达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努力早日结束战争，争取和平富强的勇气和胆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一贯坚持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斗争策略。

## “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致张澜<sup>[1]</sup>（1949年6月1日）

表方先生：

艳电<sup>②</sup>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先生及罗先生<sup>[3]</sup>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张澜(1872—1955)，四川南充人。辛亥革命前，为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后曾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皖南事变后，参加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任主席。抗日战争胜利后，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拒绝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副主席。1955年2月在北京病逝。

[2]指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1949年5月29日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

[3]指罗隆基(1898—1965)，字孑生。江西安福人。早年留学美国。1931年与张君勱等同组再生社，出版刊物《再生》，组织中国国家社会党。曾任清华、光华、南开、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新月》杂志主编，北京《晨报》社社长及天津《益世报》主笔等职。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6年代表民盟参加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并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1947年11月民盟被迫宣布解散，他在上海被国民党软禁。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等职。1965年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

### 【赏析】

国共两党北平谈判破裂后，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

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从此，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向江南和西北广大地区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5月17日武汉三镇解放，22日南昌解放，27日上海解放。在上海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罗隆基、史良等12人联合发表声明，热烈祝贺上海解放。5月29日，张澜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给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人民解放军渡江以来，时仅一月，南京及苏浙鄂赣五省会相继解放，近则上海亦全部解放。蒋军到处崩溃，人民咸庆来苏。人民解放军得到如此光荣胜利，谨为诸公庆贺。上海为东亚著名大都市，国内及国际人才多集于此。今后工商业之新发展，尤为新民主国家所利赖。值此战后，困难较多，如何安定，如何建设，想早在诸公运筹策划中……”并表示，要去京聆听新中国建设大计。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周恩来、董必武联合给张澜回信作复。

张澜一贯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在机场与迎接他的张澜首次会面，便有“神交已久”之感。在重庆谈判的百忙之中，毛泽东亲赴张澜的住地拜会他，并在纪念册上签下“光明在望”四个大字。数年过去，人民解放军已打过长江，解放上海，革命形势突飞猛进，毛泽东所预言的光明就在眼前了。

此信充分表达了毛泽东的喜悦、钦敬之情。他信心百倍地指出：“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城市的历史任务即将完成。然而，夺取城市不是最终目的，我们的任务是要管理好城市，稳步地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正如信中所言：“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国家百废待兴，热切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于建设大业。信的最后，毛泽东表示欢迎张澜的到来。一个“极”字，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民主党派荣辱与共、肝胆相照的高尚情怀。

信发出不久，张澜起程赴京，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在1949年9月下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上，张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搀扶张澜站在自己身旁，一起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 “建设大计，亟待商筹”

——致宋庆龄<sup>[1]</sup>（1949年6月19日）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sup>[2]</sup>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

专此。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宋庆龄，参见本书第175页注[1]。

[2] 邓颖超（1904—1992），原籍河南光山，生于广西南宁。原名文淑，又名咏通、湘君，化名適豪等。1919年在天津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参与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与周恩来、郭隆真等组织觉悟社。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与周恩来结婚。后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曾当选为国民党二届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干事、中央机关直属党总支书记。1932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干事和秘书长，并当选为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委委员。后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妇委书记。1945年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1946年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国民党政府召集的政治协商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后方工委委员、中央妇委代理书记，并当选为国际民主妇女联盟理事。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长期在全国妇联从事领导工作，曾担任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和第四届名誉主席。曾当选为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对外友协名誉会长。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和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十一届一中全会、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第二书记。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 【赏析】

宋庆龄早年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事业，始终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更是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最坚决的捍卫者和继承者。1926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她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她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同年8月1日，她和毛泽东等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名义发表宣言，揭露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1929年她被选为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1931年回国后，她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抗战时期，她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解放战争时期，她在上海创立福利基金会，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巨大的帮助。毛泽东、周恩来等一直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密战友。

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宋庆龄接电后，因健康原因，未能成行。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结束，毛泽东与周恩来等商议决定派邓颖超前往上海迎接。虽然当时上海已经解放，但毛泽东还是明确指示：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邓颖超临去前，毛泽东写了这封亲笔信，让她交给宋庆龄。

信的开头，尊称宋庆龄为“先生”，既表达了毛泽东的谦逊，也体现了他对宋庆龄的敬重。“违教”一词，用得真诚，“忽”字之用，道出了时光流逝之疾，革命形势发展之快。重庆谈判时，宋庆龄曾以特殊身份公开支持毛泽东的活动，并为保障毛泽东的安全尽心尽责。这令毛泽东非常感激。如今，四年过去了，毛泽东始终没有忘记这一切，“仰望之诚，与日俱积”一句，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宋庆龄的敬重和期盼。“建设大计，亟待商筹”一句，体现了共产党同宋庆龄同舟共济、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一句，进一步体现了毛泽东对宋庆龄的关切和爱护。当时的上海虽然已被解放军占领，但暗藏着大批国民党特务，为安全起见，毛泽东派人专程迎接，特别是信尾：“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一句，再次表达了伟人毛泽东的恳切、谦逊、期待之情。

此信热情洋溢、真诚感人，自始至终洋溢着对宋庆龄的敬仰、信赖、关切和期盼；语言精当典雅，气韵连贯，言简意丰，偶用文言之词，更使此信显得简洁明快，深沉凝重；在句式上长短兼用，使得结构严谨，有松有驰，轻重缓急，相应相间。

以情动人，以诚待人，是毛泽东伟大品格的一个侧面。他不仅在信中如是说，也在实际行动中如是做。当1949年8月26日，宋庆龄由上海抵达北平之时，毛泽东早已到达车站迎接，两位伟人之手紧紧握在一起，写下了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肝胆相照的又一光辉篇章。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慶雲先生：  
重慶書畫社，無近可事。  
仰斗之誠，此日與精。  
茲者全國革命勝利在  
即，建設大計亟時商  
籌，特派顏超同志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逸前翁候壽域歡迎  
先生北上敬希命駕蒞  
平江深就近請教至  
禱白却為盼！幸甚  
敬頌  
大安  
左中  
一九四九年  
翁前

## “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

——致程潜<sup>[1]</sup> (1949年7月4日)

颂云先生勋鉴：

《备忘录》诵悉。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佩慰。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贵部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均属可行。此间已派李明灏兄至汉口林彪将军处，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会面，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为着迅赴事打击桂系，贵处派员以速为宜。如遇桂系压迫，先生可权宜处置一切，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先生权宜处置，敝方均能谅解。诸事待理，借重之处尚多，此间已嘱林彪将军与贵处妥为联系矣。

毛泽东

1949年7月4日

根据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刊印

### 【注释】

[1]程潜(1881—1968)，湖南醴陵人。前清秀才，同盟会会员。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九江卫戍司令，江右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天水行营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国民党武汉行辕主任，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同年9月出席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1968年4月在北京病逝。

### 【赏析】

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第一条就是惩办战犯。在湖南主持军政事务的程潜被列入43名战犯之列，这使他陷于了深深的顾虑之中。中共对自己的态度如何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程潜的心。苦闷彷徨之时，他想起了毛泽东和他的交往。那还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特意拜访了程潜，两个老乡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为了毛泽东的安全，程潜曾提醒毛泽东早离虎穴。毛泽东从民族的大义出发，建议程潜竞选副总统，若搞不成可以相机搞和谈，再不成就回湖南搞局部和谈。后来，竞选失败，程潜回到湖南担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

席。其间,毛泽东与他信件往来,使程潜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1949年6月,程潜派人去香港会见章士钊。从章士钊那里得知毛泽东对走和平道路的人寄予很大期望。于是他下决心和共产党和谈,并秘密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由他自己签名盖章的《备忘录》,提出了和平解放湖南的意见。程潜在《备忘录》中写道:“爰本反蒋、反桂系,反战,反假和平之一贯态度决定根据贵方公布和平八条二十四款之原则,谋致湖南局部和平。一俟时机成熟,潜当即揭明主张,正式遥电全国,号召省内外军民一致拥护八条二十四款为基础之和平,打击蒋、白残余反动势力”。《备忘录》中还提出双方指派军事代表,成立军事小组和短期内设立联合指挥机关,整编队伍等意见。毛泽东收到程潜的《备忘录》后,非常高兴,遂拟这封复电。

此信结构严谨,言简意赅,用纯正的电文语言写成。电文的第一层意思,高度赞扬了《备忘录》里提出的反蒋反桂系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表示对此极为“佩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毛泽东稍有含糊,就会对本来就还有些犹豫的程潜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毛泽东开宗明义,以“佩慰”之意,激发程潜起义投诚之情。这就如同趁热打铁,更加坚定了程潜的决心。电文的第二层意思赞同了程潜所提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保存程潜部队予以整编教育等项意见,从方案上加以进一步肯定。电文的第三层意思建议从速派员到武汉与林彪会合,这就在方针认同的基础上,产生了具体实施方案,表述了共产党的诚意与务实态度。“贵处派员以速为宜”一句加重了语气,增强了语势。信的最后,毛泽东诚恳地表示,只要先生决心站在人民方面反美、反蒋、反桂,“可权宜处置一切”,再次表明对程潜的信任。

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还要依靠敌军的瓦解。”他在斗争中善于配合军事打击对敌军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瓦解,争取其起义、投诚,同时宽待俘虏,不辱不杀。正是在毛泽东的感召下,一个月后程潜与陈明仁在长沙发表“通电”,正式与蒋桂反动势力决裂,率部起义。



## “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

——致黄炎培<sup>[1]</sup>（1949年8月26日）

任之先生：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sup>[2]</sup>敬悉，很高兴。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谨致祝贺！

毛泽东

八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文集》（第五卷）刊印

### 【注释】

[1]黄炎培（1878—1965），字任之。上海川沙人。清末举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省议会议员。1915年赴美国考察。回国后从事职业教育，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理事长。1918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其后又曾创办职业指导所，补习学校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参政员。1940年底同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75年7月访问延安。同年底发起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抗战胜利后，积极拥护中共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等。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病逝。著有《延安归来》等。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北平的发言人1949年8月24日发表的痛斥美国白皮书的声明，题为《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成》。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关系》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白皮书所提的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好梦是做不成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基本利益的矛盾决定了它对一切帝国主义（包括美帝国主义在内）的态度，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它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

## 【赏析】

1949年2月,黄炎培在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赴解放区。3月25日到达北平,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在接见中,毛泽东和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了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希望黄炎培在民建会的前途和革命的分工问题上多做工作。毛泽东的殷切期望使黄炎培坚定了信念,决心把做好民建工作作为晚年的一项光荣使命。当时美国发表了颠倒是非的“白皮书”,黄炎培立刻撰写了《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警告美帝好梦做不成》的声明,予以反驳。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是为了掩盖失败,欺骗人民,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会变成美帝发展“民主个人主义”的资本或条件,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惟一的光明幸福的道路。文章发表后,毛泽东极其赞赏,当天写信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极好,这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黄炎培为此非常高兴,回信“希望主席时时指教”,毛泽东接到信后,写了这封回信。

“八月二十四日大示敬悉”一句,既是对黄炎培的尊敬,也是对其来信的重视。毛泽东曾于1948年8月发表了他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和《别了,司徒雷登》两篇评论文章,揭露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帝国主义的幻想,并对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他号召:“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黄炎培就是所说的“先进的人们”中的一个,他做的正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说服教育工作。所以,毛泽东在信中由衷地感到“很高兴”。接着,毛泽东指出了黄炎培的声明,不但是针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也就是建立了理论——只有新民主主义才是惟一光明幸福的道路的理论,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民建才有了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的主动性,才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的自觉性。信的最后一部分,对于民建采取的民主方式表示赞同。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指出:“自我批评方式,只能用于人民的内部”。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中国人民内部的中间阶级,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又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正是毛泽东所称赞的民主的、自我批评的方式。革命虽然胜利了,但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还处于动摇、观望的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不要以为胜利,就不要做工作了,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所以民主方式是很好,很必要的。民主方式重在心理教育,思想教育,这是改造人们世界观的很有效的方式。因此信中说:“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教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此信写得热情洋溢,不仅充分肯定了民建的理论,更肯定了民建的实践方式,反映出毛泽东对黄炎培的敬重和赞赏,以及对民主建国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965 年的毛泽东)

## 治国兴邦篇

## “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

——致杨开智<sup>〔1〕</sup>（1949年10月9日）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杨开智（1898—1982），湖南长沙人。杨昌济之子，毛泽东之妻兄。早年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曾积极支持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农业厅研究室主任，省茶叶公司副经理，省茶叶经营管理处副处长，湖南省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五届省政协副主席，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2年1月26日病逝于长沙。

### 【赏析】

随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不断走向胜利，毛泽东显赫的领袖地位日益加强，这不能不使得他的一些亲朋好友产生了某些过分的要求和想法。杨开智就曾在建国前夕致信毛泽东，希望毛泽东能出面斡旋，为他谋一个厅长方面的位置。毛泽东见信后没有答应杨开智的要求，不久便给他回了这封信。

此信共78个字，果断地拒绝了杨开智的要求，要他“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果断干脆，掷地有声，可谓理正辞严，容不得丝毫辩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为官之道，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他行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除此以外，没有个人私利。他当然不会答应帮助其亲朋好友谋取职位或私利。他不仅回绝了杨开智，而且于同日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致电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其老母如有困难，可给若干帮助。”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把杨开智看作“皇亲国戚”，只把他视为普通一民。这再次表现了毛泽东不拘私情，廉洁奉公的伟大品格。

随着时光的流逝，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思念更多地体现在对杨开智和杨老太太的关切上面。但这种关切并不是不讲原则的，而是以人民利益为重。早在西柏坡时期，毛泽东就把进京视作进京赶考，并发誓考个好成绩，绝不当李自成。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毛泽东对自己的亲戚严格要求，正是他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大公无私，清正廉洁的真实写照。

## “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

——致周世钊<sup>[1]</sup> (1949年10月15日)

敦元学长兄：

迭接电示，又得九月二十八日长书，勤勤恳恳，如见故人。延安曾接大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兄过去虽未参加革命斗争，教书就是有益于人民的。城南学社诸友来电亦已收到，请兄转告他们，感谢他们的好意。兄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可见骏骨未凋，尚有生气。倘有可能，尊著旧诗尚祈抄寄若干，多多益善。

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大难甫平，民生憔悴，须有数年时间，方能恢复人民经济，完成土地制度的改革及提高人民政治觉悟水平，这些任务均有待于文教工作的协助。

陈泽同先生的意见书<sup>[2]</sup>已收阅，当交此间工业机关研究，请兄为我代致谢意。他的工作问题请告他直接向湖南当局要求解决，不要等候我的答复。谨此奉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世钊(1897—1976)，字博元，又名敦元、东园，湖南宁乡人。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与毛泽东同学，新民学会会员。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省教育厅长、副省长。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

[2]指长沙的工程师陈泽同于1949年写给毛泽东的《建设湘潭工业区刍议》。陈泽同建议将湘潭所属的下摄司至株洲湘江东岸沿河40余里地区建设为新中国的“湘潭工业区”。

### 【赏析】

周世钊是新民学会第一批会员，是毛泽东的同学，早在湖南一师期间，他们就共同受到新文化的熏陶，受到过杨昌济、徐特立的教诲。在长达五年的同窗生活中，他俩情义深厚，才学出众，被师生们誉为“双杰”，在新民学会里，他们都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根本宗旨，达到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程度。1927年，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周世钊则在长沙从事教学工作。分别之后，周世钊常思念毛泽东，作诗曰：“九州明月系离



肠”，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不管毛泽东在延安还是在重庆，周世钊常冒险写信给他。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周世钊激情满怀，挥笔作诗：“百万雄师奋迅雷，红旗直指洞庭来。云霓大慰三湘望，尘露欣看万里升。箪食争迎空井巷，秧歌高唱动楼台。市民啧啧夸军起，只饮秋江水一杯。”并以此表达对毛泽东的敬仰和爱戴。他联合一些新民学会会员和教师，向毛泽东致贺电、贺信。毛泽东1949年10月15日收到这些贺信，遥想当年，感念颇多，写了这封回信。

此信直呼“敦元学长兄”，让人想起20多年前的青年时代。20多年，弹指一挥间。两人诸多感想，诸多思情，皆流于笔端，诉诸片纸，显得纸短情长。“速接电示”、“如见故人”等话，极恰当地表达了毛泽东的心情。“延安曾接太示”，“寄重庆的信则未收到”，这两句话出笔自然，但情义无限，令人难忘。接着毛泽东说，教书与革命斗争在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对周世钊的客观评价，从而打消了周世钊心中的顾虑，鼓励他继续为人民教书。“骏骨未凋，尚有生气”一句，既是对周士钊过去的肯定，又是对周士钊现在“为一师校长，深庆得人”的赞扬。

信的第二自然段，深入叙述了文教工作的重要性。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严重困难也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严峻考验。军事方面，除台湾、西藏外，全国各地大约几个月内即可完成军事占领。但在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是一个饱经战争摧残，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失业人数很多，可谓“大难甫平，民生憔悴”，必须用几年时间，才能恢复社会经济。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大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走出来，思想政治觉悟有待于大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肩负着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毒害，培养有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国家建设人才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含蓄地表达了对周世钊从事文教工作的殷切期望。信的最后一段，表明了毛泽东对陈泽同的意见书及工作问题的态度。

此信脉络清晰，层次分明，热情真挚，既有对20多年友情的回顾，又有对建设新中国的瞻望；既有对故人的褒奖，又有对文教工作的重视和鼓励。在语言运用上，此信行文质朴，自然流畅，鼓舞人心。后来周世钊收到信后，欢欣鼓舞，决心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 “剿办须有策略步骤”

——致刘揆一<sup>〔1〕</sup>（1950年3月14日）

霖生先生有道：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大示奉悉，极为欣慰，迟复为歉。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不知近日有所缓和否？匪祸必剿，首恶必办，是为定则。惟剿办须有策略步骤，以期迅速解决，安定全境。湖南匪患闻已大体解决，是否如此，先生所知如何，尚祈便中见告。敬颂大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刘揆一（1878—1950），湖南湘潭人，原籍衡山。字霖生，亦作连生。早年结交会党，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尤善。1903年自费赴日留学，入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年底回湘，任醴陵渌江中学堂监督，暗中进行革命活动。次年2月，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华兴会，被推为副会长；另设同仇会为外围，联络会党，邀马福益参加。议定于11月间在长沙发难。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因持异议，未参加，至1907年1月始加入。2月代理执行部庶务干事。同年因孙中山、黄兴去安南，代行总理职务，主持东京本部工作，直至武昌起义。在此期间，他力排众议，维护孙中山的威信，不以分裂活动为然。武昌起义后，主张“化除畛域，共建新猷”。1912年3月，同盟会转为公开，他是十干事之一。8月，任袁世凯政府工商总长，旋即申明脱离同盟会。1913年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因受同志冷遇，遂另组“相友会”，不与国民党合作。7月，因工商部私借外债受到攻击去职，在天津创办《公民报》，揭露袁世凯帝制阴谋及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被日本租界当局查封。1916到1918年，任北京政府国会议员。国会解散后回籍。北伐战争前夕，曾赴广州。大革命失败后闭门著书。1934年发表《救国方略之我见》，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实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抗日战争期间隐居洪江。解放后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顾问。著有《黄兴传记》等。当时任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

### 【赏析】

为了配合建国后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彻底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建立和巩固各级人

民民主政权,为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准备条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反霸斗争。毛泽东的同乡好友刘揆一,因发现政府在筹粮支前和剿匪安民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便于1949年12月27日写信给毛泽东作了反映。毛泽东收到信后,极为欣慰,如烟往事,似乎又重现眼前。那还是在湖南一师求学时,毛泽东就了解到刘揆一的一些情况:他早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是武昌起义汉口前线督战员,是远近著名的辛亥革命活动家。经杨昌济介绍,他们在湖南一师晤面,谈兴盎然,相见恨晚。1919年毛泽东为一批有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筹款曾找章士钊。章士钊对此深表同情,但身单力薄,无奈找到了刘揆一。刘揆一倾囊相助,帮了大忙。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为躲避追捕,受到过他的庇护。湖南解放后,刘揆一任人民军政委员会顾问。毛泽东多次派人捎信,嘱他保重身体,多为人民做贡献,从此刘揆一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一心扑在了工作上。用书信形式反映问题,说明了刘揆一对人民事业的关心。

此信首先为信的收悉而“欣慰”,也为复信较迟而“抱歉”。然后,笔锋一转,对刘揆一提出的问题——作答。信中所谓“征粮流弊,政府已发令纠正”,是指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第21次政务会议原则通过的《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在新解放区征粮中发生了不少严重问题,如有些地主以其总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来交公粮,还有些地主须以粮食收入的全部来交公粮,或者全部交了还不够。”为了纠正这些缺点错误,政府制定了七条具体规定,并要求各地据此制定详细办法,派人实地检查,以安定农村,保证春耕顺利进行。同时要求各新解放区应抓紧时间,结合春耕做好土地改革的各项工作。对尚未肃清的土匪,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及反对农民运动、破坏土地改革的分子,各地政府应主动适时地加以逮捕,交送人民法院或组织人民法庭依法审判,但必须严禁乱打、乱杀、乱逮捕、乱处罚及戴高帽子游行等行为。这些政策和措施对于当时的剿匪斗争,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全国解放后,流散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及反动会道门头子200多万人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在蒋介石集团和帝国主义操纵下,明目张胆地向人民政权发起疯狂反攻,他们四处活动,炸毁工矿企业,破坏铁路,刺探情报,抢劫物资,纵火放毒,甚至聚众搞反革命暴乱。要巩固和扩大革命胜利果实,必须要坚决剿匪反霸,但还必须讲究策略方法,也就是毛泽东信中所指出的“匪祸必剿”,“剿办须有策略步骤”。

此信不长,但思想内容丰富深刻,既有对“大示奉悉”后的“极为欣慰”之情,又有“迟复”的歉疚之意;既有对征粮流弊的解答,又有对剿匪政策的解释;既有对全国形势的分析,又有对湖南解决匪患的关切。此外,简练、明快的语言更使此信显得通俗、生动、亲切。

素生先生有過二十年  
十月廿六日奉  
為然附之  
微程流矣  
糾今不知  
匪視中勤  
為至不  
明是

宣和，惟社所演有軍容  
此縣，以期田運之法，安在  
境。湖南亞集周之大的  
決，是吾為此，先生所見也  
河，亦社所演中見者哉

頌其安不興！  
之河東  
一九五〇年  
六月廿六日



## “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

——致杨开智、李崇德<sup>[1]</sup> (1950年4月13日)

子珍  
崇德 同志:

来信收到。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望积极努力,表现成绩。小儿岸英回湘为老太太上寿,并为他母亲扫墓,同时看望你们,请你们给他以指教为荷。此问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杨开智,杨开慧之兄。参见本书第386页注[1]。李崇德,杨开智的夫人。

### 【赏析】

1950年2月的一天,当全国人民沉浸在新中国诞生的胜利喜悦之中时,毛泽东心情却显得十分沉重,他把毛岸英招呼到菊香书屋,深情地说:“你现在可以回家一趟了,代我给你母亲扫墓,带些东西,代我为老太太上寿。再回到湘潭老家看看,向乡亲们问好”。由于工作原因,毛岸英三个月后才得以成行。临行前,毛泽东给杨开智夫妇写了这封信。

当时的杨开智已经打消了去北京谋职的念头,经湖南省政府安排,从事农业方面的工作。杨开智的这一变化,让毛泽东非常欣慰。早在以前的书信往来中,毛泽东就劝杨开智,从事农业工作很好。如今,杨开智服从了地方的安排,学有所用,毛泽东能不高兴!故此,信一开头就说:“你们在省府工作,甚好”。建设新中国需要一大批学有所长的人利用所学的知识,更好地为新中国多做工作。但他又担心自己的亲戚依靠自己的权重位高不好好工作,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所以,信中鼓励杨开智夫妇一定要好好工作,创出成绩,为新中国的建设多做贡献。对于岸英此行,毛泽东曾嘱咐他除了省亲,还要多到亲友农民家中走走,多了解乡下情况,多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好好向他们学习。为此,毛泽东在信中要求杨开智夫妇对毛岸英加以指教。

此信短小精悍,情理兼容。信中有对开慧的祭悼,又有对“老太太”的孝敬,有对杨家生活上的关切,更有对杨开智夫妇工作上的激励,加上信中语言质朴,庄重,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家的无限亲情。

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

子珍

同志：

來信收到。你們在苦鬥  
忘心甚好，此種艱難努力，志  
現成績。小兒兄，兄，兄，兄  
汝為老大大上士，



## “不宜由弟推荐”

——致毛森品<sup>[1]</sup>（1950年4月18日）

森品学兄如晤：

前后两信均收甚慰，因事迟复为歉。钦明<sup>[2]</sup>兄为革命牺牲，不胜叹惜，亦是光荣之事。所述干部工作中之缺点，所在多有，现正加力整顿，期能有所改进。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风便尚祈随时惠示周行。敬祝健进。不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毛森品，湖南湘乡人，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同学。

[2]钦明，即毛钦明，毛森品之兄。曾与毛泽东同学。1928年牺牲。

### 【赏析】

毛森品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1911年春，他们又一同进入长沙中学读书，两人关系很好。新中国成立后，毛森品给毛泽东写信，汇报自己的近况，还反映了本地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加力改进。对于毛森品所提到的家庭困难，毛泽东曾多次用自己工资进行资助。但在毛森品写信要求推荐工作时，毛泽东却写了这封婉言拒绝的信。

此信首先称“两信均收”，“迟复为歉”。信中的钦明是森品的胞兄，曾陪毛泽东在湘乡考察农运，1928年为革命牺牲。对此，毛泽东不胜叹惜，称之为光荣之事。对于毛森品提出的推荐工作的要求，毛泽东却婉言加以谢绝。毛泽东早在1938年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鲜明地指出：“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当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所以，毛泽东在信中建议说：“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地参加进去”。也就是通过为人民服务的工作，被人民所认可、所发现，而不应依靠别人推荐，这体现了毛泽东廉洁清正，唯才是举，任人唯贤，注重实绩考

察干部的工作作风。

毛泽东反对任人惟亲，特别强调从实际斗争中考验和识别干部，把干部放到革命斗争的艰苦环境中去考察，识其忠，辨其才，用其能，而从不考虑是否沾亲带故。许多党的优秀干部之所以能够被重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毛泽东以实绩取人的做法。以实绩取人，而不是靠分封、世袭、举荐，这是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的睿智所在。

此信写得含蓄、婉转而又真诚。“不知以为然否？”一句，使人不觉难堪，读来亲切自然。

士林品學兄有暇：前後  
兩信均收甚感，因事遲  
覆為引。欽所兄為華僑社，  
不勝歎惜，上呈光榮之事。  
所述幹部之中，欠缺，所  
在，多有，現正加力整頓，期  
能有所改進。吾兄出任，



相為贊成，其意彌切。宜就骨  
不利量方面有所贊助表現，  
為人所重，而終而終參加進去，  
不宜由中拊之為處，而有累清  
德不知以為然否。風便尚  
社隨時惠示周知。刻祝  
健達不具。在河東。  
一九五〇年  
四月十日

## “不必远道来京”

——致李淑一<sup>[1]</sup> (1950年4月18日)

淑一同志：

来信收到。直荀<sup>[2]</sup>牺牲，抚孤成立，艰苦备尝，极为佩慰。学习马列主义，可于工作之暇为之，不必远道来京，即可达到目的。肖聃<sup>[3]</sup>午亭<sup>[4]</sup>两位老先生前乞为致候。顺颂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四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李淑一，1901年生，湖南长沙人，柳直荀的夫人。当时在湖南长沙福湘女中任教。

[2]直荀，即柳直荀（1898—1932），湖南长沙人，又名克明。1916年考入长沙雅礼大学。五四运动期间，在长沙组织学生爱国斗争，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兼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1929年以中共中央军委巡视员身份到湖鄂西革命根据地。后任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六军政委、红三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西北分特委书记。1932年在肃反扩大化中因反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被打成“改组派”。同年9月在湖北监利被杀害。1945年4月中共中央正式予以平反，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3]肖聃，即李肖聃（1881—1953），湖南长沙人，李淑一之父。

午亭，即柳午亭（1877—1957），湖南长沙人，柳直荀之父。

### 【鉴析】

1950年初，李淑一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了柳直荀牺牲和自己女儿长大成人的情况，并提出了去北京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要求。

李淑一之父李肖聃、柳直荀之父柳午亭、杨开慧之父杨昌济，都是湖南德高望重的知名学者。三家的交往，使得毛泽东、杨开慧、柳直荀、李淑一四位志同道合的青年走到了一起。1921年，毛泽东与杨开慧在省立一师结了婚。1924年经杨开慧牵线搭桥，柳直荀与李淑一结成眷属。“马日事变”后，柳直荀别妻离子参加了工农红军。与丈夫失去联系的李淑一，只身带着孩子，饱经人间种种磨难和迫害，一直熬到全中国的解放。此时，苦苦等了22年的李淑一才得知柳直荀已于1932年在洪湖牺牲的消息。毛泽东读了李淑一的来信，深为这位故人的不幸而挂念，1950年4月18日，复了这封信。

复信首先对柳直荀牺牲后，李淑一为抚养孤儿长大成人尝尽的艰辛苦难“极为佩慰”。20多年的期盼和思念，李淑一艰苦备尝而不屈，靠的是信仰的坚定和爱情的忠贞。如此含辛茹苦而意志不泯的坚强女性，自然值得敬佩。对于信中提出的来京要求，毛泽东却不赞成。

新中国成立后，一封封要求去京谋职、学习的信件从湖南寄往北京，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对于亲友的这一要求，毛泽东婉言拒绝。对于李淑一的要求，他同样没有答应。

澈一圓。自信收到。直前犧牲，  
 撫孤成其艱苦清苦，極為  
 佩服。子習子不，其可於此  
 之暇，子必達達多之，亦，即  
 可達到目的。青研午予兩位  
 老先生，其氣為政久矣。順頌  
 健康。毛澤東  
 一九五〇年  
 四月十日

## “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

——致文润泉<sup>[1]</sup> (1950年5月7日)

润泉表兄大鉴：

一月十六日来信收到，甚以为慰。唐家托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sup>[2]</sup>还在否，便时请你告我。文凯<sup>[3]</sup>先生宜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弟亦未便直接为他作介，尚乞谅之。运昌<sup>[4]</sup>兄连来数信，已复信一位寄白蛙口，不知他接到否？南松<sup>[5]</sup>兄第二次来信已收到，感谢他的好意。此复，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文润泉(1881—1967)，又名文鉴泉。湖南湘乡人。毛泽东的表兄和干哥。1927年毛泽东到湘乡考察农民运动，他陪同考察，并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积极支持毛泽东救国救民。新中国成立后，与毛泽东有多次书信往来，并七次上京会晤毛泽东。

[2] 十哥，即文萍香，文润泉的堂兄。1949年去世。

十七哥，指文梅清(1877—1960)，农民。文润泉的胞弟。

[3] 文凯(1883—1955)，湖南湘乡市白田镇白石村人，与文润泉同宗。

[4] 运昌，即文运昌。参见本书第2页注[1]。

[5] 南松，即文南松(1890—1951)，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托(当时属湘乡)人，农民。毛泽东的表兄。

### 【赏析】

1950年1月，文润泉曾给毛泽东写信，要求他为自己的本家好友文凯(即文涛生，毛泽东远房表兄)介绍工作。同年5月7日，毛泽东复了这封信。

毛泽东童年时代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唐家托成了毛泽东小时候的乐园。他与文萍香、文润泉、文运昌、文梅清、文南松诸表兄相处融洽。后来他进县城读书时也常想着回外婆家度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当上了国家主席，虽然国事繁忙，却念念不忘外婆家的亲人。所以，收到文润泉的信后“甚以为慰”。他曾饱含深情地说过，文家表兄过去因为他吃过很多苦头，现在解放了，也应该和广大人民一样过过好日子了。他于信中关切地问：“唐家托现在尚有多少人，有饭吃否，十哥、十七哥还在否”，要求文润泉“便时请你告我”。至于给文凯介绍工作，毛泽东没有同意，主张“在湖南就近解决工作问题，不宜远游”。

此信读之，倍感别样亲情。作为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常把自己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从不谋一己私利。对亲属他非常关心，也严格要求。正如他在1937年11月给文运昌信中所说：“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

\*此信在语言运用上，显得自然流畅。叙情则有诸多关切连缀而出，连绵不绝；言理则直截了当，毫不含糊。“尚乞谅之”一句，寓理于情，寓严于爱，让人感慨万千。

潤泉先生大鑒  
一月三日來信收到  
以為慰。唐景境現在尚  
有多人看飯吃者，十哥  
十七哥還在此，便時請你  
告我。外家先生宜在湖



南就近解決。工作問題，不宜  
遠游，未去後直接向他  
作會，尚乞諒之。運昌兄  
連來數信，已覆及一信，高  
白轉以，不知他接到否。南松  
兄第二次來信已收到，感



謝池的好意。此致，

順祝

健康！

毛澤東

張曙

## “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

——致叶健农<sup>[1]</sup>(1950年5月12日)

建隆学兄:

各次来函及电报均已收到。你热心研究新知识,很好。工作问题,如能在重庆获得解决,以在重庆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向最高人民法院沈钧儒院长通信询问有无适宜工作,或先入短期学习机关加以学习然后参加工作。此复,顺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叶健农,原名叶建隆,湖南平江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

### 【赏析】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断收到亲友的来信,或致贺,或叙旧,或请求帮忙……对每一封信,毛泽东总是挤时间回复,多加以精神鼓励或以自己工资、稿酬资助,对于工作上的帮忙要求,他是十分慎重的。

叶健农解放后多次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参加司法工作。毛泽东收到信后,认为这是一些合理的要求,他想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尽量予以帮助。1950年5月12日,毛泽东回了这封信。

复信首先对叶健农“热心研究新知识”表示赞成。谈及工作问题,毛泽东主张在重庆解决为好,如要来京,则请直接给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写信,表明了毛泽东不愿插手参与推荐工作,而是希望叶健农凭着自己的才学脱颖而出。

此信篇幅虽短,内涵却丰富:首先表明了对学兄学习新知识的赞同态度,这就从另一个侧面鼓舞叶健农勤学不辍,以更好地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对于工作问题,毛泽东首先表示在重庆解决最好,然后,又指出如要来京所取的合适之路,显得诚恳、真挚。毛泽东在此信中既坚持原则,不拘私情,又关心其进步,鼓励其进取,令人叹止。此信平易朴实,寓情于理,情理交融,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 “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

——致周文楠<sup>[1]</sup>（1950年5月12日）

文楠同志：

来信收到，甚慰。接你母亲<sup>[2]</sup>去东北和你一道生活一事，我认为是好的。我可以写信给湖南方面发给旅费。惟你母年高，一人在路上无人招扶是否安全，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请你考虑告我。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附件<sup>[3]</sup>还你。江青她们都好。

祝你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二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周文楠，即周润芳（1910—1992），江西临川人。毛泽东之弟毛泽覃之妻。当时在湖南长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湘赣军区政治部技术科长。1940年经重庆辗转到达延安，任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小学教员，边区政府干部休养所党支部书记。建国后，曾任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等职。

[2]即周陈轩（1888—1968），江西临川人。大革命时期曾协助周文楠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周文楠在湖南长沙被捕后，负责抚养外孙毛楚雄。1937年冬，同周文楠等一起由长沙到韶山毛泽东故居居住。1950年7月迁居东北，曾任黑龙江哈尔滨市政协委员。

[3]指周陈轩写给女儿周文楠的信。信中叙述了她在韶山一人生活无人照顾的情况等。

### 【赏析】

周文楠是毛泽东之弟毛泽覃烈士的夫人，解放后在沈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庭工作。1950年初，她的母亲周陈轩从韶山写信给她，叙述了自己在韶山冲独自生活、无人照顾等情况。周文楠接到信后，考虑到老母年事已高，生活不便，事事要人照顾，便想接母亲到沈阳一起生活。从湖南到东北，千里迢迢，谈何容易！为此，周文楠向毛泽东写了这封信，并将母亲寄来的信一并附上。

毛泽东接到信后，思绪万千。对周陈轩老人，他是熟悉，了解的。早在大革命失败后，

周陈轩就支持女儿与毛泽覃的革命活动。十年内战时期,她在白色恐怖之下,坚持为党工作,抚育了革命后代——外孙毛楚雄。后来毛楚雄参加革命光荣牺牲,周陈轩老人对此事一直不知,故而还常常思念。对于这些,毛泽东很是敬佩,对于周文楠信中所言更是十分赞成。5月12日,毛泽东给周文楠写了这封亲笔信。

复信称文楠为“同志”,可以看出毛泽东不是以亲戚的口吻,而是以同志身份给她回这封信的,这充分表现了毛泽东不徇私情、秉公办事的崇高风范。接着,毛泽东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人年事已高,正需要有人赡养,他同意周文楠接母亲一起生活的想法。毛泽东只是担心千里旅途无人照顾,老人无法成行,所以,他建议:“是否需要你自己去湖南接她同去东北方为妥当”,并提出:“如你自己去接,我给湖南的信即由你带去”。

此信不长,但情动于衷,可谓虑之以详,处之以周,关怀备至,细致入微。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照顾周陈轩老人,不仅仅是因为她是一位长者,更是因为她和许许多多的劳苦大众一样,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此信语言质朴、自然流畅,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周陈轩老人的关切之情。正是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周文楠不久来到故乡韶山,见到了离别多年,两鬓斑白的母亲,使老人的心愿得到实现。

## “不能给以特殊救济”

——致刘亚南<sup>[1]</sup>（1950年5月27日）

亚南同志：

兹有湘乡四都凤音乡大平坳文氏兄弟四人来信，付上请你看一下。他们对当地区乡政府的工作有些不满意的话，未知实际情形究竟如何。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至于文家（我的舅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节，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此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 刘亚南，1917年生，河北大名县人。当时任湖南省湘乡县县长。

### 【赏析】

1950年初，毛泽东的几位文家表兄向毛泽东写信，反映了乡下减租退押和土改情况，言辞中对当地政府中的个别人有些不满，甚至为地主富农开脱。毛泽东接到信后，5月27日给当时的湘乡县县长刘亚南写了这封信，以表达自己的关切。

为了查明问题的实情，他把文家表兄的信附上，这说明了毛泽东对当地政府部门的尊重。由于建国初期老乡反映的问题较多，出于解决问题的目的，毛泽东对省地县党政负责人的提议、建议总是以平等的、同志式的口吻进行磋商，而不是自恃官高位重，凌驾于他人之上。“假如可能的话，请你派一个同志去调查一下，以其结果告我”一句，言辞得体、客气、平易近人。但对于文氏兄弟则表现得极为严厉。信上说：“文氏兄弟都是贫农，信上则替地富说话，是何原因，亦请查明告我。”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亲戚的要求是严格的。作为人民领袖，他担心亲戚的言行损害了人民的利益，更担心亲戚借自己的权位犯错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亲密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搞特殊化，搞特权，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信尾，毛泽东还针对文家生活困难要求救济一事，指示：“只能从减租和土改中照一般农民那样去解决，不能给以特殊救济，以免引起一般人民不满”。此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严以律己、廉洁清正、不徇私情的革命情操。信中语言平易，态度冷静客观。

## “说富农的部分长了,反而不清楚”

——致刘少奇<sup>[1]</sup>(1950年6月4日)

少奇同志:

此件<sup>[2]</sup>看过,很好,很有用。有些修改,请再酌。说富农的部分长了,反而不清楚,有些则说得不大适当,故删去一大部。加上一九四六年以后一段经验<sup>[3]</sup>,借以纠正一部分同志已经有了的一种错觉,说过去的“左”倾错误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土地法大纲上规定了没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原故。如果没有这段说明,则不能纠正此种错觉。

所谓生产力,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亦称生产手段)两部分。所谓生产资料,在农村中,首先是土地,其次是农具、牲畜、房屋<sup>[4]</sup>等。粮食是农民利用生产资料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我们将从地主手里没收的粮食亦和其他被没收的东西列在一起称为生产资料也是可以的,因为这种粮食具有资金的性质。所谓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即财产的所有权关系。生产资料的使用,例如农民使用(租用)地主的土地,只是地主对于土地的所有关系的结果,这种所有关系表现为佃农对地主的隶属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即是生产关系。过去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作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把问题弄得很糊涂,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曾于一九四七年冬季叫乔木<sup>[5]</sup>写了一个文件,题为“中国各社会阶级及其待遇的规定”<sup>[6]</sup>,其前面两章是我写的,说明了这个问题,可以参看。

毛泽东

六月四日下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刘少奇,参见本书第342页注[1]。

[2] 指刘少奇准备向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

[3] 指毛泽东在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草稿中加写的一段话。全文是:“在1946年7月至1947年10月这一时期内,华北、山东及东北许多地区的农民群众和我们的农村工作人员,在实施土地改革中,没有能够按照中共中央在1946年5月4日颁发的基本上不动富农土地财产的指示,而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行动,将富农的土地财产和地主一样地没收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双方斗



争最紧张最残酷的时期。土地改革中发生偏差,也以这一时期为最多,侵犯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破坏了一部分农村中的工商业,并在一些地方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发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同时,也由于我们的大多数农村工作人员没有土地改革的经验,他们不知道正确地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方法,划错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分,将某些富农当成了地主,将某些中农当成了富农。鉴于此种情况,中共中央乃于1947年10月10日颁发了土地法大纲,将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但允许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同年冬季,中共中央颁发了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文件,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文告,任弼时也发表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演说。从这时起,农村中发生的某些混乱现象就停止了,土地改革走上了正轨。为了使我们的同志今后在各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中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指出过去的经验是有必要的。我们现在是处在完全新的情况下,我们建议的土地改革法,采取了消灭封建制度保存富农经济的方针,也是完全必要的。”

[4]这里的“房屋”指作为生产资料的房屋。作为人们生活用房的房屋,毛泽东把它列入生活资料。他在《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第一章中曾经指出:“人们为着要生活,就要生产生活资料,例如粮食,衣服,房屋,燃料,器具等。人们为着要生产生活资料,就要有生产资料,例如土地,原料,牲畜,工具,工场等。”

[5]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见本书第536页注[1]。

[6]这个文件的全称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

## 【赏析】

面对建国初期的复杂形势和种种困难,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为了过好土改关,中共中央总结历史经验,经过讨论,确定了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中央还决定在1950年6月召开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及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刘少奇将准备向会议提出的《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草稿,呈送毛泽东阅批。毛泽东阅后,写了这封长信。

此信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的优缺点。毛泽东对富农问题极为重视。他认为“五四指示”以来,特别是1947年以来,各根据地在土改中的错误,包括对富农“扫地出门”等“左”的做法,都是由于没有经验,不会划分阶级造成的,所以不要再拿到三中全会上来打屁股了。不要因为今天对富农实行新的政策就否定过去在战争条件下实行平分富农土地政策的正确性。所以,毛泽东在信中针对一部分同志出现的认为过去“左”的错误是土地法大纲的缘故这样一种错觉,加上了一段文字,来说明在两年内,在战争胜负问题没有解决,富农还倾向地主、国民党一边,而为争取战争胜利又要充分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时,征收富农的多余的土地和其他财产是正确的。从中我们可以

看出毛泽东对待富农的慎重态度和策略思想。

信的第二部分,则详细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针对过去许多同志因为在生产关系这个问题上犯二元论(甚至是多元论)的错误,将生产关系和使用关系并列,又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并列,因而划错了许多人的阶级成分的诸多问题,毛泽东详细地、有理有据地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范畴,并特别把“粮食”、“土地”等概念作了深入的剖析和辩证的概括,因而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篇书信写得详细而周密,用例恰当而典型。特别是在信的第二部分,采用诠释方法,正确回答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内涵和外延。在论证方法上采取举例的方法,用生动的事实和例证更好地帮助人们来理解抽象的理论概念。

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欣然予以接受。在同年6月14日至23日的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阐明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法、政策。会议还讨论和同意了中共中央建议的土地法草案,后根据政协会议建议,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泽东主席颁布命令公布施行,这大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的生产和革命积极性,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农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工农联盟和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得到巩固。

## “未知有此决心否”

——致谭世瑛<sup>[1]</sup>（1950年8月31日）

世瑛学兄：

五月来信收读，又承赠以长歌，深感厚意。生活困难，极为同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金甚微，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贍给；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否则须远出参加短期研究班的学习，须准备吃很大的苦楚，又难于贍家，未知有此决心否？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八月卅一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刊印

### 【注释】

〔1〕谭世瑛，毛泽东少年时的同学。

### 【赏析】

谭世瑛是毛泽东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的同学，是毛泽东的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早年毛泽东到东山学堂读书，正是由于谭咏春先生的斡旋，才得以成学。后又经谭先生推荐，毛泽东到中学读书。在毛泽东求学这个问题上，谭老先生可谓帮了大忙。

1950年5月，谭世瑛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叙述了旧情，并要求给予工作上的照顾。毛泽东为此回了这封信。

此信娓娓道来，以理服人。40年未见，对于学兄的来信及诗，当然“深感厚意”。对于信中所言“生活困难”一事，毛泽东“极为同情”。一个“极”字，可见同情之程度。信后，毛泽东便从北京寄去300元人民币以作周济，并邀请去北京一叙，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关心和爱护。对于来信中提到的工作变动，毛泽东则先言理，后达情。“现在到人民政府所属机构做事，或到学校教书，薪金甚微”一句，说明了共产党的干部和教员都是廉洁的，所以“对于家口众多者不易贍给”，接着，毛泽东在信中称：“又须入相当学校学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方能齐一步调，有共同作风。”这里包含着这样一个道理：共产党的干部都是用马列主义武装头脑，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方法统一行动，步调一致的干部，都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高尚情操，坚定不移的政治立场和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而解放前的谭世瑛

在国民党政府当过科员，他的两个儿子因参加过国民党军队而被镇压，他本人也因包庇被判处一年管制。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以吾兄状况观之，能就近获得工作职位，为最好”。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此信，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到了情谊，显得合情合理。

此信写得情有所至，理有所尽，极有分寸，让人感佩。信中的内容，深入浅出，生动感人，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待旧政府过来的人的科学态度。

此信用语含蓄，中心意思是反对谭世瑛到人民政府做事或到学校教书。但信中没有直言，而是极尽委婉，说明到人民政府做事或到学校教书应具备的种种素质，从正面提出“就近获得工作职位”的建议，最后又从反面说明“远出”带来的种种实际问题。“未知有此决心否”一句，亦庄亦谐，耐人寻味。

## “一概不要修建”

——致黄克诚、王首道<sup>[1]</sup> (1950年9月20日)

克诚、首道并告子恢<sup>[2]</sup>同志：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毛泽东

九月二十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黄克诚(1902—1986)，湖南永兴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任营政治指导员。1928年初参与领导永兴起义，后任红四军三十五团团长沙、红三军四师政委、红三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一军团四师政委、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委、第二纵队政委、第四纵队政委、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1941年后，任新四军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苏北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和政委、中共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冀察热辽军区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建国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军区司令员和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和政委、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受到错误批判和撤职处理。1977年被中共中央正式平反后，出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和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常委、常务书记，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纪委全体会议当选为中纪委委员、常委、第二书记。1986年12月28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王首道(1906—1996)，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参见本书第418页注[1]。

[2]邓子恢(1896—1972)，福建龙岩人，又名绍箕。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领导闽西起义。后曾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十二军政委、中央工农民主政府财政部长。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委员、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第四师政委、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书记、华中军区政委，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中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72年12月10日在北京病逝。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

## 【赏析】

1927年元月，在韶山考察农民运动的毛泽东曾自豪地预言：“湘乡清平搭汽车去湘潭买肉，可以赶回来吃早饭”。农民听到这话，想到韶山崇山峻岭，交通不便的苦楚，心里格外向往。

1949年，当湖南解放的时候，韶山人民怀着对毛泽东的热爱，决定自修一条通往韶山的公路，以便为前来参观毛泽东故居的人们提供方便。建国后，经过中共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提议，并报湖南省委批准，决定把公路从湘潭修到韶山，并在韶山冲建一个接待室，接待参观的游人。毛泽东知道此事后，于1950年9月20日，给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及省委第一副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这封信，并请转告中共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

信中针对修公路及建房屋一事，严厉指出：“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修路修房，本来是为了群众方便。但因为这路、这房的修建与毛泽东有关系，所以，他要求立即停止，并特别强调：“是为至要”。

在毛泽东的严厉制止下，这件事被阻止了。毛泽东以自己的清正无私、廉洁奉公，赢得了人民的拥戴。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应广大参观群众的要求，直到1951年政府才组织群众修了一条通往韶山的简易公路。

此信语言严谨庄重，“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几句，掷地有声，慑人心魄，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力量，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人民共和国创立之初，模范地实行并遵守国家的方针政策，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崇高风范。



## “请予酌办见复”

——致王首道<sup>[1]</sup> (1950年10月11日)

首道同志：

张次岑、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作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张、罗通讯处均是妙高峰中学。戴住新化，问罗先生便知。顺致

敬意

毛泽东

十月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王首道，1905年生，湖南浏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办事处委员、湘省临时委员会书记、代理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湘赣省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组织局秘书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军委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1935年到陕北后，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政委和三五九旅政委、湘鄂赣军区政委、中共湘鄂赣边区党委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交通部副部长和部长，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和法案委员会副主任、第二和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七届七中全会递补为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第十二、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当时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

### 【赏析】

张干少年丧父，家境贫寒，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后来成为优级师范高才生。他精明能干，活动能力较强，20多岁便当上了当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长。1915年湖南省议会颁布了一项新的规定，要求学生从下学期起要交10元学杂费。这项规定加重了学生

负担,更使像毛泽东这样家境贫苦的学生极为愤慨。一师师生议论纷纷,都说这个规定是张干为讨好当局而主动建议的。学生们一怒之下,纷纷组织起来罢课,要求将张干驱逐出去。学生们在校内外贴标语、发传单,揭露张干“不仁、不孝、不忠、不悌”之言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毛泽东亲自参加并组织了这次学潮。当毛泽东看到四处张贴的传单、标语把矛头对准张干的“私德”如何不好之类时,认为文不对题,没有揭露到张干的要害之处。要赶走张干,不是要反他没有当好家长,而是要反他办学无方,贻误青年,对上阿谀讨好,对下专横跋扈。于是,他重写《驱张宣言》,写得理直气壮,并连夜印发,将一师驱张学潮推向了高潮。为泄胸中私愤,张干当即决定挂牌开除毛泽东等17名学生。一师的教师杨昌济、符定一、徐特立等据理力争,迫使张干取消了自己的决定,不久张干即被免职。此后30多年间,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张干则淡泊明志,勤恳从教。

解放初期,张干因从教积累下田产而被划为地主,田产也被没收,一家六口人难以糊口,生活相当拮据。1950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的一师同班同学连同已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的周世钊将要赴京,张干便托向毛泽东问好,并请毛泽东原谅自己以前的作为,如有可能把生活窘困一事也向毛泽东反映。10月5日,在中南海住处,一师师生倾心交谈,气氛热烈。当毛泽东得知张干几十年从教以后,深有感慨地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很会讲话,三十不到就当第一师范校长,不简单。后来我不高兴他,是估计他一定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他要爬上去是很容易的,结果他没有,说明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要有一定的操守。”当周世钊谈及张干生活有困难时,毛泽东连声答应:“应该照顾,应该照顾。”并自责地说:“现在看来,当初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交10元学杂费也不能归罪于他。”从此,毛泽东对张干系念在心,再加上前不久收到的罗元鲲关于生活极苦,要求救济的来信,10月11日,毛泽东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这封信。

此信是围绕着两位教育界老人张干和罗元鲲以及袁仲谦遗孀的生活困难展开的。信的正文首先向王首道介绍了张干、罗元鲲两先生的情况。在这里,毛泽东不计前嫌,没有说他们过去如何如何,而是把他们视为湖南教育界的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进一步说明了两位老人的年龄情况,“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是指两位先生的历史和现实表现。“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干为校长,罗为历史教员”,表达了毛泽东对他们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就为拟请湖南省政府酌给津贴作了充分的说明铺垫。其次,毛泽东又谈及袁仲谦先生之遗孀70岁饿饭一事,情形大致相似,所以,亦请省政府酌以救济。最后,毛泽东强调:“张、罗、袁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

此信用朴实的语言,表达了毛泽东对三位老人的关怀和慰问。人逢七十古来稀。他们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应当让他们享受到新社会的温暖。何况他们终生为教,又没干坏事,保持晚节,这本身就值得尊敬,值得关心。但毛泽东的此信,以平等的姿态,用商量、斟酌的语气进行协商,而无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家长命令式作风。特别是信中“拟请”、“酌给”、“酌予”、“酌办”等语句的运用,充分表现了毛泽东对当地政府的尊重。王首道收到此信,立即派人督促办理,两次给张干送钱、送接济米若干,张干全家感动得热泪盈眶。

## “这是不可避免的”

——致陈叔通<sup>[1]</sup> (1950年12月18日)

叔老：

来示诵悉，已告陈云、薄一波<sup>[2]</sup>两同志酌办。全国有五百万工商户，其中商业行户大约有三百万，在整个经济事业由旧的轨道转入新民主主义轨道中，当有一大批商行和手工业需要转业和改组，这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敬问安好！

毛泽东

十二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陈叔通(1876—1966)，爱国民主人士。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甲午战争后，留学日本，参加过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抗战胜利前夕，不满蒋介石的反动独裁统治，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民主运动。1949年代表爱国工商业者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1966年2月在北京病逝。

[2]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参见本书第489页注[1]。

薄一波，1908年生，山西定襄人。原名书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支部书记，中共太原北部地区委员会副书记、书记，中共山西临时省委委员。1927年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中共北方局军委秘书长。1929年到中共顺直省委军委指导兵运工作。曾三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坚持斗争。1936年经组织营救出狱后，任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政委兼山西省第三行政区主任、专员。1940年后，任八路军太岳纵队、太岳军区政委，中共太岳区委书记，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太行分局委员，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45年，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1948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华北军区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197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机

械工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 【赏析】

建国初期,为了稳定物价,安定人民的生活,政务院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一些必要的管理措施,但是仍然出现了市场萧条、私营工商业大批停工歇业的情况。对此,陈叔通直接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己的看法,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陈叔通是清朝翰林,1898年参加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后,任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曾参加反袁护法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支持抗日救国运动,不畏敌伪高压威逼,毅然拒绝出任上海维持会会长。后来,积极参加筹备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建国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于许多重大问题,都亲自征求他的意见。毛泽东亲口对他说,你是清朝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经多见广,经验丰富,为了建设我们和平民主的国家,希望您要直抒己见。陈叔通十分感激地说:“有你和共产党的领导,我定尽自己的全力,将余生奉献给新中国”。陈叔通曾对人讲,他看到历代的最高统治者,都不可一世,毛泽东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毛泽东经常同他商谈国家大事,听取他的意见。他知道毛泽东喜欢他直言不讳,即使说错了,毛泽东也不会见怪,所以,陈叔通的心里话总是向毛泽东申诉,看到不正常的现象也可以开诚布公地畅所欲言,对于陈叔通这次提的意见,毛泽东非常重视,立即批示陈云、薄一波办理,并亲笔复函陈叔通。

此信敬呼“叔老”,信末“敬问安好”,反映了毛泽东对陈叔通的尊重。此时,陈叔通已届74岁高龄,仍为新中国的建设献计献策,体现了他为新中国建设尽职尽责、尽心尽力的崇高品格。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国外敌人总是盼望共产党的失败,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共产党的有些朋友也不无怀疑地说:“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对此,毛泽东乐观地答道:“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为了平抑物价,统一财经,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建立统一的财经领导机构,从东北调回理财能手陈云主持中财委,由薄一波协助工作,大胆统一财经管理和调整工商业。对商业和手工业进行转业和改组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困难虽比较多,但这是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必然。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党的工作中也确实存在一些缺点错误需要加以解决,一是平抑物价的措施有些过猛;二是工作中忽视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从而导致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信中,毛泽东适时地指出:“政府应当妥为指导这件事”。

这篇书信,篇幅虽短,但主题显明。全篇仅百余字,但恰当地回答了陈叔通来信中反映的问题。他借助数字说明商行和手工业的改造和转业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毛泽东对政府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这就更加增进了陈叔通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信赖,更加激发了他参政议政的工作热情,更好地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去。

## “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

——致周世钊<sup>[1]</sup> (1950年12月29日)

悼元兄:

嘱写的字<sup>[2]</sup>给你写了,不知可用否?

临行一信,长沙一信,都收到,很感谢!所说各事都同意,可以做(有些是要逐步地做)。师范教育会议,待与马先生<sup>[3]</sup>一谈,大略是可以的罢。

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论,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祝您及您的同事们工作顺利,新年快乐。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九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世钊,字悼元,当时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参见本书第387页注[1]。

[2]指毛泽东应周世钊的要求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书写的校牌“第一师范”和题词“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3]指马叙伦(1885—1970),教育家,爱国民主人士。字夷初,号石翁,别号寒香。浙江杭州人。1911年入同盟会,与章太炎在上海办《大共和日报》,任总编辑。后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员。五四时期被推为北京大学“教职员会”主席,积极支持学生运动。1921年成立“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被推为主席。1929年婚,三次任教育部次长及代理部长职。1936年1月北平文化界救国会成立,被推为主席,发表宣言,“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的誓言,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抗日战争时期,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5年12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6月被推举为上海各界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请愿的代表,在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打伤。1948年进入解放区,参加政协筹备工作。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会会员,教育部、高教部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还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第四届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70年5月在北京病逝。著有《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

## 【赏析】

1950年,当时任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周世钊给毛泽东写信,请毛泽东给一师写校牌和题词,询问毛泽东生活情况,并望他注意身体健康。毛泽东收到信后于12月29日,写了这封回信,并附了题词和题写的校名。

此信直呼“惇元兄”,读来亲切、自然,如同促膝倾谈,令人不能不感念遥远的时代。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以聪慧好学而闻名。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养成晏睡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勤勤恳恳,夜以继日地工作,老习惯依旧未改。周世钊在信中嘱他把身体健康当作大事来看待。对于故人的建议,毛泽东坦率而诚实地作了回复:“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按照太阳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一句,寓庄于谐,不仅表达了毛泽东对故人亲密无间的情感,而且体现了毛泽东通宵达旦,为新中国勤奋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



憶元元

頃會兩字給信書下，多矣

月香

臨終一信，長所一信，都收到，

報以書信，所謂多事都回意，

可以做事，  
有些重要處  
師兄，  
比犯十級教育會  
豫

待與馬先生一談，大有益處，以  
期新。

要腫的毛病正宜改以漢方  
丁未六月，按四太陽形事，雖  
月亮形事丁。但近日又為  
中，新定皮為再改正。

休息和注意。吃東西也注意。  
按之如所編，收之如所大  
事，不為心中事，就為  
常生財了。  
祝德及得同  
事們順利，  
新年快樂  
毛澤東  
十月

## “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致饶漱石、陈丕显<sup>〔1〕</sup>（1951年1月10日）

漱石、丕显同志：

黄炎培<sup>〔2〕</sup>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我将华东局去年十二月所发关于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及一月四日关于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他看，他比较懂得了一些。黄先生准备于本月内赴苏南各地去巡视，我已嘱他和你们接洽，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毛泽东

一月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饶漱石（1903—1975），江西临川人。曾用名梁朴。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任共青团满洲省委书记，曾代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32年后，任上海工联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和代理书记、新四军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政委兼华东军区政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1953年与高岗进行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1954年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被揭露、批判。1955年3月被开除党籍。是中共七大中央委员。1975年3月2日病死。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

陈丕显（1916—1995），福建上杭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杭县、福建省和中央儿童局书记。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任共青团闽赣地区中心县委书记、赣南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委书记、苏中区委书记、苏中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七纵队政委、中共华中工委书记、苏北兵团政委。建国后，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后调到上海，相继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并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后，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武汉军区政委。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当时任中共苏南区委员会书记，苏南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2〕黄炎培，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参见本书第382页第注〔1〕。

## 【赏析】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土地改革既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又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对此，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热情很高，认为这是前无古人的大事，而一部分地主兼工商业者却到处告状，叫喊“斗争过火”、“偏差很大”，要求“和平土改”等等。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甚至收到了地主的告状信。由于对土改情况不明，他对土改工作中的某些做法存有一些顾虑，常带着不安的心情和众多的疑问写信给毛泽东，并把这些地主的信件一同转达。毛泽东认为黄炎培参加政府的时间不长，对党的土地政策还不十分了解，又没有亲身感受，存在一些疑虑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况且土改本身难免会出现一些不足。为了让黄炎培了解我党的土改政策，毛泽东主动将党的有关土改文件送给他参阅。但这毕竟不是黄炎培的亲身感受。为了让他对土改工作有深入了解，毛泽东应黄炎培要求介绍他到苏南实地考察。临行之前，毛泽东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写了这封信。

此信开门见山地指出：“黄炎培先生收到许多地主向他告状的信。”为了让他明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毛泽东主动将纠正肃反工作中缺点的指示和纠正土改工作中缺点的指示送给黄炎培看，让黄炎培了解到中央关于土改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这说明毛泽东对黄炎培的关心和帮助。对于黄炎培赴苏南地区巡视，毛泽东特别嘱咐饶、陈：“到时望将全面情况和他详谈。”

此信虽短，却内涵丰富。土地改革是一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也是对部分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教育的运动。在全国统战会议上，毛泽东专门布置了民主人士考察土改的事，让他们到各地考察，听听农民的苦诉和欢乐，对照一下地主的苦诉，从中受到教育。同时指示，土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也可以让他们提提，这是一件有益的事，没有什么值得怕人的。所以信中嘱咐一定要予以接洽，向黄炎培反映实际情况。这反映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与民主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崇高风范。

## “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

——致张澜<sup>[1]</sup>（1951年1月22日）

表方先生：

西南局书记邓小平<sup>[2]</sup>同志给我的报告一件，送上请察阅（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可以看出西南工作的一般情况。阅后请予掷还。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张澜，字表方，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参见本书第374页注[1]。

[2]邓小平，参见本书第527页注[1]。

### 【赏析】

1949年9月，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召开，张澜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此时他虽已年近八旬，却愿为共和国的新生努力地工作。在新中国“一化三改”过程中，张澜欢欣鼓舞，并主动要求深入农村参加这场声势浩大的土改运动。毛泽东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劝其不要亲自参加土改，但经常批送有关文件给张澜看，以便及时听取他的意见。

1951年1月，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将西南局1950年11月、12月的工作情况给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着重汇报了农村减租、退押运动开展的情况和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情况。这份报告涉及土改工作，又是张澜老家一带的情况，所以毛泽东阅后送给张澜一阅，并附上了这封短信。当时张澜已79岁，身体欠佳，但仍关心国事，努力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发挥余热，这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为了让他了解到四川一带的土改情况，毛泽东特送上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但又怕累坏了张澜的身体，所以特地加了“可要您的秘书念给您听”一句，体现了毛泽东对张澜的悉心关怀。阅后予以“掷还”一句，体现了毛泽东的谦虚。“先生身体好吗？甚为系念”一句，表达了毛泽东的牵挂之情，读来亲切自然，感人肺腑。信中字字句句洋溢着毛泽东炽热深沉的情怀。张澜看了毛泽东的信及所附报告后，深为感动。1月24日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了土地“退押”以及对特确有困难的中小地主，多在“缓、少、不”三字上做文章，对顽固的则交法庭“处理”的建议。毛泽东收到信后，认为张的意见极好，并将张澜的信转给邓小平参考。这看似一件小事，实则反映了毛泽东与党外人士共商国事、相互尊重的崇高风范。



方先生：

西南局書記部，于日前給我的

報告，係送上情家不說，可

多生出西南局的一般情況。

閱後，請予擲下。先生身體

好嗎？甚為慰。順致

敬意。此致

## “计划轮番作战兵力”

——致周恩来<sup>[1]</sup>（1951年2月7日）

恩来同志，并告聂<sup>[2]</sup>：

在你计划轮番作战兵力时，请将杨得志<sup>[3]</sup>三个军，西南三个军（先开两个，另一个军于到达河北后教育两星期接着开），杨成武<sup>[4]</sup>两个军（在六十六军及五十军回来接防后开），四十七军（二月底集中岳州，三月初开东北，训练两星期开前线）及董其武<sup>[5]</sup>兵团两个军（先补充一万人，武器方面似亦须有所改善，准备四月间开前线负守备任务），编成为第二番作战兵力。而以现任第一番作战兵力中的第十三兵团六个军撤至后方补充休整三个月至四个月（其中五十军六十六军并同时担任天津营口线守备，其他四个军位于平壤沈阳之间休整），改为第三番作战兵力。九兵团全部则回华东任守备。补充计划，九兵团回华东再补，十三兵团需于撤到休整地点后即予补足。西南已到之两个军，杨成武两个军，董其武两个军，须令其立即开始出境作战的各项教育，应召集这些军的负责人来京开会授予任务。西南第二期三个军，须令其于二月准备完毕，三月开始出动，四月到达河北。

毛泽东

二月七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刊印

### 【注释】

[1]周恩来（1898—1976），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淮安。字翔宇，曾用名飞飞、伍豪等。1917年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回国，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领导人，并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支部领导人。1924年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会委员长等职。1925年参加领导两次东征。1926年冬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中共江浙区委军委书记。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同年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军委书记。后又任改组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共全面分裂后，同贺龙、叶挺、朱德等一起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1928年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委书记。后在上海参加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31年1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兼第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领导和指挥红军取得

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4年10月参加领导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继续被选为中央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全权代表与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同蒋介石谈判,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使团结抗日局面在中国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代表中共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先后领导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工作。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制止内战,率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1946年11月返回延安,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解放战争,同时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运动。建国后,一直任政府总理,并一度兼任外交部部长。曾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二和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是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和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长期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和毛泽东等人一起为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进行了巨大的组织工作。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主张经济建设必须积极稳妥,综合平衡。对社会主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在国际事务活动中,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提出了外交工作中一系列具体、灵活的方针和政策。1954年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关系的准则。1955年在万隆会议上,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方针,使会议通过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曾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文化大革命”中,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维持党和国家的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尽可能地挽救被他们严重破坏了了的国民经济。1975年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中国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编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等。

[2]聂、指聂荣臻,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参见本书第314页注〔6〕。

[3]杨得志(1910—1994),湖南醴陵人。1928年参加工农革命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连长、红四十五师九十三团团长沙、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一军团一师副师长、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五团团长、三四四旅副旅长和代旅长、冀鲁豫支队支队长、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二兵团司令员和十九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任陕西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和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国防委员会委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九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

委员、中顾委常委。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

〔4〕杨成武，1914年生，福建长汀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四军三十二团政委、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师长兼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团长、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冀中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三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委、华北野战军三兵团司令员、中央军委直属二十兵团司令员。建国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兵团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第一副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

〔5〕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县人。19岁入阎锡山在太原创办的斌业中学(也叫学兵团)。1924年到洛阳投效国民军二军。后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北伐先遣纵队支队长、副团长。1929年初投奔傅作义。九·一八事变后，他向傅作义呈递请战书。1933年5月23日奉命守卫北平，重创日军。1936年冬，参加绥远抗战，率一旅之师，夺取了红格尔图。1937年8月13日率兵收复察北重镇商都；10月参加忻口会战，率兵奇取板垣日军师团司令部；11月坚守太原。1939年12月中旬至1940年5月参加包头、绥西、五原三大战役。因抗日战功卓著，得到连连晋升和奖励。1940年7月任暂编第四军军长，1941年任骑兵第四军军长，1942年任第三十五军军长。不久到重庆陆军大学学习。1945年任第十二战区政治部主任兼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先后任暂编第三军军长、张家口警备总司令、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绥远省保安司令和驻绥部队指挥所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9月19日率部五万余人起义，绥远和平解放，得到毛泽东、朱德、聂荣臻的高度赞扬。21日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12月被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为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1951年9月3日率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抗美援朝，获朝鲜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11月底回国。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198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1988年7月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1989年3月3日病逝于北京。当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

## 【赏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珍惜、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治理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然而，美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它在中国和亚洲的失败，于1950年6月，悍然发动侵朝战争，并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毛泽东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毅然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部为骨干组成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利用诱敌深入、寻机歼敌的战略战术，抓住敌人恃强傲慢的心理和对志愿军的错误判断，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接连取得了第一、第二次战役的重大胜利，迫使美军由进攻

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12月14日,美国打出了“先停火,后谈判”的幌子,以诱使我志愿军停在三八线以北。毛泽东针锋相对,指出,志愿军必须乘胜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以创造政治上、军事上更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在连打两仗、未得休整补充的情况下,同朝鲜军民一道,于1月18日又取得了第三次战役的胜利,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以南80余公里。入朝三个月,连战三捷,志愿军取得了重大胜利,部队士气空前高涨。但是由于连续作战,部队减员较大,十分疲劳,急需休整补充,并且随着战线南移,后勤运输线延长,加上美国飞机狂轰乱炸,运输更加困难。但要达到解决朝鲜问题的目的,必须再进行几次激烈的大规模作战。为迎接更大规模的作战,1951年2月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这封信。

此信讲明了毛泽东就志愿军轮番作战和出境作战前要进行教育的意见。

首先,志愿军入朝轮番作战,是根据朝鲜战场和我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作出的决策。虽然志愿军在没有强大空军、海军支援配合且自身装备落后的情况下,仍然战胜了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但由于敌我装备相差悬殊和受朝鲜特殊地理环境的限制,志愿军也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困难:一是难以歼灭敌军重兵集团,二是作战物资运输困难,三是白天没有行动自由,四是朝鲜幅员狭小、三面环海、南北狭长的地理特点,不便于实施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采取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的策略,做好了谈谈打打、边谈边打的准备,在军事上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其次,对部队出境入朝前进行教育是由志愿军的使命和宗旨决定的。早在1950年10月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时,毛泽东主席就在签署的命令中指出,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到朝鲜后更要切实遵守,不能侵犯群众利益,人民的风俗习惯必须切实注意,只有搞好群众关系,取得群众的帮助,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还具体指出:“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挥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最后胜利就一定得到。”正是因为有了入朝前的教育,志愿军各部队才始终把团结朝鲜人民作为重大的政治任务。在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广大指战员,遵守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严格执行政治纪律和军事纪律,利用作战的间隙积极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春耕秋收、修渠治水等生产活动以及防疫救灾活动,涌现出了一些为保护朝鲜人民的利益英勇献身、被中朝两国人民广为赞颂的国际主义战士。志愿军与朝鲜人民以兄弟般的团结,发扬生死相依、同仇敌忾的国际主义精神,保证了战争的最后胜利。

通篇书信自始至终体现了伟大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毛泽东在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上部署的周密,同时也反映了毛泽东与美帝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巨大勇气和坚定信心。

## “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

——致黄炎培<sup>[1]</sup>（1951年2月17日）

黄任老：

刚才送上广东纠正宽大无边情报一份，现又送上广西的一份，请参阅。这两处是最典型的例子，其他地方不如此两处之甚，但亦大体相去不远，引起群众不满，极为普遍。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总之，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当然，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处徒刑，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不要杀。如同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已经解决了问题，群众已经满意的地区，即不应再杀人了。顺致敬意！

毛泽东

二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参见本书第382页注[1]。

### 【赏析】

新中国成立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上残留了大量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纠合起来，内外策应，千方百计地妄图颠覆我新生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对于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毛泽东强调，胜利的人民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1950年10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的指示》。从此镇反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为了统一思想，加强与民主党派的合作，毛主席及时向民主党派通报情况，阐述党和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态度、主张，以及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措施。1951年2月17日，毛泽东派人给黄炎培送去广东、广西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纠正宽大无边情况的材料各一份，并写了这封信。

信中首先谈了镇压反革命的重要性、必要性，指出：“不杀匪首和惯匪，则匪剿不净，且



越剿越多。不杀恶霸，则农会不能组成，农民不敢分田。不杀重要的特务，则破坏暗杀层出不穷。”“对匪首，恶霸，特务（重要的）必须采取坚决镇压的政策，群众才能翻身，人民政权才能巩固。”然后，信中用“当然”一词转折，辩证分析，对可杀可不杀的那一部分人，应当判刑或进行劳改，可以不要杀。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无边是不对的，应到群众满意为止。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在制定镇反策略时，首先考虑的是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他指出，镇反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全党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取得各界人民的拥护，从而加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曾经讲过的那句话：“只有让人民来监督，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此信通篇围绕镇反层层展开论述，指出在当时形势下，只有坚决镇压匪首、惯匪、恶霸和重要的特务，才能巩固人民政权。这篇书信有以下几方面的特色：一是用反面的论证激发读者的认同感；二是简洁明快，排比语言的运用，唤起了读者的紧迫感；三是深刻丰富的辩证思想。“宽大应有边，镇压也应有边”一句，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思想和严谨求实的态度。

## “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

——致李达<sup>[1]</sup> (1951年3月27日)

鹤鸣兄：

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sup>[2]</sup>，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

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三月二十七日

《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选集时拟加修改，此外暂仍照原。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李达(1890—1966)，湖南零陵人，号鹤鸣，字永锡。笔名有达、江春、胡炎、李特等。早年入京师优级师范学堂学习。1913年赴日本留学。1920年回国后，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被选为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次年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3年因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争执而脱党。北伐战争中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兼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阐述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大革命失败后，长期在白区从事教学活动，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1949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后，历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6年在武汉病逝。著作有《〈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社会学大纲》、《现代社会学》，主编《唯物辩证法大纲》等，并有多部译著。当时任湖南大学校长。

[2]毛泽东对李达的《〈实践论〉解说》稿第二部分的主要修改有下列几点：（一）在谈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民那时还不

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二)在谈到孙中山当年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完全以清政府为对象,从未提起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加写了这样一句话:“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三)《解说》中谈到“唯物论的‘唯理论’是今日教条主义的来源,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今日经验主义的来源”。毛泽东修改为:“唯物论的‘唯理论’与今日教条主义相象,唯物论的‘经验论’则与今日经验主义相象。”

## 【赏析】

李达和毛泽东同是湖南人,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早在延安时期,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并在书上作了许多批注。解放后,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公开发表后,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李达对这“两论”作了通俗解释,写成两本解说稿,寄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看了《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后,写了这封回信。

此信直呼“鹤鸣兄”,足见毛泽东与李达的亲密关系。他们俩见面,彼此互称其字的事,已传为佳话,由此信可见一斑。然后,毛泽东称赞“这个《解说》极好”。毛泽东一贯主张一切有相当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革命理论,并经过他们的研究向水平较低的同志进行宣传和讲解。而在建国初期,由于中国人民普遍文化较低,抽象的理论很难达到全面的普及。因此,毛泽东在信中指出:“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这就对李达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信的最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并鼓励李达“多多写些文章”。

此信反映了毛泽东对革命理论宣传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空前伟大的建设和革命,深入普遍地研究革命理论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解决的大问题。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反之,就会妨碍人民群众特别是干部和学生的成长进步,就会影响他们建设新中国的积极性,影响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他的这封信,不仅是对李达本人研究的重视,更是对一切革命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视。

1951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指出,在学习问题上存在着忽视理论的经验主义的危险倾向。因此,全体党员要在统一的制度下无例外地,不间断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高级干部应该做全党勤奋钻研理论的模范。各地根据中央的决定,制定出了实施办法,按照党员干部不同的文化理论水平,进行了编级,规定了学习内容、学习期限和考试制度,选拔、培训了一大批专职或兼职的理论教员,在全党掀起了一个比较正规的理论学习的热潮。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迫切需要毛泽东思想的通俗读本,李达的这一工作,正适应了理论学习的需要,因此,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他曾经给予李达很高的评价:“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接过硬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如此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 “似以不印为宜”

——致毛宇居<sup>〔1〕</sup>（1951年4月5日）

宇居兄：

历次各信及最近长函均收，甚谢。诸承关怀，具见盛意。惟轶事<sup>〔2〕</sup>有些内容不适合，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复颂  
兴居佳胜！

毛泽东

四月五日

乡友便祈致候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毛宇居（1881—1964），亦作璇珠，禹居，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堂兄和私塾老师。1915年参加过护国战争。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抗日战争期间曾协助韶山党组织照顾毛泽东的侄儿毛楚雄。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2〕指毛宇居撰写的《毛主席轶事》。文中记述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热爱劳动、关心农民疾苦和勤奋学习等一些情况。

### 【赏析】

作为堂兄和私塾老师，毛宇居对毛泽东少年时代的学生生活和成长过程非常熟悉和了解。他努力搜集整理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竭尽全力地向前往韶山参观的中外友人介绍。当时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锐，曾来韶山收集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事迹。毛宇居向他提供了许多难得的材料，为李锐后来撰写《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打下了基础。毛宇居还曾写过两首诗：“南峰茅庐主席家，风光犹是朴无华，往来过客人言籍，此地频开革命花。”“有询先世事如何，木石居兮击壤歌，积厚流光越时代，发扬光大起山河。”对毛泽东的爱戴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正是出于对毛主席的衷心爱戴，1951年3月，毛宇居将毛泽东青少年时的一些轶事加以整理后寄给毛泽东，请求发表。毛泽东对这类宣传都比较谨慎，不喜欢宣扬自己，他看了此文后，便将其退给毛宇居，并给他写了这封信。

信文直称“宇居兄”，读来亲切感人，表现了毛泽东与堂兄兼老师毛宇居之间亲密无间

的情谊。毛宇居经常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家乡情况，交流思想。为宣传领袖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言行风貌，他又专门写来长信。“甚谢”一词，准确地表达了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意味深长地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一个原则问题，也是保持团结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犯过大错误，而且工作有了很大成绩的人，也不要骄傲。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正是为了防止歌功颂德现象的发生，毛泽东才在信中托辞“惟轶事有些内容不适合”，提出“似以不印为宜，原稿奉还”。歌功颂德，是封建帝王所好，人民领袖永远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应该歌颂的是人民的创造，人民的业绩。

通篇仅60余字，却字字珠玑，既富于情感，也不乏睿智，深沉含蓄而又真挚动人，使人读后不仅叹其字句之简约，更仰其灵魂之高尚。

## “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

——致张元济<sup>〔1〕</sup>（1951年7月30日）

菊生先生：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今年四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六日三次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积雪西陲一诗甚好。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尊恙有起色，甚为以慰。此复。

敬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十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张元济（1867—1959），字菊生。浙江海盐人。光绪进士。曾任清刑部主事，总理衙门章京。中日甲午战争后，痛感非改革无以救中国，参加戊戌变法运动。“百日维新”期间，被光绪帝召见，询问办理北京通艺学堂情况，继而递上新政奏议，请改官制，废跪拜礼仪，建议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等，戊戌政变时，被革职永不叙用。后到上海南洋公学办理译书事宜，不久，接任公学总理。以后又加入商务印书馆，旋任总经理，致力于文化出版事业。曾校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四部丛刊》等。解放后，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著有《校史随笔》、《涵芬楼烬余书录》等。

### 【赏析】

张元济是清末戊戌科技元，早年曾与康梁等共谋变法维新，后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一道游天坛，与毛泽东合影留念。在京期间，张元济深为祖国迎来和平盛世而欢喜，对新中国建设提出了许多合理化建议。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昌都。张元济闻讯满腔欢喜，诗意驰骋，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反映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先后寄去存诗《积雪西陲》和《西藏解放歌》。

几个月以后，毛泽东百忙之中，给张元济写了这封信。

此信亲切地直呼“菊生”，对张元济三次写信一事，毛泽东谨谢厚意。然后，毛泽东称颂“积雪西陲一诗甚好”。全国统一，大势所趋，众望所归，张元济的诗作也反映了毛泽东



的心愿。

1950年10月,为了早日驱逐西藏的帝国主义势力,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条件,进藏人民解放军强渡金沙江,解放昌都,打垮了藏军主力,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1951年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签订了协议,西藏解放指日可待。因此,毛泽东在信中说:“由于签订了协定,我们的队伍不久可以到拉萨了。”此信还对张元济的病情好转表示欣慰。

这篇书信不足百字,但内容高度概括,字斟句酌,既有对张元济先生的尊敬,又有对诗作的评价;既有对形势的预测,又有对张元济身体的关心,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爱国民主人士的信任和关怀。在毛泽东的关怀和帮助下,张元济更加努力地参政议政。虽在晚年瘫痪不起,但仍为国家的建设大业操劳不已。

## “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

——致陈叔通<sup>[1]</sup>(1951年10月14日)

叔老:

十月九日惠示敬悉,谢谢您。看土改事,同意您的意见。惟冬季气候是否适于先生身体,请加考虑,春季去似乎好些,那时还有土改。又先生这样高龄,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并且看可以多走地方,做则限于一区一乡。还有,不单是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

有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可以一阅,阅后请于掷还。致以敬礼

毛泽东

十月十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陈叔通,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参见本书第420页注[1]。

### 【赏析】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大事。民主人士极为关注,热情很高,但对于土改政策,有许多人不理解,有看法。而陈叔通非常拥护党的土改政策。他不仅坚决支持土改,而且还想亲自到农村参与土地改革工作。毛泽东被其老骥伏枥之心所感动,但考虑他已届75岁,年事已高,便复了这封信进行劝说。

信的开头,毛泽东亲切地尊称“叔老”,其敬仰之情溢于笔端。“惠示敬悉,谢谢您”一句,深切地表达了毛泽东对陈叔通老当益壮的革命热情的尊敬和谢意。接着,毛泽东从季节、年龄、方式方法上进行了善意的劝告。考虑到陈叔通年事已高,在季节上劝其“春季去似乎好些”,在方式方法上劝其“只宜去看土改,不宜去做土改”。“如果精力上顾得及的话”,这是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不单视察土改一事,“抗美、镇反、生产、教育、统战等工作都宜在视察之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政治状况和社会、历史等都有许多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所以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张采取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为此,特向陈叔通推荐一份关于西北少数民族工作的报告以便让陈叔通全面详细地了解土改政策。

此信紧紧围绕着土改一事展开,更多地表现了毛泽东对陈叔通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但信中感人之情,全然隐没在字里行间,通过不厌其细的语言,层层分析,屡屡劝告,处处为陈叔通的身体考虑而表现出来。此信语气庄重恳切,真挚感人。

在毛泽东的关怀下,陈叔通亲自视察了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新农村,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写了题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反映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密切关注。

## “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

——致毛泽连、毛远悌<sup>〔1〕</sup>（1951年12月11日）

泽连、远悌：

来信收到。

慰生六婶<sup>〔2〕</sup>及泽连均不要来京，也不宜在长沙住得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长沙住得太久。

泽连家境困难，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

远悌在印厂工作，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

请你们代我问六婶好！

祝你们都好！

毛泽东

十二月十一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毛泽连（1913—1995），号润发，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农民。毛泽东的堂弟。

毛远悌，1924年生，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毛泽东的堂侄。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工农印刷厂经理，湖南省医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等职。

〔2〕慰生六婶，指毛陈氏（1887—1952），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堂叔毛慰生的妻子，毛泽连的母亲，当时患病在长沙治疗。

### 【赏析】

1949年10月，毛泽连辗转来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热情接待。随后毛泽连在中共湘潭县委的帮助下，把生病的母亲送到湘潭医院治疗，治疗了一段时间，却不见有好转，只好转送长沙湘雅医院。这时毛泽连找到了在长沙工作的毛远悌，二人商量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急信。毛泽东接到信后，回了这封信。

此信针对毛泽连和毛远悌的写信意图，开门见山地指出：“慰生六婶及泽连均不要来京”。早在北京接见毛泽连时，毛泽东就心情沉重而又温和地说：“泽连的困难我知道，我了解，不过，我是国家主席。我只能解决大多数人的困难，要为大多数谋利益。如果只能

解决一个人的困难，只考虑自己的亲属，那么我这个主席就当不成了，泽连的困难要靠当地政府解决。”“我现在当上国家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为人民服务，替人民办事，不能和封建社会一样，一当上皇帝，亲戚朋友都跟着沾光，都来享受，这些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作威作福。”在毛泽东看来，作为共产党人，作为革命者，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工农劳苦大众，要为绝大多数人谋福利，而不是为少数人谋福利，所以，对亲属来京要求，几乎全是一概拒绝。不仅如此，就连在长沙住院也要求不宜住太久，“诊病完了即回韶山为好”。在信中，毛泽东鲜明指出：“现在人民政府决定精简节约，强调反对浪费，故不要来京，也不要长沙住得太久。”对于毛泽连的家境困难问题，他指出：“待将来再设法略作帮助，目前不要靠望”。信尾，毛泽东还嘱咐毛远悌：“可在工作余暇进行学习。”

通观全篇，语气恳切庄重，语言简洁明朗。“不要来京”、“不宜在长沙住的太久”等话，看似无情，恰更有情，情中寓理，理中含情，不仅表现了毛泽东对亲人的关切之情，也反映出毛泽东不搞特殊、严以律己、廉洁奉公的伟人风范。

此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给毛泽连寄去了200元钱，以作六姊治病之用。

## “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

——致张有成<sup>[1]</sup>（1952年7月7日）

有成兄：

前后来信都收到了，谢谢你。你于阴历五月初一给我的信很好，使我晓得乡间许多情形。粮亏猪贱、近月好些否？文家诸位给我的信均收到，便时请你告他们一声，并问他们好。乡里禁酒是因缺粮，秋收后可能开禁，你们也可以喝一点了。此复。

顺问

安好！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张有成（1886—1953），湖南韶山市大坪乡新联村人，木工。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大革命时期曾参加韶山农民运动。

### 【赏析】

1952年夏天，湖南湘乡大坪一带粮食歉收，口粮紧缺。为了节约粮食，乡政府提出禁止酿酒。毛泽东少年时的好友张有成和当地人一样，有喝酒的习惯，也有用稻谷和大米酿酒的习惯，因而对禁令不满，又因为粮食紧缺，没人能养得起猪，猪价低贱。张有成把这两件事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不禁想起过去的往事：1925年，毛泽东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遭国民党兵追捕，因张有成掩护而脱险。解放后，毛泽东不忘旧情，曾托人捎信到韶山，请张有成、毛宇居等赴京叙旧。张有成返乡后，常写书信向毛泽东反映乡间民情，毛泽东因此了解了许多情况，对于张有成的来信，也是有信必复，或叙旧，或解答问题。此信便是其中的一封。

此信首先对张有成敢于反映情况一事，表示感谢，并为了了解到许多乡间情况表示满意。关于张有成对乡里禁酒不满一事，毛泽东没有批评，而是耐心地进行说服、解释。信中对“粮亏猪贱”极为关切。为了节约粮食，杜绝浪费，只有宣布禁酒。像张有成这样的农民不理解就要宣传，只有宣传群众，才能发动群众、团结群众，一道前进。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以高度的党性开展党的工作，对群众要进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鼓动，要在群众中作演说，作调查，要询问和关心群众的生活，对损

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进行劝告、制止、解释,决不能听之任之。他认为,共产党员应该是群众的朋友,是诲人不倦的教师。对于落后的群众,共产党员不应该轻视他们,而应该亲近他们、团结他们,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鼓励他们前进。

此信写得真诚、含蓄、情理交融。“粮亏猪贱,近日好些否”一句,体现了毛泽东对乡亲们的关切之情,也是对张有成的亲切问候。对于文家的来信,毛泽东也很挂念,但因工作繁忙,只好代问他们好。对于“禁酒”,毛泽东耐心地进行解答,并指出这不会是长期的,秋天粮食丰收后,可能开禁。如此劝慰,亲切而又耐心,读后让人肃然起敬。



##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

——致黄炎培<sup>[1]</sup>（1952年9月5日）

任之先生：

北戴河的信、九月四日的信及讲稿<sup>[2]</sup>，均已收到，甚为感谢。

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是否妥当，还祈考虑酌定。

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例如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消灭个人主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或者如先生所说“没有劳动，没有生活，不从劳动以外求生活，不从自力以外求生活”，这就是要求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这些对于少数进步分子来说是可能的，当作一个阶级，则不宜这样要求，至少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不宜如此宣传。

当作一个阶级，在现阶段，我们只应当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亦即接受共同纲领，而不宜过此限度。

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sup>[3]</sup>，这就是工人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领导，也就是共同纲领所规定的。

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

今年上半年北京的《学习》杂志<sup>[4]</sup>上有些写文章的同志曾经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我们已叫他们作了更正。

对于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我同意先生的意见，可以向他们宣传社会主义，使他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我想这是可行的，也是有益的。在中国的条件下这样的人可能出现，特别是在几年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更加壮大，更加显示它对于国家和人民的伟大贡献的时候，这样的人可能逐步地多起来。

先生近来思想前进甚快，例如北戴河信上所说国家主权的思想，此次所说社会主义的思想，都表示这一点，但在现在却是言之过早，在少数人想想是可以的，见之实行则是不可以的。因为先生对于我的高度的信任，故率陈鄙见如右<sup>[5]</sup>，是否有当，还祈审察赐教。

日内如有暇，想和先生面叙一次。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九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 【注释】

〔1〕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参见本书第382页注〔1〕。

〔2〕指黄炎培1952年9月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

〔3〕“五毒”，指一些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

〔4〕《学习》杂志，是中共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帮助干部学习理论的刊物。

〔5〕原信系从右至左竖写，“如右”即“如上”。

## 【赏析】

1952年初，继在国家工作人员中开展“三反”运动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又领导全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五反”运动。本来这是一场针对不法资本家腐蚀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偷漏国家税收、盗窃国家资财、在国家定货中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行为所进行的斗争，但却给大批工商业者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恐惧心理，他们担心财产被没收，无心经营，挥霍无度。在上海等大中城市几度出现“繁华盛景”。更有些资本家自杀。面对种种反常现象，黄炎培写信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亲自邀黄炎培面谈，对民主建国方针、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私人资本发展的限制、民建吸收会员的对象，以及“三反”、“五反”运动后民建吸收会员的标准等重要问题一一作了明确指示。毛泽东还鼓励黄炎培多向工商业者做些解释说明和帮助教育工作，黄炎培当即表示：一定不负重托，大胆工作，力争做出成效。

1952年9月，民建北京市分会召开会员大会，黄炎培事先认真准备了讲稿，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9月4日，黄炎培将讲稿寄送毛泽东审改。毛泽东接到讲稿，认真作了修改，第二天给黄炎培写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对黄炎培的努力工作表示感谢，然后一分为二地分析了黄炎培的讲稿。首先，毛泽东肯定了黄炎培讲稿的用意，接着指出了讲稿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一、把讲稿中“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二、把讲稿中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把帮助资本家“改造思想”，改为帮助资本家“改造那些坏思想，那些不合乎爱国主义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所谓“五毒”思想；三、在讲稿中“资产阶级分子有坏的，也有好的”一句之后，加写上“就资产阶级的大多数人来说，一个人的思想中有坏的方面，也有好的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掉坏的方面，发展好的方面”；四、在讲稿的最后一段，毛泽东加上一段话：“我们在现阶段对于资产阶级的多数人的要求是如此。但在中国的条件下，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人，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可能超过上述要求，而接受工人阶级的基本思想，即社会主义思想，而对社会主义事业发生兴趣。他们一面开工厂，并不要求马上变更自己的成分和事业；一面看到社会主义事业对于人类的

伟大贡献,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这种人是可能有的,我们应该表示欢迎。”

此信内涵丰富,条理清晰,分析辩证。“五反”斗争,是打击资产阶级违法活动的重大措施,是工人阶级同不法资本家之间的阶级较量,为了领导好这场斗争,毛泽东还特别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按照《共同纲领》办事,并掌握一条政策界限,就是违法不违法。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范围内的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这个范围就是不合法。毛泽东指出:“违法不违法,对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标准”,而不能一律按照社会主义的思想进行改造,这不是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改变,而是因为当时搞新民主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应削弱资产阶级,不应消灭资产阶级。黄炎培想帮助资产阶级一下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观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是接受不了的。当时只可能要求资产阶级少数进步分子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资产阶级的阶级整体则只能责成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所以,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指出:“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让资产阶级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与黄炎培有类似思想观点的还有当时理论界的几位同志,他们在中宣部主办的《学习》杂志上发表文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还存在两面性。毛泽东发现后,批评得相当严厉,中宣部为此专门作了检讨,对资产阶级的整个阶级,宣传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但对于其中的进步分子,“那些有远见的人们”,则可以宣传。这就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在与资产阶级斗争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的工作思路。

此信结构严谨,逻辑严密,采用对比和举例法,加深了人们对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在语言运用上,采取简洁、热忱的基调,增强了书信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

——致齐白石<sup>〔1〕</sup>（1952年10月5日）

白石先生：

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齐白石（1864—1957），画家，诗人，篆刻家。原名纯芝，字渭清，号兰亭，后改名璜，字濒生，号白石。湖南省湘潭县人。早年曾为木工。1890年后，学习绘画、诗文、篆刻、书法。1919年，定居北京，以篆刻、作画为生。1927年，被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和京华美术专科学校聘为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美术学院名誉教授、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成员、中国画研究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画院名誉院长。1953年，国家文化部授予他“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荣誉奖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授予他共和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荣誉状。1956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决定他为1955年度国际和平奖金的获得者。1957年9月，在北京病逝。遗作有《齐白石作品集》。

### 【赏析】

新中国的诞生，给人民艺术家们带来了崭新的艺术感受和无穷的创作源泉，出现了一些反映解放，歌颂领袖，歌颂人民新生活的好作品。1952年，齐白石满怀对毛主席、对新中国的无比热爱，与徐石雪、于非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等艺术界同仁，共同创作了以反映新中国诞生为题材的图画《普天同庆》，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于同年10月5日，写了这封感谢信。

《普天同庆》寄托着作者们的阶级情感，铭铸了作者对毛泽东、对新中国的热爱。齐白石生在贫苦家庭，自小就有强烈的正义感。他多次以画作枪，反对国民党的昏庸统治。建国前夕，毛泽东曾亲自致信齐白石，让他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齐白石抚今思昔，无尚感慨，欣喜万分，不顾86岁高龄，决心拼却一生，用艺术的辛勤耕耘报答人民。《普天同庆》一画反映了一个时代的转折开篇，浓缩了全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喜悦之情，展示了中国由此告别百年磨难、步入繁荣昌盛的新气象。此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对人民艺术家的尊重和关切。

中央人民政人府民革軍事委員會

白石先生

承贈著天國廣譜書一冊

此書已收到甚為感佩

何為創作者白石先生

汪先生胡佩倫東子家

博覽古今圖松房瑞

謝意

九日

## “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

——致彭德怀(1953年6月21日)

彭德怀<sup>[1]</sup>同志：

六月二十日二十二时电悉。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毛泽东

六月二十一日

根据军事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刊印

### 【注释】

[1] 彭德怀，参见本书第291页注[1]。

### 【赏析】

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五次战役，把美军从鸭绿江边一步一步赶回了“三八线”以南。从此，朝鲜战争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中朝联军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先后粉碎了敌人1951年夏秋的局部攻势，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粉碎了1952年的春夏巩固阵地作战，不仅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而且使敌人连续遭到惨重损失而不得不进行谈判。从1951年6月开始，朝鲜战争形成边打边谈、打谈交织的复杂斗争局面。

1952年秋，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发起了上甘岭坑道作战。同时，发起对美七师占领的597.9高地战役。11月5日，彻底打垮美七师，收复高地。11月25日，进攻了四十三天的美伪军伤亡惨重，美七师、伪二师被迫撤下整补，上甘岭战役至此全部结束。进入1953年以来，中朝联军和联合国军沿着“三八线”地区一直形成对峙局面。这时的朝鲜战场上集结三百万军队，其中联合国军总兵力为一百二十万人，中朝联军总兵力达到一百八十八万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火力也有较大加强。敌我双方实力的转换，迫使美方首席代表哈里逊不得不再一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1953年4月20日，中断六个月的朝鲜停战谈判复会。6月8日，关于遣返战俘问题也达成了协议，5月16日，美国政府作出停战谈判的决定。不久，朝鲜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签字仪式正在筹划之中。

1953年6月19日，彭德怀从北京赴开城，准备办理停战协议签字事宜。20日，途经平壤。鉴于南朝鲜方面破坏停战，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提出：“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须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毛泽东收到电报后，即复此电。



战争是敌对双方你死我活的残酷较量，来不得半点的“仁义道德”。落井下石，引君入瓮，乃是军事斗争常用的谋略手段。《兵经百字·发》：“制人于危难，扼人于深绝，诱人于伏内，张机设阱，必度其不可脱而后发。”意思是说，要乘敌人危难之时将其制服，引诱敌人至深绝之处将其歼灭。毛泽东充分肯定古代兵家这一谋略思想，认为在战场上大讲仁义道德将会成为宋襄公式的笑柄。他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讽刺宋襄公，就是因为战场上的对抗双方，不共戴天，你死我活，有彼无我。

毛泽东分析朝鲜战场形势时说：如果不和，对美帝国主义不利，因为：一是要死人；二是要用钱；三是要克服国内的矛盾；四是美国的战略在欧洲，并没有料到中国出兵。所以骑虎难下。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帝国主义是要争取讲和的。但是，毛泽东深知敌人要求停战谈判是被迫的，其帝国主义的本性难以改变。为了防止谈判期间敌人可能玩弄的各种阴谋伎俩，确保停战协议签字后的和平局面，毛泽东指示，要提高警惕，必须准备对付在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举行大规模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主张，“停战协定签字必须推迟”，“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以打促谈、打谈并举的谋略思想。

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1953年7月13日至27日，志愿军发起了著名的金城反击战。先后粉碎了敌人约七个师的反扑，歼敌七万八千人，取得了抗美援朝决定性胜利。正是这一战役，迫使敌方联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书上签字，一刻也不能再拖。

## “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

——致毛月秋<sup>[1]</sup>（1953年10月4日）

月秋同志：

你给我的信收到。

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无论哪一年均不要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我同意你来京一行。尚有毛翼臣<sup>[2]</sup>（不知住什么地方）、文东仙<sup>[3]</sup>（唐家托）二同志过去来信，表示要来我处一看。如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话，你可约同他们二位一道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你们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

你们来时，即持此信先到长沙湖南省委统一战线部，找那里的同志帮忙，发给你们三人来京的路费，并请他们派一人送你们来京。

另请你持此信，到韶山、石城两处乡<sup>[4]</sup>政府及当地的两个区政府及党的负责同志处，和他们商量，如果他们同意的话，请他们将两乡两区的情况及迫切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写成书面材料，交你带来，作为参考之用（不是为了直接解决乡间问题）。

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

你们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希望不迟于阳历十月二十至二十五日。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四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毛月秋（1879—1957），湖南韶山市韶山乡韶源村人，农民。毛泽东的族叔。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慈悦支部书记。曾在湖南韶山、湘乡、湘潭、长沙、华容等地从事党组织的联络工作。建国后，在韶山毛泽东故居做接待工作。

[2]毛翼臣，系毛锡臣之误。毛锡臣（1892—1961），湖南韶山市大坪乡新联村人，农民。毛泽东的远房叔祖父。

[3]文东仙（1902—1989），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托（当时属湘乡）人，农民。毛泽东的堂表弟。曾跟随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长沙文化书社做事。

[4]石城乡，原属湖南湘乡，1956年撤销。其所辖区域今属韶山市大坪乡。

## 【赏析】

1953年9月,毛泽东收到了韶山冲老地下党员毛月秋的信。信中陈述了乡间情形,汇报了当地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有关情况,并要求于阴历11月中旬去北京,祝贺毛泽东60岁大寿。

毛月秋是一位老地下党员,早在大革命时期就与毛泽东有过较多的接触。他1925年冬入党,是农会骨干。1927年1月,毛泽东由上海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毛月秋闻讯后,即在韶山两个乡组织群众召开欢迎大会。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毛月秋在韶山无法安身,只身逃往安乡。秋收起义失利后,他往返于长沙,平江,浏阳等地,担任省委交通员,负责外线联络工作。1936年冬,他从华容回到韶山,从事生产劳动,同年12月韶山党支部成立,毛月秋担任委员,他与韶山的地下党并肩战斗,开展地下活动,进行革命宣传,传递情报,并向延安输送革命青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月秋已年近70高龄,身体有病,但他仍然坚持要求继续为党工作。他来到韶山冲上屋场,担任毛泽东旧居的管理和讲解员,热情地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群众和外国友人,向他们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毛泽东一家六位烈士的事迹及韶山人民的光荣革命斗争历史。毛月秋非常想见毛泽东,于是写信要求在毛泽东生日前夕赴京祝寿。

反对别人为自己祝寿,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反对铺张浪费更是毛泽东的行为准则。在延安时期,凡是别人过生日,特别是被尊为“五老”的革命老人徐特立、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人过生日,他必赴宴祝贺,而对自己的生日却从未提起。

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便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防止出现为个人歌功颂德的现象。毛泽东带头反对别人为自己祝寿,就在毛泽东写信的前一个月,他还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再次向全党和高级干部郑重地指出:一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

在回信中,毛泽东首先讲明同意毛月秋一行来京是为了了解乡间情况,不是为了祝寿。为了节约,不论是哪一年都不要祝寿。并要求“到京住一个短期仍回家乡”。既然不是祝寿,而是为了了解情况,所以,毛泽东让毛月秋在“你及乡间其他同志同意”的前提下,约毛翼臣、文东仙二位一道来京,并希望不迟于阴历10月20至25日到京,而不是在生日前后。信中还着重强调:“你们三人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没有预约的其他同志,一概不要来京。

此信观点明确,层次清晰,言辞恳切,语重心长,紧紧围绕毛月秋信中所提出的为毛泽东过生日一事展开,共有四层意思:一是为了了解乡间情况而不是为了祝寿,同意毛月秋等三人来京;二是持信到湖南省统战部寻求帮助;三是请他们把反映韶山石城乡政府及当地两个区政府的情况以书面材料带来;四是来京不要带任何礼物,到京时间以早为好。四层意思表达了毛泽东对乡间民情的关怀,对乡里乡亲的想念,对“同意来京”的意图和要求进行的详细而又耐心的解释和劝告。全篇自始至终折射出毛泽东作为人民领袖严以律己,不搞特殊的崇高风范。

## “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

——致李漱清<sup>[1]</sup>（1953年10月16日）

漱清先生：

惠书敬悉。承告乡情，甚感。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尚祈谅之。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李漱清（1874—1957），乡村教师。大革命时期，曾去广州协助毛泽东主办《政治周报》，后在湖南省农民协会清理遗产委员会工作。“马日事变”后返乡，继续执教。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 【赏析】

李漱清是毛泽东的同乡好友，早年毕业于湘潭师范和地方自治法政专门学校，接受维新思想较早，是一位思想开朗，博学多识，反对迷信，忧国忧民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过往甚密，互通思想，情笃意长。后来，毛泽东参加了革命才渐渐与他失去了联系。建国后，毛泽东不忘旧情，于1952年秋邀李漱清赴京叙旧，了解乡情。当李漱清要求毛泽东帮助解决个人私事时，毛泽东拒绝了，并于1953年10月16日给李漱清写了这封信。

此信虽短，却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尊重地方、不干预地方事务的思想作风，以及严于律己、廉洁奉公、遵守纪律、不借个人权力为亲朋故旧谋取私利的高尚情操。建国以后，毛泽东出于了解下情的目的，很重视收集地方材料，遇到家乡人来信，就抓住机会询问，以作为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但他从不越权，不直接插手地方事务，以免让地方政府为难。

通篇书信，态度明朗，语言诚恳、真挚，用词含蓄、婉转。“地方事，我只愿收集材料以供参考，不愿也不应当直接处理一般地方性的问题，使地方党政不好办事”一句，明确体现了毛泽东对地方党政的尊重，同时也暗含着他对李漱清先生的婉言拒绝和婉转劝导。“不愿也不应当”一词，用得恰到好处，它顾及了感情上的“不愿”和道理上的“不应当”，无形中增加了说服、劝导的力度。

## “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

——致廖静文<sup>[1]</sup>(1953年12月13日)

静文同志:

十月间的信和徐先生<sup>[2]</sup>所绘奔马,早已收到,甚为感念。兹派田家英<sup>[3]</sup>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廖静文,画家徐悲鸿的夫人。

[2]徐先生,指徐悲鸿(1895—1953),著名画家。原名寿康。江苏宜兴人。1919年留学法国,受到严格的素描训练。其间还曾游学德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1927年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兼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后调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不满。1933年到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苏联举行中国近代美术展览及个人画展。1936年因拒绝为蒋介石画像,被迫离开南京,流亡桂林。1938年应印度诗人泰戈尔邀请赴印访问,在新加坡举行个人画展。1942年到重庆,任教于中央大学。1945年参加重庆文化界争取民主的签名运动,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制独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8月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团结进步画家和教师,出任北平美术家协会荣誉会长,与国民党反动派所组织的北平美术会对抗。倡议国画改革,与北平的保守派展开国画论战。北平解放前夕,两次拒绝飞往南京。解放后,当选为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50年4月,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1953年病逝。著名作品有《田横五百士》等。画马作品尤佳。

[3]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见本书第476页注[1]。

### 【赏析】

北平解放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徐悲鸿,他紧紧握住徐悲鸿的手,为他在北平文化界及为北平和平解放所作的努力致谢。毛泽东的谦逊襟怀和平易近人的态度深深地打动了徐悲鸿。为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讴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他铺纸提笔,泼墨挥就一幅奔马图。这匹饱蘸徐悲鸿高涨热情和满腔激情的奔马,奋蹄驰

骋，昂首长瞻，仿佛刚刚挣脱缰绳，获得了永远的解放和新生。在画的右侧，徐悲鸿以苍劲的大笔题写了“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的诗句。这扬鬃奋蹄的奔马不正象征着历经百年磨难如今欣欣向荣的新中国吗？徐悲鸿与夫人廖静文商量，决定将此画奉献给毛泽东。廖静文观赏再三，还是建议画一幅更好的再送，后来由于工作繁忙且身体欠佳，徐悲鸿终未如愿完成新作。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溘然长逝。在整理遗物时，廖静文又看到那幅奔马图。睹物思人，百感交集，她知道将奔马图献给毛泽东是徐悲鸿的遗愿。于是，她将画装裱后，让人携着自己的信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感念万端，在百忙中写了这封回信。

此信甚短，却字字沉重，仿佛浸透了对徐悲鸿的悼念之情。对于徐悲鸿的长逝，毛泽东十分悲痛，对他那幅立意高远的奔马图及题画诗也颇有感触，这是一位文化界的老战士对党的无限信任和忠诚。如今，人已逝去，但他对党的信任和忠诚却永久地留在了这幅画中。早在来北平之前，毛泽东就托田汉转达自己的意愿，希望徐悲鸿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并尽可能在文化界为党做些工作。后来，北平解放，毛泽东希望徐悲鸿能留下来为国家的美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徐悲鸿到死都没有辜负毛泽东、共产党对他的期望，为此，毛泽东曾对他的秘书田家英说道：“徐先生一生襟怀坦白，是个好人，我很敬重他。”徐悲鸿的去世使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徐夫人廖静文陷入了极度悲痛之中。为了劝她节哀，保重身体，毛泽东在信中写道：“兹派田家英同志询问你们的情况”，表达了毛泽东对徐先生一家的关怀和爱护。徐悲鸿先生去世后，还有两个幼小的孩子，对此，毛泽东也很挂念。“如有困难，请告知为盼”一句，正是毛泽东牵挂之情的体现。

通篇书信，感物而发，言不在多，情动于衷。毛泽东正是以真诚的关怀帮助着徐悲鸿的全家。当田家英带着毛泽东的信交给廖静文时，廖静文读之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她由衷地对田家英说：“请你转告主席，谢谢他对我的关心。我没有什么困难，我一定把孩子抚育成人，让他们继承悲鸿的遗志。”短短书信，其情其意，是何等的挚诚感人。



## “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

——致彭石麟<sup>[1]</sup>（1954年3月31日）

石麟先生：

一九五四年三月九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sup>[2]</sup>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sup>[3]</sup>先生，文运昌<sup>[4]</sup>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 彭石麟（1885—1957），湖南韶山市韶山乡花园村人，乡村教师。大革命时期，他曾任湘潭县清溪乡女子职业学校校长，毛泽东在清溪一带从事革命活动时得到过他的帮助。

[2] 毛蕊珠，即毛宇居，毛泽东的堂兄和少年时的私塾老师。参见本书第439页注[1]。

[3] 李漱清，参见本书第457页注[1]。

[4] 文运昌，毛泽东的表兄。参见本书第2页注[1]。

### 【赏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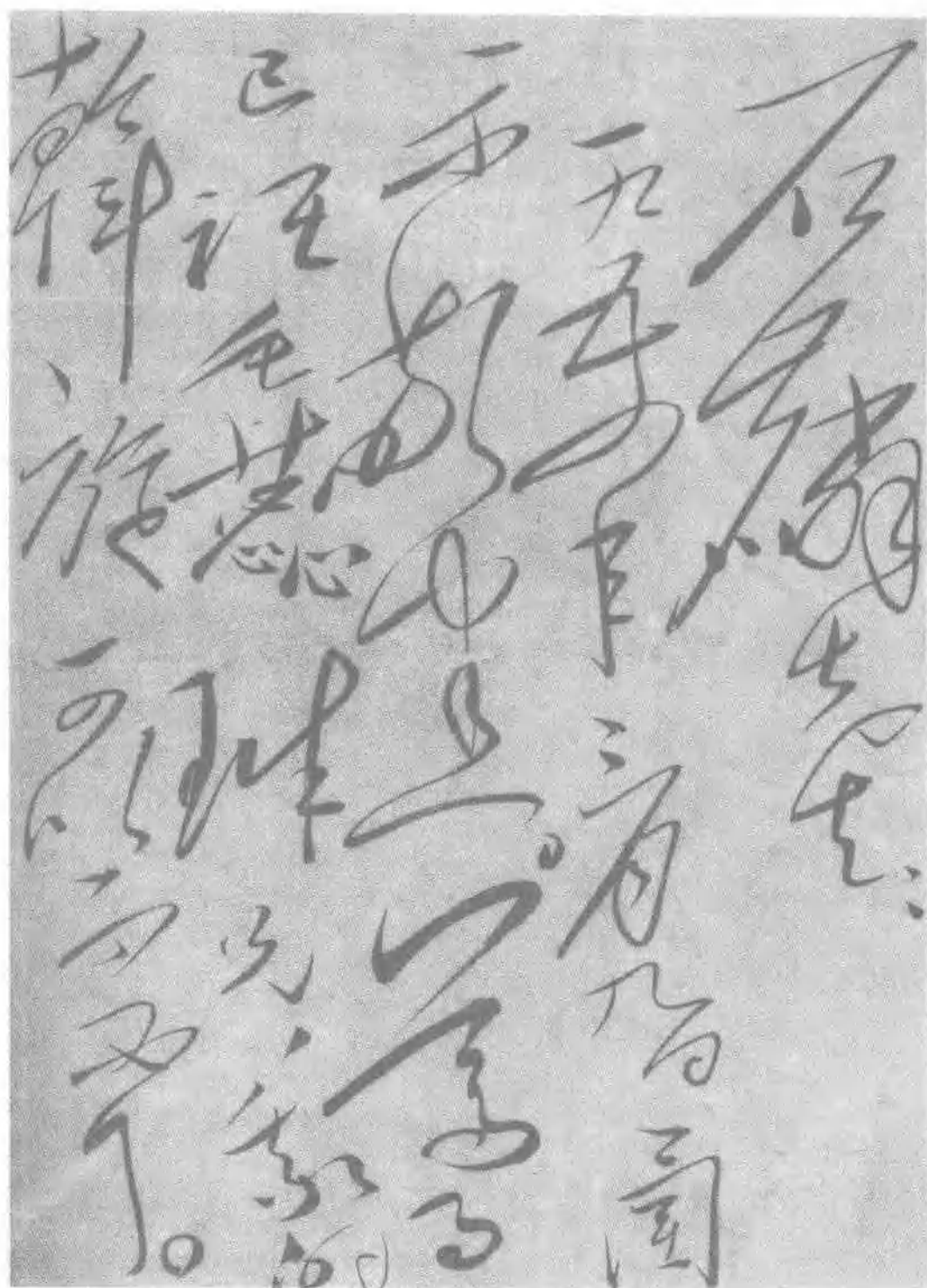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新生的共和国夜以继日地工作，并且严于律己，率先垂范，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亲戚朋友，因为生活、工作等问题寻求帮助解决的事情，毛泽东多为慷慨解囊，予以资助，以免使地方党委、政府为难。1954年3月9日，彭石麟致信毛泽东，请求帮助解决工作问题或者谋一个省文史馆馆员之类的职务，以维持生计。毛泽东收到信后，写了这封信。

彭石麟在大革命时期曾任湘潭县清溪女子职业学校校长。1925年2月至8月，毛泽东到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曾受到过彭石麟的接济和帮助。对于旧情，毛泽东没有忘却。在信中，他尊敬地称彭石麟为“先生”，称彭所托之事为“尊事”。这反映了毛泽东对彭的尊重。信中的毛蕊珠、李漱清、文运昌三人解放后先后担任了湖南省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省文史馆馆员，但他们均是通过正当途径和自己的努力而获得的，毛泽东并没有为他们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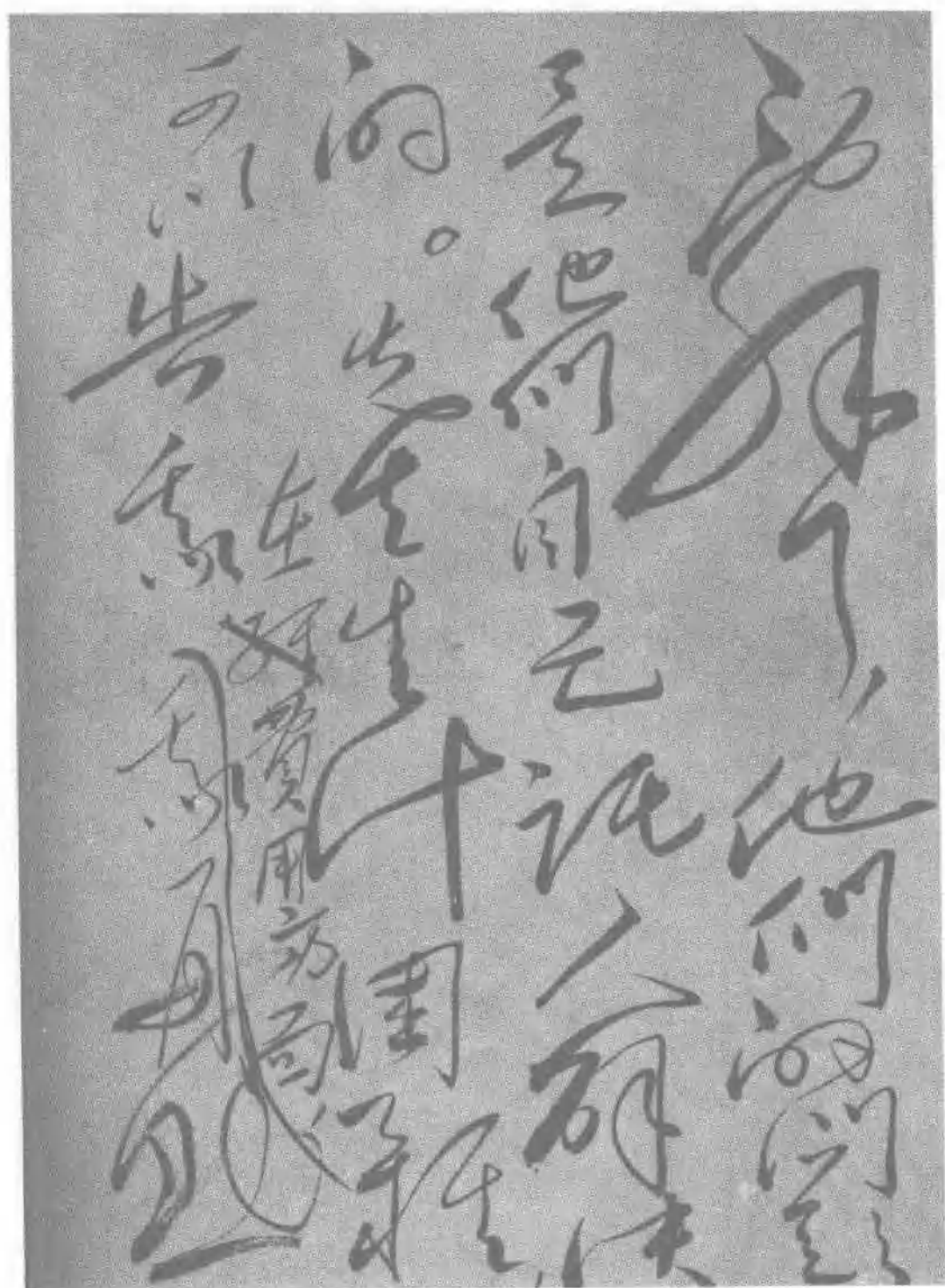
绍过工作。“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一句，正是毛泽东严以律己，不凭个人权力为亲属故旧提供方便的一贯作风的生动体现。

身为国家领袖，举荐一两亲友任职，可谓易如反掌。然而毛泽东从内心深处厌恶“家天下”的封建帝王作风，不愿看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老戏在新中国上演。“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语非激昂，展示的却是“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人民领袖毛泽东仅仅将自己理解为为人民谋利益的公仆，除了谋求人民的利益外，不追求任何私利。这是何等伟大、崇高的品格！

通篇书信，写得委婉含蓄，言词亲切、诚恳。对于彭石麟的要求，毛泽东并非简单地回绝，而是婉转地予以劝导，耐心地加以解释，并且设法在生活上予以接济，可谓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读来使人心悦诚服。



李相才  
兄，此見  
託家  
婉  
司或也  
得極  
打  
里祝友  
形  
讀  
甚  
佳  
戴  
高  
子  
大  
願  
重  
為  
正



步生於平，是不移  
的。此所及，社稷是  
幸。中。信。又。是  
即。之。也。月。廿一日



## “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致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sup>[1]</sup> (1954年4月)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努力，我很高兴。

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地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刊印

### 【注释】

[1]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1938—1989)，藏族，青海循化人。班禅是西藏喇嘛教“格鲁教”(即黄教)的教主之一。1937年九世班禅逝世后，1941年班禅堪布会议厅按照宗教手续，选定贡布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迎往青海塔尔寺供养，1949年6月3日经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为十世班禅。1949年10月1日，班禅致电毛泽东、朱德，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表示拥护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1952年由青海返藏。解放后，历任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二、五、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常委、第一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1989年1月28日因病逝世。

### 【赏析】

班禅额尔德尼，即十世班禅，1938年生于青海，俗名贡布慈丹。三岁时被堪布会议厅确认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1948年，国民党反动政府为挽回败局，在西藏和西南地区建立“反共基地”，妄图对班禅十世进行诱骗，企图将他控制住。1949年9月，人民解放军进驻西宁。班禅闻知，立即与进驻西宁的解放军取得了联系。同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班禅大师和堪布会议厅全体成员倍感鼓舞，致电向毛主席、朱德致敬，希望西藏早日解放。不久，毛泽东、朱德联合复电：“希望先生和西藏爱国人民一致努力，为西藏解放和西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后经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努力，1951年5月23日，双

方达成《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数月后,班禅一行平安抵达拉萨。回想起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关心支持,以及党的民族政策使西藏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班禅心情非常激动,曾致信说,协议的签订,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羁绊和压迫,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来,给西藏人民开辟了走上幸福繁荣的新道路。班禅经常向毛泽东汇报西藏的工作情况。毛泽东对西藏工作也极为关注。他多次在复电中希望班禅“与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和繁荣幸福的新西藏”。1954年,中共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潮。西藏的建设事业时时牵动着毛泽东的心,同年4月,他给班禅额尔德尼写了这封信。

毛泽东在信中充分肯定了班禅每年派人来内地参观学习的做法。在毛泽东看来,汉藏人民之间的团结,有赖于更深的了解和互相学习,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尊重西藏的宗教习惯,学好藏语文,更好地为藏族同胞服务,同样,西藏同胞也应该来内地学习汉语,学习建设西藏的本领。特别是青年,是西藏建设的接班人和后备大军,来内地学习,应当重视青年。为此,毛泽东在信中进一步指出:“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仅关心西藏的今天,而且也在关心着西藏的明天,并表达了愿为此大力支持和援助的愿望。毛泽东多次在谈话中说:“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只靠派遣是不够的,还必须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西藏的发展和进步。没有大批少数民族的优秀干部,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是不可能的。最后,毛泽东还附备了部分物资,以表援助和慰问。

此信着眼于民族团结大义,为西藏建设事业献计献策。培养民族干部特别是青年民族干部的建议,可以说语重心长。毛泽东曾指出,方针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会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而有了干部,就能恰当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团结先进,争取后进。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的积极性持久地发挥,党的方针、政策才能够很好地得到贯彻落实。西藏的建设同样如此。

通篇书信,入情入理。班禅接到此信后,欢欣鼓舞,更加坚定了为西藏建设和民族团结而努力工作的信心和斗志。

## “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

——致石城乡<sup>〔1〕</sup>党支部乡政府（1954年4月29日）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月秋<sup>〔2〕</sup>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托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现有文炳璋<sup>〔3〕</sup>同志的一封信，付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托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致韶山亲友书信集》刊印

### 【注释】

〔1〕石城乡，参见本书第455页注〔4〕。

〔2〕毛月秋，参见本书第455页注〔1〕。

〔3〕文炳璋（1920—1973），湖南韶山市大坪乡大坪村唐家托（当时属湘乡）人，毛泽东的表侄。当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防空司令部通讯连工作。1954年转业。后在北京合成纤维厂工作。

### 【赏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家乡的亲友们满怀敬仰之情，纷纷来到北京看望他。有的人见了毛泽东之后，自视高贵了许多，回到老家后，神气十足，讲大话，摆架子；有的甚至拿毛泽东当挡箭牌，我行我素，自视尊贵，根本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石城乡党支部、石城乡政

府把这些情况写成报告,托进京的毛月秋捎给毛泽东。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于1954年4月29日写了这封信。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党和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是欢迎别人提意见的,有了批评和建议,才会对工作有帮助。所以,信一开头就说:“毛月秋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家亲戚唐家坨文家来京回乡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众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然后,毛泽东阐明了自己的态度:“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信尾,毛泽东表示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严格要求亲属,是因为他作为全国人民的领袖,时刻没有忘记接受人民的监督,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毛泽东的教育下,他的亲戚都能遵纪守法,安心务农,积极向上,特别是收到毛泽东的信后,更是顾全大局,没有一个违法乱纪的。他们虽然过去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牺牲,但没有向国家提过分要求,而是和全国人民一样靠自力更生,勤俭节约,过上了幸福生活,并扎根农村,为新中国的建设尽到了公民应尽的义务。

##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

——致卫立煌<sup>〔1〕</sup>（1955年3月17日）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卫立煌（1897—1960），字俊如，又字辉珊。安徽合肥人。辛亥革命时参军，随范鸿仙进行反袁斗争。1917年参加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卫队，因功送升至旅长。1925年10月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团长，北伐进军到福州后，升任师长，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卫戍南京。1928年被蒋介石削去军权，入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后升任第十四军军长，率部进攻革命根据地，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红军长征时，他任“追剿”东路军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忻口战役、韩信岭战役，予日军重大杀伤，后坚持中条山抗战。1938年后，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河南省主席，主张团结抗日，后又任西安行营主任。1943年冬，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指挥滇西反攻战，配合中国驻印军打通中印公路。1945年1月任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出国游历。1948年1月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因辽沈战役中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介石撤职查办，软禁在南京。1949年初，化装出走，寓居香港。1955年3月毅然回到北京。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60年在北京病逝。

### 【赏析】

新中国所建立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民主联合政府，这与蒋介石独裁专制政府有着本质的、鲜明的区别。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如同百川归海，纷纷加入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民主人士和民主党派坦诚相见，给予极大信任和尊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襟和民主作风，使无数民主人士心悦诚服，与共产党建立了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深情厚意。新中国成立后，身在

香港的卫立煌，心系北京，不顾国民党特务盯梢，曾于1949年10月3日给毛泽东发电，表达过回归大陆的愿望。

卫立煌早在1938年4月14日就到过延安，受到毛泽东的热烈欢迎。在延安，他了解了共产党，也了解了毛泽东，并保持了彼此的友好关系。1947年，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的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后到了香港。1955年3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等悉心安排帮助下，卫立煌从香港回到大陆，他一到广州就给毛泽东、周恩来发电致歉，并通过新华社发表了揭露蒋介石罪行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毛泽东对卫立煌的归来非常高兴，在收到卫立煌电报的第二天，就以个人名义回了这封电报。

此信虽短，却充满了热烈欢迎之意。“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借图良晤”一句，表达了毛泽东渴望快些见面的急切心愿。考虑到要让卫立煌了解新中国的变化，所以毛泽东建议他：“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由此信可见，毛泽东对愿意归来的民主人士是信任的、欢迎的。正如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要员，我们应该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此信写得热情洋溢，感情充沛。特别是信中短句的运用，加快了感情抒发的节奏，使语势得到增强，感情得到抒发，且简洁明快，短促有力，气氛热烈。



## “辩论总是会有益的”

——致蒋竹如<sup>[1]</sup>（1955年5月1日）

竹如兄：

二月惠书收读，甚谢！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来书已付文字改革委员会研究去了。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此复。顺问  
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蒋竹如，湖南湘潭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 【赏析】

蒋竹如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学，五四运动时期曾参加过毛泽东组织的新民学会。抗日战争时期，蒋在湘潭新群中学任国文教师兼班主任，不久，离开“新群”，先后去湖南省立五师和一师任教，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1951年7月31日蒋竹如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去北京参加中国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并同时寄去回忆他早年学校生活的一篇文章。毛泽东收信后，于10月写信表示“可以来此入学研究”，对蒋竹如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帮助。1955年2月，蒋竹如又把自己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的经验写成专著，给毛泽东寄去，并附上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提出了简化汉字和使用汉语拼音的问题，建议进行汉语文字改革。毛泽东虽不完全同意他的见解，但对改革汉字深表赞成。于是写了这封信。

此信直称“竹如兄”，显得亲切、自然，使人读后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他们曾经拥有过的交往。对于蒋竹如从事教育工作并刻苦钻研、出版专著，毛泽东是重视的，对于蒋在语文学研究中提出的不同意见，“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毛泽东历来主张允许别人说话和学术争鸣，认为这种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以研究工作为基础，使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只有民主的、平等的辩论，才能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所以，毛泽东认为辩论总是有益的。接

着,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汉字从一定意义上讲是汉文化的结晶,它在中国文化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汉字繁体字数太多,形体复杂,学习和使用都有一定难度。对于文字改革,毛泽东早就有所提倡。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使其易学易用。建国后,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也在到来。文字建设,一定要适应和推进政治变革,使之从旧文字转向新文字,以适应和推进经济建设,培养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正是在毛泽东的关心支持下,国家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实行了汉字简化,推广了普通话,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同样认为,拼音文字是比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但文字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改全非,而应逐步实施,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

此信简短,情理兼容,既赞成蒋对改革汉字的主张,又阐明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读来轻松愉快,平易近人。

## “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致中共湘乡县委(1955年5月17日)

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

石洞乡的谭世瑛<sup>[1]</sup>,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近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sup>[2]</sup>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正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他的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分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祝你们工作顺利。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谭世瑛,参见本书第414页注[1]。

[2]谭政,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参见本书第246页注[2]。

### 【赏析】

毛泽东少时同学谭世瑛,解放前曾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科员,而且他的两个儿子都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在镇反运动中,他的两个儿子被政府镇压,他本人也被管制一年。对此,谭世瑛多次致信毛泽东,不仅陈述生活困难,而且埋怨政府处理不公。毛泽东接到信后,在生活上予以接济,但对谭反映的问题并不偏听偏信。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给中共湘乡县委写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说明了毛泽东和谭世瑛的关系,以及对他生活的关心和接济。然后,毛泽东根据谭世瑛的来信内容,本着把问题搞清楚的原则,询问了有关谭世瑛的实际问题。因为谭世瑛信中所言是一面之词,所以,毛泽东信中用“据他说”、“听说”、“他又说”等类词句,这样就把问题一一提了出来,便于湘乡县委有针对性地予以回答,也能够为很好地解

决问题提供线索。中共湘乡县委接到毛泽东的信后,专门派人作了调查,并把调查情况写成材料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原来,谭世瑛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而且屡教不改,越犯越重。所以政府对此加以处理,而谭世瑛因对儿子的问题态度不当也被管制一年。毛泽东得此报告后,马上给谭世瑛写信,信中对湘乡县委的做法是同意的,并认为是“应该的”、“公道的”。由此可见,毛泽东的这封信,完全是出于查知问题、解决问题的愿望。毛泽东一向主张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信中称“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没有半句结论性的话,而是希望湘乡县委查明真相。从这封信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待友人的挚情和对待原则问题的慎重态度,这是值得后人永远学习的。

这篇书信通俗易懂,娓娓道来,全然是一种平等语气,决无半点架子,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共湘乡县委的尊重和信任。

## “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

——致田家英<sup>[1]</sup> (1955年9月27日)

田家英同志：

请付工厂照改。每省的题目和每篇的题目，均照我在目录上改的去改正。其余的，今天可以不必送我了。

迅速打出八份（加陈云<sup>[2]</sup>同志一份），最好于今日下午或晚上送交各同志。

你和乔木<sup>[3]</sup>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请告乔木。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四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田家英(1922—1966)，四川成都人。1937年赴延安参加革命，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后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单位工作。从1948年起，任毛泽东的秘书。建国后，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参加《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及毛泽东其他著作的编辑、注释和出版工作。曾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6年5月含冤逝世。著有《学习〈为人民服务〉》、《中国妇女生活史话》等。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这封信是毛泽东在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过程中写给他的。

[2]陈云，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参见本书第489页注[1]。

[3]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参见本书第536页注[1]。

### 【赏析】

1955年9月，毛泽东主持编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目的在于展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前景，动员各级党委全力以赴切实把合作化运动掌握在自己手里，进一步批判对合作化运动的“动摇”态度和“动不动就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总结经验，让那些不会办合作社的人们也学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共收集各地材料176篇，90多万字，全面地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对社会主义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基本指导思想，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要求迅速摆脱贫困，使国家富强的美好

愿望。为了编好这本书，毛泽东用11天功夫，关了门，看了120篇报告并加以研究，亲自为此书写序，为104篇材料写了按语。为了尽快印发给10月4日至11日召开的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的与会同志，毛泽东在编辑过程中字斟句酌，每天夜里都要修改稿子和写按语，再由田家英、胡乔木、逢先知等进一步作文字加工。为此，他经常写信给田家英同志提出具体修改的指导意见。此信便是其中的一封。

此信的称呼“田家英同志”，显得亲切自然。由于田家英同志的积极协助，《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就打出了清样，但对有些冗长、累赘、使人看了头痛的标题，毛泽东作了大量的修改，以达到鲜明、生动、有力、文题相符、主题突出的效果。所以，在信中，毛泽东指示：“请付工厂照改。每省的题目和每篇的题目，均照我在目录上改的去改正。”这里，毛泽东提到：“你和乔木各分一半彻底地作一次文字上的修改，包括题目改得生动些”。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文章的题目是“窗户”，“眼睛”，有了生动的题目，就会首先吸引人。文章的材料要典型，题目更要突出醒目，如同“画龙”必须“点睛”一样。对文字修改也要生动活泼，否则，就会空洞无味，即使内容再好，也会把人拒于千里之外。

通篇语言随和，平易近人。在语气上毫无命令的口吻，如“今天可以不必送我看了”、“最好于今日下午或晚上送交各同志”、“请告乔木”等语句庄重而不失亲切，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亲密无间、平等协商、互相体谅的工作作风。

## “奉和一律,尚祈指政”

——致周世钊<sup>〔1〕</sup>(1955年10月4日)

悼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sup>〔2〕</sup>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sup>〔3〕</sup>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政。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sup>〔4〕</sup>。

顺问

近佳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世钊,字伟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参见本书第387页注〔1〕。

〔2〕程颂万,湖南宁乡人,晚清诗人。

〔3〕曹子谷,即曹籽谷(1876—1960),名典球,湖南长沙人。解放前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湖南大学校长。建国后,曾任湖南省政协常委、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4〕赫曦台,是湖南长沙岳麓书院的附属建筑之一。

### 【赏析】

1955年6月,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工作,故友周世钊幸而陪同,一道游览长沙岳麓山。周世钊为此情此景所动,写了题为《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方麓宫》诗一首:“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故园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已见升平乐,仅用书生颂物华。”毛泽东接到周的信及诗后,于10月4日写了这封信及诗作为回复。

毛泽东和周世钊早在一师时就在文学和诗词方面有不凡造诣。新中国的诞生,更使故人精神倍增,感于新生活、新气象,常有诗作顿生,互相酬唱,别有情趣。

此信称:“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毛泽东对周世钊的诗作“甚有兴趣”,于是“奉和一律”,作了《七律·和周世钊》。“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



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城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一首酬和诗，俱见对多年情谊的珍视。从结构上看，此诗四联八句，对仗工整，前半部分写景记游，后半部分抒情寄兴。诗人通过想象所造一种典型环境，借这种景来抒发情怀，把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寄寓其中，主要是指正以全力推动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诗人放眼全国，不禁油然而生欣喜之情，联想到在全国这块“绿洲”和“青野”上全面铺开合作化运动，把发生在960万平方公里上的事情，尽收眼底。“风”、“吹”、“雨”、“上”等字的运用，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潮涌迅猛的态势，全部表现了出来。

前四句，是追忆重登岳麓山的情景，诗人仿佛在深情地叩问老同窗：你还记得么？那江、那山、那风、那雨……生动地再现了自己当时的奇妙感受：那浩荡的春江和层层的高峰任“我”流连而攀登，那风和浪、雨和山皆因“我”的瞬间感觉而入诗入画。特别有意味的是风起绿洲风也绿，雨从青野雨亦青。诗人呼吸领会到了一种朦胧无边、充满生机的青春气息。

后四句，是在抒发人生咏叹。世事沧桑，旧友重逢，人之恒情，“尊前谈笑人依旧，城外鸡虫事可哀”，守律工整，骈丽对仗，读起来音调铿锵，令人神驰，给读者想象或联想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此信诗意盎然，雅兴无量，体现了诗人毛泽东与诗友周世钊的磅礴诗情和宏大气度，以及对事业、对人生的达观态度，读来朗朗上口，余味无穷。

## “亲爱的大姐”

——致宋庆龄<sup>[1]</sup> (1956年1月26日)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宋庆龄，参见本书第175页注[1]。

### 【赏析】

宋庆龄应毛泽东、周恩来之邀来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不久，她被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作为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宋庆龄，为国家大事日夜操劳，参加了大量的国事活动，同时，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保持着亲密的交往。1956年元旦，宋庆龄给毛泽东寄了一张贺年卡，表达了自己的新年祝福。毛泽东收到贺卡后，写了这封信。

此信称宋庆龄为“亲爱的大姐”，读来如同一家之亲，手足之情。宋庆龄作为一个民主革命的勇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坚决与背叛三民主义的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因而受到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尊敬。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一直称宋庆龄为“先生”。然而，当宋庆龄来到人民政府，和共产党人共同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重任时，彼此之间再也不仅仅是在两条战线上的彼此尊重，更像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携手建设共同家园的亲密、融洽的一家人。所以，毛泽东改变了称呼。紧接着毛泽东如聊家长一般叙说了自己的饮食起居等生活琐事，读来让人感到温暖、亲切。信末，毛泽东劝宋庆龄“好生宝养身体”，表现了他对宋庆龄的关心和惦念。

全信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活泼愉快的轻松感和温暖感。两位国家领导人在新年到来之际，日理万机之间，互相道出彼此的祝福和关心，岂不温馨暖人！

此信在语言运用上，显得幽默、风趣，“我仍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这是对自己的评价，读来不觉伤感，倒觉得轻松愉快，宁静达观，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乐观自信的人生态度。

## “我可作证”

——致曹云芳<sup>〔1〕</sup>（1956年8月11日）

云芳同志：

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罗哲<sup>〔2〕</sup>同志英勇牺牲，早就听到一些消息。一九四五年在重庆的时候，见到张维<sup>〔3〕</sup>兄，曾打听你们的下落，他只告知你姐姐王夫人已故，你的情形他不知道。现知你仍健在，并有两个女儿能继承罗哲遗志，我很高兴。罗哲为党艰苦工作，我可作证，当时没有别的证件。恤金由谁领的问题，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如果决定给继子，不给女儿，也就算了，不必为此去争论。坟墓可由家属修理。现寄上三百元，请你酌量处理。今后如果还有困难，可以告我设法。你见过的两个孩子，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你们在贵阳工作有成绩，向你们致贺。顺祝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八月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曹云芳，原是罗哲烈士之妻。大革命时期她曾随罗哲一起在毛泽东领导下做革命工作。

〔2〕罗哲，湖南株洲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时期曾随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1928年牺牲。

〔3〕张维（1898—1975），湖南浏阳人。早年同毛泽东有较多交往。1949年9月起在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任教授。

### 【赏析】

此信是毛泽东写给罗哲烈士遗孀曹云芳女士的。

罗哲早年曾以满腔革命热情参加过毛泽东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担任过毛泽东在广州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全国农协筹委秘书，积极协助毛泽东工作。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赴浏阳组织秋收起义，重新建立湘潭工委，罗哲任组织部长，受到敌人的悬赏捉拿，后被捕入狱，英勇牺牲。后来，毛泽东在延安得知这一噩耗后，非常沉痛，多次打听烈士遗属曹云芳和两个孩子的下落。解放后，毛泽东指示民政部门对烈士遗属给予抚恤和照顾。1956年7月，毛泽东收到了曹云芳的一封信，随后复了这封信。

20多年未见，忧虑常积于心中。烈士罗哲26岁即慷慨赴死，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烈士的遗属情形如何？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毛泽东心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经多方打听，得知曹云芳等已去贵阳，并重新组织家庭，已有继子和两个女儿，方感宽慰。如今，罗哲遗属有信来到，如一石头落地，心中能不感到慰藉？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七月八日的信收到，甚慰。”一个“甚”字，看出感之切，虑之深。接着，毛泽东简言回顾了罗哲牺牲后，对烈士遗属的多方寻问和牵挂。罗哲虽已身亡，而现在云芳同志及女儿都很好，这不正是毛泽东所期望的吗？何况两个女儿都已继承了罗哲遗志，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不仅使活着的人高兴，就是烈士有灵，也会含笑九泉。至于罗哲参加革命工作有无证据，毛泽东愿为之作证，对于抚恤金由谁领取这个问题，毛泽东不便建言，而是相信“应由当地政府去作决定”。但至于决定给继子还是女儿，毛泽东则认为：“不必为此去争论。”并寄上300元，请云芳同志酌量处理，并称，如果再有困难，可以相告。曹云芳来信还问及她曾见过的毛泽东的两个孩子，毛泽东也难过地一一作了答复：“一个在战争中牺牲了，一个也已病废。”信尾，毛泽东对他们工作有成绩表示了由衷的祝贺。

此信用平易的语言，表达了对罗哲烈士的怀念及对遗属的关怀和帮助，可谓“神形语外”、“情系辞中”。

## “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

——致黄炎培<sup>[1]</sup>(1956年12月4日)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

你们的会议<sup>[2]</sup>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

顺致

敬意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sup>[3]</sup>,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黄炎培,字任之,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参见本书第382页注[1]。

[2]指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间召开的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在同年11月间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3]这里的“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这一年填的一首词是《浪淘沙·北戴河》。“今年”即1956年填的一首词是《水调歌头·长江》,公开发表时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 【赏析】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以汹涌澎

并之势席卷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包括部分企业职工,天天敲锣打鼓,要求批准公私合营,政府只好一次批准全面合营的办法。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在个体户增加的背景下,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人们称它为“地下工厂”,还出现了“地下商店”。11月间,中国民主建国会相继召开了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会上,黄炎培针对内部存在的问题,采取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大会开得很圆满,很成功。会后,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了民建会近况和两会情况。此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给黄炎培写了这封回信。

在此信中,毛泽东开门见山,祝贺大会开得圆满成功,盛赞大会开得很好。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能够在工商业者、各级知识分子之间行得通,并且日益健全,确实是个喜讯。接着,毛泽东层层展开论述了为什么要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方法,怎样实行这个方法等等。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它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一切事物及其发展的过程中。正如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针对两种性质的矛盾介绍了两种解决矛盾的方法。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一样。对于敌我矛盾,应采取专政的办法去解决,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则只能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说服教育的方法。党的八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由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即敌我矛盾、阶级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基本解决,而人民内部矛盾则大量显露出来,突出出来。因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特别是1956年下半年,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了不安定的苗头。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闹社等事件时有发生,工商业者中间的问题也不少。如何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是一个大问题,它不能用镇压的方法,而只能采取“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民建会处理得好。所以,毛泽东很高兴,并鼓励“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对于黄炎培信中所关注的国际问题,毛泽东也作了回答。1956年下半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波匈事件”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少麻烦,正如毛泽东在信中所说:“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社会主义及其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学会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巩固人民政权,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验之一。最后,毛泽东满怀自豪地称自己是乐观主义者,他给黄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信后,毛泽东又附加《浪淘沙·北戴河》、《水调歌头·长江》两首词,以答复黄历次赠诗的雅意。

通信读完,脍炙人口。在纷繁复杂的国内矛盾中,此信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又有在弄清问题之后应答诗人的雅兴。特别是《水调歌头·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一句,足见毛泽东那从容不迫和敢于藐视困难的宽阔胸怀。

此信围绕“批评与自我批评”展开论述,逻辑严密,结构严谨,层次清晰。过渡自然,文气贯通,读来一目了然,令人击掌喝彩。此外,信中还用“我希望”、“我想”等词句表达对黄炎培先生的期望,显得含蓄委婉,温暖人心。

## “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

——致周世钊<sup>[1]</sup>(1956年12月5日)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帐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sup>[2]</sup>,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水调歌头 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暂时不会出国,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

问好!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世钊,字惇元,当时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参见本书第387页注[1]。

[2]指周世钊1950年9月下旬赴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路过许昌时所作的《过许昌》一诗。全诗如下:“野史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斜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纪,谁识郢中王!”

### 【赏析】

1950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一周年前夕,毛泽东的一位亲戚由京回湘省亲,毛泽东托他便道邀周世钊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这天恰是中秋佳节,周世钊在长沙登车,但见月华如波、圆盘皎皎、桂香馥郁,于是口吟《五律·仲秋北上》诗一首:“露重香浓桂正花,中秋奉命发长沙。歌盈江市人难静,梦醒湖乡月正斜。三十年前亲短范,数千里外向京华。輶生垂老逢嘉庆,喜见车书共一家。”第二天,车到许昌,又咏《五律·过许昌》一诗:“野诗闻曹操,秋风过许昌,荒城临旷野,断碣卧夕阳,满市烟香溢,连畦豆叶长,人民新世



纪，谁识邨中王。”不久，周世钊将此诗赠给毛泽东。

毛泽东和周世钊既是挚友，也是诗友。他们在长达63年的交往中，不仅情深意挚，被世人称道，而且赠诗应答，酬唱奉和，亦为世人叫绝。1955年，周世钊升任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让毛题写校牌，毛泽东回信嘱他要经常下去不只看学校，还要看别的东西。周世钊欣然应命，并将其所见所闻写给毛泽东看。1956年12月5日，为酬答周世钊，毛泽东于百忙之中写下这封信。

信的开头，毛泽东因周的拳拳情意，高兴至极。作为一国主席，毛泽东极想了解省察情形，收到周的信，主席盛赞其益。“校牌仍未写”一句，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歉疚和诚恳；“但却时常在念”一句，则体现了毛泽东对此事的重视。“总有一天要交帐的”一句，生动活泼，寓庄于谐，幽默诙谐，体现了友谊之真挚，情感之浑朴。接着，信称：“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水调歌头·长江》，通过抒写畅游长江时的感受，表达了作者叱咤风云、气吞山河的伟大情怀。全词上阕九句，48字，写游泳；下阕十句，47字，写建设。全词构思奇特，文气贯通，一环扣一环，无一句闲文，无一字空言，意境深远而平实，风格体势高华典雅与雄浑奔放兼容，可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凌云健笔，遒劲纵横，震古烁今。语言舒展流畅而豪放，用典作譬信手拈来，贴切而精当，充分显示了诗人自信豪迈、独立不羁的英雄气派和伟大风格。周世钊的《五律·过许昌》借古咏今，盛赞人民新世纪。毛泽东《水调歌头·长江》则以浪漫笔触，讴歌人民的伟大创造。两诗都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喻含了“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真谛。特别是毛泽东“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一句，极具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表现出了从容不迫、气吞寰宇的博大胸怀。

## “应以新诗为主体”

——致臧克家<sup>[1]</sup> (1957年1月12日)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臧克家，1905年生，山东诸城人，当代著名诗人。早年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开始新诗创作。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0年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同时写作新诗。1933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烙印》。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前线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42年到重庆，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6年7月到上海，先后编辑《侨声报》副刊和《文讯》月刊。1948年底去香港。1949年3月到达北平。建国后，任华北大学三部研究员、人民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等职。现任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当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

### 【赏析】

毛泽东不仅是当代伟大的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也是一位独领风骚的伟大诗人。他常有感于伟大的革命实践，借诗抒怀，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留下了满怀激情的诗篇。毛泽东的诗词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体现着革命导师的伟大思想。它根植于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又闪烁着马列主义真理的光芒；既有人民领袖的伟大胸怀，又有哲学家、理论家的深邃和军事家的睿智，而且气势博大、恢宏，给人以壮美之感。郭沫若曾评论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姚雪垠说：“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

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了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毛泽东的诗歌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在世界文坛上也有极高的声誉。为了便于中国乃至世界的人们对历史巨人毛泽东的诗词进行学习和借鉴,臧克家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在新创刊的《诗刊》上刊载毛泽东的诗词。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写了这封信。

臧克家是一位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的杰出诗人,曾长期担任我国当代最大的诗歌期刊《诗刊》的主编,任职期间,与毛泽东多有书信来往并曾面晤。这些交往既有臧克家对毛泽东的爱戴,也体现了毛泽东对《诗刊》、对新中国诗歌事业的殷切期望。信的第一层意思是为复信迟而道歉。第二层意思集中体现了毛泽东自己的主张。毛泽东虽然在审美趣味上一直把我国瑰丽而辉煌的古体诗词放在了突出位置上,但在理智上,却极力主张新诗的大力发展。他在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旧体诗,容易贻误青年。所以,他在信中表示:“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诗歌发展的独到见解以及对青年成长的关心。但对于旧体诗,毛泽东也不是一味地排斥,认为“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所以,毛泽东最终还是给寄去了诗歌,以引起百家争鸣,达到百花齐放。“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一句,表达了毛泽东对《诗刊》编辑部同志们的尊重以及对《诗刊》的支持。信的第三层意思,是对《诗刊》成长发展的关切。因为《诗刊》创刊不久,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诗要以新诗为主体,旧诗也可以写一些,但不应该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就为《诗刊》的工作和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提倡写新诗,提倡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是毛泽东对于诗歌创作的要求。他号召人们,特别是青年要从民歌中吸取营养,发展为能够吸引广大读者,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的新体诗歌,并预言,照此努力,一定能达到成功。

通篇书信层次分明,说理透彻,体现了毛泽东对《诗刊》的支持,表达了毛泽东倡导新诗的愿望。“惠书”、“遵嘱”、“请加审处”、“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等语言,尽显谦逊美德,蕴含闪光人格,虽是寥寥数语,也足可引人读之再三,以至击节赞叹了。

## “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

——致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sup>〔1〕</sup>（1957年3月17日）

恩来、陈云、彭真、定一同志：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以上各点，请中央讨论一次，并作出决定。我已到天津。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刊印

### 【注释】

〔1〕周恩来，参见本书第431页注〔1〕。

陈云（1905—1995），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1920年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店员。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曾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松浦特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巡视员和省委委员，上海闸北区委书记、法南区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和书记，上海临时中央政治局成员。1933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局成员，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团成员。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五军团中共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同年5月经成都、重庆、上海转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7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中央组织部长，中央青委书记、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书记、辽东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野战军兼东北军区副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建国后，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重工业部部长。1954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部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5年和1978年分别当选为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六届四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月政治局会议（1937年）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七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

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为中纪委第一书记，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第一书记，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中顾委主任。主要著作编为《陈云文选》，《陈云文稿》等。1995年4月逝世。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

彭真(1902—1997)，山西曲沃人，原名傅茂公。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青年团太原地委书记、正太铁路总工会秘书，后到天津，先后任中共天津地委第一部委书记、第二部委书记、第三部委书记、工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顺直省委工人部部长，唐山市委书记，顺直省委组织部长，天津市委书记。1929年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6年出狱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城工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市长、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小组副组长和组长，并当选为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二至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64年任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1966年5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并被停止和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9年由中共中央正式平反后，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领导全国的政法工作和法制建设。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见本书第337页注〔1〕。

## 【赏析】

1956年6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发生了罢工、游行示威和骚乱事件，同年11月，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等地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这些不安定情况的出现，不能不对我国产生影响。从1956年下半年起，我国一些地区接连出现不安定因素。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几十人，多的达一二百人，有的甚至近千人，有几十个城市也发生了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对于闹事原因，共青团中央分析指出，基于反革命分子捣乱、破坏的是极少数，绝大部分是些幼稚青年因学校在学习、生活上满足不了自己要求而闹事的。毛泽东对此十分重视，他在1957年1月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发生人民闹事的原因有这么一些，有些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犯了错误。犯错误的原因无非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东西。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那就是学校自身的思想

政治教育问题。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概括地讲道,1956年,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这些人闹事的直接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的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应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写了这封信。

首先,此信立足现实,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办学思想。联系1956年底、1957年初的国际国内形势,毛泽东深切地感到:“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他指出,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在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在信中,毛泽东主张“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治(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不仅如此,他还特别注重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人员队伍的素质,“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同时赋予教育部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其次,此信放眼未来,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思想。抗美援朝战争表明: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侵略、干涉和经济封锁很难达到其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因此,他们在使用“硬”的一手同时,又采用了“软”的一手。1953年1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突出地强调了“和平演变”的战略,并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代、第四代人的身上,说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如果他继续要有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的孩子,他们的后代将获得自由”。他还攻击“中国共产主义是一致命的危险”,要“用和平的方法使中国得到自由”。毛泽东十分注意杜勒斯的这些言论,十分注意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颠覆策略、方式的变化。1956年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反叛以及波匈事件的接连发生,1956年下半年我国部分地方工人、学生闹事等等事件,都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惕。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一部分,毛泽东把他们视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对青年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和无比的关怀。因此,必须从青年学生抓起。“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毛泽东的此信正是站在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向全国大、中学校提出的战略任务。

全信观点突出,思想深刻,使人读来觉得立意高远,意义重大。

## “我失骄杨君失柳”

——致李淑一<sup>[1]</sup> (1957年5月11日)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sup>[2]</sup>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sup>[3]</sup>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sup>[4]</sup>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李淑一，柳直荀的夫人，杨开慧的好友。参见本书第401页注[1]。

[2]开慧，即杨开慧，毛泽东的夫人。参见本书第122页注[3]。

[3]直荀，即柳直荀。参见本书第401页注[2]。

[4]柳午亭，柳直荀之父。参见本书第401页注[3]。

### 【赏析】

这封信是毛泽东写给当时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李淑一的。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是毛泽东的战友，1932年在湖北牺牲。1932年夏，李淑一听到了柳直荀牺牲的传闻，但又没有确切的消息，在一个非常沉痛的夜晚，她忽然梦见柳直荀归来，刚一见面却又梦醒。梦醒后的凄凉使她写成一首《菩萨蛮》：“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1957年春节，李淑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寄了这首词，并索阅当年毛泽东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毛泽东读信之后，写了这封信。



此信首先针对李淑一信中对自己的过于敬重,表示了异见。“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这是李淑一过于谦逊的原因。“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表达了毛泽东对李淑一同志式的劝告和批评,然后就李淑一的那首词发表了自己的感慨。1930年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被反动派何键杀害。1932年柳直荀牺牲。读着李淑一的《菩萨蛮》,毛泽东也想起了自己的夫人。正是无数像他们这样的烈士的光荣牺牲,才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因此,毛泽东在信中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对于李淑一索阅毛泽东以前赠杨开慧的旧词一事,毛泽东没有照办,而是另写了一首《游仙》词,即《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毛泽东的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虽曰游仙体,却是从人间现实出发,不仅是对战友、对亲人的悼念,也是对英雄烈士的赞美,更是对经过牺牲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的歌颂,读来使人沉痛而昂扬,悲壮而鼓舞。“骄杨”和“柳”,对毛泽东和李淑一来说,是亲人,是战友,是同志,同时也是为革命捐躯的无数英烈的代表。该词把烈士的忠贞、人民的景仰,通过神话的形式表达出来,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信中还特别嘱咐:“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此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这就进一步表达了毛泽东对英雄、对烈士的怀念之情。此信除《游仙》词之外,尽用朴实坦率的语言,毫不遮掩,直陈己见,表达了毛泽东对李淑一同志的真挚与坦诚。

## “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 伟大友谊的象征”

——致《真理报》<sup>[1]</sup>编辑部(1957年11月20日)  
《真理报》编辑部：

亲爱的同志们：

我们，参加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庆祝典礼<sup>[2]</sup>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你们伟大国家的逗留期间，收到了苏联公民们的大批信件和电报，其中有的还附来了珍贵的礼品。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都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和它的成员以及对我个人的最诚挚的兄弟情谊和最良好的祝愿。我们把苏联人民的这种感情看作是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象征。因为我和我的同志们难以对这么多的信件和电报——作复，请让我们通过贵报转达六亿中国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们和我个人对苏联人民、对所有给我们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的苏联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于莫斯科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刊印

### 【注释】

[1]《真理报》，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1912年5月5日创刊。在彼得堡公开发行。曾8次被沙皇政府查封，1914年7月被查封。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3月18日复刊。几次更改名称。十月革命后，自1917年11月9日起重新以《真理报》名称出版。1918年3月迁莫斯科出版。

[2]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1957年为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集会，毛泽东率团参加了庆祝典礼。

### 【赏析】

5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57年毛泽东分析指出，在世界范围内，除了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外，还存在着三种力量，即美国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四种力量重新分化和组合，使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的局势中，党中央、毛主席主张：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继续加强团结和合作；对被压迫

民族的解放运动和争得独立的民族国家,积极支援并大力发展友好关系;对美国以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争取同它们发展关系。

为了团结苏联,保持中苏两国两党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团抵达莫斯科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方法,以协商方式向苏共提出了对苏共二十大若干问题的不同看法,讲清了国际形势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团结等问题。中苏两党协调立场,互有妥协,共同提出《莫斯科宣言》草案,并顺利通过。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收到了苏联公民的大批信件、电报和珍贵礼品,这些信件、电报和礼品都热情洋溢地表达了苏联人民对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的最诚挚的兄弟情谊和良好祝愿。为了感谢苏联人民的情谊,毛泽东在11月20日离开苏联以前,向《真理报》编辑部写了这封信。

全信集中表达了毛泽东对苏联人民情谊的感谢之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正如毛泽东在莫斯科机场讲的那样:“我在1949年底,1950年初访问过苏联。那时我们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此开始了我们两个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亲密结合。”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得到了苏联人民的同情和帮助,在共同的斗争中,中苏两国结成了兄弟般的同盟。在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绝不仅仅是为了纪念,而是为了制止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保卫世界和平。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把浸透苏联人民美好祝愿的信件、礼品和电报视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伟大友谊的象征,并对此表示衷心感谢,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苏联人民的尊重以及对中苏两国伟大友谊的珍视。

此信开头的称呼——“《真理报》编辑部”、“亲爱的同志们”,饱含浓烈的感情色彩,显得格外亲切。信中用了“最诚挚的兄弟情谊”和“最良好的祝愿”等词句,显得庄重、热情,使人读后会顿时沉浸在伟人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那恢宏、博大的情流里,久久难以平静。

##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

——致刘建勋、韦国清<sup>〔1〕</sup>（1958年1月12日）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地方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上午七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刘建勋（1913—1983），河北沧县人。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

韦国清（1913—1989），广西东兰人，壮族。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七军连长，瑞金红军学校军事教员。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红军干部团营长，红军大学特科团代团长，红军教导师特科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副校长、新四军三师九旅旅长、新四军四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1950年任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1956年回国后，任广西省省长、公安军副司令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四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九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十届一中全会、十一届一中全会、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89年6月14日在北京逝世。当时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 【赏析】

1958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讨论1958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和“二五”计划的钢铁发展目标,会议还对1956年的“反冒进”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不要当“空头政治家”,指出,红而不专,脱离实际,会慢慢变色。他号召搞“实业”的要搞点政治,搞“虚业”的要研究点“实业”,并提倡“种试验田”。这次大会历时十天,促使党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有些地区和部门开始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但也有积极的一面,那就是它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为中央和全党开辟了新的思路。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给时任中共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集中谈了办好省报的问题,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对报纸工作一直是十分重视的。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所作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使党的纲领路线、方法、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等都是代表群众利益的,通过报纸,可以使政策为广大群众所认知,从而动员他们团结起来,为之奋斗。这正是党领导、组织广大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条重要纽带。办好报纸,把报纸办得引人入胜,在报纸上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内容。他还特别强调指出,要办好报纸必须实行群众路线,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毛泽东提出的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鲜明地体现在毛泽东给刘建勋、韦国清的这封信中。

此信直接点到地方报纸的问题,“送上几份地方报纸”,供刘、韦二人参考。这些报纸编得好,较为引人看,内容不错。毛泽东通过这种方式,让刘、韦二人认识到《广西日报》的不足。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没有鉴别就不会有进步。毛泽东在强调办好地方报纸以前,没有直接指出《广西日报》如何如何的不足,而是提供几份办得好的地方报纸,这就在无形中让刘、韦二人看到了《广西日报》的差距。有了这个认识,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省报问题是一个极重要问题,值得认真研究”的主张。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强调办好省报,是因为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靠报纸,单靠开会效果有限。为此,他指出,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他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的问题”。对于如何研究办好省报问题,毛泽东不仅提出问题,而且提供方法:“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都要研究。要“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这句话,看似朴实,实则体现了毛泽东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各省报纸要把外地的经验和本地的工作实践相结合,这样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循环往复,以至无穷,就能逐步提高起来,“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接着,毛泽东又重点强调指出:“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毛泽东对报纸的建设常常是精心予以指导的,他曾告诫人民日报社的负责同志,报纸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

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同时，吸收报纸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这就是政治家办报。对于《广西日报》，毛泽东提示刘、韦二人：“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并强调指出：“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毛泽东之所以这样重视省报，原因何在？信的末尾，毛泽东概括地写道：“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地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

通篇书信，思路清晰，脉络分明，有启发，有要求，有指示，有建议，更有鼓励，内容丰富，包容量大，在语言运用上，冷静客观。像“值得认真研究”，“要共同研究”，“以为如何”等句子，语言质朴感人，启人深思。

## “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

——致刘少奇<sup>[1]</sup>（1958年2月10日）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sup>[2]</sup>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sup>[3]</sup>，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sup>[4]</sup>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意。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象齐白石<sup>[5]</sup>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刘少奇，参见本书第342页注[1]。

[2] 贺知章，唐代诗人。

[3] 这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中的一句。原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信中提到的“‘少小离家’一诗”即指这首诗。

[4] 李白，唐代诗人。

[5] 齐白石，参见本书第451页注[1]。



## 【赏析】

贺知章是唐代著名诗人，风流倜傥，狂放不羁，清心寡欲而又光明磊落，在长安为官多年。天宝三年，他辞去朝廷官职，告老还乡，时已86岁，距他中年离乡已50余年。人生易老，世事沧桑，心头自然有无数感慨，《回乡偶书》一诗正是写于此时。“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虽未改，但时光流逝，“鬓毛”已悄悄斑白，所以故乡的“儿童”不认识了，竟问从何处而来，给人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对于后两句的理解，诸家各执己见，众说纷纭。1958年初，刘少奇同志在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中认为，“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儿童”当是贺知章的儿女，由儿女在家推断古代官吏为官上任禁带眷属。毛泽东听后认为不妥，反复琢磨，并从《全唐诗话》、《旧唐书》等书，特别详细地查对了贺知章的生平。1958年2月10日上午，给刘少奇同志写了这封信。

毛泽东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推断：（一）贺知章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有六七十了。由此，毛泽东推断，“儿童相见不相识”中的“儿童”，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应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这一推论就使诗后两句的意义更加广泛，增强了诗的艺术表达效果。（二）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没有眷属，似不太可能。（三）贺知章虽信道教，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作为一个高龄人，生活难以自理，没有亲属共处，似不太现实。虽然他胸襟洒脱，但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因此，不可能长期独处。（四）以历史文献为据，“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以此诗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证明是不充分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查阅《唐书·文苑·贺知章传》，对自己的见解再加印证，最后强调“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在信中对贺知章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指出贺既是诗人，又是书法家；既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又是一个勤于苦学的人。他指出，评定文学史上的人物，不仅要看他的诗作，还要观其为人，应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与分析。

这封信紧紧围绕一个问题，依次递进，反复论证，水到渠成，自然得出结论；既有史料可依，又有严密推证。但毛泽东并不以为这就是终极真理。“这是我的看法”、“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等语，让人感到毛泽东的谦虚和认真。

## “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

——致田家英<sup>[1]</sup> (1958年4月27日)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sup>[2]</sup>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sup>[3]</sup>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sup>[4]</sup>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月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参见本书第476页注[1]。

[2] 班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撰有《汉书》。

[3] 贾谊，西汉政论家、文学家。参见本书第29页注[7]。

[4]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参见本书第253页注[2]。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参见本书第536页注[1]。

### 【赏析】

1958年4月，针对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指出，生产要务实，宣传要实际，深入、细致、踏实，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和建议，是他尊重实际、坚持真理的思想表现，而且对历史多有借鉴。致田家英的这封信，就是为建议他读史书而写的。

此信称“家英同志”，显得亲切自然，给人一种被信任之感。信的正文直截了当：“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班固是东汉的史学家、文学家，撰有《汉书》。在《汉书》中，他专门为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作传。毛泽东所说的《贾谊传》就是指此。贾谊一生宏文巨著不少，但失传颇多，留在《史记》中的只有《吊屈》、《鹏鸟》二赋和《过秦论》、《治安策》二文，而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又略去了《过秦论》，仅留“二赋一文”，即《吊屈》、《鹏鸟》和《治安策》。毛泽东在此信中指出，对于“二赋”可以不阅，这就点出了信中主要的要求和建议，那就是仅读一下《治安策》一文。为了引导田家英更好地读这篇文章，毛泽东对《治

安策》还作了概括介绍。《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是贾谊于南放归来著给汉献帝的，为国家长治久安提出了一些谋略。文中“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古书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论太子一节”虽近于迂腐，但掩盖不了此书的价值，它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值得一看”。从中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贾谊的居安思危、痛陈弊端、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是肯定和赞赏的。

通篇书信围绕建议田家英读《治安策》一书而展开，先介绍了贾谊的其人其文，然后重点介绍《治安策》，高度评价了此书的长处，据此提出了阅读的建议。这样显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层层递进，因果相成。此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耐心细致、深入浅出的诲人艺术。在语言运用上，显得语句通俗，逻辑严谨，语气平易，语势连贯，在字里行间闪烁着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火花。

毛泽东所倡导的贾谊居安思危、直陈时弊、坚持真理的精神，是值得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借鉴的。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而且必须具有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精神，敢讲真话和实话，不说违心话、虚话、假话。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 “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

——致张治中<sup>[1]</sup>（1958年5月22日）

文白先生：

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sup>[2]</sup>，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张治中（1890—1969），著名爱国将领，原国民党二级上将。字文白，安徽巢县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后在粤、滇、桂、川军中任职。1924年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官团团长。曾参加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诸役。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长。攻克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1928年后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厅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武汉行营主任，教导师师长。曾率部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蔡廷锴军的作战。1932年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1933年任东征军第四路总指挥，与福建十九路军作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指挥前期淞沪抗战。后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1945年任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等职，主张国共谈判，和平建国。1946年与周恩来、马歇尔组成军事调处三人小组，研究军队统编问题。1949年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与中共谈判，双方拟定的“和平协定”为国民党政府拒绝后，留住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建国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9年在北京逝世。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六十岁总结》，是张治中于1949年冬60岁时口授的一份自述。

### 【赏析】

毛泽东和张治中既是密友，又是诤友。张治中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位久负盛名的风云

人物。他为维护国共两党合作,弥合两党之间的裂痕,东奔西走,日夜操劳,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国共和谈的舞台上,他最为积极活跃,人称“和平将军”。北平谈判期间,张治中被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诚意和胆略所折服,毅然投向人民的怀抱。1958年5月,整风反右运动接近尾声时,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讨书》,连同1949年所写的《六十岁总结》一并送给毛泽东审阅。5月22日,毛泽东一口气读完后,欣然命笔,写了这封信。

《六十岁总结》一书中,作者回忆了60年走过的路程。由于作者本人长期所处的环境,作品中体现出的世界观与共产党人的世界观相比“是有距离”的,正如作者所说:“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败坏下去……。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办法了,我就如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在精神上得到了解放。”作品中体现出的要求进步的意愿让毛泽东高兴。对于这个向前进取的意愿,毛泽东认为是来之不易的。“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这是毛泽东善解人意的生动体现,也反映他对张治中真诚合作,充分信任、互相谅解的态度。

此信在语言运用上,用词浅显而朴实,如“原封不动”、“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我猜想”等近似口语,亲切自然。在句式运用上,长短兼用,显得语气或缓或促,有张有弛。特别是“高兴是在……是在……是在……”一句,构成排比气势,加重了语气,增进了解,读来让人振奋。

## “问题还在争论中”

——致周谷城<sup>[1]</sup>（1958年7月28日）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敢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教安！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1921年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任湖南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1926年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兼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1930年后，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教务长，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会长，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农工民主党第九届中央主席。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党名誉主席。著有《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中国政治史》、《史学与美学》等。当时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 【赏析】

周谷城作为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史学和哲学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对历史和哲学同样有着浓厚兴趣的毛泽东，经常邀请周到家中做客，并鼓励他参加“百家争鸣”，活跃学术气氛，更希望他在逻辑学研究方面有大的突破。周谷城不负厚望，不久完成了《形式逻辑与辩证法问题》一书。在即将出版之际，他写信给毛泽东，就一些有关问题向主席请示并希望主席为之作序。毛泽东阅后写下了这封短信。

毛泽东生于1893年，比周大六岁，但信中却以“兄”相称，表达了毛泽东对周谷城的尊重和信任。众所周知，毛泽东对逻辑和哲学的研究是很有造诣的，有不少脍炙人口的佳作。但在信中，毛泽东却谦虚地说：“不敢有所论列”。毛泽东早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

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是有害于艺术和科学发展的。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往往需要考验的时间。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作结论。所以,毛泽东在此信中拒绝过早地谈类似结论的东西。“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对于要求写序一事,毛泽东也婉言谢绝了。由此可知,毛泽东不急于公开发表意见,正是为了让大家继续讨论,使争鸣开展下去。名为不便插手,实却从争鸣的角度,让问题进一步得到深入探讨解决,表达了毛泽东对逻辑学研究的重视、爱护和支持。无怪乎周谷城读罢此信,几天里感动不已。他不仅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明白了毛泽东对争鸣的支持。为了感谢毛泽东的知遇之恩,周谷城作了一首题为《献衷心》的词:“是此身多幸,早沐春风。阙旧染,若新生。又这回倾听,指点重重;为学术,凡有理,要争鸣。情未已,兴偏浓,夜阑犹在诲谆谆。况正逢佳节,大地欢腾。人意泰,都奋进,莫因循。”



谷城兄：  
兩次熱情的信都已  
收到，甚感！大甘齋出  
版，可資情懷。我不知  
還輯否？多研究，少教習，所  
編子，可題之在奇編中。

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過  
 宜；正序的，不~~我~~座命，  
 可~~我~~後~~我~~？~~我~~夜。  
 順~~我~~十~~我~~也！  
 毛澤東  
 七月二十八日

## “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

——致周世钊<sup>〔1〕</sup>（1958年10月25日）

惇元兄：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坐地日行八万里，蒋竹如<sup>〔2〕</sup>讲得不对，是有数据的。地球直径约一万二千五百公里，以圆周率三点一四一六乘之，得约四万公里，即八万华里。这是地球的自转（即一天时间）里程。坐火车、轮船、汽车，要付代价，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价（即不买车票），日行八万华里，问人这是旅行么，答曰不是，我一动也没有动。真是岂有此理！囿于习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却以为怪。巡天，即谓我们这个太阳系（地球在内）每日每时都在银河系里穿来穿去。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们人类只是“巡”在一条河中，“看”则可以无数。牛郎晋人，血吸虫病，蛊病，俗名鼓胀病，周秦汉累见书传，牛郎自然关心他的乡人，要问瘟神情况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记错了？），属银河系<sup>〔3〕</sup>。这些解释，请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十一月我不一定在京，不见也可吧！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世钊，字惇元，1958年7月起任湖南省副省长。参见本书第387页注〔1〕。

〔2〕蒋竹如，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同学。参见本书第472页注〔1〕。

〔3〕牛郎星不属大熊星座，它是天鹰星座中的 $\alpha$ 星。大熊星座中的星和牛郎星都属银河系。

## 【赏析】

1958年7月,周世钊当选为湖南省副省长,他既兴奋,又不安,喜的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但又顾虑自己能力有限,难负重托。左思右想,胸臆不吐难快。10月17日,他想起了挚友毛泽东,并致函陈述心理顾虑。一周之后,毛泽东回复的就是这封信。

信的称谓平易近人,亲如兄弟。信的第一层意思,毛泽东从就任新职的态度上劝告:“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有了这样的态度就有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然后,毛泽东又从能力上给周世钊以激励。为了使人易于接受,毛泽东引用古人的话,说明贤能二者不可得兼,而“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这就从贤德和能力两个方面对周世钊进行了高度评价。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周世钊感觉自己能力不行的原因:一是主观上认识不足,并不是无能,而是没有好好认识自己;二是客观上不能很好地了解社会常态——“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并指出这是“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最后,毛泽东又从周世钊的性格上进行分析。“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等语,吹去了周世钊内心的诸多心理阴云,使他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毛泽东的诸多劝告可谓忠言,而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但毛泽东对自己的意见,仅仅视为“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醋而已”。此语寓庄于谐,意味无穷。

信的第二层,毛泽东就蒋竹如对《送瘟神》一词的几点疑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上载,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病。毛泽东读后,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在微风拂煦,旭日临窗之时,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就《送瘟神》一词,但他的同窗好友对其中的“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两句表示迷惑不解。对此,毛泽东耐心地一一作了解释,请周士钊告诉蒋竹如,并说“有不同意见,可以辩论”,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对待争论问题的正确态度。

此信结构层次清楚,脉络分明。对周世钊的劝告,本着鼓舞士气的原则,从主观到客观,从心理素质到个性特点等多方面进行,特别是“我看你这个人是可以兼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日,应当刮目相看”等语,在客观上起到了励人之志,激人之心的作用。对蒋竹如的解答,则本着弄清楚问题的原则,对一句、一词、一字,分别作解,或下结论,或作类比,通俗明了,极具耐心。通篇语言生动有趣,耐人寻味。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毛泽东的书信,使周世钊顾虑顿消,精神抖擞,信心百倍。人逢难处想知音。周世钊每遇疑难,毛泽东都以诚相待,且高瞻远瞩,珍视友情更重大义,“文革”期间,周世钊遭红卫兵“光顾”,痛惜之情溢于言表,毛泽东全力支持他,“不要心存芥蒂,当说的说,当管的管。”周世钊当时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湖南省主任委员,毛泽东对同窗挚友推心置腹之情,无不渗透着他对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长期共存”之诚。

# “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

——致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sup>[1]</sup>

(1958年10月25日)

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

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中国人自己解决。一时难于解决，可以从长商议。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sup>[2]</sup>，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你们知道张作霖<sup>[3]</sup>将军是怎样死去的吗？东北有一个皇姑屯，他就是在那里被人治死的。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分子都没有良心。美帝国主义者尤为凶恶，至少不下于治死张作霖的日本人。同胞们，我劝你们当心一点儿。我劝你们不要过于依人篱下，让人家把一切权柄都拿了去。我们两党间的事情很好办。我已命令福建前线，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使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上的军民同胞都得到充分的供应，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你们长期固守。如有不足，只要你们开口，我们可以供应。化敌为友，此其时矣。逢单日，你们的船只、飞机不要来。逢单日我们也不一定打炮，但是你们不要来，以免受到可能的损失。这样，一个月中有半个月可以运输，供应可以无缺。你们有些人怀疑，我们要瓦解你们军民之间官兵之间的团结。同胞们，不，我们希望你们加强团结，以便一致对外。打打停停，半打半停，不是诡计，而是当前具体情况下的正常产物。不打飞机场、码头、海滩、船只，仍以不引进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小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它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其实并非当作一个国家。这种“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国民党朋友们，难道你们还不感觉这种危险吗？出路何在？请你们想一想吧。此次蒋杜会谈文告不过是个公报，没有法律效力，要摆脱是容易的，就看你们有无决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切爱国

者都有出路,不要怕什么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并不劝你们马上同美国人决裂,这样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最后走到存身无地,被人丢到大海里去。我们这些话是好心,非恶意,将来你们会慢慢理解的。

国防部长 彭德怀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刊印

## 【注释】

〔1〕这是《人民日报》正式发表的《再告台湾同胞书》。这篇文稿是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但毛泽东的手稿没有保存下来,只有一份毛泽东修改的打印件。

〔2〕杜勒斯,当时任美国国务卿。

〔3〕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奉系军阀首领。1928年6月作战失利,乘火车退回东北,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

## 【赏析】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美国要求中国承担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义务,承认美国在中国的领土台湾有所谓“单独和集体的自卫”权利,企图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事实。中国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指出,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局谈判,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澎湖、金门、马祖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但是这属于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不能成为中美会谈的议题。中国的这一正义原则立场,遭到了美国的顽固拒绝。为了打击国民党部队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活动的前沿阵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开始炮击金门。美国急忙增兵台湾海峡,并派舰队为国民党舰队护航,侵入中国领海,美国这种搞“两个中国”的企图,不但是中国政府坚决反对的,台湾当局也十分不满。毛泽东考虑到在反美搞“两个中国”这一点上,中国人民同国民党集团之间存在着的共同点,决定让金门、马祖暂时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毛泽东利用美蒋矛盾,指出,只是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而且单日只打码头、机场,不打岛上工事、民房,打也是小打小闹,甚至连小打也不一定打。从军事上看,中外战史从未有过,但这是政治仗,政治仗就得这样打。10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布的这封再告台湾同胞书。

全信有以下两个特点:

一是中心突出,思想明确。全信开门见山,起笔破题,提出绝大多数人爱国,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个主题思想贯串全篇。仿佛信中的“魂”,使得整篇书信貌似“形散”,不尽连贯,但却有“神聚”之效。中间虽有穿插,但不突兀,而是靠内在联系和逻辑力量,很好地贯彻了中心思想。

二是叙述形象、生动。如用“政治掳客杜勒斯”、“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等话,来刻画美国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企图。信中说“沿海岛屿”,而说“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大小岛屿”,不仅仅说“供应”,而具体说“包括粮食、蔬菜、食油、燃料和军事装备在内”,这就给人以形象、生动、深刻而具体的印象。



## “这篇文章可以转载”

——致吴冷西<sup>[1]</sup> (1958年10月)

吴冷西同志：

这篇文章<sup>[2]</sup>可以转载。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永远有许多人总是不得解决。《世界知识》编辑部将我各个时期阐述这个观点的文章收集起来放在一起，看起来好象竟成一篇新文，似不妨予以转载，并予广播。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小册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册子。你看如何？请你和陆定一<sup>[3]</sup>同志商量一下，看他同意否？《世界知识》编者按语，或者照登，或者另写一段，由你酌定。

毛泽东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吴冷西(1919—2002)，广东新会人。1937年起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起任中共中央机关刊《解放》半月刊干事，《解放日报》编辑、国际评论部主任。1948年起任新华社编辑部主任、副总编辑、总编辑、社长。1957年至1966年兼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75年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和毛选材料组领导成员。1977年起任中共中央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播电视部部长。中国共产党第十一、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

[2] 指《世界知识》1958年第20期刊载的《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

[3] 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参见本书第337页注[1]。

### 【赏析】

1958年7月以来，蒋介石等人配合美国对黎巴嫩的侵略，疯狂叫嚣“反攻大陆”，并命令大小金门岛和马祖岛上的蒋军不断炮击我沿海村镇。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于8月23日，向金门蒋军和驶往金门的蒋军运输舰进行了警告性的炮击。9月初，美国从各地调兵，加强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兵力，并派出军舰、飞机，直接为蒋军驶往金门的运输舰护航，对我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我福建前线炮兵部队奉命于9月8日、11日和13日，又对金门和驶往金门的蒋军运输舰，进行了三次警告性大规模的猛烈炮击。同时，全国人民



掀起了反对美帝武装挑衅的高潮。为了击破美帝国主义要把台、澎、金、马这个中国国内问题变为所谓“国际问题”的阴谋,10月6日,毛泽东撰写了国防部长告台、澎、金、马军民同胞书,指出,从当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列。文告严正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可谈,台湾和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这是中国内部的问题,或谈或打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美帝国主义必须从中国的领土上撤出去。为了配合现实斗争,增强人民反帝信心,《世界知识》1958年第20期刊载了毛泽东的《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为了扩大宣传,毛泽东给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同志写了这封信。

此信开门见山,直言指出:“这篇文章可以转载。”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代表腐朽势力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没有前途,它们的一切猖獗,不过是表示垂死挣扎;第二部分论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外强中干,革命的人们有理由在战略上藐视他们,但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斗争中又要重视他们;第三部分论述了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并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必将被打败。但是,毛泽东的这个观点,在世界范围内还有许多人不能理解,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这个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大问题”,而《世界知识》编辑部把毛泽东关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讲演,谈话加以披露,这对中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帮助。所以,毛泽东建议“重新译成三四国外文出小册子。中文也可出一小册子”,以更好地指导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

通篇书信围绕《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篇文章层层展开,语言朴实、流畅、亲切感人,特别是像“你看如何”、“请你和陆定一同志商量一下,看他同意否”、“或者照登,或者另写一段,由你酌定”等语言,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吴冷西的信任和尊重,以及礼贤下士、民主平等的工作作风。

## “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

——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  
(1958年11月9日)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sup>〔1〕</sup>。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一临到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于郑州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即人民出版社1958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

### 【赏析】

1958年九、十月份，以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为标志的“大跃进”已经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全国上上下下“拔白旗”、“插红旗”、“大辩论”、“放卫星”，指标一个比一个高，头脑越来越热，直到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和“共产风”等“左”倾错误。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表明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党

领导经济建设缺乏经验。为了弄清真实情况,毛泽东从“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热闹场面中沉静下来,乘专列到全国各地巡视,并开始做“降温”工作。

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军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结合视察过程中出现的诸多混乱现象,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前提下,着手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一些错误,并针对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党知之甚少,又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的现状,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委的委员同志们,认真读一点书。当然,书本上也未必能找到现成答案。但读与不读,毕竟不大一样。

此信“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这样就开门见山地指出了问题。“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之所以向同志们介绍这两本书,是因为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里糊涂,昏昏沉沉。搬出斯大林,是希望对一些同志进行说服工作,所以要参考《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问题。这两本书很好地论述了什么是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为什么要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尊重价值规律等等。毛泽东提出了具体要求:“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的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这里,毛泽东首先教人要随读随想,注意辨别;其次,毛泽东又从争论的角度上,教育人们在读时,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条加以讨论;再次,毛泽东要求人们,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读这两本书。毛泽东一生酷爱书,也酷爱读书,更善于读书。他不仅重视读书,更注重读“无字”大书,不仅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书籍,而且能够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大量吸取精华,剔除糟粕,为我所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强调了读苏联的这两本书的目的。毛泽东指出,读这两本书,目的在于澄清很多人的混乱思想,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信尾,毛泽东还介绍了苏联同志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指出:“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

此信观点鲜明,论证有力,论据充分,不但指出读书的任务,而且指出读书的方法和目的,使人读后觉得任务清、方法准,目的明。通篇书信,逻辑严谨,气势连贯,表现出了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诲人不倦的伟大品格。特别是信尾“同志们觉得如何呢”一句,有力地引发了读者的共鸣,激发了同志们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 “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

——致刘思齐<sup>[1]</sup>（1959年1月15日）

思齐：

不知你的情况如何，身体是否有起色，极为挂念。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我好，只是念你。

祝你平安。

父亲

一月十五日

根据华龄出版社一九八九年出版的  
《生活中的毛泽东》刊印

### 【注释】

[1]刘思齐，1930年生，刘谦初与张文秋之女，1949年同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结婚。1950年毛岸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后，1955年至1957年，刘思齐在苏联学习。曾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工作。

### 【赏析】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毛岸英不幸为国捐躯。噩耗传来，毛泽东非常悲痛。然而，丧子的巨痛他忍住了。他知道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为国际共产主义而牺牲，是共产党员的责任。但对于岸英的妻子思齐，毛泽东忍痛两年之后才不得不把这一消息告诉她，刘思齐悲痛至极。为了换换环境，学点技术，刘思齐来到苏联留学。在学习期间，毛泽东写信给她，嘱咐她争口气，学成回国效力，多读报纸，看些国内消息，多了解国内情况。刘思齐回国后，因为江青的阻拦，却与毛泽东隔绝了。1959年，毛泽东在新春佳节将至之时，想到了多日不见的刘思齐，1月15日那天，给刘思齐写了这封信。

此信称谓“思齐”，落款“父亲”，可以让人感到一种浓烈的亲情。毛泽东对思齐的爱，并未因岸英的牺牲而变淡，也未因江青的阻挡而隔断，相反地，看到思齐，仿佛看到了岸英。呼唤思齐，也同样会激发起他对岸英的怀念。一年已近尾声，新春佳节将至，思齐近况如何呢？这是毛泽东最关心的。所以，在信中首先写道：“不知你的情况如何，身体是否有起色”。岸英的牺牲重重地撞碎了思齐的心，在心灵深处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悲伤。丧夫的巨痛，使她日益憔悴，寝食不安，神经衰弱。“极为挂念”四个字，分量很重，饱含了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对刘思齐的无比关切。据刘思齐回忆说，岸英牺牲后，毛泽东关心着自己

的思想、学习、工作、健康乃至婚姻。毛泽东的确如慈母一样时时刻刻关心着刘思齐的健康和进步。毛泽东知道，岸英牺牲的时候，刘思齐才19岁，人生才刚刚起步，青春不能因此而消沉。应当时时催促她成长、进步、振奋精神。由于江青等人的造谣和阻拦，刘思齐受到了恶语中伤甚至被人轻视、仇视。毛泽东对此是痛苦的，越是痛苦，就越是牵挂，越是关切。在此信中，毛泽东写道：“要立雄心壮志，注意政治理论，要争一口气”，不为别的，要“为死者，为父亲，为人民，也为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争这一口气”，充分表达了毛泽东鲜明的爱憎情感和殷切期望。信的最后，毛泽东为不使刘思齐挂念自己，轻描淡写地写道：“我好，只是念你”，并祝刘思齐“平安”。至此，作为父亲的毛泽东那博大无私的父爱已经完全展现纸上。

此信虽短，却寄托着毛泽东对刘思齐的关切之情。全信语言简约，但字里行间，浓情一片，其中不乏有挂念之情，期望之情，还有对那些轻视、仇视的人们的愤懑之情，更有“祝你平安”的祝愿之情。读来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 “直指英印,不要躲闪”

——致胡乔木、吴冷西、彭真<sup>〔1〕</sup> (1959年4月25日)

乔木、冷西、彭真同志:

“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全国一律照18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sup>〔2〕</sup>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前昨两天报纸好了,声势甚大。也有缺点:印度、锡兰、挪威三国向我使领馆示威,特别(是)侮辱元首这样极好的新闻,不摆到显著地位,标题也不甚有力<sup>〔3〕</sup>。短评<sup>〔4〕</sup>好,不用“本报评论员”署名,则是缺点。昨天评论,人民日报的评论不如光明的评论<sup>〔5〕</sup>有力,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我有这种感觉。请注意: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sup>〔6〕</sup>,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尼赫鲁廿四日与达赖<sup>〔7〕</sup>会面后放出些什么东西,我们如何评论,你们今天就要研究,可以缓一两天发表。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廿五日上午六时

根据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出版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刊印

### 【注释】

〔1〕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的秘书。参见本书第513页注〔1〕。

吴冷西,当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参见本书第722页注〔1〕。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二届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和秘书长、三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参见本书第686页注〔1〕。

〔2〕这里的“18日”可能是20日之误。《人民日报》1959年4月21日发表了新华社政治记者20日的一篇评论,题为《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其中讲到:4月18日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

〔3〕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第六版登载的三则新闻:《孟买“示威者”侮辱我国领袖,公然在我领事馆前猖狂侮辱毛主席像》、《锡兰一群僧侣兴风作浪,竟到我驻锡使馆无理取闹》、《挪威执政党公然诽谤我国,奥斯陆报纸恶毒侮辱我国领袖毛主席》。锡兰,即今斯里兰卡。

[4]指1959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登载的《原来如此!》和《此地无银三百两》两篇短评。

[5]指1959年4月24日《光明日报》发表的题为《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的评论。

[6]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政府总理。

[7]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学会名誉会长。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出走印度。

## 【赏析】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反动的农奴制度,公然撕毁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以拉萨为中心发动了全区性武装叛乱,分裂祖国。17日,达赖喇嘛潜往印度。19日夜,反动集团指挥藏军和叛乱分子向驻拉萨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面进攻。毛泽东文武兼用,一方面命令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3月20日开始,展开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作战,另一方面又就如何对外宣传问题进行了周密部署。4月8日,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强调要马上准备对西藏叛乱事件以及印度当局的态度发表评论,要求《人民日报》要着手准备一篇比较充分的、把问题展开来讲的社论。当时英国、美国和印度吵吵嚷嚷,搞反华大合唱,支持西藏上层叛乱集团,反对平叛。毛泽东指示,要沉着应战,在宣传上加以反击。4月22日,毛泽东又提出集中反击印度方面在西藏叛乱事件中的反华言行。4月25日,毛泽东给胡乔木、吴冷西、彭真写了这封信。

此信对“帝国主义、蒋匪帮及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干涉中国内政”这个说法提出了批评,因为与蒋匪帮的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只有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策动西藏叛乱才是干涉中国内政。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不能相提并论。况且“帝国主义及外国反动派”所指范围太广,打击一片,树敌太多。所以,毛泽东批评说:“这个说法,讲了很久,全不适当”,并指示,立即收过来,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这就使斗争的对象明朗化、具体化。然后,要求“全国一律照十八日政治记者评论的路线说话”,“今日请乔木、冷西召集北京各报及新华社干部开一次会,讲清道理,统一规格。请彭真招呼人大、政协发言者照此统一规格,理直气壮。”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此问题上,一是希望“突出对象”,二是希望“声势浩大”。接着毛泽东又对几天来的报纸,指出了优点和不足。信末,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不要直接臭骂尼赫鲁,一定要留有余地,千万千万”,但要研究如何评论尼赫鲁言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尼赫鲁的态度是要尖锐批评,不怕刺激他,要斗争到底。这里的斗争显然是靠笔战、舌战。这就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在处理英印集团策动西藏叛乱这一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以及讲究灵活性和策略性的斗争艺术。

通篇语言准确有力,鲜明生动,如“全不适当,要立即收过来”、“直指英印,不要躲闪”,“统一规格,理直气壮”等语言,显得语气硬朗,观点明确,立场坚定。同时信中还用“狼狈为奸”形容英印集团,用“一个是女孩子”,“一个[是]青壮年”分别来形容《人民日报》的评论文章《予诽谤者以打击》和《光明日报》的评论文章《清醒点,印度扩张主义者》,形象生动,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 “要如实公开报道”

——致胡乔木、吴冷西<sup>[1]</sup>（1959年6月20日）

乔木、冷西同志：

广东大雨<sup>[2]</sup>，要如实公开报道。全国灾情，照样公开报道，唤起人民全力抗争。一点也不要隐瞒。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讲究对策。此件<sup>[3]</sup>阅后退回。

毛泽东

六月二十日上午四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参见本书第536页注[1]。

吴冷西，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参见本书第513页注[1]。

[2]指1959年6月广东东江流域暴雨造成的大水灾。当时东江流域几个县的县城和绝大部分村庄，农田被淹，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受到很大的损失。

[3]指新华通讯社编印的《内部参考》第2801期上刊登的广东东江流域遭受大水灾的消息。

### 【赏析】

1959年6月，广东东江地区暴雨成灾，几个县的县城和绝大部分村庄、农田被淹，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损失。新华社在内部发行的《内部参考》第2801期上刊登了这一消息。毛泽东看到以后，对新闻界要不要如实公开报道自然灾害情况的问题，于6月20日给胡乔木、吴冷西写了这封信。

早在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就针对干部中存在向上级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提倡学习忠贞而敢谏的明朝官员海瑞。4月底，他直接给省以下各级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信，着重提出要讲真话的问题。“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所以毛泽东指示：“要如实公开报道。”这一主张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要求。因为只有报道得实在、公开，才能更好地让群众了解真情，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全力以赴抗灾救灾。更重要的是树立一种讲真话、讲实话的正气，充分发挥报纸宣传者、组织者的作用，“一点也不要隐瞒”，

充分表明了毛泽东的决心和态度,是对“如实公开报道”的突出强调,也是毛泽东一贯坚持的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

毛泽东非常重视报纸的宣传作用,报纸的宣传不仅要让领导者知道,而且要让全体群众知道。只有群众知道了真相,才有共同的目标,才会齐心协力去做。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于它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迅速地同最广泛的群众见面。失实的、封闭的报道,只能蒙蔽群众,最终受到群众的冷遇。只有如实报道,才能帮助群众分析困难,一同讨论解决困难的办法,起到武装人、启发人、鼓舞人、引导人、团结人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在信中说:“政府救济,人民生产自救,要大力报道提倡。”不仅农业自然灾害要如实公开报道,“工业方面重大事故灾害,也要报道”,而且要“讲究对策”。

此信虽短,却字字千钧,集中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要如实公开报道”、“一点也不要隐瞒”、“要大力报道提倡”等语,句句中肯,语重心长。

## “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

——致田家英<sup>[1]</sup>(1961年1月20日)

田家英同志:

(一)《调查工作》<sup>[2]</sup>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sup>[3]</sup>各一份,注上我请他们修改的话(文字上,内容上)。

(二)已告陈胡,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共三个组,每组组员六人,连组长共七人,组长为陈、胡、田。在令、明、后三天组成。每个人都要是高级水平的,低级的不要。每人发《调查工作》(1930年春季的)一份,讨论一下。

(三)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六个组员分成两个小组,一人为组长,二人为组员。陈、胡、田为大组长。一个小组(三人)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十天至十五天。然后去广东,三组同去,与我会合,向我作报告。然后,转入广州市作调查,调查工业又要有一个月,连前共两个月。都到广东过春节。

毛泽东

一月二十日下午四时

此信给三组二十一个人看并加讨论,至要至要!!!

毛泽东又及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参见本书第476页注[1]。

[2]《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写的一篇关于调查研究的文章。1964年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时,将原题《调查工作》改为《反对本本主义》。

[3]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参见本书第253页注[2]。

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参见本书第536页注[1]。

### 【赏析】

由于“大跃进”运动过火,“浮夸风”、“共产风”等脱离群众的过激倾向不断滋长,全国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农村中的饥饿、疾病、死亡现象接连发生,人民群众空前的建设热情受到严重挫伤。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民问题,毛泽东决心及时地予以纠正。1960年11

月1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的瞎指挥风》,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解决。为此,毛泽东极力倡导调查研究,并身体力行,亲自乘专列到各地巡视,了解基层情况,同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1961年1月20日,毛泽东针对派中央调查组到全国农村开展调查工作一事,特意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这封信。

要调查研究,不能不先从理论上武装调查人员的头脑,让他们带着任务和方法去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写的《调查工作》等文章中,就鲜明地论述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的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调查的技术”等问题,对调查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所以,毛泽东在信中指示:“《调查工作》这篇文章,请你分送陈伯达、胡乔木各一份”,并请他们结合实际情况修改。然后就调查小组的组成、组员的素质情况等一一作了详尽的指示,就调查的时间、地点、要求、计划等一一作了安排。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早年投身革命时,他就很重视社会调查,新民学会期间,他多次下乡调查,大革命时期曾作过五县考察,红军初创时还到过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调查,他还常说,我们犯错误,首先就是情况不明,掌握不了真实情况。情况不明,决策就不准,就要吃败仗。所以,在他的指示下,三个调查组于1月21日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此带动下,大批领导同志深入基层,不仅成为我党60年代前期转变工作作风的思想先导,而且结出了一系列像《农村六十条》那样的丰硕成果。

通篇书信在结构上采用并列式,并且每段叙述一件与调查研究工作有关的事,每段前都标有序号,显得层次分明,不枝不蔓,极有条理。在语言运用上,此信不厌其详,周到细致,平易通俗,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和他身边工作人员之间亲密无间、融洽和谐的工作关系,以及对调查研究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 “就照这样付印”

——致何其芳<sup>[1]</sup> (1961年1月24日)

何其芳同志：

此件<sup>[2]</sup>看过，就照这样付印。付印前，请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sup>[3]</sup>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出书的时候，可将序文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登载。另请着手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此书能在二月出版就好，可使目前正在全国进行整风运动的干部们阅读。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一月二十四日

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sup>[4]</sup>。

根据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的  
《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刊印

### 【注释】

[1]何其芳(1912—1977)，四川万县人，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所长。

[2]指何其芳写的《〈不怕鬼的故事〉序》。

[3]刘，指刘少奇。参见本书第342页注[1]。

周，指周恩来。参见本书第431页注[1]。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参见本书第527页注[1]。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参见本书第293页注[1]。

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参见本书第305页注[1]。

[4]何其芳送审的《〈不怕鬼的故事〉序》第八页第一、第二行原文是：“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毛泽东改作：“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

### 【赏析】

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门妨碍“苏美合作”，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诺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不能接受。在这种动荡和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坚持各党各国独立自主，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平等关系和霸权主义。毛泽东于1958年10月26日同吴冷西、田家英谈话中指出：“《聊

斋志异》中写了很多不怕鬼的故事。其中一篇名为《春风》，说的是狂生耿去病夜读于荒宅，一鬼披发入，面黑如漆，张目视生，生笑，染指砚墨自涂，灼灼然相与对视，鬼渐而去。你不怕鬼，鬼也无可奈何。炮打金、马的经过也是这样。”10月3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毛泽东《论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1959年春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文学研究所接到中央书记处布置的任务，选编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此，毛泽东要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为此书起草序文，并要求完后送阅。1961年1月4日，毛泽东同何商量，谈到序文时指出：“除了战略藐视，还要讲究战术上重视。对具体的鬼，对一个一个的鬼，要具体分析，要讲究战术，要重视，不然，就打不败它。”1月23日，毛泽东又在序文上加上两处：“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另加一处是：“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1月24日，何其芳派通讯员把誊清打印好的稿子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当天看完，写了这封信，并连稿子一并复回。

此信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就照这样付印。”但为慎重起见，毛泽东建议：“送清样给刘、周、邓、周扬、郭沫若五同志一阅，询问他们是否还有修改的意见。”至于如何出书，毛泽东作了详细安排，序文的刊登、书稿的翻译、出版的时间等，可以说周到细致。在落款后，毛泽东加上一句：“第八页第一第二行有一点修改”，是指毛泽东将“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向着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转化的”一句，改为“事物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通过斗争同它的对方交换位置，向着它的对方的地位转化的”这句话。在此信中，毛泽东之所以这样修改，就是因为“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毛泽东在序言中所加的话）。这正反映了他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思想。

通篇书信文辞简约，内容丰富，层次分明，条理清晰，语言朴实，明白如话，读之使人一目了然，清清楚楚。

## “向群众寻求真理”

——致邓小平<sup>[1]</sup> (1961年4月25日)

小平同志：

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于五月十五日到达北京，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们（列举名单，照广州原样）则于五月九日到达北京。此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sup>[2]</sup>和继续整“五风”<sup>[3]</sup>，不讨论工业和城市整风问题，或者只在会议末尾略为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留待七月会议上去讨论。为此，到会各同志，应利用目前这一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食堂问题、粮食问题、供给制问题、自留山问题、山林分级管理问题、耕牛、农具大队有好还是队有好问题，一、二类县、社、队全面整风和坚决退赔问题，反对恩赐观点、坚决走群众路线问题，向群众请教、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问题，恢复手工业问题，恢复供销合作社问题）进行重点调查，下十天至十五天苦工夫，向群众寻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此通知，请你找田家英<sup>[4]</sup>同志合作起草。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

毛泽东

四月二十五日上午九时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邓小平(1904—1997)，四川广安人。原名希贤，又名斌。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初回国，被派到冯玉祥部中山军政学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中共党组织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以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身份参加八七会议。后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29年底和1930年初，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在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右江前委书记、红七军政委、红八军政委、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总政委，红七军政委兼十九师政委。1931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会（昌）寻（鄔）安（远）中心县委书记、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星报》主编。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5年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调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后



又相继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代理书记。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晋冀鲁豫野战军政委、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政委、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建国后,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诬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而受到批判,并被解除一切职务,下放到江西劳动。1973年后,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1975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76年4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诬为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而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恢复一切职务。同年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81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委员,并在十二届一中全会和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分别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和中顾委主任。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1988年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中央军委主席。1997年2月因病逝世。主要著作编为《邓小平文选》等。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2]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草案全文共60条。

[3]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

[4]田家英,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参见本书第476页注[1]。

## 【赏析】

为纠正1958年以来农村工作中的错误,特别是人民公社化的错误,在毛泽东的领导和带动下,全党上下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工作。1961年3月29日,中央正式发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广州会闭幕后,由各级领导干部率领的调研大军,带着《六十条(草案)》开赴农村,同群众一起讨论,听取意见,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同时,各级党委、政府机关、民主党派和群众团体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为了收集调查研究来的意见,进一步纠正“五风”,党中央决定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北京会议。为此,毛泽东给邓小平同志写了这封信。

这是一封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同志起草通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共商国事的亲笔信。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也是他信任并乐意委以重任的亲密战友。所以,在信中毛泽东亲切地称“小平同志”,表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同志的无比信任。信的正文直截了当地布置任务,但态度谦和:“请你起草一个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然后是通知的内容；其中包括所要通知的对象及与会时间、地点、会议的任务，分门别类，一目了然。这次会议的任务是继续广州会议尚未完成的工作，收集农民和干部的意见，修改工作条例“六十条”和继续整“五风”。总之，是讨论农村工作，不讨论工业和城市问题。接着毛泽东对与会者提出了要求：应利用这段时间，对农村中的若干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寻求真理，目的是在会议上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任务。

向群众寻求真理，可以说是毛泽东总结党史经验得出的结论。从我们党的历史可以看出，什么时候全党重视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处处倾听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党的决策就比较正确，工作就比较顺利，即使发生了失误，也比较容易纠正。反之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所以，毛泽东对起草通知的时间、方式等注意事项作了布置，“今天晚上我们谈好，明天用电报发出，是为至盼”一句，体现了毛泽东为解决农村问题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态度。

## “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

——致李井泉并陈正人<sup>[1]</sup> (1961年5月6日)

四川省委李井泉同志，并转

简阳平泉公社陈正人同志：

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再去简阳做一星期，最好是两星期的调查，极为有益。井泉同志：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我渴望你的信。你去调查了没有？中央列举了一批调查题目，是四月二十五日通知你们的。五月四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将会期推迟到五月二十号，以便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时间，将那批问题搞深搞透，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大进一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请你们在这半个月内，下苦功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我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这半个月希望得到你们一封信。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

此信并告中央。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于上海

你们来信，用保密电话直达我的住地及火车上，勿误为要。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李井泉(1909—1989)，江西临川人。早年曾就读于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南下的南昌起义军。后任共青团东江特委秘书长。1930年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政委办公室主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后，任红三十五军政委，红军独立第三师政委，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和补充师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处主任、红九军政治协理员、红二方面军四师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副旅长和政委、大青山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秘书长、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中央军委直属二十兵团政委。建国后，任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兼川西行署主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军区第一政委、四川省人民政府主席、西南军区副政委、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副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协主席。是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三、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五中全会

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1989年4月24日在北京逝世。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陈正人(1907—1972)，江西遂川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江西省遂川县委书记，井冈山根据地湘赣边界特委副书记、江西省委代理书记、江西省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长。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吉林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建筑工程部部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等职。当时任农业机械部部长。

## 【赏析】

1961年3月15日，广州会议开幕。在会上，毛泽东指出，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作调查研究工作，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作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毛泽东坦诚地承认：最近几年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所付出的代价很大，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为补课起见，他提倡调查研究。他认为第一书记亲自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广州会议以后，为响应中央号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纷纷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进行比较扎实的调查。4月25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要他代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要求到会同志利用会前时间，对农村的食堂、粮食、供给制、自留山、山林分级管理，以及坚决退赔、走群众路线、恢复手工业、恢复供销社等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陈正人领导的调查组到四川简阳进行了实地调查后，将一份关于简阳平泉公社的调查报告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收到信后非常高兴，几天后就写了这封信。

此信说：“陈正人同志五月一日给我的信收到，很高兴。”并鼓励他回简阳农村再作两个星期的调查。因为这样，调查会更深入，对于解决问题也更有益处。然后，毛泽东又问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你去调查了没有？”像是询问情况又像是督促检查，也像是温和的批评。“我渴望你的信”一句，像是期待，又像是鞭策和鼓励。然后毛泽东解释一下他盼信的原因：中央为把问题调查清楚，切实纠正工作失误，希望到北京会议时，比起广州会议来，能够把问题搞得更深更透，能够大进一步。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求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在会前的半个月里，“下苦功夫去农村认真做一回调查研究工作”，并和他随时通信。为了打破有些同志的顾虑，防止做表面文章，毛泽东还特别就通信一事写道：“信随便写，不拘形迹”，“如果你们发善心，给我写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以及对了解下边情况的迫切愿望。

此信从表扬陈正人同志入手，表扬其不仅有调查而且有收获，并鼓励他再作深入调查。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巧妙地引出了对李井泉同志的“批评”，先称他“井泉同志”，既亲切又严肃，紧接着反问：“你为什么不给我写信呢？”直接提问题，不避不讳。最后又提出了调查的目标、任务和要求。在语言运用上，此信亲切而又严肃，含蓄而又深沉。其中，“我渴望你的信”，“我准给你们写回信”几句，声情并茂，内容丰富，耐人寻味，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毛泽东对同志善意的劝诫、批评，以及对同志耐心细致、诲人不倦的态度。

## “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

——致张平化<sup>[1]</sup> (1961年5月14日)

张平化同志：

你的这封信<sup>[2]</sup>，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仿照办理。都要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四日于天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张平化，1907年生，湖南酃县人。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2]指张平化1961年5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汇报了他到一个生产大队作调查，同群众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的情况。

### 【赏析】

1961年5月13日，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到一个生产大队作调查，同群众商量解决按劳分配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等情况，毛泽东阅后于次日写了这封回信。

毛泽东一贯倡导调查研究工作，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处处倾听群众的要求和呼声，通过调查弄清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方法。调查要全面、周密、细致，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敷衍了事，道听途说。张平化深入基层，走门串户，找干部群众谈话，召开座谈会，和群众商量，亲自动手解决突出问题的做法值得肯定。推广张平化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以指导湖南全省的调查研究工作，正是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

此信首先对张平化的信表示肯定：“可发湖南全省各地、市、县、社党委研究”。毛泽东为了找到更适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路子，不仅自己带头调查研究，而且善于借鉴他人的正确经验，进而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决策。让各级党委“仿照办理”一句，体现了毛泽东对此信的重视。毛泽东极力主张各级党委书记亲自作调查研究工作。他还形象地打比方说：医生看病叫诊病，先诊，中医叫望、闻、问、切，先搞清病情，然后开处方。为了掌握真实情况，他提倡坚决走群众路线，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是“下马观花”而不是“走

马观花”。摸清情况,提出分析建议,然后集思广益,作出符合群众要求的正确判断,作为政策贯彻执行。离开了调查研究,工作就会产生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错误。所以,他倡导“各级党委,不许不作调查研究工作。绝对禁止党委少数人不作调查,不同群众商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

通篇书信观点明确,旗帜鲜明,论述简要概括,采用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像“一切”、“都要”、“不许不”、“绝对禁止”等语句,加重了语气,强化了语势,显得果断干脆,大刀阔斧。另外像“关在房子里,作出害死人的主观主义的所谓政策”一句,生动形象,意味深长,既体现了毛泽东特有的语言个性,又体现了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凡事同群众商量的优良作风的极力倡导,以及对不作调查研究、不同群众商量的深恶痛绝,闪烁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读来让人精神振奋。

## “照此报告，坚决执行”

——致邓小平<sup>[1]</sup>（1961年6月22日）

小平同志：

此件<sup>[2]</sup>很好，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并且还可以减去几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不知行不行？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会大为提高。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减，则将在全国范围内大为减少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另外工人减二千万，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实行，则一个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解决了。以上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参见本书第527页注[1]。

[2]指习仲勋1961年6月19日写给中共中央的《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

### 【赏析】

1961年6月19日，习仲勋给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中央机关精简情况的报告》。《报告》说，自去年9月中央批转了《关于中央各部门机构编制情况和精简意见的报告》以后，中央各部门进行了比较认真的精简。中央各部门在京单位原有24万余人，至今已精简了8万余人，占原有人数的33%，中央各部门的司局机构撤销、合并89个，精简了15%；事业机构合并了111个，精简了26%。经过精简，改善了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充实了基层，加强了第一线，纯洁了组织。《报告》还提出对中央各部门的机构和人员再做适当精简的意见。6月22日，毛泽东针对此类问题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了这封信。

此信对习仲勋的报告，极其赞赏，并指示：“应当批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因《报告》说，从群众鸣放揭发材料看，各中央部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组织不纯、浪费人才的现象十分严重，所以，毛泽东坚决强调：“照此报告，坚决执行。”并且表示：“再减四万人”，“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肯定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要求各省、市、区一级，专区一级，县一级，这地方三级均照此计划，坚决精简。在1960年11月12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妥善安排精简下来的职工的通知》,指出,精简职工的重点放在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劳力,压缩各方面民工,动员城里没有固定工作的回农村。所以,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三级人员已有规定,如能坚决妥善地实行,则“人浮于事”的严重问题就可以解决。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采纳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先生建议,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缩小了机构,精简了人员,充实了基础,减轻了人民负担,使各级机构变得精干而有战斗力,而且密切了军民关系、军政关系,使党度过了严重的困难时期,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60年代初,由于“大跃进”的影响,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此时毛泽东精简机构和人员的主张在当时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通篇书信采用数字列举方法说明道理,深入浅出,对比鲜明。“如果中央二十四万人中,已减三分之一,即八万人”,“我想再减四万人”,“如能共减十二万人,占总数二十四万人的一半”,信中三处运用假设句,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同时,说理循序渐进,转接巧妙,寓深邃于浅显之中,读来引人掩卷沉思。

## “不计时日，以愈为度”

——致胡乔木<sup>[1]</sup>（1961年8月25日）

乔木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甚念。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sup>[2]</sup>。此诗宜读。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你的病近似陈云、林彪、康生诸同志，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问谷羽<sup>[3]</sup>好。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顺告，勿念。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胡乔木（1912—1992），江苏盐城人。1930年在北平（今北京）的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193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上海临时工委委员、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参加领导上海的左翼文化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1941年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曾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1948年任新华总社社长。1949年任新闻总署署长，1950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4年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曾参加起草1954年宪法和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1977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和名誉院长、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共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顾问。中国共产党第八、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随后召开的中顾委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中顾委常委。著有《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等。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2] 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的《曹操集》中作：“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3] 谷羽，胡乔木的夫人。

## 【赏析】

1961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经过广大干部群众反复讨论和试点,做了几次重大修改。在修改初期,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同志一直是主要执笔人。由于劳累过度,他积劳成疾,中途病休,只好由别人接替。在病休过程中,胡乔木还一直牵挂着条例的修改,表示短期休息后就投入工作。1961年8月17日,胡乔木把这一想法写在信里,寄给毛泽东,毛泽东接到信后,于同年8月25日,写了这封回信。

此信称“乔木同志”,融情于笔端,读来很觉亲切。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胡乔木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意。这次胡乔木累病,毛泽东极为挂念。正如信中所说:“8月17日信收到,甚念。”然后,毛泽东针对胡乔木信中急于工作的心情一一作了劝说:“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尽管条例草案的修改,急需像胡乔木这样的人去做,但为了身体,毛泽东劝他长期休养,直到病愈为止,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同志的关心和爱护。毛泽东坚持认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第一,工作第二,没有好的身体,工作最终也不会干好。为了说服胡乔木安心休养,毛泽东还以曹操诗为例,进一步劝导。“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这首诗是劝人“养怡”的,惟有“养怡”才能永寿。所以,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此诗宜读”。在休养的思想认识问题解决以后,毛泽东又从方式方法上作了指导:在地点上,“你似以迁地疗养为宜”;在疗养方式上,“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在时间上,“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为了进一步说明长期休养的好处,毛泽东又以陈云、林彪、康生为例,作了劝说:“林、康因长期休养,病已好了,陈病亦有进步,可以效法。”为了解决长期疗养问题,毛泽东又想到胡乔木的夫人谷羽,为了很好地照顾胡乔木,毛泽东同意,“如你转地疗养,谷宜随去。”为了使这些建议更好地适应胡乔木和谷羽的生活实际,毛泽东说:“以上建议,请你们二人商量酌定。”

通篇书信围绕胡乔木的来信层层展开,步步深化,反复举例,旁征博引,目的是让胡乔木放弃只顾工作不顾身体只进行短期休养的错误想法。在语言运用上,此信平易随和,语调深切、含蓄,读来让人感动不已。

高本同志：

八月十七日信收到。其  
余。你須長期休養，  
不計時日，以無為  
度。曹操詩云：盈  
縮之期，不獨在天。

養怡之福，因可以  
永年。此詩宜讀。  
你似以遷地悖養為  
宜，但氣候轉移，從  
事游山玩水，專看閑  
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

事，如此可就好得快些。  
你一二三月休養打算，不  
要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  
工作，又將復發。你的病  
近似陳雲林君，康生諸  
同志，林康因長期休  
養，病已好，陳病亦有進步。



可以效法。問答明  
好。如你特地療養，若宜  
隨去。以上事，請你  
們二人商量約定。  
我身心尚好，順告勿  
念。  
鮮果東 1961年  
八月二十五日



## “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致周世钊<sup>[1]</sup>(1961年12月26日)

世钊同志:

惠书收到,迟复为歉。很赞成你的意见。你努力奋斗吧。我甚好,无病,堪以靠慰。“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村”<sup>[2]</sup>。“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sup>[3]</sup>。同志,你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岂不妙哉?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周世钊,当时任湖南省副省长。参见本书第387页注[1]。

[2]见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全唐诗》卷七),下句原为“暮雨千家薜荔村”。

[3]这是湖南长沙岳麓山云麓宫望湘亭上的一副对联。摘自清末诗人黄遵让的七律《重登岳麓》(《雪竹楼诗稿》卷六),上句原为“西南云气开衡岳”。

### 【赏析】

为了更好地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鉴于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已经大大提高,而农业连续两年受灾没有完成生产计划,批准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会的公报说,1961年全国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农业战线,贯彻执行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方针,加强各行各业对农业的支援,尽最大努力争取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收成。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世钊经常思考一些问题,并把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写成信寄给毛泽东,引起了毛泽东的思考和共鸣。1961年12月26日,毛泽东写了这封复信。此信有“歉意”,也有“同意”,更有“勉意”。然而,更多的想法是一时难以用书信来表白的。所以,毛泽东只好以诗歌的形式来答友人:“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此诗以明快、纯净的色彩,将故乡久远而美丽的神话,将斑竹掩映,霞光铺彩的潇湘美景,将衔远山、吞长江、气象万千的洞庭美景融合在一起,尽情地抒发自己的乡情与友情,读来显得飘逸、瑰丽。毛泽东在信中问友人,身处“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朝云薜荔

村”、“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环境中，“岂不妙哉？”毛泽东的这首诗已经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结合了起来，把革命气概和求实精神巧妙运用于文学艺术创作中。这是何等高雅、奔放、雄奇的思想境界！

通篇书信言辞简约，内容丰富，深沉含蓄而又激情洋溢。信中两句诗的妙用，恰到好处，似抒情总结，又似自然过渡，“岂不妙哉”一句，余味无穷，使人感思不尽。

## “我们两家同是一家”

——致杨开智<sup>[1]</sup> (1962年11月15日)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sup>[2]</sup>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杨开智，毛泽东夫人杨开慧之兄。参见本书第386页注[1]。

[2] 即杨开智、杨开慧的母亲。

### 【赏析】

1962年11月，杨开智的母亲向振熙老人去世，毛泽东闻讯后十分悲痛，立即寄去500元安葬费，并发出这封信函。信中充溢着对杨开慧的深情怀念和对岳母的无限悼念之情。

毛泽东是在追求救国救民真理道路上与杨开慧相识相知的。杨开慧仰慕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毛泽东喜爱杨开慧聪慧大方、卓尔不群、刚毅不屈的巾帼风格。正是在杨老夫人的支持下，两位有情人才成眷属。九年的婚姻生活，两人相知相爱。在事业上，杨开慧是丈夫的得力助手；在感情上，她则带给丈夫无限温暖，每次长离短别，夫妻无不柔肠寸断。毛泽东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词记下了当时两人的如海深情。“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难舍的是心心相印；“热泪欲零还住”，“汽笛一声肠已断”，带走的是几多离愁别恨。1927年秋收起义前的别离竟是生死永别。1930年10月24日，杨开慧被捕，在狱中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依然严辞拒绝透露毛泽东的行踪以及刊登所谓与毛泽东脱离关系的声明。20天后，杨开慧英勇就义。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听到噩耗后，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全国一解放，毛泽东先后派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回湘扫墓。1957年他又写下了感人至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词，赞扬开慧为“骄杨”，当毛岸青夫妇索书时，又将“骄杨”改为“杨花”，尽显怀思之情。毛泽东在致杨开智这封信时已是69岁的老人，杨开慧已牺牲30余年，但他

依然动情地称其为“我亲爱的夫人”。人去魂还绕，日久思更深。此中真意，催人泪下。

通篇书信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篇幅虽短，内涵丰富。全篇不足百字，却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内涵。信中既有对已逝杨老夫人的哀悼，又有对杨开智夫妇的劝慰，更有对杨开慧烈士的深切怀念。为了不引起杨开智夫妇的过度悲伤，毛泽东没有过分地表达出“哀痛”之意，而是反复劝其“节哀”。这表现出毛泽东对杨开智夫妇的关切。

二、感情深沉，语句沉重。正是在杨老夫人的支持下，毛泽东与杨开慧不作“俗人之举”，结成连理，并双双参加革命。面对杨老夫人的去世，怎能不让她想起过去？想起过去，毛泽东的心情是悲伤的。“十分哀痛”四字，表达了悲痛的程度达到极点。“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一句，不仅是对杨老夫人的敬重，更是对杨开慧深情的怀念。

三、语气低缓，节奏缓慢。该信是唁电，“惊悉”之用，准确细腻、庄严凝重。“十分哀痛”一词，形成了一种悲痛与沉重的气氛。“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一句，意近辞繁，看似冗赘，重复，实则悲情淋漓，读之有如泣如诉，荡气回肠之感。

## “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

——致张干<sup>[1]</sup>(1963年5月26日)

次岑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悼元<sup>[2]</sup>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张干(1884—1967),字次岑,湖南新化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担任过该校校长。

[2]周悼元,即周世钊。参见本书第387页注[1]。

### 【赏析】

这封信,可以作为毛泽东关心张干的又一个例证。

1951年10月1日,张干应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国庆两周年观礼。这是他终生难忘的一天,因为是为毛泽东不计前嫌,宽容大度,才使他得以登上天安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观看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式。此行让张干心情激荡,思潮澎湃。回湘以后,张干被聘为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参议,尽管年老多病,仍愿孜孜不倦地参政议政。60年代初,张干身体多病,生活也比较困难,又因身边无人照顾,于是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提出调女儿到身边工作的要求。毛泽东收到信后,先给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写信。信上称:“老校长张干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并嘱咐周世钊:“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并希望周将“叙谈结果”相告。不久,周世钊如实回信,将叙谈结果告诉了毛泽东。1963年5月26日,毛泽东亲自给张干写了这封回信。

毛泽东抬笔之际,仿佛看到张次岑先生卧病在床的情景。张次岑年事已高,本应有人照料,何况是有病缠身呢?但是,对于张干提出的女儿调动以便侍养之事,不知能办得到否?所以,毛泽东在稍事寒暄之后,便写道:“尊恙情况,周悼元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极”字之用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张干的深切关怀。毛泽东日理万机而能为张干的病挂

念,这使张干在读信后很受感动,精神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毛泽东不仅在精神上关照他,而且“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在物质上予以接济。此信所言“薄物若干”,是毛泽东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捎给张干的2000元钱。

此信极短,仅70余字,却字字含情。毛泽东具体地、历史地看待张干,捐弃前嫌,关怀备至,不仅体现了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对老一代教育工作者的关怀,更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博大,善于团结的高贵品质。无怪乎张干读罢此信,激动万分,于病中反复叮咛子女要好好为党工作,以报答毛泽东主席和人民政府的无比关怀和厚爱。

波 浪 滿 目 如 此  
雨 次 甚 多 均 已 收  
其 為 民 為  
謝 矣



况周憶先嘗已  
見告，極為憶念。  
高上乃物，若年  
以為醫藥，之興，  
尚此收納為興。



## “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

——致章士钊<sup>〔1〕</sup>（1965年7月18日）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sup>〔2〕</sup>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sup>〔3〕</sup>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sup>〔4〕</sup>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sup>〔2〕</sup>上部，盼即寄来。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早年就读于两湖书院，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受聘《苏报》主笔，宣传革命。1904年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密谋发动长沙起义，未成，逃往上海。因参与谋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事件而被捕，不久获释。后留学日本。1908年留学英国，在爱丁堡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武昌起义后，回国，任上海《民主报》编辑。二次革命中任讨袁军秘书长。亡命日本后，参加组织欧事研究会，任书记。1914年5月在东京创办《甲寅》月刊，从事反袁宣传，不久停刊。反袁护国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务院秘书长兼两广都司令部秘书长。1917年11月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5月应邀任南方护法军政府秘书长。1921年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此时，政治与思想日趋保守，公开捍卫封建文化，反对新文化、新文学。1924年被段祺瑞执政府任命为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要求学生读经，复刊《甲寅》杂志，为封建文化张目。1925年曾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1930年后任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华北警察政務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任。抗战期间，被聘为国民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任律师。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留住北平。同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等职。1973年赴香港探亲，7

月病逝。遗著有《甲寅杂志存稿》、《长沙章氏丛稿》等。

〔2〕指章士钊所著《柳文指要》。

〔3〕指当时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此文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见,1965年7月23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

〔4〕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参见本书第305页注〔1〕。

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参见本书第354页注〔6〕。

伯达,即陈伯达。当时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参见本书第253页注〔2〕。

## 【赏析】

章士钊是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1919年经杨昌济介绍与毛泽东相识,在此后50多年的交往中,他们拔桃报李,甚为世人称道。他们都喜欢读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钊得知自己著的《柳文指要》引起了毛泽东的浓厚兴趣时,便将上下两集近一百万字的书稿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收到书稿,非常佩服。派人送去桃杏各五斤,并附信写道:“大作今收,义正辞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极相反,尚乞谅解。”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柳文指要》视为“琼瑶”,并逐字逐句地进行了认真研究。1956年7月18日,毛泽东在看完了《柳文指要》下部书稿后,给章士钊写了这封信。

此信直呼“行严先生”,表达了对章士钊的尊敬之情。“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这些话,既表达了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喜爱,又表达了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重视。章士钊著的《柳文指要》,是一部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毛泽东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谈到它,说它“颇有新意”,“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这说明毛泽东对其中许多观点是赞同的。但由于章士钊和毛泽东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差距,所以毛泽东在给别人的信中说:“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解释说,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而章士钊的世界观已经形成,要改变,似乎很难。所以毛泽东劝其“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知识和学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指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有助于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信中的“友人”是指康生,康生虽一向反对此文,但不得不表示赞同,赞有“引人入胜”之处。而后来在“文革”中身居高位的康生却提出要改变观点,被章断然拒绝。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此书稿才于1971年正式出版。

## “诗要用形象思维”

——致陈毅<sup>[1]</sup> (1965年7月21日)

陈毅同志：

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太气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因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剑英<sup>[2]</sup>善七律，董老<sup>[3]</sup>善五律，你要学律诗，可向他们请教。

### 西 行

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  
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  
海酿千钟酒，山裁万仞葱。  
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

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

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sup>[4]</sup>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sup>[5]</sup>，然其中亦有比、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sup>[6]</sup>，“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sup>[7]</sup>。韩愈<sup>[8]</sup>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以上随便谈来，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但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又李白<sup>[9]</sup>只有很少几首律诗，李贺<sup>[10]</sup>除有很少几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写。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

祝好！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 陈毅，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参见本书第313页注[1]。他写了很

多诗词,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毅诗词选集》。

[2] 剑英,即叶剑英(1897—1986),广东梅县人,字沧白。早年曾加入粤军并追随孙中山革命。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北伐战争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第四军参谋长。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司令员、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三军团参谋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1936年协助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八路军驻南京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南方局常委、中央军委参谋长。抗战胜利后,曾协助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任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央军委副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1949年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后,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市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军区司令员、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和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75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1976年10月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1978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在中共第七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一中全会和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病逝。他写的诗词现在已经出版的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远望集》和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叶剑英诗词选集》。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

[3] 董老,指董必武(1886—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名贤琬,又名用威,号璧伍。1911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参加辛亥革命。五四时期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秋与陈潭秋等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1年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武汉建立和发展湖北省的中共党组织,先后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委委员。1924年后,领导筹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常委。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1932年回国后,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执行委员、最高法院院长、工农检察委员会副主任。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到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长期参加同国民党的谈判,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重庆工委书记。1945年曾代表中国解放区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后任中共中央财经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建国后,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委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和代理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至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七届一中全会、八届一中全会、九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1975年4月2日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编为《董必武选集》。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董必武诗选》。当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副主席。

[4]杜甫,唐代诗人。

[5]见《诗集传·周南·葛覃》朱熹注。

[6]见《诗集传·周南·蟋蟀》朱熹注。

[7]见《诗集传·周南·关雎》朱熹注。

[8]韩愈,唐代文学家、诗人。

[9]李白,唐代诗人。

[10]李贺,唐代诗人。

## 【赏析】

我党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博才善文,常于戎马倥偬、日理万机之余挥毫泼墨,壮抒襟怀。他们的诗词凝聚着历史的激荡风云,激荡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透射着人民骄子的伟岸风采,是屹立在现代诗坛上的一座辉煌丰碑。其中毛泽东的诗词磅礴雄浑,陈毅的诗词豪放炽烈,都深受人民的喜爱。1965年陈毅将自己的几首近作奉送毛泽东,请求斧正。毛泽东阅后遂写了这封著名的回信。毛泽东对于诗词可谓“经纶外,诗词余事,泰山北斗”(郭沫若语),但仍以谦虚的口吻写道:“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他对陈毅的诗则高度评价为“大气磅礴”。信中还给陈毅同志学习律诗指出路子:“剑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可向他们请教”,并探讨了诗歌写作问题,指出比兴等形象思维是写好律诗的核心,强调新时代的诗歌要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诗歌创作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体现了毛泽东对诗歌源于生活的深刻认识。而毛泽东本人也正是吸取民族文学的精华,才形成了他独特的创作风格和深厚的创作底蕴。

该信是一篇诗话。毛泽东作为诗中里手,议论精当。“诗要用形象思维”一句,可谓一语破的,切中肯綮。运用形象反映生活是文艺的基本特征,缺失形象性,文艺的审美性即无从谈起,黑格尔有“一切美皆在形象中见”的著名论断,颇有道理。显然,毛泽东更是深得此中真谛的。这也是他几十年创作经验的高度概括。



## “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

——致李先念<sup>[1]</sup>（1965年8月15日）

先念同志：

“还须下一番苦功夫”，你的意见<sup>[2]</sup>很对。请你在这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务必达到藏粮于民的目的，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五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  
《毛泽东书信选集》刊印

### 【注释】

[1]李先念（1909—1992），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在家当木匠。1926年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红军游击队。曾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苏维埃主席。1931年后，相继任红四方面军团政委、师政委、三十军政委。1935年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地区与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会师。1936年秋参加红军西路军，渡河西征。1937年率西路军余部转战到新疆。同年回到延安。抗日战争爆发后，被派到鄂豫地区，任中共鄂豫边区委书记、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曾领导创建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任中原军区司令员。1946年率中原军区部队突破国民党政府军的包围后，在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坚持游击战争。1947年率部回到中原地区，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中原局副书记。建国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兼市长，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中南局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调中央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国务院第五办公室主任、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协助周恩来主持全国的经济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参加调整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工作。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至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八届一中全会至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著作编为《李先念文选》。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2]指李先念1965年8月2日在给毛泽东等的信中提出的关于纠正当时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的建议。他提出，“初步打算今后几年内把粮食征购任务稳定下来”，

粮食征购“畸轻畸重的,要进行调整,做到公平合理”,并说“要达到公平合理的要求,还须要下一番苦功夫”。

## 【赏析】

1964年以后,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备战问题摆到了全党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当时国际形势日趋严重,中国面临着美苏两国迫在眉睫的侵略威胁。在此形势下,大规模的三线(战略后方)建设开始布局。为此,党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早在1965年初,为备战、备荒,就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的小计委,专心致力于战略研究。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小计委拟定“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后,指出:“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毛泽东还提出了安排计划的几条原则,特别强调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还要留有余地,对老百姓更不要搞得太紧张,这是个原则问题。同年8月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同志,就当时一些地区粮食征购任务过重问题致信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指出:“初步打算今后几年内把粮食征购任务稳定下来”,粮食征购“畸轻畸重的,要进行调整,做到公平合理”,并说:“要达到公平合理的要求,还须要下一番苦功夫”。毛泽东读罢此信,便做了回复。

此信对于李先念信中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表示赞赏并予以充分肯定。他直接引用李先念信中的原话:“还须下一番苦功夫”,并加着重号,说明了毛泽东对李先念这一观点的完全认同。面对备战、备荒的关系问题,毛泽东与李先念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备战总得有饭吃有衣穿;备荒,同样要考虑到口粮不够吃、衣被甚少的问题。要正确处理好这一关系,达到公平合理,不下一番苦功夫是办不到的。所以在信中,毛泽东要求李先念在几年内抓紧检查督促,以达到“藏粮于民”之目的。由此可见,备战也好,备荒也好,都是为了人民。正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备战、备荒、为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才得到科学处理,鼓舞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情绪,一个以加快三线建设,搞好5亿亩稳产、高产农田为中心的生产建设热潮迅速兴起。

此信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时刻关心广大人民群众疾苦,维护着国家利益,经常思考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信中“务必……绝对不可以购过头粮”一句,凝炼简洁,果断坚决,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施政治国、泽被人民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雷厉风行、英明果断的伟人风范。

##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致江青<sup>[1]</sup>（1966年7月8日）

江青：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sup>[2]</sup>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sup>[3]</sup>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sup>[4]</sup>的地方，已有10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sup>[5]</sup>，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说：峩峩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4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

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做,他们就倒霉了。中国自从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20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20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1966年7月8日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毛泽东回湖南纪实(一九五三——  
一九七五)》刊印。

## 【注释】

[1]江青(1915—1991),山东诸城人。原名李云鹤,曾用名蓝萍。早年到山东实验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学戏。后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工作,并在海滨剧社参加演出话剧。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上海,入业余剧社等剧团,并成为电影演员。曾在上海被捕入狱。1936年曾与唐纳结婚。抗日战争爆发后赴延安。先后在抗日军政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任教。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建国初期,曾任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1961年后,进行“戏剧改革”工作。1964年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年2月在上海召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全盘否定建国以后文艺界的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任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和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成为实际领导全国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69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十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10月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一起被中共中央隔离审查。1977年在中国共产党十届三中全会上被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因而被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认定在“文化大革命”中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为首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从而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作出

裁定,认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无抗拒改造恶劣情节,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因患喉癌,不堪病痛折磨,自缢而亡。

[2]指杭州。

[3]指韶山滴水洞。

[4]指武汉。

[5]指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曾发言,大讲特讲“政变”和大搞个人崇拜。

## 【赏析】

1966年,正当我国胜利完成经济调整任务,克服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这场所谓的“大革命”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认为过去几年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没有很好的解决问题,只有用“文化大革命”这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才能彻底揭发党和国家生活中的阴暗面,把被所谓“走资派”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由于他对形势的估计和他所运用的理论、政策、方法的错误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并且被表面竭诚支持而实际另有野心的林彪等人利用。林彪等人凭借取得的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煽动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结果把“左”倾错误推向极端。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有关事项。林彪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等人要“搞政变”、“搞颠覆”。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并大肆渲染古今中外的各种政变。他还称颂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诛之。”

林彪这篇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静静地生活了12天,把思绪理了理。后在张平化、王任重、王延春陪同下抵武汉。7月8日给江青写了这封信。

这封信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离京期间在重大问题上的心路历程。

首先,信中简言叙述了离京多日的行止情况,然后,笔峰一转,写道:“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或许毛泽东从材料中得到启发,于是感叹:“天下大乱,得到天下大治。”毛泽东开始对社会的严重混乱状况采取肯定的态度。在他看来,这表明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接着毛泽东没有点名地写道:“我的朋友们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朋友”显然是指林彪。毛泽东对林彪渲染“政变”、称颂“天才”大搞个人崇拜的一些提法和反常行为,已经感觉不安。他并未被林彪的“造神”之言论所迷惑,相反他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毛泽东虽然对林彪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但却无奈,违心地发表了讲话,但对林彪的用心,认识很清楚。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

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说明毛泽东虽处乱世，迫于形势，但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此信还表述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决心。在他看来，“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他甚至以为，这次运动，“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通篇书信，内涵丰富，深沉含蓄，多处借用隐喻和历史典故表达思想感情，喻理婉转回折。“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等口语和俚语的借用，既鲜明又生动，明确地表达了毛泽东在特定时代的复杂思想和对党及国家大事的深刻认识与思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的。作为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毛泽东极为关注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努力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是十分可贵的。他为消除党风腐败现象和脱离群众现象所作的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一直赢得党和群众的拥护、支持。但他把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认我为敌，在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执掌政权的情况下还要试图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些做法，既违反马克思主义，又违背中国国情，是完全错误的。但由于局势的发展，特别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篡党夺权活动更加猖獗，毛泽东很难驾驭局势，多次预计终止“文革”皆流于落空。事实证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相反，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使全国陷于严重动乱之中。



## “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

——致林、周、<sup>[1]</sup>中央及文革各同志

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1967年12月17日）

（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

（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

（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sup>[2]</sup>。

（五）我们不要题字。

（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

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毛泽东

根据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出版的

《毛泽东回湖南纪实（一九五三——

一九七五）》刊印。

### 【注释】

[1] 林，指林彪，参见本书第114页注〔1〕。

周，指周恩来，参见本书第431页注〔1〕。

[2] 湖南集会原定日期为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

### 【赏析】

1967年1月，首先在上海，然后在全国掀起了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的狂暴行动。“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所谓“全面夺权”的新阶段。一浪高过一浪的无政府主义狂潮，使全国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之中。毛泽东虽然表示支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对于这种“打倒一切”的严重混乱状况也不能不设法约束。7月至9月，毛泽东亲自赴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指出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以斗私批修为纲，开展革命大批判，实现“大联合”和“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特别强调要搞好干群关系，多到下面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毛泽东还深入到群众中去，关心工农业生产 and 人民生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任何做法。1967



年12月13日,湖南革筹小组将一份《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递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有感而发,写了这封批示信。

此信内容丰富,简明扼要,层次清晰。

第一层意思,毛泽东认为“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并严厉地指出:“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有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毛泽东的分析是辩证的,毛泽东的态度是科学的。他的这一指示,是从理论上对“个人崇拜”意识的有力反驳。早在1966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就别有用心称颂毛泽东是“天才”,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把毛泽东的话语视为“最高指示”,从而把毛泽东的思想观点推到了“绝对权威”的地位。毛泽东在此信中的批示,实际上是一次有力的批驳,表达了他对“造神”运动的反感。

第二层意思,毛泽东针对请示电报有关“大树特树”的说法,认为也不妥。毛泽东的权威和威信是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但林彪等人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别有用心地制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运动,特别是“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的题词发表后,“四个伟大”的说法便在全国盛行起来,各地出现了大量毛泽东的塑像、语录坊和像章。毛泽东对此用人工方法建立威信的做法表示不满,并严正指出:“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另外,此信还重申了党中央禁止祝寿一事,将湖南集会的日期由原定的毛泽东的生日那天改为“另择日期”,并拒绝题字等等。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伟人毛泽东谦虚的态度以及对个人崇拜思潮的抵制。

此信在结构上采取并列式,提纲挈领;语言诚恳、严肃,语气果断,坚决,在当时人们看来,无疑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 “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

——致李庆霖<sup>〔1〕</sup>（1973 年 4 月 25 日）

李庆霖同志：

寄上 300 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毛泽东

1973 年 4 月 25 日

根据团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全鉴》（第四  
卷）刊印

### 【注释】

〔1〕李庆霖，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人，贫农，中共党员。当时为农村小学教员。

### 【赏析】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蓬勃兴起，抗美援朝战争同时也获得了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进行，在广阔的农村，人民得安宁，生活有改善，合作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毛泽东发出了“到农村去”的号召。他在为鄞县大李庄乡合作化经验写的按语中说道：“……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从此以后，越来越多的农村中小学毕业生回到农村，一些城市毕业生也开始“上山下乡”，他们志愿舍弃城市生活，远离亲人，满怀激情和理想到农村去，揭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1958 年的大跃进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农业大规模减产，饥荒降临到中国人民的面前。为了大力加强粮食生产，党中央、国务院采取非常措施，“大办农业，大办粮食”，提倡农民返乡，城里人下乡，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再掀高潮。《人民日报》社论及时地引导，把这场运动当作培养“接班人”的需要，知青运动一度出现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但“文革”开始后，调子越唱越高，数百万知青涌向农村，一系列诸如学习、住房、生产劳动、油盐柴米、人身安全、医疗卫生等严重问题无法解决，使成千上万的知青家长为自己子女的命运感到忧虑。1970 年 12 月 20 日，福建省莆田县一位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教师李庆霖，有感于自己的儿子李良模在农村面临的困难和窘境，上书毛泽东，坦陈其子的困难，并反映了当地干部子女“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等实际问题。

1973 年 4 月，李庆霖的信，终于传到了毛泽东手里。4 月 25 日，毛泽东亲自作复，写了这封信。

此信虽短，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知青运动中一系列不正常现象的关注。“寄

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表面看,是对李庆霖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但这一理解、同情、支持李庆霖的举动,反映出伟大领袖毛泽东对知青运动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不正常现象的反思和认识。从70年代初开始,各地知青中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地方无政府主义现象,对当地社会秩序、日常生活构成了严重干扰。这一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这项涉及千家万户的政策就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封书信从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毛泽东对知青政策的调整。“全国此类事情甚多,容当统筹解决”。在毛泽东写信后的第四天,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召开了解决知青问题的专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批示”,强调一定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做好,并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明确要求。1973年5月17日,中共福建省委向全省各地党组织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信的通知》,认为毛主席亲自给群众复信,意义非常深远,是对人民群众和青年一代的深切关怀。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21号文件,将毛主席的复信、李庆霖的上书和福建省委的通知,印发到公社、街道以上各级党委,并传达到下乡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当中。6月下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形成了《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经毛泽东圈阅,8月4日以中共中央30号文件转发全国,要求各级党委以毛主席的有关教导为指针,层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纠正不正之风,总结经验,推动全局。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青面临的实际困难,同时也稳定了广大知青和家长的思想和不满情绪,从而保证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狂热逐步走向理智。

此信仅有30余字,却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 “不要说没有工作”

——致江青<sup>[1]</sup> (1974年11月20日)

江青：

可读李固<sup>[2]</sup>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根据红旗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

《毛泽东的人际世界》(上)刊印

### 【注释】

[1]江青，参见本书第559页注[1]。

[2]李固(94—147)，东汉中南郡人，字子坚，初曾勉励黄琼出仕。后因上疏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为议郎。永和(136—141)中，任荆州刺史、泰山太守。后被梁冀所诬杀。

### 【赏析】

党的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在谈话中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一场“批林批孔”运动立即在全国掀起。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在“文革”中既得的权势，竭力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作文章，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等人歪曲事实，制造事端，到处揪斗老干部，批判教育界、文化界的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把政治空气搞得非常紧张。毛泽东虽然支持“批林批孔”运动，但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大动乱，对江青等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有所察觉，并多次批评：“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他警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毛泽东的告诫和批评并没有使江青集团有所收敛。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行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但江青集团置若罔闻，以为当时是他们篡夺更多权力的大好时机，加紧了阴谋活动。江青一方面给毛泽东写信，说她“九大以后基本上是闲人”，希望毛泽东对她委以重任，给她发号施令的权力；另一方面，她以自己仅有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同时她抓住“风庆轮”事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她散布谣言诬蔑国务院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联，她还要王洪文乘专机赴长沙向毛泽东报告情况，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妄图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而由他们出面“组阁”。

毛泽东当即告诫王洪文：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同时对江青来信作了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人贵有自知之明。几天以后即1974年11月20日，毛泽东又给江青写了这封信。

此信直呼“江青”，表达了一种复杂的感情。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江青野心膨胀，妄图结伙篡党夺权，对此毛泽东多次告诫，但江青一意孤行。所以信中建议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李固、黄琼都是东汉人，李固对黄琼素来仰慕，曾勉励其出仕。顺帝永建二年，黄琼被召入朝，途中称病不肯前往，经朝廷敦促，才继续向京城出发。在黄琼到达洛阳近郊时，李固写了一封信给他，即毛泽东所说的“李固给黄琼书”。信从两个方面启发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往往名实不符，以致容易被人攻击的缺点，对黄琼进行了规劝告诫。毛泽东对李固此文颇为欣赏，认为此文击中了黄琼要害，也能够给江青带来启发，促使她正确认识自己，真正做到有自知之明。针对江青来信中所说的九大以后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工作做的埋怨，毛泽东劝诫说：“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看看资料，提提意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一句，是对好高骛远，野心勃勃的江青婉转而有力的反驳。信的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

此信70余字，语言概括凝炼，语气婉转迂回，有压抑的感情，更有坚定的原则。特别是巧用诱人法，先劝其读李固给黄琼书，然后由远及近，逐渐向正题转移，最后表明态度，这正是毛泽东书信语言的艺术所在。



## 附录： 重要注释词目笔画索引

### 一 画

一二八之役 ..... 198 页注〔7〕

### 二 画

丁 玲 ..... 299 页注〔1〕

### 三 画

工学世界社 ..... 72 页注〔5〕

《大公报》 ..... 26 页注〔37〕

大柏地战斗 ..... 105 页注〔6〕

山城堡之役 ..... 198 页注〔5〕

卫立煌 ..... 470 页注〔1〕

女子工读团 ..... 47 页注〔16〕

习仲勋 ..... 335 页注〔1〕

马叙伦 ..... 422 页注〔3〕

### 四 画

王 均 ..... 171 页注〔1〕

王 佐 ..... 106 页注〔20〕

王 勃 ..... 29 页注〔8〕

王 莽 ..... 14 页注〔4〕

王以哲 ..... 166 页注〔1〕

王安石 ..... 11 页注〔7〕

王闳运 ..... 28 页注〔2〕

王首道 ..... 418 页注〔1〕

王稼祥 ..... 148 页注〔13〕

井岳秀 ..... 157 页注〔2〕

韦国清 ..... 496 页注〔1〕

太平军 ..... 306 页注〔3〕

“五毒” ..... 449 页注〔3〕



|      |            |
|------|------------|
| 五卅运动 | 128 页注[4]  |
| 长汀战斗 | 105 页注[6]  |
| 长城抗战 | 198 页注[6]  |
| 《中庸》 | 11 页注[2]   |
| 毛月秋  | 445 页注[1]  |
| 毛宇居  | 439 页注[1]  |
| 毛远梯  | 444 页注[1]  |
| 毛岸青  | 257 页注[1]  |
| 毛岸英  | 257 页注[1]  |
| 毛泽东  | 2 页注[4]    |
| 毛泽民  | 122 页注[4]  |
| 毛泽连  | 444 页注[1]  |
| 毛泽覃  | 236 页注[4]  |
| 毛钦明  | 397 页注[2]  |
| 毛森品  | 397 页注[1]  |
| 毛锡臣  | 458 页注[2]  |
| 六次大会 | 98 页注[12]  |
| 文 凯  | 404 页注[3]  |
| 文玉钦  | 90 页注[1]   |
| 文东仙  | 455 页注[3]  |
| 文运昌  | 2 页注[1]    |
| 文南松  | 404 页注[5]  |
| 文炳璋  | 468 页注[3]  |
| 文润泉  | 404 页注[1]  |
| 文梅清  | 404 页注[2]  |
| 文化书社 | 72 页注[6]   |
| 方志敏  | 106 页注[16] |
| 邓小平  | 527 页注[1]  |
| 邓子恢  | 416 页注[2]  |
| 邓宝珊  | 250 页注[1]  |
| 邓颖超  | 376 页注[2]  |
| 孔祥熙  | 176 页注[4]  |

## 五 画

|     |           |
|-----|-----------|
| 艾思奇 | 233 页注[1] |
| 左宗棠 | 59 页注[10] |
| 龙 璋 | 20 页注[17] |

|       |           |
|-------|-----------|
| 龙济光   | 24 页注〔8〕  |
| 《平民》  | 43 页注〔4〕  |
| 卢照邻   | 29 页注〔8〕  |
| 叶挺    | 105 页注〔7〕 |
| 叶剑英   | 553 页注〔2〕 |
| 叶健农   | 407 页注〔1〕 |
| 叶德辉   | 260 页注〔4〕 |
| 田家英   | 476 页注〔1〕 |
| 史沫得列  | 215 页注〔2〕 |
| “四种迷” | 72 页注〔3〕  |
| 白崇禧   | 186 页注〔1〕 |
| 白砂会议  | 115 页注〔3〕 |
| 白浪滔天  | 32 页注〔1〕  |
| 冯玉祥   | 200 页注〔1〕 |
| 冯国彰   | 19 页注〔10〕 |
| 司马懿   | 25 页注〔24〕 |
| 《民铎》  | 43 页注〔3〕  |

## 六 画

|       |            |
|-------|------------|
| 西安事变  | 204 页注〔2〕  |
| 西北野战军 | 344 页注〔7〕  |
| 达赖    | 520 页注〔7〕  |
| 朱德    | 146 页注〔1〕  |
| 朱熹    | 11 页注〔3〕   |
| 朱云卿   | 115 页注〔18〕 |
| 朱绍良   | 173 页注〔1〕  |
| 朱培德   | 106 页注〔14〕 |
| 任可澄   | 24 页注〔11〕  |
| 华盛顿   | 11 页注〔9〕   |
| 向警予   | 61 页注〔1〕   |
| 刘歆    | 14 页注〔4〕   |
| 刘人熙   | 20 页注〔18〕  |
| 刘少奇   | 342 页注〔1〕  |
| 刘亚南   | 410 页注〔1〕  |
| 刘伯承   | 146 页注〔1〕  |
| 刘明俨   | 70 页注〔4〕   |
| 刘建勋   | 496 页注〔1〕  |

|            |           |
|------------|-----------|
| 刘思齐 .....  | 517 页注〔1〕 |
| 刘揆一 .....  | 389 页注〔1〕 |
| 刘霖生 .....  | 237 页注〔5〕 |
| 齐白石 .....  | 451 页注〔1〕 |
| 齐燕铭 .....  | 287 页注〔1〕 |
| 江 青 .....  | 559 页注〔1〕 |
| 汤芑铭 .....  | 19 页注〔2〕  |
| 汤寿军 .....  | 47 页注〔13〕 |
| 许 士 .....  | 26 页注〔31〕 |
| 许德珩 .....  | 192 页注〔1〕 |
| 《红旗》 ..... | 118 页注〔5〕 |
| 孙 文 .....  | 38 页注〔4〕  |
| 孙 科 .....  | 177 页注〔4〕 |
| 孙雪苇 .....  | 283 页注〔9〕 |

## 七 画

|            |           |
|------------|-----------|
| 芬丹白露 ..... | 64 页注〔8〕  |
| 劳君展 .....  | 46 页注〔5〕  |
| 克林威尔 ..... | 11 页注〔9〕  |
| 杜 威 .....  | 55 页注〔4〕  |
| 杜斌丞 .....  | 159 页注〔1〕 |
| 杨 雄 .....  | 14 页注〔4〕  |
| 杨开智 .....  | 386 页注〔1〕 |
| 杨开慧 .....  | 122 页注〔3〕 |
| 杨成武 .....  | 432 页注〔4〕 |
| 杨虎城 .....  | 161 页注〔1〕 |
| 杨昌济 .....  | 40 页注〔6〕  |
| 杨绍萱 .....  | 287 页注〔1〕 |
| 杨润馥 .....  | 47 页注〔14〕 |
| 杨得志 .....  | 432 页注〔3〕 |
| 杨德邻 .....  | 20 页注〔19〕 |
| 李 达 .....  | 437 页注〔1〕 |
| 李 訥 .....  | 348 页注〔3〕 |
| 李 固 .....  | 566 页注〔2〕 |
| 李一纯 .....  | 47 页注〔18〕 |
| 李大钊 .....  | 47 页注〔12〕 |
| 李井泉 .....  | 530 页注〔1〕 |

|      |            |
|------|------------|
| 李六如  | 88 页注〔3〕   |
| 李石曾  | 70 页注〔5〕   |
| 李立三  | 121 页注〔1〕  |
| 李先念  | 556 页注〔1〕  |
| 李庆霖  | 564 页注〔1〕  |
| 李肖聃  | 401 页注〔3〕  |
| 李宗仁  | 186 页注〔1〕  |
| 李济深  | 295 页注〔1〕  |
| 李健侯  | 25 页注〔2〕   |
| 李烈钧  | 401 页注〔16〕 |
| 李淑一  | 78 页注〔1〕   |
| 李维汉  | 78 页注〔8〕   |
| 李富春  | 246 页注〔2〕  |
| 李鼎铭  | 295 页注〔1〕  |
| 李漱清  | 457 页注〔1〕  |
| 两广事变 | 188 页注〔3〕  |
| 护国军  | 16 页注〔5〕   |
| 《时报》 | 27 页注〔40〕  |
| 吴 晗  | 364 页注〔1〕  |
| 吴 虞  | 260 页注〔4〕  |
| 吴玉章  | 360 页注〔1〕  |
| 吴冷西  | 513 页注〔1〕  |
| 吴亮平  | 283 页注〔4〕  |
| 吴炳湘  | 26 页注〔25〕  |
| 吴稚晖  | 176 页注〔4〕  |
| 何 健  | 107 页注〔24〕 |
| 何干之  | 252 页注〔1〕  |
| 何长工  | 246 页注〔1〕  |
| 何其芳  | 525 页注〔1〕  |
| 何叔衡  | 47 页注〔9〕   |
| 何凯丰  | 282 页注〔1〕  |
| 何香凝  | 217 页注〔1〕  |
| 余光生  | 303 页注〔6〕  |
| 谷 羽  | 536 页注〔3〕  |
| 岛 夷  | 7 页注〔8〕    |
| 邹泮清  | 52 页注〔6〕   |
| 邹韬奋  | 179 页注〔1〕  |

|     |            |
|-----|------------|
| 沈仲九 | 67 页注〔10〕  |
| 沈金鉴 | 19 页注〔9〕   |
| 沈钧儒 | 179 页注〔1〕  |
| 沈铭昌 | 24 页注〔6〕   |
| 沈雁冰 | 310 页注〔1〕  |
| 宋子文 | 176 页注〔4〕  |
| 宋庆龄 | 175 页注〔1〕  |
| 宋哲元 | 164 页注〔1〕  |
| 张 干 | 546 页注〔1〕  |
| 张 贞 | 106 页注〔13〕 |
| 张 维 | 481 页注〔3〕  |
| 张 澜 | 374 页注〔1〕  |
| 张元济 | 441 页注〔1〕  |
| 张文亮 | 52 页注〔2〕   |
| 张文彬 | 159 页注〔4〕  |
| 张平化 | 532 页注〔1〕  |
| 张有成 | 446 页注〔1〕  |
| 张作霖 | 512 页注〔3〕  |
| 张国焘 | 146 页注〔1〕  |
| 张国基 | 69 页注〔1〕   |
| 张金吾 | 165 页注〔6〕  |
| 张学良 | 190 页注〔1〕  |
| 张治中 | 503 页注〔1〕  |
| 张树勋 | 19 页注〔4〕   |
| 张闻天 | 148 页注〔13〕 |
| 张敬尧 | 59 页注〔12〕  |
| 陆 游 | 324 页注〔3〕  |
| 陆定一 | 337 页注〔1〕  |
| 陆荣廷 | 20 页注〔13〕  |
| 邵力子 | 169 页注〔1〕  |
| 陈 云 | 489 页注〔1〕  |
| 陈 昌 | 7 页注〔6〕    |
| 陈 庚 | 343 页注〔6〕  |
| 陈 亮 | 324 页注〔3〕  |
| 陈 宦 | 20 页注〔21〕  |
| 陈 毅 | 313 页注〔1〕  |
| 陈正人 | 530 页注〔1〕  |

|     |            |
|-----|------------|
| 陈丕显 | 427 页注〔1〕  |
| 陈伯达 | 253 页注〔2〕  |
| 陈奇涵 | 250 页注〔2〕  |
| 陈叔通 | 420 页注〔1〕  |
| 陈国辉 | 106 页注〔12〕 |
| 陈昌浩 | 148 页注〔13〕 |
| 陈独秀 | 81 页注〔4〕   |
| 陈济棠 | 167 页注〔4〕  |
| 陈嘉庚 | 368 页注〔1〕  |

## 八 画

|       |            |
|-------|------------|
| 耶 苏   | 40 页注〔11〕  |
| 范长江   | 244 页注〔1〕  |
| 范文澜   | 259 页注〔1〕  |
| 范仲淹   | 40 页注〔15〕  |
| 林 彪   | 144 页注〔1〕  |
| 林伯渠   | 92 页注〔1〕   |
| 直罗镇之役 | 197 页注〔2〕  |
| 欧阳山   | 299 页注〔1〕  |
| 欧阳泽   | 64 页注〔1〕   |
| 易礼容   | 85 页注〔2〕   |
| 易昌陶   | 7 页注〔7〕    |
| 罗 素   | 55 页注〔4〕   |
| 罗 哲   | 481 页注〔2〕  |
| 罗佩金   | 24 页注〔13〕  |
| 罗学瓚   | 72 页注〔1〕   |
| 罗章龙   | 67 页注〔1〕   |
| 罗斯福   | 26 页注〔31〕  |
| 罗隆基   | 374 页注〔3〕  |
| 征南军   | 58 页注〔8〕   |
| 金汉鼎   | 106 页注〔19〕 |
| 周 文   | 276 页注〔5〕  |
| 周 扬   | 293 页注〔1〕  |
| 周 骏   | 25 页注〔16〕  |
| 周文楠   | 408 页注〔1〕  |
| 周以栗   | 137 页注〔1〕  |
| 周世钊   | 387 页注〔1〕  |

|     |           |
|-----|-----------|
| 周谷城 | 505 页注〔1〕 |
| 周陈轩 | 408 页注〔2〕 |
| 周恩来 | 431 页注〔1〕 |
| 周泰园 | 226 页注〔1〕 |
| 周敦祥 | 46 页注〔5〕  |
| 变工队 | 303 页注〔5〕 |
| 郑佩宜 | 324 页注〔2〕 |

## 九 画

|      |            |
|------|------------|
| 赵恒惕  | 59 页注〔14〕  |
| 胡适   | 259 页注〔3〕  |
| 胡乔木  | 536 页注〔1〕  |
| 胡宗南  | 173 页注〔3〕  |
| 胡瑞霖  | 24 页注〔7〕   |
| 柏格森  | 55 页注〔4〕   |
| 柏路会议 | 115 页注〔11〕 |
| 柳午亭  | 401 页注〔3〕  |
| 柳亚子  | 323 页注〔1〕  |
| 柳直荀  | 401 页注〔2〕  |
| 威尔逊  | 26 页注〔30〕  |
| 段芝贵  | 26 页注〔25〕  |
| 段祺瑞  | 24 页注〔4〕   |
| 俾士马克 | 11 页注〔5〕   |
| 饶漱石  | 427 页注〔1〕  |
| 施复亮  | 87 页注〔1〕   |
| 恽代英  | 105 页注〔9〕  |
| 洪禹   | 330 页注〔1〕  |
| 《觉悟》 | 170 页注〔2〕  |
| 贺龙   | 105 页注〔7〕  |
| 贺昌   | 106 页注〔10〕 |

## 十 画

|             |           |
|-------------|-----------|
| 秦邦宪         | 303 页注〔1〕 |
|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 466 页注〔1〕 |
| 袁文才         | 98 页注〔11〕 |
| 袁世凯         | 11 页注〔6〕  |
| 聂荣臻         | 314 页注〔6〕 |



|         |            |
|---------|------------|
| 晋冀鲁豫野战军 | 344 页注[8]  |
| 埃德加·斯诺  | 215 页注[1]  |
| 贾 谊     | 29 页注[7]   |
| 贾拓夫     | 320 页注[3]  |
| 夏 希     | 93 页注[7]   |
| 倪嗣冲     | 26 页注[25]  |
| 徐向前     | 148 页注[13] |
| 徐特立     | 208 页注[1]  |
| 徐悲鸿     | 458 页注[2]  |
| 高 岗     | 276 页注[3]  |
| 高桂滋     | 157 页注[1]  |
| 郭沫若     | 305 页注[1]  |
| 唐 蟒     | 20 页注[17]  |
| 唐三藏     | 283 页注[5]  |
| 唐继尧     | 58 页注[4]   |
| 旅京学会    | 55 页注[5]   |
| 陶 侃     | 11 页注[9]   |
| 陶 毅     | 46 页注[1]   |
| 陶行知     | 179 页注[1]  |
| 陶忠恂     | 20 页注[16]  |

## 十一画

|        |           |
|--------|-----------|
| 黄 兴    | 21 页注[22] |
| 黄克功    | 228 页注[2] |
| 黄克诚    | 416 页注[1] |
| 黄炎培    | 382 页注[1] |
| 萧 三    | 255 页注[1] |
| 萧 军    | 270 页注[1] |
| 萧子升    | 10 页注[1]  |
| 萧劲光    | 246 页注[2] |
| 梅特涅    | 25 页注[24] |
| 曹 琨    | 19 页注[8]  |
| 曹 操    | 25 页注[24] |
| 曹子谷    | 478 页注[3] |
| 曹云芳    | 481 页注[1] |
| 《盛世危言》 | 2 页注[2]   |
| 符定一    | 339 页注[1] |

|     |           |
|-----|-----------|
| 康 生 | 354 页注〔6〕 |
| 康有为 | 7 页注〔4〕   |
| 章乃器 | 179 页注〔1〕 |
| 章士钊 | 551 页注〔1〕 |
| 章炳麟 | 29 页注〔2〕  |
| 望云亭 | 19 页注〔7〕  |
| 阎锡山 | 203 页注〔1〕 |
| 梁启超 | 7 页注〔5〕   |

## 十二画

|      |            |
|------|------------|
| 彭 真  | 489 页注〔1〕  |
| 彭 璜  | 85 页注〔1〕   |
| 彭石麟  | 460 页注〔1〕  |
| 彭素民  | 92 页注〔1〕   |
| 彭雪峰  | 204 页注〔6〕  |
| 彭德怀  | 291 页注〔1〕  |
| 斯宾塞尔 | 12 页注〔20〕  |
| 葛健豪  | 61 页注〔3〕   |
| 董必武  | 554 页注〔3〕  |
| 董其武  | 433 页注〔5〕  |
| 董振堂  | 201 页注〔7〕  |
| 蒋介石  | 197 页注〔1〕  |
| 蒋光鼐  | 133 页注〔3〕  |
| 蒋竹如  | 472 页注〔1〕  |
| 蒋伯诚  | 106 页注〔11〕 |
| 蒙达尔尼 | 65 页注〔9〕   |
| 粟 裕  | 354 页注〔5〕  |
| 程 潜  | 380 页注〔1〕  |
| 程颂万  | 478 页注〔2〕  |
| 傅作义  | 204 页注〔7〕  |
| 傅良佐  | 59 页注〔12〕  |
| 舒 群  | 283 页注〔3〕  |
| 鲁 迅  | 283 页注〔6〕  |
| 鲁涤平  | 129 页注〔5〕  |
| 曾 毅  | 58 页注〔1〕   |
| 曾国藩  | 7 页注〔2〕    |
| 曾继梧  | 20 页注〔15〕  |

|             |           |
|-------------|-----------|
| 《湖南公报》      | 26 页注〔38〕 |
| 湖南改造促成会     | 59 页注〔15〕 |
| 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 | 47 页注〔11〕 |
| 《湘江评论》      | 52 页注〔6〕  |
| 谢觉哉         | 273 页注〔1〕 |
| 谢富治         | 343 页注〔6〕 |

### 十三画

|        |           |
|--------|-----------|
| 蒲鲁东    | 78 页注〔7〕  |
| 雷经天    | 228 页注〔1〕 |
| 靖国军    | 58 页注〔8〕  |
| 《新湖南》  | 43 页注〔2〕  |
| 《新民丛报》 | 页注〔3〕     |
| 新民学会   | 46 页注〔3〕  |
| 《群学肄言》 | 11 页注〔11〕 |

### 十四画

|     |            |
|-----|------------|
| 嘉 纳 | 29 页注〔11〕  |
| 蔡 畅 | 62 页注〔4〕   |
| 蔡 锷 | 24 页注〔14〕  |
| 蔡元培 | 184 页注〔1〕  |
| 蔡廷锴 | 133 页注〔3〕  |
| 蔡和森 | 77 页注〔1〕   |
| 臧克家 | 487 页注〔1〕  |
| 廖 平 | 260 页注〔4〕  |
| 廖承志 | 218 页注〔3〕  |
| 廖静文 | 458 页注〔1〕  |
| 谭 政 | 246 页注〔2〕  |
| 谭世瑛 | 414 页注〔1〕  |
| 谭延闿 | 25 页注〔22〕  |
| 谭震林 | 137 页注〔1〕  |
| 熊式辉 | 106 页注〔14〕 |
| 熊光楚 | 13 页注〔2〕   |

### 十五画

|     |          |
|-----|----------|
| 樊增祥 | 29 页注〔2〕 |
| 黎元洪 | 24 页注〔5〕 |

|            |           |
|------------|-----------|
| 黎锦熙 .....  | 13 页注〔1〕  |
| 德 王 .....  | 165 页注〔4〕 |
| 滕代远 .....  | 246 页注〔2〕 |
| 摩哈默德 ..... | 40 页注〔11〕 |
| 颜 子 .....  | 29 页注〔6〕  |
| 潘汉年 .....  | 181 页注〔4〕 |

#### 十六画

|             |           |
|-------------|-----------|
| 薄一波 .....   | 420 页注〔2〕 |
| 冀察政委会 ..... | 159 页注〔2〕 |

#### 十七画

|           |           |
|-----------|-----------|
| 戴 戡 ..... | 24 页注〔12〕 |
| 魏 璧 ..... | 46 页注〔5〕  |

## 再版后记

我们满怀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无限敬仰,面对一些关于毛泽东轶闻轶事书刊的出版,渴望在对原始文献资料的学习钻研中,通过自己的领会、思考去认识、理解毛泽东及其经历的那个时代,于是选择了书信这一前后跨越时间长、几乎贯穿毛泽东一生的独特领域,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沿着文学欣赏和史料考证这两条殊途同归的小道,开始了我们艰辛的攀登。

毛泽东书信内容之广博,思想之深邃,特点之突出,不能不令人惊叹!政治、军事、外交、教育、科技、文化、艺术、新闻、哲学、伦理……包罗万象,无所不容。老师面前,他始终是学生,友人眼里,他永远是益友;于真理追索,他锲而不舍,对革命事业,他孜孜以求;国家存亡之秋,他是一个勇敢的民族英雄,治国兴邦之时,他是一个可敬的人民领袖……这近60年间的190封书信,展示了毛泽东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活灵活现的生动形象。

把握每封信的核心内容,挖取每封信的主要特点,理清每封信的艺术特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研究毛泽东著作的方法各种各样,我们所谓的“赏析”,是在研读原著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文献史料的纵横比较、反复论证,对原著进行的合理的讲解、分析和评价。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融进赏析者本人的认识和发挥,特别是毛泽东超群的艺术才华在信中时时闪现,不同的读者也许有不同的艺术感受,我们的赏析,权作抛砖引玉。希望这部书稿能给读者展现出一个血肉丰满、伟大而真实的毛泽东形象,能让读者触摸到那逝者如斯,沧桑而风流的历史脉搏,能使读者采摘到朵朵启人智、海人行的思想火花……

建夫和我是同乡,我们同年出生在曾养育了王愿坚、王统照、王希坚等一批文化名士的那个小乡镇;建夫和我是同学,我们一同在孔子故里曲阜接受了良好的大学教育;建夫更与我同志,我们一同提出了这个很大的课题。毛泽东逝世那年我们刚刚走进小学校门,和许多同龄人一样,对毛泽东及其经历的那个时代充满着敬仰和好奇。工作后,我们正是怀着这种敬仰和好奇,笔耕不辍,利用业余休息时间完成了这部书稿。1997年11月,书稿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又借鉴了一些最新研究成果,对第一版书稿进行了补充、修订和完善,使书稿更趋完美。

需要指出的是,在成稿、初版和再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许多前辈、专家和志同道合者的鼎力相助。中国现当代著名诗人、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名誉会长臧克家老前辈,不顾年事已高,一直关心着本书的进程。每每趋前聆教,他总能以诗人的灵性,学者的才识和丰富而成熟的人生阅历,高屋建瓴,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曾长时间从事青年工作,现已任安徽省副省长的赵树丛,也与臧老一起欣然担任了本书初版和再版时的顾问。正是在他们的精心指导、热心帮助和关心鼓励下,我们才满怀信心,矢志不渝,不断在荆棘丛中采摘到芳香馥郁的累累硕果。当时任山东党史研究会副会长、山东高校中国革命史教学研究会会长的徐树绩教授,在本书初版时审阅了大部分稿件并命笔作序。我们还得到了刘守安、

刘相、别立平、崔斌、胡廷正、穆宝忠、罗长娟等良师益友的大力帮助。

特别欣慰的是,我国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中石先生,在本书再版时题写了书名。

向所有帮助我们的人,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由于编著条件和我们知识水平、认识水平所限,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专家批评指正。

王树山

于泉城济南闵子骞路

2004年1月再版时根据1997年8月第一版后记修改